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一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2年 北京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譯出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編譯、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譯校过程中参考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一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7 $\frac{1}{2}$ · 插頁 9 · 字数 645,000

1962 年 6 月第 1 版

196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书号 1001·528 定价(四) 2.80 元

目 录

| | |
|------------------------------|-----------|
| 第十一卷說明 | XI—XXXIII |
| 卡·馬克思。議會常会開幕 | 3—6 |
| 卡·馬克思。論內閣的危机 | 7—8 |
| 卡·馬克思。議會状况 | 9—13 |
| 弗·恩格斯。欧洲战争..... | 14—19 |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議會新聞。——战区消息..... | 20—24 |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上一届英国政府 | 25—32 |
| 卡·馬克思。論內閣危机 | 33—37 |
| 卡·馬克思。阿伯丁內閣的倒台 | 38—45 |
| 卡·馬克思。被推翻的內閣 | 46—49 |
| 卡·馬克思。政党和集团 | 50—52 |
| 卡·馬克思。两种危机 | 53—56 |
| 弗·恩格斯。克里木的斗争 | 57—61 |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帕麦斯顿。——军队..... | 62—65 |
| 卡·馬克思。*議會新聞: 格萊斯頓的发言 | 66—67 |
| 卡·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 | 68—75 |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編者注

| | |
|--|---------|
| 一 | 68—71 |
| 二 | 71—75 |
| 卡·馬克思。赫伯特的重新当选。——新內閣的最初 措施。——东印度的消息 | 76—78 |
| 卡·馬克思。議會 | 79—83 |
| 卡·馬克思。托利党人同激进派的联合 | 84—86 |
| 弗·恩格斯。欧洲面临的战争 | 87—94 |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議會和軍事問題 | 95—97 |
| 卡·馬克思。論新的內閣危机 | 98—101 |
| 卡·馬克思。休謨 | 102—103 |
| 卡·馬克思。*帕麦斯顿和英国的寡头政治 | 104—107 |
| 卡·馬克思。不列颠宪法 | 108—111 |
| 卡·馬克思。累亚德 | 112—113 |
| 卡·馬克思。英国的危机 | 114—117 |
| 卡·馬克思。軍銜买卖。——澳大利亚消息 | 118—121 |
| 卡·馬克思。英国报刊論沙皇逝世 | 122—123 |
| 一 | 122—123 |
| 二 | 123 |
| 卡·馬克思。論同法国联盟的历史 | 124—127 |
| 卡·馬克思。調查委员会 | 128—131 |
| 卡·馬克思。布魯塞尔回忆录 | 132—133 |
| 卡·馬克思。爱尔兰的复仇 | 134—137 |
| 弗·恩格斯。克里木事件 | 138—141 |
| 弗·恩格斯。大冒險家的命运 | 142—145 |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 | 146—149 |

| | |
|-----------------------------|---------|
| 卡·馬克思。*报刊的反普魯士运动。——斋戒日。—— | |
| 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冲突····· | 150—153 |
| 卡·馬克思。*倫敦飯店中的群众大会····· | 154—157 |
| 卡·馬克思。英国报刊的消息····· | 158—159 |
| 卡·馬克思。*議會新聞:上院关于普魯士的辯論····· | 160—165 |
| 弗·恩格斯。拿破侖最近的詭計····· | 166—169 |
| 弗·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会战····· | 170—174 |
| 卡·馬克思。論同法国联盟的历史····· | 175—178 |
| 卡·馬克思。拿破侖和巴尔貝斯。——報紙印花稅····· | 179—181 |
| 卡·馬克思。*調查委員會的揭露····· | 182—185 |
| 卡·馬克思。不列顛軍隊····· | 186—190 |
| 弗·恩格斯。战争的进程····· | 191—195 |
| 弗·恩格斯。論克里木局勢····· | 196—199 |
| 卡·馬克思。法国立法团的丑事。——德魯安·德· | |
| 路易的影响。——民軍的現狀····· | 200—202 |
| 卡·馬克思。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 | 203—208 |
| 弗·恩格斯。評拿破侖在“通报”上的社論····· | 209—213 |
| 弗·恩格斯。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 | 214—217 |
| 弗·恩格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 | 218—225 |
| 一····· | 218—220 |
| 二····· | 221—225 |
| 卡·馬克思。論鼓动运动的历史····· | 226—229 |
| 弗·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 | 230—236 |
| 卡·馬克思。皮阿諾里。——对奥地利的不滿····· | 237—239 |
| 弗·恩格斯。克里木战局····· | 240—243 |

- 卡·馬克思。“晨邮报”反对普魯士。——輝格党和托利党……………244—246
- 卡·馬克思。上院會議……………247—251
- 卡·馬克思。*資產階級反对派和宪章派……………252—255
- 卡·馬克思。金融市場……………256—258
- 弗·恩格斯。克里木战争……………259—266
- 卡·馬克思。关于改革运动……………267—269
- 卡·馬克思。評克里木局勢。——議會新聞……………270—273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帕麦斯頓勋爵官邸演出的
喜剧序幕。——克里木最近事件的經過……………274—277
- 卡·馬克思。議會改革。——維也納會議的中断和恢复。——所謂歼灭性战争……………278—282
- 卡·馬克思。迪斯累里的提案……………283—287
- 卡·馬克思。*議會新聞;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辯論……………288—294
- 卡·馬克思。对帕麦斯頓最近一次演說的批評……………295—297
- 卡·馬克思。*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298—302
- 卡·馬克思。*議會关于战争的辯論……………303—307
- 弗·恩格斯。克里木的消息……………308—311
- 弗·恩格斯。評克里木事件……………312—315
- 卡·馬克思。*英国議會中的辯論……………316—319
- 弗·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320—325
- 弗·恩格斯。拿破侖的軍事計劃……………326—332
- 卡·馬克思。納皮尔的信。——罗巴克委员会……………333—336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下院的事件。——克里木
战争……………337—339

- 卡·馬克思。阿尔伯特亲王的祝詞。——报纸印花稅……340—342
- 卡·馬克思。奇怪的政策 ……………343—347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局部战争。——关于行政
改革的辯論。——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 ……………348—352
- 卡·馬克思。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巴
黎交易所新聞。——上院关于汉格暴行的辯論 ……………353—357
- 卡·馬克思。六月十八日的失利。——增援部队 ……………358—362
- 卡·馬克思。*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 ……………363—369
- 卡·馬克思。消息数則 ……………370—374
- 弗·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 ……………375—381
- 卡·馬克思。消息数則 ……………382—384
- 卡·馬克思。关于更严格地遵守星期日例假制的法案
所引起的風潮 ……………385—389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人民同警察的冲突。——
論克里木事件 ……………390—393
- 弗·恩格斯。六月十八日的强攻 ……………394—397
- 卡·馬克思。*議會新聞: 罗巴克和布尔韦尔的提案 ……………398—400
- 卡·馬克思。*議會新聞: 布尔韦尔提案, 爱尔兰問題 ……………401—404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罗素的辞职。——克里木
事件 ……………405—408
- 卡·馬克思。罗素的辞职 ……………409—411
- 卡·馬克思。在議會內 ……………412—414
- 弗·恩格斯。战争的前景 ……………415—419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議會新聞。——战区消息 ……………420—423
- 卡·馬克思。帕麦斯顿。——大不列颠統治階級的生

| | |
|---|---------|
| 理現象 | 424—428 |
| 卡·馬克思。約翰·羅素勛爵 | 429—455 |
| 一 | 431—434 |
| 二 | 435—438 |
| 三 | 439—442 |
| 四 | 443—446 |
| 五 | 447—451 |
| 六 | 452—455 |
| 卡·馬克思。北明翰代表會議：丹麥王位繼承問題和 四項保證問題 | 456—462 |
| 一 | 456—460 |
| 二 | 460—462 |
| 弗·恩格斯。歐洲軍隊 | 463—538 |
| 第一部分 | 465—492 |
| 一 法國軍隊 | 471—480 |
| 二 英國軍隊 | 480—488 |
| 三 奧地利軍隊 | 488—492 |
| 第二部分 | 493—516 |
| 一 普魯士軍隊 | 493—501 |
| 二 俄國軍隊 | 501—514 |
| 三 德意志各小邦的軍隊 | 514—516 |
| 第三部分 | 517—538 |
| 一 土耳其軍隊 | 517—523 |
| 二 撒丁軍隊 | 523—527 |
| 三 意大利各小國的軍隊 | 527—528 |
| 四 瑞士軍隊 | 529—530 |

| | |
|-------------------------------|---------|
| 五 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军队 | 530—533 |
| 六 荷兰军队 | 533—534 |
| 七 比利时军队 | 534 |
| 八 葡萄牙军队 | 534—535 |
| 九 西班牙军队 | 535—538 |
| 卡·马克思。辛普森将军的辞职。——议会新闻 | 539—540 |
| 卡·马克思。评议会的辩论 | 541—544 |
| 卡·马克思。反对俄国的兵力 | 545 |
| 卡·马克思。波兰集会 | 546—550 |
| 卡·马克思。对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的批判 | 551—554 |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英法对俄战争 | 555—560 |
| 一 | 555—557 |
| 二 | 557—560 |
| 卡·马克思。论战区事件 | 561—563 |
| 卡·马克思。纳皮尔的信 | 564—565 |
| 卡·马克思。奥地利和战争 | 566—571 |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对英国兵士的惩罚办法 | 572—574 |
| 弗·恩格斯。黑河会战 | 575—581 |
| 卡·马克思。英国的新揭露材料 | 582—588 |
| 弗·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 | 589—593 |
| 卡·马克思。奥康瑙尔的葬礼 | 594 |
| 弗·恩格斯。克里木战争的前景 | 595—600 |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克里木事件 | 601—603 |
| 卡·马克思。贸易和财政状况 | 604—606 |
| 弗·恩格斯。俄国的抵抗力量 | 607—609 |

| | |
|---|---------|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將軍們的報告。——英 国的法庭。——来自法国的消息 | 610—613 |
| 弗·恩格斯。戰爭的決定性事件 | 614—623 |
| 卡·馬克思。官方財政報告 | 624—626 |
| 卡·馬克思。法兰西銀行。——克里木的增援部队。 ——新元帅 | 627—629 |
| 弗·恩格斯。軍事行动的进程 | 630—635 |
| 弗·恩格斯。俄国軍隊 | 636—641 |
| 卡·馬克思。傳統的英国政策 | 642—645 |
| 弗·恩格斯。亚洲战争 | 646—652 |
| 弗·恩格斯。欧洲战争 | 653—657 |
| 卡·馬克思。英美冲突。——法国的局势 | 658—664 |
| 卡·馬克思。小波拿巴法国 | 665—671 |
| 卡·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 | 673—712 |
| 一 | 675—683 |
| 二 | 684—694 |
| 三 | 695—704 |
| 四 | 705—712 |
| 卡·馬克思。普魯士 | 713—718 |
| 注釋 | 721—778 |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 779—796 |
| 人名索引 | 797—833 |
| 期刊索引 | 834—836 |
| 地名索引 | 837—846 |

插 图

- 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战区图262—263
- 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时期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图396—397
- 弗·恩格斯绘制的1855年8月16日(4日)黑河会战略图576—577
- 弗·恩格斯所写的克里木战争大事记.....621
- 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总进程图656—657

第十一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收集了他們在1855年1月底至1856年4月这一时期的論文和通訊。这些作品大部分在德国資產階級民主派報紙“新奧得報”上发表过。馬克思从1854年12月底起就是該報的撰稿人。同时，他繼續給当时进步的美国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写文章。和前几年一样，馬克思的某些著作是在厄·琼斯主編的、1852年5月創刊的宪章派机关報“人民報”上发表的。

在政治反动的条件下，在几乎完全沒有工人報刊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報刊的情况下，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須利用进步的資產階級報紙来联系群众并促成有利于无產階級的社会輿論，来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馬克思为“新奧得報”撰稿使他有可能与德国保持更紧密的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认为这一点有很大的意义），有可能对德国讀者闡明国际政治、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的經濟发展和政治状况方面最重要的問題，以及工人运动和資產階級民主运动的問題。

因为馬克思为“新奧得報”和“紐約每日論壇報”写文章几乎要占去他的全部時間并使他中断在政治經濟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而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一部分給“論壇報”写的文章，根据馬克思的請求是由恩格斯

写的。这些文章主要是軍事評論。馬克思也时常把这些軍事評論譯成德文，送到“新奧得报”去发表。在个别情况下，馬克思由于考虑到为德国写通訊稿的特殊条件，于是用自己的文字把恩格斯的軍事論文的内容表达出来，或者对这些論文作某些改动、縮減，有时他自己又写一些对議會辯論和国际事件的評論补充进去。这些文章实际上是两位作者的劳动成果，是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創造性合作的范例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政論文章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在五十年代革命活动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同他們的理論研究工作、同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論的工作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馬克思在这个时期除了研究政治經济学以外，还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問題。恩格斯繼續研究軍事科学，首先是軍事学术史，他研究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历史，研究語言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研究的成果一部分反映在他們的論文和通訊中。同时，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写稿过程中收集了新的实际資料，后来他們在自己的科学著作中利用了这些資料。例如，在給“新奧得报”写的論文中所引用的关于爱尔兰土地关系的某些材料和工厂視察員的报告后来都被馬克思用在“資本論”中。

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革命的政論文章对于五十年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利用在普魯士反动的条件下出版的“新奧得报”的篇幅来进行革命宣傳有困难，尽管在許多問題上和“紐約每日論壇报”的編輯們有分歧，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能够在他們的政論文章中貫徹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路綫。他們揭露了欧洲各国的反动制度，揭示了資本主义制度的濃疮，抨击了被統治阶级用来为这个制度作思想辯护的反動理論。馬克思和恩格

斯在自己的文章中論证了无产階級在欧洲各国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最重要問題上的策略問題。他們运用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当时的事件，并且通过具体的实例說明了他們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規律的作用，繼續具体化了并发展了他們关于社会的唯物主义学說和階級斗争的理論。

在本卷文章所談到的很多問題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最注意国际关系和当时进入結束阶段的克里木战争。本卷中有关这些題目的文章，就其內容來說是全集第九卷和第十卷所发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东方問題的論文的繼續。在这一卷里占很大篇幅的是評述欧洲各国首先是英国的經濟和內部政治状况的文章以及專門論述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

馬克思主义奠基人是以无产階級革命家的态度来分析所有这些問題，来評价历史事件的，他們首先注意到欧洲資產階級民主运动和无产階級运动新高潮的前景，他們坚信这种新高潮的到来。正如弗·伊·列宁所指出的，他們在决定无产階級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路綫时，是从1789—1871年这一时期的客观条件出发的，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資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間的斗争还未結束。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中，就是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务也还未解决，摆在日程上的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摧毁这些制度，推翻異族压迫”。（“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80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欧洲彻底革命地实现資產階級民主改造是胜利地进行无产階級革命的必要条件。他們在这一时期的策略，即由无产階級革命者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也曾面临的那些基本任务所决定的策略，基本上是“新萊茵报”在1848—1849年

的革命策略的繼續，不过它采取了适应已經改变了的历史情况的新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的危机”、“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指示工人階級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要利用国际冲突，即克里木战争来发展反对現存反革命制度的欧洲革命。他們着重指出，工人階級的利益要求使統治階級发动的以反人民为目的的克里木战争成为爆发大規模革命事件的推动力。馬克思希望这些事件“将使无产階級能够重新取得它在法国 1848 年六月战斗中所失去的地位。这不仅关系到法国，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中欧，包括英国在內。”（見本卷第 208 頁）

馬克思主义奠基人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法国无产階級的革命主动性上。恩格斯在“大冒險家的命运”一文中談到“第四次并且是最偉大的一次法国革命”的可能性时指出，这次革命能引起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震蕩。“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克罗地亚人就将摆脱硬把他們拴在一起的鎖鏈，而重新形成旗帜不同、目标各異的两大陣营，以代替欧洲今日不稳定的偶然的联合和敌对。那时斗争将只在一方面是民主革命和另一方面是君主反革命之間进行。”（見本卷第 145 頁）

像在 1848—1849 年一样，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专制制度是欧洲封建专制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他們在一系列的文章中揭露了在沙皇俄国占統治地位的农奴制度，揭穿了沙皇政府的掠夺计划和沙皇政府的外交活动，揭示了沙皇政府和欧洲其他反革命势力一道在镇压革命运动中所扮演的警察角色。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欧洲列强的統治階級竭力保全和利用沙皇制度作为反对革命的工具的企图。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摧毁沙皇制度、消除它

对欧洲的反动影响,是使欧洲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前提。

恩格斯在“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中,揭示了沙皇专制政府企图利用欧洲中部和南部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反革命性质,揭示了沙皇政府要把斯拉夫人联合起来的号召变为自己掠夺政策的手段之一的意图。恩格斯在說明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反动实质时指出,散布这些思想的一些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的君主派分子,在1848—1849年在客观上起了支持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反对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一切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等。他們強調指出,这种思想体系会造成各民族之間的民族糾紛,它是同各个民族(包括斯拉夫民族)的民主发展、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馳的。

恩格斯支持南方斯拉夫人和波兰人的独立要求,但是,他并不把这种要求推广到属于奥地利帝国的其他一些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拉伐克人等)。在“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中,恩格斯談到这些民族和它們的前途,他是从他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两著作中就已经提出的錯誤論点出发的,即认为这些民族似乎已失去了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的能力,因而必定要为較强的邻族吞并(关于这一点,詳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和第8卷的說明)。得出这样的結論主要是因为恩格斯认为集中、建立大国和大民族吞并小民族是資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趋向,而沒有充分地估計到另一种趋向,即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努力爭取民族独立的趋向。历史經驗表明,以前曾加入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不仅显示出它們有能力作为独立的民族

而发展, 建立自己的国家組織, 而且能够和社会主义陣营的其他民族一道成为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創造者。

为了民主地改造欧洲、解放被压迫的民族、通过革命的民主道路联合德国和意大利, 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必須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战争, 他們揭穿了英法統治阶级为了侵略目的、为了巩固欧洲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寡头政治制度而发动战争的政策。

在本卷的許多論文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詳尽地分析历史事实、外交文件包括 1855 年維也納會議的議定书和議會辯論等材料的基础上, 揭露了克里木战争发生的原因和真正的性质。他們揭穿了国家活动家們和西欧官方报刊的虛伪的声明, 这些声明把英法对俄战争描繪成是“保卫”土耳其独立、反对“专制”爭取“自由”和“文明”的战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文章中证明, 克里木战争的爆发首先是参战各国的經濟利益和軍事利益发生冲突的結果, 这个战争的性质是由这些国家的統治阶级的利己政策决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欧洲列强在近东的矛盾, 說明了这些列强为了分割土耳其帝国、爭夺在巴尔干和黑海海峽的霸权而进行的斗争, 以及它們在中亚細亚的竞争。

馬克思在“帕麦斯顿。——大不列颠統治阶级的生理現象”和其他文章中, 揭露了西方列强对待它們的“盟国”土耳其的政策。他揭穿了欧洲列强对落后的土耳其实行殖民奴役的掠夺手段, 其中包括在援助的幌子下强迫土耳其接受財政上的奴役。馬克思指出, 西方列强把土耳其的外交部和內政部置于它們的監督之下, 掌握着它的軍隊并“正把手伸向土耳其的財政”。(見本卷第 425 頁)

在“奇怪的政策”一文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 馬克思揭露了英

法統治階級在克里木戰爭中所追求的真正的政治目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看到，資產階級寡頭政體的英國和波拿巴法國力求除掉俄國這個在近東和中東的對手，力圖奪取塞瓦斯托波爾，奪得俄國的高加索，消滅俄國艦隊從而削弱俄國的軍事實力，但是它們根本不關心摧毀作為反革命勢力的沙皇制度。西方列強決不是要動搖歐洲反動的、旨在鎮壓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政治制度，而這個制度的基礎早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上就已奠定了，它的支柱之一就是俄國沙皇制度。相反地，在西方列強的當權者的計劃中却要鞏固這個制度。馬克思在揭露英法統治集團的反革命陰謀時着重指出，克里木戰爭的“目的不是廢除維也納條約，而是通過把土耳其補加到1815年的議定書中來鞏固這個條約。有人希望，從這時起保守主義的千年王國就會開始，各國政府將能夠僅僅為了使歐洲思想界‘平靜’而作共同的努力”。（見本卷第344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議會新聞：關於迪斯累里提案的辯論”、“拿破侖的軍事計劃”、“下院的事件。——克里木戰爭”、“局部戰爭。——關於行政改革的辯論。——羅巴克委員會的報告”和其他的文章中證明，英法統治集團害怕東方沖突變成大陸上普遍的革命烈火，這對它們的外交政策、軍事計劃和作戰方法有很大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西方列強的統治集團在法國和英國煽起沙文主義的情緒，同時努力使戰爭局部化，不讓它變成歐洲人民反對沙皇制度和其他反革命勢力的戰爭。馬克思和恩格斯猛烈地抨擊了法國政府所提出的並得到英國政府支持的“為了局部目的而進行局部戰爭”的計劃，指出這一計劃反映了波拿巴集團和英國寡頭政治對於全歐洲同沙皇俄國作戰將招致革命的後果而產生的恐懼，指出這個計劃是根據法國和英國的上層統治階級的反

革命的、王朝的以及类似的打算而提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要是不揭穿这些国家統治階級的政策，不坚决反对这种政策，就不可能根本改变战争的性質，不可能使它变成爭取民主改造欧洲的战争。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实现这个任务，首先需要无产阶级力量 and 革命民主力量积极展开活动。馬克思写道，“在舞台上应该出現另一种力量”（見本卷第 350 頁）来代替英法反革命政府。

在一些文章中，馬克思指出西欧各国对俄国作战的联合是不巩固的，这些盟国之間的矛盾在战争过程中經常暴露出来。在論述英法联盟的几篇文章中，馬克思揭露了英法統治階級进行經濟和政治竞争的歷史根源，这种竞争必不可免地引起了它們之間的一切新的冲突。

馬克思把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同迫近的經濟危机（它本来就会引起所有矛盾的尖銳化和階級斗争的加剧）联系起来，他特別注意資本主义的英国，因为当时英国是資產階級和无产阶级之間矛盾最尖銳的国家。

在載入本卷的許多論文中，馬克思闡述了英国的經濟和政治状况、統治階級和执政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揭示了这些政策的反人民的实质。馬克思在“傳統的英国政策”、“帕麦斯顿勋爵”、“英国的新揭露材料”、“波兰集会”以及“卡尔斯的陷落”和其他几篇文章中，追溯了英国数百年来对外政策，指出英国統治階級的政策和外交手腕的一貫特点是背信棄义、假仁假义以及在各种各样騙人的幌子下干涉他国内政，并且指出英国在許多冲突中，特别是在近东和中东，起着煽風点火的作用。馬克思以帕麦斯顿、罗素和其他国家活动家对波兰、爱尔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态度为例子，揭露

了英国政策的反革命性质，指出了英国統治階級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仇視，而这种仇視又往往用同情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的假話来加以掩盖。

在“金融市場”、“貿易和財政状况”、“英国的危机”等文章中，馬克思闡述了英国的經濟状况，描述了工业生产、国内外貿易、市場价格、汇率等情况。他根据具体的实例考察了他所发现的資本主义經濟規律性的作用，分析了資本主义生产的周期的发展，指出了資本主义經濟发展的时断时續的性质。他得出了下面的結論：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出現的經濟繁荣时期，已經被英国一些工商业部門、首先是紡織工业部門中出現的蕭条时期所代替。馬克思在1855年也看出了曾在1853年底和1854年初出現过的經濟衰退現象。他在文章中指出，这种經濟衰退現象表现为某些工业品生产縮减、失业現象增长、許多企业实行不完全工作周制、大的貿易公司破产。馬克思曾經預言，在不久的将来，英国將經受比过去严重得多的經濟危机；危机的严重程度将因英国經濟依賴世界市場状况的这种特点而加深。馬克思的預言得到了证实，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的新的經濟危机在1857年到来了。

馬克思在文章中分析英国經濟状况时，尖銳地批評了以自由貿易派为代表的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这个自由貿易派散布关于推行貿易自由的原則經濟危机就会消失的幻想。馬克思指出这些幻想是要破产的，指出自由貿易派和其他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关于資本主义无危机地发展的可能性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他揭穿了主張自由貿易的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科布頓、布莱特和其他作为資本主义辯护者、工人階級的凶恶敌人的所謂曼彻斯特學派的代表人物。馬克思撕下了自由貿易派的“自由的捍卫者”、反对貴族

而捍衛人民群眾利益的“維護者”的假面具。他指出，自由貿易派反對國家干涉經濟生活，但是每當僱傭工人階級的运动開始公開威脅剝削制度時，他們就要懇求議會和政府進行干涉。馬克思在文章中嚴厲斥責自由貿易派侵犯工廠視察制度，企圖廢除限制婦女和兒童的工作日的法律。

馬克思為了揭穿自由貿易派關於英國勞動人民是“幸福”的謊言，他根據工廠視察員的報告材料描述了英國工人群眾特別是婦女和童工遭受剝削的觸目驚心的景象。他指出資本主義企業的惡劣的勞動條件，勞動保護幾乎完全沒有，因而工人的健康和生命經常遭受威脅。馬克思寫道：“工廠視察員的這份工業通報比關於克里木戰役的任何一份通報都更可怕、更嚇人。婦女和兒童不斷地為傷亡者名單提供大量名額。”（見本卷第 427 頁）

馬克思在一些文章中猛烈譴責曼徹斯特學派的首領們在克里木戰爭中所採取的立場，揭露了科布頓和布萊特的“保衛和平”的言論和他們的“無論如何要和平”的口號的真正含義。馬克思着重指出，曼徹斯特學派要和平是為了“有可能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工業戰爭”。（見本卷第 317 頁）他指出，自由貿易派的假愛和平的詞句掩蓋着英國資產階級對外擴張的企圖，掩蓋着它的爭奪世界市場霸權的鬥爭。

在“上一屆英國政府”、“被推翻的內閣”、“論內閣危機”、“兩種危機”、“不列顛憲法”、“帕麥斯頓和英國的寡頭政治”等文章中，對英國的政治制度作了全面的說明。馬克思在揭露資產階級和貴族的寡頭政治制度的反人民性時寫道：“不列顛憲法其實只是非正式執政的、但實際上統治着資產階級社會一切決定性領域的資產階級和正式執政的土地貴族之間的由來已久的、過時的、陳腐的妥

协。”（見本卷第 108 頁）馬克思着重指出，貴族保持对国家最重要的职位的壟断，是英国发展道路上主要的障碍之一，是寡头政治制度的柱石之一，这使貴族能够对英国的对外和对內政策起决定性的影响。馬克思在許多文章中指出，寡头政治制度給官方英国的全部政治生活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它反映在議会的活动、政府的构成和政策中，反映在国家和軍事管理的組織上以及各主要政党的立場上。馬克思在說明英国政府（阿伯丁联合內閣和 1855 年 2 月接替它的帕麦斯頓的輝格党内閣）活动的特点时指出，在这两届政府的活动中体现了寡头政治制度的所有缺陷，这两届政府的目的是千方百计地阻碍推行任何威胁英国上层統治階級的政治壟断的进步改革。

馬克思在“論內閣的危机”、“政党和集团”、“‘晨邮报’反对普魯士。——輝格党和托利党”等文章中，大大地补充了他在前几年的文章中对于英国官方政党、对于由托利党保守派和輝格党自由派輪流执政的傳統的两党制所作的經典性的描繪。他着重指出托利党落后的保守主义，托利党是“教会和国家、保护关税政策和反天主教問題上的一切旧英国偏見的”热烈捍卫者。（見本卷第 245 頁）同时他揭穿了輝格党人这些資產階級貴族代表的装装样子的自由主义，他們和托利党人一样，竭力巩固寡头政治制度，不过他們在这方面表現得更为狡猾，更能随机应变罢了。馬克思指出，輝格党人“毫不犹豫地拋棄了那些妨碍他們实现操纵国家职位的世襲权利的偏見”，他們“根据不同情况”更換“自己的常礼服和观点”。（見本卷第 245、246 頁）

載入本卷的“約翰·罗素勛爵”这篇抨击文是为揭穿輝格党的政策而写的，它抨击的是这个“追求名位者的政党”（按照馬克思的

說法)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一个多次担任政府领导职务的著名的国家活动家。馬克思在这篇抨击文以及在其他一些文章中指出,托利党和輝格党的斗争只不过是統治階級的两个派別之間的爭吵,由于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之間階級斗争的尖銳化,剝削者的各个派別也日益团結起来,因此这两党在政策上的分歧也就日益消失。在野的这个或那个政党对政府的猛烈攻击只不过是排挤对手下台的一种手段。馬克思在揭穿英国两党制这种結構时指出,这个或那个政党执政时,它仍然是繼續奉行它的前任者的政治方針。这两个政党都同样致力于使資產階級和貴族上层分子保持对国家政权的壟断。

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英国寡头政治制度所固有的深刻矛盾,指出陈旧的政治制度不适合英国的經济发展,傳統的議会政党已經蜕化。馬克思写道:“掌握着管理国家的壟断权的旧的議会政党,現在只不过是一些集团罢了。”(見本卷第 51 頁)馬克思闡述英国政治制度的文章,清楚地說明了十九世紀中叶英国发生的旧貴族政党解体并演变为英国資產階級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过程,它反映了資本家階級的影响不断增长,反映了这个階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地位的巩固。

馬克思在論英国的那些文章中非常注意英国工人階級。在“倫敦飯店中的群众大会”、“論鼓动运动的历史”、“資產階級反对派和宪章派”、“关于改革运动”、“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人民同警察的冲突。——論克里木事件”以及其他許多文章中,馬克思分析了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重要的問題。他在文章中认定英国无產階級的政治积极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活跃。馬克思在指出資產階級反对派的代

表人物、其中包括西蒂区商业金融集团反对派更加努力地企图使英国工人阶级屈从于他们的影响的同时，总是不断地强调宪章派对资产阶级分子类似的企图进行反击的意义。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介绍了厄内斯特·琼斯和其他宪章派活动家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内容，这些活动家指出资产阶级反对派反对寡头政治的言论是温和的和不彻底的，指出资产阶级反对派害怕工人运动并准备和贵族妥协，而且还揭穿资产阶级领袖们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他们自私的目的。行政改革这种温和的资产阶级要求是要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获取国家职位开辟更广阔的途径，而宪章派则与此相反，他们要求以人民宪章的六项条目为基础进行广泛的民主选举改革。马克思认为宪章派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竭力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保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地位，保证它在争取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

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马克思的“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这篇内容深刻的文章引起了很大注意。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宪章派政治纲领的历史意义，这一纲领的中心就是要求普选权。马克思着重指出，在五十年代的英国条件下实现这一纲领就能够为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利用它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辟道路。马克思指出：“这是人民群众的宪章，它意味着人民群众取得作为实现他们的社会要求的手段的政治权力。”（见本卷第301页）这篇文章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要求具体地历史地对待政治口号，包括对待普选权的口号。他们教导说，普选权这个口号的内容和意义是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说在法国以及整个大陆普选权口号的内容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要求的范围，那末在英国的条件下，这个要求和宪章派纲领的其他条目一

样，具有另外的性质。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暴力革命是大陆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可能的手段，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他們认为英国是例外。他們估計到当时英国的一些特点，例如英国同法国和大陆上的其他国家相反，沒有发达的軍事官僚的国家机关，并且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英国居民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的道路取得政权，其办法就是实行普选权，采取激进的措施来改造議會制度和使英国整个政治制度完全民主化。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个前景出发而对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作了评价，但是他們认为英国无产阶级还有通过非和平的道路来夺取政权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是它的政治觉悟和組織性的提高以及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爭取恢复宪章运动的斗争能促使这个任务得到解决，但是这个希望沒有实现。宪章派在五十年代想掀起群众性的爭取宪章的运动的尝试沒有成功。宪章运动本身不久便完全退出了舞台。宪章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英国工人中間机会主义傾向的加剧，而机会主义傾向的加剧則是由英国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断地位和资产阶级从殖民地取得巨大超額利潤收买了英国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工人貴族”而造成的。

本卷中很大一部分文章闡述了法国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对外和对內政策。在上面已經提到过的“大冒險家的命运”、“拿破侖的軍事計劃”、“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辯論。——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以及“拿破侖最近的詭計”等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波拿巴法国在战争中的真正目的——力图进行掠夺和巩固波拿巴政体。恩格斯在強調指出波拿巴法国是发动克里木战争

的主要国家之一和揭露拿破侖第三的陰謀時指出，軍事冒險是波拿巴政策的不可分割的特征，掠奪和侵略是波拿巴集團的政治統治和波拿巴王朝執政本身所依據的原則之一。他指出，對於路易·波拿巴說來，“不能奪取塞瓦斯托波爾便等於失去法國”。（見本卷第169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揭露波拿巴政體是反革命資產階級軍警專政的政體，並且嚴厲批評了波拿巴法國的頭子——無恥的篡奪者和冒險家拿破侖第三皇帝本人以及他最親近的婁羅聖阿爾諾元帥、埃斯潘納斯將軍、福雷將軍、康羅貝爾將軍和其他貪得無厭出賣靈魂追求名位的人，這些人在戰場上表現得庸碌無能而在鎮壓革命運動時則以野蠻殘酷見稱。

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地注視了法國內部的政治狀況。他們在“將軍們的報告。——英國的法庭。——來自法國的消息”、“法蘭西銀行。——克里木的增援部隊。——新元帥”、“英美衝突。——法國的局勢”等文中，指出法國政局由於物價高漲、其他經濟困難增多以及狂熱的投機活動擴大等等的影響而嚴重起來。人民群眾顯露出不滿的跡象，在工人階級、大學生、一部分資產階級中間，甚至在直到現在還是波拿巴政體的支柱的軍隊中間出現了革命的情緒，——這一切都表明第二帝國並不鞏固，證明馬克思所寫的“波拿巴主義的繁榮時代已經過去了”。（見本卷第664頁）

馬克思在“人民報”上發表的“小波拿巴法國”一文明確地反對了波拿巴主義。這篇文章是馬克思所寫的战斗的革命的政論文章中的傑作之一。它準確地和生動地揭穿了第二帝國制度的反人民本質。馬克思向英國工人報紙的讀者指出官方的波拿巴法國與人民群眾的法國之間的鮮明對照：前者大肆揮霍本國的國民財富，後者則只有波拿巴集團的統治所帶來的苦痛和貧窮、警察迫害和血

腥鎮壓。馬克思着重指出，在这个人民法国的深处，反对路易·波拿巴制度的革命風潮正在成熟起来，預示着“进行证券投机交易的帝国即将垮台了”（見本卷第 671 頁）的征象正在出現。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中，繼續闡明了奧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場。他們考察了奧地利政府在战争过程中的活动、英法和俄国之間在奧地利立場問題上所展开的外交斗争，也分析了奧地利帝国的内部状况，同时揭露了哈布斯堡王朝在东方危机时期执行两面的搖摆的政策的原因。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反动的奧地利君主国是一个以压迫国内各民族并在它們之間煽起民族糾紛为基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它的内部蘊藏着許多易燃物。奧地利統治集团害怕革命，需要沙皇制度作为支柱，以便在新的革命浪潮爆发时向它求助。同时，奧地利在巴尔干追求掠夺的目的，覬覦土耳其在欧洲的領土，希望俄国被削弱；因此，奧地利在多瑙河集中了大量軍隊，同西方列强訂立条約并与这些国家进行关于財政援助的談判。因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意向而苦恼的奧地利采取了与俄国敌对的立場，但是在战争結束以前并不敢公开地起来反对俄国。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奧地利政府害怕一旦对俄作战，在隶属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民族中間将展开解放运动，这一点对奧地利政府的这种搖摆不定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分析奧地利立場的同时，馬克思也考察了普魯士的政策。他认为，普魯士統治集团宣布中立也是由于害怕会产生把对沙皇俄国作战的戰場移到中欧来的革命后果。普魯士参加战争就可能推动用革命民主的方法开展爭取德国民族統一的斗争，这就会威胁普魯士和奧地利君主制本身的存在。馬克思在“普魯士”一文中，說明了普魯士的經濟和政治状况，指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以及

与此相联系的普魯士有产階級——地主和資產階級——的空前富有。在涉及到資產階級时，馬克思再一次強調指出他和恩格斯还在 1848—1849 年就已表明的思想：德国資產階級在爭取實現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的斗争中沒有能力起領導的作用。馬克思揭穿了普魯士君主制的政治制度的反动本质，认为这个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官僚政治万能、毫无民主自由和大部分居民处于无权地位。馬克思指出普魯士农民的困苦状况，他們仍然像过去一样“無論在行政方面或司法方面都直接隶属于貴族”。（見本卷第 717 頁）

恩格斯关于分析克里木和高加索战場的軍事行动进程、作战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某些軍事行动的論文在本卷中占相当大的份量。这些軍事評論对于研究軍事历史科学是很重要的。它們提供了考察克里木战争的一切最重要阶段的可能性。在这些文章中，包括了許多有关軍事学术史和軍事战略战术問題的宝贵結論和原理，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了恩格斯那个时代的战争經驗。

在許多文章中，恩格斯批評了英法的統帥部，批評了它的战略和西方列强的代表們对軍事行动缺乏干练領導。在提到联軍統帥部的失算和失策、提到它缺乏深謀远慮的战略計劃和主动精神以及它所表現出来的局限性和墨守陈規的习气时，恩格斯指出，英国和法国的有許多显著缺陷的作战方法，是完全符合英法統治集团在战争中所追求的那种极为自私的、反人民的目的的。在“克里木的斗争”、“調查委员会的揭露”、“不列顛軍隊”、“对英国兵士的惩罚办法”等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英国軍事制度的保守性，英国軍隊組織的守旧性，指出英国軍官理論素养和軍事素养水平的低下，統帥部和軍需部（軍需部虽然有比較有利的条件，但还是不能保证供应英国軍隊以武器和装备）領導者的庸碌无能。馬

克思和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关于揭露波拿巴主义的文章中，評述了波拿巴集团在法国軍隊中所推行的反革命制度，以及第二帝国許多軍事活动家的丑恶面貌。

恩格斯的絕大部分軍事評論都是談論塞瓦斯托波尔的圍攻和防禦情况的。俄国軍隊保卫这个城市的 11 个月的英雄历程引起了全世界注意，自然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的中心。恩格斯把塞瓦斯托波尔的圍攻和防禦看做是克里木战争的新阶段，他詳細地分析了英法軍隊所采用的圍攻方法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防禦方法。在研究塞瓦斯托波尔战役的經驗时，恩格斯对于要塞在当时战争条件下的作用以及野战軍与要塞的相互关系問題作了重要的总结。

在“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塞瓦斯托波尔会战”和其他文章中，恩格斯分析了联軍圍攻的方法。他指出，“像塞瓦斯托波尔圍攻战这样沒有系統、不可理解和不光彩的圍攻战例，在特洛伊圍攻以来的战史中却是一个也找不出来的”。（見本卷第 217 頁）恩格斯着重指出，在筑城工事方面，俄国人大大胜过英国人和法国人。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防禦組織、保卫者的軍事工程艺术給予很高的評价，指出了俄国要塞保卫者的英雄气概和勇敢精神。在“战争的进程”、“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和其他文章中，恩格斯指出塞瓦斯托波尔守备部队的軍事工程师，包括工程长官托特列本的技艺、他們迅速而正确地了解情况的能力、善于組織火力和防禦工程的本領都是联軍的榜样。按照恩格斯的評論，俄国人在防禦过程中修筑新的工事是“被圍守軍以往从未采取过的一种最大胆最巧妙的措施”。（見本卷第 193 頁）恩格斯指出，俄国人采用把火炮层层排列的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形的优越条件。他指出，

俄国人順利的出击是他們整个防禦体系中的重要手段,在出击中,他們“以固有的頑强精神很巧妙地”作战。(見本卷第 172 頁)最后恩格斯得出結論說,“整个这一防禦的組織堪称典范”。(見本卷第 194 頁)

这些評价表明恩格斯充分估計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英雄气概和軍事艺术,表明他在評述軍事事事件时善于找到客观的标准,虽然他掌握的甚至只是英法新聞报道中关于軍事行动进程的片面的、往往大受歪曲的消息,而当时对这些报道,他又往往无法去核实。后来經過更詳細更全面的研究,恩格斯又多次地談到英勇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經驗,把这次防禦战看成是积极防禦的杰出榜样,看成是保卫者的軍事技艺和英雄气概的典范(參看恩格斯專門論述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文章以及他在普法战争时期所写的“战争簡評”)。

反映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对軍事发展的研究的是收入本卷的他的一部总结性著作——“欧洲军队”。这一著作,像軍事評論一样表明恩格斯是一个了不起的軍事专家,是精通軍事历史和当时各国武装力量的状况的人。在这一著作中,他詳細地評述了欧洲各国的军队,說明了每个国家军队和它的組織、編制、訓練制度、官兵的战斗素质的特点。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在各国军队发展中民族特性和民族傳統的意义,同时強調指出,軍事技术的普遍进步和軍事方面的改善使得每个国家的军队必須考虑并利用所有其他国家军队的經驗。恩格斯批判了統治階級的軍事历史著作所特有的唯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傾向,其中包括流行的关于某国军队永远不可战胜的“理論”。在恩格斯的整部著作中貫串着一条极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即某个国家军队的状况和战斗力首先决定于

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个原理，后来他在“反杜林論”一书里作了詳尽的發揮。例如，恩格斯在說明普魯士軍隊时指出，由于普魯士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制度，先进的編制原則和先进的对全体能够服兵役的居民进行短期軍事訓練的原則沒有彻底实行，而且这些原則由于統治集团渴望“有一支馴服可靠的軍隊，在必要时可以用来鎮压国内的騷乱”（見本卷第 497 頁）而被歪曲了。恩格斯指出，实行民族压迫和煽动民族仇視是哈布斯堡王朝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这些現象也反映在奧地利的軍隊中，并且对奧地利軍隊的战斗力发生了不良的影响。恩格斯在“土耳其軍隊”一节里指出，土耳其落后的封建制度、帕沙們的橫行霸道和舞弊分子阻碍了必要的軍事改革。恩格斯指出在許多欧洲国家的軍隊中也有封建殘余的影响。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以及在“俄国軍隊”的专論中，在描述当时俄国軍隊的状况时指出，俄国軍隊的落后的技术、陈旧的編制方法和軍隊訓練方法，“閱兵式教练”和盜窃公款等的風行，都是沙皇俄国經濟落后、封建农奴制关系的統治、反动的政治制度的結果。恩格斯同时強調指出了俄国兵士的高度战斗素质，“射死”他們“比迫使他們退却要容易一些”。（見本卷第 510 頁）

但是应当估計到，恩格斯在描述农奴制俄国的軍隊的落后状况时有某些夸大的地方。因此，关于俄国兵士似乎总是消极被动、俄国軍隊中外国人起了特殊作用、俄軍中极少有才能的人以及在相同条件下似乎俄国人总是被西欧軍隊打敗的說法，都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恩格斯所以产生这些不准确的說法（他在較后的著作“波河和萊茵河”以及其他著作中作了某些修正），是因为他根据了西欧軍事史学家对俄国过去的軍事情况所作的歪曲論述，而当

时，由于沒有别的史料根据，恩格斯只能从这些軍事学家的著作中寻找史实材料。恩格斯在論文中反对作为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的俄国沙皇制度的这种政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俄国军队的看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战争实质上已成定局的时候所写的“英法对俄战争”、“欧洲战争”等等一些文章中，对克里木战争作了一些总结。“英法对俄战争毫无疑问将作为‘不可理解的战争’而载入战史。言語夸大而行动却微不足道；准备的規模巨大而成果却小得可怜……將軍們出奇地平庸而军队却出奇地勇敢……这是一系列的矛盾和不合邏輯的現象的交錯。而所有这一切是俄軍的特点，正像是他們的敌人的特点一样。”（見本卷第 555 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結論說，克里木战争並沒有实现这样的願望，即把这一战争变为爭取民主的和革命的原則的战争，並沒有使欧洲实行根本改革，使欧洲各国的反动制度垮台。此外，它也沒有解决欧洲各国在东方問題和其他問題上存在的矛盾。馬克思在上面提到的“卡尔斯的陷落”一文中談到参战各国在巴黎举行的和平談判时认为，巴黎的和平談判是假談判，而巴黎和約則是暫時的条約。正因为如此，所以馬克思着重指出，克里木战争结束后簽訂的巴黎和約不仅不意味着爭端得到調解，而且一开始就表明欧洲列强之間孕育着新的、更尖銳的冲突。

馬克思主义奠基人指出，克里木战争並沒有使欧洲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根本改变，但是认为这次战争对許多国家的內部发展包括对俄国的发展有所影响。例如，1871 年馬克思重新評價克里木战争时，他在“法兰西內战”一书的初稿中写了下面一段話：“虽然俄国通过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或許挽回了自己的荣誉并通过

在巴黎的外交胜利使外国人迷惑不清，但是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以后（这次失败暴露了俄国国内社会、政治制度的腐朽性），俄国政府仍然解放了农奴，改革了整个行政制度和审判制度。”（“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3（8）卷第281頁）馬克思看出了沙皇政府本身为了避免来自下面的革命而被迫从上面即从沙皇宝座上实行的改革是和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遭受的失败相联系的，弗·伊·列宁后来深刻而全面地闡明了这种联系，他写道：“克里木战争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03頁）

* * *

本卷包括了全集第一版沒有收入的、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36篇文章。1855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文章同时在“新奧得报”和“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在把这些文章收入本卷时，我們主要是采用較为完整的和报纸編輯部改动較少的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在注釋中就注明未收入本卷的不同版本。两种版本間有些出入的地方我們就用脚注表明。本版中有些文章在全集第一版中未曾发表（这些文章同样在篇末注明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版本变动的地方則在注釋中予以說明。在某些情况下，文章的两种版本都收入本卷，因为这两种版本都有其独立的意义，这一点是和全集第一版不同的。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所未收入的不同版本的文章共10篇。第一版中发表的“战争的总结”和“欧洲的和平”两篇文章，因为沒有充分根据证明其作者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沒有收入本版。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书信中一再指出，“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随意改动他們文章的原稿。編輯部力图使恩格斯所写的許多通訊，特别是軍事評論成为在紐約写的文章，因此它常常增

添一些字句；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文章还作了补充；本版中对于編輯部改动过的地方都在有关句子的注釋中予以注明。

在研究本卷各篇文章所引用的具体的历史材料时，应当注意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当时事件的很大一部分文章中，能够利用的材料主要是资产阶級报刊——“泰晤士报”、“总汇通报”、“經济学家”杂志等等的报道。他們通常是从这里取得关于軍事行动的进程、作战双方軍队的数量、財政貿易的状况等消息的。在某些場合下，这些消息同后来經過研究所确定的事实是有出入的。

“紐約每日論壇报”、“新奧得报”和其他机关报上原文中专有名詞、地名、数字、日期等等印錯的地方，經過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利用的資料核对以及把文章的几种版本加以比較后都更正过来了。

本版和全集第一版不同的地方是第一版中編者把某些文章按題目性质編在一起，而本版則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文章按照当时在报上发表的形式刊印。凡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加的文章标题，都在标题前面加一星花。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5年1月—1856年4月

Neue Oder-Zeitung.

Mittagsblatt.

In Berlin bei der Grenichen
aus dem Verlagsbureau zu Quartel
1 Zeltel 20 Gr.

Breslau.

Donnerstag, den 27. Januar 1855.

In Preußen bei allen Postämtern
zum Verkauf zu haben.

Nr. 45.

卡·馬克思 議會常会開幕¹

倫敦 1 月 24 日。議會常会于昨日复会²。埃倫伯勒伯爵在上院宣稱，下星期四，2 月 1 日，他將建議向議會提交一份關於派往克里木的軍隊（步兵、騎兵和水兵）人數以及傷亡、病號和一般離隊人員的數目的官方材料。里士滿公爵質問陸軍大臣說，為什麼在頒發獎章時不發給曾在巴拉克拉瓦作戰³的人。不僅巴拉克拉瓦會戰的參加者，而且所有駐在黑海的水兵，甚至那些沒有參加戰鬥的人都應當得到獎章——陸軍大臣紐卡斯爾公爵就這樣吃掉了里士滿公爵的一張牌。里士滿公爵為了反駁這種說法，便與埃倫伯勒伯爵和哈德威克一起利用了亞當·斯密的舊論點：“奢侈品”的價值，因此也包括獎章的價值同其數量成反比例。經過大約半小時非常激烈的爭辯，貴族們就走散了。

下院的會議廳擠滿了人。但是與會者的希望沒有實現。迪斯累里缺席，發言的是本杰明·霍尔爵士。會議在 3 點 3 刻開始，還不到 6 點就結束了。羅馬元老院接到在坎訥吃了敗仗⁴的消息時所表現的那種泰然自若的神情通常使人感到吃驚。但是英國 commoners [下院議員] 現在已勝過了羅馬 patres conscripti [元

老〕。仅看他們的臉色决不会相信英国的軍隊在克里木复灭。看来，克里木軍隊的卫生状况促使本杰明·霍尔爵士提出关于改善英国卫生警察組織的两个法案。本杰明·霍尔爵士是一个像威廉·摩耳斯沃思、奥斯本之流的那种所謂激进派分子。这帮先生的激进主义表现在他們为自己謀求內閣职位，虽然他們不是寡头政治家，也不具有平民的才能。但是单是他們进入內閣，就已經是一个激进的事实。他們的朋友这样說道。因此，当 1854 年夏季霍乱在英国十分猖獗，在这以前一直受內务大臣帕麦斯顿监督的“保健委员会”像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兵营里的医务部門一样显得束手无策的时候，联合內閣认为設置一个新的內閣职位——保健委员会主席这个独立的职位——并用吸收“激进的”本杰明·霍尔爵士参加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时机到来了。于是本杰明·霍尔爵士就成了保健大臣。虽然在“官报”上报道他上任的消息之后霍乱在倫敦并没有絕迹，但是曾經在“笨拙”杂志⁵上嘲笑过联合內閣和俄国沙皇的一个叫泰勒的人却在这本杂志上消失了。本杰明·霍尔爵士任命他为保健委员会秘书，薪俸 1 000 英鎊。作为激进派的本杰明·霍尔爵士认为进行激进治疗比较好。关于他的法案的优点，等法案提出来以后我們还来得及談。而昨天法案只是为他作为大臣 *entrée*〔进入〕下院提供了理由。

关于累亚德的质問，

“內閣是否同意向議院提交在 1854 年 12 月 2 日的条約問題上与外国的通信，特别是英法方面轉交給俄国政府的不是为了进行談判而是为了要它接受的某些有关說明四項条款的文件”，

約翰·罗素勋爵回答說，他不知道是否可以把所质問的某些文件提交議院。这不符合議会的慣例。至于談到有关四項条款⁶的談

判經過，他可以向自己值得尊敬的朋友概述如下：11月底，俄国通过哥尔查科夫通知說，俄国願意接受所謂的四項條款；后来紧接着締結了12月2日的条約⁷；此后，12月28日，哥尔查科夫同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大使在維也納会晤。法国大使代表盟国宣讀了說明四項條款的文件。这一說明也应当被认为是談判的基础。在第三項條款中提出要結束俄国在黑海的优势地位。哥尔查科夫不同意这种解釋，但說准备請示自己的政府。10天后，哥尔查科夫通知布奥尔伯爵說，他已接到有关的指示。1月7日或8日，在奥地利外交大臣的办公室又举行了会晤。哥尔查科夫宣讀了闡明他的政府的观点的备忘录。布奥尔伯爵、威斯特摩兰勋爵和布尔克奈男爵宣称，他們沒有被授权接受备忘录。談判的出发点应当是同意对四項條款所作的說明。这时哥尔查科夫便收起备忘录，同意把这一說明作为談判的基础。罗素补充說，俄国虽然接受了这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以条文正式确定下来以后（現在它的条文是初步的），对它的“每一項條款”保留有提出異議的权利。英国政府宣称，它打算在上述基础上参加談判，“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授予它的大使談判的全权”。后面这句话也就是罗素告訴«commoners» [“下院議員”]的唯一新聞。

會議上发生的最重要事件是罗巴克提出以下声明：

“下星期四，他将建議成立專門委员会来查明塞瓦斯托波尔城郊軍隊的人数和状况，以及調查負責滿足軍隊需要的政府各部門的活动。”

“泰晤士报”⁸“懇求”罗巴克“大声疾呼，不要有任何顾虑”。“泰晤士报”的央求和罗巴克先生的往事都使人們认为，他会大叫大嚷，或者确切些說，他将說丧气話，以便妨碍別人議論。据我們

所知,烏利斯从来沒有利用过瑟息替斯;但是同烏利斯一样机灵的輝格党人却在利用罗巴克。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1 月 27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45 号

卡·馬克思 論內閣的危機

倫敦1月26日。当苏丹梅利克-沙赫的急使到阿拉木特要求哈桑-卜-薩巴赫投降的时候，“山上来的长老”吩咐一个殉道派教徒⁹自杀以代替回答。这个青年立即用匕首刺入自己的胸膛，倒在石板地上咽了气。联合內閣的“长老”^①也要求約翰·罗素勋爵为他牺牲，在下院自杀。但是罗素这位老牌的議会仁人君子，在他解釋“爱別人如爱自己”这一戒条时，总是說这意味着“人莫不先爱其身”，因而他宁願杀死“长老”本人。罗巴克沒有使我們失望。他按照同罗素的協議提出了自己的提案，以便在联合內閣垮台时保全內閣的“精华”——輝格党人。

果真如此！罗巴克的提案并不是反对整个內閣，而是反对直接負責进行战争的那些“主管部門”，也就是反对皮尔派¹⁰。此外，罗素在議会开幕时的声明显然决不是偶然的，他說：談判的基础完全不是基础，因为俄国保持了对四項条款中的每一項提出異議的权利；談判实质上不成其为談判，因为英国內閣尚未授权任何人去进行談判。罗巴克一提出关于自己的提案的声明（这是在星期二），罗素当天晚上就写信給“长老”說，这个提案的目的是表示不信任軍事主管部門（皮尔派），因此他不得不递交辞呈。阿伯丁前往

^① 阿伯丁。——編者注

温莎城堡去觀見女王，劝她接受辞呈，結果事情也就这样办了。“长老”的勇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很明显，帕麦斯顿沒有呈請辞职。

下院在星期四的會議上知道了这些重要的事件。下院把會議推迟到今晚举行，罗巴克也把自己的提案推迟到今晚提出討論。所有的下院議員都奔到上院去，因为阿伯丁将在那里作解釋。但是阿伯丁非常狡猾，又借口到温莎去了而沒有出席會議，紐卡斯尔公爵則在上院重复帕麦斯顿在下院說的那一套不可相信的話。这时候，下院的輝格党議員在上院知道了他們的計劃被識破并且后退的路也被切断了，他們非常惊惶。托利党人决沒有靠牺牲皮尔派来重新保证輝格党人旧有的“不列颠帝国天生的包稅者”的特权的熱望。他們慫恿林德赫斯特勋爵提出一項提案，這項提案与罗巴克的提案不同，即不是反对个别的部，而是反对整个政府，不是像罗巴克那样仅仅指責一番，而是直接把政府置于被告的地位。林德赫斯特声明的原話是这样的：

“2月2日，星期五，我将提出一項提案，提案將說明：下院认为，克里木远征是女王陛下各部大臣在极端缺乏物資、对可能遭到的敌人反抗的性质和力量的問題缺乏应有的預見性和充分的研究的情况下进行的，政府在指导战局上所表現的失职和无能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

用不着怀疑，林德赫斯特的提案反对輝格党人的程度，就像罗巴克的提案反对阿伯丁的拥护者的程度一样。順便提一下：約翰·罗素勋爵通过海特尔告訴下院，一有机会（也就是在今晚），他将解釋自己辞职的原因。“无所指望的人也就不会失望”。¹¹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26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1 月 29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47 号

卡·馬克思 議 会 状 况

倫敦 1 月 27 日。昨天下院會議的風貌和基調使人清楚地認識到，現在的英國議會墮落到什麼地步了。

在會議开始前，約摸下午 4 点，會議厅挤得滿滿的，因为大家都在等着看一个丑惡的場面——罗素勋爵解釋他辞职的原因。但是当私人性质的辯論刚一結束、开始对問題的实质——罗巴克的提案进行辯論的时候，激憤的爱国者都匆匆忙忙地去吃飯了；會議厅空下来了，有些地方发出了喊声：“表决！表决！”开始了令人难受的間歇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长到軍务大臣悉尼·赫伯特站起来对代表的空席位作冗长的、詳細的报告时为止。随后，吃飽了的議員們一个个慢吞吞地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在晚上 9 点半左右累亚德开始讲话，到会的約有 150 名議員；在他結束讲话时，大約在會議結束前一小时，會議厅又挤滿了人。但是會議快結束时却又很像是議会的午休時間。

約翰·罗素勋爵的全部优点在于維持了議會策略的老規矩这一点上，他讲话时不是像在这种場合下通常所做的那樣，站在議長席上，而是站在大臣席后面的第三排上即坐着不滿意的輝格党人的那一排席位上。他用低沉的、嘶哑的声音說話，語調拖得很長，像平时一样，英語发音很蹩脚，并且常常严重地違反句法規則。

(順便說說,決不能把報上發表的講演稿同口頭講話混淆起來。)一般的演說家是用漂亮的敘述形式來掩飾糟糕的內容,羅素却試圖用惡劣的敘述來抵補糟糕的內容。他似乎用自己說話的方式來請求別人原諒他所說的話。

而事實上確實有請人原諒的地方!據說上星期一他還沒有想到要辭職,而在星期二,當羅巴克一提出關於自己的提案的聲明時,他就認為辭職是不可避免的。這使人想起那種絲毫不反對撒謊而當謊言被戳穿時良心才發現了的奴才。他說,他能夠根據什麼理由來反對下院領袖的職責要求於他的那種由議會進行調查的提案!難道是以禍害並未大到非要求調查不可的地步作為理由嗎?但是誰會否認在塞瓦斯托波爾城郊的軍隊的悲慘處境呢?這種處境不單是痛苦的,而且是可怕的、不堪忍受的。莫非他應當使議會確信,議會調查委員會是沒有用的,因為為了消滅禍害已經採用了各種最好的辦法?這裡,羅素碰到了一個微妙的問題,因為他不僅是內閣的成員,而且是 Privy Council〔樞密院〕院長,他要對採取這些措施直接負責。羅素承認,他曾同意委任紐卡斯爾公爵為陸軍“首席”大臣。他不能否認,最晚在 8、9 月必須採取供應軍隊糧食、軍服以及醫療方面的措施。根據羅素自己承認的,他在如此緊急的時期做了些什麼呢?他跑遍全國,在 «literary institutions»〔“文學協會”〕發表無關緊要的演說,並且從事查理·詹姆士·福克斯的通信集¹²的出版工作。當他在英國游歷時,阿伯丁在蘇格蘭游歷,內閣從 8 月到 10 月 17 日沒有舉行過一次會議。在這次內閣會議上,用約翰勛爵自己的話來說,他沒有提出任何值得議會注意的東西。此後,約翰勛爵又思考了整整一個月,終於在 11 月 27 日寄給阿伯丁一封信,建議把陸軍大臣的職務同 secretary at

war〔軍務大臣〕的職務合併，並且讓帕麥斯頓勳爵去擔任這兩個職務，換句話說，就是免去紐卡斯爾公爵的職務。阿伯丁沒有接受這個建議。11月28日，羅素又寫了一封同樣內容的信給阿伯丁。阿伯丁於11月30日具有充分根據地回答他說，他的整個建議的目的僅僅在於以一個人代替另一個人，以帕麥斯頓代替紐卡斯爾公爵。其實當殖民部同陸軍部分開時，羅素曾欣然建議把後者交給紐卡斯爾公爵，以便把自己輝格黨的一名成員——喬治·格雷爵士安插到殖民部去。後來，阿伯丁私下問羅素是否打算向內閣提出自己的建議。羅素放棄了這個念頭，用他的話說，為的是“不搞垮內閣”。可見首要的是內閣，其次才是克里木的軍隊。

羅素承認沒有採取任何消除禍害的措施。軍事管理機關的一切改革只限於使軍需部隸屬於陸軍部。不僅如此，羅素雖然沒有採取任何改善狀況的措施，但是他還是滿不在乎地呆在內閣里，而且從1854年11月30日到1855年1月20日再沒有提出任何建議。在上星期六這一天，阿伯丁轉給羅素一些關於改革軍事管理機關的建議，但是羅素認為這些建議是不夠完備的，因此用書面形式提出了自己的響應建議。僅僅過了三天，他認為必須呈請辭職，因為羅巴克發表了聲明，而羅素不打算同他在其中任職並且直接參與其事的內閣分擔責任。羅素解釋說，他聽說阿伯丁無論如何不願任命帕麥斯頓為陸軍部獨攬大權的人，既然如此，他，庫爾威烏斯只能慶幸自己不是白白地離開內閣和投到反對派的深淵里去。這樣，我們的約翰勳爵就愈來愈往下滾，他把他能夠提出來為自己的辭職辯護的最后一个借口也推翻了，他說：（1）戰爭的前途根本不是引起盛行的絕望情緒的理由；（2）阿伯丁是偉大的首相，克拉倫登是偉大的外交家，格萊斯頓是偉大的財政家；（3）輝格黨

不是由追求名位者而是由愛國的幻想家組成的，最後，他羅素在表決羅巴克的提案時棄權，雖然他退出內閣似乎是因為一個愛國者絲毫不能反對這個提案。羅素發言時態度冷淡，而聽眾對他的發言則更冷淡。

帕麥斯頓代表內閣發言。他的地位很尷尬。庫爾威烏斯-羅素辭職是因為阿伯丁不想任命帕麥斯頓為軍事獨裁者。布魯土斯-帕麥斯頓猛烈攻擊羅素，說他在危急關頭離開了阿伯丁。在這種尷尬的地位上，帕麥斯頓卻感到很舒服。他利用它來引人發笑，把嚴肅的局面變成一幕鬧劇，像他通常在緊急關頭所做的那樣。當帕麥斯頓指責羅素，說他在12月還沒有作出自己英勇的決定的時候，迪斯累里——他至少沒有掩飾住因威尼斯憲法破產而引起的喜悅，——大聲笑了起來，而擅長於擺出一副嚴肅面孔的格萊斯頓大約在暗自念皮由茲教派¹³的祈禱文以免哈哈大笑出來。帕麥斯頓聲稱，通過羅巴克的提案就意味着內閣倒台。如果提案被否決，那內閣將討論它本身的改組問題（其中也包括讓帕麥斯頓獨攬大權的問題）。

帕麥斯頓真是一位偉大的魔術家！他一只腳雖已跨進棺材，但仍能使英國相信他是一個 homo novus [新人]，他的官運還剛剛開始！這個在20年內擔任軍務大臣的職務，並在這個職位上僅僅以一貫維護體罰和出賣軍隊中的官銜¹⁴著名的人，現在居然能偽裝成單靠他的名字就足以消滅整個制度的缺點的人！在所有的英國大臣當中，他是唯一在議會中屢次被揭露（特別是在1848年）為俄國代理人的人，他居然能偽裝成靠自己一個人就能使英國同俄國作戰的人，帕麥斯頓真是一個偉大的人物！

對羅巴克的提案的辯論改到星期一晚間會議上進行，關於這

個問題留待下次再談。這個提案写得如此巧妙，連內閣的反对者都宣稱將投票贊成它，雖然他們認為它是荒謬的，而內閣的擁護者則打算贊成這項提案，雖然他們將投票反对。上院的會議沒有令人感到特別的兴趣。阿伯丁對羅素的聲明沒有作任何補充，除了對下面這一點表示驚訝：羅素使整個內閣大吃一驚。

卡·馬克思寫于 1855 年 1 月 27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1 月 30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 49 號

New-York Tribune.

VOL. XIV.....N° 4,316

NEW-YORK, SATURDAY, FEBRUARY 17, 1895.

PRICE TWO CENTS.

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¹⁵

随着新的維也納會議¹⁶開幕日期的接近，俄国方面作出某些让步的希望已日益暗淡，而且是极端靠不住了。沙皇出色的外交 coup [步驟] 的輝煌胜利——迅速同意所提出的談判基础——使他至少在最近时期处于很有利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有把握地說，尽管从表面上看来沙皇已同意和談建議，但实质上他在目前同意調解的唯一现实基础是維持 status quo [現狀]。沙皇以接受四項条款¹⁷ 的手段重新使奥地利处于十分搖摆的地位，同时繼續控制普魯士，并且还贏得了時間，以便在軍事行动开始前把所有的預备部队和新編的部队調往边境。

同意談判这件事本身，就使沙皇能够从俄国在奥地利边境的監視軍中，立即抽調出他在两个月或十周内可以补充上的这样数量的部队，即至少 6—8 万人。由于原来的整个多瑙河軍团作为一个軍团而論已不存在，——第四軍从 10 月底起調到了克里木，第三軍在 12 月底也到了那里，而第五軍的剩余部分連同騎兵和預备部队正在开赴克里木——为了替換这些部队，就必须从駐在波兰、沃倫和波多利亚的西方軍团中抽出生力軍，將它們配置在布格河和德涅斯特尔河地区。可見，如果战争轉移到大陆中部，那末两三

个月的时间对俄国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现在俄军在卡利希到伊兹马伊耳的一线上拉得太长，没有增援部队便不能继续与数量日渐增加的奥军相对峙。现在俄国赢得了这段时间，下面我们说明俄国的军事准备目前正处于什么阶段。

俄国军队的组织情况我们以前已经作了概述¹⁸。用于欧洲南部和西部的庞大的作战部队，最初是由 6 个基干军（每军有 48 个营）、精锐部队 2 个军（每军有 36 个营）以及相当多的正规骑兵、非正规骑兵和炮兵组成的。我们以前曾经报道过，沙皇政府不仅召集预备兵员，在精锐部队中编成第四、第五、第六营和在其余 6 个基干军中编成第五、第六营，而且还利用新兵在每个团内编成第七、第八营。这样，6 个基干军内营的总数就增加了一倍，而精锐部队（近卫军和掷弹兵）内营的总数则增加了一倍多。现在俄国军队的数量大致如下：

| | | |
|---------------------------------------|-----------------------|-----------|
| 近卫军和掷弹兵(按每团的前 4 个营计算)..... | 共 96 个营, 每营 900 人, 共 | 86 400 人 |
| 近卫军和掷弹兵(按每团的后 4 个营计算)..... | 共 96 个营, 每营 700 人, 共 | 67 200 人 |
| 第一、第二军(尚未参加战斗, 按每团的前 4 个营即基干营计算)..... | 共 96 个营, 每营 900 人, 共 | 86 400 人 |
| 第一、第二军(按每团的后 4 个营计算)..... | 共 96 个营, 每营 700 人, 共 | 67 200 人 |
|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军(按基干营计算)..... | 共 192 个营, 每营 500 人, 共 | 96 000 人 |
|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军(按每团的后 4 个营计算)..... | 共 192 个营, 每营 700 人, 共 | 134 400 人 |
| 芬兰军 | 共 16 个营, 每营 900 人, 共 | 14 400 人 |
| 合 计..... | 784 个营 | 552 000 人 |
| 另有: 正规骑兵..... | | 80 000 人 |
| 非正规骑兵..... | | 46 000 人 |
| 炮兵..... | | 80 000 人 |
| 总 计..... | | 758 000 人 |

我們列举的数字中有些可能使人觉得过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尽管俄軍遭受損失，但是受到損失的只是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軍的 96 个基干营，所以自战争开始以来所征召的大量新兵仍应使軍隊的人数更大于这个数字，但新兵在开往自己团队途中常常大量死亡，因此我們打了折扣。此外，騎兵的計算数字是大大压缩了的。

上述数字中有 8 000 人（第五軍的 1 个师）駐高加索，这部分軍隊应当除外，因为这里我們不談用于欧洲地区以外的軍隊。其余 75 万人的配置情况大致如下：駐波罗的海沿岸的是西韦尔斯將軍指揮的波罗的海軍团，由芬兰軍以及近卫軍、擲彈兵和第六軍的預备部队組成，連同騎兵和炮兵共約 135 000 人，其中一部分是未經訓練的新兵和仓卒編成的营。駐波兰和加里西亚边境自卡利希至卡麦涅茨一綫的是近卫軍、擲彈兵、第一軍、第六軍 1 个师以及擲彈兵和第一軍的部分預备部队，連同騎兵和炮兵共約 235 000 人，这是俄国武装力量的精华，它由精銳部队和优良的預备部队編成。在貝薩拉比亚以及德涅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間，有第二軍的 2 个师和它們的部分預备部队，总共約 6 万人。这些部队本屬西方軍团，但自多瑙河軍团开往克里木后，就被調往多瑙河軍团的原来駐地。現在，他們同駐多瑙河各公国的奧軍對峙，由帕紐亭將軍指揮。用于防守克里木的是已开到的第三軍、第四軍、第五軍 1 个师、第六軍 2 个师、部分預备部队以及尙在途中的第二、第五軍的各 1 个师；这些部队連同騎兵和炮兵总共 17 万人，由緬施科夫指揮。其余的預备部队和新編部队，其中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軍的这些部队，現在正由切奧达也夫將軍組成一个龐大的預备軍团；这个軍团集中在俄国内地，共約 15 万人。至于这个軍

团的哪一部分正开赴波兰或南方，自然无法说出。

这样算来，尼古拉皇帝在其帝国西部自芬兰起到克里木止的边境上，去年夏季有不到 50 万人，而现在已有 60 万人，另外还有在内地编成的为数 15 万人的预备军团。尽管如此，同奥地利相比，它现有兵力仍比过去的少。去年 8、9 月间，在波兰和波多利亚的俄军为 27 万人，而且在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地区还驻有约 8 万人的多瑙河军团，这个军团驻在那里主要是防范奥地利人。因此，当时可以动用 35 万人的军队对付奥地利。现在，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里仅有沿奥地利前哨配置的 295 000 人，而对峙的奥军却已有 32 万人，而且奥军还可以把驻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 7—8 万人调来支援。现在，俄军在数量上处于相对劣势，而且没有把握指望援军在这种季节能及时地由贪污成风的本国内地开到，这些原因就足以使俄国政府要力求赢得更多的时间。敌人数量上的优势阻碍着俄军采取进攻行动，这意味着在波兰境内的开阔地形上、在两军之间又无大江河的这种条件下作战时，俄军只要一与敌人接触，就只好向可以扼守的阵地退却。这时俄军就可能被割裂为两部分，一部分退向华沙，另一部分退向基辅，而且这两部分之间还隔着不能通行的、起于布格河（不是南布格河，而是维斯拉河支流）止于德涅泊河的波列西耶沼泽地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量的俄国兵没有被赶进沼泽地带，那真是俄军破例的、在这种场合下罕见的成功。这样一来，甚至不得不战而放棄波兰南部的大部分、沃伦、波多利亚和貝薩拉比亚，也就是从华沙到基辅和赫尔松的整片土地。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俄军在数量上占优势，那末它在奥军冒险进行决战之前，也能同样容易地把奥军赶出加里西亚和莫尔达维亚，并占领去匈牙利的通路；其结果是不难想像的。在

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这种战争中，首次进攻的胜利，确实对任何一方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此交战双方都将竭尽全力，以求最先在对方的领土上站住脚。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奥地利不同俄国交战，现在的战争，从军事学术的观点来看，便不会像所有的欧洲战争那样引人注目。甚至克里木的战事也不过是一场小范围的大战争而已。俄军的不可思议的长途行军以及联军所遭到的灾难，到目前已使双方军队减员，以致使它们不能进行一次真正大规模的会战。如果交战双方都只使用 15 000—25 000 人，那还称得上什么会战！在赫尔松涅斯与巴赫契萨赖之间的小块土地上，又能够进行什么具有真正学术意义的战略行动！甚至在这里，不论进行过什么样的会战，兵士的数量都少得无法占据整个战线。所以，引人注意的，与其说是正在进行的事情，倒不如说是还没有进行的事情。而在其他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具有历史意义，只不过是趣闻而已。

如果目前在加里西亚边境上对峙的两支大军都行动起来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管指挥官的意图和能力如何，大量军队的本身，再加上地形性质，将使有名无实的战争和优柔寡断的现象不再存在。迅速集中，强行军，军事智谋，大量兵力对敌人翼侧的迂回，作战基地和作战方向的变换，简单地讲，符合真正军事学术原则的大规模的机动和会战，这时就成为完全必要和理所当然的了。在这种条件下，根据政治上的理由行事的或行动不够果断的统帅，不可避免地会葬送自己的军队。在这种地形上展开的这样规模的战争，将立刻具有严重的和认真的性质。正因为如此，俄奥战争一旦爆发，就将成为 1815 年以来最令人注意的事件之一。

至于缔结和约的前途，目前已不如数星期前那么明确了。如

果同盟国願意在基本上維持 status quo〔現狀〕的条件下結束斗争，那末战争就可能停止。但讀者不需要解釋便可明白，这种希望是多么微小。事实上，在目前情况下，当俄国能得到半个德国至少在精神上的支援，并且它已动員了如前面所說的大量兵力的时候，它未必肯接受法国和英国可能向它提出的或为英法所能够同意的条件。俄国从彼得大帝时起到阿德里安堡和約¹⁹时止締結了几乎一連串的有利的和約，現在，当塞瓦斯托波尔还没有陷落，俄軍还只动用了三分之一的兵力的时候，想要它締結意味着放棄黑海霸权的和約，那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如果說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命运和联軍远征的前途尚未最后明确以前和約不可能簽訂，那末当克里木战局的勝負决定后，就更不可能簽訂了。如果塞瓦斯托波尔陷落，或者联軍被击败并被赶入海中，那末，俄国的荣誉，或者同盟国的荣誉都不允許它們在沒有取得更重大的战果之前簽訂和約。如果在會議准备期間訂立停战协定，——我們在得知沙皇接受四項条款时，曾推測有这种可能，——那末还有根据期望和平；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們却不得不設想，可能性更大得多的是发生大規模的欧洲战争。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1 月 29 日
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2 月 17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31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議會新聞。——战区消息

倫敦 1 月 29 日。今天的英国报纸证实了我们对英国议会的判断。

“晨报”²⁰說：“英国议会又开会了，并且第一个晚上就在一陣笑声中散了会，这种笑声比痴子对着自己父亲的棺材开的玩笑还令人作嘔。”

“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指出：

“当然，只有少数人在讀过星期五举行的會議的报道后才能够克服阴暗的情緒。只要仔細考察一下，就能发现这种情緒是由这样的看法引起的，即认为我們的在非常情况下为討論最重要的問題而召开的立法會議宁願談些次要的問題而不願談极重要的事情，并且把本来应当完全用来討論我軍在克里木的悲慘处境的时间都浪費在涉及个人利益或狹隘党派利益的問題上。”

根据这种情况，“泰晤士报”建議任命帕麦斯頓为首相，因为担任陸軍大臣，他是“太老”了。这家报纸建議进行克里木远征，而它为远征所选择的季节和使用的兵力，据英国的最大的軍事評論家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证明，几乎担保远征失敗。

談到星期五举行的會議的特点，还可以作一点补充。虽然早就患慢性病的罗巴克在开始发言 10 分钟以后不得不中断自己的发言而直截了当地談自己的提案，但是他还是有充分的时间提出一个严重的問題：我們派到东方去的是一支总共有 54 000 人的装

备精良的部队；现在只剩下 14 000 人了；所差的这 4 万人到哪里去了呢？英国虔诚派和论著派²¹ 的伟大的保护人军务大臣悉尼·赫伯特又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他说，制度不合适。但是几个月以前，当陆军部和殖民部分开的时候，是谁反对对这个制度进行任何根本的改革的呢？是悉尼·赫伯特和他的同僚。悉尼·赫伯特不仅拿“制度”当救命符，而且还责备旅长和团长毫不中用。但是熟悉这个制度的人都知道，这些指挥官同管理制度毫不相干，因而同坏的管理制度也毫不相干。大家都认为成了这种制度的牺牲品的是一支模范的军队。但是虔诚的赫伯特觉得，他还没有完全把别人的罪过说出来。据他说，英国兵士不灵活，不机智。虽然他们很勇敢，但是很愚蠢。

“他们打起架来是好汉，
但在动脑筋上是笨蛋。”^①

而他悉尼·赫伯特和他的同僚是未经公认的天才。赫伯特的说教使德拉蒙德这个怪人激动起来，并促使他提出是否到了暂时停止宪法生效和任命英国独裁者的时候的问题，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最后，辉格党的前大臣维农·史密斯用一句非常精彩的话说明了普遍的混乱状态，他说，他不知道提案人要求什么，也不知道他自己应该做什么；不知道新内阁是否已经组成，旧内阁是否存在过，因此他不打算投票赞成提案。但是，“泰晤士报”认为，今晚提案将被通过。大家知道，1810 年 1 月 26 日，波尔切斯特勋爵的关于成立伐耳赫伦岛远征²² 调查委员会的提案曾经遭到英国议会的反对。1855 年 1 月 26 日又看到了类似的反对情况。但是，

① 引自歌德“名诗选”。句子换了说法。——编者注

1810年1月29日通过了提案，而英国成了一个有历史先例可援的国家。

俄国单是同意和平談判，就足以使它有可能从駐在奥国边境的監視軍中調走在2个月或10星期內可以重新补充上的这样数量的部队，即至少6—8万人。現在我們知道，原来的整个多瑙河軍团(俄国的)作为一个軍团而論已經不存在了，因为第四軍从10月底起就已經在克里木，第三軍在12月底也到了那里，而第五軍的剩余部分連同騎兵和預备部队正在开赴克里木。在布格河和德涅斯特尔河一带應該由西方軍团(駐扎在波兰、沃倫和波多利亚)中的部队接替的这些軍队所进行的新的部署，以及第二軍和騎兵預备部队的一部分也在向克里木进发这一事实，其本身就足以說明——不問一切其他外交上的考虑如何——为什么俄国一分钟也不迟疑就又同意在所謂的“基础”上进行談判。两三个月的时间对俄国來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俄軍在卡利希到伊茲馬伊耳的一綫上拉得太长，沒有增援部队便不能繼續与数量日漸增加的奥軍相对峙。为了更有說服力地证明这一点，我們引用以下关于用在欧洲南部和西部戰場上的龐大的俄国作战軍队的人数和布防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极可靠的地方搜集来的，与其說它們对俄国兵力估計不足，倒不如說对它估計过高。这支軍队起初有：6个基干軍，每軍有48个营；精銳部队(近卫軍和擲彈兵)2个軍，每軍有36个营；相当多的騎兵(正規的和非正規的)和炮兵。后来俄国政府召集了預备兵員，編成了精銳部队的第四、第五和第六营，以及其他基干軍的第五和第六营。此后，它又通过招募新兵的办法，为每团增加了第七和第八营，这样一来，基干軍的营的数目就增加了一倍，而精銳部队的营的数目則增加了一倍多。

这些武装力量的人数大致如下：**近卫軍和擲彈兵**——每团的前4个营，共96个营，每营900人，共86400人；每团的后4个营，共96个营，每营700人，共67200人；**第一和第二軍**（尚未参加战斗）——每团的前4个营，共96个营，每营900人，共86400人；每团的后4个营，共96个营，每营700人，共67200人；**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軍**——每团的前4个营，共192个营，每营500人，共96000人；每团的后4个营，共192个营，每营700人，共134400人；**芬兰軍**——14400人。合計784个营，552000人；**騎兵**（正规的）——80000人，**騎兵**（非正规的）——46000人；**炮兵**——80000人。总计758000人。到目前为止，只有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軍的96个基于营有伤亡。

除了駐在高加索的第五軍第一师以外，还剩下75万人，現在他們是这样布置的：駐波罗的海沿岸的是西韦尔斯將軍指揮的波罗的海軍团，由芬兰軍以及近卫軍、擲彈兵和第六軍的預备部队組成；連同騎兵等等，共約135000人，其中一部分是由未經訓練的新兵和仓卒編成的营組成的。駐波兰和加里西亚边境自卡利希到卡麦涅茨一綫的是近卫軍、擲彈兵、第一軍、第六軍第二师，以及擲彈兵和第一軍的部分預备部队，連同騎兵和炮兵共約235000人。俄国軍队的这支精銳部队由哥尔查科夫指揮。在貝薩拉比亚以及在德涅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間，有第二軍的2个师和它們的部分預备部队，总共約6万人。这些部队本屬西方軍团，但自多瑙河軍团开往克里木后，就被調到多瑙河軍团的原来駐地。現在，他們同駐多瑙河各公国的奧軍對峙，由帕紐亭將軍指揮。用于防守克里木的是第三和第四軍、第六軍的2个师和預备部队以及尚在途中的第二和第五軍的各1个师，連同騎兵总共17万人，由緬施

科夫指揮。其余的預备部队和新成立的营(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軍的)正由切奧达也夫將軍重新組成一个龐大的預备軍团。这个軍团集中在俄国内地,共約 15 万人。至于这个軍团的哪一部分正开赴波兰或南方,还不清楚。

这样算来,去年夏末,在从芬兰到克里木的西部边境上的俄国軍隊还不到 50 万人,現在在那里的俄軍除了 15 万人的預备軍团外,还有 60 万人。尽管如此,同奥地利相比,俄国現在还是比过去削弱了。在 8、9 月那个时候,在波兰和波多利亚駐有俄軍 27 万人,而在普魯特河、德涅斯特尔河和多瑙河一带則駐有俄軍約 8 万人——加在一起是一支 35 万人的軍隊,这支軍隊可以动用来对付奥地利。現在那里只有 295 000 人,而奥地利則直接派出了 32 万人来对付他們,而且它还可以把駐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的 7—8 万人調来支援。因此,俄国目前沒有能力采取进攻行动,这意味着在波兰境内的開闊地形上、在两軍之間又无大江河这种条件下,俄国部队将被迫退到可以扼守的陣地上去。如果奥地利現在开始进攻,那末俄国軍隊将被切成两部分,一部分只得向华沙撤退,另一部分只得向基輔撤退,而且这两部分之間还隔着不能通行的、起于布格河止于德涅泊河的波列西耶沼澤地带。这就說明了为什么目前贏得時間对俄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也就說明了为什么俄国有那些“外交上的考虑”。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1 月 29 日

載于 1855 年 2 月 1 日

“新奧得报”第 5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上一届英国政府²³

在談到帕麦斯顿勋爵的政府(我們以为,这届政府的寿命是不长的,前途是不太光明的)上台执政的时候,简单地談一談上一届政府的历史,我們认为是适当的。很难讲,在将来进行历史研究时,这届政府历史中的哪一点将受到特別注意:是它的原有的野心呢,还是它所参加的一些事件的重要性;是它的极端无能呢,还是伴随着它的倒台而来的耻辱。

应当記住,阿伯丁勋爵及其联合內閣是在 1852 年 12 月 16 日的表决推翻了得比政府以后上台执政的。迪斯累里在表决他所提出的預算时居于少数地位。預算被 19 票的多数否决了,理由是他提出的扩大房屋稅和直接稅的主張是同輝格党和皮尔派所宣布的明智的政治經濟学的原則完全抵触的。实际上决定表决結果的是爱尔兰旅²⁴(大家知道,他們所根据的理由完全不帶理論性质),甚至所謂自由派和自由派保守党人言行也不一致,因为他們自己的預算也是迪斯累里的許多主張的翻版,而且他們借用了迪斯累里的大部分論据。不管怎样,托利党是被推翻了,在經過几次搏斗和作了一些毫无結果的嘗試之后,建立了联合內閣,由于这个內閣,照倫敦“泰晤士报”的說法,英国現在正面临着“政治千年王国的开端”。但这个千年王国剛剛延續了两年零一个月,就在英国人民

群情激憤的情況下以徹底的失敗和崩潰而告終了。正是那個宣稱“群賢”的即位意味着千年王國的開端的“泰晤士報”，對促使這屆內閣的倒台起了比其他任何報紙更大的作用。

“賢人們”在 1853 年 2 月 10 日出現於議會。他們重新宣布的也就是約翰·羅素勳爵早在 1850 年就提出的、並且很快使內閣辭職的那個輝格黨的綱領。至於議會改革這個主要問題，看來在“下次常會”以前是不能進行討論的。暫時國家只得滿足於進行一些次要的但是數量比較大的和比較實際的行政改革，如司法改革，實行鐵路新規章和改進國民教育事業。約翰·羅素勳爵辭去外交大臣後，接任的是克拉倫登勳爵，這是這個賢人政府所喜歡作的那許許多多的人事更動中的頭一個更動，這些更動的結果總是設置新的職位，加添薪高事少的職位，規定政府的忠實信徒的新的薪額。羅素曾經當過一個時期這樣的閣員，即除了行使下院領袖的職權外，沒有其他職權，也沒有薪金；但是很快他就開始在這方面鑽營，終於榮獲樞密院院長的官級和稱號，享有相當可觀的一筆年薪。

2 月 24 日，約翰勳爵向議會提出了他的關於取消對猶太人權利的限制的法案，但是沒有得到任何結果，因為上院把這個法案束之高閣了。4 月 4 日他提出了教育改革法案。對於懶漢內閣也只能期望這種平淡而可憐的法案。就在這個時候，帕麥斯頓以內務大臣的身分揭露了一個新的火藥陰謀，這就是有名的科蘇特—黑耳火箭案件。我們要提醒一下，根據帕麥斯頓的指令，對黑耳先生的火箭工廠進行了搜查，沒收了很多火箭和爆炸物；案情本來就夠夸大的了，而 4 月 15 日在議會討論這個案件時，帕麥斯頓作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暗示而使案情更加嚴重。但帕麥斯頓畢竟在一個問

題上說出了真情：他宣布自己是大陆警察局对付流亡者的主要情报員，而且是彰明較著地干，就像詹姆斯·格萊安先生 1844 年在暗中檢查馬志尼书信这件事上所作的一样²⁵。这位高尚的情报員終于不得不在实际上停止审理这个案件，因为所能加于黑耳先生的唯一罪名就是他的炸药工厂离倫敦市郊太近，違反了法律規定。这个好像是以炸毀整个欧洲为目的的大阴谋原来不过是違背了警察条例，处以罰金就行了！

現在再来談談罗素。5 月 31 日他在議院所作的发言中对曾經帮助他获得职位的天主教派橫加侮辱²⁶，以致政府的成員爱尔兰旅立即呈請辞职。这是对“巩固的政府”的一个很沉重的打击。爱尔兰旅的支持是它存在的首要条件，因此，阿伯丁在給爱尔兰旅的一个成員的信中不得不同自己的同僚划清界限，而罗素也只好在議會中收回自己的話。

議会的这次常会討論的一个最重要的問題是关于东印度的法案。內閣提出把东印度公司特許状再延长 20 年，并且对管理印度的制度不作任何重大改变。这个建議連本屆議會也不能接受，因此只得放棄。常会决定授予議會廢除特許状的权利，但須在一年之內預先通知該公司。前罗素內閣的一位庸碌无能的財政大臣查理·伍德爵士，現在在督察委員會即印度事务委員會里却显示了自己的才能。所有提出的改革不过是在訴訟程序方面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效果不大的改变，以及自由地代理需要有专业知識的民事职务和軍事职务。但是这些改革无非是一种借口；法案的实质則是：督察委員會主席查理·伍德爵士的薪俸从 1 200 英鎊增加到 5 000 英鎊；由公司选出的 24 个董事，只剩下了 18 个，而其中 6 个董事由政府任命；这种加强政府监督的作法絲毫也沒有降低他

們的身价,因为董事們的薪俸从 300 英鎊增加到了 900 英鎊,而董事長和副董事長每人要得到 1 000 英鎊。这样揮霍国家資金,他們还感到不滿足,于是决定把印度总督的职位同孟加拉省省长的职位分开(这两个职位原来由一人兼任),并再設置一个由总督管轄的印度河本区的省长职位。在每个这样的省长下面不用說都要有一个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中的职务都是待遇很高、大有油水可撈、只拿錢不做事的差事。印度到头来还是要按照輝格党的真正原則来管理,这是印度的多么大的幸福呵!

随后討論了預算。这个令人吃惊的財政計劃同格萊斯頓先生提出的清理国債的計劃一样,在“論壇报”上分析得极其詳尽,因此沒有必要再来談它的一切細节。格萊斯頓的預算草案中有很多地方是从迪斯累里的預算中照抄下来的,而迪斯累里的預算当时曾經使有德行的格萊斯頓大为憤怒;这两个預算都規定要降低茶叶稅和扩大直接稅。預算中某些最重要的項目,如关于取消报纸广告稅的項目,关于增設地产遺產稅的項目,都是这个大財政家在他的反提案被議會不止一次地否决以后不得已而接受的。关于专利制度的改革草案在討論过程中經過几次反复审查后而不得不放棄了。他自以为編制得天衣无縫的預算,在辯論过程中变成了一种由一些互不相关的、意义不大的項目所湊成的无定形的 *mixtum compositum* [混合物],而对这些項目恐怕根本不值得花費为討論它們所用去的百分之一的時間。

至于减少国債,格萊斯頓在这个問題上遭到了更加惨重的失敗。他的那个自以为編制得比預算更好的計劃,就是要发行利率二厘五的国庫債券来代替利率一厘的国庫期票,这使公众損失了利息總額的 1.5%;由于实行这个計劃,就不得不收回全部正在流

通的国库期票和 800 万英镑的南海公司²⁷ 的债券，这就给公众造成了最大的不便；这个计划还使谁也不愿意要的国库债券完全破产。由于实行了这些高明的措施，格莱斯顿先生能够满意地确信：到 1854 年 4 月 1 日，国库的现金在一年之内就从 780 万英镑减少到了 280 万英镑，换句话说，正是在战争前夕，国库的现金减少了 500 万英镑。其实，从西摩尔爵士的秘密通信中就可以看出，政府还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就已经知道同俄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托利党人纳皮尔早在得比勋爵内阁时期就提出讨论的关于爱尔兰大地主和佃农的新法案²⁸ 在下院通过了，看来至少得到了内阁的同意，但是上院却把它否决了，而阿伯丁在 8 月 9 日竟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流放法案²⁹、航海法案以及其他一些已经成为法律的法案，都是从得比内阁那里继承下来的。议会改革法案、国民教育改革法案以及几乎所有有关司法改革的法案，都被搁到一边了。如果英国辉格党的措施中有某一个措施避免了这样的命运，看来他们会认为是自己的不幸。唯一被通过的、并且完全可以认为是属于这届内阁的法案，就是关于马车夫的偉大法令，但是，就连这个法令也不得不在它通过以后的第二天加以修改，因为它激起了马车夫的公愤。“群贤”甚至连马车夫守则也不能付诸实行。

1853 年 8 月 20 日帕麦斯顿宣布议会常会闭会，并向议会保证，人民对于东方的困难情况是会保持镇静的；多瑙河各公国的驻军是会撤走的，而对这一点的担保则是：“他相信俄国皇帝的诚实和个人品质，这些东西会促使他从多瑙河各公国撤走自己的军队！”12 月 3 日，大家已经知道俄国人消灭了在西诺普的土耳其舰队。12 月 12 日，四大国向君士坦丁堡发出一份照会，实际上要求土耳其政府作出甚至比先前维也纳会议的照会所提出的更大的让

步³⁰。12月14日英国政府打电报到維也納，說它并不认为西諾普事件是繼續談判的障碍。帕麦斯頓是完全同意这一点的，但第二天他却提出了辞呈，表面上似乎是因为他对罗素提出的議会改革法案有不同意見，但实际上是为了向輿論界表明，他的辞职是由于对外政策和战争問題上的政策。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过了几天他又回到了內閣，这样他就避开了在議会里的一切不愉快的解釋。

在1854年，事情是由一个財政副大臣、前爱尔兰旅的政府捐客薩德勒先生的辞职引起的。在爱尔兰法庭上对丑事的揭露使政府失去了一个賢人。随后又暴露了一些新的丑事。格萊斯頓先生，有德行的格萊斯頓，企图把他的一位姓劳勒的亲戚安插到澳大利亚总督的职位上，此人是他的私人秘书，只是以賽馬迷和証券投机商而聞名，不过幸而这个打算很快就破产了。就是这位格萊斯頓，还由于一个在他手下工作、靠他得到自己职位的姓奧弗拉赫蒂的人携带不少公款潜逃而受牽連。另一个姓海华德的人曾經因写了一长篇毫无文学和科学价值的抨击迪斯累里的文章而得到了格萊斯頓賞賜給他的济貧委员会中的职位。

2月初議会恢复了工作。2月6日帕麦斯頓发表声明說，他要提出关于建立爱尔兰和苏格兰民軍的法案，但是当3月27日真的宣战时，他却认为他的責任是在6月底以前不提出法案。2月13日罗素提出他的議会改革法案，不过是为了在10个星期之后也因为宣战而“含着眼泪”撤回法案。3月間，格萊斯頓提出了自己的預算，他要求的仅仅是“把目前准备离开不列顛海岸的25 000名兵士弄回来所需要的那笔款項”。靠了他的同僚的帮助，他現在已經不用操这份心了。就在这时候，沙皇公开了秘密通信³¹，使英法两國內閣不得不宣战。1853年1月11日給罗素的急电开始的这一

秘密通信表明，英国的大臣們在当时就完全知道俄国的侵略意图。他們所作的关于尼古拉的誠实和个人品质，关于俄国的爱好和平和温和的立場的一切論断，現在看来都只是企图把約翰牛引入迷途的无耻的謊言。

4月7日，格雷勋爵发言猛烈抨击目前的軍事管理組織，因为他渴求得到陸軍大臣的职位，以便破坏軍队的紀律，就像他在領導对殖民地的管理时使不列顛帝国的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不再服从一样。他要求把一切軍事部門統一在陸軍大臣一人的領導之下。这篇发言使得內閣能够把陸軍部和殖民部分开，在6月間另設一个新职位即陸軍大臣的职位。这样一来，一切都照旧很糟，只不过多了一个职位，多付了一份薪俸。考察一下議会在这次常会期間的全部活动，就可以作出以下的总结：提出了七个重要法案，其中三个法案即修改貧民迁移法法案³²、苏格兰国民教育法案和修改議会誓詞法案³³（关于犹太人权利的变相法案）被否决了；另外三个法案即防止賄买选民法案、改变文职法案和議会改革法案被撤回了；只有一个法案即牛津大学改革法案被通过了，但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这里沒有必要来談作战情况和联合內閣在外交上的努力，因为所有这一切每一个人都还記憶犹新。議会的工作是在去年8月12日中断的，在12月間再召集开会，以便赶快通过两个急不容緩的措施：外籍軍团法案和以自願方式利用民軍在国外担任軍事勤务法案。这两个法案直到今天还是一紙空文。而同时却傳来了在克里木的不列顛軍队处于苦难境地的消息。这使輿論界大为憤慨；事实是令人震惊的，也是不容爭辯的；于是大臣們不得不考虑辞职了。議会在1月間开会，罗巴克发表了关于自己的提案的声

明，約翰·羅素勛爵馬上就不見了，只經過了几天的辯論，“群賢”就遭到了議會史上空前的失敗，于是他們被推翻了。

大不列顛可以吹噓的不只是一个无能的政府，但是，像“群賢”內閣这样无能、可怜、貪婪、同时又这样剛愎自用的內閣还是从未有过的。这个內閣以滔滔不絕的胡吹開場，滿足于一些小事的爭論，不断遭到失敗，最后則以蒙受人世間最大的耻辱而告終。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寫于

1855年2月1日

作为社論載于1855年2月23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432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論內閣危機

倫敦 2 月 2 日。昨天晚上，在帕麥斯頓發表關於內閣辭職的正式聲明以後，下院會議又延期了。

在上院，阿伯丁勳爵發表了給“群賢內閣”送葬的悼詞。據他說，他反對羅巴克的提案，並不是因為他的政府害怕調查，而是因為這個提案違反憲法。然而，阿伯丁沒有像自己的朋友悉尼·赫伯特那樣，舉出歷史上的例子來證實這種說法，赫伯特則曾經質問下院，它是不是有意仿效法國執政內閣（成立於 1795 年），派委員去逮捕杜木里埃，而大家知道，杜木里埃把這些委員引渡給奧地利是在 1793 年³⁴。蘇格蘭貴族不想顯露這樣淵博的學識。他保證說，他的內閣只會因任命調查委員會而得到好處。他繼續往下說。他預先肯定了調查的結果，大肆吹捧自己和自己的同僚——首先是陸軍大臣，然後是財政大臣，再就是海軍首席大臣，最後是外交大臣。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都是偉大的，每一個人都是賢人。至於英國的軍事情況，克里木軍隊的處境的确是困難的，但是波拿巴向歐洲宣布過，法國軍隊共有 581 000 人，此外他還下令再招募 14 萬人。撒丁交給腊格倫勳爵指揮的有 15 000 名優秀的兵士。如果維也納和平談判失敗，他說，我們可以得到擁有 50 萬大軍的軍事強國的幫助。

无论如何，苏格兰贵族没有著名的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西斯蒙第身上的那种缺点，西斯蒙第自己承认，他用一只眼睛把一切看得一团漆黑。阿伯丁用两只眼睛把一切看得都很美好。例如，商人、工厂主和工人都肯定地说他们经受着严重的商业危机，阿伯丁却发现目前国内各地区都是一片繁荣景象。阿伯丁用了一些俏皮话（拜伦勋爵还赞扬过苏格兰贵族的这番话³⁵）来攻击自己的对手得比勋爵：

“尊敬的議員們！國家現在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用什麼方法才能建立這個政府，這不該由我來說。盛傳得比勳爵奉女王陛下之命負責組閣。但是看到得比勳爵在自己的普通的崗位上，我就想，事情不是這樣，流傳的謠言是不可相信的。”

為了理解這段話的俏皮之處，有必要引證一下得比勳爵的回答。

“高貴的阿伯丁伯爵過低估計他獲得消息的來源。不是從謠傳中知道，而是他自己〈得比〉在去上院之前，曾親自告訴阿伯丁關於他所接到的女王的建議。因此，說什麼謠言迫使高貴的伯爵相信他〈得比〉曾經謁見過女王陛下，這只是高貴的伯爵由於天生害怕誇大并希望公正地闡明他所維護的事物的每一細節而使用的生動的說法。”

同時，得比趁機聲明，在目前各政黨和下院的情況下，他沒有負責組閣的可能。

陸軍大臣紐卡斯爾公爵的解釋和他所描繪的在“和睦家庭”中的相互關係的情景，轉移了上院與會公眾和高貴的貴族本身對克里木軍隊和內閣危機的注意力。紐卡斯爾公爵說，約翰·羅素勳爵在下院的解釋使他不得不說明他自己在垮台的內閣中所處的地位。羅素的陳述既不全面又不真實。羅素把情況說成這樣，似乎

在把陸軍部和殖民部分開的時候，他同意把陸軍部交給紐卡斯爾公爵是非常勉強的，完全是對公爵的“強烈的願望”的讓步。實際上，當內閣決定把兩個部分開的時候，他（紐卡斯爾）就曾聲明：“至於我個人，我準備負責這兩個部中的任何一個部，或者什麼都不負責。”他不記得羅素曾經表示願意把陸軍部交給帕麥斯頓勳爵，但是清楚地記得，有一個時期，羅素打算自己來主持這個部。他（紐卡斯爾）根本不想在這方面擋着羅素的路，並且他在接受陸軍部時就充分意識到，事情如果順利，功勞不會記在他賬上，事情如果不順利，各種各樣的責難卻會落到他頭上。但是，他認為自己的義務是不要逃避這個有危險有困難的吃力不討好的差事。有些人說這是“自命不凡”，羅素勳爵用一種顯然庇護的口吻稱這種行為是“值得稱贊的功名心”。羅素勳爵故意把阿伯丁給高貴的勳爵的信中的下面一段話對下院隱瞞起來：

“我把您的來信的內容告訴了紐卡斯爾公爵和悉尼·赫伯特。果不出所料，他們兩人都極力堅持要在他們擔負職務的問題上通過一項將被認為是最符合社會利益的決定。”

他（紐卡斯爾）還就這點向阿伯丁伯爵作了口頭聲明：

“不要給羅素勳爵有退出內閣的借口。不要違反他想使我離開這個崗位的願望。請您像社會利益所要求的那樣來處理我的問題。”

紐卡斯爾說，在下院，羅素勳爵隱約地暗示了他在給阿伯丁的信中所提到的錯誤，但是又留神不說出這封信中有關的話。第一個暗示是關於為什麼第九十七團沒有從雅典調到克里木的問題，但是要知道，外交大臣認為英國軍隊從雅典調出來是不能容許的和危險的。至於他談的第二個錯誤，即拒絕派遣 3 000 名新兵，則是因為腊格倫勳爵反對今後把那些年輕的和沒有養成守紀律的習

慣的兵士派到他那里去。况且当时运输船只根本不够。这两个所谓的錯誤就是罗素所能想出来的一切，罗素和自己的同僚常常在海濱疗养地休养，而他（紐卡斯尔）在1854年整整一年中一直在自己的崗位上辛辛苦苦地工作。不过，罗素在10月8日給紐卡斯尔本人的信中关于这些“錯誤”是这样說的：“您做了可能做到的一切，我满心欢喜地希望您获得成功。”

紐卡斯尔說，阿伯丁毕竟向內閣提出了罗素关于更換人員的建議。但是建議被一致否決了。12月13日，他（紐卡斯尔）在上院作了維護自己的管理机关的詳尽发言；12月16日，罗素对阿伯丁說，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放棄了更換人員的打算。罗素除了下面两次以外，从来沒有提出过关于改革軍事管理机关的具体建議。在他提出辞呈和罗巴克发表声明的前三天，举行了內閣會議。罗素提出一項建議，要求把从某一时期以来即由陸軍大臣办公厅召开的各軍事部門的首长的會議肯定为正式的和合法的。他的建議被通过了。此后不久，罗素提出了一份书面草案，其中除了已經由內閣贊同的新措施以外，还包括两点建議：（1）設立一个由陸軍大臣为首的、包括軍械部在內的并且監督軍隊的一切非軍事管理机关的最高委員會；（2）除了过去已經吸收进来的軍事部門的首长以外，这个最高委員會还应当有两个高級軍官加入。罗素在下院說，他有一切根据认定他的“书面建議”将被否決。但这不正确。第一个建議被紐卡斯尔公爵採納了；第二个建議被否決了，順便說說，这所以被否決是因为罗素想拉进来的“总軍需官”多年来已經成了傳奇式的人物，英国軍隊中再沒有这种人了。可見，罗素从来沒有提出过不会被採納的建議。不过他（紐卡斯尔）在1月23日就对阿伯丁伯爵說，不管議会的決議如何——支持或者反对內

閣——他都要退出內閣。他只是不希望別人把他看成是在議會作出決斷以前就逃跑了。

約翰·羅素勳爵的一生，用老科貝特的話來說，就是一連串“對待生活的騙人的幌子”，現在，正像紐卡斯爾公爵的發言所表明，他也是在騙人的幌子下完結的。

卡·馬克思寫于 1855 年 2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2 月 5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 59 號

卡·馬克思

阿伯丁內閣的倒台

1855年2月2日星期五于倫敦

在代議制的全部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屆內閣像英国著名的“群賢”內閣那样在辞职时蒙受那样大的耻辱。任何一屆內閣都可能成为少数派，但是，被 305 票对 148 票的多数即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击败的，并且是在大不列顛下院这样的議會里被击败的，就只能是以 ce cher [这位可爱的] 阿伯丁为首的一代杰出的天才人物。

无疑地，議會刚一开会，內閣就明白它的寿命不长了。在克里木干了丑事，全軍复沒，参与指揮战争的一切机关和人員束手无策，由于“泰晤士报”的抨击而使全国更加憤慨，以及約翰牛断然决定要查明誰是事件的罪魁禍首，或者至少要拿誰来出出自己的气——所有这一切都向內閣表明，死期已到，它該准备后事了。

关于提出威胁政府的质問和提案的声明一下子就大量出現；特別危險的是罗巴克关于成立一个委員會的提案，这个委員會要查明作战情况和調查所有对指揮战争負有一定責任的人的活动。这馬上得出了結局。政治敏感立刻使約翰·罗素勋爵意識到，不管少数派³⁶是否投票贊成，罗巴克的提案总会被通过，而像他这样一个可以以他的年岁还没有他成为少数派的次数那么多而自豪的

国家活动家，不能容忍多数票在現在又来反对他。因此，生来就胆小怕事和卑鄙无耻的他（这些品质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常常从他那煞有介事的夸夸其談和維護宪法的装腔作势的假面具下暴露出来）认为，“明智是勇敢的最好表现”^①，于是沒有預先告訴自己的同僚便从自己的崗位上逃跑了。虽然罗素是一个平常的人，沒有他，人們也能很好地过下去，但是看来“群賢”都由于他的突然棄职而大为震惊。英国报刊一致譴責这个矮小的国家活动家，但是这能起什么作用呢？所有报刊和它們的所有譴責都不能消除內閣的混乱現象。正是在这种紊乱的時刻，即紐卡斯尔公爵放棄陸軍部，而帕麦斯頓勛爵还没有把它接管过来的时候，內閣接到了罗巴克的可怕的提案。

罗巴克先生是个小律师，假如他在議會生涯里比較一帆風順的話，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像約翰·罗素勛爵一样有風趣而不得罪人的小輝格党人。但是，这位 *ci-devant*〔过去的〕未开业的律师，現在的議會饒舌家，尽管使出了全部精力，善于随机应变，也不能撈到什么显著的政治資本。他在任何一届輝格党内閣中总是扮演一种受委托的秘密代表的角色，但他始終沒有取得可以保证他得到“官职”的地位，而这乃是一切不列顛自由党人的最高目的。我們可爱的罗巴克被自己的美好希望所迷惑，他遭到自己党的輕視和自己的反对者的嘲笑，他意識到他的心已經变得冷酷了，而且充滿了悲哀，于是他漸漸变成了一只不定在什么时候就要在議會里尖吠一通的最貪婪、最凶恶、最討厭、最惹人生气的劣种狗。他以这种身分来輪流为所有善于利用他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服务，甚至

^① 这一句話已經成为成語了，原出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場。——編者注

不希望得到任何方面的感激或尊重。但是，誰也沒有像我們的老朋友帕麥斯頓那樣能夠高明地利用他，他在1月26日又充當了帕麥斯頓的工具。

羅巴克的提案本身在英國下院這樣的議會里未必能有什么意義。大家知道，下院各個委員會工作得很差勁，拖拖拉拉，簡直慢得要命；而由這樣的委員會來調查目前戰爭的領導問題，即使能夠一般地提供出一些東西，實際上也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因為它的結果大概要比應該做到的晚許許多個月才能揭曉。只有在像1793年法國國民公會那樣的革命專政的議會里，這種委員會才能帶來良好結果。但是在同樣的情況下，政府本身也只不过是這樣的一個委員會；它的受托人就是議會本身的代表，因此，在這樣的議會里這類提案就是多餘的了。悉尼·赫伯特先生畢竟沒有完全錯，他曾指出過，這個提案（當然，羅巴克完全沒有這種意圖）在某種程度上是違反憲法的，他還以他特有的對歷史事實的精確知識詢問說，下院是不是有意像**執政內閣**（原來如此！）對付杜木里埃將軍那樣派委員到克里木去。我們要指出，正是這個最確切的年表載明派委員到杜木里埃將軍那里去的是**執政內閣**（成立於1795年），而這些委員早在1793年就被這位將軍逮捕并被引渡給奧地利，——正是這個年表清楚地證明在悉尼·赫伯特和他的同僚們的全部活動中所常見的那種把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上弄亂的情形。至於羅巴克的提案，那末他的上述違憲行為就使許許多多有可能取得官職的候選人有理由對這個提案不投贊成票，從而為自己參加任何一個可能拼湊起來的內閣留下一條廣闊的道路。然而，反對內閣的多數竟占了如此壓倒的優勢！

各主管部門之間的爭吵是辯論的特色。每一個主管部門都企

图把过错推在别的主管部门身上。军务大臣悉尼·赫伯特断言，一切都要怪运输部门；海军部秘书长贝尔纳·奥斯本声称，全部祸害的原因仅仅在于伦敦最高统帅所习惯了的那种有缺陷的、不合适的制度。海军部部务委员之一的贝克莱海军上将相当明白地向赫伯特示意，他应当首先引咎自责，等等。同时，在上院，陆军大臣纽卡斯尔公爵和总司令哈丁子爵之间也在彼此交换这一类的恭维话。由于约翰·罗素勋爵的发言，赫伯特的处境的确非常困难，因为约翰·罗素在说明他辞职的原因时承认，报刊上关于克里木军队的状况的所有报道实质上都是正确的，军队的情况“很糟糕，简直不能令人容忍”。因此，悉尼·赫伯特没有别的办法，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事实，最多只能用一些极不妥当的、部分是沒有根据的理由来辩护。他不得不承认，甚至是比较明确地承认，军事管理机关完全不行，而且非常紊乱。赫伯特说，我们比较顺利地吧 24 万吨各种储备品和大批军队调到了 3 000 英里以外的巴拉克拉瓦（接着就很快地列举了充分供应军队的各种服装、帐篷、食物、甚至奢侈品）。但是，唉！需要所有这一切的不是巴拉克拉瓦，而是离岸 6 英里的地点。把所有的储备品运送到 3 000 英里以外是可能的，而运送到 3 006 英里以外却不可能了！必须把储备品再往前运送 6 英里的事实毁了一切！

假如不是累亚德、斯泰福和他的同僚格莱斯頓发言，赫伯特苦苦哀求宽大的表示也许终于会引起对他的某种怜悯。前两位議員刚刚从东方旅行归来；他们是大家谈论的全部事情的目击者。他们不只是重复报纸上已经谈过的东西，他们还举出了玩忽职守、无能和管理不善的事例；他们所描述的阴暗情景远远超出了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切。用帆船把马匹从瓦尔那运到巴拉克拉瓦去，却

不带任何飼料。行囊从克里木到博斯普魯斯海峡来回运送了五六次，而饥寒交迫的兵士都因穿不上这些行囊里的衣服而冻僵了，湿透了。“初愈的病号”被遣回克里木担任队列勤务，但他们还很虚弱，连站也站不稳；被抛棄在斯庫塔里、巴拉克拉瓦和运输船只上的听天由命的伤病員得不到任何照顾，憐得怕人。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一幅使“本报通訊員”的描述或来自克里木的私人消息全都黯然失色的图景。

为了消除这些描述所造成的沉重印象，不得不求助于自負的、英明的格萊斯頓，但是，对于悉尼·赫伯特來說，不幸的是格萊斯頓否认了他的同僚們在辯論的第一个晚上所承认的一切。罗巴克直截了当地向赫伯特提出一个問題：你从英国派出了 54 000 名兵士，現在处于战斗状态的只有 14 000 名，其余 4 万名到哪里去了呢？赫伯特对罗巴克回答得很干脆，他提示說，其中一部分还在加利波利和瓦尔那就死亡了；他絕不怀疑关于死亡和离队人員的总的統計数字的正确性。然而現在看来，格萊斯頓比軍务大臣消息还要灵通，他說：“根据我們所得到的最新統計数字”，軍队的实际人数不是 14 000 名，而是 28 200 名，其中不包括担任岸防勤务的 3 000—4 000 名海軍陆战队和水兵在內。当然，格萊斯頓很謹慎，沒有說出他所指的是哪一个“最新的統計数字”。但是，如果注意到各級机关特别是旅部、师部和总參謀部在編制伤亡名单时常有的那种拖拉現象，我們有权推定，格萊斯頓的表报大概是 1854 年 12 月 1 日以前的，而且还把在最近 6 个星期內由于气候恶劣和过度疲劳而完全离队的大批兵士也計算在內。然而看来格萊斯頓現在还像他曾經指望輿論界对待他的財政草案那样，盲目地相信官方文件。

沒有必要更詳細地來分析這些辯論。除了許多 *dii minorum gentium* [小神]^① 以外，發言的還有迪斯累里，其次是托利黨的最后一任內務大臣沃尔波尔，最后是“慷慨地”為自己的受到抨擊的同僚們辯護的帕麥斯頓。在辯論過程中，帕麥斯頓在沒有最後確信辯論會得出怎樣的結果以前一句話也不說。在他確信以後，僅僅是在這以後，他說話了。通過大臣們的官員傳到大臣席上的流言，議院的一般情緒——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內閣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而這種失敗必將使他的同僚們完蛋，但未必會牽涉他本人。雖然帕麥斯頓看來也將同所有其餘的人一起離職，但他是這樣地確信他的地位的巩固，這樣地確信他的同僚們的離職會給他帶來好處，以致他幾乎認為尊敬地把他們請走是他講究禮貌必盡的職責。這個職責他履行了，因為他恰恰在投票表決以前作了發言。

帕麥斯頓實際上也的確非常精明。他由於帕西菲科事件而博得“真正的英國大臣”的聲譽³⁷以後，非常善於保持自己的這種聲譽，儘管有許多聞所未聞的揭露，但是，當帕麥斯頓一離開外交部，約翰牛總是認為自己被出賣給了某一個外國。帕麥斯頓被約翰·羅素非常不禮貌地趕出這個部以後，便用威脅的辦法迫使這個矮小人物不談他被趕出的原因，從這時起，對“真正的英國大臣”就更加關心了：他成了功名心重而又沒有才能的同僚們的無辜犧牲品，成了一個被輝格黨人出賣的人。在得比內閣倒台後，帕麥斯頓被安置在內務部的一個職位上，在這裡他仍然被看做是犧牲品。他們沒有這個他們大家都憎恨的大人物是不行的，但是他們又不希望讓他擔任應該由他擔任的職務，於是就用一個辜負這種天才的

① 轉意是：二流人物。——編者注

职务来敷衍他。約翰牛就是这样議論的，它越来越以自己的帕麦斯頓而自豪，因为它看到这位真正的英国大臣在自己的次要职位上忙个不停：干預治安法院的案件，折磨馬車夫，申斥主管下水道的机关，就专利制度問題作娓娓动听的发言，为煤烟这样重要的問題而恼火，硬要把警察集中起来，反对在市內埋葬。好一个真正的英国大臣！对于他來說，“泰晤士报”上发表的《Paterfamilias》〔“家长”〕的接連不断的来信就是情报的样本和来源，就是新的措施和改革的宝庫。自然，誰也沒有像这位同英国的大多数資產阶级选民一模一样的 Paterfamilias 那样以此感到滿足，对于資產阶级选民說来，帕麦斯頓已成了一尊偶像。“瞧吧，大人物在小职位上可以干些什么！历任內务大臣有誰曾經关心要消除所有这些紊乱現象！”誠然，馬車夫那里依然如故，煤烟並沒有消除，墓地也沒有在市內消失，警察也沒有被集中，一句話，这些偉大改革当中的任何一件都沒有付諸实现，但据說这不怪帕麦斯頓，而要怪他的貪婪的、愚鈍的同僚們！帕麦斯頓的忙碌和纏扰行为則漸漸地被看做是他的旺盛的精力和积极性的证明。而这位最反复无常的英国国家活动家从来沒有能够使議會里的任何一次商議，任何一个法案得到善終，这位政客只是为了自我滿足而忙个不停，他的一切措施到头来仍然是一紙空文——就是这位帕麦斯頓被推崇为国家在危急关头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應該說，帕麦斯頓本人為頌揚自己是出了不少力气的。他不滿足于作“晨邮报”³⁸（这家報紙每天都把他吹嘘成国家未来的救星）的共有主，于是他雇佣了像魏科夫那样的一定会在美国和法国頌揚他一番的花花公子；几个月以前，他收买了“每日新聞”³⁹，他把某些電訊和其他重要消息告訴了它；他几乎对所有的倫敦報紙的編輯部都有影响。对战争的拙劣指揮导致

了帕麦斯顿所期望的那种危急局面，这就使他在联合內閣的廢墟上扶搖直上，使他高升到別人所不可企及的高度。在这个决定性的关头，他得到了“泰晤士报”的无条件的支持。他怎样爭得这一点，他同德兰恩訂立了什么契約，自然很难說，但是在投票后的第二天，所有倫敦的日报，只是“先驅报”⁴⁰除外，都異口同声地一致拥护帕麦斯顿担任首相，应当說，他认为自己竭力追求的目的已經达到了。对这位真正的英国大臣說来，不幸的是他常常使女王煩惱，因此女王尽一切可能来打乱他的計劃。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2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5 年 2 月 17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316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被推翻的內閣

倫敦2月3日。1852年12月16日，迪斯累里預算的第一項即規定擴大直接稅首先是擴大一切房屋稅的項目被19票的多數否決了。托利黨人內閣呈請辭職。經過10天的幕後鬥爭，聯合內閣組成了。這個內閣是由這些人組成的：輝格黨的一部分寡頭政治家（格雷氏族這次被排擠掉了）；皮爾分子的官僚集團；所謂梅費爾激進派⁴¹的某些混雜物，如摩耳斯沃思、奧斯本；以及薩德勒、克奧、蒙塞耳等愛爾蘭旅的捐客——他們在12月16日決定了事情的結局，同時也得到了次要的內閣職位。新內閣自稱為“群賢內閣”。它也真的幾乎收羅了三十多年來在政府中互相輪換的所有賢人。“泰晤士報”在宣布“群賢內閣”上台時是這樣說的：“我們現在正面臨着政治千年王國的開端。”的確，在執政集團看來，自從他們發現他們的黨派組織已經瓦解，他們的內部矛盾只是產生於個人的怪癖和虛榮心，他們彼此間的摩擦再也不能引起全國的注意的時候起，“政治千年王國”就已開始了。聯合內閣並不代表某個特殊的派別。它代表的是到目前為止治理着英國的階級的“群賢”。因此，回顧一下這個內閣的活動是很重要的。

得比內閣倒台以後，議會放了聖誕節假。後來議會又放了復活節假。只是在這以後，1853年的正式常會才開會，這次常會几

乎完全是討論格萊斯頓的預算、查理·伍德关于印度的法案和楊格关于調整爱尔兰的大地主和佃农之間的关系的法案。

格萊斯頓在把自己的預算提交議院審議之前，宣布了实行减少短期国債和长期国債的重要措施。在短期国債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是，他把国庫期票的日息从 1.5 辨士降低到 1 辨士，并且正好是在市場利率提高的时候降低的。由于实行这项措施，格萊斯頓不得不先收回 300 万国庫期票，然后再按更高的利率发放出去。他在大量长期国債方面的試驗更有意思。他的冠冕堂皇的目的是减少国債。格萊斯頓搞得那样巧妙，以致在財政年度終結时不得不 at par〔按票面价值〕收回 800 万英鎊南海公司債券，这些債券按当时交易所的牌价只值票面价值的 85%。同时，格萊斯頓把他新发明的有价证券——国庫債券拋到交易所去。他爭取到議會准許发行为数 3 000 万英鎊的这种证券。但是他費尽气力才把 40 万英鎊的这种債券推銷出去。一句話，实行格萊斯頓的减少国債的措施的結果是：长期国債的基本数額增加了，短期国債的利率提高了。

联合內閣引以自豪的格萊斯頓預算是由各种不同的要素組成的。像降低茶叶稅、降低消費稅（固然，格萊斯頓談的是降低肥皂消費稅，而迪斯累里談的則是降低麦芽消費稅）和提高直接稅这些項目，是格萊斯頓从他的前任的預算中照抄下来的。其他一些最重要的項目，例如对地产征收遺產稅和廢除報紙廣告稅等等，都是格萊斯頓在議院两次否決他的反提案以后不得已而接受的。对自己預算中的某些項目，例如关于專利制度的改革，他只得完全放棄了。他向議院提出的那种作为无所不包的制度的东西，經討論后成了五花八門的互相矛盾的項目的大雜燴。只有預算中关于廢除報紙附刊的印花稅這一項是他自己提出的；由于這一項，所有報紙

中唯一出附刊的“泰晤士报”得到了每年3—4万英镑的好处。但是格萊斯頓更积极地坚持保存报纸正刊的印花税，这样一来，他博得了“泰晤士报”的特别好感，当然，这家报纸现在希望在新的内阁里面也能看到他。这就是联合内阁在1853年整个常会期间借以维生的格萊斯頓的偉大创作。

1854年4月30日，东印度公司特許状有效期滿。因此，应当重新調整英国和印度之間的关系。联合内阁力图把东印度公司的特許状再延长20年，結果沒有成功。印度沒有再被“租給”东印度公司几十年。特許状只是在停止特許状生效的“通知”发出前还有效，而議會随时都可以向公司发出停止特許状生效的通知。关于印度的法案中的这项唯一重要的条款，在違反内阁願望的情况下被通过了。如果不把在印度的訴訟程序方面的某些不大的改变和准許一切具有必要能力的人代理需要专业知識的民事职务和軍事职务这种情况算在內，那末，有关印度方面的改革实际上不过是以下一点：住在倫敦的印度事务大臣（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ontrol〔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薪俸从每年1200英镑增加到5000英镑。东印度公司的18个董事中有6个今后由内阁任命，只有12个由公司的股东会选出。这些董事的薪俸由300英镑增加到900英镑，而两位董事长的薪俸則由400英镑增加到1000英镑。此外，孟加拉省省长的职位（以及他下面的委员会）以后同印度总督的职位分开；同时，在印度河本区設置一个新的省长职位（以及他下面的委员会）。“群賢内阁”在印度方面的改革仅仅是提高薪俸和設立新的薪高事少的职位。

联合内阁的关于爱尔兰的大地主和佃农之間的关系的法案，是从自己的前任托利党人那里接受过来的。联合内阁不應該落后

于他們。它提出了这些法案，并在常会閉幕以前不久，經過长达 10 个月的辯論之后，在下院通过了这些法案，或者更确切些說，让这些法案在下院通过。但是在上院，阿伯丁同意，以这些法案必須仔細加以研究并在下次常会上再提出为借口而否决这些法案。

关于議会改革、国民教育改革、司法改革等等的內閣法案，根据內閣的要求，被推迟到下次常会討論。“群賢”的偉大創作——关于倫敦馬車夫守則的法案固然成了法律，但是这个法律剛出議會的大門就送回来修改了。它是行不通的。

議会常会終於在 8 月 20 日結束了。帕麦斯頓用他在議会常会閉幕时說的一句話概括了这次常会期間內閣的对外政策：議会可以安心地散会了。“我完全相信俄国皇帝的誠实和个人品质”，他将自願地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

帕麦斯頓公开过問 1853 年常会期間的对外政策，还只限于上述言論；其次就是在下院閉会前几天在議會发表的演說，在这次演說中，他把俄国人对多瑙河苏利納河口的封鎖說成是不成功的玩笑；再有就是在 1853 年 4 月 15 日的會議上——有关所謂科苏特火药陰謀的問題——被迫承认，他奉欧洲各宮廷之命，利用英国警察来監視政治流亡者。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3 日

載于 1855 年 2 月 7 日

“新奧得报”第 6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

政党和集团

倫敦 2 月 5 日。目前的內閣危机的延长，多少可以說是正常的，因为在英国，这样的危机平均要持續 9—10 天。凱特勒在他的名著“論人的能力”⁴² 中证明，在文明的国家里，每年发生的不幸事件和犯罪行为等等的数字可以几乎像数学般准确地預先計算出来，这使人大为惊奇。相反地，十九世紀各个不同时期英国內閣危机有一定的持續時間，却毫不令人奇怪，因为大家知道，这里总是要經過一定的拼凑过程，总是要瓜分一定数量的职位和发生一定数量勾心斗角的事。只有这次由旧政党的瓦解所决定的拼凑的性质才是不寻常的。这种瓦解的事实曾使得目前被推翻的联合內閣有成立的可能和必要。执政集团（这帮人在英国同統治階級极不相称）在它还没有最后丧失治国能力的时候，不得不忽而进行这种联合，忽而进行那种联合。大家知道，得比的拥护者曾拚命反对任何联合。在得比勋爵奉女王之命組織新內閣之后，他的第一个步驟就是企图不仅同帕麦斯顿（迪斯累里在討論罗巴克提案时直截了当地向帕麦斯顿說过，要求对譴責进行表决，这既是反对紐卡斯尔公爵和阿伯丁，也是反对他本人）进行联合，而且同格萊斯顿和悉尼·赫伯特即被托利党人当做瓦解自己政党的直接禍首而深恶痛絕地加以迫害的皮尔分子进行联合。当罗素受命組閣的时候，

他也想同皮尔分子进行联合，但正是这些皮尔分子参加上届內閣才使他有了辞职的借口，正是他們在議會會議的严肃場合下揭穿了他的謊話。最后，如果帕麦斯頓能組成內閣，那也只会是改变很小的旧联合內閣的再版。很可能是輝格党人格雷之流的氏族来代替輝格党人罗素的氏族等等。掌握着管理国家的壟断权的旧的議會政党，現在只不过是一些集团罢了，但是，促使这些集团削弱并让它们沒有可能建立政党、独树一帜的那些原因，也促使这些集团失去了联合的能力。因此，在英国議會史上任何时期都沒有出現过像联合內閣时期那样的分裂成許多人数很少、偶然拼凑起来的集团的情况。在这些集团中，人多势众的只有两个集团，这就是得比派和罗素派。在他們的拥护者中，有一个由势力雄厚的古老世家及人数众多的被保护者組成的支綫散布得很广的集团。但是人数众多恰恰是得比派和罗素派軟弱的根源。要組成独立的議會多数，他們的人数太少，但同时他們的人又太多，其中有不少追求名位的人，必須滿足这些人的野心，这就使得他們沒有可能用分配重要职位为代价来取得外界的充分支持。因此，人数較少的皮尔分子集团、格雷集团、帕麦斯頓的拥护者等等就比較适合于組織联合內閣。但是，使他們适合于組織这种內閣的原因，即其中每一集团都軟弱，也使得他們的議會多数帶有偶然性，在任何时候，只要得比派同罗素派或得比派同曼彻斯特学派⁴³等等勾結起来，这个多数都可能瓦解。

最近这次組織新政府的嘗試，在另一方面也是有趣的。在所有这样拼凑成的政府中，都有旧內閣的成員。后一届內閣的首脑是前一届內閣中最有威望的成員。但是，难道下院在接受罗巴克提案之后，沒有像帕麦斯頓本人在答复迪斯累里时所說的那樣，表

明不仅贊成对譴責旧內閣全体成員进行表決，而且贊成任命委員會来調查他們的活動嗎？委員會還沒有任命，調查還未開始，而被告却又執掌權柄了。如果議會有權推翻內閣，那末內閣也有權解散議會。而解散的前景會怎樣地影響目前的議會，從約翰·特羅洛普爵士于 1853 年 3 月 1 日在下院所作的聲明中可以看出來。

他說：“現在已經有 14 個由議員組成的委員會在開會，這些委員會是議院為了調查在最近議會選舉期間發生的賄買事件而成立的。如果我們讓這種風氣繼續存在下去，那整個議會很快就會變成調查賄選行為的各種委員會。不僅如此，被控告的議員會非常之多，以致剩下的沒有嫌疑的議員會少到不可能去審訊他們或者哪怕是調查他們的案件。”

出于愛國主義精神，在議會第三次常會開始時就失掉用高價買來的職位，那是會很難受的。

卡·馬克思寫于 1855 年 2 月 5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2 月 8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 65 號

卡·馬克思 两种危机

倫敦2月6日。輿論界目前正专心致志地談論着两种危机：克里木軍隊所遭受的危机和內閣危机。前一种是人民談論的，后一种則是俱乐部和沙龙談論的。据最近来自克里木的笔調非常低沉的报道，英国軍隊的人数已經从14 000人减少到12 000人，撤除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圍攻的日子很快就会来到。同时下院正在討論沙龙陰謀。罗素勛爵和格萊斯頓占用了會議的全部時間，他們滔滔不絕地陈述着贊成或者反对偉大的罗素退出再也不存在的內閣的意見。哪一方也沒有举出新的事实，只是对旧的事实爭个不休。約翰勛爵是他自己的辯护人，格萊斯頓則担任紐卡斯尔公爵的辯护人。关于紐卡斯尔是否适合担任陸軍大臣职务的問題所提出的深謀远慮的意見，在本来应当加以管理的軍隊不再存在的时候，听起来特別可笑。格萊斯頓在結束他的冗长的发言时說，“他希望一切誤会（罗素和紐卡斯尔之間的）都被遺忘”，这时甚至連現在的下院也終於以著名的傳統的发牢騷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滿了。

因而，不是議院的不信任投票，更不是英国軍隊的复沒，而純粹是年老的勛爵和年輕的公爵之間的“誤会”——这才是造成內閣危机的基础。克里木不过是沙龙陰謀的借口。內閣和下院之間的

誤會甚至不值一提。甚至對目前的下院來說，這已經太嚴重了。羅素垮台了，格萊斯頓垮台了，整個會議都垮台了。

兩院都得到通知，已授命帕麥斯頓勳爵組閣。但是他意外地遇到了障礙。格雷勳爵拒絕擔任指揮戰爭的職務，他一開始就不同意戰爭，現在也不同意戰爭。這對軍隊倒是件幸事，因為否則他一定會像過去破壞殖民地的紀律一樣破壞軍隊的紀律。然而格萊斯頓、悉尼·赫伯特和格萊安也很难說通。他們要求讓所有的皮爾分子都回到政府中來。這些大政治家意識到，他們組成的是一個在議院中只有大約 32 票的無足輕重的集團。只有把自己的“偉大的”賢人團結起來，他們的小集團才有希望保持獨立。如果皮爾分子的一部分領導人加入內閣，而另一部分留在內閣外面，這就等於值得尊敬的大政治家的俱樂部消失。這時帕麥斯頓採取了極端手段，企圖像強使女王服從自己一樣，強使議會服從自己，因為在這裡，他沒有自己的政黨。他的內閣還沒有組成，他就在“晨郵報”上威脅說，他將不求助於議會而求助於人民。他威脅說，如果議院胆敢“不給予他那種他在韋斯明斯特宮以外、在人民中所受到的尊敬”，他就要解散議會。他的“人民”——這只不過是完全屬於他或一半屬於他的報紙而已。在最近發出人民呼聲的地方，例如太恩河畔新堡的群眾大會（從那裡給議會送來了請願書要求使內閣受到法律制裁），正是人們最堅決地揭露帕麥斯頓是倒台的聯合內閣的幕後領導人的地方。

為了使“群賢內閣”的行狀更完全，還要指出幾點。1853 年 11 月 30 日發生了西諾普事件；12 月 3 日，關於這個事件在君士坦丁堡已經盡人皆知了；12 月 12 日，四國代表交給土耳其政府一份照會，要求對俄國作出比臭名遠揚的維也納照會更大的讓步；12 月

14日英国内阁打电报到维也纳，说西诺普事件不应该使维也纳的和平谈判中断。帕麦斯顿勋爵出席了那次通过这个决定的内阁会议。他同意这个决定，但是第二天就借口罗素起草的议会改革法案似乎同他的保守见解相抵触而退出了内阁。帕麦斯顿的真正目的是，他想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推掉自己在公众面前对西诺普事件所应负的责任。这个目的一达到，他马上就回到了内阁。

1854年2月初，议会恢复了工作。关于东方纠纷的外交文件似乎都提交给了议会。没有最重要的文件了。议会是 via [通过] 彼得堡从尼古拉皇帝那里得到这些文件的，而不是从英国内阁得到的。在彼得堡公布的“秘密的和机密的通信”⁴⁴ 十分清楚地向吃惊的议会表明，在过去的1853年的整个常会期间以及1854年的常会期间，内阁蓄意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欺骗它。这个公布出去的通信迫使内阁于3月27日宣战。2月6日，帕麦斯顿声称，他要提出关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征集民军的法案。但是，刚一宣战，他就把自己的法案搁置起来，并且一直到6月底还没有提出来。2月13日，罗素提出他的议会改革法案，他把法案的二读延迟到4月底，但是在3月，他就动人情感地、呜咽啜泣地把法案收回去了，他的同僚们为他所作的牺牲给他一个奖赏：授予他这位过去一直是无职无薪的所谓额外大臣以内阁中一个薪高事少的枢密院院长的职位。3月6日，伟大的财政家格莱斯顿提出了自己的预算。他只要求把所得税提高一倍，期限为六个月。他所要求的“仅仅是把目前准备离开英国的25 000名兵士弄回来所需要的那笔款项”。现在，他的同僚纽卡斯尔使他用不着操这份心了。5月8日格莱斯顿已经不得不提出第二个预算草案。4月12日他表示反对发行任何公债，而4月21日却建议议会同意发行600万英镑的公债来

抵償他用在轉換國債的不成功的試驗上的費用。4月7日，格雷勳爵作了关于英国軍事管理机关的缺点的发言。6月2日，內閣利用他关于改革的提案——正像利用关于印度管理制度的改革和与霍乱流行病有关的改革一样——設立新的职位。陸軍部和殖民部分开了。其他一切照旧。⁴⁵在这次常会期間，內閣在立法方面的成就可歸納为：它提出了七个重要法案。其中三个即修改貧民迁移法法案、苏格兰国民教育改革法案和修改議會誓詞法案被否決。另外三个即防止賄买选民法案、完全改变文职法案和議會改革法案被撤回。一个法案即牛津大学改革法案被通过，但是作了无数的修改，以致面目全非了。政府在外交上和軍事上的丰功偉績，我們还記憶犹新。“群賢內閣”就是如此。

卡·馬克思写于1855年2月6日

載于1855年2月9日

“新奧得报”第6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斗争

阿尔馬河会战和联军向巴拉克拉瓦的进军刚一结束，我們就曾说过，克里木战局的最終結局，将取决于哪一方能最先調来足以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造成优势的生力軍。⁴⁶从那时起，战况有了很大变化，許多幻想都破灭了。但在这整个时期內，俄国与同盟国之間展开了一种調动增援部队的竞赛，而且我們应当承认，俄国人在这一竞赛中領先了。尽管在技术和运输工具方面有了值得称赞的各种改进，但是野蛮的俄軍在陆上行走 300—500 英里，比高度文明的法軍和英軍在海上航行 2 000 英里要容易得多，特别是当英軍和法軍似乎故意輕視高度文明所給予他們的一切优越性时更是如此，而野蛮的俄軍可以让自己比联军多丧失一倍的兵士，却不担心自己在最后失去优势。

現在，联军中的不列顛軍隊，連到俄国人面前去送死的希望都沒有了，他們开始不断地起勁地做着有意自己消灭自己的事情，而且做得如此努力，如此有效，以致过去的一切成就都被掩盖了。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同盟国还能指望什么呢？然而事情确是这样。据我們所知，不列顛軍隊作为一支軍隊來說已不复存在了。原有的 54 000 名兵士只剩下数千人，而这数千人之所以还被认为“能够服役”，只是因为医院容納不下他們，否則他們也可能死在那里。

在法軍中執行勤務的可能還有 5 萬名左右的兵士，但是過去他們比這個數目要多一倍。不管怎樣，他們总算保存了至少比英軍多四倍的具有戰鬥力的兵士。可是，既然整個冬季要扼守格拉克列亞的赫爾松涅斯，要繼續從南面封鎖塞瓦斯托波爾，要防守塹壕，而春天還要用剩下的兵力轉入進攻，那末，這 5—6 萬人又能抵什麼用呢？

現在英國人已停止派遣增援部隊。問題在於腊格倫在失去挽救軍队的希望後，看來他自己也不想獲得新的補充兵員了，因為就連剩下的軍队，他都不知道拿什麼來供養，配置在哪裡以及怎樣使用。法國人可能正在準備新的師，以便在 3 月間由水路運往克里木，但他們也正在花許多力量準備應付大陸上的春季大戰，因此十有八九他們派去的增援部隊或者過弱，或者過遲。為了改善當前的處境，同盟國會採取了兩項措施，而這兩項措施正好證明同盟國已完全無力防止災難的發生，這場災難正緩慢地但卻肯定地向克里木的聯軍逼近。首先，為了改正因克里木遠征遲了 4 個月而鑄成的大錯，他們又犯了不可估量的更大的錯誤：正值嚴冬的時候，在他們自己的軍队到達克里木後過了 4 個月，又把土耳其的唯一可用的殘余部隊派到那裡。這支軍队的兵力和戰鬥力，由於土耳其政府的玩忽職守、無能和投靠外國，已經在蘇姆拉受到摧殘，因此一當他們在克里木登陸就會因飢寒而迅速瓦解，其瓦解之快甚至會使英國陸軍部在這方面的成就都顯得遜色。如果俄軍聰明一些，暫時不去打擾土軍，不去進攻他們，情況就會是這樣。如果天氣條件允許俄軍發動攻擊，土軍便會立即被消滅，雖然這將使俄軍付出較高的代價，而且除了振奮士氣之外不會給他們任何好處。

其次，同盟國僱傭（只能用這個詞）了 15 000—20 000 皮蒙特

人，用以补充缺额的英军，他们的给养由不列颠军需部供给。在1848和1849年，皮蒙特人曾表现出他们是勇敢善战的兵士。他们大都是山民，他们的步兵就其本身条件来说甚至比法国人更适于在起伏地上和散开队形内作战；而波河平原提供的骑兵，身材高大、体格匀称，就像英国精锐的骑兵团一样。同时他们在革命时期的严酷战争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两个皮蒙特师，无疑是当前战争中不坏的“外籍军团”。但是在一个根本不懂机动而且只要求兵士具有高度顽强性（这种顽强性是英国兵的荣誉，也是他们唯一的军事素质）的英国老顽固^①的指挥下，这些动作灵巧迅速、个子不高的年轻人又能干出些什么呢？他们会被配置在不适于他们所习惯的作战方法的阵地上，不能干他们所擅长的事，并被派去完成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所不会下达的任务。像在阿尔马河所作过的那样，把不列颠军队无意义地、轻率地、愚蠢地赶到屠场去的这种作法，也许就是完成任务的捷径了。而老公爵^②通常也是轻率地对待这类事情的。德意志军队也许可能被迫这样做，虽然他们的军官因有较好的军事素养而不会长久地容忍这种拙劣的指挥。但是，要对法国军队、意大利军队或西班牙军队采取同样的做法，那是不可能的。这些军队训练出来主要是为了担任轻步兵、进行机动和利用有利的地形，也就是说这些军队的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兵士的运动性和灵活性。那种笨拙的作战方法对于这些军队是绝对不适用的。然而，可怜的皮蒙特军队也许能避免按英国方式作战这一严重的考验。要知道皮蒙特军队的给养是由不列颠军需部供给的，而这个名声很坏的机关直到现在只能自己供

① 腊格伦。——编者注

② 威灵顿。——编者注

应自己。因而，皮蒙特军队将遭到与新补充的不列颠部队同样的命运。他们会像这些不列颠部队一样，每周死亡 100 人，而送进医院的人数将比不列颠的多两倍。但如果腊格伦勋爵以为皮蒙特军队会同不列颠部队一样驯服地容忍他的低能和他的军需官的无用，那末他很快就会认识到自己是大错特错了。在这种情况下肯俯首听命的，恐怕只有英国人和俄国人，而且应当承认，这并不能为他们的民族性格增添光彩。

这个凄凉阴沉得像遍地污泥的塞瓦斯托波尔台地一样的战局的以后进程可以描述如下：一旦俄军把兵力集中完毕而天气又许可作战，他们大概就会首先攻击奥美尔-帕沙的土耳其军队。英国人、法国人和土耳其人都预料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给土军指定的阵地是非常不利的。总之，这一点正是说明，把土军派到北面完全是有意識的，很难有比联军将领的这种被迫的供认更能证明联军已陷入绝境的了。土军将被击溃，这是不用怀疑的。但联军和皮蒙特军队的命运又将如何呢？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再吹嘘塞瓦斯托波尔的强攻了。伦敦“泰晤士报”就这个题目发表了爱·纳皮尔上校 2 月 3 日的一封信，信中断言，如果联军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的南区，那末他们突入城内的可能性极大，但他们将被北区的俄国堡垒和炮台的优势火力彻底消灭，同时也将被俄国的野战部队围困住。他说，应当首先打败这支部队，然后从北面和南面围攻城市。他举出威灵顿公爵曾两次由巴达霍斯撤围去迎击被围者的援军的例子⁴⁷。纳皮尔上校说的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在有名的巴拉克拉瓦侧敌行军时，本报也曾发表过几乎相同的意见。⁴⁸但是，这位上校在说联军能够突入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显然没有估计到俄国防御工事的特点，而正由于这种特点，要想一举攻下城市

是不可能的。那里最外面有外圍工事，往里有主牆，主牆內有改建成多面堡的城市建筑物；街道上設有街垒，整个街区的房屋都凿有射孔，岸防炮台的后牆上也凿有射孔，要想夺取每个炮台都需要进行单独的攻击，可能还需要进行单独的圍攻，甚至还需要进行地道爆破。除这一切以外，俄軍最近几次胜利的出击，还充分证明圍攻部队已經向城市推进到这样的距离，以致双方势均力敌，并使攻击的一方除炮兵占优势外別无任何优势。只要俄軍的出击还不能被制止，任何强攻的想法都是荒謬的。假如圍攻者无力把被圍者逼困在要塞的圍牆內，那就更不可能指望以白刃战攻下要塞了。

这样一来，圍攻部队今后仍将毫无作为地呆在自己的兵营內。他們将由于自己兵力的薄弱和俄国野战部队的威胁而被困于兵营內，同从前一样逐渐瓦解，而这时俄軍将調来生力軍；只要英国新政府不投入任何新的兵力（关于这些兵力到現在还一无所知），那末总有一天，英軍、法軍、皮蒙特軍和土軍都将被赶出克里木。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2 月 9 日
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2 月 26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32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帕麥斯頓。——軍隊

倫敦 2 月 9 日。由于帕麥斯頓和悉尼·赫伯特担任了新的內閣职务，所以必須履行把他們重新选入議會的手續。由于这个原因，两院在昨天都把會議延长一周。得比勋爵和兰斯唐侯爵在上院报告內閣危机的幕后經過时，只是重复了已經說过不止一次的东西。重要的仅仅是得比揭露帕麥斯頓勋爵处境的秘密的一番話。大家知道，帕麥斯頓在議會中沒有任何政党或者冒充为政党的集团。輝格党人、托利党人、皮尔分子都同样地对他不信任。曼彻斯特学派公开反对他。在梅費尔激进派（不同于曼彻斯特激进派）中，他的亲信总共不超过一打人。既然如此，那末究竟是誰和什么东西使他有可能把自己强加給女王和議會呢？是他的名声嗎？他的名声很少能够有助于这一点，正像格萊斯頓、赫伯特、格萊安和克拉倫登的坏名声只能妨碍他們重新执政一样。或許，一个从来不屬於任何政党、輪流为各个政党效劳、輪流离开各个政党并且經常在各个政党之間保持平衡的人，是企图組織联合內閣来阻止历史进程的那些瓦解了的政党的天生領袖吧？目前这种情况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因为它不足以使帕麥斯頓还在 1852 年就代替阿伯丁担任联合內閣的首脑。

得比提供了一把揭开谜底的钥匙。帕麥斯頓是波拿巴的公开

的朋友。他的过于仓卒地承认 1851 年 12 月的政变，当时被当做他退出辉格党内阁的原因。⁴⁹ 所以他是一个 «persona grata» ——得到波拿巴信任的人。而同波拿巴结成联盟在目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帕麦斯顿就借助于对外政策的因素来拼凑内阁，——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只要进一步了解 1830 年到 1852 年期间英国内阁的历史就很容易相信这一点。

由于克里木军队的状况现时已经不可能被利用来进行内阁的阴谋活动，约翰·罗素勋爵在昨天下院会议上放弃了自己对情况所作的阴暗估计，准许不列颠军队再增加两三万人，并且为此同有正统信仰的格莱斯顿互相庆贺。尽管“议会使”不列颠军队“复活”，但是毫无疑问，现在不列颠军队作为一支军队来说已不复存在了。有数千人还被认为“能够服役”，因为医院里没有他们的床位。10 万名法国军队还剩下 5 万来人。可是，既然整个冬季要扼守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要从南面封锁塞瓦斯托波尔，要防守塹壕，而春天还要用剩下的兵力转入进攻，那末，这 5 万或 6 万人又能抵什么用呢？可能法国人会准备好新的师，在 3 月间把他们由水路运去，但是他们正在花许多力量准备应付大陆上的春季大战。而且从一切迹象看来，他们派去的增援部队或者过弱，或者过迟。

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所采取的两个救急措施，证明它们无能为力，也证明它们让军队到克里木去听天由命。

它们希望纠正对克里木的远征迟了 4 个月的错误，但同时却犯了一个不可估量的更大的错误：正值严冬的时候，在它们自己的军队到达克里木后过了 4 个月，又把土耳其的唯一可用的残余部队派到那里去。这支军队的兵力和战斗力，由于土耳其政府的玩

忽职守、无能和投靠外国，已經在苏姆拉受到摧殘，因此一当他們在克里木登陆就会因饥寒而迅速瓦解，其瓦解之快甚至会使英国人在这方面的成就都显得逊色。

只要俄国人把自己的兵力完全集中起来，天气条件又允許他們采取野战行动，俄国人大概会首先攻击奧美尔-帕沙的土耳其軍隊。英国人和法国人預料到这一点，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指定給土耳其人的陣地是多么不利。因此，联軍清楚地表明，他們現在把土耳其人調往北方，是有意識地犯这个战略性錯誤的。只有当俄国人犯下难以置信的錯誤时，土耳其人才能免遭必不可免的复沒。

其次，英国人和法国人雇佣了15 000个皮蒙特人，用以补充缺額的英軍，他們的給养由不列顛軍需部供給。在1848—1849年，皮蒙特人曾表現出他們是优秀的和勇敢的兵士。他們大都是山民，他們的步兵在起伏地的軍事行动中，在成散开队形作战和在互射方面甚至都超过法国人。另一方面，波河平原提供的騎兵可以同英国的近卫騎兵媲美。最后，他們在革命时期的最后几次战局中經過了严酷的鍛炼。这些活潑、伶俐、敏捷、个子不高的小伙子干什么都行，就是不适合当要他們当的英国兵，不适合采取腊格倫的全部战术——通常的笨拙的正面攻击。此外，他們将由不列顛軍需部供应給养，而到目前为止英国的軍需部只能自己供应自己！因此，雇佣15 000个皮蒙特人可能又是一次新的失策。

目前已暫時停止派遣英国增援部队了。看来是腊格倫本人禁止派遣的，因为他連現有的殘余部队都对付不了。誰能相信，在不列顛的兵营內患病的、过度疲劳的和精力衰竭的現象愈是普遍，惊人的鞭笞制度采用的就愈是广泛呢？有些人早該送进医院了，却接連好几周地执行着勤务，穿着湿衣服睡在潮湿的土地上，以几乎

是非人的坚毅精神来忍受这一切，如果发现他们在塹壕里睡着了，他们就要受到“九尾皮鞭”和棍棒的款待。“给懒汉五十大板！”——这就是腊格伦勋爵常常下达的唯一的战略性命令。如果著名的向巴拉克拉瓦“侧敌行军”的创造者所指挥的兵士摹仿他同样向俄国人方面“侧敌行军”来逃避棍棒，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正像“泰晤士报”的记者所报道的，开小差跑到俄国兵营里去的现象日益严重。

关于强攻塞瓦斯托波尔的大话自然收起来了。据说首先应当粉碎在开阔地上的俄国军队。要知道威灵顿两次撤除对巴达霍斯的包围，为的是对付前来援助被围者的军队。此外，已经讲过，俄国人重新修筑起来的防御工事使得用强攻夺取城市成为不可能⁵⁰。最后，俄国人最近的出击证明，联军对俄军的优势只是在炮兵方面。因此，在不能制止俄军出击以前，关于强攻的任何想法都是荒谬的。如果围攻者不能把被围者封锁在要塞内，那就更不用指望在白刃战中拿下这个要塞。因此，被本身的弱点和俄国的野战军困在自己营地上的围攻者今后也只好在营地上偷安下去。他们的兵员依旧会减少，而同时俄国人却会调来生力军。如果联军仍找不到直到现在还完全不知道的、而过去又没有估计到的新的资源，那末在克里木演出的欧洲战争的序幕将以联军的复没而结束。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2月9日

载于1855年2月12日

“新奥得报”第7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馬克思

*議會新聞：格萊斯頓的發言

倫敦 2 月 10 日。格萊斯頓——闡述教義的財政大臣和財務上的鄧斯·司各脫——對一句舊俗語“信仰創造奇蹟”作了新的論證。他依靠信仰使死人復活，並且依靠信仰使克里木的英國軍隊從 11 000 人增加到 3 萬人。他要求議會也依靠這種信仰。但不幸得很，塞瓦斯托波爾城郊兵營的醫務主任霍爾醫生的報告恰巧寄來了。根據這份報告，不僅第六十三團全團復沒，就連去年 11 月離開英國的由 1 000 人組成的第四十六團也只剩下 30 名具有戰鬥力的人員了；霍爾醫生說，還在擔任勤務的人中有一半是應該送進醫院的，在兵營里頂多只剩下 5 000—6 000 名真正具有戰鬥力的兵士。凡是了解篤信宗教的保護者的勾當的人都不會懷疑，格萊斯頓像福斯泰夫一樣，能把 6 000 個“穿麻衣的人”^①變成 3 萬人。難道在星期四舉行的議院的最近一次會議上他不曾對我們說過，那些作過粗略計算的人都是從各種不同的觀點出發的；例如，慣於低估克里木軍隊數量的人計算騎兵就不是像他本人所計算的那樣——似乎在巴拉克拉瓦會戰後一般還存在着值得一提的騎兵！在進行統計時，對於格萊斯頓來說是絲毫不值得把“失蹤的人”算

① 見莎士比亞“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場。——編者注

入的。他在星期四的會議上就自己軍隊的“預算”所作的宣傳——其中把每個借方都當做了貸方，把每個赤字都當做了余額，並且最後說他“原諒反對政府的人所作的誇大”——是絕妙無比的。他在勸說議員不要“感情”用事時的腔調和姿態也是絕妙無比的。應當溫存地體諒別人的痛苦——這就是有正統信仰的格萊斯頓的座右銘。

卡·馬克思寫于 1855 年 2 月 10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2 月 13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 73 號

卡·馬克思 帕麥斯頓勳爵⁵¹

一

倫敦 2 月 12 日。帕麥斯頓勳爵毫無疑義是官方英國的一位最引人注目的非凡人物。雖然他已經是一個老头子，並且從 1807 年起幾乎一直在政治舞台上活動，但是他總能想出辦法使自己具有新奇的吸引力，喚起人們通常對大有前途的和經驗不足的青年人所抱的一切希望。而且雖然他一只腳已經跨進墳墓，但是人們仍然認為他的真正的官運還在前面。假如帕麥斯頓明天逝世，那末，知道他整整半輩子都擔任大臣的整個英國將為之震驚。他並不是一個全能的国家活動家，但無疑是一位全能的演員；他同樣能夠很好地表現出英勇的氣派和喜劇的作風；既能裝出神色激動的樣子，又能用親昵的口吻說話；既能演悲劇，又能演滑稽劇；不過演滑稽劇也許更適合他的性格。他不是第一流的演說家，但却是一位十足的辯論家。他具有驚人的記憶力、豐富的經驗、無與倫比的機智、上流社會的人物所貫有的機巧和靈活，他諳熟議會內的一切詭計、陰謀、政黨和活動家，因而能從容不迫地判斷最複雜的事務，每一次都能夠迎合任何一個聽眾的偏見。他的 nonchalance〔粗枝大葉〕使他避免了任何意外的事故，他的利己主義和圓滑機巧使他防

止自己公开暴露，而他的极度的轻率和贵族式的冷淡又使他不致急躁。他善于用恰如其分的俏皮话博得一切人的好感。他从不失去自制力，从而使他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也对他表示敬仰。如果他也找不到共同的见解，那他总是打算从大家所讲的话中织出优美的花纹。如果他也没有能力控制某个对象，那他还是能够玩弄它。他善于哆嗦着躲开同强敌作斗争，而使弱者成为自己的敌人。

他事实上屈从外国的势力，但在口头上却反对它。帕麦斯顿继承了坎宁的衣钵，仿制了英国负有在大陆上传播立宪主义的使命的理论（顺便说一下，坎宁在临终时会警告要预防他），因此，不用说，他任何时候都不会没有理由来向民族偏见谄媚，同时又去支持外国列强怀有妒意的怀疑态度。当他用这种恰当的方法使自己变成大陆各宫廷的 *bête noire* [可怕的东西，令人恐怖和憎恨的东西]^① 以后，他就毫不费力地在国内赢得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声誉。虽然帕麦斯顿最初是托利党人，但是他善于在执掌外交政策时玩弄 «shams» [“骗术”] 和制造矛盾，而这些正是辉格主义的实质。帕麦斯顿善于借用过去贵族的英国的傲慢语言，把民主的空话同寡头政治的观点结合起来，袒护鼓吹和平的资产阶级。他善于在自己同意的时候装成一个攻击者，而在自己叛卖的时候装成一个保卫者；他善于宽恕表面上的敌人和使假装的盟友凶横起来；在争论的决定性关头，他善于站在比较强的一边去反对弱者，大胆地发言，然后溜之大吉。

一些人指责他领取俄国的津贴，另一些人怀疑他是烧炭党人。1848年当他有被控告同俄国订有秘密协议而有受法律制裁的危

① 直译是：“凶猛的野兽”。——编者注

險時，他不得不在議會內為自己辯護。後來在 1850 年，他成了外國大使館的迫害對象（他對這一點感到很滿意），因為外國大使館製造了一個反對他的陰謀，這個陰謀在上院獲得了成功，而在下院遭到了破產⁵²。如果說帕麥斯頓出賣了別國人民，那末他是非常有禮貌地干這個勾當的。如果說壓迫者總是能夠指望得到他的真正的幫助，那末對於被壓迫者他總是慷慨地賜予他那雄辯家的虛夸的寬大。波蘭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其他各國人民運動的被鎮壓，恰巧都是在他執政期間，鎮壓這些人民運動的勝利者總是懷疑他同犧牲者有秘密來往，而他們對犧牲者的迫害却又是得到他的允許的。到目前為止，凡是有他這樣一個敵人的，總能指望獲得勝利；凡是有他這樣一個朋友的，則必定要遭到失敗。但是如果帕麥斯頓的外交藝術並沒有使他同外國的談判取得多少還良好的結果，那末這種藝術也就更加鮮明地表現在：他善於迫使英國人民把空話當作事實，把幻想當作現實，而看不見在高尚的借口後面所掩藏的卑劣的動機。

亨利·約翰·坦普爾，帕麥斯頓子爵在 1807 年波特蘭公爵政府成立時被任命為海軍副大臣。1809 年他開始擔任 secretary at war [軍務大臣]，在 1828 年 5 月以前他在派西沃、利物浦、坎寧、葛德里奇、威靈頓的內閣里一直擔任這個職務。無論如何，把這個“自由制度”的唐·吉訶德，這位“光榮的立憲制度”的品得看做托利黨內閣的著名的常任閣員是令人奇怪的，因為托利黨內閣曾頒布谷物法⁵³，允許外國雇佣兵駐在英國土地上，經常給人民“放血”（西德默思勳爵的說法），堵塞報刊喉舌，禁止集會，解除人民群众的武裝，一度廢除正常的訴訟程序，同時還剝奪個人自由——總之，使大不列顛和愛爾蘭處於戒嚴狀態！1829 年，帕麥斯頓投奔輝

格党，于1830年11月被该党任命为外交大臣。如果不把托利党执政的几段时间即1834年11月—1835年4月和1841—1846年计算在内，那末帕麦斯顿从1830年革命时起到1851年政变时止一直执掌英国的外交政策。下一次的通讯将对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作一概述。

二

倫敦2月14日。最近几星期內“笨拙”不止一次地把帕麦斯顿描述成傀儡戏中的彼特鲁什卡。大家知道，彼特鲁什卡是一个专门破坏社会安宁的人，是吵鬧打架的爱好者，是引起有害的誤会的禍首，是干丑事的能手。他只有在自己所引起的普遍不安的环境中才觉得自由自在，他利用这种普遍的不安把妻子、儿女以及警察扔向窗口，以便最后制造无謂的騷扰，使自己几乎摆脱得一干二淨，并且挑衅性地对发生的丑事幸災乐禍。因此，帕麦斯顿勋爵是作为一个不安分的、不知疲倦的人物出现在我們面前的（至少在艺术形象中是如此），他寻找各种困难、阴谋和复杂問題来作为他从事活动的必要材料，因此他在沒有发现冲突的地方制造冲突。从来沒有一个英国外交大臣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里发挥过这样的积极性。封鎖些耳德河、塔霍河、杜罗河，封鎖墨西哥和布宜諾斯艾利斯⁵⁴，远征那不勒斯，因帕西菲科事件而引起的远征和对波斯灣的远征⁵⁵，在西班牙为“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和在中国为輸入鴉片而进行的战争⁵⁶，制造北美边境事件，向阿富汗进军，轰击圣让得阿克⁵⁷，在西非因陪审权問題而干丑事，甚至在《Pacific》〔“太平洋”〕制造糾紛，——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和附带着不可胜数的带有威

胁性的照会，一摞一摞的记录和外交抗議书。所有这些纷扰通常总是以保证高貴的勋爵获得短暫的胜利的激烈的議会辯論而告終。这就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帕麦斯頓像一个演員那样来对待外交上的冲突，到一定的时候他使冲突尖銳化，但只要冲突一有可能引起过于严重的后果或者已經引起他所需要的那种戏剧性的激动时，他就立刻让步。世界历史本身就好像是一种专门为了使帕麦斯頓一族中的这位高貴的帕麦斯頓子爵得到滿足而臆想出来的消遣品。这就是帕麦斯頓的光怪陆离的外交所給予經驗不足的人們的第一个印象。然而，如果更仔細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从他的一切外交措施中得到惊人的好处的只是一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不是英国而是俄国。帕麦斯頓的朋友休謨在 1841 年曾經說道：

“即使俄国皇帝在英国内閣中有他的代理人，那末这个代理人也未必能比高貴的勋爵更好地保卫俄皇的利益。”

帕麦斯頓的一个最热烈的崇拜者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在 1837 年曾对他說过以下的話：

“高貴的勋爵还打算让俄国侮辱大不列顛和損害不列顛的貿易多久？高貴的勋爵在全世界面前損伤英国的尊严，把英国打扮成一个对弱者傲慢无礼和殘酷无情、对强者俯首恭順和奴顏婢膝的爱吹牛的寻衅者的角色。”

不管怎样，决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所有对俄国有利的条約，从阿德里安堡条約到巴尔塔利曼尼条約⁵⁸和关于丹麦王位继承权的条約⁵⁹都是在帕麦斯頓的庇护下簽訂的；誠然，在簽訂阿德里安堡条約时，帕麦斯頓并没有参加政府，而是在反对派內，但是这项条約正是在他的密謀策划下得到承认的。另一方面，他当时领导輝格党反对派，攻击阿伯丁倒向奧土一边的方針，他曾經說过，俄国是文明的捍卫者（参看 1829 年 6 月 1 日、1829 年 6 月 11 日、1830

年2月16日等的下院會議記錄)。罗伯特·皮尔爵士关于这一点曾經在下院說过：“他弄不清帕麦斯顿究竟是誰的代表。”1830年11月帕麦斯顿担任了外交大臣。他不但拒絕法国提出的鉴于“圣詹姆斯和圣彼得堡內閣之間的友好关系”而进行有利于波兰的共同干涉的建議，而且还禁止瑞典把自己武装起来，对已派兵去俄国边境的波斯进行威胁說，如果它不把军队撤回，将訴諸战争。帕麦斯顿甚至清償了俄国的部分軍事費用，沒有得到議会的授权仍繼續按照所謂俄荷貸款协定支付主要款項和利息，尽管关于这项貸款的协定已被比利时的革命所廢除。⁶⁰1832年，他准許放棄希腊国民議會作为1824年希英貸款的保证而給英国契約一方的以領土所作的抵押，并把它移作在俄国帮助下簽訂的另一項貸款的保证。在帕麦斯顿給英国駐希腊的駐办公使道金斯先生的急电中經常指出：“你應該在俄国代表的同意下进行活动。”1833年7月8日，俄国迫使土耳其政府簽訂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这项条約規定不让欧洲各国船只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保证俄国在土耳其实行八年的专橫統治(見条約的第二条)。⁶¹苏丹^①被迫簽訂了这项条約，因为俄国舰队已停泊在波斯普魯斯，而俄国军队駐扎在君士坦丁堡的門口，似乎是为了防御伊布拉希姆-帕沙。帕麦斯顿一再拒絕土耳其提出的从它的利益考虑而加以干預的坚决請求，这样来迫使土耳其同意帮助俄国。(这从帕麦斯顿在下院1833年7月11日、8月24日和其他日期的會議上以及1834年3月17日的會議上的声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到帕麦斯顿勋爵出任外交大臣的时候，英国在波斯的势力显然已占优势。英国代表經常得到他的指

① 馬茂德二世。——編者注

示：他們“在一切場合下都應該在俄国大使的同意下进行活动”。依靠帕麦斯頓的帮助，俄国才能使它的一个王位追求者^①登上了波斯的宝座。帕麦斯頓勋爵贊許俄波向赫拉特远征。这次远征失败之后，帕麦斯頓发出英印向波斯灣远征的命令，这是促使俄国在波斯的势力加强的一种虛張声势的做法。1836年，英国在高貴的勋爵的政府领导下第一次承认俄国在多瑙河口的侵占，承认由它实施檢疫和关税条例⁶²等等。同年帕麦斯頓利用英国商船“雌狐号”被駐在切尔克西亚的苏茹克-卡列灣的俄国軍舰沒收的机会（“雌狐号”由于英国政府的坚决要求而被派往該地），正式承认俄国对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的貪求。同时又发现，帕麦斯頓早在六年前就已秘密承认俄国对高加索的貪求。当时这位高貴的子爵仅靠16票的多数在下院避免了对他的譴責。当时对帕麦斯頓最激烈的指責者之一是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即現在的英国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雷德克利夫勋爵。1836年駐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英国代表^②同土耳其簽訂了有利于英国的貿易协定。帕麦斯頓拖延批准这项条約，而在1838年却偷偷摸摸地簽訂了一项对俄国十分有利而对英国十分不利的新条約，以致使某些在近东各国的英国商人决定今后在俄国商行的保护下来进行貿易。由于国王威廉四世的逝世，发生了一件与“公文集”⁶³有关的恶名四播的丑事。在华沙革命期間，在康斯坦丁大公的宮中保藏的俄国外交官員和大臣們的全部秘密通信和急电等都落到了波兰人手里。查尔托雷斯基公爵的侄子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运到了英国。在这里，根据国王的命令，这些文件由烏尔卡尔特編輯并在帕麦斯頓总的監督

① 穆罕默德-沙赫。——編者注

② 烏尔卡尔特。——編者注

下在“公文集”上发表。国王一死，帕麦斯顿就马上否认他曾参与在“公文集”上发表这些文件的工作，拒绝付给印刷厂主费用等等。当时乌尔卡尔特公布了他同帕麦斯顿的助手巴克豪斯先生的通信。“泰晤士报”(1839年1月26日)就这件事评论道：

“我们不知道帕麦斯顿勋爵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十分清楚，任何一个自命为绅士并担任大臣职务的人在这些通信公布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2月
12和14日

载于1855年2月16和19日
“新奥得报”第79和8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1854—1855年论文书信集”(1924年版)

卡·馬克思

赫伯特的重新当选。——新內閣的最初措施。——东印度的消息

倫敦 2 月 16 日。昨天在薩里斯柏雷市政大厅里演了一出把悉尼·赫伯特重选为威尔特郡南部地区的議員的滑稽剧。威尔特郡甚至在英国各郡中也以地产集中而著名，因此，那里的全部土地成了不到一打家族的财产。除了苏格兰北部的某些地区以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威尔特郡那样大量地把居民从土地上“清扫”出去，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威尔特郡那样彻底地实行现代农业制度。要不是为数不多的領主之間有时爆发家族紛爭，威尔特郡就不会有什么选举的斗争。

除了悉尼·赫伯特以外，沒有提出任何候选人。因此，主持选举大会的郡长在會議一开始就馬上对赫伯特說，他按照一切法規重新当选了。于是悉尼·赫伯特站了起来，向自己的佃农和僕从說了几句应景的話。这时，市民們漸漸聚集在大厅里了，他們沒有选举权，但是英国宪法賦予他們一种特权，即在 hustings〔选举大会〕上可以提出問題来麻煩候选人。悉尼·赫伯特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各种各样的問題像冰雹一样打在他神圣的头上：“給我們兵士吃生咖啡豆是怎么回事？”“我們的军队在哪里？”“昨天‘泰晤士报’上是怎样談論您的？”“为什么您要放过敖德薩？”“您的舅舅俄

国沃龙佐夫公爵有没有霸占敖德萨的宫殿？”等等。当然，对这些非议会公众和他们所提的问题，谁都没有去理睬。相反地，悉尼·赫伯特却利用了喧嚷声稍微静一些的时机，提议向如此“公正地”主持了“讨论”的郡长表示感谢。这个提议在议会公众的掌声中和非议会公众的嘘声和怨声中被通过了。接着又是一连串毁灭性的问题：“谁使我们的兵士挨饿？”——“送他自己去打仗吧！”等等。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此后，郡长宣布持续了半小时多一点的演出结束，于是闭幕了。

新改组的內閣的最初一些措施决没有受到称赞。新任陆军大臣潘繆尔勋爵是个残废人，因此他的职务的主要重担都落在陆军副大臣的肩上。任命已故的皮尔的小儿子弗雷德里克·皮尔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引起了很大的愤怒，因为弗雷德里克·皮尔是一个公认的庸碌无能的人。虽然他很年轻，但他却是陈规陋习的活的化身。别人都是逐渐变成官僚的，而他生来就是一个官僚。弗雷德里克·皮尔是靠皮尔派的势力得到职位的。因此应当使辉格党人也起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弗兰西斯·贝林爵士也被任命为朗卡斯特公国的大公。他曾经在墨尔本勋爵的辉格党政府中担任过财政大臣，当时得到了“赤字先生”这个非常合适的绰号。在军队中完全是按元老制度来任命官职的。这样，80岁的西顿勋爵被任命为爱尔兰军队的司令。年迈耳聩患痛风的洛克比勋爵被派到克里木去当近卫旅的指挥官。驻克里木的第二师原先由雷希·伊文思爵士指挥，现由丝毫不像参孙的辛普森将军指挥；相反地，朴次茅斯市长的悠閒职位对这位高龄的将军倒是十分合适的。1811年的准将萨美塞特将军到东印度去担任总司令。最后，被“泰晤士报”称之为老“无政府主义者”的、曾在君士坦丁堡把一切

運輸工具等等弄得杂乱无章的海軍上将博克塞，現在被派到巴拉克拉瓦去整頓那里的港灣“秩序”。

“泰晤士報”說道：“我們怕不得不要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寻找內閣力量的源泉了。向那些大手大脚和不加考慮地浪費國家最好的資源的人去控訴這種浪費行為是徒勞無益的。如果他們沒有被長期執掌政權（政權經常由他們階級的一個集團轉到另一個集團手中）沖昏頭腦，他們至少在目前不會讓那種固執的和淺薄的利己主義暴露出來。自衛的本能看來應當教會他們某些東西，而我們要鄭重地問一問英國人民：他們能容許他們的同胞去作冷酷無情或庸碌無能的犧牲品嗎？”“泰晤士報”威脅地宣稱：“不是內閣，甚至不是下院，而是不列顛憲法在受審判。”

最近來自東印度的消息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們證明了加爾各答和孟買的不景氣狀況。在紡織工業區，危機緩慢地但是不可避免地臨近了。曼徹斯特細紗工廠的廠主在前天舉行的會議上決定從2月26日起在自己的工廠里實行四日工作周制，並在此期間號召附近的工廠主也採取這個辦法。在布萊克本、普雷斯頓和波爾頓的工廠中，工人們已經預先得到通知：往後他們按“不完全的工作周”工作。破產的事例將特別多和嚴重，原因是去年有許多工廠主為了影響市場，不通過商行而把出口貿易掌握在自己手里。上星期三“曼徹斯特衛報”⁶⁴承認，不僅工廠制品，而且工廠本身都發生了過剩現象。

卡·馬克思寫於1855年2月16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55年2月20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85號

卡·馬克思 議 會

倫敦 2 月 17 日。昨天議會又開會了。下院充滿了頹喪情緒。它似乎沮喪地意識到最近三個星期政治上的勾結使它的威信完全掃地了。執政的依舊是以前的內閣，只是稍加刷新而已。兩個不能和睦共處的老勳爵在內閣中消失了，但是同他們一起得不到信任的第三個老勳爵，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升到最高的一級。帕麥斯頓勳爵受到了莊重的冷遇。沒有任何 «cheers» [“歡呼聲”]，沒有任何熱情。人們破例地用極其冷淡和懷着敵意的懷疑態度對待他的演說。同時，他的記憶力也反常地不聽使喚了，茫然若失地翻着放在他面前的筆記本，最後還是查理·伍德爵士悄悄地提醒他應該繼續說什麼。看來，聽眾並不相信，換一塊招牌就能使老商行免遭破產。帕麥斯頓的全部神態令人回想起紅衣主教阿爾貝羅尼談奧倫治的威廉的一番話：

“當這個人握住天平的時候，他是強有力的；但從他把自己投到天平的一端的時候起，他就軟弱無力了。”

然而，最重要的事實是，無可爭辯地出現了反對改組過的舊聯合的新聯合——以迪斯累里為首的托利黨人同激進派中最堅定的人物累亞德、鄧科布、霍斯曼以及其他等人的新聯合。正是在激進派中，在梅費爾激進派中，帕麥斯頓一直有着自己最忠實的擁護

者。一家內閣的報紙低声地說：累亚德要得到陸軍部的一個职位的希望落空了。另一家報紙則暗示說：隨便給他一個职位吧！

帕麥斯頓勳爵在介紹自己的新內閣以前，簡略地敘述了內閣危机的經過情形。然後他就開始吹噓自己的貨色：他組織的內閣

“具有足夠的行政管理能力，足夠的政治洞察力，高度的自由主義原則，充分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履行自己職責的決心”。

克拉倫登勳爵、潘繆爾勳爵、格萊斯頓先生、詹姆士·格萊安爵士——每一個人都受到了恭維。但是，他說這個出色的內閣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出席這次會議的羅巴克先生堅持下星期四要任命調查委員會。議院干嗎需要委員會呢？請回憶一下理查二世時代瓦特·泰勒暴動時期的一件可笑的事。年輕的帝王遇到了一群暴動者，他們的首領剛剛在他們的眼前死去。帝王就勇敢地走到他們面前大聲地說：“你們失去了自己的領袖；朋友們，我來當你們的領袖吧。”“而我（年輕的（！）獨裁者帕麥斯頓）這樣說：如果你們，下院，同意不要這個委員會，那末政府本身就充當你們的委員會吧。”

這樣不恭敬地把議院比作一群“暴動者”和毫不客氣地要求把內閣變成自己本身的審判官，受到了譏笑。你們究竟想要什麼，——帕麥斯頓提高了嗓門，用愛爾蘭的挑釁方式仰起了頭大聲地說——調查委員會追求的是什麼目的？管理方面的改善。那很好！請聽一下我們在這方面採取了哪些措施。過去你們有兩個陸軍大臣：secretary at war〔軍務大臣〕和陸軍大臣。今後你們只會有了一個，即陸軍大臣。至於軍械部，則總的軍事領導歸最高統帥（Horseguards），非軍事領導歸陸軍大臣。運輸部門將要擴大。按照1847年的法律，過去服兵役的期限是10年；今後可以在任何

期限——从1年到10年雇人入伍。不得雇佣小于24岁、大于32岁的人入伍。現在談战区情况！为了在作战方面和战区的管理方面做到步調一致、坚强有力和有条不紊，帕麦斯顿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办法：在每一个职位上增設一个具有不定权力的监督員。腊格倫勋爵仍任总司令，但是辛普森將軍将担任总参謀长，腊格倫应当“认为自己有义务执行他的建議”。約翰·伯戈因爵士将被召回，而哈利·琼斯爵士則被任命为軍需部的总全权代表，具有无一定限制的独断权力。但是同时将派一个文职人員——約翰·麦克尼耳爵士(著名的小册子“俄国在东方的进展”⁶⁵的作者)到克里木去調查軍需部的侵占行为、无能和失职的問題。在士麦那和斯庫塔里将建立新的医院，在克里木和英国本土将实行医务部門的改革；在克里木和英国之間运送伤病員的运输船只每10天往返一次。但是，除此以外，陸軍大臣还要求保健委员会主席派3名文职人員到克里木去，以便在春季到来的时候在那里采取預防鼠疫的必要的卫生措施，并对全体医务人員的活动和医务工作的安排进行檢查。由此可見，在职权問題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而腊格倫勋爵由于現在他的“最高指揮受到了合法的制度的限制”而得到一种补偿，即有权进行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支由300名土耳其的街道清洁工人和掘坟工人組成的队伍的談判。这些工人应当在解冻天气来临时把死亡的兵士、倒毙的馬匹以及所有的垃圾抛到海里去。在战区将建立專門的陆上运输。可見一方面将准备今后的軍事行动，同时約翰·罗素勋爵又将准备在維也納簽訂和約(如果这是可能的話)。

迪斯累里。——听了高貴的勋爵对自己的同僚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政治洞察力”的贊語，很难相信他說的就是議院在19天以

前所譴責的那些“无与伦比的犯錯誤的能手”！姑且认为約許的改进办法会付诸实现并将产生預期的效果。但是这些改进办法难道不是对唯一反对实现它們并把下院关于調查过去管理不当的原因的决定解釋为对自己投不信任票的内閣的最恶毒的諷刺嗎？就連約翰·罗素勋爵也說，軍隊无声无息地消失对他來說是不可理解的，調查造成这种情况的难以猜測的原因是必要的。議院本身是否一定要把自己置于愚蠢的境地，重新撤銷它剛在 10 天以前通过的决定呢？如果那样，它就会长时期完全丧失它对社会的影響。高貴的勋爵和他的焕然一新的同僚举出了什么样的論据說服下院去任人愚弄呢？这就是一些諾言，而这些諾言，如果没有建立調查委员会的威胁，是决不会提出的。迪斯累里坚持議会进行調查。帕麦斯顿担任了崇高的职务之后，就开始威胁議会的独立活动。还从来沒有一届内閣像阿伯丁勋爵的内閣——“上一届”内閣，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那样得到反对派这样的支持和这样的願意为它效劳！迪斯累里說，这两个特洛米奧完全把他搞糊塗了；因此，最好是說：“上一届内閣和它目前忠实的继承者——它在內閣席位上的學生兄弟。”

罗巴克声称，下星期四，他将提出由議院批准成立的委员会的候选人。政府仍旧是老政府，只不过把牌重洗了一下，但是这些牌又落入了过去那些人的手中。只有下院直接干預才能打破陈規陋习的束縛，消除使政府甚至在願意改革的情况下也不能进行必需的改革的那些障碍。

托·邓科布。——高貴的勋爵向我們声明說，他和政府同意自己来充当我們的委员会！我們万分感激！議院想要調查的正是高貴的勋爵和他的同僚們的活动！勋爵答应改革，但是誰来实行

呢？就是那些管理不当而使改革成为必要的人。在管理方面絲毫沒有改变。在罗巴克提案提出 *status quo ante* [以前的状况] 仍旧保持着。約翰·罗素勋爵胆怯地从自己的崗位溜走了。帕麦斯顿勋爵本人是从利物浦勋爵的内閣开始到目前的内閣为止的 13 届已經死亡的内閣的一朵“枯萎的花”。所以他应当无可爭辯地具有“丰富的經驗和巨大的行政管理才能”。他的潘繆尔勋爵甚至不能与紐卡斯尔公爵相比。任命委员会究竟还不是譴責，而只是說要进行調查。譴責大概接着就会来的。至于維也納的談判，那末政府在这个問題上也是和人民对立的。人民希望对 1815 年的維也納条約作有利于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修改。而且人民把反对俄国的战争理解为真正摧毁俄国的优势。

可見，帕麦斯顿内閣的開場和阿伯丁内閣的收場一样，就是反对罗巴克提案。下星期四以前将会施展一切手段来拼凑反对調查委员会的内閣多数。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17 日

載于 1855 年 2 月 22 日

“新奧得报”第 8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 托利党人同激进派的联合

倫敦 2 月 19 日。我們在上篇报道^①中談到的托利党人同激进派的联合，現在已被倫敦所有的日报視為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实]了。內閣的“紀事晨报”⁶⁶就这一点指出：

“从来还没有一次革命，不是由于那些注定要成为革命的牺牲品而自己又没有意識到这一点的人的激动、受伤害的虛荣心、虛伪的功名心或者十足的愚蠢而加速到来的。得比派和自由派的联合是杂凑起来的，他們同罗巴克先生一道步法国众議院議員的后尘，这些議員发动 1848 年有利于改革的宴会运动，只想除掉內閣，而結果却推翻了王位。”

人們断言，罗巴克打算扮演罗伯斯比尔或者（十分值得注意的“或者”！）賴德律-洛兰的角色。他企图組織“社会拯救委员会”。他不怕推举以下的人作为他提出的調查委员会的候选人：罗巴克、德拉蒙德、累亚德、約瑟夫·帕克斯頓爵士（世界工业展覽会的大厦建筑师）、斯坦利勋爵（得比的儿子）、爱里斯、怀特塞德、迪斯累里、巴特、娄（“泰晤士报”秘密委员会委員）和迈尔斯。

“紀事晨报”繼續写道：“我們面临着向我国貴族进行革命的十字軍討伐的公开威胁，对这一点避而不談是无益的。蠱惑家們力图推翻帕麦斯頓勋

^① 見本卷第 79—80 頁。——編者注

爵的内閣，巧妙地利用迪斯累里和罗巴克的联合起来但又沒有統一起来的战斗力量来反对它。民主派企图引起革命，有步驟地把內閣一个接着一个地推翻。”

最后，一家政府的机关报以解散議會，“向人民呼吁”相威胁，正像波拿巴在政变前几个月所做的那样。

財政部秘书长威尔逊出版的“經濟学家”杂志⁶⁷宣称，“代議制”和进行战争是不相容的。因此，过去的制帽工人威尔逊建議，担任国家职务的議員不必經過重选，可以 *ex officio* [根据职位] 把下院的席位和投票权給予大臣——內閣閣員。这样，內閣就不依赖于选民和下院，而下院却要依赖于內閣。就此，“每日新聞”警告說：

“英国人民应当警惕起来，并准备保卫自己的代議机关。应当料到，有人企图減輕政府对下院的依賴程度。这也許会造成政府和議院之間的冲突。結果可能发生革命。”

事实上，下星期三，在被认为是倫敦最激进的一个区的梅里勒榜区，将举行群众大会，会上必将作出反对“政府企图抗拒議會調查”的決議。

在“紀事晨报”这样預告革命的同时，“每日新聞”却預告反革命的企图，“泰晤士报”也暗示二月革命，虽然它指的不是有利于改革的宴会运动，而是普拉兰謀杀案。刚好在前几天，爱尔兰大法官法庭审理了一起遺產案，在这个案件中，英国貴族克兰里卡德侯爵——墨尔本內閣时期的駐彼得堡大使和罗素执政时期的邮政主管部門的首长扮演了完全和巴尔扎克描写謀杀、通奸、欺騙和非法占有遺產的小說中所塑造的人物一模一样的主角。

“泰晤士报”指出：“在1847年阴郁的秋天，当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惶惶不

安的預感激动着法国輿論界的时候，在巴黎社会的上层集团里发生了一件大丑事，这件事引起了本来就已受刺激的广大社会阶层的愤怒，并且大大加速了灾难的来临。凡是細心观察到目前輿論界极端激动的状况的人，就不能不同样激动地去注視在爱尔兰大法官法庭大厅里揭露出来的轰动一时的丑事。”

执政集团内部的犯罪行为，它的狂妄无能和軟弱，英国精銳部队的复沒，旧政党的瓦解，下院中沒有紧密团結的多数，在早已过时的傳統基础上建立的联合內閣，在极端严重的工商业危机存在的情况下进行欧洲战争的开支——所有这一切都是充分說明大不列顛面临着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征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实：在政治幻想破灭的同时，自由貿易的幻想也在破灭。前者保证了貴族对行政权的壟断，而后者則保障了资产階級对立法权的壟断。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19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2 月 24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92 号

弗·恩格斯 欧洲面临的战争⁶⁸

假如最近期間在維也納不簽訂和約（目前在歐洲似乎沒有人相信會簽訂和約），再過幾個星期，我們就將親眼看到戰爭在歐洲大陸爆發；同這一戰爭相比，克里木戰局只將起到它在世界三個最強大的國家之間的戰爭中所應起的無關輕重的作用。那時，直到目前還互不聯系的在黑海和波羅的海上的軍事行動，將被一條橫貫這兩大內海之間的整個大陸的戰綫聯結起來，在人數上與薩爾馬特平原^①的遼闊無垠相適應的雙方軍隊，將為爭奪這一片平原而戰。那時，也只有到那時，才可以說，戰爭成為真正的歐洲戰爭了。

至於克里木戰局，我們只需要作一些簡要的補充說明。我們曾多次詳盡地描述過它的性質，談論過它可能的結局，因此現在只列舉幾個新的事實來證明我們的論點。一星期以前我們曾說過^②，這一戰局已變成增調援軍的競賽，並且俄國人可能在這場競賽中獲勝。現在已無須懷疑，到天氣允許按原定計劃開始長期的軍事行動時，俄軍在克里木半島上的兵力將為 12—15 萬人，而聯

① 薩爾馬特平原是古羅馬時期對維斯拉河與伏爾加河之間的地區的稱呼。——譯者注

② 見本卷第 57 頁。——編者注

軍在尽了非凡的努力之后，可用来对抗俄軍的可能只有 9 万人。即令法国和英国有足够的軍隊可以派往克里木，但已开往黑海的輪船却有四分之三在各种借口下被留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它們又能到哪里去找运输工具呢？英国横越大西洋的航綫已完全瘫痪，現在迫切需要海洋輪船，但是无处可寻。唯一能够拯救联軍的办法，是用軍舰将奥地利大約 3 万人的一个軍从多瑙河口及时运到克里木。沒有这支增援部队，不論是皮蒙特軍和那不勒斯軍，或是英法为数不多的补充兵員以及奥美尔-帕沙的軍隊，都不能給联軍以任何有力的援助。

現在来看一看英法已把哪一部分軍隊用于克里木。下面我們只談步兵，因为配屬給这种远征軍的騎兵和炮兵所占的比例变动极大，以致无法对他們的数量作出任何肯定的結論。此外，一个国家的基干軍隊已有多少参战，总是根据步兵参战的数量来确定的。我們不准备談土耳其，因为参战的奥美尔-帕沙的軍隊是土耳其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支軍隊。至于它在亚洲部分的殘部，已不能算作軍隊，只不过是一群烏合之众罢了。

英国軍隊共有 99 个团，即 106 个步兵营，其中駐殖民地的至少有 35 个营。此外，約有 40 个营已編入派往克里木的头 5 个师，后来至少又有 8 个营前往增援。还余下約 23 个营，其中恐怕連一个营也抽調不出来了。因此，英国最近所采取的軍事措施，实际上就等于公开承认它平时建立的基干軍隊已經用尽。为了弥补漏洞，他們还玩弄了各种花招——允許約有 5 万人的民軍志願到本土以外去服役；打算把他們派往直布罗陀、馬尔他島和科尔富島，以便把駐在这些殖民地的約 12 个营抽出来派往克里木。已决定建立外籍軍团，但很可惜，外国人似乎不願意到这个实行体罰的軍隊中

来当兵。最后，2月13日又下令在93个团内建立第二营，其中43个营各为1000人，50个营各为1200人。这样就将增加103000人，此外，还将补充騎兵和炮兵17000人。但是这12万人中連一个人还没有召募到；而且誰来訓練和指揮他們呢？不列顛軍隊奇特的組織和对它的共同領導，使除了后备連和若干后备营以外的几乎所有的步兵——不仅兵士，而且軍官——都被調到克里木和殖民地去了。列入軍隊名册中領取半薪的将官和校官的确为数甚多，他們可以在这些新編的部队中任职。但据我們所知，領取半薪的上尉却完全没有或几乎没有，而受过必要訓練的中尉、少尉和士官則根本找不到。生手很多，但是未經訓練的軍官是不能够訓練未經訓練的新兵的；大家知道，任何軍隊的骨干都是經驗丰富的、久經鍛炼的老士官。同时像威廉·納皮尔爵士这样的权威人士也认为，要想使古老英国的任何一群烏合之众变成約翰牛所說的“世界上最优秀的兵士”和“英国的精华”，至少需要三年的時間。在有現成的軍官干部的情况下尚且如此，那末在缺少下級軍官或士官的情况下，想把还待征召的12万兵士个个都培养成英雄，又需要多少時間呢？我們可以认为，英国的全部軍隊在这场战争中已陷入了这种困境，以致在今后一年内英国政府能够用以对抗敌人的兵力，最多也不过是一支4—5万人的“英勇的小部队”。即令这个数目可以增加，也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而且还会严重破坏未来的增援部队的全部訓練工作。

法国軍隊的数量比較多，組織比較完善，已参加作战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法国有100个基于步兵团、3个朱阿夫团、2个外籍軍团，每团有3个营；此外，还有20个猎兵营，6个非洲营，共計341个营。在这341个营中，有100个营即每个基于团各有1个

营为后备营，由它来接收和训练新兵；只是每团的头两个营用于作战，后备营则用于补充兵员，使头两个营经常保持足额。这样，就应当从营的总数中一下子减去 100 个。如果今后这些后备营被用来作为核心编成第三野战营（拿破仑时代常常这样做），那末就需要编入更多的新兵，而且还需要经过一些时间的训练才能用来作战。因此，目前法军可以使用的兵力不超过 241 个营。其中至少有 25 个营必须驻防阿尔及尔。4 个营现驻罗马。9 个步兵师，即大约 80 个营，已派往克里木、君士坦丁堡和雅典。除后备营外，按整数算来共使用了 110 个营，即几乎占法国平时步兵总数的一半。法国军队中所采取的措施，后备营的预先建立，在服役期最后一年归休的兵士的征集，不用紧急征兵即能圆满完成每年征兵任务的能力，以及法国人对服兵役的爱好，——所有这一切都使法国政府有可能在一年内把步兵的数量增加一倍。如果我们注意到法国自 1853 年年中开始就不断地暗中扩充军备，建立了 10—12 个皇家近卫营，并且注意到去年秋季在某些兵营内所集结的兵力，那末就可以推断，目前法国国内的步兵总数同没有调出 9 个师以前的数量相等；如果再考虑到法军有可能以各团的后备营为基础编成第三野战营，而且不使后备营的训练职能受到显著的破坏，那末步兵数量甚至可能还要多一些。然而，如果我们说，3 月底以前在法国本土上的步兵将为 35 万人，那就不是估计过低而是估计过高了。按照法国的现行编制推算，35 万名步兵再加上骑兵、炮兵等，就相当于 50 万人的一支军队了。其中至少有 20 万人要留在国内作为后备营的基干，用来维持国内秩序以及为军事工厂和医院服务。因而到 4 月 1 日止，法国能参加战争的军队将有 30 万人，约 200 个步兵营。但这 200 个营不论在组织和纪律方面，或是

在战斗頑强性方面，都不能同以前派往克里木的部队相比。这些营将有很多年輕的新兵，許多营将是专门为了这次战争編成的。这些部队因为官兵互不了解，并且直到出发前才按上級指示仓卒編成，因此在許多方面都比老部队要差，而老部队的成員則因长期共同服役、共历艰險、多年朝夕相处，已养成了 *esprit de corps* [团结友爱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强烈影响下，即使最年輕的新兵也能很快地习惯本部队的生活。所以必須承认，已派往克里木的 80 个营在法国军队中所占的地位，比单从数字上所显示的要重大得多。如果說英国把它的全部精銳部队几乎不留一兵一卒地投入了战争，那末法国已把将近一半的精銳部队派到了东方。

这里沒有必要重复关于俄軍兵力的材料，因为不久以前我們曾报道过俄軍的人数和部署^①。只要指出下面一些情况就足够了：在俄国作战军队即用于本国西部边境的军队中，目前参加作战的只有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軍，而近卫軍、擲彈兵和第一軍还未动用，第二軍似乎派了約 1 个师的兵力到克里木去。除这些部队外，还有已經組成或正在建立的 8 个預备軍，他們在人数上或营的数量上相当于作战军队的 8 个軍。这样，俄国用以对抗西方的兵力約有 750 个营，但是其中可能有 250 个营尚在建立，并且永远也不会足額，另有 200 个营曾在两次战局中遭受严重的損失。至于預备部队，則每个团的第五、第六营多半由老兵編成（如果最初的建立部队的計劃已經实现）；而第七、第八营則肯定由新兵編成，因而战斗力最差，因为俄国人虽然聪明，但是要他們习惯于担任軍事勤务却需要很长时间。此外，所有的預备部队都缺少軍官干部。因

① 見本卷第 14—17 頁。——編者注

此，目前俄国方面参战的部队約为其正规的作战军队的一半。尙未参战的另一半军队——近卫军，擲弹兵，第一军和第二军——是俄国军队的精华，是沙皇寵爱的部队，他对这一些部队的战斗力特别关心。而俄国把一半作战军队投入战争后，究竟取得了什么结果呢^①？俄国几乎全部摧毁了土耳其的进攻和防御能力；迫使英国葬送了 5 万军队，使它至少在一年內衰弱无力；此外，还迫使法国把相当于俄国自己派出的那样多的部队投入了战争。而当法国精锐的非洲团已同敌人交战的时候，俄军的 élite〔精锐部队〕却还一枪未放。

因此，虽然在欧洲作战的俄国部队并无任何胜利可以夸耀，而且相反地，在所有重大的会战中总是放棄陣地，放棄自己的一切计划，但是优势暂时还是在俄国方面。然而，只要奥地利一参战，情况就将起根本的变化。奥地利有 50 万军队已作好战斗准备；此外，后备部队有 10 万人，編入预备役的有 12 万人；如果进行一次規模很小的紧急征兵，军队总数就可能达到 85 万人。但是我們把它算作 60 万人，其中只包括后备部队，而不包括尙未征召的预备兵員。这 60 万人中，有 10 万人是后备部队，另有約 7 万人駐在意大利和受不到俄国威胁的国内其他地区。其余 43 万人編成数个军团，配置在波希米亚—加里西亚—多瑙河下游一綫，这样就能在很短時間內向任何地点集中 15 万人的兵力。一旦奥地利对俄国开战，这一支龐大的军队将立即造成对俄国的优势；因为自从俄国原来的整个多瑙河军团全部調往克里木后，奥军已在各个方面超过俄军，并能很快地把预备部队調往边境，虽然目前俄军已先开到。

^① 馬克思为“新奥得报”翻譯此文时，將此句改为：“只有以外交对西方作战发生影响这一点，才能解釋俄国已获得的成就。”——編者注

但是还需要指出一点，在预备兵员的数量方面，奥地利远比不上俄国，这 12 万预备兵员征集后，要想进一步扩军，就必须征召新兵，因此扩军将是很慢的。所以，奥地利宣战的时间越迟，对俄国就越有利。据说，法国的辅助部队将进入奥地利，因而情况将得到改善。但是由第戎或里昂到克拉科夫的路程十分遥远，需要有很好的组织，否则，如果刚刚改编的奥地利军队因战斗素质差而不是兵力即使稍占优势的俄军的对手，那末法军的到达就可能太迟了。

这样一来，奥地利就成了命运的主宰者。它自从在自己的东部边境占领阵地以来，就保持了对俄军的优势。如果由于俄国预备部队的及时开到而使它暂时失去这个优势，那末它也可以依靠它那些经验丰富的将军（近年来除若干匈牙利人外，唯有他们显露了军事才干）和那些组织良好、大部分受过战斗洗礼的部队。只要进行几次巧妙的机动，来一次小小的退却，就能迫使敌人分散兵力，造成胜利的良机。用军事语言来说，只要奥军一开始行动，俄国就将被迫完全转入防御。

还必须谈谈另一个情况。假如法国把国内的军队扩充到 50 万人，奥地利把全部军队扩充到 80 万人，那末这两个国家在一年内至少还可各征召 25 万人。在俄国方面，如果沙皇有一天完成了各步兵团的第七、第八营的兵员补充，从而把作战军队增加到譬如说 90 万人，那末他就为防御做了几乎所能做到的一切。据说，最近一次征兵工作到处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因而不得不降低原定的身高标准，并采取了保障征足所需人数的其他措施。沙皇发布征召南俄罗斯的全部男性居民入伍的命令，并没有使军队数量显著增加，却等于公开承认今后再也不能正常地征召新兵了。当 1812 年法军入侵而俄国真正遭到侵略时，曾经采用过上述办法，不过那

也只是在 17 个省內。当时，莫斯科提供了 8 万非常后备軍，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斯摩棱斯克派出了 25 000 人，等等。可是在战争时却哪里也看不到他們，这几十万非常后备軍未能防止俄軍在到达維斯拉河时发生与法軍同样狼狽、同样混乱的現象。这次 en masse〔普遍的〕征兵，还說明尼古拉决心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如果說从軍事观点来看，奥地利的参战将迫使俄国轉入防御，那末从政治观点来看，情况就决不能說一定如此。我們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沙皇握有厉害的政治进攻手段——唆使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暴动并宣布匈牙利独立。

我們的讀者知道，奥地利的国家活动家是多么害怕这一点。无疑地，沙皇在必要时将采取这一手段；其結果如何，很难預料。

我們絲毫沒有談到普魯士。它最后也許会同西方联合起来反对俄国，虽然这只有在发生了誰也无法預見的風暴之后才有可能。不管怎样，只要还没有发生某种民族运动，普魯士軍队就未必会起很大作用，因此我們暂时几乎可以不把它考虑在內。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2 月 20 日
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3 月 8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332 号，
并載于 1855 年 2 月 23 和 24 日
“新奧得报”第 91 和 9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并根据“新奧得报”校对过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議會和軍事問題

倫敦 2 月 20 日。虽然下院又在昨天下午 4 点到深夜 2 点开会，并且决定撥款大約 750 万英鎊作为陆軍的經費，但是这次辯論并不值得詳細論述。我們只指出，帕麦斯頓在答辯时装模作样、說些鄙俗話，而且在說这些鄙俗話时态度蛮横无礼，带有挑衅性，因而使他的自由派反对者們大发雷霆。他用一种只有在阿斯特利馬戏院里才合适的朗誦声調讲述巴拉克拉瓦会战，同时大罵累亚德“庸俗地高談貴族”。他說在軍需部、运输部門、医务主管部門里的并不是貴族。可是他忘記了在那里的是貴族的奴才。累亚德准确地看出帕麦斯頓所发明的委员会只会使得在远征軍的权限問題上引起冲突。但帕麦斯頓却大声叫喊道：怎么——他又装出理查二世的姿态，而議會則扮演平民瓦特·泰勒的角色——你們希望建立一个只适合于編輯 Blue Books⁶⁹ 的議會委员会，而反对我的“应当工作！”的委员会嗎？帕麦斯頓对議會的态度非常傲慢，甚至认为这一次沒有必要使出自己說俏皮話的本領。他借用了議員桌上的政府晨报里的一些俏皮話。他既談到“紀事晨报”上提出的“社会拯救委员会”，也談到“晨邮报”的一句平淡无奇的俏皮話——把要求調查的議員送到克里木去，并讓他們留在那里。但这类东西只能夠奉獻給目前这样的議會。

这样，帕麦斯顿在议会里甚至胜过了老阿伯丁，然后他就在报刊上——不是在直接受他支配的机关报上，而是在联合起来的啤酒酒店老板的一張盲目輕信的报纸^①上——散布謠言，說什么他的行动是不自由的，宫廷束縛着他等等。

既然和平會議不久就要在維也納开会，那末來談一談战争，大致估計一下已經在某种程度上参战的国家所拥有的軍事力量就是适时的了。这里問題不仅在于軍队的总数，而且在于可以用来进攻的部队的数量。現在我們只詳細地談談步兵，因为其他兵种的員額同步兵有相应的比例。

英国軍隊共有 99 个团，即 106 个步兵营，其中駐殖民地的至少有 35 个营。此外，有 40 个营已編入派往克里木的头 5 个师，后来至少又有 8 个营前往增援。因此，还余下約 23 个营，其中恐怕連一个营也不可能調到国外去服役。5 万名以上的民軍則有到国外去服役的权利。打算把他們派往直布罗陀、馬尔他島和科尔富島，以便抽出約 12 个营供克里木調用。外籍軍团，正如帕麦斯顿昨天在下院所說的，沒有能够建立起来。最后，2 月 13 日又下令在 93 个团內建立第二营，其中 43 个营各为 1 000 人，50 个营各为 1 200 人。这样就将增加 103 000 人，此外，还将补充騎兵和炮兵 17 000 人。但是这 12 万人中連一个人都还没有招募到；而且还需要訓練他們，給他們配备軍官干部。

目前不列顛軍隊的这种奇特的組織，使除了后备連和若干后备营以外的几乎所有的步兵（不仅兵士，而且——这似乎是难于置信的——軍官）都被調到克里木和殖民地去了。列入不列顛軍隊

^① “晨报”。——編者注

名册中領取半薪的將官和校官多得很，他們可以在這些新編的部隊中任職。但是領取半薪的上尉却幾乎完全沒有，中尉和士官則根本找不到。大家知道，士官是任何軍隊的骨干。按照這方面的最高權威、研究比利牛斯半島戰爭⁷⁰ 的歷史學家威廉·納皮爾將軍的意見，要想使古老英國的 «tag-rag» 和 «bob-tail» (流氓無產階級) 變成“英國的精華”，變成“世界上最優秀的兵士”，需要整整三年時間。但是這只有在擁有軍官幹部和只需要加以補充的條件下才能做到。想把這 12 萬名兵士個個都培養成英雄，又需要多少時間呢？在今後一年內，英國政府最多只能拿出 5 萬名“英雄的小部隊”來同敵人對抗。誠然，在短時期內這個數目可能會增加，但是這將嚴重破壞未來的增援部隊的訓練工作。

要付郵了，我們只能談到這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寫于

1855 年 2 月 20 日

載于 1855 年 2 月 23 日

“新奧得報”第 91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卡·馬克思 論新的內閣危機

倫敦 2 月 24 日。下院昨天擠滿了人，都等着听大臣們對第一屆帕麥斯頓政府垮台的解釋。在拥挤到极点的大厅里，議員們迫不及待地等候着高貴的子爵的到來，議會宣布開会后過了一小時，這位子爵終於出現了，有的議席上對他報以嘲笑，有的議席上則對他 cheers [歡呼]。變節的大臣們——格萊安、格萊斯頓、赫伯特——在所謂激進派（曼徹斯特學派）的議席上坐了下來，布萊特似乎在那裡歡迎他們。在靠近他們的議席上坐着也已退出內閣的卡德威爾。帕麥斯頓勳爵提出了立即審查羅巴克委員會問題的提案。接着詹姆士·格萊安爵士開始了他那大臣的表白，但他剛開始玩弄詞藻，就傳來了帕麥斯頓的伴奏——酣睡的可靠徵兆。

格萊安反對調查委員會的辯詞原則上可以歸結為：任命這樣的委員會就是下院侵犯王室的特權。我們知道，英國大臣們有一種習慣，即在反對王室時舉出議會的特權，而在反對議會時則舉出王室的特權，這已經有 150 年的傳統。實際上格萊安是以委員會的調查會造成英法同盟破裂的危險這一點來嚇唬人。而這不過是暗示說，法國同盟者將被看成是一切失敗的主要罪魁。至於格萊安的退出內閣，據說內閣從一開始就把羅巴克的提案完全看做是一種隱蔽的不信任投票。因此阿伯丁和紐卡斯爾公爵就成了犧牲

品，旧內閣也就被解散。但是新內閣除了坎宁和潘繆尔以外，仍由原班人馬組成；那末为什么罗巴克的提案能够突然得到另一种解釋呢？不是他，而是帕麦斯頓勳爵从上星期五到本星期二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不是他，而是他的高貴的朋友是一名逃兵。此外，——格萊安天真地承认——他退出改組的內閣的原因在于他确信

“现在的政府并不比几星期以前下台的政府得到議院更大的信任”。

格萊安还在他的发言中說道：

“在組織新政府的时候，我曾問过高貴的勳爵（帕麦斯頓），是否会对阿伯丁伯爵的对外政策作某种修改，是否会对已經提出的媾和条件作某种修改。帕麦斯頓勳爵肯定地向我保证說，在这方面一切都将照旧。”

（我們援引的这些話是在下院所讲的原話，而不是他在报纸上刊登的經過修飾的詞句。）

布萊特馬上就抓住格萊安的这个声明，来证明他并不想推翻帕麦斯頓政府，他个人对高貴的勳爵并不怀任何敌意，不但如此，他确信帕麦斯頓和罗素拥有受到不公正攻击的阿伯丁所缺少的东西，即享有足够的声望，可以在四項条款的基础上来簽訂和約。

悉尼·赫伯特。——罗巴克的提案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組成的。第一、罗巴克提議調查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軍队的状况；第二、調查直接負責軍队給养的政府机关方面的領導如何。議会有权做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赫伯特1月26日曾激烈地反对“后者”，正像現在，2月23日他反对“前者”一样，是否就是根据这一点理由呢？当他（赫伯特）在本屆內閣中担任职务的时候，帕麦斯頓勳爵完全符合于他在上星期五所作的发言，說任命委员会是一种違宪的措施，并且认为，随着阿伯丁和紐卡斯尔公爵的离职，委

員會的問題已經不存在了。帕麥斯頓甚至不懷疑，現在議院會不作任何討論就否決羅巴克的提案。既然委員會的目的不是彈劾政府，而是調查軍隊的狀況，那末任命這個委員會就是一個駭人聽聞的騙局。帕麥斯頓勳爵沒有勇氣根據他不止一次表明過的信念來行動，從而也就削弱了政府。如果一個強有力的人執行的是軟弱的政策，那他還能帶來什麼好處呢？

格萊斯頓對自己的同僚們的解釋實質上並沒有作任何補充，如果說有的話，那只是提出了這樣一種論據，這種論據曾使已故的皮爾有理由就格萊斯頓退出他的政府一事（那時談的是梅努特神學院問題⁷¹）指出，在他的朋友沒有想到要在兩小時的發言中向議會說明退出政府的原因以前，似乎他就已經理解這些原因了。

帕麥斯頓認為談自己以前的同僚們的解釋是多餘的。他惋惜他們的離職，但是沒有他們也能過下去。在他看來，委員會的目的不是彈劾，而是調查軍隊狀況。起初他反對任命委員會，但是現在他確信，要迫使議院撤銷自己的決定是不可能的。國家不能沒有政府，因此他仍將留下來擔任政府的首腦而不管有沒有委員會。對於布萊特的問題，帕麥斯頓回答說，和平談判將認真進行，給羅素的指示是在四項條款的基础上擬定的。關於他的內閣的情況，他什麼也沒有向議院報告。

儘管帕麥斯頓的第一屆政府突然垮台了，但是帕麥斯頓卻已經無可爭辯地取得了勝利，即使不是在輿論界，至少也是在內閣和議會里。他派羅素率領代表團去維也納，從而擺脫了這個令人難堪的、變化無常的對手。他同羅巴克妥協，把議會的調查委員會變成了政府的委員會，並使它僅僅成為同他自己設立的三個委員會並列的第四個委員會。用悉尼·赫伯特的話來說，帕麥斯頓用“駭

人听聞的騙局”代替了事实。皮尔分子的退出內閣使他有可能成立由一些等于零的人物組成的內閣，而其中只有他是整数。然而毫無疑問，要成立这个真正的帕麦斯頓內閣必将碰到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2 月 27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97 号

卡·馬克思 休 謨

倫敦 2 月 24 日。休謨死了，下院失去了一員老將。他的長時期的議會活動是在 1831 年最為得勢的那個資產階級激進政黨的發展的精確晴雨表。在改革⁷²後的初期，休謨在議院里起了議會的沃里克即“議員製造者”的作用。八年以後，他同丹尼爾·奧康奈爾和菲格斯·奧康諾爾一起成了“人民憲章”⁷³的擬訂者。“人民憲章”直到現在還是憲章派的政治綱領，按其實質來說，這就是要求普選權和創造在英國能夠真正實現這種權利的條件。

在這以後不久，工人和資產階級鼓動者之間發生了分裂。休謨是站在資產階級鼓動者這一邊的。在羅素內閣時期，他擬定了“小憲章”，這個憲章成了所謂“議會改革和財政改革派”⁷⁴的綱領。“小憲章”的三項條目代替了“人民憲章”的六項條目，並且只要求用多少“擴大的”選舉權來代替“普遍”選舉權。最後，在 1852 年，休謨宣布了新的綱領，在這個綱領中他放棄了自己的“小憲章”，而只堅持一項條目——秘密投票 (Ballot)。此外，休謨還是所謂“獨立”反對派的典型代表，科貝特會非常恰當地把這個反對派稱為舊制度的“安全閥”。晚年，休謨沾染了一種習慣（這成了他的真正的癖好），即向議會提出提案，然後遵照內閣的指示在最後一分鐘放棄這些提案。他喜歡賣弄的那句“節約公款”的話已經成為

口頭語了。內閣讓他抨擊小的支出項目和縮減這些項目，目的是要使大的支出項目能毫無阻礙地在議院通過。

卡·馬克思寫于 1855 年 2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2 月 28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 98 號

卡·馬克思

*帕麦斯頓和英国的寡头政治

倫敦 2 月 27 日。帕麦斯頓对那种反对貴族的喧嚷作了諷刺的回答，他成立了一个由 10 个勳爵和 4 个从男爵組成的內閣，而且在这 10 个勳爵中有 8 个人参加貴族院的會議。为了回答由寡头政治中各派別之間的妥协而引起的不滿，他促使輝格党內的各个家族集团取得妥协。在他的內閣中，格雷氏族、薩特倫德公爵家族以及克拉倫登家族都得到一部分职位。內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是格雷伯爵的堂兄弟，而海軍首席大臣查理·伍德爵士娶了格雷伯爵的姐姐；格兰維耳伯爵和阿盖尔公爵代表薩特倫德家族。財政大臣乔·康·路易斯爵士是外交大臣克拉倫登伯爵的姐夫。只有一个印度分給了沒有爵位的維农·斯密斯，但他同輝格家族也有姻亲关系。理查三世曾經大声疾呼：“一个王国換一匹馬！”^①帕麦斯頓也摹仿卡利古拉⁷⁵大声叫嚷：“一匹馬为王国效忠！”并且把維农·斯密斯变成印度的大莫臥儿⁷⁶。

“晨报”抱怨道：“帕麦斯頓勳爵不仅給了我們一个在我国历史上絕无仅有的最貴族式的政府，而且用可以找到的最坏的貴族材料組成了自己的政府。”但是，天真无邪的“晨报”聊以自慰地說：“帕麦斯頓直到目前为止还不是行动自由的人，他的手脚还带着鐐铐和绳索……”

①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五幕第四場。——編者注

前面我們曾經說過^①，帕麦斯顿勋爵用一些等于零的人物来組織內閣，而只有他才是內閣中的整数。約翰·罗素勋爵在1851年不讲策略地将他从輝格党人的內閣中攆了出去，他却很巧妙地把罗素派去旅行⁷⁷。他为了继承阿伯丁的职位，曾利用了皮尔分子。在他的首相职位稳固之后，他馬上撇开了阿伯丁的信徒，并且像迪斯累里所說的那樣，从罗素那里不仅盜取了輝格党人的法衣，而且把輝格党人本身也搶走了。尽管目前的政府和1846—1852年罗素的輝格党政府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它們混为一談也是十分錯誤的。現在問題的实质根本不在于內閣，而在于代替內閣的帕麦斯顿勋爵。虽然內閣的成員大多数都是旧人，但是，內閣位置的分配不同了，內閣在下院中的支柱大大不同了，而且它本身是在大大改变了的情况下重新建立起来的，所以，如果說过去它是一个軟弱的輝格党内閣，那末現在，只要帕麦斯顿不是假皮特，路易·波拿巴不是假拿破侖，而約翰·罗素勋爵还繼續自己的旅行的話，它就体现着强有力的个人专政。英国的資產者虽然对局势的这样突然的轉变感到非常煩惱，但是帕麦斯顿用来欺騙和愚弄朋友和敌人的厚顏无耻的把戏还可以供他們取乐。西蒂区的商人說，帕麦斯顿再次表现出他很«clever»。但«clever»是一个不好翻譯的詞，它有各种意思、各种含义。它包含着一个善于表現自己的优点以及善于巧妙地損人利己的人的一切品质。英国資產者虽然信奉道德、讲究尊敬，但他們仍然首先称頌他們所謂的«clever»的人，这种人不受道德的約束，虔敬也不能使他迷乱，他把原則看成捕捉他周圍的人的罗网。既然帕麦斯顿«clever»到这种

^① 見本卷第100—101頁。——編者注

程度，那他不是也能用巧計胜过俄国人，就像用巧計胜过罗素一样嗎？——英国資產階級上层分子中的政治家发出这样的議論。

至于托利党人，他們以为美好的旧时代又回来了，联合的恶毒誘惑力被摧毁，輝格党内閣和托利党内閣的傳統交替現象重新恢复起来。不仅仅限于消极瓦解的一种真正的变动，事实上只有在托利党政府时期才可能发生。只有在托利党人执掌政权的时候，才开始有强大的外界压力——pressure from without——和实行不可避免的改革。例如，天主教徒的解放⁷⁸是在威灵頓內閣时期，廢除谷物法是在皮尔內閣时期；如果不談議會改革法案本身，那末至少关于改革运动——其意义比效果大得多的运动，也可以这样说。

当英国人从海外請来一位荷兰人^①做国王的时候，随同新的王朝的建立，开始了新的紀元——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相結合的紀元。从那时到現在，一直保持着血統特权和金錢特权之間的立宪均勢。例如根据血統特权，軍隊中一部分的职务是按家族关系的原則、通过徇私和寵愛来分配的，但是金錢原則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因为一切軍官官銜都是用硬幣买卖的。据統計，目前在軍隊中供职的軍官用于购买自己軍銜的資本已达 600 万英鎊。为了不失去自己在供职期間所获得的权利，以及为了不致被任何年輕的富人排挤出去，不太富裕的軍官只好去借債，为升官奔波，这样一来，他們就成了受抵押奴役的債務人了。

在教会中也像在軍隊中一样，除了家族关系的原則以外，現金原則也仍然盛行一时。教会的一部分职务落到年幼的貴族子弟手中，另一部分职务則落到花錢較多的人的手里。因为英国人民的

① 奧倫治的威廉。——編者注

“灵魂”属于国教会，对英国人民的“灵魂”的交易，也和贩卖弗吉尼亚黑人的生意一样经常化了。在这門行业中不仅有卖者和买者，而且也有經紀人。Court of Queen's Bench [皇家法院] 昨天审理了这种“宗教”經紀人中的一个姓辛普森的訴訟案。他要求一个叫拉姆的人付給他应得的酬金，这位拉姆根据契約規定，应当帮助約瑟亚·罗德韦耳牧师弄到西哈克尼教区的圣职，并有言在先，辛普森可以从买者和卖者那里分別拿到百分之五的佣金，某些額外收入除外。据他說，拉姆沒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桩交易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拉姆的父亲是一个 70 岁的牧师，在薩塞克斯拥有两个教区，这两个教区的售价定为 16 000 英鎊。不用說，这种价格与教区的圣职收入成正比，另一方面又与占有者的年龄成反比。拉姆次子是拉姆长子所占有的教区的照管人，又是第三个更年輕的拉姆——西哈克尼的教区占有者和牧师的哥哥。因为后面这位拉姆年紀还很輕，他的薪高事少的下一任圣职的价格比較低。虽然这个教区每年的收入是 550 英鎊（牧师的住宅費用除外），但是它的占有者把下一任圣职只卖 1 000 英鎊。在父亲去世后，他的哥哥必須把薩塞克斯的教区交給他，而又答应把西哈克尼的空位子通过辛普森以 3 000 英鎊卖给約瑟亚·罗德韦耳。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拿到 2 000 英鎊的純收入，他的弟弟可以得到較好的教区，而經紀人在这桩交易中按应付給他百分之五的佣金計算，也可以賺 300 英鎊。后来不知为什么合同被取消了。法院判給了經紀人辛普森 50 英鎊作为他“花費劳动”的賠償費。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27 日

載于 1855 年 3 月 3 日
“新奧得报”第 10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

不列顛宪法

倫敦3月2日。不列顛宪法在一切受到战争考驗的地方都全部破产了，而在国内，英国历史上最具有宪法精神的联合內閣也垮台了。死于黑海沿岸的4万名不列顛兵士是不列顛宪法的牺牲品！軍官团，总参謀部，軍需部，医务主管部門，运输部門，海軍部，最高統帥部，軍械部，陆軍和海軍——全都瓦解了，它們使自己在全世界面前威信扫地。但是，大家一想到它們不过是履行了对不列顛宪法所担当的义务，也就心安理得了！“泰晤士报”就这个全面破产写道：“不列顛宪法本身受到了审判。”它这样写比它原来設想的更接近真理！宪法受到了审判，并且被认为是**有罪的**。

但是，这个不列顛宪法是什么呢？它的实质是否就是代議机关或者限制行政权呢？这些特征并没有使它無論同北美合众国的宪法或是同无数“熟悉本行业务”的英国股份公司的章程有什么区别。不列顛宪法其实只是**非正式执政的**、但实际上統治着资产階級社会一切决定性領域的资产階級和**正式执政的土地貴族**之間的由来已久的、过时的、陈腐的妥协。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最先参加妥协的只有一个资产階級派別——**金融貴族**。1831年的改革法案使另一派，即英国人称为«millocracy»的**工业资产階級**巨头也参加了妥协。1831年以来的立法史就是一部向工业资产階級

让步(从新济貧法⁷⁹到廢除谷物法,从廢除谷物法到实行地产遺產稅)的历史。

如果資產階級——其实只是資產階級的上层——一般也被认为是政治方面的統治階級,那只有在各方面的一切实际管理,甚至行使立法权的职能,即在議會两院实际立法的权利,都掌握在土地貴族手中的情况下才談得上。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資產階級宁願再同土地貴族妥协而不願同英国人民群众妥协。而貴族虽然屈从資產階級所提出的某些原則,但是却无限制地統治着內閣、議會、国家管理机关、陸軍和海軍;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不列顛宪法最重要部分的貴族階級,現在不得不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了,并且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沒有能力繼續治理英国。为了使它起死回生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的嘗試!內閣一个接一个地組成,不过是为了在上台执政几个星期之后宣布自己解散而已。危机連綿不断,政府不过是一种暫時現象。一切政治活动都中止了,每个人都意識到,他所企求的只是給这台政治机器上上油,使它不要完全停頓下来。下院在按照自己的模样建立的那些內閣里,已經再也认不出自己了。

在这种普遍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不仅要进行战争,而且要同比沙皇尼古拉危險得多的敌人作斗争。这个敌人就是**工商业危机**,它从去年9月以来日益加剧,日益普遍。危机的铁手一下子就把那些鄙俗的自由貿易的信徒的嘴給堵住了,这些信徒許多年来一直鼓吹說,在谷物法廢除以后,市場上商品过剩和社会危机就永远成为历史掌故了。但是現在,市場上商品过剩已成为事实,正是那些仅仅在五个月前还以武断的、絕對正确的口吻說生产过剩永久不再发生的經濟学家,現在比誰都更响亮地叫喊沒有縮減生产的

工厂主缺乏先見之明。

这个病症早在普雷斯頓罢工⁸⁰时期就以慢性病的形式出现了。此后不久，美国市場商品过剩引起了合众国的危机。印度和中国虽然也堆满了商品，但它們仍像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一样，继续对生产过剩起着排水渠的作用。英国工厂主再也没有可能不降低价格而在国内市場上銷售自己的商品，因此便采取了冒险的办法——把商品运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去委托出售。这种办法使他們能在某一个时期内避免了如果一下子把全部商品抛到国内市場上去就会給商业造成的那些困难。然而，輸出的商品剛一到达目的地，它們立即就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市場价格，而且到9月底，这种状况所产生的后果在英国这里也开始感觉到了。

于是，慢性危机轉变成了急性危机。第一批遭到破产的企业是印花工厂——其中包括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一些老商号。接着輪到的是船主以及同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做买卖的商人，然后是同中国做买卖的商行，最后是同印度做买卖的商行。大家都輪到了；其中大部分亏损严重，許多商行不得不歇业，而且对这些商业部門中的任何一个部門來說，危險都还没有过去。相反地，这种危險还在日益增大。絲織工厂的厂主也被危机波及；絲織品的生产目前縮减到几乎等于零，而在絲織品生产的各个中心地現在极端困难。随后就輪到棉紡織厂的工厂主。他們当中某些人已經支持不下去了，而且有更多的人注定要遭到同样的命运。我們已經指出过^①，細紗工厂实行了不完全工作周制，粗紡工厂很快也会不

^① 見本卷第78頁。——編者注

得不这样做。部分粗紡工厂現在就已經一周只工作几天了。它們能不能这样长久地維持下去呢？

再过几个月，工业区的危机将达到 1842 年危机的規模，甚至超过它。但是一旦工人階級自己充分感觉到危机的影响，近六年来在工人階級中間多少处于沉寂状态，并且只保存下来进行新的鼓动的干部的政治运动就会重新开始。正是在資產階級同貴族的冲突达到頂点的时候，工业无产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冲突又会开始。至今一直掩盖着大不列顛政治面貌的真正特点而不让外国看見的假面具終将被撕破。只有不知道这个国家拥有多么丰富的人力和物力的人，才会对这个国家能胜利地摆脱面临的大危机而振兴起来这一点发生怀疑。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3 月 6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109 号

卡·馬克思 累亞德

倫敦3月2日。著名的亞述學家累亞德前天在艾爾斯貝里向自己的選民們發表的演說中，舉出了值得注意的詳盡的材料，這些材料一方面說明寡頭政治家在分配極重要的國家職位時所採取的手段和方法，另一方面說明所謂自由和獨立的議員們對這些寡頭政治家所抱的十分曖昧的態度。

累亞德說，格蘭維爾勳爵任命他為外交副大臣；在羅素內閣倒台、得比內閣成立以前，他在這個職位上干了三個月。得比建議他在指定為他的繼任者的斯坦利勳爵（得比的兒子）從印度回國以前仍舊留在這個職位上，並說以後將派他（累亞德）出國辦理外交。

累亞德說：“我所有的政界朋友都認為我應當接受這個建議，只有羅素勳爵除外，他有相反的意見；我立即聽從了羅素的勸告。”

這樣，累亞德拒絕了得比的建議。妙極啦！羅素勳爵又成了內閣大臣，而且累亞德也沒有被遺忘。羅素邀請他坐上“內閣的席位”，就是要他擔任«Board of Control»〔“督察委員會”〕副主席的職務，也就是擔任印度事務副大臣。累亞德表示同意。但是羅素突然想起，輝格黨人中有一個以前曾經負責過愛爾蘭事務、但從未負責過亞洲事務的上了年紀的紳士托馬斯·雷丁頓爵士“還沒有安插”（原話）。因此，羅素暗示累亞德，要他不阻礙安插可尊敬的紳

士。累亚德又让步了。于是，被这位学者的谦逊态度和自我牺牲精神所鼓舞的罗素，就劝他索性让路改任駐埃及的領事。但是，这一次累亚德却大发雷霆，拒絕了这个建議，并且在議會中发表了反对內閣的东方政策的动人演說，以此来引起議員們对自己的注意。

帕麦斯頓組閣以后，想用軍械部秘书的职务来满足累亚德。累亚德沒有接受这个建議，因为他說他对火炮等等东西一窍不通。多么天真啊！好像已經离职的軍械部秘书、爱尔兰旅的捐客之一蒙塞耳先生曾經能够把普通的火枪和針发枪区别开来似的！于是帕麦斯頓建議累亚德担任陸軍部副大臣的职务。他接受了这个建議，但是第二天帕麦斯頓突然发现，弗雷德里克·皮尔这个官气十足的渺小人物目前是陸軍部絕對不可缺少的，虽然大家知道，皮尔对陸軍部的职能一无所知。最后，帕麦斯頓以罗素的名义建議累亚德担任殖民部副大臣的职位作为补偿。累亚德认为，要去熟悉从来沒有研究过的 50 个殖民地，在目前的情况下太困难了。他又表示拒絕，于是这段頗有教益的历史就到此結束了。

內閣的报纸从这里得出的唯一教訓是：累亚德在处世方面还很少經驗，而他自己的过錯則是沒有利用自己在亚述学方面的名望。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 日

載于 1855 年 3 月 5 日

“新奧得报”第 10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

英国的危机

在“大西洋号”輪船从欧洲带来的一切消息中⁸¹，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沙皇的逝世和这一事件对当前复杂局势的影响。但是，关于这一事件或其他欧洲问题的消息无论怎样重要，都未必能使深思熟虑的观察家感到兴趣，因为更能引起他们注意的是目前英国不由自主地卷入的那种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逐渐发展的征兆。企图保持被称为不列颠宪法的那种过了时的妥协（即官方统治阶级和非官方统治阶级之间的妥协）的最后一次尝试，显然已失败了。在英国，不仅联合内阁即在历届内阁中最合乎宪法的内阁已破产，就连宪法本身在它遭到战争考验的一切地方也全部破产了。死于黑海沿岸的4万名不列颠兵士是不列颠宪法的牺牲品！军官团、总参谋部、军需部、医务主管部门、运输部门、海军部、最高统帅部、军械部、陆军和海军——全都瓦解了，它们使自己在全世界面前威信扫地。但是，大家一想到它们不过是履行了对不列颠宪法所担当的义务，也就心安理得了。伦敦“泰晤士报”就这个全面破产写道：不列颠宪法本身受到了审判。它这样写比它原来设想的更接近真理！

宪法受到了审判，并且被认为是犯罪的。这个不列颠宪法无非就是过了时的妥协，由于这种妥协，国家政权完全转入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手里，然而其条件是：一切实际管理、全部行政权、甚至行

使立法权的职能，即在議會两院实际立法的权利，都依旧掌握在土地貴族手里。而貴族虽然屈从資產階級所提出的一般原則，但是却无限制地統治着內閣、議會、国家管理机关、陸軍和海軍；这个构成不列顛宪法最重要部分的貴族階級，現在不得不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了。它不得不承认自己沒有能力繼續治理英国了。內閣一个接一个地組成，不过是为了在上台执政几个星期之后宣布自己解散而已。危机連綿不断，政府不过是一种暫時現象。一切政治活动都中止了；每一个人所企求的只是給这台政治机器上足油，使它不要完全停頓下来。一切拥护宪制的英国人引以自豪的下院本身，已經弄到癱瘓的地步。它自从分裂为許許多多的派別由它們去試驗在一定的位数下所能拼出的組合和变分后，再也认不得自己了。它甚至在按照自己的模样建立起来(其唯一目的是重新解散它們)的各种不同的內閣中，也已认不得自己了。真是彻底的破产。

一种束手无策的毛病已感染了全国，它像克里木的流行病一样，漸漸蔓延到了政治机体的各个部分，在这种普遍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不仅要进行战争，而且要同一个比俄国可怕得多的敌人作斗争，同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內閣、所有这些格萊斯頓派、卡德威尔派、罗素派和帕麦斯頓派的內閣加在一起也无力抵御的一个敌人作斗争。这个敌人就是工商业危机，它从去年9月以来就带有极其尖銳、极其普遍和猛烈的性质，以致人們已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它那无情的铁手一下子就把那些鄙俗的自由貿易的信徒的嘴給堵住了，这些信徒許多年来一直鼓吹說，在谷物法廢除以后，市場上商品过剩是不可能发生的。以最尖銳的形式表現出来的市場上商品过剩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在今天已成为事实，面对这一事实，誰也沒有像那些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还断言生产过剩永不

再产生的經濟学家那样，狠狠地責备沒有縮減生产的工厂主缺乏先見之明。我們早已注意到了这种慢性病的存在。美国最近的困难和引起美国商业停滯的危机无疑地加深了这种病症。印度和中国虽然也堆滿了商品，但它們仍像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一样，繼續起着排水渠的作用。英国工厂主再也沒有可能在國內市場上銷售自己的商品，或者說，为了不降低价格而不願意这样做，因此便采取了荒謬的办法——把商品运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去委托出售。这种办法使他們能够在某一个时期內避免了如果一下子把全部商品拋到國內市場上去就会給商业造成的那些困难；然而，輸出的商品剛一到达目的地，那些国家的市場上就立即发生了困难，到去年9月底，这种状况所产生的后果在英国也开始感觉得到了。

于是，慢性危机轉变成了急性危机。印花工厂的厂主們首当其冲；包括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一些老商号在內的許多企业全都破产了。接着輪到的是船主以及同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做买卖的商人，然后是同中国做买卖的商人，最后是同印度做买卖的商行。大家都輪到了；其中大部分亏损严重，許多人甚至不得不歇业，而且無論对誰來說，危險都还没有过去。相反地，这种危險还在日益增大。絲織工厂的厂主也被危机波及；絲織品的生产几乎等于零，而这一生产的各个中心地过去是而且直到現在还是极端困难。随后就輪到棉紡織工厂的工厂主。根据最近的报道来看，他們当中某些人已經支持不下去了，而且有更多的人注定要遭到同样的命运。大家知道，細紗工厂实行了四日工作周制，粗紡工厂很快也会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它們中間是否有很多的工厂能在一个比較长的时期內支持下去呢？

再过几个月，危机将达到英国自 1846 年以来或许甚至从 1842 年以来所没有过的规模。但是一旦工人阶级自己充分感觉到危机的影响，近六年来处于沉寂状态的政治运动就会重新开始。那时，英国工人就会重新起来进行斗争；并且恰好是在资产阶级最终把贵族从政权中排挤出去的时候，给资产阶级以威胁。至今一直掩盖着大不列颠政治面貌的真正特点的假面具终将被撕破。英国的两种真正斗争着的力量——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将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而这个国家终将被纳入欧洲社会的总的社会发展轨道。当英国同法国结成联盟的时候，它就彻底丧失了那种由于它是岛国而产生的、并且早就被世界贸易和交通工具的发展所破坏的孤立性质。现在，它也未必能够逃避其他欧洲国家所卷入的那些伟大的国内运动。

不列颠宪法的末日同路易-菲力浦君主政体的末日一样，充满了一幅幅腐朽透顶的社会制度的图景，这个事实也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已经报道了议会的丑事和政府的丑事，报道了斯托诺尔、萨德勒、劳勒的丑事^①，但是，最重要的是汉德科克和德·巴勒案件的被揭发，在这个案件中，英国贵族克兰里卡德勋爵如果不是最可恶的罪行的直接参与者，至少也是间接的参与者。毫不奇怪，这足以作出比较，人民一看到案件的可耻细节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喊起来：“普拉兰公爵！普拉兰公爵！”英国已经到了自己的 1847 年，谁知道它的 1848 年将在什么时候开始和将是什么样子呢？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3 月 2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4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论英国”文集(1952年版)

① 见本卷第 29—31 页。——编者注

卡·馬克思

軍銜买卖。——澳大利亚消息

倫敦3月3日。大家知道，葛德里奇勳爵关于把軍士提升为上尉的提案在前天的下院會議上被否决了。帕麦斯頓举出了一个旧的理由：局部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旧制度的一个环节关联着另一个环节。总之，个别的实际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改革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而整个制度的改革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是改革，而是革命。因此，改革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实际上行不通。目前的下院——遵循«principiis obsta»〔“把邪恶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个原則的下院，自然很乐意听信这一点，或者更确切些說，不需要別人說服，因为它事先就已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帕麦斯頓就这个問題指出，买卖軍官官銜证书的制度由来已久。这一点他說得对。我們已經說过，这种制度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时期与建立国債、銀行券和荷兰王朝等制度同时产生的。还在1694年惩治叛乱法⁸²中就曾指出必須防止

“在皇家軍隊中买卖軍銜的巨大罪恶活动”，同时規定“每个有官銜证书的軍官〈只有軍士沒有官銜证书〉必須发誓：他的官銜证书不是买来的”。

但是，这个規定沒有应用到實踐中去；相反地，1702年，掌璽大臣納·萊特爵士作出了相反的决定。1711年5月1日，官銜证书制度直接得到了女王安的一項命令的承认，這項命令写道：

“未經國王批准，任何軍官官銜證書都不得出賣，服役未滿 20 年或尚未被認為不宜服役的任何軍官都無權出賣官銜證書”等等。

這種對軍官官銜證書買賣的正式承認同官銜證書市價的正式確定只相隔一步之差。官銜證書市價最初是在 1719—1720 年規定的。後來，軍官官銜證書的價格在 1766 年、1772 年、1773 年、1783 年都作了調整，而最後在 1821 年確定了價格，這個價格一直保持到現在。早在 1766 年，陸軍大臣巴林頓就公布過一封信，信中說道：

“這種買賣軍官官銜證書的制度所造成的後果往往是這樣：懷着最熱切的志向來服軍役並且不放棄立功機會的人一生的官銜都是很低的，因為他們窮。這些可尊敬的軍官常常受到極大的屈辱，他們處在豪門出身的年輕軍官的管轄之下，而這些年輕軍官入伍晚得多，他們有錢，可以在團隊外尋歡作樂，而其他人則經常呆在營房里鑽研自己的業務，執行這些紳士們的職務。”

英國一般法律固然認為，因授予某一國家職位而接受饋贈或“佣金”這種行為是非法的，正像國教會章程中規定必須把買賣宗教職位⁸³的人開除教籍一樣。但是，歷史的發展表明，任何法律都不能決定實踐，任何實踐也都不能取消同它矛盾的法律。

最近來自澳大利亞的消息給普遍的騷亂、恐慌和不穩定的圖畫又增添了幾筆。我們應當把巴拉腊特（靠近墨爾本）的叛亂和席卷維多利亞全省的革命運動區別開來。前者現在大概已經被鎮壓下去了；後者只有在滿足了一切要求之後才可能停止。前者只是後者的徵兆和偶然的爆發。至於巴拉腊特的叛亂，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在巴拉腊特金礦區，有一個名叫本特利的“厄夫里卡”旅館的老板，他同采金人發生了各種衝突。在他的旅館里發生了一件凶殺案，這更加强了人們對他的仇恨。在驗屍官驗屍以後，本特利作

为与案件无关的人而获释。但是，在驗尸时到场的 12 位陪審員中，有 10 位对 coroner (驗尸官) 企图隐瞒对被捕者不利的证詞的偏袒态度提出異議。根据居民的要求，进行了第二次偵查。尽管揭发他的证詞确凿，本特利又被釋放了。这时才弄明白，原来有一个法官給这个旅館投过資。許多控訴书，过去的和新收到的，都說明巴拉腊特专区的政府官員有曖昧行为。在本特利第二次获釋的那一天，采金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燒毀了他的旅館，然后便走散了。根据維多利亞省省长查理·霍桑爵士的命令，逮捕了三名禍首。11 月 27 日，采金人代表团要求釋放被捕者。霍桑拒絕了这个要求。采金人便組織了大規模的群众集会。省长从墨尔本調来了警察和正規部队。双方发生了冲突，結果有几个人被打死。根据最近的消息(12 月 1 日左右)采金人举起了独立的旗帜。

就連这个基本上从一家政府机关报上借用的叙述，也决不能說明它对英国法官和政府官員有利。它只证明普遍对他們不信任。維多利亞省的革命运动实际上是圍繞着两大問題进行的，由于这两大問題才燃起了激烈的斗争。采金人要求廢除采金特許证，也就是要求取消直接对劳动所課的稅收；其次，他們坚决要求取消对下院議員的財產資格限制，从而企图把对稅收和立法的監督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难看出，实际上这些动因和那些促使合众国宣布独立的动因是相类似的，所不同的只是在澳大利亚，对那些同殖民官僚相勾結的壟断資本家的反抗是由工人开始的。在“墨尔本阿尔古斯报”上，我們一方面看到有利于改革的盛大的群众集会，另一方面則看到政府的大規模軍事准备工作。該报写道：

“在一次有 4 000 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通过了一項決議，決議指出特許稅是一个沉重的負擔，是一种对自由劳动的非法稅收，因此与会者必須用

燒毀全部特許证的方法来立即廢除这个制度。假如有人因沒有特許证而將被捕，人民就要联合起来支持和保护他。”

11月30日，专員里德和約翰遜在騎兵和警察的随同下在巴拉腊特出現了，他們手執武器要采金人出示特許证。采金人大部分也都武装起来，他們举行群众大会，决定全力抗拒征收可恨的特許证稅。他們拒絕交驗自己的特許证，声称他們已經把特許证燒毀了；有人便向他們宣讀惩治叛乱法，这时，真正的叛乱也就开始了。

这里只要引证以下事实就足以表明，在省立法机关作威作福的壟断資本家和那些与他們勾結的殖民官僚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1854年，維多利亞省的政府开支达到了3 564 258英鎊，赤字是1 085 896英鎊，即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强。而由于目前的危机和全面破产，查理·霍桑爵士竟要求1855年的預算达到4 801 292英鎊！維多利亞总共不过30万居民，而要从上述总额中拿出1 860 830英鎊（每人摊到6英鎊）用在公共工程方面，例如：修筑道路、船塢、堤岸、营房、政府大厦、海关、植物园、公家的馬厰等等。如每人按6英鎊計算，大不列顛居民单是在修建公共工程方面每年就得繳納16 800万英鎊，也就是說要繳納比他們所交的稅款还多二倍的数目。工人居民起来反对这种过重的稅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官僚和壟断資本家靠別人出錢来这样大規模地共同修建公共工程，从而得到了多大的好处，这也是不难想像的。

卡·馬克思写于1855年3月3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55年3月7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111号

卡·馬克思

英国报刊論沙皇逝世

一

倫敦3月3日。所有今天出版的日报和周报，不用說，都发表了关于俄国皇帝逝世的社論，但是，所有这些报纸登的全是庸俗不堪和千篇一律的东西。“泰晤士报”至少企图以100匹馬力的热情把自己的文笔提到帖木儿-塔梅尔兰的高度。我們只提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都是对帕麦斯顿勋爵說的恭維話。这两个地方就是：任命“沙皇的死敌”帕麦斯顿为首相，更加重了对尼古拉的过度刺激，加速了他的死亡；在1830年到1840年期间（实行帕麦斯顿对外政策的头十年），沙皇就放棄执行自己的掠夺和統治世界的政策。两种說法不过是半斤八两而已。

另一方面，“晨报”提出了它的发现，米哈伊尔是沙皇的长子因而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帕麦斯顿的私人报纸“晨邮报”在悼詞中对英国公众宣称：

“維也納會議虽然还要拖延一个时期，但是一定会很快开幕的，而且会对未来作出新的展望”，同时，“今天午后克拉倫登勋爵将在布倫同拿破侖皇帝會談，届时两国政府将对这样意外的和重要的事件交換意見。”

“每日新聞”不相信“意外事件”会产生和平后果，因为西方列强不会同意在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以前結束战争，而俄国也不会同

意在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以后結束战争。

二

倫敦3月6日。尼古拉皇帝的逝世使这里的报刊有机会登出一些不完全是一般化的广告消息。詹姆斯·李先生沒有作过任何医疗上的监护,却比格兰維耳医生还高明⁸⁴。

他在今天的“晨报”上說,“2月6日我曾寄給你們一封信,其中写道,俄国皇帝,从我发信的日子算起,过不了三个星期就要寿終正寢”。

“晨报”編輯部在按語中說明,他們的确收到过李的信,但认为这封信上写的是病人的囈語,所以把它扔到字紙簍里去了。李不仅說过这些話,他还要在“晨报”上預告另一个帝王快死的消息,但有一个必須的条件,即他的消息一定要登出来。看来,李的預言的价值比西維拉占語集的价值更低賤。

沙皇的逝世也促使那作为一个苏格兰高地居民、天生具有洞察一切才能的烏尔卡尔特发表了几句皮蒂姪格言⁸⁵,其中最典型和最容易懂的就是下面这些話:

“尼古拉和波兰人之間流过血,对这些波兰人不能沒有监督,并且要从他們那里得到50万名战士。尼古拉的前輩亚历山大在莫斯科大教堂宣布的恢复白色双头鷹——斯拉夫种族联合的象征,在尼古拉一生中未能实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此,烏尔卡尔特认为,現在到了俄国变成大斯拉夫帝国的时候,正像从前莫斯科王国变成俄国一样。

卡·馬克思写于1855年3月3和6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55年3月6和10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109和116号

卡·馬克思

論同法国联盟的历史

倫敦3月6日。今天的“先驅晨报”由于发表了下面的消息而使倫敦感到震惊：

“我們有一切理由断定，法国皇帝曾經对战争情况調查委员会的任命表示抗議，他声明，如果这个委员会繼續进行工作，两国军队就不能再采取一致行动，虽然它們致力于同一目的。为了滿足路易-拿破侖，同时又不致引起英国人民的不滿，議會一有适当机会就将解散。”

我們並沒有特別重視“先驅报”的这篇簡訊，我們认为它是拉芒什海峡两岸的潜伏势力破坏英法同盟的許多征兆之一。請回忆一下前任各大臣所作的說明吧。

詹姆斯·格萊安爵士。——在調查委员会的压力下，我們的海軍上将将被迫說出造成封鎖延緩的原因，因此，当避免在我們之間发生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誤会已經显得极端重要的这种时刻，进行調查就会涉及我們同偉大而强盛的盟国之間的相互关系。

悉尼·赫伯特。——他吁請委员会要看到問題的实质，同时不要損毀我們在克里木的军队的声誉，尽可能地不要动搖我們盟国的信任：如果委员会中沒有一个委員能及时阻止委员会走上危險的道路，那末就会发生严重的不公正行为；被委员会訊問的軍官可能因为不准对提出的控告进行答辯（因为这样会造成微妙而危

險的揭发) 而受害。至于赫伯特自己, 他說他认为自己有責任不让不列顛軍队的軍官处于被束縛住双手和沒有申辯机会的被告人地位。

格萊斯頓。——除了其他一切外, 委员会应当查明以巴拉克拉瓦为起点的那条道路为什么沒有早一点修好。如果委员会不調查这个問題, 那末它就什么事也干不了; 如果它正在調查这个問題, 那末答案会是: 由于劳力不足。如果它接着問, 劳力不足的原因是什么, 那末就会回答: 人們都在挖塹壕, 由于法軍和英軍的陣地彼此分开, 因而这些塹壕的距离很长。我还要說: 如果調查时不追究道路問題, 那末調查就完全是虛有其名, 如果追究这个問題, 那末被告人在申辯时就会直接涉及英法关系的最微妙方面。

显然, 大臣們的这种說明促进了已經播下的不信任种子的成长。把在克里木的英国軍队的作用縮小到在巴拉克拉瓦执行卫兵勤务的这种情况, 强烈地触犯了英国人的民族感情。随后, 在“通报”⁸⁶ 上出現了一篇帶有“皇帝”对英国宪法的一些看法的半官方性文章。这篇文章遭到了英国各周刊的尖銳批駁。在这以后, 发表了布魯塞尔回忆录⁸⁷, 在这个回忆录里, 路易-拿破侖一方面被描繪成克里木远征的倡議人, 而同时又被描繪成向奥地利让步的倡議人。对这个回忆录进行評論(例如“晨报”所发表的評論)时所采用的尖銳詞句使人想起了关于十二月二日政变的“一个英国人^①的信件”⁸⁸。

所有这一切在真正的民間刊物中究竟引起了怎样的反应, 可以根据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的下面一段話来判断⁸⁹:

① 阿·理查茲。——編者注

“波拿巴把英国引誘到克里木……我軍落入了圈套，而被他置于这样的境地：在俄国軍隊同他自己的軍隊发生接触前，我軍就已打垮了俄国軍隊。在阿尔馬河，在巴拉克拉瓦、因克尔芒和塞瓦斯托波尔城郊，英軍都是处在最危險的陣地上。他們不得不承受主要的打击，因而遭到最大的損失。如果同法国相比較，那末，英国根据条約只应派出三分之一的軍隊。这三分之一的軍隊必須挑起几乎所有战役的重担。也就是这三分之一的軍隊应当守住塞瓦斯托波尔城郊一半以上的陣地。由于粮食和服装未能运到（这些物資在巴拉克拉瓦腐爛了），我們的軍隊被消灭了；粮食和服装未能运到的原因是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間沒有道路，而沒有这条道路的原因是由于拿破侖坚持要占全部軍隊三分之一不到的英軍完成一半以上的挖壕作业；这就使得英軍不可能撥出必要的人力来修筑道路……格萊安、赫伯特和格萊斯頓所暗示的秘密就在这里……这样一来，拿破侖就蓄意毁灭了我們 44 000 名兵士”，等等。

对法国同盟者表示不信任的所有这些迹象和对它的不滿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领导政府的是帕麦斯頓勋爵，是每次都利用同法国的联盟作为向上爬的阶梯，然后又突然制造一种几乎必然要以战争来代替英法同盟的局面的人物。在 1840 年土耳其-叙利亚事件和签订 7 月 15 日条約（他以此結束了同法国的十年联盟）期間⁹⁰ 就曾經发生过这样的事情。1842 年罗伯特·皮尔爵士曾經就这一点說过：

“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廢除同法国的联盟——这个高貴的勋爵看来总是那样引以自豪的联盟。”

1847 年在同西班牙联姻問題⁹¹ 上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1846 年帕麦斯頓之所以能重新登上他的职位，就是因为他訪問了路易-菲力浦，极郑重地同他言归于好，并且在下院的一次讲话中奉承了法国人。1847 年他要人相信路易-菲力浦廢除了联盟，因为路易-菲力浦破坏了烏得勒支条約⁹²（这个条約在 1793 年失效，此

后未再生效),对英国女王采取了“背信棄义”的行为。至于談到背信棄义,这里倒有一部分眞話,但是,正如后来发表的文件所表明,是帕麦斯頓为了得到决裂的借口,用最巧妙的方法促使法国宮廷背信棄义的。由此看来,狡猾的路易-菲力浦本来指望以机智胜过帕麦斯頓,可是自己却落入了这位子爵——“爱开玩笑者”所精心設置的圈套。只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二月革命,才阻碍了英法战争的爆发。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6 日

載于 1855 年 3 月 9 日

“新奧得报”第 11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 調查委員會

倫敦3月7日。借口調查委員會破壞了同法国的联盟因而議會即將解散的傳說，看來已經得到了証實。關於這一點，“晨報”記者指出：

“是誰賦予委員會以公開性質的？是帕麥斯頓勳爵。正如大家所斷定的，他存心要解散議會。要求進行調查並且爭取到這一點的羅巴克堅決主張委員會處於秘密狀態。而反對進行調查但又不得不在這個問題上讓步的帕麥斯頓勳爵卻贊成公開。起初他迫使委員會選擇了一條在我們的國外同盟者看來是最可恥的途徑，然後，這條途徑的可恥性就成為首相解散議會、停止進行調查和暗自嘲笑這兩者的理由。”

關於這個問題，“先驅晨報”的社論中有一段這樣寫道：

“當聯軍在塞瓦斯托波爾城郊佔據自己的陣地時，英軍在數量上多於法軍；後來我軍隊伍之所以減員，完全是由於在地中海缺乏預備部隊，在英國本土缺乏有組織的民軍。由於這些原因，英軍就缺乏必要的增援部隊。想把我們盟國的聲譽糾纏到辯論中去的這種企圖乃是一些絕望了的、沒有良心的人所勉強能掩蓋住的詭計，這些人力圖逃避調查，因為他們知道，這種調查對他們未來的政治前途十分有害。克拉倫登勳爵通過迂迴的途徑設法會見了法國皇帝，其唯一目的就是迫使他發表可以被解釋為不贊同調查委員會的聲明或意見。現在，當這一點已經做到後，愛國的大臣們就抱定宗旨要在‘同法国的联盟在危急中！’這個口號下用解散來威吓議會并向全國呼喚。”

十分明显，如果这种詭計是为了使英国政府摆脱調查委員會，那末同时它也就使同法国的联盟受到損害，因此就恰好准备下了它似乎应当預防的东西。必須放棄委員會，因为据說它能揭穿使法国同盟者的声誉受到損害的“微妙和危險的”秘密，这种論断本身就已經使法国同盟者的声誉受到了損害。撤銷委員會要比委員會本身更能說明是反对法国同盟者的。何况，根据对英国輿論經常搖擺不定这一点的最肤淺的了解，我們深信：撤銷委員會或者解散議會（这被理解为似乎是根据波拿巴的要求对外国所作的巨大让步）一遇适当时机就会引起反应——对法国的影响进行最强烈的反抗。

讓我們从調查委員會头两次會議情况的报告中引证爵士德·雷希·伊文思將軍的供詞吧。在軍隊从英国出发以前不久，曾經派了一位軍需部的官員到馬尔他島去，他在島上惊異地知道：連一匹驢子都沒有买到。在斯庫塔里，屠宰牲口和烘制面包的必要准备工作也沒有做好。当时已經发现，財政部所訂的一些規章制度严重地妨碍着正常工作的进行。伊文思坚信在战争初期就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幻想，似乎用不着放一枪一切就能順利解决，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建立各种各样的倉庫。軍需部虽然受总司令監督，但是它同財政部（因而同首相）也有密切的联系，看来，軍需部的官員曾經得到过这样的启示：支付目前战争所必須的費用是一种狂妄行为。在瓦尔那，收容伤兵的准备工作几乎完全沒有做。显然，大家都深信在这次战争中不会出現伤兵。使軍隊能够立即开始野战的工作一点也沒有做。当俄軍越过多瑙河时，奧美尔-帕沙曾經向英軍求援，但是得到的答复是，軍隊沒有必要的运输工具（不用說，这是早就应当考慮到的）。政府依旧在等待着維也納的照会和議

定书，而沒有作很大的努力使軍隊准备行动。当然，要对这种拖拉行为負責的是政府，而不是軍需部。俄軍已經开始圍攻錫利斯特里亚，而英軍却仍然沒有做好出动的准备。軍隊的粮食供应由两个主管部門——軍需部和補給部負責。可是同軍需部发生冲突是常見的現象。軍需部的官員也許是財政部的好文书。而事实上他們也不过是从事与財政部的来往公文的抄写工作而已。在战时他們根本沒有用处。甚至要在距离瓦尔那 18 英里的地方采购粮食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瓦尔那軍需处的人員太少了，因而不得不撥出 100 名士官去担任軍需勤务。駐瓦尔那的兵士死亡率所以很高，主要是因为令人难受的、长期无所作为而产生的压抑情緒。

在談到駐克里木的部队的状况时，德·雷希·伊文思重复了一部分大家所已經知道的事实——缺乏粮食、軍服和板房等等。現在我們只举下面一段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見，这些意見說得很詳細，因而值得加以注意：

“还在向比利牛斯进军期間就領導軍需部、而現在是总補給官的年迈的非耳德，从来沒有和他商量过有关他（伊文思）的师的需要問題，而本来他是应当做到这一点的；他（伊文思）坚决要求履行这个职责，但是非耳德拒絕了他的要求。非耳德虽然是腊格倫的屬下，但同时与財政部有直接的公文来往。”“用炮兵和騎兵的馬匹来运送飼料是极不妥当的。結果是他（伊文思）的火炮最近只有半数能得到馬匹供应。”“从巴拉克拉瓦港到兵营的道路已被严重冲毀，泥濘不堪。要有 1 000 名兵士工作 10 天，才能使这条道路暢通，但是据他推測可以用于这方面的人力都派去挖战壕了。”

最后，伊文思說明了造成英軍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死亡的原因：

“我深信，如果兵士們不是由于挖战壕而疲劳过度，那末在运送軍服、粮食和燃料方面的缺点是不会引起軍隊中这种駭人听聞的死亡和生病現象的。

人体的疲憊衰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損失。兵士的人数一开始就根本不足以应付他們所投入的那种劳动。夜間劳动时过分緊張无疑是軍隊遭受一切災難的主要原因。”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7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3 月 10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 117 号

卡·馬克思 布魯塞爾回忆录

倫敦 3 月 7 日。帕麦斯頓的私人報紙“晨邮报”今天刊登了附有一篇簡短序言的著名的“布魯塞爾回忆录”的英譯文，在序言中推測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拿破侖亲王。報紙同时还刊登了一篇充滿着对拿破侖·波拿巴的恶毒攻击的社論，社論中不厌其煩地重复这样的論調：“回忆录”的作者可能“只是一个俄国奸細”。

“晨邮报”显然只是借口保护路易·波拿巴免受他的堂兄弟的陷害和保持对阿希尔·勒卢阿，alias [要不] 就是弗洛里芒，alias 就是德·圣阿尔諾的純洁无瑕的怀念而为英法之間的矛盾寻找資料。圣阿尔諾是在历代法国騙子手的历书中所常見的那些 Saints [圣徒]①，例如圣热尔門、圣乔治等等当中的一个。“晨邮报”的功績就是把这些 Saints 尊为圣者，并且把他們变成相应等級的圣徒。說什么“回忆录”向俄国人泄露了“軍事”秘密，这种論断完全是胡說八道。不論是英国、美国还是德国的評論界都沒有等待“回忆录”的出版來說明克里木远征是一种失策。虽然“回忆录”的功績是毫不客气地描繪了那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指揮作战的庸碌之輩的群像，但是“回忆录”並沒有比在它出版以前就出

① 这里是俏皮話；法国人名字中的“圣”按字义就是“圣徒”。——編者注

現的那些評論多說一個字。只有俄國人才希望對克里木遠征抱有幻想，“晨郵報”談到俄國的代理人和奸細時所表現出的那副激動樣子使人想起了埃斯基涅斯，此人一方面指責狄摩西尼，說他受了菲力浦的收買，而同時自己又吹噓說比別人先識破馬其頓皇帝的密謀。但是我們，當然決不是要把拿破侖·波拿巴親王說成是狄摩西尼。

卡·馬克思寫於 1855 年 3 月 7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55 年 3 月 11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 118 號

卡·馬克思

爱尔兰的复仇

倫敦 3 月 13 日。爱尔兰向英国报了仇：在社会方面，爱尔兰在英国每一个較大的工业城市、海港城市和商业城市中都分出了爱尔兰人区；在政治方面，爱尔兰在英国議會中有了“爱尔兰旅”。1833 年，丹尼尔·奥康奈尔痛斥輝格党人，說他們“下流、殘暴和冷酷”。但到 1835 年，他却变成了那些輝格党人的手中的最馴服的工具，因而，墨尔本政府尽管遭到英国大多数人的反对，毕竟还是靠着奥康奈尔和他的爱尔兰旅的支持，从 1835 年 4 月执政到 1841 年 8 月。为什么 1833 年的奥康奈尔和 1835 年的奥康奈尔竟是这样不同呢？原来有了一个所謂“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⁹³，根据这个协定，輝格党内閣保证对奥康奈尔在爱尔兰予以“保护”，而奥康奈尔則保证爱尔兰旅在議會中支持内閣。輝格党一被推翻，这位“丹王”^①就开始了 Repeal [取消合并] 的鼓动⁹⁴，但当托利党遭到失敗的时候，“丹王”就又变成了普通的律师。奥康奈尔逝世后，爱尔兰旅絲毫沒有失去自己的影响。相反，事实表明，它之所以有影响并不是由于个人的天才，而是由于一般的权力关系。英国議會中的两个历来的大党——托利党和輝格党——大体上是势

① 丹尼尔·奥康奈尔。——編者注

均力敌的。因此，改革后的议会里获得议席的新兴的小派别——曼彻斯特学派和爱尔兰旅——能在双方之间起着举足轻重和决定性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爱尔兰人区”在英国议会中的作用就是由此产生的。奥康奈尔逝世后，已经不能用 Repeal [取消合并] 的鼓动来发动爱尔兰群众了。“天主教”问题也只能偶尔利用一下。自天主教徒解放以后，这个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可用来进行鼓动的经常题目了。因此，爱尔兰的政治家们就不得不干当年奥康奈尔所极力回避和反对的事情，即触及爱尔兰的祸根——土地所有制关系并提出改革这种关系的要求作为竞选口号，也就是有助于他们被选入议会的口号。在得到议席之后，他们就立即设法利用佃农的权利问题等等（像从前利用 Repeal 一样），来缔结新的“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

爱尔兰旅推翻了得比内阁。它在联合内阁里取得了一个职位，虽然是一个次要的职位。它是怎样利用这个职位的呢？它帮助联合内阁“埋葬”了改革爱尔兰土地关系的措施，这些措施本来是托利党信赖爱尔兰旅的爱国精神并想把它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而自己决定提出的。帕麦斯顿作为一个爱尔兰出身的人，是深知自己的“爱尔兰人区”的，因而主动地在最广泛的基础上恢复了1835年的“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他任命爱尔兰旅的首领克奥为爱尔兰的 Attorney General [首席检察官]，任命也是由爱尔兰选出的天主教自由派议员菲兹吉拉德为 Solicitor General [总检察长]，又任命爱尔兰旅的第三个成员为爱尔兰 Lord Lieutenant [总督] 的法律顾问；这样，控制爱尔兰的整个司法总部现在就由天主教徒和爱尔兰人组成。原来联合内阁的 Clerk of Ordnance [军械局秘书] 蒙塞耳，虽然像门茨（北明翰选出的议员、军火制造商）所正

确指出的，連毛瑟枪和針发枪也分不清，可是帕麦斯頓在稍經犹豫之后，仍然批准他担任原来的职务：帕麦斯頓指示各郡郡长：凡是爱尔兰民軍中的上校职位和其他負責职位，一般都該优先委派給与議會內的爱尔兰旅有联系的爱尔兰僧侶所保护的人来担任。帕麦斯頓的政策已經收到了效果，serjeant〔皇家法官〕施氏的倒向內閣就是证明。此外，这还表現在阿思隆的天主教主教达到了使克奧重新当选的目的，以及天主教僧侶帮助了菲茲吉拉德再度当选。凡是在天主教下級僧侶把“爱尔兰的爱国精神”真当一回事并反对倒向政府一边的爱尔兰旅成員的地方，这些下級僧侶都受到知悉外交秘密的主教們的申斥。

一家托利党新教派的报纸悲戚地叹道：“帕麦斯頓勋爵与爱尔兰僧侶之間完全一致。如果帕麦斯頓把爱尔兰交給神甫，那末这些神甫所选出的議員就会把英国交給帕麦斯頓。”

爱尔兰旅为輝格党控制英国議會服务；輝格党以职位和薪俸給爱尔兰旅一点小恩小惠；天主教僧侶則以双方承认、巩固和扩大天主教势力为条件，让一方收买它和另一方出卖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实：随着爱尔兰人在英国政治方面的势力的增长，克勒特人在爱尔兰社会方面的統治在削弱。看来，議會中的“爱尔兰人区”和爱尔兰僧侶都同样沒有意識到，在他們背后，盎格魯撒克逊的革命正使爱尔兰社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这一革命就是爱尔兰的土地关系制度正在让位于英国的土地关系制度，小的租佃制度正在被大的租佃制度所排挤，正如旧日的土地所有者让位于現代的資本家一样。

准备了这一变革的主要事件是：1847年的饥荒，这次饥荒的結果大約死了100万爱尔兰人；向美洲和澳洲的移民，这次移民又

使 100 万人从爱尔兰的土地上消失而且还在继续使成千上万的人消失；遭到失败的 1848 年的起义⁹⁵，这次起义使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信心也丧失了；最后是迫使负债的爱尔兰旧贵族拍卖地产的议会法令，这一法令把这些贵族从土地上赶走了，正如饥饉夺走了小佃农、轉佃农和无地农民的生命一样。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3 月 16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127 号

弗·恩格斯 克里木事件⁹⁶

倫敦 3 月 16 日。由于官方的无能、英国内閣的阴谋和波拿巴主义的貪婪而产生的对克里木战事的幻想，与最近几个月盖滿战場的积雪一同开始消失了。在小日罗姆·波拿巴的一本小册子中直接提到：正当克里木的情况乱成一团的时候，

“总司令們奉政府指示掩飾和隱瞞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困难”。

这完全为这些將軍們的报告、特别是他們不止一次散布的定于某日强攻的謠言所证实了。自去年 11 月 5 日到今年 3 月初，拉芒什海峡两岸的公众一直等待着这场戏的最后一幕。而长期圍攻的結果，在兵营內也造成了以有見識的軍官們公开发表的意見为根据的某种輿論，总參謀部的先生們已經再也不能散布联軍将于某日进行强攻和城市将被攻占的謠言了。現在这已經欺騙不了任何一个兵士。防禦工事的性质，敌人火力的优势，圍攻部队的兵力与它所担負的任务的不相称，特别是北堡的决定意义，——这些現在在整个兵营內都知道得很清楚，以致老調不能重彈了。我們曾有机会讀到英国軍官的信件，他們对于这种情况是絲毫也不怀疑的。

从現有材料来看，到 2 月底，联軍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有

58 000 名法軍, 1 万名英軍和 1 万名土軍, 共約 8 万人。但是即使联軍有 9 万人, 也未必能以一部分兵力繼續圍攻, 而以另一部分兵力进攻巴赫契薩賴附近的俄軍。因为联軍能調往巴赫契薩賴的野战部队不会超过 4 万人, 而俄軍却至少能以 6 万人和它对抗, 并且那里地形开闊, 联軍不会再像在因克尔芒和巴拉克拉瓦之間时那样, 两翼都有无法接近的障地。因此, 联軍将继续被困于赫尔松涅斯, 直到他們能够以大約 10 万軍隊渡过黑河时为止。但是在这里又可以看出他們所陷入的那种恶性循环: 投入这个染有鼠疫菌的捕鼠器的部队愈多, 因病遭受的損失就愈大; 而从那里安然脱身的唯一办法, 却是派遣尽可能多的部队。

联軍想出的另一个計策, 是土軍向叶夫帕托利亚远征, 而現在看来, 这却是原先錯誤的直接翻版。土軍在叶夫帕托利亚附近刚一登陆, 便发觉自己的兵力过于薄弱, 不能向半島的腹地推进。看来, 这个据点周圍的工事占了很大的面积, 需要 2 万人左右的部队防守。而規定容納 4 万人的营垒也一定相当大, 以致当敌人来襲击时, 需要大約以半数的軍隊积极迎战。这样一来, 城市本身的防御大致就需要 2 万人, 而只剩下 2 万人可以进行野战。但就是这 2 万人, 也不能离开叶夫帕托利亚若干英里, 否則就会遭到俄軍从两翼和后方的各种襲击, 甚至与城市的联系也有被俄軍切断的危險。而俄軍却能够向皮列柯普和辛費罗波尔这两个方向退却, 而且由于是在本国領土上, 随时都能避免同来自叶夫帕托利亚方向的 2 万土軍进行任何較大的决战。因此, 距城市一日行程的 1 万俄軍, 随时都能威胁集中在城內的 4 万土軍。俄軍每后退 10—12 英里, 敢于离开作战基地的土軍人数将随之减少。換句話說, 叶夫帕托利亚是第二个卡拉法特, 所不同的只是卡拉法特背后是多瑙河而

不是黑海,并且是防御障地,而叶夫帕托利亚却是进攻障地。如果说在卡拉法特的3万人能成功地进行防御,并且能不时成功地进行一定距离的出击,那末用叶夫帕托利亚的4万人来防守这个由1000名左右的英法军扼守了5个月之久的地点就嫌太多,而用来采取任何进攻行动则又嫌太少。因此,俄军一个旅或者至多一个师,就足以箝制叶夫帕托利亚的全部土军。

所谓叶夫帕托利亚会战⁹⁷,就俄军方面来说只不过是一种侦察行动。约有25000—30000人的一支俄军部队,自唯一易于攻击的西北面接近叶夫帕托利亚,因为该城南面有海掩护,东面有变为沼泽的萨塞克湖掩护。城市西北是岗峦起伏的平原,根据地图和最近这次会战的经验来判断,它并不瞰制在野炮射程以内的城市。俄军比守军少1万人,并且两翼特别是右翼可能遭到海湾中军舰的射击,自然不会真正企图以强攻夺取城市。因此,俄军只限于进行积极的侦察。开始时他们在不会受到严重损失的距离上对敌人全綫进行了炮击;然后使炮队逐渐前移,并把纵队尽可能地留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以外;接着把纵队也向前推进,做成攻击的样子,以迫使土军暴露自己的兵力,随后在有墓碑和树木作掩护而能接近防御工事的地点真正地进行了攻击。在弄清楚土军工事的分布情况及其防御力量以及守军的概略人数以后,他们就退走了,这在其他任何军队中有头脑的统帅也都会这样做的。俄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至于他们的损失会比土军大,这是他们事先就料到的。这件极平凡的事却被联军司令官们夸大为辉煌的胜利。难道这不正说明了联军非常需要胜利而真正的胜利又太少这一事实吗?俄军让联军在叶夫帕托利亚支持了5个月,一直到土军到来,这无可争辩地是个重大的错误。俄军只要用一个旅和必要数量的十二磅炮就

足以把敌人赶到海里,而在岸上构筑一些简单的土质工事,就甚至可以把军舰阻擋于相当远的距离以外。如果联军舰队向叶夫帕托利亚派遣一支能压制俄军抵抗的分舰队,那末俄军就可以燒光这个地方,使它以后完全不能用作登陆部队的作战基地。但是在目前形势下,俄军只会乐于让叶夫帕托利亚留在联军手中。4万土军——土耳其拥有的唯一值得重视的军队的最后残余——被封锁在营垒中,俄军用1万兵力就可以把他们箝制在这里,而且土军还受到通常因人群聚集而随之发生的流行病和困苦生活的威胁;这4万被俄军箝制的土军,使联军的进攻兵力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法军和英军被封锁在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土军被困在叶夫帕托利亚,而俄军却与塞瓦斯托波尔北区和南区保持着顺畅的联络,——这就是在克里木5个月试验的光荣结果。与此有关的还有许多政治和军事情况,我们将在下次通讯中分析。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3月16日左右

载于1855年3月19日“新奥得报”第131号,并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4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5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弗·恩格斯 大冒險家的命运

这几天我們发表了从拿破侖亲王不久前出版的小册子中摘录下来的几段有趣的話；我們并不怀疑，讀者已經給予了应有的注意⁹⁸。这本小册子揭露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令人惊異的事实，即克里木远征是路易·波拿巴本人的創举，他沒有和任何人商量而独自制定了詳尽的远征計劃，为了避免瓦揚元帅的反对，他把計劃的手稿送往君士坦丁堡。当所有这一切真相大白之后，这次远征造成的最严重的軍事錯誤有很大一部分从远征的創举者的王朝利益中找到了解釋。在瓦尔那軍事會議上，圣阿尔諾不得不直接借用“皇帝”的权威硬要到会的陆海軍將領进行克里木远征，因为当时这位統治者本人曾把反对他的人的意見公开斥为“怯懦的建議”。来到克里木之后，圣阿尔諾却情願接受腊格倫所提出的向巴拉克拉瓦进軍的真正怯懦的建議，因为实现这个建議，即使不能直接到达塞瓦斯托波尔，那末不論到什么地方，至少也是接近了它的大門。沒有充足的器材就狂热地强行圍攻；迫不及待地开火，因而使法軍如此忽視自己工事的牢固程度，以致敌人在几小时內就把他們炮队的火力压下去了；兵士在塹壕里經常过度疲劳，現在已证明，这同其他原因一样促使不列顛軍隊崩潰；从10月17日到11月5日进行了沒有意义和沒有效果的炮击；忽視各种防御工事，甚至忽視比較巩固地

占領通往黑河的一大片丘陵地，因而在巴拉克拉瓦和因克尔芒附近遭到了損失，——所有这一切現在都得到了充分的解釋。波拿巴王朝需要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在最短期限內攻下它，联軍必須完成这个任务。康罗貝尔如果获得成功，就可以如願地成为法国的元帅、伯爵、公爵、亲王，并享有“濫用”公款的无限权利。反之，如果失敗，他就要成为出卖皇帝利益的叛徒，并将和他的同僚拉摩里西尔、貝多、尚加尔涅一样被流放。腊格倫是那樣的优柔寡断，以致不能不对这位与成敗有极大利害关系的同僚让步。

然而以上这些不过是皇帝的作战計劃的最微不足道的結果。法軍有 9 个师，即 81 个营被拖入這場毫无指望的战争。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最輕率的牺牲，却没有得到任何結果；塞瓦斯托波尔比以前更加坚固了；我們現在根据可靠的材料得悉，法軍的塹壕仍然在距离俄軍工事整整 400 碼远的地方，而英軍的塹壕还要远一倍。波拿巴派去視察圍攻作业的尼耶尔將軍声称，强攻是根本談不上的；他改变了主攻方向，把攻击的出发地点从法軍方面轉移到英軍方面。这样一来，不仅延长了圍攻的时间，而且把主要打击的矛头指向城郊，即使城郊被占領，它与城市之間仍被南灣隔开。简单地說，施展一个个詭計，玩弄一个个花招，并不是为了保持胜利的希望，而只是为这种希望装装样子而已。当事态发生了如此变化的时候，当大陆上即将爆发全面战争的时候，当一支新的波罗的海远征軍（这支远征軍在目前航行季节內应当取得某些成就，因此登陆部队的数量应比 1854 年的远征大得多）正在装备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固执的性格促使路易·波拿巴又把 5 个步兵师投入了克里木泥潭，而在那里兵士們甚至整个整个的团就像变魔术似的消失着。不但如此，他还决定亲自到克里木去，以便看看他的

兵士們是怎样进行最后一次强攻的。

这就是路易·波拿巴第一次战略性試驗使法国所陷入的处境。这个不知为什么自以为将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堪与其王朝奠基人媲美的偉大統帥，其实从一开始他就不过是一个剛愎自用的小人。路易·波拿巴仅掌握非常有限的情报，却制訂了向远在3 000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远征的計劃，他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就詳尽而秘密地制訂了这个計劃，并把它送給自己的总司令，而这位总司令虽然离攻击目标仅几百英里，但同样一点不知道敌人的抵抗力量，也一点不知道可能会遇到的障碍的性质。远征开始了，失敗接踵而来，就是胜利也没有带来任何結果；它将要造成的唯一后果，便是远征軍本身的复灭。拿破侖在自己的极盛时期也决不至于坚持采取这种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善于寻找其他出路，出敌不意地将自己的軍队調往新的攻击目标，依靠出色的成功的机动，甚至使暫时的失敗也成为有助于取得最后胜利的行動。如果他在阿斯佩恩⁹⁹抵抗到底，那会发生什么結果呢？只是在他沒落的时期，在遭到1812年的慘敗因而动搖了信心之后，他的坚强的意志力才变成了盲目的固执，例如，在萊比錫¹⁰⁰他就因此而死守那些他作为一个統帥而不可能不意識到是完全无用的障地。然而，这两位皇帝之間的差別就在于：拿破侖以此而告終的正是路易·波拿巴由此而开始的。

看来路易·波拿巴真的坚决要去克里木亲自督战，以夺取塞瓦斯托波尔。他的行期可能推迟，但是要使他改变决心，只有簽訂和約。事实上，作为他第一次軍事行动的这次远征关系着他个人的命运。但是可以认为，他真正出发的那一天，将是法国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革命的开端。欧洲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这一点，都劝他放棄此行。法国資產階級在提到他的克里木之行的时候，都不

禁发抖。但是这位斯特拉斯堡的英雄¹⁰¹是百折不撓的。他一生就是一个狂热的賭徒，近来又成了慣于下巨注的大賭徒，他正在凭着自己的“福星”，不顾最不利的时机而孤注一擲。此外，他也很清楚地了解，資產階級把他留在巴黎以求摆脱危机的希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不论他在不在巴黎，法兰西帝国的命运，现行社会制度的命运，都要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塹壕里决定。如果他不顾一切，在克里木赢得胜利，那末他的亲临战场将有助于（至少在欧洲輿論界面前）使他不再被看做是一个强盜，而是一位英雄；如果不是这样，那末，在任何情况下，他的帝国都会灭亡。他随身带着自己的竞争者和可能的继承人——身穿中将制服的小日罗姆·波拿巴这一事实，就说明他是估計到可能会有这种结局的。

目前克里木远征首先是为奥地利的利益服务的。如果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斗争再持续几个月，那末这个吞噬一个又一个軍的并且削弱法国和俄国力量的泥潭，将使奥地利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仲裁人，它在欧洲大陆的60万名兵士的巨大力量，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举足轻重，使它获得决定性的优势。然而幸亏还有阻碍奥地利获得这个最高权位的对抗力量。只要法国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支奥地利军队就将分裂为几个互相矛盾的部分。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克罗地亚人就将摆脱硬把他们拴在一起的鎖鏈，而重新形成旗帜不同、目标各异的两大陣营，以代替欧洲今日不稳定的偶然的联合和敌对。那时斗争将只在一方面是**民主革命**和另一方面是**君主反革命**之間进行。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3月16日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1855年4月2日

“紐約每日論坛报”第435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坛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

倫敦3月17日。小日罗姆·波拿巴的小册子揭露了以下事实：克里木远征是路易-拿破侖本人的創举，他沒有和任何人商量而独自制定了詳尽的远征計劃，为了避免瓦揚元帅的反对，他把計劃的手稿送往君士坦丁堡。当所有这一切真相大白之后，这次远征造成的最严重的軍事錯誤有很大一部分从远征的創举者的王朝利益中找到了解釋。在瓦尔那軍事會議上，圣阿尔諾不得不直接借用“皇帝”的权威硬要到会的陆海軍將領进行克里木远征，因为皇帝本人曾把反对他的人的意見公开斥为“怯懦的建議”。来到克里木之后，圣阿尔諾却情願接受腊格倫所提出的向巴拉克拉瓦進軍的真正“怯懦的建議”，因为实现这个建議，即使不能直接到达塞瓦斯托波尔，至少也是接近了它的大門。沒有充足的器材就狂热地强行圍攻；迫不及待地开火，因而使法軍如此忽視自己工事的牢固程度，以致敌人在几小时內就把他們炮队的火力压下去了；兵士在塹壕里过度疲劳，現在已证明，这同軍需部、运输部門、医务部門等等一样促使不列顛軍隊崩潰；从10月17日到11月5日进行了沒有意义和沒有效果的炮击；忽視各种防御工事——所有这一切現在都得到了充分的解釋。波拿巴王朝需要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而且要在最短期限內攻下它；联軍必須完成这个任务。康罗貝尔如

果获得成功，就可如願地成为法国的元帅、伯爵、公爵、亲王，并在財政方面取得无限的权力。反之，失敗就意味着他的官运的終結。腊格倫是那樣的优柔寡断，以致不能不对这位与成敗有极大利害关系的同僚让步。

然而这不是皇帝的作战計劃的最重要的結果。法軍已有 9 个师，即 81 个营被拖入这场毫无指望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几乎被认为輸定了；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最輕率的牺牲，却没有得到任何結果；塞瓦斯托波尔比以前更加坚固了；我們根据可靠的材料得悉，法軍的塹壕仍然在距离俄軍工事 400 碼远的地方，而英軍的塹壕还要远一倍。波拿巴派去視察圍攻作业的尼耶尔將軍声称，强攻是根本談不上的；他改变了主攻方向，把攻击的出发地点从法軍方面轉移到英軍方面，这样一来，不仅延长了圍攻的时间，而且把主要打击的矛头指向城郊，即使城郊被占領，它与城市之間仍被南灣隔开。簡單地說，制定一个个計劃，玩弄一个个花招，这一切并不是为了保持胜利的希望，而只是为这种希望装装样子而已。当事态发生了如此变化的时候，当大陆上即将爆发全面战争的时候，当一支新的波罗的海远征軍（这支远征軍这次应当取得某些成就，因此需要比 1854 年更多得多的登陆部队）正在装备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波拿巴又把 5 个步兵师投入克里木泥潭，而在那里兵士們和整个整个的团就像变魔术似的消失着。不但如此，他还决定亲自到克里木去，要不是可能性极小的和約或者波兰边界的严重事件迫使他改变决定的話，他就一定会到那里去。这就是波拿巴的第一次战略性試驗使他本人和“皇帝的”法国所陷入的处境。促使他到那里去的不仅仅是他的固执性格，还有那种认为法兰西帝国的命运要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塹壕里来决定的不祥的預感。直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馬連峨能證明霧月十八日的再版¹⁰²是正當的。

復辟的帝國不管怎樣努力摹仿自己的原型，還是不得不到處做和拿破侖所做的相反的事情，這種情況，真可以說是歷史的諷刺。拿破侖打擊的是同他作戰的那些國家的心臟；今天的法國攻擊的卻是俄國的 *cul de sac* [死胡同，偏僻地方]。希望不寄托在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而寄托在成功的 *coup de main* [突擊]、奇襲和冒險上面。第一和第二法蘭西帝國及其代表人物之間的整個差別就在於這種策略的不同。拿破侖慣於以勝利者的身分進入現代歐洲各國的首都。而他的繼承者則以各種借口——保護教皇、保護蘇丹、保護希臘國王——把法國的守備部隊分駐在古代歐洲各國的首都：羅馬、君士坦丁堡和雅典；結果絲毫沒有加強威力，而只是分散了力量。拿破侖的秘訣在於集中，而他的繼承者的秘訣卻在於分散。當拿破侖看到自己不得不在兩個不同的戰場上作戰時，例如在對奧地利的戰爭中，他就立即把自己的最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有決定意義的作戰綫上（在對奧戰爭中是斯特拉斯堡—維也納綫），而把較少的兵力留在次要的戰場上（意大利）；因為他相信，即使他的軍隊在次要戰場上打了敗仗，他自己在主要作戰綫上的勝利也能比任何直接的抵抗更可靠地阻擋敵軍的前進。反之，他的繼承者卻把法國的兵力分散在許多地方，而把一部分兵力集中在這樣的地方，在那里連最小的勝利（如果一般地說能夠取得這種勝利的話）也要付出最大犧牲的代價。除了在羅馬、雅典、君士坦丁堡、克里木的軍隊以外，還得向奧地利接近波蘭的邊境派遣一支輔助部隊，向波羅的海派遣另一支輔助部隊。這樣，法國軍隊起碼要在三個彼此相距最少也有 1 000 英里的戰場上作戰。按照這個

计划, 法国的兵力还在欧洲战争具有严重的性质以前, 就几乎全部使用上了。当拿破仑认识到他已经开始的行动不合理时 (例如在阿斯佩恩), 他便不坚持这一行动, 而善于找寻其他出路, 出敌不意的将自己的军队调往新的攻击目标, 依靠出色的成功的机动, 甚至使暂时的失败也成为有助于取得最后胜利的行动。只有在他没落的时期, 当他在 1812 年以后对自己丧失了信心的时候, 他的坚强的意志力才变成了盲目的固执, 使得他死守作为一个统帅很清楚知道是完全无用的那些阵地 (例如在莱比锡)。可是他的继承者却不得不一开始就做他的先辈最后才做的事情。对于一个来说是无法解释的失败的结果, 对于另一个来说则是无法解释的幸运的结果。对一个来说, 他所信赖的福星是他自己的天才, 对另一个来说, 却不得不以对自己的福星的信赖来代替天才。一个赢得了真正的革命, 因为他是能够实现这个革命的唯一人物; 另一个则赢得了重新唤起的对过去革命时代的回忆, 因为他承袭了这个唯一人物的名字, 因而他本身就是一种回忆。在第二帝国的内政中反映了它的作战方法的自命不凡的平庸, 在这方面也是外表代替了现实, “经济的” 远征决不比军事的远征更有成效, 要证明这些本来是并不困难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3 月 17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20 日

“新奥得报”第 13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馬克思
*报刊的反普魯士运动。
——斋戒日。——无产阶级和
資产阶级之間的冲突

倫敦 3 月 19 日。为了說明这里报刊对普魯士的态度,我們引证两段摘录——一段摘自托利党的机关报“先驅晨报”,另一段摘自帕麦斯頓的报纸“晨邮报”。“先驅晨报”在引证剛被任命为海軍副大臣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对他的朴次茅斯选民发表的演說时指出:

“罗伯特·皮尔爵士希望迫使普魯士采取明确的政策,他这样做是完全正确地表达了英国人民的感情,因为否則我們第二次远征波罗的海就会像第一次远征那样毫无結果。我們的議定书够多了,‘条款’也够多了;早就应当切断俄国的物資来源,引起俄国内部相应的反应了。”

“晨邮报”收到了下面一篇关于韦德尔將軍使命的巴黎通訊:

“韦德尔將軍把他接到的指示通知拿破侖內閣。这些指示是什么呢?韦德尔將軍告訴法国政府:(1)普魯士国王陛下对他的內弟——俄皇之死深感悲痛;(2)关于 12 月 28 日的議定书,普魯士完全同意西方各国的意見,并准备按任何傳統的形式签字,因此普魯士应在維也納會議上占有席位。然而全部問題在于:12 月 28 日的議定书并不使任何人承担任何义务,它不过是一份外交上的历史文件草稿而已。因为普魯士拒絕簽訂关于英国、法国和奧地利締結联盟的正式的条約,所以韦德尔將軍的使命可以认为是完成了。”

大家知道，泰尔和迦太基的統治者們在希望上帝发慈悲时，并不是拿自己去当祭品的，而是收买穷人家的孩子，把他們扔到燒得通紅的摩洛赫怀抱里。官方的英国規定人民要依順上帝，进行斋戒和为前任政府因其拙劣的管理方法而使人民受到的那些耻辱懺悔，为政府从他們身上榨取来而沒有作出一桩好事的数百万英鎊懺悔，为它昧着良心地从他們那里攫去的数千条生命懺悔。樞密院宣布最近这个星期三为懺悔和祈禱日，

“以便祈求寬恕我們的罪孽，用最恭順和虔誠的方式高举我們的祈禱文和給万能上帝的稟帖，恳求它賜福、保佑我們的武器和为女王和她所有的領地恢复和平”。

坎特布里大主教就像在举行宮廷仪式时的宮內大臣一样，頒布了一張进行这种宗教仪式的“表格”——規定怎样祈求万能上帝的表格。在英国国教会和也为俄国武器恳求上帝賜福的俄国国教会之間的这种惊人竞争中，优势显然是在后者这方面。

“先驅”¹⁰³指出：“沙皇的臣民讀了坎特布里大主教所規定的祈禱文，会感到这是胆小鬼的祈禱文；英国人讀了它，会感到这是伪君子的祈禱文；非国教徒讀了它，会理解为这是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所有教徒的教派祈禱文；而工人将认为它是有錢人的祈禱文，这些有錢人屬於同一教派，并且支持整个这种騙局，认为这种騙局能間接地帮助他們保留对官位的壟断。大主教的这种殷勤到肉麻的創作引起了全国各地工人階級的憤慨。对于工人階級來說，斋戒和节制日是一种現實的东西。而对于所有那些不相信貧穷的人來說，不論他們抱有什么其他信仰，这一天只是意味着在平日的食物中加上鸡蛋和魚湯，并且像星期日那样关上他們的企业和作坊的大門。对于工人來說，斋戒日意味着丟掉工資，因而也就意味着丟掉一頓午餐。”

在以前的一篇通訊中，我們曾指出：

“正是在資產階級同貴族階級的冲突达到頂点的时候，工业无

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冲突又会开始。”^①

上星期五在倫敦飯店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这一說法得到了明显的证明。在报道这次大会情况之前，我們想提供一些关于最近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議会內和議会外所发生的一連串冲突的材料。就在不久以前，曼彻斯特的厂主們举行了一次會議，会上决定宣傳取消官方的“工厂視察員”，据說是因为这些視察員不仅敢于对法定的劳动時間的切实遵守情况进行监督，而且甚至要求在工厂里认真貫徹議会为防止因采用机器而引起的威胁工人生命和健康的不幸事件所規定的那些措施。南郎卡郡的工厂視察員，著名的萊昂納德·霍納由于在最近一次报告中坚持在紡紗工厂执行法律所規定的措施而引起了厂主們对他的特別不滿。有一位工厂主——当然是和平协会¹⁰⁴的會員——天真地喊道：由于不遵守这些措施而“在去年死亡的总共不过五个成年工人”。

議会外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在下院內，亨利·哈耳福德爵士提出的宣布«stoppage of wages»制度为非法的法案在二讀时被否决了。«Stoppage of wages»就是名义工資中的扣款，这些扣款一部分就是因違反雇主所規定的工厂制度而处的罰金，一部分就是在还没有实行新制度的工业部門中，工人使用織布机或其他机器时应交納的租金等等。

上述制度特別盛行于諾定昂的織袜生产部門。正如亨利·哈耳福德爵士所证实的，这个地方的工人在許多場合下不但不能从企业主那里获得工資，反而經常要被迫付錢給他。原因就是各种各样的借口下从名义工資中扣的款太多了，以致工人还得偿付

^① 見本卷第 111 頁。——編者注

工資和資本家記入借方的那笔款項之間的差額。这样一来，工人就变成了雇主的債務人，不得不在更加不利的条件下同雇主重新訂立合同。現在他們还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奴，但是与农奴不同的，就是他們甚至連維持自己肉体存在的保证都沒有。

对于應該杜絕这种岂有此理的現象的亨利·哈耳福德爵士的法案，下院是在二讀时把它否決的，而对于英国著名的抨击文作家的儿子科貝特的法案，議院連理睬都不屑于理睬。因为这个法案所要达到的目的是：（1）以1847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代替1850年的十个半小时工作日法¹⁰⁵；（2）以每天在法定的工作日结束后强制停歇机器的办法使法律所規定的对工厂劳动時間的限制成为“现实”。

明天我們再来談談关于倫敦飯店中的群众大会的情况。

卡·馬克思写于1855年3月19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55年3月22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137号

卡·馬克思

*倫敦飯店中的群眾大會

倫敦3月20日。“晨報”幾個月來作了不少努力來組織一個名叫“國民和立憲協會”的鼓動團體，其宗旨是推翻寡頭政治制度。經過巨大的准备工作如發出呼呼和征集簽名等等後，終於在上星期五在倫敦飯店召開了公開的群眾大會¹⁰⁶。這一天就成了被大肆宣揚的新協會的誕生日。早在大會開始以前，大廳就擠滿了工人群眾，最後，當那些自己把自己選出來的新運動的領袖們來到時，他們好容易才在講台上找到了自己的席位。當選為主席的詹姆斯·泰勒先生宣讀了累亞德、德·雷希·伊文思爵士、韋克利、詹姆斯·杜克爵士和約翰·雪萊爵士等人的來信，他們表示完全同情協會的宗旨，但卻借口種種原因，不肯親自出席會議。然後又宣讀了“告人民書”。內容是論述東方戰爭進行的情況和內閣的危機。接着就聲明：

“每一個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中有才干的人，都具有擔負國家管理職務所必需的条件。”

這種對資產階級特殊奢望的笨拙的暗示遭到了響亮的噓聲。

“告人民書”中接着寫道：“這個協會的首要任務是要消滅貴族階級對行政權和國家职位的壟斷，因為這種壟斷對國家的最高利益是極其有害的。屬於次要任務的是廢除秘密外交。這個團體的特殊使命是向聯合王國的全体

选民呼吁，以便提醒他们要对那些受他们委托来保护国家的物质资源和自由的人进行必要的严密监督，尤其是不要再把自己的选票投给贵族阶级和财富的微不足道的代表及其傀儡。”

在这以后，比耳斯先生站起来，作了详尽的发言，为第一个建議辯护：

“由于国内情况危急，由于在篡夺了政府职权、壟断了国家职位和特权并给国家招来耻辱和不幸的目前寡头政治制度的条件下所作的任何改进尝试都已显然无望，因此有必要把人民联合起来以制止旧制度的继续存在……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名叫**国民和立宪协会**的团体。”

梅里勒榜的巨擘之一**尼科萊**先生支持这个建議。議員**阿普斯利·佩拉特**也以同样的精神发了言：

“人民将以**克倫威尔‘铁騎軍’**般的决心、稳健适度、坚韧不拔和不屈不挠的頑强精神担负起改革管理制度的事业。英国的选民如果决心**无报酬地**派遣廉洁正直的人到議會里去，那末他们就有充分的可能消灭一切舞弊行为。但是如果像埃布林頓勋爵那样的人只是因为他付出了5 000 英鎊（而他的倒霉的对手却白白花了3 000 英鎊）就可以代表梅里勒榜参加議會，那末英国选民就不可能指望会有廉洁正直的代表。”

接着議員**默姿**先生走上讲台，但在會議的坚决要求下他不得不让**乔治·哈里逊**（諾定昂的工人，宪章派）先发言。

哈里逊說：“这个运动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分配国家职位和撫恤金、并为比現存的寡头政体更坏的寡头政体打下基础的一种尝试。”

接着他宣讀了一个**修正案**，宣布土地贵族和金錢贵族同样是人民的敌人，并且声明，复兴国家的唯一手段是实行包括下列五項条目的**人民宪章**：普选权，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議會每年改选一次，取消财产資格限制。

厄內斯特·琼斯（宪章派領袖，出身于贵族家庭）支持这个修

正案,并且指出:

“人民如果支持这种以夺取政权和职位为目的的资产阶级运动,那末他们自己就破坏了自己原来的立场。毫无疑问,在讲台上有不少人是渴慕首相职位的 (cheers [表示赞同的喊声]), 有很多人是喜欢 in partibus [異区的]①薪高事少的职位的 (cheers)。然而,人民不应当同布莱特和科布顿之流以及货币资本的代表締結联盟。不是土地贵族,而是资本的代表抗拒人道的工厂法;正是他们否决了反对 stoppage of wages (名义工资中的扣款) 的法案,他们阻撓通过有益的协会法——也正是货币和工业资本的代表早在一切人之先就力图压迫和凌辱人民。从我这方面来说,我随时都准备参加旨在摧毁戴文希尔公爵和其他等人势力的运动,但决不是为了让代表工厂尘埃的公爵和代表紗錠的助爵来代替他们。(表示赞同的喊声和笑声) 有人说,工人运动、宪章运动是死气沉沉的。我要向资产阶级的改革家先生们表明:工人阶级是充满生气的,它有足够的力量来摧毁任何一个运动。如果资产阶级不把人民宪章及其五项条目列入它的纲领,工人阶级就不会让资产阶级动一动。资产阶级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吧——他们休想再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

经过短时间的争辩后,在群情激昂的情况下主席企图摆脱修正案,说这不是修正案,但是不久他还是被迫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修正案被提付表决,并且在至少是 10:1 的情况下以多数票获得通过。人群中发出了响亮的表示赞同的欢呼声,人们挥舞着帽子。主席宣布修正案通过后,在哄堂笑声中表示相信大多数出席大会的人毕竟是拥护成立“国民和立宪协会”的。因此,发起人将着手进行这个协会的下一步组织工作,稍后再向人民发出要求支持的呼吁。这时,他暗示了一下(纵然是用隐讳的形式),今后为了避免别人的反对,只允许持有会员证的人出席会议。兴高采烈的宪章派称赞了主席,对他表示感谢,于是群众大会就结束了。

① 原意是:“不信教地区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地区的纯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就加有这种字样。——译者注

不能否认,甚至从被公开宣布的协会的原则这方面来看,邏輯是在宪章派这方面。协会想通过向議會而不向內閣呼吁的方式推翻寡头政体。但內閣是什么呢?是議會多数人的亲信。或者它想通过向选民呼吁的方式来推翻議會嗎?然而議會是什么呢?是自由选举出来的选民代表机关。可見,出路只有一条——扩大选民范围。那些拒絕接受宪章因而拒絕把这个范围扩大到包括全体人民的人,自己就供认了他們想用新的貴族制来代替旧的貴族制的意图。他們想以人民的名义同現在的寡头政体打交道,同时在向人民发出号召时又想避免使人民自己登上舞台。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0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3 月 24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141 号

卡·馬克思 英国报刊的消息

倫敦 3 月 20 日。紐卡斯尔公爵发布了召回卢肯勋爵的命令，潘繆尔勋爵发表了腊格倫反对卢肯的信件，而哈丁勋爵这位卓越的英軍元帥則拒絕卢肯提出的进行調查和軍事审判的要求。卢肯勋爵不顾两位大臣——克里木的总司令和倫敦最高統帥的反对，昨天在上院作了詳細的說明，来证明要对巴拉克拉瓦城郊輕騎兵复灭負責的不是他，而只是腊格倫，证明阿伯丁內閣和帕麦斯頓內閣想为克里木的这位随和、笨拙和好說話的总司令开脫責任而把卢肯勋爵交給憤懣的公众去懲罰。本来就应当設法使这个大怪物——社会得到滿足的。在这个問題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从卡瑟克特將軍尸体上找到的一封沒有写完的信，这封信是寄給他妻子的，写信的日期是 11 月 2 日，即因克尔芒会战¹⁰⁷前三天，也就是騎兵在巴拉克拉瓦城郊进行攻击后的一星期。在这封信里直截了当地写道：

“完全相反，不論是卢肯勋爵，或是卡迪根勋爵，都不应受到譴責，因为他们只是服从命令。”

“泰晤士报”在今天的一篇关于維也納會議¹⁰⁸的文章中提出了下面一个很能說明問題的意見：如果會議能認真进行，那末主要障碍将来自土耳其人方面。必須力爭苏丹，而不是沙皇在四項條款範圍內作出重大的让步。

前天“泰晤士报”又以下列“可靠”消息蒙騙讀者：还在3月19日以前就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强攻。这种从无可救药的悲观絕望到建立在迷信基础上的愉快乐观的突然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泰晤士报”开始它的克里木战局来反对已被推翻的联合內閣，以及在成立調查委員會的必要性問題上它說 «ceterum censeo»¹⁰⁹ 恰好是在这样的時候，即格萊斯頓建議廢除印花稅和減輕那种郵資是一辨士的報紙的重量，因而对它的壟斷造成了威胁的時候；他建議把这个重量限制为4盎斯，也就是比一份“泰晤士报”的重量还輕。格萊斯頓剛被推翻，他的继任人乔·康·路易斯爵士就撤回了这个法案，同时“泰晤士报”希望一切都能照旧，因此突然放棄了它对克里木事件的忧郁看法，而代之以一幅动人心弦的、閃耀着胜利希望光芒的图景：仅仅在三个月以前这家報紙还对它致悼詞的那支軍隊在这里又活动起来了。今天“泰晤士报”的情緒又轉为忧郁，因为昨天乔·康·路易斯爵士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又提出了廢除報紙印花稅的法案。“泰晤士报”大声喊道：这是往事述評文作者对新事物的憎恨！大家知道，路易斯过去是“爱丁堡評論”杂志的发行人。

一旦下院詳細闡述这个法案，我們再来談这个法案；現在我們只指出一点：这个法案是对曼彻斯特学派的让步，而这个学派的功績就是孜孜不倦地鼓吹在报刊方面实现竞争自由。帕麦斯頓內閣对曼彻斯特学派的让步是 *captatio benevolentiae* [企图博得好感] 以防解散下院和进行新的議會选举。

卡·馬克思写于1855年3月20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55年3月23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139号

卡·馬克思

*議會新聞：上院关于 普魯士的辯論

倫敦3月21日。在上院昨天的會議上，利物浦和卡斯尔里的旧同僚林德赫斯特勋爵终于提出了他早就答应提出的“关于普魯士对維也納會議的态度”的提案。他指出，最近有两个情况使这个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即垂死的俄国皇帝写信給普魯士宫廷和亚历山大二世发表宣言；亚历山大二世在宣言中保证贯彻彼得、叶卡特林娜、亚历山大和他父亲的政策。俄国本身是怎样想像普魯士的政策，这可以从波茨坦-迪-博尔哥在1828—1829年战争爆发前不久拍給涅謝尔罗迭的一封秘密急电的下列一段摘录中看出。在这封急电中有一段写道：

“如果俄国对土耳其采取强制手段，那末就有一切理由指望：普魯士决不会在这方面阻撓它；相反，普魯士的独立自主同时又是和睦亲善的立場将对其他各国发生强烈的、抑制性的影响，使它們不得不同意符合于俄国的尊严和利益的結果。必須在某种程度上让柏林內閣知道我們的意图，并使它相信，我們分配給普魯士担任的角色将促使双方君主和双方宫廷之間的真誠关系得到巩固。”

林德赫斯特高声喊道，难道在过去就能够未卜先知地預言最近半年或一年来普魯士宫廷所奉行的那种方針嗎？誠然，普魯士

在12月5日、1月13日和4月9日的議定书上签了字。这些議定书的目的是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使苏丹的独立和土耳其的完整得到保证。普魯士宫廷有沒有遵照这个目的行事呢？曼托伊費尔男爵曾經就用于軍事行动的3000万塔勒借款問題声明：在上述議定书中普魯士对俄国政策所表示的意見就是认为俄国作了一种很不正义的行为，但是普魯士并不认为自己有責任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和积极参加战争。难道这是一个大国的語言嗎？难道普魯士簽訂了1840年和1841年的条約而不承担保护土耳其的直接义务嗎？曼托伊費尔男爵又补充說道：德国的独立或德国的利益并不因发生了冲突而受到損害，因此普魯士并不认为自己应当作出任何牺牲。然而曼托伊費尔男爵自己在另一个文件里又坚决主張相反的东西。不过，要是沙皇占領君士坦丁堡，那談論德国的独立和德国的利益也就沒有必要了。它們都应当对优势力量让步。接着，林德赫斯特順便提了一下陆軍大臣博宁的辞职、从倫敦召回本生大使和拒絕草拟普魯士議会对御前演說的答詞等問題后，就把話題“轉到这出政治悲剧的第二幕”。他說，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奥地利认为要求俄国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是可能的。这个要求拟就后就送到柏林去签字了。柏林給維也納送来了一些反建議，这些反建議根本不能接受，但是需要花費時間，因为还得把它們提交盟国研究。当时俄国已經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但是以軍事上的理由繼續占領着它們一部分領土。并且俄国还声明：今后打算采取单纯防御性的立場；于是普魯士就退出了联盟，它肯定地說俄国已經滿足了一切合理的要求。从这时起，普魯士就使用一切手段来破坏奥地利的計劃。抱着这个目的它向联邦議会和德意志各邦提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順利）建議。就在这个时候，俄国对德意

志两个邦拒絕参加同盟国公开表示感謝。他(林德赫斯特)現在又把話題轉到这出戏的第三幕和最后一幕来了。同盟国确定8月8日在維也納会談,以决定向俄国提出哪些要求作为任何初步談判的基础。同平常一样,普魯士接到了这方面的通知,而且通知书不只接到一封。它沒有直接拒絕参加会议,但是实际上並沒有参加。由于普魯士的缺席,同盟国沒有草拟議定书,而是签署了一个照会,其中提出四項条款作为未来談判的基础,同时要俄国接受这四項条款,但是俄国拒絕接受。而普魯士方面却公布并散发了一个文件,反对上述四項条款。与此同时,它还繼續劝說联邦議會和德意志各邦的宮廷,以阻止德意志各小邦参加同盟国。12月2日的条約簽訂后,普魯士得到通知說,可以給它以加入这个条約的机会。普魯士拒絕加入,但声明它准备单独同法国和英国簽訂类似的条約。上述国家对此表示同意后,普魯士在历次談判过程中明明知道法国和英国必然不会同意,却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議,要求无止境地進行修改。当他(林德赫斯特)談到普魯士时,仅是指官方的普魯士。他知道,普魯士的人民絕大多数是对俄国有反感的。可是完全不能理解,普魯士在拒絕加入12月2日的条約后,又怎么能要求別人邀請它参加維也納的談判。他希望各同盟国不論在何种借口下都不要讓普魯士代表参加,否則俄国在維也納會議上就不是一票,而是两票了。普魯士的外交政策从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起就沒有改变过。他提起了1794年、提起了奧斯特利茨会战前后不久的那个时期等等。

克拉倫登勳爵。——他只打算对英国和普魯士之間談判的消息作几点补充。在俄国政府拒絕了同盟国提出的条件后,曾經召集过有关各国大使的會議,但是會議始終沒有开成,因为普魯士政

府的代表不願參加。雖然後來普魯士駐倫敦大使對克拉倫登聲明：他的政府打算給予它駐維也納大使以所需要的許可令，但是他（克拉倫登）回答說：“現在太晚了。”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的通信是對俄國有利的。還在12月2日的條約簽訂以前，就曾經邀請普魯士參加這個條約，但是沒有結果。普魯士要求不附帶任何條件地允許它參加新的會議，其理由說是：這次會議是前一次尚未結束的、普魯士根本不想退出的會議的繼續。對於後面這種說法，英國政府引證了這樣一個事實：會議由於普魯士不願屢次邀請而不願參加，因而已經一度中斷。何況新的會議根本不是舊的會議的繼續，因為奧地利在10月和11月向英法兩國提出重新召開會議的要求時，英法已經對它作了答復，言明簽訂議定書和舉行會議的時間已經過去，但是如果奧地利同意和它們簽訂軍事條約，那它們要看看，和平能否爭取到。這樣就產生了12月2日的條約。後來曾經表示準備同普魯士簽訂單獨的條約。

“但是，讓普魯士享有一切特權而不與我們分担任何危險；允許它不附帶任何條件地參加可能以和平告終、但也可能引起更大規模戰爭的會議；在普魯士還沒有就它的目的和政策發表任何聲明以前，對於現在或必要時它是否會同我們結成聯盟這一點還沒有把握以前，對於它將作為中立國家，還是作為敵對國家，還是作為友好國家來出席會議這一點還不了解以前，就允許它參加會議——這些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克拉倫登說，普魯士後來派出的專門代表團不論是在倫敦或是在巴黎都受到了同樣的善意接待，但是談判暫時還沒有得到什麼結果。他畢竟沒有認為談判已經中斷了。只不過是在三天以前才提出了新建議。可惜，維也納會議仍然是在普魯士因其本身的行为而受到排斥的情況下開幕的。像普魯士這樣的大國是不能把

自己关在德国这个狭窄範圍內的。有人曾經不止一次地向普魯士提出警告，反对过这种态度，但普魯士却总是回答說：它的政策就是和平。而实际上它的政策“既非欧洲式的，又非德国式的，也非俄国式的”；与其說它是要威胁俄国，不如說它是要妨碍奥地利。而且一旦有人拿欧洲的重大利益作为賭注的时候，普魯士毕竟不能长期坚持它的閉关自守的政策。它不能站到俄国方面，因为这同普魯士和德国的民族感情有抵触。普魯士十分清楚地懂得：如果它站在俄国方面反对奥地利，它就会成为俄国的附庸。而支持奥地利普魯士又不願意。相反，它对奥地利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

“因此我断定：普魯士采取了閉关自守和虛伪的态度。这种做法也許是它的敌人所喜欢的，但是它的盟邦和它本国人民中的爱国者却深感遺憾。”

最后克拉倫登勳爵保证，他将竭尽全力以爭取普魯士的合作。

威·格萊安勳爵在下院質問首相道：

“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再度当选时說过，不恢复波兰和匈牙利，就不能滿意地解决东方問題。不知奥地利大使有沒有要求克拉倫登勳爵对这些話作解釋。”

帕麦斯頓勳爵沒有对这个問題作任何答复，而只对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职位表示高兴。至于談到匈牙利，他說奥地利早就知道，把匈牙利从帝国分离出去，英国就会认为是对欧洲的一种很大的不幸，因为奥地利帝国作为一个統一的整体在欧洲中心的存在被当作是保持均势的一个重大因素。至于談到波兰（这时由于帕麦斯頓在回答时作了片刻停頓，在繼續講話时又用了一种奇腔怪調，因而引起了哄堂大笑），他說，他的看法是，在波兰目前的制度和現在被占領的情况下，它对德国是一个經常的威胁。然而現在維也納正在討論的各項条款並沒有包括任何关于改

組波兰的条文。但是，英国和法国将根据情况或战局的发展而保留这样的权利：以他們认为对欧洲未来的安全來說是重要的其他条文来补充作为目前进行談判的基础的四項条款。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1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3 月 24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141 号

弗·恩格斯 拿破侖最近的詭計¹¹⁰

“如果克雷茲渡過加利斯河，他必將毀滅遼闊的帝國。”這個回答呂底亞國王的德爾斐神諭^①，現在完全適用於路易·波拿巴的克里木之行。他的親征的確將招致帝國的毀滅，不過毀滅的不是俄羅斯帝國，而是他自己的帝國罷了。

特殊的、不正常的局勢要求採取不尋常的行動。任何人如果處在他的地位，進行這種成功和失敗的可能性為一比十的親征，都會被看做是瘋子。路易·波拿巴大概完全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仍不得不親征。他是整個遠征的倡議者；他把聯軍引到了現在所處的不妙境地，因此，他應對全歐負起使聯軍擺脫這種處境的責任。要知道這是他第一次重大的軍事偉業，其結局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將影響他作為一個統帥的聲譽。他對這次遠征的成敗，恰好要用自己的皇冠負責。

此外，還有一些次要原因同樣地使他把這次冒險的克里木親征看做國家大事。兵士們在東方已經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們對爭取新帝國的軍事榮譽已經大感失望。在瓦爾那和巴扎爾吉克，假查理大帝的帕拉丁之流^②被自己軍隊贈以“猴子”的綽號。

① 德爾斐為古希臘城市，因阿波羅神廟的神諭出名。所謂神諭就是祭司借神靈之名所說的話，它是為貴族服務的。——譯者注

② 帕拉丁是中世紀長篇小說和長詩中查理大帝最親密的戰友的名字，此處指路易-拿破侖的親信聖阿爾諾、埃斯潘納斯等人。——譯者注

«A bas les singes! Vive Lamoricière!» [“打倒猴子! 拉摩里西尔万岁!”]——朱阿夫兵在被圣阿尔諾和埃斯潘納斯派到保加利亚荒原而将死于霍乱和寒热病时这样高声喊道。現在，在軍隊里人們已不單是把失寵的將軍們的榮譽和名望同目前率領法軍的指揮官們值得懷疑的聲譽加以對比了。小日羅姆·拿破侖在東方任職期間的奇怪行為¹¹¹使富有經驗的阿尔及利亚兵士記起了奧爾良親王們在非洲時截然不同的行為；那些親王，不論人們怎樣議論他們，總還是身先士卒履行自己軍人的天職的。當然，年輕的奧馬爾和年輕的拿破侖之間的鮮明對照足以促使兵士們議論：要是奧爾良王族仍然當政，親王們定會同我們并肩作戰，同我們共患難，要知道他們都不叫拿破侖！這就是兵士們說的話。怎麼能讓他們沉默呢？這個“被允許穿師長制服”的人，竟然損害了同拿破侖的名字連在一起的軍事傳統；而皇室其餘的成員不是十足的文人、自然科學家、教士，便是些道地的冒險家；老日羅姆由於年邁不能算數，況且他昔日的戰功並沒有給他帶來多大榮譽。由此可見，路易-拿破侖除了親自出馬以外，別無他法。此外，關於當前克里木之行的消息已傳到法國的窮鄉僻壤，並且受到農民的热烈歡迎，而路易-拿破侖正是被農民擁上寶座的。農民們確信，被他們擁上寶座並且也叫做拿破侖的這位皇帝，的確應當是 *Napoleon redivivus* [再生的拿破侖]；在他們看來，路易-拿破侖應當率領軍隊，他所率領的軍隊決不會次於大軍的軍團。塞瓦斯托波爾所以沒有攻下來，就是因為皇帝還沒有到那里去；只要他在那里一出現，俄國要塞的棧堡就會像耶利哥的城市一樣土崩瓦解。因此，路易-拿破侖即使不願意去，也不能收回自己親征的諾言，因為關於他這次出征的消息已廣泛地傳開了。

因此，准备工作正以全力进行。为了加强已經在克里木的 10 个师，应当再增派 4 个师，其中 2 个师应在战局刚开始时在君士坦丁堡組成預备軍团。这 4 个师中，1 个师将由皇家近卫軍組成，另 1 个师将由精兵混成連即巴黎軍团的擲彈兵和輕騎步兵組成；其余 2 个师（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或者已經开始上船，或者正在土倫和阿尔及尔集結。这些增援的生力軍到达后，法軍在克里木的人数将达 10—11 万人左右；而到 4 月底，15 000 名皮蒙特人和大批不列顛增援部队也将开到那里。但是，未必能指望联軍在 5 月会有 15 万人开始作战。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变成了一个大大墓地，并且是非常荒蕪的墓地，那里的情况是，随着炎热或潮湿天气的到来，它必将成为各种各样流行病的发源地；不論那里有多少軍队，疾病将非常猖獗，死亡率也一定会很大，因而联軍将遭到比目前更为可怕的損失。在全部增援部队到达以前，联軍的作战部队沒有任何可能从現在的陣地向前推进，而增援部队要在 5 月中旬才能开到，可是那时流行病将十分猖獗了。

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联軍也不得不把 4 万人留在塞瓦斯托波尔南区附近，因此只有 9—10 万人能用来同俄軍野战部队作战。只要联軍不进行特別成功的机动，而俄軍又不犯严重的錯誤，那末这支軍队从赫尔松涅斯出动后首先就应击潰俄軍，将它赶出辛費罗波尔，然后才能同叶夫帕托利亚附近的土軍会师。我們假定实现这一会师沒有特別的困难，但是土軍能够派給这支五花八門的法、英、皮蒙特联軍的增援部队至多也只有 2 万人，并且还不完全适于野战。这样，总共将組成一支約 12 万人的軍队。很难設想，这样一支軍队在被俄軍破坏过的、缺粮的以及主要財富即牲畜无疑被俄軍赶到皮列柯普去了的这一地区內能够生存下去。只要軍队前进

一步，就必須運去大量飼料并派出大批部隊保障翼側和通往海港的交通綫。迄今尚未參戰的俄國非正規騎兵將開始用襲擊的方法疲憊聯軍。與此同時，俄軍也會調來增援部隊；由於法國對最近6個星期的軍事准备工作大肆宣揚，俄軍得以及時採取必要的措施。無疑，俄軍從沃倫和貝薩拉比亞的部隊中或從新編的預備部隊中抽調的2—3個師，目前正開往克里木，以保持那里原有的兵力對比。

可是，聯軍却不能不用最大的一支部隊從北區封鎖塞瓦斯托波爾。這又需要用去2萬人，剩下的部隊，在供應上這麼困難，而且還累贅地帶着一大串運載彈藥和糧食的車輛，因此未必有足夠的力量把俄國野戰部隊趕出克里木。

十分明顯，路易·波拿巴企圖在克里木靠勝利來取得拿破侖的聲譽，但是這棵勝利之樹卻長得相當高，要攀折它並不是那麼容易。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指出的一切困難都只是局部性的。反對這種在克里木的作戰方法的主要理由，歸根到底是這種作戰方法把可以使用的法國全部武裝力量的四分之一用在次要戰場上，而在这里即使取得最大的勝利，也不能解決任何問題。這種在奪取塞瓦斯托波爾問題上不顧一切的、已經發展到某種迷信地步的並且賦予成敗以虛構的意義的頑固態度，正是整個作戰計劃的最根本的錯誤。而賦予克里木整個事件以虛構意義，反過來就又使這一計劃的倒霉的制定者吃到加倍的苦頭。對亞歷山大來說，塞瓦斯托波爾遠非整個俄國，但對路易·波拿巴來說，不能奪取塞瓦斯托波爾便等於失去法國。

弗·恩格斯寫於1855年3月23日左右

作為社論載於1855年4月7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4358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会战¹¹²

今天本报刊登了法、英、俄官方关于塞瓦斯托波尔会战的报道。这一极其重要的事件值得我们作某些说明和评论，以作为对官方文件的补充。

大约一个月以前，俄军的出击通常都是成功的，这使我们作出了如下结论：塹壕已推进到使被围者和围攻者势均力敌的距离上^①。换句话说，塹壕已构筑到这样近的地方，以致俄军在出击时能够向任何一段塹壕集中至少相当于联军在1—2小时内才能调集的兵力。既然一两个小时就足够用来把倒刺钉钉入火炮的火门以破坏炮台上的火炮，联军自然不能使自己的接近壕再向前推进。从这时起，直到可以用来替换一部分英国步兵和加强塹壕警卫的法军3个旅（第八师的1个旅和第九师的2个旅）开到时止，联军停止了积极的行动。同时，工程部队的将军尼耶尔和琼斯来到后，又使围攻作业展开了，并纠正了主要由于法国比佐将军的固执和由于英军步兵人数不足所造成的错误。联军构筑了新的接近壕，特别是在离马拉霍夫岡上的俄军工事约300码的英军配置地段上，构筑了新的平行壕。一些新构筑的炮台已非常逼近因克尔芒，以致只要一开火，便能从后方射击或以纵射火力射击俄军的部分炮台。

① 見本卷第60—61頁。——編者注

俄軍为了对付这儿綫新的工事，采取了非常巧妙和大胆的行动。

从平面图上可以看出，俄軍的防綫由卡兰亭灣到內港，再由內港到基連灣入口处，成半圓形圍繞着城市。基連灣是由一条深谷形成的不大的海灣，这条深谷从大灣即塞瓦斯托波尔停泊場一直远远地伸向联軍兵营所在的台地。这条山谷西面的許多高地构成了俄軍的防綫；其中最大的高地是馬拉霍夫岡；这个岡由于居高临下而成为俄軍整个右翼的鎖钥陣地。在这条山谷和基連灣的东面也有一个高地，它完全处在俄軍炮台和軍艦的炮火射程內，又由于联軍未能彻底破坏塞瓦斯托波尔和因克尔芒之間的、为停泊場北面的堡垒和炮台的火力所掩护的交通綫，因而它始終未被联軍占領。但是，由于联軍把自己的炮队設置在馬拉霍夫岡东面和东南面的陣地上，能从翼側和后方威胁俄軍的防綫，所以这个双方都未占領的高地便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俄軍在2月20日夜間派了一个作业队到那里构筑由俄軍工程师預先設計好的多面堡^①。21日晨，联軍看到了一道长壕及其外面的胸墙，但是他們大概完全不理解这些工事的作用，因而并没有阻拦俄軍施工。到次日晨，多面堡已經筑成，当然并没有完全筑成，因为以后的战事表明，护堡壕的断面即护堡壕的深度以及胸墙的坚固程度还很不够。这时联軍开始明白，这个堡垒的位置非常优越，使俄軍能以纵射火力射击他們的纵射炮台，从而使这些炮台几乎失去作用。工程师們說，必須不惜任何代价夺下这一堡垒。因此，康罗貝尔极其秘密地建立了一支約由1600名朱阿夫兵和3000名海軍陆战队組成的强攻纵队。由于作战命令是在深夜突然下达的，因此部队在指定地点集結时耽擱了一下，当朱阿夫兵終於带头发起攻击时，已經是2

^① 色楞格多面堡。——編者注

月 24 日清晨 2 时了。他們經過短時間的跑步后，到达离护堡壕 20 碼的地方。与通常进行这种攻击时一样，沒有允許放枪；兵士們奉命取下枪上的火帽，以免进行不必要的和过早的射击。突然傳出俄軍下达口令的声音，多面堡內一支强有力的部队行动起来，他們把枪放在胸墙上，对进攻的纵队进行齐射。由于夜暗和在塹壕內作战的兵士根深蒂固的常規——任何时候都只通过胸墙向正前方射击，这一齐射仅能使进攻纵队正面不寬的先头部队遭到輕微的損失。朱阿夫兵的前进几乎一点沒有被尚未筑好的护堡壕和垒墙的緩坡所阻滯，他們轉瞬間就冲入了多面堡，端着刺刀扑向敌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过了不久，朱阿夫兵攻占了半个多面堡，稍后，俄軍便完全放棄了該堡。而在这时，跟在朱阿夫兵后面不远的海軍陆战队不知道是迷了路还是由于其他某种原因，在高地斜坡上停了下来。他們在这里遭到俄軍纵队两翼夹攻，虽然他們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仍被俄軍赶下高地。显然，在战斗时或战斗后不久天就亮了，因为俄軍曾仓促地撤离高地，把多面堡留給朱阿夫兵，随后便以所有能利用的火炮轰击朱阿夫兵。有一段时间，朱阿夫兵臥倒了，而一些随伴他們的志願兵射手則爬向馬拉霍夫岡上的工事，企图对准炮眼向俄軍炮手射击。但由于俄軍炮火过于猛烈，不久朱阿夫兵便不得不退到朝向因克尔芒的高地斜坡上，在那里可以避开大部分炮台的火力。他們肯定地說，他們把自己的全部伤員都撤回来了。

在这次規模不大的战斗中，朱阿夫兵在蒙奈將軍的指揮下作战非常勇敢，而俄軍則以固有的頑强精神很巧妙地作战。俄軍的兵力为两个团，即色楞格团和沃倫团，这两个团的人数在数次作战之后每营已不超过 500 人，共計 4 000 人。它們由赫魯朔夫將軍

指揮。俄軍的行動如此成功，以致法軍宣稱，似乎俄軍已預先了解了他們的整個攻擊計劃。俄軍對海軍陸戰隊的攻擊幾乎轉瞬間即獲全勝；他們由未完工的多面堡撤退後，就把倒霉的、失去支援的朱阿夫兵置於炮兵的猛烈射擊之下，而當戰鬥還在多面堡內進行時，炮兵却一彈未發。

康羅貝爾將軍發現，這次失敗在他的軍隊中發生了強烈的影響。已經不止一次表現出來的急躁情緒，現在強烈地爆發出來了。兵士要求強攻城市。“背叛行為”一詞——這是法軍一貫用來解釋每次失敗時的用詞——在軍隊中響亮地喊出來了，甚至还指出了把法國軍事會議的秘密決議洩露給敵人的背叛者的名字；人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根據就認為這個背叛者是福雷將軍。康羅貝爾非常慌張，急忙寫了一道命令，把整個行動說成是輝煌的、雖然是相對的勝利；同時又給腊格倫勳爵送去一份文件，建議立即開始強攻，而這一建議當然被腊格倫勳爵拒絕了。

俄軍守住了這一新的多面堡，並進行了加修。這個障地非常重要。它保障通向因克爾芒的交通綫並保障從那方面運送給養。它還從翼側威脅着聯軍圍攻工事的整個右側，只有構築新接近壕才能消除這一障地的危害性。不僅如此，所有這一切還證明，俄軍不僅能守住自己的障地，並且能夠前進到障地以外。2月下半月，俄軍在新多面堡附近對着聯軍的工事建立了反接近壕體系。但是，報告里沒有指出這些工事的準確方向。不管怎樣，在塞瓦斯托波爾有上面所說的那兩個基干團，這就說明到目前為止僅由海軍陸戰隊和水兵組成的守軍已得到很大的補充，並且現在已有足夠的兵力來應付敵人可能的行動。

最近的報道說，聯軍炮台可能在3月10—11日左右射擊俄軍

的防御工事。但是，在俄军实力雄厚和联军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能否指望联军会造成胜利的首要条件，即围攻者的火力比被围者的火力猛烈，并且猛烈到在英军和法军弹药耗尽前就能压制住俄军炮台的火力呢？但是即令联军能取得这种结果，即令俄军野战部队在这种决定性的关头不试图攻占因克尔芒和巴拉克拉瓦附近的阵地，即令联军将对俄军的第一道防线进行一系列的攻击并且突破它，那时又将怎样呢？在强攻纵队面前将会出现新的防御工事、新的炮台和改成小型碉堡的坚固建筑物，而要消灭它们又必须构筑新的炮台。联军在弹雨下将被迫撤退，最多也只能守住夺得的俄军第一道防线。

这以后将是对第二道防线围攻，接着又是对第三道防线围攻，更不用说还有大量的小型障碍物了，而俄军工程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物——是不会不在他们负责的防御地段上设置这种障碍物的。同时，酷暑和阴雨交替，在由于成千具的人马尸体腐烂而产生瘴气的土地上，将引起前所未闻的疾病。当然，流行病不仅会在城外，而且还会在城内猖獗起来，但是，谁知道究竟哪一方将首先被流行病瓦解呢？

春天的来临对欧洲三个最强大的国家正在激战的这个宽 5 英里、长 10 英里的小小半岛来说，将意味着可怕的灾难；如果路易·波拿巴的这一伟大的远征终于开始获得丰硕的果实，那他真应当替自己庆幸。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3 月 23 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4 月 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58 号，并载于 1855 年 3 月 26 日“新奥得报”第 14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根据“新奥得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論同法国联盟的历史

倫敦3月24日。迪斯累里的報紙“新聞報”¹¹³ 断定說，“路易皇帝”是締結和約道路上的唯一障礙，他同奧地利簽訂了一項秘密“協定”（奧地利力求擺脫這項協定），从而使自己同奧地利聯結起來，這種說法在上星期引起了一場小小的風波。托利黨人直到現在仍像保護自己的嬰兒一樣保護着英法同盟。難道馬姆茲伯里勳爵沒有加強同波拿巴的聯盟？¹¹⁴ 難道迪斯累里未曾在議會中惡毒地嘲笑格萊安和伍德，說他們似乎在自己的選民面前罪惡地誹謗十二月二日的政變？難道兩年來托利黨人無論在議會讲坛上或在報刊上都不是最狂熱的戰爭提倡者？而現在突然毫不轉彎抹角、也毫不客氣地詆毀同法国聯盟，刻薄地諷刺“路易皇帝”并鼓吹和平！年高望重的托利黨人的老朽的機關報“先驅晨報”不知道黨的領袖的秘密，懷疑地搖晃着腦袋，嘟囔着激烈的詞句來反對它所不能理解的“新聞報”的錯覺。然而，“新聞報”今天又回到不祥的命題上來。它在最顯著的地位用黑體字刊登着以下的報道：

“重要的情況已經弄清楚了。我們不久前曾說過，我們有根據推測，congress re infecta〔沒有結束工作的會議〕將要中斷，約翰·羅素勳爵即將回國。奧地利在尼古拉皇帝逝世後改變的對俄國的口氣，特別是奧地利皇帝向亞歷山大二世所作的聲明，無疑都促成這種結局。現在我們也有根據推

測，法国皇帝已消除了走向全面和解道路上的障碍，法国会同意完全撤出克里木，对拆毀或縮減这个地区的工事也不会提出任何条件。”

“新聞报”为了說明这个預言，援引了“自己的一篇社論里所报道的可靠的詳情細节”。但是，恰巧这些詳情細节同根据这些詳情細节十分仓促地作出的結論奇怪地矛盾着。

社論写道：“維也納的事态每小时都在朝着不明智和不順利的方向轉化；因此，重要的是要使拉芒什海峡双方所闡明的意見产生应有的作用，以防止可能引起激动和惋惜的后果。如果 1853 年我們的大臣們真誠地对待英法同盟，那末也許不会导致战争；但如果战争避免不了的話，那末战争很可能进行得很順利很成功。可是英国政府并没有同法国結成友好的联盟，却花了整整一年時間去爭取达到它所說的 *Adhäsion* [吸引] 德意志各大邦的目的。西方列强同俄国作战的理由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坚决要明目張胆地割夺俄罗斯帝国的南部。这是解决东方問題的唯—办法。1853 年是一个有利的时机，但是错过了。它們白白地花費了時間和金錢，毀坏了軍隊和荣誉。如果 1853 年我們对法国有誠意，那末，德意志各邦就不得不跟着我們走。而現在得到了什么結果呢？奥地利皇帝向亚历山大皇帝保证說，‘奥地利既不企图縮小俄国的疆界，又不企图使俄国的領土遭受任何損失’。这些話只能有一种解釋。至于談到我們过去已經暗示过的法奥秘密协定，那末，根据絕對可靠的資料，我們已經知道，虽然这个协定显然带有两个帝国永久同盟的性质，但是其中絲毫沒有說什么奥地利必定要进攻俄国。——俄国皇帝准备接受媾和条件，这些条件虽然并不意味着东方問題的解决，但是，毫无疑問，它們承认了侵略的彻底失败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所干的暴行的一种贖罪。我們认为，实施較高水平的政策的时机已經错过了，能够保证欧洲独立的各种情况的这种凑合不会馬上再現；現在毕竟还可以求得一般对欧洲有益，对土耳其有利而对西方列强不失体面的和平。但是我們有根据担心这种和平談判能否进行。誰阻碍着这件事呢？…… 法国人的皇帝。假如他現在仍然坚持那种任凭条件不利，东方問題一定要得到解决的意見，那我們就不会談英国应当撤走了。但是我們知道，皇帝完全是別有意图…… 法国皇帝想出了縮小俄国疆界和可能的和平談判之間的 *mezzo termino* [某种中間东西，中間道

路),这是危险的,也可能是非常不幸的。皇帝梦想一个充满光辉的功绩、能恢复他的 prestige (荣耀) 的战争;战争应当以一个和约告终,而这个和约丝毫不能更改奥地利和俄国的建议所规定的、英国驻维也纳特命全权代表已准备同意的欧洲和亚洲各国的疆界。至于计划中关于单纯为了挽回威信而决心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的那一部分,则更不用说了……我们认为,这个计划的狂妄轻率与它的不道德是同样不能容忍的。如果为了威信而发动的战争没有成功,那又怎么办呢?……除了俄军在克里木设置的障碍以外,瘟疫也像武器那样是一种威胁。如果为了威信而发动的这个战争没有成功,那英国和法国又将如何呢?那时德意志各邦将站在哪一边呢?前途只有一个:欧洲的衰落和毁灭。即使时机对我们有利,我们是否有权利去冒这种风险,何况不是为着去执行一定的政策,而是单纯地进行示威?对于法国人的统治者来说,错过这种良机也许是很痛心的;对于英国人民来说也同样是痛心的。但是国家活动家们应当考虑到情况。无论法国、英国或是俄国,1855年的处境与1853年的处境不同。出卖欧洲最高利益的人们真是可怜得很。让他们去遭受他们所应遭受的命运吧。法国人的统治者和英国女王并没有过错,但是他们不应该像失掉理智的竞技者那样,在突然极度悲观或一阵绝望之下加速他们将要遭到的那种不幸的来临。”

在同一家报纸上我们发现引自日拉丹的一本抨击性小册子“和平”¹¹⁵的一段话,其中欢迎同时拆除塞瓦斯托波尔和直布罗陀的军事设备,认为这是真正解决和平问题的办法。

“新闻报”感叹地说道:“真想不到这本抨击性小册子,或者确切些说,它的出售,是得到法国政府准许的,而它的作者是皇位的可能继承者的亲密的朋友、顾问和同事!”

这里值得指出,得比派(他们的机关报是“新闻报”)力图同爱好和平的曼彻斯特学派联合,而内阁这方面也想靠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法案(关于这个法案,我们回头还要谈)把它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纯粹进行示威性战争的思想,进行欧洲战争不是为了打击强大的敌人而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的思想,进行装装样子的战争

的思想，自然一定会使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英国人失去自制力。现在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思想是否像复辟的帝国所理解和不得不理解的那样，是«idées napoléoniennes» [“拿破侖观念”]¹¹⁶之一呢？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3 月 27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145 号

卡·馬克思
拿破侖和巴尔貝斯。
——報紙印花稅

倫敦 3 月 27 日。根据可靠的材料我們得知，波拿巴定于 4 月 16 日訪問圣詹姆斯宮¹¹⁷ 将成为大規模抗議性示威的导火綫。宪章派已邀請法国流亡者阿尔芒·巴尔貝斯也在 4 月 16 日到倫敦来，在他到达之际倫敦将举行街头游行和大規模群众集会。但是現在还不知道，健康状况是否允許巴尔貝斯作海上旅行。

昨天下院二讀通过了廢除報紙印花稅的法案。這項法案的主旨如下：（1）取消强制的報紙印花稅。（2）在盖了印的紙上印刷的定期刊物像以往一样，享受免費郵寄的特权。第三条是有关郵寄印刷物的范围，最后还有一条規定，在盖了印的紙上印刷的報紙应当提交保证金以防因造謠中伤而可能引起的訴訟。为了說明報紙課稅的旧制度，只要举出一两个例子就够了。在倫敦，出版日报至少需要 5—6 万英鎊的資本。全部英国报刊，除了少数例外，掀起了反对新法案的一个最下流无耻的运动。难道还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旧制度是对現有的报刊的一种保护制度，是对以自由精神創作的作品的一种禁止制度嗎？在英国，出版自由直到現在仍然是資本的无上特权。少数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周刊（当然談不上出版日报），依靠为了总的目的而作出与大陆工人完全不同的牺牲

的英国工人的每周捐款，勉强維持着自己的生存。英国出版界的龐然大物——“泰晤士报”——悲喜交集地大声疾呼 *pro aris et focis* [为保卫社稷和家园，为自己的切身事业] 而奋斗，也就是为报纸的壟断而奋斗，同时，它时而謙逊地把自己同德尔斐神灵作比較，时而断言在英国只存在一个唯一值得保存下来的机关即“泰晤士报”，时而自命为世界新聞界的統治者和——用不着什么庫楚克-凱納吉条約——欧洲所有新聞工作者的保护人。

“泰晤士报”的所有这些«cant» [“大話”] 在下院的昨天會議上怪人德拉蒙德的发言中遭到了应有的駁斥，德拉蒙德說：

“現在的报刊是商业企业，不是什么別的东西…… 瓦尔特之流的先生們（“泰晤士报”的主要股东）自然有同布萊特先生開設棉紡織厂一样的权利来開設政治性的廢話工厂…… ‘泰晤士报’比它的竞争者更善于經營。瓦尔特之流的身边經常有一帮狡猾的人——开业多年的律师和类似他們的人，这些人随时准备对任何問題表示贊成或反对。例如巴恩斯、奧塞哲、斯梯林、德兰恩、莫利斯、姿和戴森特先生們就是这样的人。所有这些紳士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而不善經營的愚蠢报纸，例如‘紀事晨报’，則投靠一个固定的党派。一种报纸漸漸成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另一种报纸則漸漸成为得比派的机关报等等。当皮尔派兴盛的时候，它的报纸也兴盛，但是只要皮尔派一不順利，他們的报纸也就不順利。不在行的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真正的艺术——这里‘泰晤士报’也显示了它的技能——在于雇佣一大帮持有各种不同意見的紳士，并强使他們写稿。自然，不能責难这些先生中間任何一个人的不彻底性；假如他們每一个人始終坚持同一种观点，那末，这些新聞工作者中每一个人单独說来是十分彻底的；但是如果把他們全部湊合在一起，則不得不承认，世界上再沒有比这更不彻底的了。新聞界的真正美德看来是遵守这样的原則：無論在政治方面或是在文学方面个人应表現正派，集体則应表現不誠实。这种原則很有用，‘泰晤士报’經常使德拉蒙德想起他的一个佃农，他曾叫这个佃农排干一块沼澤地。佃农說：‘决不！請不要排干这块地吧！下雨天在这块地上能长出一些喂牛的东西，如果长不出什么喂牛的东西’”

西,那末会长出一些喂猪的东西,如果連喂猪的东西也一点长不出来,那末总会长出一些喂鵝的东西来的。’至于談到報紙的叛卖性,那末这里有关于‘泰晤士报’的直接证据,拿破侖在談到‘泰晤士报’时曾經說道:‘他們給我寄来了“泰晤士报”,下流的“泰晤士报”,波旁王朝的报纸。’在奧馬腊的一本书里肯定地說,‘泰晤士报’每月从他那里得到6 000法郎。奧馬腊持有由报纸出版者签名的正式領錢收据。奧馬腊还說,拿破侖在被放逐到易北河之前曾收到各种报纸,其中包括‘泰晤士报’关于著文保护他的建議。拿破侖拒絕了这些建議,但是后来他对自己的决定后悔了。”

对于上述情况,我們只补充一点,即“泰晤士报”于1815年曾坚决主張把它称之为欧洲蠱惑宣傳头目的拿破侖交付軍事法庭审判并判处枪决。而在1816年,这家报纸却力图使北美合众国“这个胜利叛乱的极危险的典型”重新置于英国的专制制度的統治之下。

卡·馬克思写于1855年3月27日

載于1855年3月30日
“新奧得报”第15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調查委員會的揭露

倫敦 3 月 28 日。下院調查委員會已經開了 12 次以上的會議。它的調查結果大部分已為公眾所知道了。社會各階層的見證人，從劍橋公爵起，到“泰晤士報”的麥克唐納先生止都被訊問過。他們的所有證詞的特点是罕見的一致。各管理部門都受到了檢查，它們都處於不僅不能令人滿意的、而且簡直是可恥的、丑惡的狀態。陸軍司令部、醫務部門、供應管理局、軍需部、運輸部門、醫院管理局、衛生警察局、巴拉克拉瓦和君士坦丁堡的港務警察局——所有這些部門都一致被認為是不中用的。但是不論每一個部門單獨來說多么糟糕，這套機構的全部美妙之處只是在它們相互接觸和協作的過程中才顯示出來。規章制度訂得非常出奇，以致當它們一開始生效，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的職權範圍從何處開始，到何處終止以及應當同誰打交道。請讀一讀敘述醫院狀況的文章以及敘述在運輸船上的和到達指定地點的傷病員所處的那種非常悲慘的境地（不知是由于玩忽職守，還是由于疏忽大意）的文章。在撤出莫斯科時還沒有這類駭人聽聞的現象。而且所有這些事實都發生在距君士坦丁堡——一個擁有豐富資源的大城市——很近的斯庫塔里，而不是發生在倉皇退卻的時候，即在哥薩克追蹤退卻者、切斷其供應綫的時候；所有這一切是發生在作戰還順利的时候，發生

在防禦敵人進攻的地点內，發生在大不列顛用來為自己的軍隊集中儲備物的、巨大的中心倉庫內。而且這些駭人聽聞的事件的禍首不是野蠻人，而是屬於“成萬個上層人物”之列的紳士，是一些獨特的軟心腸人。規章制度 fiat [萬歲]，軍隊 pereat [讓它去毀滅吧]！“請找別的部門吧，這件事不歸我們管！”——“但是找什麼地方呢？”——“了解哪一個部門是主管部門，這不在我們的職權範圍之內，即使這在我們的職權範圍之內，我們也沒有權限把這一點告訴你。”——“但是病員需要襯衫、肥皂、床單、住房、藥品、麵包和波爾特溫酒。他們許許多人快要死亡了。”——“我們實在感到很遺憾，英國的精華會這樣快毀滅，但是我們沒有任何辦法可以幫忙。即使我們有東西，沒有六個人簽署過的有關正式命令，我們也一點不能發給，而且這六個人中有四個人不在這裡，他們在克里木，或者在其他地方。”即使兵士們看到甚至感覺到那些能夠救他們的命的物資，他們也應當像唐達魯士那樣死去。在當地找不到一個男人有足夠的毅力去打破這套陳規舊習，能夠根據情況的需要而不顧規章地去負責採取行動。只有一個人敢於這樣做，那是一個女人，南丁格爾小姐。她確信必需的物品都在倉庫里，於是帶領了幾個大胆的人，真的撬開了鎖，盜竊了女王陛下的倉庫，並且向吓得呆若木雞的軍需官們聲稱：

“我終於有了我所需要的一切。現在請你們把你們所看到的去告訴英國吧。全部責任由我來負。”

掌管君士坦丁堡和斯庫塔里事務的老朽的懦夫們不僅不能採取這樣勇敢的行動，而且表現得十分胆怯，要不是他們自己坦白承認，就很難令人相信有這等事。譬如調查委員會曾問過他們當中一個當過醫院院長的安得魯·斯密斯醫師：難道在君士坦丁堡就

沒有購買必需物品的資金和能夠弄到這些東西的市場嗎？

他回答道：“是啊！但是請你相信，在國內習慣了40年之久的因循守舊和拖拉作風後，我很难在幾個月內弄明白哪些資金是真正由我全權支配的。”

而不列顛軍隊就是委託給這樣一些老朽的懦夫們的！在報刊上和議會內所作的極其生動的描述與見證人的證詞中所展示的实际情景比起來就顯得黯然遜色了。對於赫伯特輩、格萊斯頓輩、紐卡斯爾輩以及 *tutti quanti*〔諸如此類〕的老爺們，對於皮爾的高級官員們（他們在議會內不止一次地把目前已經證實的事實說成是謊言，並且以很难期望於“最受尊敬的”老爺們的那種激情駁斥了這些事實），又能說些什麼呢！對於 Exeter Hall¹¹⁸ 的這些純袴子弟、皮由茲式的花花公子來說，“變形”和“实际存在”之間的差別是生命問題，他們以自己特有的“朴素的”自信心指揮戰爭，並且在不列顛軍隊的“變形”方面獲得那麼大的成就，以致使這支軍隊喪失了全部的“实际存在”。格萊斯頓回答道：“它正駐扎在某處，1月1日駐克里木的不列顛軍隊有32 000人。”但對他不幸的是，我們掌握有劍橋公爵提供的證據：在因克爾芒會戰以後，即在11月6日，不列顛軍隊連13 000人也不到，我們知道，11—12月以來，這支軍隊損失了將近3 000人。

同時，關於下院對內閣表示憤慨的消息、關於羅巴克委員會以及關於國內廣泛不滿的消息傳到了克里木。為士兵們所歡迎的這些消息，使將軍們和各部門的長官們感到恐懼。一星期以後又傳來一則消息說，受權進行談判和調查的委員會代表們已在途中。這個消息就像一股電流那樣刺激了一下癱瘓病人。同時，沒有受傳統、常規和官僚惡習束縛的鐵路工人也開始工作了。他們保障了登陸地點的物資供應，拿起了鐵鍬，修建了造船廠、掩蔽所和障

碍物，而且当滑稽可笑的老紳士們还没有来得及搞清楚怎么一回事的时候，第一批铁軌就已經鋪成了。对于圍攻來說，这条铁路也許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用更簡便更省錢的办法就可以具备它的一切优点），但是它的极大好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范例，把墨守陈規、軟弱无能的英国与現代化的工业英国作了鮮明的对比。由于铁路工人坚定地“前进”，因而使不列顛軍队摆脱了被魔法迷惑的麻木状态，这种麻木状态是由虛假的不可設想的幻想所造成的，而这种幻想則把英国官兵引导到土耳其人的愚昧的宿命論，并迫使他們平心靜气地把必然的灭亡看成是命中注定的厄运。由于铁路工人的坚决行动，在軍队中又开始說：«Aide-toi et le ciel t'aidera» [“要自己爭气，老天爷才会帮助你”]。在六个星期內一切都变了样。腊格倫和他的司令部，各个师和旅的將軍們天天都在塹壕里出現，他們察看一切并发布命令。在軍需部里找到了馬匹、大車和車夫，而部队也能够为自己的病員、同时部分也为自己修筑掩蔽所。医务人員消除了医院帳篷和板房內的极其令人气憤的恶劣現象。开始有了彈药、軍服以至鮮肉和蔬菜。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建立起来了，虽然还有許多應該加以克服的旧弊病，但是状况已得到改善則是无可置疑和非常显著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8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3 月 31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 153 号

卡·馬克思 不列顛軍隊

我們曾有机会了解到由下院任命去調查不列顛軍隊在克里木狀況的著名委員會的大約 12 次會議的報告內容。社會各階層的見證人，從劍橋公爵起，都被訊問過，他們的所有證詞的特点是驚人的一致。各管理部門都受到了檢查，它們都處於不僅不能令人滿意的、而且簡直是丑惡的狀態。陸軍司令部、醫務部門、供應管理局、軍需部、運輸部門、醫院管理局、衛生警察局和違警法庭、巴拉克拉瓦的港務警察局——所有這些部門都一致被認為是不中用的。

但是不論每一個部門單獨來說多麼糟糕，這套機構的全部美妙之處只是在它們相互接觸和協作的過程中才顯示出來。這些機關的規章制度訂得非常出奇，以致當部隊在土耳其登陸後它們一開始生效，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的職權範圍從何處開始，到何處終止以及有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時應當同誰打交道。因此，由於害怕負責，大家都把自己擔負的責任推給別人。在這種制度下，醫院中的病員都處於非常悲慘的境地。疏忽大意和玩忽職守嚴重地影響到在運輸船上的以及到達指定地點的傷病員。揭露出來的事實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在撤出莫斯科時還沒有這類駭人聽聞的現象。然而這些事實確實發生在距君士坦丁堡——一個既擁有人力

又拥有丰富资源的大城市——很近的斯庫塔里。所有这一切不是发生在仓皇退却的时候，即在哥薩克追踪退却者、切断其供应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作战还順利的时候，发生在防御敌人进攻的地点內，发生在大不列顛用来为自己的军队集中儲备物的、巨大的中心仓库內。而且这些駭人听闻、卑鄙齷齪的事件的禍首不是残酷无情的野蛮人，而是那些出身名門受过教育的英国紳士們，是那些心腸軟的、以慈悲为怀和篤信宗教的人。毫無疑問，他們当中的每个人作为普通的人，是乐意做一切必需做的事情的；作为官方人士，他們則应当袖手旁观，若无其事地看待所有这些卑劣行为，并以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这种情况在女王陛下規章制度中的与他們有关的任何一項条文中都沒有規定。宁可让 1 000 名兵士去牺牲，也不要違犯女王陛下的規章制度！即使能够救兵士們的命的物資离开他們非常近（看来只要一伸手就能得到！），他們还是应当像唐达魯士那样死去。

在当地找不到一个男人有足够的毅力去打破这套陈規旧习，能够根据情况的需要而不顾規章地去負責采取行动。只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那是一个女人，南丁格尔小姐。她确信必需的物品都在仓库里，于是就像报道所說的，她帶領了几个大胆的人，真的撬开了鎖，盜窃了女王陛下的仓库！掌管君士坦丁堡和斯庫塔里事务的老朽的懦夫們不仅不能采取这样勇敢的行动，而且表現得十分胆怯，要不是他們自己坦白承认，就很难令人相信有这等事。曾經問过他們当中一个当过医院院长的安得魯·斯密斯医师：难道在君士坦丁堡就沒有购买許多必需物品的資金和能够弄到这些东西的市場嗎？

他回答道：“是啊！但是請你相信，在國內习惯了 40 年之久的因循守旧

和拖拉作風后，我很难在几个月內弄明白哪些資金是真正由我全权支配的！”

在报刊上和議會內的发言中对情况所作的极其阴暗的描述与我們面前所展示的实际情景比起来就显得黯然逊色了。某些最令人发指的事实早已宣揚开了，但是現在它們带有更加阴暗的色彩。虽然这幅图景还远不是完整的，但是就我們所知道的已經足以判断全部状况。在这幅图景中，除了随軍的女看护以外，沒有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一群群的工作人員都同样地恶劣而愚蠢，如果委员会的委員們在自己的报告中敢于按照見证人的证詞那样来写，那末他們就很难在英語里找到相当有力的詞句来表达自己的譴責心情。

經過所有这些揭露以后，人們不仅对于直接的禍首、而且首先对于組織这次远征并且厚顏无耻地宣称这些非常明显的事实为捏造的政府，是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极度憤恨和蔑視的感情的。这种偉大的“群賢”的联合，这批杰出的大政治家（他們的上台本来就应当意味着英国黄金时代的到来）現在在哪儿呢？輝格党人和皮尔分子、罗素的信徒和帕麦斯頓的追随者、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自由保守党人和保守自由党人——所有人的所作所为无非是議价成交而已，而且所有那些被他們任命担任国家职务的人不是些老朽的懦夫，就是些十足的笨蛋。这些大政治家深信他們在30年內所操纵的机器一定能出色地运轉，以致竟然沒有派遣一名享有特命全权的人到克里木去应付預料不到的情况；既然管理得那么好，还会发生什么預料不到的情况呢！这些英国大臣們，就其天性和习惯來說，只善于服从別人，現在突然担負了指揮的职务，自然使英国弄到了非常可耻的地步。就拿腊格倫这个老头子來說，这是一个終身呆在威灵頓司令部里的人，这个人从来沒有得到許可

由他自己獨立負責地去行動，他活到 65 歲只養成了盲目服從命令的習慣。而這樣一個人却突然被委託帶領整整一支軍隊去對付敵人，去迅速而獨立地決定一切問題！於是他也就非常出色地顯示了自己。動搖不定、猶豫不決、對自己毫無信心、毫不果斷和毫無主動精神，這一切都說明他的每個舉動的特點。現在我們知道，當克里木遠征的決定被通過的時候，他在軍事委員會里表現得多么膽怯。他完全是聽命於像聖阿爾諾那樣的吹牛大王和下流胚（而威靈頓老頭子只要說一句平淡的譏諷話就能迫使聖阿爾諾啞口無言）！在向巴拉克拉瓦進軍時他猶豫不決，在圍攻時和冬季災難時期他又束手無策，除了躲避人們以外想不出任何更好的辦法！其次是哈丁勳爵，就其性格來說，也只適合於擔任下屬的角色，但在这里，在英國，却是軍隊的司令官。雖然他是歷次戰役的參加者，但是從他的一套管理制度以及他在上院堅持他的一套制度這一點來看，可以認為他從來沒有走出過他的營房和辦公室。說他一點也不了解作戰部隊最起碼的需要，或者說他懶得去考慮這些需要，這是對他的活動可以作出的最溫和的評語。再其次是皮爾的官員們——卡德威爾、格萊斯頓、紐卡斯爾、赫伯特以及 *tutti quanti* [諸如此類的人]。所有這些人都是彬彬有禮、外表可親的年輕紳士，他們的文雅風度和崇高的感情都不允許他們粗暴地行動或者對這個世界上的事務表現出哪怕是表面的果斷。他們的座右銘是“留心看看”。他們對一切都很注意；他們對一切都給予應有的重視；他們對一切都很細心，並指望所有的人注意到這一點以後也會對他們本身給予應有的注意。他們喜歡一切都圓滿和平穩。沒有任何東西能像毅力和實力的徵象——不隨和那樣使他們更厭惡的了。

这些軟心腸的、老实而虔誠的紳士們厚顏无耻地否认来自軍队的关于領導无能而使軍队遭到毀灭的消息；既然他們 *à priori* [早先] 就确信他們的管理是无可指摘的，那末除了他們以外又有誰会发表这类反駁的言論呢。当指責愈来愈坚决，而来自战場的官方消息甚至使他們不得不部分地承认對他們的指責是正确的时候，在他們的反駁中仍然还繼續发出憤懣和譏諷的声調。他們对罗巴克关于进行調查的提案表示反对是一个頑固地公开否认真相的前所未見的可耻例子。倫敦“泰晤士报”、累亚德、斯泰福以至他們原来的同僚罗素都指責这些紳士們在撒謊，然而他們却进行頑抗。整个下院的三分之二多数都指責他們在撒謊，但是他們仍然进行頑抗。現在他們受到罗巴克委員會的审查并且被揭露了，但是，据我們所知，他們还是在繼續頑抗。然而現在他們頑抗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真相已經大白于天下，而这将不可避免地促使不列顛軍队在組織和管理上的改变。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8 日

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4 月 14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36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战争的进程

正当外交家們聚集在維也納討論塞瓦斯托波尔的命运、而同盟国企图在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下締結和約的时候，俄軍在克里木却利用敌人的严重錯誤以及自己在半島上所处的中央位置，再次全面轉入进攻。如果我們回想一下联軍在入侵之初的大話，那末目前的状况是可笑的，而且看来正是对人的自恃和愚蠢的絕妙諷刺。但是，这出戏尽管有滑稽可笑的一面，整个說来却是个大悲劇，因此我們再次建議讀者把“亞美利加号”輪船在星期日早晨送来的最近报道中所叙述的事实仔細地加以研究。¹¹⁹

在叶夫帕托利亚，奧美尔-帕沙的軍隊实际上从陆地方面已被封鎖住。俄軍在騎兵数量上占优势，所以他們能够把自己的前哨和騎兵哨几乎派到城边，在城郊巡邏，从而切断敌人的供給綫，而当敌人进行猛烈的出击时，就退到自己步兵的所在地。可見，俄軍正做着我們以前所預料的事，即以相当于土軍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兵力，箝制着数量上占优势的土軍。¹²⁰ 因此，奧美尔-帕沙等待騎兵增援部队的到来，同时又到英法兵营去通知联軍，說明他此刻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迫切希望法軍派出約1万人的增援部队。毫無疑問，能派出增援部队是最好不过了，但是康罗貝尔本人同样也需要增援部队。康罗貝尔已經发觉，他所掌握的軍隊太多，同时

又太少，——如果繼續采用老办法圍攻并防守黑河，兵力就太多；如果强渡黑河，把俄軍击退到半島的腹地并圍攻北堡，兵力就太少。派1万人到叶夫帕托利亚，不一定能使土軍开始順利的軍事行动，但法軍少了他們，却会恰好在春季增援部队到达后开始行动时，陷于困难的境地。

現在圍攻的情况实际上很糟。朱阿夫兵2月24日夜間的攻击的結果，比我們一星期前所报道的还更加令人失望^①。从康罗貝尔的报告可以看出，当他下达攻击命令时，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該干些什么。他写道：

“鉴于攻击目的已經达到，我軍即行撤退，因为誰也不想完全被敌人火力控制的地点巩固下来。”

但究竟达到了什么目的呢？既然这一地点不能扼守，又为什么要发起攻击呢？完全沒有必要。多面堡未被摧毀，在敌人火力下也不可能被摧毀，即使像第一次报告中所肯定的那样，朱阿夫兵一度完全攻占了多面堡，情况也是如此，何况朱阿夫兵並沒有做到这一点。俄国人在自己的报告中坚决駁斥这一事实，而康罗貝尔甚至不敢提出类似的反駁。究竟为什么要在这种情况下发起攻击呢？原来原因在于：康罗貝尔看到俄軍巩固了陣地，使得圍攻者陷于非常困难而又非常不体面的境地，于是不加思索，不衡量一下这一行动的可能結局，便把軍隊投入了攻击。这是真正毫无意义地驅使兵士去送死的行为，它将成为康罗貝尔軍事声誉的污点。能够作为辯解的唯一理由，是法軍渴望开始强攻，而这位將軍决定給他們机会，以便讓他們多少認識到这种强攻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結

^① 見本卷第171—173頁。——編者注

果。但是这样的辯解，正如攻击本身一样，也会使康罗貝尔威信扫地。

馬拉霍夫岡附近的战斗的結果，俄軍在紧靠自己防禦工事前面的地段上占了优势。位于高地棱綫上的、朱阿夫兵未能攻下的那个堡垒，被俄軍称为色楞格多面堡，以紀念防守該堡垒的色楞格团。受战斗胜利鼓舞的俄軍立即采取了巩固胜利的措施。色楞格多面堡現在已扩大和加固，并設置了火炮(尽管在搬运它們时遭到圍攻者极猛烈的射击)，还在多面堡前挖掘了反接近壕，可能是为了在多面堡前再构筑一个或两个不大的堡垒。在另一处，即在科尔尼洛夫棱堡前，俄軍在原有的工事前面 300 碼处还构筑了一系列新的多面堡。如果相信英国人以前的报告，那末上述行动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們一直听說，联軍早就把自己的塹壕推进到更加靠近俄軍防綫的距离上了。但我們根据权威性的軍事資料已經查明，約在一个月前，法軍战綫仍然距俄軍外圍工事 400 碼，而英軍战綫甚至还要远一倍。現在，“泰晤士报”的記者终于在 3 月 16 日的报道中承认，直到目前为止，英軍的塹壕距俄軍的塹壕仍有 600—800 碼，而且准备向敌人射击的炮台，实际上还是去年 10 月 17 日进行射击的那些炮台！請看，圍攻的胜利多么大，塹壕推进得多么远，这就是三分之二的英軍牺牲生命的代价！

在这种情况下，两軍炮台綫之間的間隙地看来足够俄軍用来构筑新的工事，但构筑这种工事是被圍守軍以往从未采取过的一种最大胆最巧妙的措施。这实质上就是在距联軍工事 300—400 碼的地方构筑一条新的平行壕，即一条对付圍攻者的最大的反接近壕，因而迫使圍攻者立即轉入防禦，而任何圍攻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却是圍攻者要迫使被圍者处于防禦地位。这样一来，攻

者和防者的角色已完全調換过来了，而且俄軍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不論俄国工程师犯过多么严重的錯誤，不論他們在施尔德尔的指揮下在錫利斯特里亚做过什么不合实际的試驗，但在这里，在塞瓦斯托波尔，看来联軍所遇到的却是另一种人。俄軍工程师在构筑塞瓦斯托波尔周圍的防綫时，善于迅速而正确地判明情况，能够随机应变、大胆而准确地实现既定意图；防御的薄弱地点一被敌人发现，就不断注意加强这些地点的防护；火力配系組織得极为出色，能向正面任何地段集中比敌人更猛烈的火力；在第一綫工事之后构筑第二、第三、第四綫工事，——简单地說，整个这一防御的組織堪称典范。最近在馬拉霍夫岡和在科尔尼洛夫棱堡前面构筑的前进工事，是圍攻史上前所未有的，这說明其組織者是第一流工程专家。还必须公正地补充一点，塞瓦斯托波尔的工程长官是托特列本上校，他是俄軍中一位不太出名的人物。然而，不应当把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体系看做是俄国筑城术的典型。比較切合实际情况的是介于錫利斯特里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两者之間的某种东西。

不論在克里木，或者在英国和法国，人們現在已开始懂得（虽然很慢），以强攻夺取塞瓦斯托波尔是毫无希望的。陷于窘境的“泰晤士报”請教于“大軍事权威”后認識到，必须轉入进攻，为此应当：或者强渡黑河，同奥美尔-帕沙的土軍会合（不論在同俄国的監視軍会战以前或者以后）；或者对卡法实行佯攻，以迫使俄軍分散兵力。既然联軍的兵力据推測現有 11—12 万人，那末采取这样的行动就应当是联軍力所能及的。其实康罗貝尔和腊格倫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了解，强渡黑河并同奥美尔-帕沙的軍隊会合是多

么需要；但正如我們多次证实的那样^①，遺憾的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高地上的联軍現在沒有而且从来也沒有达到过 11—12 万人。到 3 月 1 日，联軍在那里能担任勤务的兵士不超过 9 万人。至于談到远征卡法，当現在联軍在其所控制的两个点上都还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完成規定的任务的时候，如再将兵力分散在距中心点 60—150 英里的三个不同的点上，那当然是俄軍求之不得的事！“大軍事权威”郑重其事地奉劝“泰晤士报”出面主張再走远征叶夫帕托利亚的老路，显然是对该报的嘲弄！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3 月 30 日
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4 月 17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36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參看本卷第 87—88 頁。——編者注

弗·恩格斯 論克里木局勢

倫敦3月30日。关于和談進程的報道的性質每天都在改變着。今天說和平是不容置疑的，明天又說戰爭是不容置疑的。帕麥斯頓在“郵報”^①上用大炮和劍進行威吓——這證明他隨時準備締結和約。拿破侖命令自己的報刊歌頌和平之樹——這最確凿地證明他打算繼續戰爭。克里木事件的進程絕難說明塞瓦斯托波爾即將陷落。在叶夫帕托利亞，奧美爾-帕沙的軍隊實際上從陸地方面已被封鎖住。俄軍在騎兵數量上占優勢，所以他們能夠把自己的前哨和騎兵哨幾乎派到城邊，在城郊巡邏，從而切斷敵人的供給綫，而當敵人進行猛烈的出擊時，就退到在他們后面的步兵所在地。可見，正像我們所預料的那樣^②，俄軍以相當于土軍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兵力，箝制着土軍的優勢兵力。在伊斯甘德-貝伊（即波蘭人伊林斯基，他是在卡拉法特城郊出的名）的指揮下土耳其騎兵進行了出擊，但是被三支從三個不同地點同時向土軍攻擊的俄國部隊所擊退。像所有訓練得不好而又不果斷的騎兵一樣，土軍沒有拔出馬刀向俄軍沖擊，却停留在相當遠的距離上，用馬槍向俄軍射擊。這種顯然證明土軍不果斷的行動，促使俄軍轉入進

① “晨郵報”。——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138—141頁。——編者注

攻。伊斯甘德-貝伊帶領一個騎兵連企圖向敵人攻擊，但是除了巴希布祖克外，所有的人都拋棄了他，他因而不得不退却，沖出俄軍重圍。奧美爾-帕沙等待騎兵增援部队的到來，同時又到英法兵營去通知聯軍，說明他此刻不能採取任何行動，迫切希望法軍派出約 1 萬人的增援部隊。毫無疑問，能派出增援部隊是最好不過了，但是康羅貝爾本人同樣也需要增援部隊。康羅貝爾已經發覺，他所掌握的軍隊太多，同時又太少。如果採用老辦法圍攻塞瓦斯托波爾和防守黑河，兵力就太多；如果強渡黑河，把俄軍擊退到半島的腹地並封鎖北區，兵力就太少。派 1 萬人到葉夫帕托利亞，不一定能使土軍開始順利的軍事行動，同時法軍要在開闊地上行動也會感到力量不足。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一天天地使圍攻者陷入愈來愈困難的境地。

我們看到，俄軍在 2 月 24 日堅守住了薩蓬山上的多面堡（在馬拉霍夫岡附近）。¹²¹ 這個多面堡現在已擴大和加固，並設置了火炮，還在多面堡前挖掘了反接近壕。在另一處，即在科爾尼洛夫梭堡前，俄軍在原有的工事前面 300 碼處還構築了一系列新的多面堡。這對“泰晤士報”的讀者來說，是難以置信的，因為根據這家報紙的報道，聯軍早就把自己的塹壕推進到更加靠近俄軍防綫的距離上了。現在，“泰晤士報”的記者終於承認（例如 3 月 16 日的報道），直到目前為止，英軍的塹壕仍然位在 600—800 碼的距離上，而且準備向敵人射擊的炮台，實際上還是去年 10 月 17 日進行射擊的那些炮台。請看，圍攻的勝利多麼大，塹壕推進得多麼遠，這就是三分之二的英軍犧牲生命和健康的代價！在這種情況下，兩軍炮台之間間隙地看來足夠俄國用來構築新的工事。這些工事可以被看做是在距聯軍工事 300—400 碼的地方構築的一條對付

圍攻者的新的平行壕，即一条对付圍攻部队的最大的反接近壕。因此，圍攻部队不得不轉为防御，而任何圍攻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却是圍攻者要使被圍者处于防御地位。

不論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兵营，或者在英国本土，人們現在已开始懂得，以强攻夺取塞瓦斯托波尔是毫无希望的。陷于窘境的“泰晤士报”請教于“大軍事权威”后認識到，必須轉入进攻，为此应当：或者强渡黑河，同奥美尔-帕沙的土軍会合（不論在同俄国的監視軍会战以前或者以后）；或者对卡法实行佯攻，以迫使俄軍分散兵力。既然盟軍現有 11—12 万人，那末采取这样的行动就应当是力所能及的。“泰晤士报”是这样认为的。

腊格倫和康罗貝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了解，現在同奥美尔-帕沙的軍隊会合是多么需要。但遺憾的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高地上的联軍直到現在为止从来没有达到过 11—12 万人；联軍在那里能担任勤务的兵士最多是 8—9 万人。至于談到远征卡法，那是俄軍求之不得的事。联軍在其所控制的两个点上都还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完成規定的任务的时候，就将其兵力分散在距中心点 60—150 英里的三个不同的点上！莫非“泰晤士报”采用了“俄国”軍事专家的建議？

由于法軍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已在途中，而其余部分同第十三师、第十四师和两个皮蒙特师一起准备随后开来，所以到 5 月底联軍的兵力将达到使它能够而且不得不从自己在黑河的防御陣地向前推进的程度。軍隊都将在君士坦丁堡集中，他們多半是同时乘舰出发，以便在不幸的赫尔松涅斯停留尽可能短的时间。这个办法可能会使行动迟緩一些，然而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到目前为止，一小队一小队地逐渐派到克里木的增援部

队虽然汇合成了一支完整的軍隊，但是始終沒有使远征軍加强到能够轉入进攻的程度。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3 月 30 日
左右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載于 1855 年 4 月 2 日
“新奧得报”第 155 号

卡·馬克思
法国立法团的丑事。
——德魯安·德·路易斯的
影响。——民軍的現狀

倫敦4月3日。来自巴黎的报道：

“波拿巴的立法团中发生了一场丑剧，有关这场丑剧的消息没有传到英国的报界。在辯論代役法¹²²时，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在蒙塔郎贝尔发言之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在最激憤的时候漏出了这样一句话，他說：只要这个法律一生效，军队就会理所当然地效忠于秩序和皇帝，我們就不会再看到丢人的景象——兵士倒戈 (soldats à baionnettes renversées) 的現象。这个公然頌揚土耳其近卫軍制度是法国军队的理想的发言在結束时甚至在这个會議上也引起了一片哄然的怨声，因而格朗尼埃只得坐下了。这时立法团的另一个議員接着发言，他猛烈地攻击了格朗尼埃。于是演出了这样一出丑剧：甚至莫尔尼也不得不要求卡桑尼亚克进行解釋。〈众所周知，当基佐还在他編輯无聊的小报“地球报”时，他就把卡桑尼亚克叫做 le roi des drôles [丑角之王]。〉格朗尼埃十分沮丧地表示了正式的歉意，并提議在‘通报’上对这场風波保持緘默。會議开得是这样地热烈，簡直就同路易-菲力浦时代众議院极盛时期一模一样。”

今天的“紀事晨报”写道：

“英国公众得出了一个結論：德魯安·德·路易斯先生到維也納去，是想以谗言和慫恿的方法影响約翰·罗素勋爵，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位勋爵的行

为既不能使自己的同胞感到滿意，又得不到我們盟友們的欢心。这位高貴的勳爵是以其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的忽高忽低而著称的。当他处于反对派地位或者必須为自己争取政治資本的时候，他对社会活动特別积极；一当直接的利害关系消失的时候，他就完全无所作为。这一次好像也在发生着类似的事情，因而人民已經开始抱怨了…… 在德魯安·德·路易斯先生到倫敦来过以后，上层集团中开始出现一种比較坚定的語調。有人甚至說他的使命完成得十分成功，以致使約翰·罗素勳爵的和平意图遭到了政府的反对，**我們的活动人物**〈帕麦斯頓〉不管願意不願意，都必須同意提出看来会遭到俄国輕蔑地拒絕的最后通牒。”

英国的軍隊已經消失了，英国的民軍也正在逐漸消失。根据1852年（得比勳爵执政时期）議會法令所建立起来的民軍，按照法律規定，平时服役期一年应不超过28天。但是，在外敌侵入或出現任何其他紧急情况时，民軍也可以应征长期服役。相反地，由于1854年的議會法令，所有在1854年5月12日以后被征的人都必須服役到战争結束。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問題：如何規定那些根据1852年法令征召入伍的人的义务。王室法律顧問們声称，他們认为这一类人也应当在整个战争期內服长期兵役。与法学家們的这种結論相反，潘繆尔勳爵在数星期前頒布了一項命令，根据這項命令，所有在1854年法令頒布前被征入伍的人都可以退役，但是，如果他們願意再服役5年，他們就可以得到1英鎊的报酬。由于在正規軍隊中服役2年的新兵的报酬，現時步兵是7英鎊，騎兵是10英鎊，所以在民軍中服役5年报酬不过是1英鎊这一点，就成了解散民軍的最可靠的方法。将征募民軍一事几乎拖延了一年之久的帕麦斯頓勳爵，看来一有机会便想重新摆脱民軍。因此，我們得知最近两个星期来民軍团一个接一个地减少了三分之二到八分之五的人員。例如，索美塞特郡的第一民軍团500人中有414人

退役，北德勒穆的民軍 800 人中有 770 人退役，萊斯特的民軍 460 人中有 340 人退役，薩福克郡的炮兵团 130 人中有 90 人退役等等。

卡·馬克思寫于 1855 年 4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4 月 7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 163 號

卡·馬克思

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

1855年4月10日星期二于倫敦

請允許我在長時間的中斷之後恢復我在“論壇報”上的通訊。

昨天和今天大概是維也納會議的头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因为4月9日的會議应当是在德魯安·德·路易斯先生出席的情况下开幕，此外，还可以預料到，在这以前，俄国大使定能接到关于第三和第四項条款的指示。在所有的交易所里一开始就有人大吹大擂，把德魯安·德·路易斯先生的出行說成是真正的和平征兆。他們断言，这样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如果不确信談判会获得成功，当然不会亲自参加这种談判。至于談到这位外交家的“杰出品质”，那末它們完全带有神話般的特性，而且主要是存在于由他支付报酬的那些報紙論文中。在这些論文里他被捧为第二个达来朗，似乎他在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多年經歷中，从来就沒有树立过“杰出的”庸碌无能的名声。他这次出行的真实原因是：約翰·罗素勋爵由于人所共知的不懂法語，竟在数星期之內用他从来不算作的让步束縛住了盟国，因此現在需要花費不少力气来收回这些让步。約翰勋爵的法語是典型的約翰牛的语言，是“弗拉·迪亚沃洛”¹²³以及过去在法国流行的其他剧本里的“大人”所使用的語言；他从«monsieur l'aubergiste»〔“老板先生”〕这句话开始，而以

«très bien» [“很好”] 這句話結束。如果他只听懂別人對他說的話的一半，那末他可以告慰的是，他感到別人能听懂他的話還更少些。正是由於這種考慮，他的朋友和競爭者帕麥斯頓勳爵才把他派到維也納去，以為在這種活動場所只要有兩三次重要的失算，就足以把可憐的小約翰徹底毀掉。事情果然這樣發生了。羅素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能了解談話的內容，對於哥爾查科夫或布奧爾的每一個尖銳的突如其來的插話，這位不走運的初次登台的外交家總是不好意思地回答說 «très bien»。這就使俄國、並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奧地利有可能斷定，某些條款，在涉及到英國的情況下，已經達成協議，儘管可憐的約翰勳爵從來也沒有想到要作出這種讓步。既然全部過錯都算在他的不幸的同僚頭上，帕麥斯頓自然不會反對這樣做。但是，路易·波拿巴不能容許別人用這種欺騙辦法來迫使他締結和約。法國政府希望結束這種外交，因此決定立刻把事情弄出一個結局。它擬定了一份最後通牒，德魯安·德·路易斯帶着這份通牒到倫敦去了，在倫敦他取得了英國政府的同意，然後又帶着這份文件前往維也納。這樣一來，德魯安·德·路易斯現在可以看做是英國和法國的共同的代表，而且毫無疑問，為了自己主子的利益，他會用最好的方式來利用這種地位。既然路易·波拿巴唯一的興趣是：在他還沒有為法國取得新的榮譽和新的優勢之前，在戰爭還沒有被充分證實是 «moyen de gouvernement» [“管理手段”] 之前，他就不締結和約，那末很明显，德魯安·德·路易斯的使命絕對不是和平的；恰恰相反，它的目的無疑是在儘可能漂亮的借口下保證戰爭繼續進行。

在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集團內，這場戰爭根本不受歡迎。在法國資產階級中間，這場戰爭一開始就不受歡迎，因為從12月

2日起，这个阶级对“社会救主”的政府采取了完全反对的立场。在英国，资产阶级内部意见有分歧。它的大部分将自己对法国人的民族仇恨转移到了俄国人身上。虽然约翰牛自己有时可以在印度实行某种兼并，但是他并不想让别的国家在离英国本土或它的领地非常近的一些地方去干同样的事情。俄国是在这方面早已引起约翰牛不安的国家。由于不列颠同东方地区的贸易以及通过特拉比曾德同亚洲内地的贸易日益大规模地扩大，船只自由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对英国来说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英国不能容许俄国逐渐并吞多瑙河沿岸各国，因为这些国家作为谷仓的意义在日益增长；英国不能容许俄国封锁多瑙河上的航行。俄国的粮食现在已经是英国消费项目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要是这些与俄国毗邻的产粮国家归并于俄国，那就会使大不列颠处于完全依赖俄国和合众国的地位，而这两个国家就会变成世界粮食市场的调节者。此外，在英国常常流传着关于俄军向中亚细亚挺进这样一些捉摸不定的、使人惶惶不安的谣言；不熟悉地理的英国公众，很容易相信那些在印度事务上有利害关系的政客和吓破了胆的幻想家所大力散布的这种谣言。因此，当俄国开始侵略土耳其时，民族仇恨马上就很明显地暴露了出来；也许，从来没有一场战争像这场战争那样受人欢迎。主和派只好暂时保持缄默；甚至其中很大一部分成员已被大流所卷走。但是了解英国人性格的人都相信这种好战的热情不会持续很久，至少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如此。只要战争使资产阶级破费，它的唯利是图的天性就比它的民族自豪感占上风，对私人利益立即会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比对全民族的巨大优势必然要逐渐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更厉害。皮尔分子——战争的反对者，与其说由于真正爱好和平，不如说由于自

己的局限性和胆怯（这种局限性和胆怯总是使他們在碰到任何一次大危机和果断行动的时候就害怕起来），采取了种种措施想使每个英国商人和工厂主都能精确地計算每一个法寻、他个人 *per annum*〔每年〕要为战争付出什么代价的偉大的时刻加快到来。格萊斯頓先生輕視发行公債这一通常的主意，一下子就把所得税提高了一倍，并且暂时中止了財政改革。后果很快就表現了出来。主和派又重新抬头了。約翰·布萊特以他固有的毅力和頑强精神大胆地起来反对国内盛行的情緒，結果他終于使得工业区倒向他这一边。在倫敦，情緒仍然有利于战争，但是主和派影响的增长甚至在这里也漸漸明显起来。順便应当提到，和平协会以往在首都从未享有过任何重大的威信。然而它正在全国加紧鼓动工作，只要再經過一年的時間征收加倍的所得税并且发行公債（而发行公債現在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就足以消灭工商业階級中的好战精神的最后痕迹。

这两个国家里的人民群众的情况則完全不同。法国的农民从1789年起，就是战争和軍事荣誉的热烈拥护者。这一次农民們都确信，他們不会强烈地感觉到战争的重担，因为在土地无止境地在小私有者之間分散的国家里，征兵不仅使农业区不再有剩余的劳动力，而且每年使将近两万个年轻人有适当的机会去掙相当多的錢，使他們有可能作为代替者去服兵役。只有持久的战争才会严重地影响到农民。至于軍事稅，皇帝不敢把它加在农民身上，他不会拿自己的王冠和生命去冒险。在农民中間維護波拿巴主义的唯一手段，就是免除农民的軍事稅以收买农民的好感；因而在最近几年內农民大概能免于这种压迫。

在英国，情况也大致相同。在农业区通常存在着劳动力过剩

的現象，兵士的基本群众是由农业区提供的，只是在战争后期才从城市的不安分的人中間得到了大量的补充兵員。因为在战争开始时商业或多或少还处于令人滿意的状态，不久前在农业方面又实行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所以这次农村新兵的数量比过去少些，而目前民軍中市民显然占多数。但是即使应征入伍的人数不多，也足以对工資产生有利的影响，而农村居民的同情心又总是在来自他們中間的并且后来成了他們心目中的英雄的兵士这一边。直接稅并不触犯小佃农和农业工人，必須經過几年战争他們才会感觉到自己身上間接稅的增加。在这些人中間，好战热情比任何时候都强烈；沒有一个乡村不开設以“阿尔馬的英雄”为招牌的新啤酒鋪或諸如此类的什么鋪子，乡村里几乎每一家的牆上都裝飾着奇怪怪的描繪着阿尔馬会战、因克尔芒会战、巴拉克拉瓦城郊的攻击的彩色画以及腊格倫勋爵等人的肖像。但是，如果說法国的小农由于占巨大优势（占人口的五分之四）而且对路易-拿破侖抱有特殊态度因而他們的意見能举足輕重，那末在英国，仅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农业人口就几乎沒有任何影响，他們只不过扮演了土地貴族的附屬品和应声虫的角色。

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业无产階級对于战争采取了几乎是同样的特殊态度。無論英国无产者或是法国无产者都充滿着崇高的民族感情，不过他們或多或少摆脱了两国农民所固有的陈旧的民族偏見。除了同胞們的胜利能使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得到滿足，而法国人輕率地过于自信地指揮战争和英国人胆怯地愚鈍地指揮战争，給予他們一个很好的鼓动机会来反对現政府和执政階級以外，战争對他們很少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對他們來說最主要的是下面这一点：与商业危机（目前还只有一些初步表現）結合在一起的、

由那些沒有能力解決他們所面臨的任務的人們所指揮的、同時又具有歐洲規模的這場戰爭，必然會引起一些事件，這些事件將使無產階級能夠重新取得它在法國 1848 年六月戰鬥¹²⁴中所失去的地位。這不僅關係到法國，而且也關係到整個中歐，包括英國在內。

在法國，任何新的革命風暴早晚会使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對這點也不可能有任何懷疑。在英國事態很快就會發生同樣的變化。貴族階級希望繼續戰爭，但是它沒有能力進行戰爭，而去年冬季戰爭進行得很不利，這使它的聲譽已經完全掃地。資產階級不希望繼續戰爭，但是戰爭現在又不可能結束；資產階級為了和平而奔忙，從而證明它沒有能力治理英國。如果事件迫使貴族階級連同它的各種派別離開政權，同時也不讓資產階級掌握政權，那末只剩下兩個階級能執掌政權：小資產階級即小有產者階級和工人階級。前者在每一次號召它把言論變成行動時，都暴露出缺乏毅力和果斷精神；後者則在作為一個階級開始行動時，常常因表現出了過多的毅力和果斷精神而受到指責。

究竟哪一個階級能使英國擺脫目前的搏鬥和由此而眼看就要產生的那些困難呢？

卡·馬克思寫於 1855 年 4 月 10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5 年 4 月 27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4375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弗·恩格斯 評拿破侖在“通报”上的社論¹²⁵

倫敦4月14日。公众，甚至法国的公众，看来都已識破塞瓦斯托波尔圍攻的秘密。因此，作为“通报”en chef〔总〕編輯的路易·波拿巴就这个问题又大写起冗长的社論来。他指望用这篇社論达到几个目的：总的是就已开始的行动遭到失敗一事安慰公众；特别是解脫拿破侖第一的继承者对失敗所負的責任，而其中还对布魯塞尔回忆录进行了答辯。这篇以半亲昵、半官腔的笔調（这是同时为法国农民和欧洲各国政府撰写文章的这位作者特有的風格）写成的文章很像是战史，还夹杂了为每一个步驟所臆造的根据。这个文件极为拙劣，因为它非常无力而不能令人信服。但是，既然波拿巴被迫用这种办法讲话并替自己辯护，那末可見 pressure from without〔外界的压力〕是很大的。

在冗长的前言之后，公布了圣阿尔諾在作战初期所接到的部分指令，并說明为什么联軍起初在加利波利登陆。这里写道，俄軍可能在魯舒克附近强渡多瑙河，迂迴苏姆拉到瓦尔那一綫，越过巴尔干山脉向君士坦丁堡挺进。在凡是引用来为加利波利登陆辯护的所有理由中，这是最坏的一个。首先，魯舒克是要塞，而不是像这位至高无上的“通报”发行人看来所想像的那样，是不設防的城市。这使我們联想到不久以前“通报”刊載的关于尼古拉皇帝的

訃聞中把阿德里安堡條約同庫楚克-凱納吉條約混同起來而犯的历史錯誤¹²⁶。至於談到俄軍這一側敵行軍的危險性，那就應當想到：俄軍如果不派強大的兵力去箝制固守在四大要塞^①之間的6萬土軍，那末他們的後方便不能不受到威脅；這一側敵行軍會使巴爾干山脈狹谷中的俄軍陷於杜邦在拜蘭和萬當在庫爾姆¹²⁷那樣的境地；在最好的情況下俄軍也只能有25 000人到達阿德里安堡。至於認為這樣的一支軍隊對君士坦丁堡造成了威脅的那些人們，他們可以從莫爾特克少校關於1828—1829年俄土戰爭一書¹²⁸中吸取某些有益的東西。現在再看下面寫的。如果君士坦丁堡沒有任何危險，那末聯軍就應派幾個師向瓦爾那推進，以便粉碎圍攻錫利斯特里亞的任何企圖。在這以後可能的行動有兩個：或者在敖德薩登陸，或者攻占克里木。聯軍的將軍們應當就地討論這兩個行動的問題。指令末尾是用訓示和格言形式寫的幾點英明的軍事忠告：

“要經常了解敵人在做什麼。要集中兵力，不要分散；當你被迫分散兵力時，要使他們能在一晝夜內重新集結於指定地點”云云。

所有這些的確都是最寶貴的行動準則，但却是老生常談和人所共知的東西，以致使人立刻會自然而然地得出結論：既然聖阿爾諾需要這樣的訓示，看來他在主子眼中是個十足的不學無術之徒。然而，指令卻忽然用下面幾句話出人意料地結束了：

“元帥，您享有我的充分信任！出發吧，我相信在您富有經驗的指揮下，法蘭西之鷹將獲得新的光榮。”

至於談到主要的一點，即克里木遠征，波拿巴承認，這是他得

① 即魯舒克、錫利斯特里亞、蘇姆拉和瓦爾那。——譯者注

意的計劃，后来他为此給圣阿尔諾发去一批新的指令。但是他否认他曾亲自拟定远征計劃的一切細節并把計劃送到大本营。按他的話說，將軍們是可以選擇在敖德薩登陆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波拿巴引用了这些新指令中的一点，即他曾提出在費奧多西亚（卡法）登陆，因为考虑到那里有安全而寬闊的停泊場，可供应当成为軍队固定作战基地的舰队使用。关于作战基地的概念，他还在最初的指令中就試图最詳尽最通俗地对这位著名的元帅作解釋。軍队應該从卡法这个地点开往辛費罗波尔，把俄軍赶到塞瓦斯托波尔，在塞瓦斯托波尔工事前面也許要进行会战，最后再圍攻該城。“不幸得很”，联軍的將軍們沒有执行他所提出的計劃。但这个“不幸的”事情却成了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它使波拿巴摆脱了对这个不愉快事件的全部責任，而把一切推到將軍們的身上。以6万兵士在卡法登陆以便由該地进击塞瓦斯托波尔这一計劃的确是很奇特的。按照一般的規則，在敌人領土上的軍队的进攻力量至少是离作战基地愈远就愈弱，試問：通过120多英里长的距离以后，联軍还会有多少人开到塞瓦斯托波尔？必須留在卡法的有多少人？扼守和巩固中間地点需要多少人？保护运输和肃清殘敌又需要多少人？也許，在要塞的城墙下連集中2万人都办不到，然而仅是封鎖这座要塞就需要比这多两倍的兵力。如果路易·波拿巴在某一天忽然想起要亲自出征，并按照这些原則作战，那末两个都姓波拿巴的人在战史上无疑将成为最鮮明的对照。^①至于談到卡法安全的停泊場，那末黑海的每个水兵都知道而且任何地图都标出：卡法

^①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这篇文章中，这一句話是：“如果路易-拿破侖在某一天忽然想起要亲自出征，并按照这些原則作战，那末他便会立刻关心到他在倫敦的住处米瓦特私邸，因为他再也不会看到巴黎了。”——編者注

是一个暴露的停泊場，只能擋住北風和西風，而黑海上最可怕的風暴却是西南風和东南風。例如 11 月 14 日的風暴便是这样。如果舰队那时停泊在卡法附近，那它一定会被刮上海岸。

接着，是社論最微妙的部分。路易·波拿巴自以为他本身已僥幸地卸脫布魯塞尔回忆录加在他身上的責任。但是他又不便牺牲腊格倫和康罗貝尔。因此，为了证明这两位將軍的才干，他又对圍攻法作了概略的描述。但是这个描述实质上只是证明塞瓦斯托波尔是不可能攻下的，因为它明确地強調了所有的一般規則都不适用于塞瓦斯托波尔。

社論写道：“例如在一般的圍攻中，如果从一个方向攻击，那末最后一道平行壕的长度可能約为 300 米，塹壕全长可能不超过 4 000 米。而在这里，平行壕却长达 3 000 米，塹壕的全长則达 41 000 米。”

的确是这样，但是問題也正在这里：**为什么**当全部情况要求把火力尽量集中到一两个地点的时候，却反而把攻击綫拉得这样长呢？答案是：

“塞瓦斯托波尔不同于其他要塞。那里只有一条不很深的护城壕；沒有石质內岸，代替这些防御工事的是**鹿砦**和**防栅**。因此，我方火力只能对土质胸牆起很小的作用。”

这不可能是为圣阿尔諾元帅写的（他可能会相信这个說法），所以显然是特地为法国农民写的，因为法軍的任何一个士官都可能对这派胡言哈哈大笑。防栅只要不是設在护城壕底，至少不是在圍攻者看不到的地方，那就很容易为霰彈所毀。**鹿砦**可以燒毀。鹿砦应当設在斜堤脚附近，距胸牆約 60—80 碼，否則就会妨碍炮兵射击。但是从哪里能取得做这些鹿砦用的树木呢？——这要粗大的树木，并且要把它們牢固地連接起来，橫放在地上，使砍尖的

枝干朝向敌方。在这个无林区哪里有树木呢？关于这一点“通报”却只字不提。說什么防栅比石质內岸进了一步，这真是新发现；要知道这种木质工事很容易被燒掉，因而当防守者的炮火被压制住以后，它們并不能阻碍强攻。

社論的結尾告訴我們，联軍將軍們已作了所能作的一切，而且超过了在这样条件下所能期望于他們的，甚至还获得了荣誉，——这正是这篇社論所要证明的一点。如果荣誉需要证明，而且用这种方式来证明，那末这是不光彩的荣誉！这些將軍老爷們之所以不能包圍塞瓦斯托波尔，他們之所以沒有能赶走俄国的監視軍，他們之所以直到現在還沒有进入塞瓦斯托波尔，那只是因为他們力量不够！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可是，如果說他們力量不够，那末究竟誰对这个在一切錯誤中最大的錯誤負責呢？不是別人，正是波拿巴。这就是“通报”社論所导致的必然的結論。至于这篇社論在巴黎造成的印象如何，那可以从平常是那样奴顏婢膝的“泰晤士报”駐巴黎記者的一篇通訊的摘录中看出：

“有些人认为这篇社論簡直是軍隊完全撤离克里木的先声。在正統主义集团中可以听到：我們曾被許以拿破侖式的战争，但看来現在将得到路易-菲力浦式的和平。另一方面，在圣安东郊区的工人居民中也充滿着这种情緒。他們认为发表这篇社論是公开承认自己完全沒有力量。”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4 月 14 日
左右

載于 1855 年 4 月 17 日“新奧得报”
第 177 号，并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4 月 30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37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并根据
“紐約每日論壇报”校对过

弗·恩格斯

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¹²⁹

倫敦 4 月 15 日。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仍舊進展緩慢，毫無生氣，沒有發生任何重大事件，也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只有個別無結果的衝突和零零星星的攻擊才帶來了一些生氣，不過每次的攻擊都是上次的翻版和下次的樣本而已。如果撇開守方在工程方面的優點不談，那末確實很少見到像這樣能表明雙方指揮人員庸碌無能的、如此長期對峙的戰例。

我們手頭有法國和英國官方關於 3 月 23 日出擊的報道；俄國方面詳盡的報道我們還沒有見到。同往常一樣，聯軍將軍們的報道故意寫得含糊不清，以致無法從中得知任何肯定的東西。但依靠英國人的私人信件和報紙的通訊，還是能夠——雖然是概略地——描述這一事件的。聯軍**進攻部队的右翼**正對塞瓦斯托波爾防綫的東南段，由於聯軍構築了三條接近壕，即鋸齒形塹壕，並把這些接近壕的末端以所謂第二道平行壕連接起來，因此右翼推進到距俄軍第一道防綫 600 碼的地方。而这三條接近壕又從第二道平行壕起很緩慢地、毫無規則地向前延伸，以便由第三道平行壕把它們連接起來，並在中央那條接近壕內建立筑壘陣地或足夠配置預備隊的隱蔽地。中央那條接近壕由英軍占領，左右兩側的接近壕則由法軍占領。兩側的接近壕比中央的接近壕推進得遠些，因此法軍塹壕比英軍陣地距要塞大約近 50 碼。

3月23日拂晓前，俄軍以相当大的兵力（大約12个营），从城內冲向圍攻工事。俄軍非常了解联軍构筑塹壕时完全忽視了操典所規定的預防措施，平行壕的两端沒有适当地弯向后方，也沒有多面堡防护，因此向平行壕的两端大胆地猛攻必然能突入塹壕；于是俄軍以突然而迅速的机动开始了攻击，結果迂迴了平行壕的东西两翼側。当俄軍的正面攻击牵制住塹壕的战斗警戒部队及其預备队时，他們的迂迴纵队不顾法軍的英勇抵抗，跳进圍攻工事，开始沿塹壕迅速前进，一直冲到英軍防守的中央陣地。正面受不到严重威胁的英軍陣地，在来自左右两方的步枪射击迫使英軍部分預备队投入战斗以前一直沒有遭到攻击；甚至在这以后，俄軍的正面攻击仍然不猛烈，因为他們的主攻力量都集中在迂迴纵队內。但是这些迂迴纵队沿攻占的塹壕边战边进地通过了很远的一段距离以后，便丧失了最初的銳气，自俄軍同英軍接触时起，他們的軍官所考虑的便都是如何保障退却以結束出击。这样一来，战斗很快就轉入双方相持不下的阶段，而在此时，出击部队正是应当考虑如何安全退却了。俄軍也正是这样做的。他們沒有真正打算把英軍逐出陣地，而是繼續坚持战斗，直到大部分部队退到距塞瓦斯托波尔已足够近时为止；此后，后卫也撤退了，在同法軍和英軍的預备队的战斗中，后卫受到了很大的損失。

看来，俄軍原来以为在第二道平行壕內能发现許多火炮、大量彈药和其他軍用物資。他們出击的目的只能有一个，即消灭所有这一切。但是俄軍在那里几乎什么也沒有找到，因而这次出击毫无所获，只是使俄軍确信：就是在距自己工事这样远的地方，他們也能在出击的最初几小时內保持优势，直到敌人集中預备队时为止。这当然有某些意义，但是未必能补偿出击所受的損失。俄軍給圍攻工事

造成的物质損失在一两天內就得到了弥补，而这次出击的精神作用則可以說等于零。因为任何出击必然以退却結束，所以圍攻者总是把自己看做胜利者。出击在精神上所起的作用通常对圍攻者比对被圍者更加有利，只有当后者的損失大大小于前者时才是例外。

正当康罗貝尔和腊格倫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表面的胜利时，俄軍这种没有什么效果的、最后仓卒退却的出击正合他們的心意。法軍特別夸耀自己曾把敌人一直追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跟前。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做到这点并不怎么困难，因为要塞炮为了怕誤伤自己的部队而不能进行射击。至于英軍方面，由于他們的陣地过于縮在后面，因此与其說是起了第一綫部队的作用，倒不如說是起了預备队的作用，但他們避开这一情况不談，却大肆吹嘘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說英国兵具有不屈不撓的勇气，因而不会后退一步，但是，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少根据了。就在这些不屈不撓的兵士防守的地区內被俘并老老实实地被押送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凱利上校和其他英国軍官們知道，这种 cant〔自夸〕究竟有多少价值。

与此同时，英国报界的大战略家們繼續在慷慨激昂地重复強調說，在考虑强攻塞瓦斯托波尔之前，无论如何必須先攻占俄軍新构筑的外圍工事；他們还希望这能很快就实现。自然，他們的主張是正确的，但也是陈腐的。問題在于，联軍既然在自己炮队火力的控制範圍內都不能阻止俄軍构筑这些工事，又怎样能攻占它們呢？对色楞格多面堡（在薩蓬山上）的攻击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以巨大損失作代价可以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內攻占这样的工事，但难以理解的是：既然这些工事攻占后守不了多久，甚至还守不到为破坏它所需的时间，那末为什么还要去攻占它。問題在于，这些新工事是俄軍整个防御体系的有机組成部分，它的翼側和后方都处于主

要防线的控制之下，所以不采取攻夺主要防线时所必需的那些手段，那是无法夺取它们的。对攻击和占领这些外围工事作认真考虑之前，必须使接近壕向前延伸到足够近的距离上，构筑带屯兵场的隐蔽平行壕，并设置射击俄军主要防线用的炮台。鼓吹得最厉害并坚决主张立即夺取外围工事的“泰晤士报”，只是忘记了说出用什么新方法才能够在几小时内完成它这样有信心地宣布的艰巨任务。但该报还没有来得及表达自己乐观的希望，就接到驻克里木记者的来信，这位记者不仅宣称俄军新的外围工事是攻不破的，而且还说那些工事仅仅是第一线，俄军还打算有步骤地从那里向前延伸自己的反接近壕。马美朗多面堡（俄军称之为堪察加多面堡）前的战壕，已经被一条整齐的塹壕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一道新的防线。在马美朗多面堡与色楞格多面堡（在萨蓬山上）之间，挖掘了一条新的塹壕，它形成正方形的三个边，从这里可以对法军的部分接近壕进行纵射。总之很清楚，俄军企图建立完整的前进防御工事体系，以便由两翼和正面掩护马拉霍夫冈，而最后也可能要攻占联军的塹壕。一旦这一企图实现，联军在这个攻击地段的围攻线就将被突破。最近6个月以来，联军仅仅是扼守自己的阵地，多半是巩固自己的炮台，而很少向前推进，但俄军在一个月內却向敌人阵地推进了很多，并且还在继续推进。当然，还有比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更出色的防御战例，但是像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这样没有系统、不可理解和不光彩的围攻战例，在特洛伊围攻以来的战史中却是一个也找不出来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4月15日左右
载于1855年4月18日“新奥得报”第
179号，并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4月
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7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¹³⁰

一

据可靠消息报道，俄国**当今的皇帝**给某些宫廷发了一份电报，其中说道：

“一旦奥地利同西方最终结成联盟，或者对俄国采取某种公开敌对行动，亚历山大二世就要亲自领导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并且将把他目前的**全俄罗斯皇帝**的称号改为**全体斯拉夫人皇帝**的称号〈？〉。”

如果亚历山大的这个声明确实可信，那末它就是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坦率的表白。这是使战争具有欧洲性质的第一个步骤，到现在为止这种性质只是从各种各样的托词和借口、议定书和条约、瓦特耳的几段话和普芬多夫的话录来猜测的。土耳其的独立问题、甚至土耳其的生存问题从而也退居次要地位。现在问题已经不是谁来管辖君士坦丁堡，而是谁来统治整个欧洲了。斯拉夫人由于内部纠纷早就弄得四分五裂，他们被德国人逼退到东方，部分地被德国人、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所征服，但是他们用逐渐传播泛斯拉夫主义的办法在1815年以后又悄悄地把自己的各个支系联合起来，现在他们第一次声明自己的统一，并且进而向至今还统治着欧洲的罗曼-赛尔特民族和德意志民族宣布殊死战。泛斯拉

夫主义,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这是一种力图把一千年来历史所创造的一切东西化为乌有的运动;这是一种只有把土耳其、匈牙利和半个德国从欧洲地图上抹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后,又只有通过征服欧洲的办法才能保证自己的未来的运动。现在泛斯拉夫主义已经从信条变成了政治纲领,它掌握有 80 万名步兵。它使欧洲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或者被斯拉夫人征服,或者永远消灭泛斯拉夫主义的进攻力量的中心——俄国。

我们必须回答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奥地利被俄国式的泛斯拉夫主义所触动的程度如何?在居住在波希米亚森林和克伦地亚的阿尔卑斯山以东的 7 000 万斯拉夫人中,几乎有 1 500 万人处在奥地利君主的统治之下,其中几乎包括斯拉夫语系的所有各种代表。波希米亚系或捷克系(600 万人)全部处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波兰系有近 300 万加里西亚波兰人,俄罗斯系有住在加里西亚和匈牙利东北部的 300 万小俄罗斯人(卢西人和卢田人),这是在俄罗斯帝国境外的唯一的俄罗斯族;南斯拉夫系几乎有 300 万斯洛文尼亚人(克伦地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以及为数不多的散居各处的保加利亚人。因此,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分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是由各民族的残余分子组成,他们过去有自己的历史,而现在的历史发展是同那些与他们有不同种族和语言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作为民族,处境是困难的,这是因为这些过去伟大而现在悲惨的残余分子在奥地利境内没有任何的民族的组织,相反地,他们散居在各个省内。斯洛文尼亚人虽然勉强强有 150 万人,但他们分散在克莱纳、克伦地亚、施梯里亚、克罗地亚以及匈牙利西南部等各省。捷克人是奥地利斯拉夫人中人口最

多的一个民族，一部分住在波希米亚，一部分住在莫拉维亚，一部分(斯洛伐克系)住在匈牙利西北部。因此上述这些民族虽然全都住在奥地利境内，但未被承认为已经形成了的不同的民族。他们或者被看成是德意志民族的附加部分，或者被看成是匈牙利民族的附加部分，实际上他们也不是什么别的民族。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另一集团是由一些零星的不同的民族构成的，这些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同本民族的基本群众分离，因而他们的主要中心是处在奥地利境界以外。因此，奥地利的波兰人倾向于俄属波兰，把它看做自己的自然中心，卢西人倾向于另一些同俄国合并的小俄罗斯地区，而塞尔维亚人则倾向于土耳其的塞尔维亚。所有这些同本民族分离的零星部分，每个都倾向于他们的自然中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随着他们中间文明的传播，并因此对民族历史活动的需要的日益增长，这种现象也就愈来愈明显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仅仅是 *disjecta membra* [分散的人，零星的部分]，他们力图彼此重新结合起来，或者是各自同本民族的基本群众合而为一。为什么泛斯拉夫主义不是俄国的而是奥地利的发明创造，原因就在这里。为了保证各个斯拉夫民族的复兴，奥地利的各个斯拉夫民族就开始赞成欧洲所有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俄国本身是强大的，波兰则深深意识到自己民族存在的不可动摇的稳定性，而且公开地敌视斯拉夫俄国——显然这两个民族都不会要求创造泛斯拉夫主义。处在土耳其统治之下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还很不开化，不会提出这种思想；保加利亚人顺从地屈服于土耳其人，而塞尔维亚人则致力于争取本身独立的斗争。

二

泛斯拉夫主义的最初形式是纯粹文艺的形式。它的创始人是多勃罗夫斯基（捷克人，斯拉夫方言的科学语文学的奠基人）和科勒（匈牙利外喀尔巴阡山的斯洛伐克诗人）。多勃罗夫斯基富有学者和研究家的热情，而科勒的政治思想很快占了优势。泛斯拉夫主义起初只满足于一些哀诗，它的诗歌的主题是过去的伟大，现在的耻辱、不幸和异族的压迫。“呵，上帝！难道大地上就找不到一个人能把正义交还给斯拉夫人吗？”关于建立一个迫使欧洲遵守它的法律的泛斯拉夫帝国的想法，那时还只是模模糊糊地有所表露。但是，哀诗时期很快就结束了，单纯“为了斯拉夫人的正义”的呼吁也随之过去了。

有关斯拉夫人的政治、文学和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研究活动，在奥地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语言学家沙法里克、科皮塔尔和米克洛希奇以及历史学家帕拉茨基领导了这个运动，追随他们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天资较差或根本没有才能的学者，如汉卡和盖伊等人。捷克和塞尔维亚的光荣的历史时代都被作了色彩鲜明的描绘，以与这些民族目前受屈辱的悲惨处境相对照；正如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政治和神学在“哲学”的幌子下遭受批判一样，在奥地利，梅特涅认为，泛斯拉夫主义者利用语文学来鼓吹斯拉夫人统一的学说，并建立这样一个政党，它的目的显然是要根本改变奥地利各民族的现状，甚至要把奥地利变成一个大斯拉夫帝国。

从波希米亚和克伦地亚往东，一直到黑海，语言的混杂情况真是令人吃惊。居住在邻接德国地区的斯拉夫人中间非民族化的过

程，德国人的緩慢而不間断的推进，匈牙利人的入侵（这一入侵的結果使北部和南部的斯拉夫人被 700 万密集的芬兰民族分割开来），插入斯拉夫族地区的土耳其人、韃靼人和瓦拉几亚人的存在——所有这一切造成了真正的語言上的巴比倫。村与村之間，几乎是田庄与田庄之間，語言都有变化。甚至在波希米亚，500 万居民中有 200 万德意志人和 300 万斯拉夫人，而且这些斯拉夫人三面受到德意志人的包圍。奥地利的斯拉夫族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斯拉夫人的原有土地归还給斯拉夫人，把奥地利（提罗耳和倫巴第除外）变成一个斯拉夫帝国，这就是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宣布近千年来的历史发展全部无效，砍掉德国的三分之一和整个匈牙利，把維也納和布达佩斯变成斯拉夫的城市——目前占有这些地区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是不能同情这种行动的。而且，各种斯拉夫方言的差別很大，除极少数外，讲斯拉夫方言的人彼此都听不懂。有一个可笑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1848 年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¹³¹上，曾經想找出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共同語言，作了各种各样的嘗試都沒有成功，最后与会者不得不讲他們所最痛恨的語言——**德語**。

因此，我們看到，奥地利的泛斯拉夫主义缺乏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因素：**群众和統一**。所以缺乏**群众**，是因为泛斯拉夫主义派只掌握一部分受过教育的階級，在人民中沒有什么威信，因此要同时反抗它所敌对的奥地利政府以及德意志民族和匈牙利民族，力量就不够了。所以沒有**統一**，是因为泛斯拉夫主义派的統一原則是純粹理想的原則，在第一次企图实现这种統一原則时，就因語言上的差別而遭到了失敗。只要泛斯拉夫主义一直是純粹奥地利的运动，那末它不会有很大的危險性，但它会很快地找到它所需要的

那种統一和群众的中心。

本世紀初土耳其的塞爾維亞人的民族运动¹³²很快就使俄國政府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土耳其的居民中大約有 700 万斯拉夫人，他們的語言是所有斯拉夫方言中同俄語最近似的一种語言，而宗教和教會語言（古斯拉夫語或教會斯拉夫語）則同俄國人的完全一样。俄國依靠自己的希腊正教教會領袖和庇護者的地位，正是在这些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当中第一次开始进行了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动。当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剛剛在奧地利生根的时候，俄國就立刻把它的諜報机关的分支伸展到自己盟国的地区。在它碰到信仰羅馬天主教的斯拉夫人的地方，就根本不提宗教方面的問題，俄國仅仅表現为一个吸引一切斯拉夫人的中心，即团結各个复兴的斯拉夫民族的核心，它要使各个斯拉夫民族形成一个强大而統一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使命是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利亞海到北冰洋的偉大的斯拉夫帝国。总之，这里已經找到了所缺乏的群众和統一！泛斯拉夫主义一下子就落入了圈套。于是，它宣布了自己的判決。为了重新建立想像中的民族，泛斯拉夫主义者表示願意为維護俄罗斯—蒙古人的野蛮統治而牺牲八百年来实际参加过的文明生活。难道这不是一开始就坚决反动地反对欧洲文明发展进程和力图使世界历史开倒車的运动的自然結果嗎？

梅特涅在自己实力最雄厚的年代就已認識到了这种危險性，并且觉察到了俄國的陰謀。他使用他所有的一切手段来鎮压了这个运动。但是他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可以用一个詞來說明，那就是迫害。而唯一有效的手段——德意志和匈牙利的精神的自由发展完全可以驅散斯拉夫怪影——是同他的一套卑鄙的政策相矛盾

的。結果，在梅特涅垮台以后，1848年斯拉夫运动又蓬蓬勃勃地开展了，它席卷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广泛的居民阶层。然而这个运动的极其反动的性质很快就暴露了出来。当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运动显然是一种进步的运动的时候，——斯拉夫人却正是挽救了旧制度，使旧制度免于毁灭，使拉德茨基得以向明乔河推进，使文迪施格雷茨得以夺取維也納。为了使奥地利完全依从于斯拉夫人，强大的斯拉夫后备軍即俄国軍隊于1849年开进了匈牙利¹³³，在那里强迫它接受和約。

如果說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同俄国的結合是它的一种自我斥責的話，那末奥地利同样明显地承认了它自己的沒有生命力，因为它决定接受、甚至呼請这种斯拉夫人的援助以反对它境內的三个剛剛具有历史生命力而且正在表現这种生命力的民族，即反对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从1848年起，对泛斯拉夫主义所欠的这笔債一直威胁着奥地利，意識到这笔債，是奥地利政策的主因。

奥地利已开始在本国領土上反对斯拉夫人，但是，如果不实行哪怕有部分的进步性质的政策，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各省的特权都廢除了，实行了集中管理制来代替联邦管理制，提出承认一种人为的民族——奥地利民族来代替各种不同的民族。虽然这些新办法有一部分是針對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但是它們的重点却落在不大密集的斯拉夫族身上，德意志人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如果說国内对斯拉夫人的依賴因此而消除了，那末对俄国的依賴仍旧存在，所以必須哪怕是暫時地或在一定程度上結束这种直接的和屈辱的依賴状态。这就是奥地利在东方問題上奉行虽然是动搖的、但至少是公开宣布的反俄政策的真实原因。另一方面，泛斯拉夫主义並沒有絕迹；它深受凌辱，它正在憤怒、沉

默，并从在匈牙利进行干涉的时候起把俄国皇帝当做它命中注定的救世主。一旦俄国作为泛斯拉夫主义首領而采取公开行动，奥地利为了使自己生存不至于遭到威胁，是否会采取向匈牙利和波兰让步的对策？考察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的任务。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现在已经不仅是俄国，而是整个泛斯拉夫主义的阴谋有在欧洲废墟上建立自己统治的危险。所有斯拉夫人的联合具有显著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会日益增强，因此这种联合很快要迫使与它敌对的力量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形式行动起来。这里我们没有谈到波兰人，他们可尊敬的大部分是敌视泛斯拉夫主义的；也没有谈到假民主和假社会主义形式的泛斯拉夫主义，这种泛斯拉夫主义本质上同普通的露骨的俄国泛斯拉夫主义不同的地方只是在它的漂亮言词和假仁假义。我们同样很少谈到德国思辨哲学的代表¹³⁴，这些代表们因离奇的愚昧无知而堕落为俄国阴谋的工具。以后我们还要来谈这个问题，并将详细说明这些以及另外一些与泛斯拉夫主义有关的问题。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4 月 17 日
左右

载于 1855 年 4 月 21 日和 24 日
“新奥得报”第 185 和 18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馬克思

論鼓动运动的历史

倫敦 5 月 7 日。在英国举行各次大規模的鼓动运动的时候，倫敦西蒂区一次也沒有能够在运动中打先鋒。直到目前为止，倫敦西蒂区的参加任何一次鼓动，只是意味着这次鼓动的目的已經达到，它已是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实]。由北明翰发起的議會改革运动就是这样。由曼彻斯特领导的反谷物法运动也是这样。1797 年的銀行限制法¹³⁵ 却是一次例外。那时倫敦西蒂区的銀行家及商人們所組織的群众集会，支持了皮特禁止英格兰銀行用現金进行支付，在这以前，銀行的董事們曾于事先几星期內通知皮特說，銀行瀕于破产，只有通过 *coup d'état* [政变]，也就是說通过銀行券的强制性的行价才能挽救銀行。英格兰銀行服从支付現金的禁令，与西蒂区商人（他們的信貸依賴于銀行信貸）支持皮特的禁令并使之推行于全国^① 比較起来，当时情况并不要求英格兰銀行

① 簡直令人难以置信，在最新的政治經濟学史中，把当时西蒂区的行为引为英国爱国主义的证据。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馮·哈克斯特豪森先生在他的“論俄国”（1852 年版第 3 卷）一书中，竟抱着那样輕信的态度，以致断言，皮特用銀行暂时停止支付現金的办法控制住了英国的貨币。¹³⁶ 在俄国，人們究竟造了什么样的謠言，使一个人竟能相信这种事情？对于完全信賴馮·哈克斯特豪森先生并为了证实这一点而仿效他的說法的柏林評論，我們又应怎样考虑呢？

更多地放棄私利。挽救英格蘭銀行就是挽救西蒂區。由此才出現了當時西蒂區的“愛國主義的”群眾集會以及它的“鼓動者的”倡議。西蒂區上星期六在倫敦飯店和金碧大廈舉行了自己的群眾集會，成立了“行政改革協會”¹³⁷，它在目前擔任倡導的功績在於：這是英國非常罕見的新鮮事物——無前例的事件。而且在這些群眾集會上不吃不喝，這也是西蒂區史冊上的新鮮事，因為它的“元魚湯愛國主義”早就被科貝特永久保存下來了。最後，倫敦西蒂區的商人們在倫敦飯店和金碧大廈召開的群眾集會是在大白天營業時間舉行的，這也是新鮮事。目前的商業蕭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這種現象，所以，一般來說，蕭條是西蒂區商界人士精神紛擾的一種酵素，而且是一種重要的酵素。不管倫敦西頭的貴族怎樣竭力嘲笑西蒂區的這個運動，但決不能否認這個運動的重要意義。資產階級改革派的報紙“每日新聞”、“晨報”、“紀事晨報”（這家報紙從某個時期起就屬於這一派）竭力想在自己的反對者面前表現出西蒂區協會的“遠大前途”。但是它們沒有覺察到直接的效果。它們不懂得召集群眾集會的事實本身就已經意味著一些非常重大和非常重要的問題的解決：（1）把議會外的統治階級和議會內的執政階級分裂開來；（2）把直到現在還對政策發生影響的資產階級分子排擠掉；（3）使帕麥斯頓聲譽掃地。

大家知道，累亞德答應今晚要在下院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大家知道，大約在一星期以前議院沒有讓他說話，對他發噓聲，嘲笑他並且給他喝倒彩。西蒂區的英國商界巨子們在自己的群眾集會上，為了對累亞德表示尊敬高呼“萬歲”。累亞德成了倫敦飯店和金碧大廈的一時眾所矚目的人物。西蒂區的 cheers [歡呼聲] 是對下院 groans [喝倒彩] 的一種挑釁性的回答。如果今晚下院表現

出了自己的胆怯，那末它的威信就要丧失，它的日子也就快完了；如果下院还再 groans，那末反对者的 cheers 会更加强烈。而从“阿布德拉人”¹³⁸一书中我們可以知道，cheers 和 groans 之間的竞争会导致什么結果。西蒂区的群众集会是对下院的一个直接的挑衅，这就像在本世紀的最初十年选举弗兰西斯·伯德特爵士为韦斯明斯特的代表是一个挑衅一样。

大家知道，过去领导英国资产阶级运动的是曼彻斯特学派及其布莱特輩和科布頓輩。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們現在被西蒂区的商人們排挤掉了。他們的正統的反战立場使英国的一刻也不得閑着的资产阶级确信，他們——至少是現在——已失去了领导资产阶级的能力。曼彻斯特的大亨要能在現時保持“領導权”，就必需胜过西蒂区的大亨。在布莱特輩及科布頓輩受到排斥、同时他們也自动放棄参加的西蒂区群众集会上，实际表明了资产阶级的两个最大的派別之間的竞争，这种竞争預示着对人民运动将会有好处。可以举下面这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西蒂区委员会書記写信給倫敦的宪章派，建議他們派人来参加西蒂区的常务委员会。宪章派就派了厄內斯特·琼斯到那里去。在商业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間自然沒有像在工人与工厂主、millocracy〔工业巨头〕之間的那种直接的对抗，因此，他們可能采取——至少在开始时——宪章派和曼彻斯特派之間所不可能有的共同步驟。

帕麦斯頓在國內的一个最重要的选区第一次被人嘲笑，被人喝倒彩，——这也是西蒂区群众集会的最后一个巨大成果。他的名字的魅力永远消失了。使他在西蒂区丢臉的不是他的比三十年战争¹³⁹更长久的俄国政策；使他丢臉的是：一方面他假装要帮助英国摆脱它所經歷过的一切危机中最可怕的危机，另一方面他又

进行恶毒的嘲笑，厚颜无耻地妄自尊大，而首先是开“平淡无味的玩笑”。所有这一切激怒了资产阶级的良心，虽然在堕落的“下流”议院^①里也曾取得过成就。

要在目前这样的议会内进行行政改革——任何人都会马上明白这些善良的愿望是不合逻辑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纪里也看到了教皇改革家们¹⁴⁰。我们经历过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改革宴会¹⁴¹。因此，如果冲击古老英国的雪崩一开始是以西蒂区商人改革家手中的雪团的形状出现的，那也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5 月 10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215 号

① 双关语：《Haus der Gemeinen》意思是“下院”，亦即“下流的议院”。——编者注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¹⁴²

星期六晚間这里收到的“亚美利加号”輪船带来的邮件，再次使我們有可能向讀者們作比較全面的有关克里木战争进程的报道，尽管依然互相矛盾和含糊不清的官方报道和报纸通訊使我們的工作做起来頗不容易。十分明显，維也納和談的挫折¹⁴³使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联軍兵营有了生气和較大的活跃气氛，虽然可以說炮击在4月24日就停止了，但是以后的两周也并不是完全沒有行动的。目前还很难断定联軍究竟取得了哪些成果，尽管有一个記者肯定說，俄軍的前进防御工事——色楞格多面堡、沃倫多面堡和堪察加多面堡——以及这些工事前的整个一綫上的战壕均已失守¹⁴⁴。因为这无疑是联軍最大限度的成就，所以我們暫且假定这个消息是确实的。某些記者报道，法軍曾强攻馬奇塔棱堡并攻占了它，但这些消息不足置信。它們只不过是4月21日事件毫无根据的夸大而已，当时法軍曾利用地道爆破的方法在这个棱堡前面炸开了一条最前面的塹壕。^①

① 本文在“新奧得报”发表时，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巴拉克拉瓦、倫敦、巴黎之間建立的电訊直到現在还什么也沒有向公众报道过，但却給公众所获得的消息带来了更大的混乱。

英国政府要就是什么都不公布，要就是只发表一些有关胜利的含糊不清

我們假定俄軍已确实被击退到自己最初的防綫，虽然很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联軍攻占薩蓬山和馬美朗高地的报道。即使这些高地上的多面堡已不在俄軍手中，但是仍然誰也不能否认，俄軍已經很有效地利用了它們。俄軍扼守薩蓬山，是从2月23日起到4月底止，扼守馬美朗高地上的堪察加多面堡，是从3月12日起到4月底止；在这整段時間內，联軍的塹壕不是处在俄軍炮台的纵射火力之下，就是处在它們集中的正面火力之下，而俄軍整个陣地的鎖钥——馬拉霍夫岡，在整整两周的炮击期間却充分地得到掩护。俄軍在有效地利用了这些高地之后，是可能自动放棄它們的。

关于联軍得以攻占俄軍战壕和反接近壕的許多次夜間攻击，以及俄軍为夺回这些工事而进行的出击，沒有必要在这里加以叙述。这些行动从战术观点来看，只对那些亲自熟悉过地形的人才有兴趣，因为这类行动大多取决于下級軍官和兵士的机智、勇猛和頑强。英法軍隊在这些素质方面优于俄軍，所以他們能够在紧靠

的声明。法国政府公布了康罗貝尔签署的一些电文，但其內容已經过严重的删改，以致从中几乎什么也不可能得到。例如，法軍主要攻击的棱堡过去一直叫做馬奇塔棱堡——*Bastion du Mât*。現在，我們听到的却是法軍先在攻击中央棱堡而后在攻击第四棱堡时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把这些报告同过去的、特别是同俄国方面的报告仔細核对，便可以看出所談的仍是我們过去所熟悉的棱堡，即馬奇塔棱堡，只是換了个名称而已。这样故弄玄虛完全是有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注定如此’的。

但是，电訊虽沒有給公众带来好处，却显然使联軍兵营有了一些生气。无容置疑，在康罗貝尔收到的第一批电报內就有严格的指示：更坚决地行动，用一切手段获得某些胜利。有一則非官方报道肯定地說，俄軍的全部前进防御工事——色楞格多面堡、沃倫多面堡和堪察加多面堡，——以及它們前面的整个一綫上的战壕均已失守。”——編者注

俄軍工事的某些地方建立自己的据点。在个别地方，双方已接近到手榴彈可以投到的距离，也就是說联軍距俄軍的隱蔽路只有20—30碼，距主牆只有40—60碼。俄軍宣称，圍攻部队距主牆30俄丈，即60碼。在馬奇塔棧堡、中央棧堡和大凸角堡之前的态势就是如此，那里有些洼地形成了死角，而且它們的位置使俄軍火炮不能构成相应的俯角对它們进行曲射。但是由于俄軍炮兵的火力根本未被压制住，所以很难同这些洼地保持聯絡和把它們变成完整的塹壕体系，因而联軍将会遭到俄軍側射火力的严重威胁。事实上，当联軍的炮队还在前进塹壕之后400—500碼处的时候，很难設想联軍能守住这些沒有掩护的陣地，去对抗俄軍相当大的兵力突然进行的出击；而在目前已公认为不成功的炮击以后，还需要經過一定的時間，才能使向前推进得較远的新炮队开始射击。

联軍几乎到达俄軍的要塞圍牆脚下这一突然的进展，虽然表面看来不像过去那样緩慢和迟疑不决，但实际上还是老一套。联軍进行这次圍攻时，既无系統，又未遵循严格的順序；而任何圍攻既然实质上都是严格的循序渐进的行动，在每一步驟完成之后，为了不致徒劳无益，都应当立即获得某种新的胜利。因此十分明显，联軍是按照各种可能有的計劃中最糟糕的一个計劃进行圍攻的。虽然联軍的將軍們在最初看到作战地区時曾产生过失望情緒，虽然去年秋季在所謂第一次圍攻期間有过失策，联軍本来还是能够获得更大的胜利的。这里，我們也像联軍的將軍們那样完全撇开塞瓦斯托波尔北区不管。这些將軍們毅然决定单攻南区，要冒險进入为他們无法接近的堡垒所瞰制的市区。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問題：或者是联軍的將軍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攻下南区，如果是这样，他們現在将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或者是他

們感到自己的兵力太弱，那末試問，他們为什么不調援軍來呢？現在已無法否認這一事實，即在這個“值得紀念和史无前例的”圍攻中，是一次接着一次地失策的。看來，在冬季不得不忍受的困苦，使部隊和將軍們都產生了無法克服的萎靡不振、淡漠和疲倦的情緒。在2月間，俄軍大胆地沖出自己的工事，在前面建立了新的防綫，這對聯軍來說似乎應當是個相當大的震動，應當迫使他們動員自己的兵力；然而，康羅貝爾却只會利用這一嚴重的警告來冷卻朱阿夫兵的战斗熱情，派他們去進行他明知必敗的攻擊。掘壕作業恢復了，但這與其說是為了使炮隊更接近敵人，不如說是為了給強攻縱隊開辟隱蔽路。甚至在俄軍要塞附近呆了6個月以後，聯軍的每個行動都仍然證明他們並沒有明確的計劃，也沒有確定總攻擊的地点；相反地，他們仍然抱着以 *coup de main* [大胆突擊] 的方法攻取塞瓦斯托波爾的老主意不放，這就妨礙他們採納任何合理的建議，阻礙他們實現逐步前進的任何企圖。聯軍所做的並不多，而且比正規圍攻作業多花了两倍的時間；同時，由於行動沒有按順序，又沒有總的計劃，因此甚至沒有能產生對這種行動所本應具有的勝利信心。

然而聯軍卻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不久前進行的炮擊上面。這就是他們為歷次行動遲緩和按兵不動作辯解的主要理由。雖然很難說以遠離目標600—1000碼的炮隊進行炮擊這件大事究竟能產生什麼效果，但是炮擊終於開始了。頭两三天，每門炮發射了150發炮彈，後來發射了120發，再往後是80發、50發，最後是30發，這以後炮擊就停止了。假如不算聯軍損壞的火炮和用空的彈藥庫，那末就幾乎看不到什麼結果。如果聯軍進行5天最猛烈的炮擊，那也許比進行15天開始猛烈而後立即減弱的炮擊會使俄軍

受到更大的損失，并使聯軍有更多的獲勝的機會。但是，聯軍在彈藥缺乏、火炮損壞的情況下，難道能夠利用這樣的有利機會嗎？他們是不能比現在所做的再多做些什麼的；而這時，當聯軍的炮火減弱而且已不再像最初 5 天那樣每天向俄軍發射 5 萬發炮彈以後，俄軍目前的處境比可能有的處境已好得多。聯軍用減弱火力強度的方法延長炮擊的持續時間，這種做法是嚴重違背一切軍事原則的，是不可解釋的，這無疑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頭兩天的炮擊使聯軍誤以為有希望，但是在維也納會議期間却必須保持虛張聲勢的炮擊，這就迫使他們毫無目的地消耗了彈藥。

炮擊已經停止，維也納會議已經中斷，電訊已經建立。情況立即起了變化。巴黎發出了迅速而堅決地行動的命令。原來的攻擊方法不再使用了，無效果的炮擊改為局部強攻、用地道爆破奪取陣地、進行互射和白刃格鬥。雖然遭到了被圍部队的初次出擊，聯軍仍向前占領并守住了新的地點。但是，如果不可能在接近俄軍防綫的地點配置炮隊并迫使俄軍撤離這些防綫的話，這就不是什麼成功。如果每天不付出重大的代價，不能經常在互有勝負、得失難定的格鬥中堅持下來，就無法守住這些最前面的陣地。即使第二和第三道平行壕內的炮台已經構築好，并且為了構築這些炮台一開始就已將俄軍趕出戰壕，但是又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在這些新炮台上架設足夠的火炮，以便對最近兩次炮擊中已經表明并不弱于聯軍火力的俄軍的火力進行有效的回擊呢？炮隊距離敵人工事越近，可能向它們集中的交叉火力就越猛烈，配置火炮的空間也就越有限，換句話說，只要守方的火力未被較遠距離上的炮隊的火力壓制住（現時還沒有做到這一點），攻守雙方的火力就會更加不相上下。

俄軍究竟依靠了什么才如此順利地抗击了联軍的攻击呢？第一，依靠联軍本身的錯誤和犹豫不决；第二，依靠守軍的英勇和工程长官托特列本上校的才略；第三，依靠陣地本身的天然坚固性。因为必須承认，陣地的坚固程度的确是少有的。按照直到最近才辨別清楚的质量很差的地图来看，塞瓦斯托波尔位于山坡的下方，后面有高地瞰制；但按照质量較好的新地图来看，該城边缘位于成环形的、同台地之間有雛谷相隔的若干独立的丘陵上；这些丘陵实际上是在同样的程度上瞰制城市和台地。这种地形也許可以充分地說明，为什么去年9月联軍不敢强攻要塞；看来，它对联軍的將軍們起了极大的影响，竟使他們甚至不敢試图迫使敌人显露防御力量。俄国工程师最充分地利用了这些地形上的优点。在塞瓦斯托波尔所有面向台地的山坡上，都构筑了两列甚至三列而且一列比一列高的炮台，这使得防御力量增强了一倍甚至两倍。在其他城市（如巴黎的蒙瓦勒里安山坡）筑垒时也曾构筑过这种炮台，但工程师們一般并不贊成这种炮台，并称之为靶子。它們的确是圍攻部队的大靶子；炮彈在未命中所瞄准的炮台时，也会射中其上方或下方的炮台，因而守方总是要遭受重大的損失。但是，在要塞甚至沒有被圍住的情况下，比如在塞瓦斯托波尔，这种損失同炮台赋予防御火力以巨大威力的好处相比，就微不足道了。我們认为，在塞瓦斯托波尔圍攻战結束以后，对这种炮台的非难就会很少了。在防守有大量軍用物資且不易被圍的第一流要塞时，如果地形有利，就可以非常有效地利用这种炮台。除了这种炮台以外，俄軍在其他方面也沒有墨守工程学上的陈規。按旧的棱堡体系，要塞周圍构筑15个甚至17个棱堡可能还不够用，它們对要塞的防御可能还保障得很差。現在俄軍改变了这种做法，只在向前突出的高

地上构筑 6 个棱堡，而连接棱堡的中堤则成折线形，可以不依赖棱堡本身的火力进行侧射，而配置在折线突出部的重炮则能射击前面的整个地区。在这些中堤上（几乎是整个中堤）配置了火炮，这又是一个新的创造，因为一般棱堡的中堤上通常只配置 1—2 门仅用以射击专门目标的花炮，而整个火力防御则依靠棱堡和眼镜堡。现在虽然没有更详细的技术材料，但就上述情况也可以看出：俄军最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条件，即使联军攻占了马奇塔棱堡或马拉霍夫冈上的棱堡，他们无疑地还会碰上第二和第三道防线，而且必须施展全部本领和运用一切机智，才能突破这些防线。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5 月 8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5 月 2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01 号，并
载于 1855 年 5 月 11 日“新奥得报”
第 21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新奥得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皮阿諾里。——对奧地利的不滿

倫敦 5 月 9 日。“紀事晨報”、“晨報”、“每日新聞”以及其他報紙对“通報”的某一号提出了十分怯懦的責难，从而結束了它們对奸詐的凶手皮阿諾里的一切痛罵。这一号“通報”发表了对皮阿諾里的起訴书，同时刊載了付給坎提昂（前法国軍士，而現在是布魯塞尔的滯銷貨）一万法郎的决定（这笔錢是拿破侖遺贈給他作为对他图謀杀害威灵頓的奖励）。平常十分严肃的“紀事報”現在献殷勤和卑躬屈节得特別令人发笑。它竟认为，拿破侖第三似乎并不知道为了表示尊敬拿破侖第一而作出了这样一件奇怪的在目前來說是极其笨拙的事情。“坎提昂”的名字想必是由于 lapsus penae〔笔誤〕而偶然出現在“通報”的洁白的版面上的。也許是某一位过分热心的下級官吏擅自分給坎提昂一万法郎的，等等。看来，可尊敬的“紀事報”以为，法国的官僚制度是按照英国的样式建立的；在英国，正如从議会調查委员会进行的最近一次訊問中可以看出，Board of Ordnance〔軍械部〕的下級官吏确实可以背着他的长官擅自訂购某一种火箭，而且价目达数千英鎊；在英国，正如帕麦斯頓向下院所說明的，提交議会討論的外交文件可以因为外交部所委托轉交这些文件的“人”感冒或得了風湿病而积压数星期。

倫敦的报刊逐漸不再贊揚奧地利已經有好几天了，它正在准

备使讀者理解到将在方針上作急劇的轉變，將采取完全另一种調子。同往常一样，开辟道路的应当是 «our own correspondents» [“我們自己的記者”]。例如，“紀事晨报”发表了下列柏林通訊：

“不要揭穿普魯士內閣的任何一件显然不誠实的行为或違背諾言的行为。如果西方各国政府有所誤解，那只是由于它們自己的过錯，或是由于那些应当使西方各国政府注意的人的过錯。但是能不能那样去說奥地利呢？奥地利的行为是不是也像普魯士的行为那样十分明显呢？普魯士千方百計地伤害西方国家，而且是直截了当地和公开地干这种勾当的。普魯士嘲弄和譏笑我們是毫不掩飾、毫不客气的。而奥地利在 20 个月內一直在向英法献媚，偷偷地譏笑我們，它引起了徒劳无益的希望，它利用官方的和私人的途徑，吸引我們参加一个又一个的委员会，它提出了絕对的保证。可是現在，正如那些沒有被过分的信任所迷惑的人們早就預言的，如果我們不接受那些对俄国來說可能較为有利、而对英法來說則根本不能接受的媾和条件，那末奥地利就打算离棄我們！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奥地利起初是俄国在普魯特河上的擋箭牌，它让哥尔查科夫几乎把他所有的部队从貝薩拉比亚調到了克里木，而現在它却主張并且坚持締結一个应保持原状不作任何变更的和約。如果这就是我們所能期待于奥地利友誼的一切，那末这种假面具摘掉得越快越好。”

另一方面，“泰晤士报”发表了下列維也納通訊：

“統率第三和第四軍的海斯男爵不久前草拟了并向皇帝递交了一封短信，信中证明，在目前情况下，向俄国宣战对奥地利來說是不明智的。可能人們会喧嚷起来反对我，因为我这样坦率地涉及到一个如此微妙的問題。但是我的看法是，如果我說，英法只应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奥地利的援助未必能指望得到，那末我就是为英法效劳了。要是奥地利能說服普魯士和德意志联邦提供一支 10 万人的軍隊来掩护它的左翼，那末，尽管障碍重重，奥地利大概也早就担当起开始进攻俄国的义务了。海斯男爵在他的短信中提出了哪些論据，确实不知道，但是奉行俄国方針的奥地利人在这种事情上总是比誰都掌握有更多的情报的，他們确信，这些論据大概可以归結为以下一点：西方国家十分明显地证明，为了在克里木順利地同俄軍对抗，他們不得不把自己

的全部力量以及土耳其的全部力量都投到克里木去。因此,如果奥地利不能保证自己得到德意志联邦的支援就同俄国打仗,那就太不聪明了。大家都承认,俄国在波兰有一支为数 25 万人的军队,其中包括近卫军和掷弹兵军;而且由于这支军队驻扎在俄罗斯帝国的七个最强大的要塞的地区;因此至少必须有一倍多的兵力,才能顺利地同上述俄国军队对抗。同时还应当注意到奥地利的财政状况很紊乱,法国不可能提供一支 10 万人的军队来让奥地利支配,英国政府显然无能为力,普鲁士的态度不可靠等等。最近一周以来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论据——事物一般是变化无常的,特别是人的命运变化多端,如果在奥地利同俄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时路易-拿破仑发生了什么问题的话,奥地利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9 日

载于 1855 年 5 月 12 日

“新奥得报”第 21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局¹⁴⁵

倫敦 5 月 11 日。法軍中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緒迫使康羅貝爾洩露了聯軍的作戰計劃。按這個計劃，應當把 25 000 人的預備軍團調往克里木，隨後還要派去 3—4 萬名法軍和皮蒙特軍。預備軍團一開到，法軍將立即出動，渡過黑河，攻擊在任何地點遭遇到的俄軍，力圖在阿爾馬河和卡查河附近某處同奧美爾-帕沙的部隊會合，以後再根據情況行動。與此同時，艦隊的蒸汽艦應向卡法和刻赤進行襲擊，如果成功，即占領並扼守這兩個城市，作為野戰部隊可能利用的 pivôts，即據點。的確，這是使聯軍能勝利結束克里木戰局的唯一可行的計劃。但是，要在開闊地上採取這樣的行動，聯軍必須在數量上占相當大的優勢。沒有這種優勢，他們就不能指望在同俄國的監視軍接觸時獲得決定性的勝利。而目前雙方兵力的對比究竟怎樣呢？

法軍在克里木有 9 個步兵師和 1 個騎兵旅 (Chasseurs d'Afrique [非洲獵兵])。每個師如為 7 000 人，則共有步兵 63 000 人，騎兵 1 500 人。英軍有 5 個步兵師，每師不超過 6 000 人，有 1 個騎兵師，為 2 000 人。此外，在克里木還有 1 個土耳其步兵師，約 6 000 人。這裡還應加上法國的預備軍團，其中在康羅貝爾規定的戰局開始時間以前能調到克里木的不超過 2 萬人，包括 5 月 3 日

已登陆的 4 000 名皮蒙特軍在內。这样，联軍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兵力总数如下：

| | | | | |
|--------|----|-----------|----|---------|
| 法軍 | 步兵 | 83 000 人， | 騎兵 | 1 500 人 |
| 英軍 | 步兵 | 30 000 人， | 騎兵 | 2 000 人 |
| 土軍 | 步兵 | 6 000 人， | 騎兵 | — |
| 共計……步兵 | | 119 000 人 | 騎兵 | 3 500 人 |

我們对留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国預备軍团的編成了解得很少，因此不知道目前是否能再調一些騎兵到克里木去。在战局开始前，联軍的騎兵最多能增加 2 000 人，这样，騎兵总数将增加到 5 500 人。为了繼續圍攻，至少必須有相当于目前担任圍攻任务的兵力，即 46 000 人（4 个法国师，每师 7 000 人；3 个英国师，每师 6 000 人）。此外，还应加上守卫巴拉克拉瓦和由此到因克尔芒一綫的工事的、同时又作为圍攻部队預备队用的水兵和步兵，其数量至少为 12 000 人，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 6 000 名土軍。如果这些部队中有 4 000 人是水兵和海軍陆战队，那末从步兵总数 119 000 人中减去的應該是 54 000 人，这样，用于野战的則为 65 000 名步兵和 5 500 名騎兵，共計 7 万余人。此外，还应考虑到在叶夫帕托利亚附近的奥美尔-帕沙的部队，它大約有步兵 35 000 人，騎兵 3 000—4 000 人。其中 15 000 人必須留守要塞，因此奥美尔-帕沙大概能够出动步兵 2 万人，騎兵 4 000 人，共計 24 000 人。

这样算来，联軍这两支独立的部队中可用于野战的兵力总数为：

| | 步兵 | 騎兵 | 总数 |
|---------------|--------|-------|--------|
| 塞瓦斯托波尔方面的部队…… | 65 000 | 5 500 | 70 500 |
| 叶夫帕托利亚方面的部队…… | 20 000 | 4 000 | 24 000 |
| | 85 000 | 9 500 | 94 500 |

至于俄軍的数量，从俄国人自己所引用的关于他們目前在克里木的部队的总数的材料中取其最小的数字来看，步兵为 12 万人，騎兵为 2 万人。这一数字中应除去必須防守塞瓦斯托波尔的 5 万人，其中 26 000 人防守南区，24 000 人防守北堡和营垒。所以用于野战的还有步兵 7 万名和騎兵 2 万名。至于野战炮兵，甚至連大概的数字也无法估計。如果考虑到联軍在馬匹补給方面有許多困难，而俄軍一向随带大量火炮，那就未必还会怀疑俄軍在炮兵方面将占优势。他們在騎兵方面的优势也同样是明显的。至于步兵，联軍兵力合起来超过俄軍，但分开算，每支野战部队的步兵人数都比俄軍少。然而俄軍最大的优越条件还是它所占领的陣地。俄軍配置在阿尔馬河、塞瓦斯托波尔和辛費罗波尔之間的三角地带，在北面同奥美尔-帕沙对抗的俄軍占领着沿阿尔馬河的筑垒陣地，这个陣地可用 15 000 名步兵在正面防守，而同时俄軍騎兵采取側敌机动还可能切断土軍同叶夫帕托利亚的联系。所以，如果奥美尔-帕沙决定单独向阿尔馬河推进，那是决不能渡过該河的，除非等到英法軍隊把俄軍击退到辛費罗波尔并从而迫使他們放棄阿尔馬河的陣地。只有那时，这两支軍隊才有可能会合。因而英法軍隊向前推进是全局胜利的基本条件。但联軍向前推进的路綫，看来只可能是沿着向梅肯集田庄去的那条道路。这条通向阿尔馬河和辛費罗波尔方向的道路設有兩道防御工事：一道构筑在俯瞰黑河的山脊上，另一道构筑在从梅肯集田庄附近的山岭到塞瓦斯托波尔灣末端的狹谷的北面。这第二道、也是主要的防綫全长約 2 英里，据說构筑得非常坚固，联軍必将在这里进行第一次决战，其結果将决定：联軍是仍然被困在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呢，还是能够突入半島的腹地。联軍不得不在狹窄的正面上行动，

这对俄军是有利的。如果俄军在此遭到失败，阵地被夺，那末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退往贝尔贝克河，并扼守这道防线以抗击联军，同时将专门派出一支部队去威胁在阿尔马河的土军。即使俄军在此再度遭到失败，但由于他们在骑兵方面占优势，而联军因运输工具不良又不能在远离海岸的地点站稳脚跟，所以俄军仍能撤离联军的活动地区。俄军可能退守的防线，是其左翼的延伸部分，但这是很不利的阵地。可是完全有这种可能，即俄军一开始就力图将联军牵制在黑河地区，同时以主力对付奥美尔-帕沙，以便在骑兵的协助下围歼土军，然后再将全部兵力调转头来对抗英法军队。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5 月 11 日
左右

载于 1855 年 5 月 14 日“新奥得报”
第 221 号，并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5 月 2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0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晨邮报”反对普魯士。

——輝格党和托利党

倫敦 5 月 14 日。帕麦斯頓的私人報紙“晨邮报”今天登載了一篇对普魯士充滿威胁的文章,其中写道:

“1854年4月,樞密院决定許可用中立国船只把俄国产品輸入联合王国。普魯士非常迅速地利用了这种許可。下列統計資料(引自向議會呈报的官方統計表)表明 1853 年和 1854 年从这个国家輸入英国的脂油、大麻和亚麻的比較数字。尽管我們严密封鎖了俄国在波罗的海的港口,但是去年进口增加的数額却清楚地表明通过默麦尔和但澤而找到了通往不列顛市場的道路的俄国产品的数量。从普魯士輸入联合王国:

| | 1853 年 | 1854 年 |
|----------|---------|---------|
| | (单位:公担) | |
| 脂 油..... | 54 | 253 955 |
| 大 麻..... | 3 447 | 366 220 |
| 亚 麻..... | 242 383 | 667 879 |
| 亚麻籽..... | 57 848 | 116 267 |

这些数字充分說明这个新的貿易部門对普魯士的意义。結果,尽管我們封鎖了俄国,但它仍然能够像在和平时期那样自由地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我們却必須为这些产品多付 50% 的稅和为普魯士商人所得的利潤。我們承认,我們现在的政策是根本不合邏輯的。但是有益的办法不是撤除对敌人港口的封鎖,而是消灭(因为这是我們有能力做到的)經過普魯士領土的陆上貿易。”

反对貴族政治的运动在英国只可能有这样一个直接的結果：使托利党、即特殊的貴族政党执掌政权。如果結果不是这样，那末运动首先就必然归結为輝格党人的一些鄙俗行为，即两三項不值得一提的虚伪的行政改革。累亚德声明他打算提出关于“国家状况”的決議案，而这个声明又受到了下院的欢迎，这样就引起了西蒂区群众大会的召开。但是在西蒂区群众大会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埃倫伯勒在上院的提案，托利党人借这个提案来掌握这种新的改革运动，并且利用这种运动来作为进入內閣的手段。累亚德本人在提案中把“貴族的影响”这样的字眼变换成“家族的影响”，从而对托利党人作了让步。議會外的一切运动在議會內的形式，就是执政階級的两个派別之間的爭吵。为輝格党人所掌握的反谷物法同盟成了推翻托利党人的工具¹⁴⁶。为托利党人所掌握的行政改革协会将成为推翻輝格党人的手段。只是不应当忘記：这两个派別都这样拿旧制度的基础一个接着一个地輪流去作牺牲，然而制度本身（必須补充一句）却仍然有效。我們早就說过，只有托利党人才常常被迫作更多的让步，因为只有在他們执政时，外来的压力才具有威胁的、甚至是革命的性质^①。輝格党代表英国寡头政体本身，代表像薩特倫德、培德福德、卡萊尔和戴文希尔等这样一些少数有实力的家族的权势。托利党代表 squireocracy，也可以說是代表容克派，尽管在英国的大地主和北德意志容克之間有着很大的差別。因此托利党人是教会和国家、保护关税政策和反天主教問題上的一切旧英国偏見的保持者。輝格党人是文明的寡头政治家，他們毫不猶豫地拋棄了那些妨碍他們实现操纵国家职位的世

① 見本卷第 105—106 頁。——編者注

襲权利的偏見。輝格党人的好意总是束縛着資產階級运动；托利党人的好意則經常把人民群眾推入資產階級的怀抱，而資產階級又把人民群眾交給輝格党人支配。現在輝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不再有什么區別，因为后者好像是貴族中的平民，而前者則是貴族的 *haute volée* [上层]。貴族中的平民慣用旧貴族的詞句，而貴族中的显貴則慣用自由派的詞句。但实际上在老的托利党人（博林布罗克勋爵等）退出舞台以后，領導托利党的一直是像皮特、阿丁頓、派西沃、坎宁、皮尔和迪斯累里这样一些暴发戶。Homines novi [新人，暴发戶]总是出在托利党内。在得比（得比本人就是从輝格党陣营投过来的）組閣时，在閣員中除了得比本人外，最多也不过两个知名人物。所有其余的人都是一般的大地主，还有一位文学家。相反，根据不同情况而毫不猶豫地更換自己的常礼服和观点的、自己經常在表面上进行一些革新和改变的輝格党人却不需要新人。他們能够使自己的姓名永垂不朽。如果我們总的回顾一下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的英国历史，那末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旨在反对人民群眾的一切法律，从把議会的任期改为七年的法令¹⁴⁷起，到最近的习艺所法¹⁴⁸和最新的工厂法止，都出自輝格党人之手。但是輝格党人的反动政策总是經資產階級同意后实施的。托利党人的反动政策反对資產階級的程度甚至比反对人民群眾的程度更大。这就是为什么輝格党人被視為自由派的原因。

卡·馬克思写于1855年5月14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55年5月18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227号

卡·馬克思 上院會議

倫敦 5 月 15 日。昨天下午，上院走廊里还在开会以前就挤满了人。人們等待着一个有趣的場面——討論埃倫伯勒勳爵的提案和 Ins und Outs [政府和反对派] 之間的真正交鋒。此外，人們都好奇地想親眼看一看繼承的立法者將怎樣扮演反對貴族的十字軍騎士的角色。演得很糟糕。演員們經常離開自己的角色。演出以悲劇開始，而以鬧劇告終。在假交鋒的時候，甚至連一點幻想、戲劇性的幻想都沒有保存。一眼就可以看出，崇高的戰士們不僅竭力保存彼此的完整，而且甚至竭力保存他們用來交鋒的武器的完整。

辯論既然圍繞着對進行戰爭的批評，它也就低於倫敦的任何一個 Debating Club [辯論俱樂部] 的辯論水平，在這種辯論上哪怕是花一分鐘，也意味着白白浪費時間。但我們仍然打算用輕輕的幾筆來勾劃出高貴的勳爵們是怎樣扮演維護行政改革、反對貴族獨霸國家管理大權的角色的，他們對西蒂區的群眾大會是怎樣反應的。埃倫伯勒勳爵高聲地叫道：“要把適當的人放在適當的位置上！”為了證明每一個人都應該根據功績、而且僅僅是根據功績得到自己的榮譽，他舉出了這樣一件事實：他本人（埃倫伯勒）和哈德威克勳爵之所以能呆在上院，是因為他們的父親以自己的功績

为自己进入貴族院开辟了道路。相反，在我們看来，这个例子正好說明，借助于别人的功績，在这里是自己父亲的功績，不仅可以取得某一个終身的职位，而且甚至还可以取得英国立法者的称号。Lord chief justice of the Queen's Bench [皇家法庭大法官] 老埃倫伯勒和哈德威克勳爵的父亲查理·約克先生所借以为自己进入上院开辟道路的功績，究竟是什么呢？这段历史是可資借鉴的。已故的埃倫伯勒，这个英国律师，后来的法官，在审理皮特和他的继承人时期所发生的出版案、阴谋案和警察間諜案的过程中取得了 en miniature [小] 杰弗雷斯的声誉。在他的领导下，special jury [特別陪审法庭] 在英国取得了甚至連路易-菲力浦时代的 «jurés probes et libres» [“正直而自由的陪审員”] 都从来没有享有的荣誉。这就是老埃倫伯勒的功績，这些功績为他进入上院开辟了道路。至于說到哈德威克勳爵的先輩查理·約克先生，那末他在功績方面还超过老埃倫伯勒。这位查理·約克，当了 20 年由劍桥选出的議員，是受皮特、派西沃和利物浦的委托 «to do the dirty work for them» [“为他們干骯髒事情”] 的特殊人物之一。当时每一个“公正的”恐怖措施都找他来作自己的品得。他认为每一次反对公开买卖下院席位的請願都是“雅各宾阴谋”。查理·約克把每一个反对在英国已經出現了赤貧現象的时候还在实行的无耻的濫設官职制度的提案說成是图謀破坏“我們神圣的宗教的幸福安宁”。这位查理·約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庆賀自己高升到了上院的呢？伐耳赫倫島远征¹⁴⁹于 1810 年在英国引起了像克里木远征在 1855 年所引起的事件。当时波尔切斯特尔勳爵向下院提出了任命一个調查委员会的提案。查理·約克激烈反对，說这是阴谋，这是要激起人們的不滿，等等。尽管如此，波尔切斯特尔的提案还是被通

过了。于是約克决定使公众无法了解調查材料，坚持要行使旧的不合理的議會特权，坚持不让公众和記者进入議會走廊。結果是这样做了。这时有一位盖耳·琼斯先生，倫敦一个 Debating Club〔辯論俱乐部〕的主席，发表了一則消息，說俱乐部将在最近一次會議上討論查理·約克破坏出版自由和粗暴地侮辱輿論的問題。为了对付这一点，查理·約克在下院斥責盖耳·琼斯侮辱議員，破坏“議會特权”，之后，下院就不顾英国的一切法律，未經审讯就直接从議院的會議上把琼斯送进了新門監獄，“以便下院要把他在那里押多久就押多久”。查理·約克在树立这些英雄的功勛的时候还夸耀自己的独立性。請看，他只是作为一个正派的“乡村貴族”、作为“国王的朋友”、作为“忠誠的反雅各宾主义者”而行动的。但是，大家知道，由于約克的坚持而把走廊封閉后还不到三周，他就已經向派西沃內閣提出了自己的賬单，經過討价还价，他获得了 Teller of the Exchequer〔國庫檢查員〕（有点像“綠蜡保管員”）这个薪高事少的終身职位，換句話說，他这一輩子每年的收入是2700英鎊。查理·約克在接受这个肥缺以后，就必須到劍橋的选民那里去参加重选。在选举大会上，人們用口哨声和嘘声、烂苹果和臭鸡蛋来欢迎他，于是他只好逃跑。派西沃則把他提升上来，授予他貴族的称号，作为对他的失敗的补偿。查理·約克是通过这样的道路变成了勛爵的，他是通过这样的道路使得組織得很好的国家机关承认他的功績的，——埃倫伯勒勳爵开导帕麦斯頓勳爵說。埃倫伯勒这个无疑与可怜的騎士^①相类似的人物不顾这种天真的富有特色的 lapsus linguae〔失言〕，竟大部分用了西蒂区群众

① 唐·吉訶德。——編者注

大會的語言。

他的朋友得比甚至竭力限制這種純粹詞句上的讓步。他駁斥了他同累亞德有勾結的謠傳。他的全部天才在於慎重，所以他斥責累亞德不慎重。他說，在西蒂區的先生們的观点中有很多正確的東西，但是他們得出的結論太古怪 (!!) 了。大臣應該在議會里為自己找到同僚，不僅要在議會里，而且要在他所加入的黨里，並且主要不是在黨的一般成員中，而是在那些在議會里享有威信的成員中。在這些成員當中，直到現在還常常被忽視的那些才能當然應該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得比認為，錯誤在於 1831 年的議會改革。《rotten boroughs》即“腐朽的市鎮”被消滅了，但恰恰是這些市鎮提供了頭腦清醒的英國國家活動家。這些市鎮使有勢力的人們能夠把天才的、但是還沒有資產的年輕人送進議會，並經過議會去擔任國家職務。因此甚至按照得比的意見，不進行議會改革——只是在相反的意義上即在恢復“腐朽的市鎮”的意義上的議會改革——任何行政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注意到下院有 85 個席位至今還屬於大約 60 個小的《rotten boroughs》(僅僅在英格蘭)，其中任何一個市鎮都沒有超過 500 名居民(雖然有的還派出兩名議員)，那末，得比的抱怨就不是完全有根據的了。

代表內閣發言的潘繆爾勳爵使上院的辯論沿着討論問題的實質這個方向進行。他結結巴巴地說，你們的豪言壯語所追求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議會外面所掀起的喧囂把我們趕出內閣，自己來占據我們的位置。為什麼得比三個月以前在接到女王的建議時不組織內閣呢？得比得意地微笑着回答說，是的，三個月以前！但在三個月內情況變了。三個月以前帕麥斯頓勳爵還是一個 *homme à la mode* [時髦人物]，一個偉大的沒有人能夠代替的國家活動家。

現在他的美妙時光已經過去，該輪到我們了。

上院的辯論表明，在這裡任何一方都沒有可以用來培植成一個真正的人的材料。至於下院，那末埃倫伯勒公正地指出，它已經失掉香味了，喪失威信了，因此不應該在議會內部，而應該到議會外面去找政治影響。上院的辯論清楚地表明了貴族反對派的 *mala fides* [不真誠]，他們企圖用欺騙來使資產階級運動化為烏有，而同時又利用它來作為反對內閣的攻城槌。在下篇通訊中，我們還將有機會證明西蒂區改革派對待工人階級也是 *mala fides* 的，他們打算玩弄工人階級，就像他們被貴族反對派玩弄一樣。這就使我們有可能確信，英國目前的運動按其性質來說是極其複雜的，正如我們早先已經指出的，它本身包含着兩個彼此對立和敵對的運動。

卡·馬克思寫於 1855 年 5 月 15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55 年 5 月 19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 228 號

卡·馬克思

*資產階級反對派和憲章派¹⁵⁰

倫敦 5 月 16 日。資產階級反對派對上院就埃倫伯勒提案進行的表決表示憤怒，這是資產階級反對派軟弱的標志。資產階級反對派本來應當相反地把這個提案的否決當作一種勝利來慶祝。迫使上院這個貴族最高會議在莊嚴而公開的辯論過程中聲明它對迄今進行的戰爭表示滿意，迫使上院大聲地承認帕麥斯頓是自己的領袖和代表並且甚至完全拒絕行政改革和任何一切改革的良好願望——貴族的敵人從埃倫伯勒的提案中還能期待什麼更好的結果呢？他們本來應當首先竭力破壞上院這個英國貴族的最后堡壘的威望。可是他們却抱怨上院忽略了必須依靠現在的內閣而不是依靠自己的特權來獲得極短暫的威望的機會！如果是托利黨機關報、宣揚“我們最完美的憲法”的一切偏見的報紙“先驅晨報”這樣抱怨，那末這是理所當然的。“先驅晨報”用這樣的希望來安慰自己：在輝格黨寡頭政治家在一个半世紀內履行了資產階級和“自由進步”的朋友的義務以後，角色將有所變動，在以後一个半世紀內，資產階級和“自由進步”的“貴族”代表這一角色將由托利黨人來擔任。“先驅晨報”有充分正當的理由來發牢騷。可是資產階級反對派呢？難道它以為，西蒂區的商人舉行一次溫和的遊行示威就足以使貴族自殺和放棄政權了嗎？然而真實情況是，資產階級

希望妥協，它期待着對方的讓步以便自己也有讓步的機會，它希望尽可能地避免真正的鬥爭。因為真正的鬥爭一開始，“千百万人”即他們所謂的“下層”階級就會擠上舞台，他們不僅作為旁觀者或公斷人，而且作為鬥爭的一方來參加戰鬥。可是這一點是資產階級無論如何都想要避免的。正由於這種原因，輝格黨在1808年至1830年間才不得不留在內閣之外。他們願意不惜任何代價來推翻自己的對手，只要不對資產階級作真正的讓步（而沒有資產階級的援助就不能趕走托利黨人），只要不進行議會改革。我們看到，埃倫伯勒和得比是怎樣模稜兩可地聳着肩膀、帶着保留條件并用什麼也說明不了的諷刺方式宣布自己是資產階級行政改革的擁護者，而同時卻把自己的虛假的同盟者完全棄之不顧。另一方面，我們現在又看到，西蒂區的商人改革家一開始就多么胆怯而陰險地在竭力防止憲章派的一切反對，而且竭力使他們暫時保持沉默，以便然後悄悄地把他們從他們自願讓出的陣地上排擠出去。西蒂區的先生們同托利黨人一樣，對虛假的同盟者的恐懼和仇視超過了對虛假的對手的敵意。事件經過的簡略情況如下：

行政改革協會害怕憲章派的反對，讀者一定還記得，在聖馬丁大廳和南威克召開的兩次盛大的群眾集會上，憲章派同國民和立憲協會進行了順利的鬥爭，迫使它退出了它所選定的陣地。4月26日，詹姆士·艾克蘭先生（過去是反谷物法的鼓動者）登門拜訪厄內斯特·瓊斯，聲明他是行政改革協會的“使節”，協會指望得到憲章派的支持，因為協會力圖廢除“階級立法”和建立國民政府。他邀請厄內斯特·瓊斯不日同這個協會的**委員會**會晤。瓊斯表示，他沒有受權代表憲章派答复這個問題。在同倫敦憲章派執行委員會¹⁵¹（將在這個星期天召集會議）商量以前，他不得不拒絕

会晤。

在4月29日，星期天的晚上，琼斯把这一切告诉了宪章派委员会，该委员会授权他继续进行谈判。第二天早晨，琼斯同西蒂区运动领导人英格列海姆·特腊佛斯先生会晤，英格列海姆·特腊佛斯先生亲自向他介绍他的这个党派的全权代表詹姆斯·艾克兰。英·特腊佛斯先生向琼斯保证，他们的目的是建立国民政府。他说，在“泰晤士报”上登载的决议只是初步的决议；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还将由伦敦饭店举行的群众大会所选出的执行委员会来确定。为了证明对行政改革的同情，宪章派应委派一位发言人来代表宪章派出席群众大会。这个发言人应当在主席的邀请下支持某一项决议。宪章派还应当派出一位代表，这位代表将在群众大会上根据西蒂区商人临时委员会的提议，而被选为改革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最后，达成了协议：由于参加群众大会必须凭票入场，宪章派将得到相当数量的入场券。琼斯不同意仅限于口头上的这些谈判，因而对英格列海姆先生说，上述各点应当用书面形式转达给宪章派执行委员会。

于是就这样做了。充满庄严保证的信件接到了。但是送来的入场券却只有12张。宪章派委员会提出抗议，指出这是违背诺言的行为，得到的回复是推说入场券不够，但他们说，如果宪章派委员会愿意派两个宪章派成员站在饭店门口的话，那末他们可以不要票而把他们所希望的人放进去。为此，宪章派选出了斯洛克姆先生和沃克曼先生，他们也得到了特腊佛斯先生的委托书。为了消除一切猜疑，行政改革协会在举行群众大会的那一天，在开会前几小时，派专人送给琼斯一封信，提醒他说，主席要求他支持第四项决议，并说将向群众大会提出宪章派代表琼斯作为候选人，以便

把他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

在群眾大會開始前大約一個小時內，飯店門前聚集了大批憲章主義者。大門一開，斯洛克姆先生和沃克曼先生却被禁止放進任何沒有票的人入內。當門外的壓力愈來愈大的時候，為了**拖延時間**，就十分勉強地散發了 8 張入場券。拖延時間是為了把早就布置在附近街道上的一隊警察引進來。從這時起，除了“著名的商人和銀行家”外，誰也不放進去了。身穿**工人服**即大家所熟悉的絨布短上衣的人即使有入場券也不讓進去。為了欺騙在街上等待的工人群眾，大門突然關上了，門上貼出了一張布告，上面寫着：“客滿。停止入內。”其實這時大廳里連一半也沒有滿，而乘着馬車來的“紳士們”，卻從窗戶和廚房後門進去了。工人群眾沒有識破這種陰險行為，他們靜靜地散去了。在大會進行時，儘管厄內斯特·瓊斯拿出了他的“發言證”，但是沒有讓他上講台，當然也就沒有能夠發言。協會達到了兩個目的：防止了憲章派的反對，並且有了機會向人們指出在街上聚集的群眾就是他們的**擁護者**。然而群眾只是在街上充當了不說話的配角。

厄內斯特·瓊斯在告英國工人書中揭露了這個陰謀騙局的全部過程，并用憲章派的名義向行政改革協會挑戰。¹⁵²

卡·馬克思寫於 1855 年 5 月 16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55 年 5 月 19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 229 號

卡·馬克思 金融市場

倫敦 5 月 19 日。根据英国报界的一些乐观主义者的看法，英国的工商业危机已經結束了，工商业又在沿着上升綫发展。他們得出这种令人快慰的結論的事实根据是，金融市場的状况有了改善。这就是說，一方面，英格兰銀行地窖里的黄金儲备量有了增加，另一方面，銀行降低了貼現率。1855 年 1 月 20 日黄金儲备量只有 12 162 000 英鎊，到 1855 年 5 月 12 日，黄金儲备量已达 16 045 000 英鎊——增加了 3 883 000 英鎊。1855 年 1 月 20 日貼現率是五厘，3 月 31 日，銀行把它降低到四厘五，4 月 28 日，又降低到四厘。然而这些先生們沒有考虑到，銀行地窖里黄金的积累和貼現率的降低，除了經濟繁荣以外，还可能有另一种恰好相反的原因：营业蕭条和与此有关的对資本需要的减少。英格兰銀行每周公布的統計表表明，这一次的真正原因正好是后一种。不应当像上面提到的乐观主义者那样，仅仅注意这些統計表中的黄金儲备量和貼現率两栏。必須把另外两栏——預备銀行券和貼現期票对比一下。

大家知道，英格兰銀行是由两个不同部門組成的：即 Issuing department (发行部) 和 Banking department (銀行部)。我們可以把前者称为英格兰銀行的造币厂。它的全部活动就是发行銀行券。

由于 1844 年罗伯特·皮尔颁布的法令，銀行券的发行受到了法律的限制。这就是說：除了国家应給予英格兰銀行的資本 1 400 万英鎊以外，銀行有权发行的銀行券总数不能超过保存在銀行地窖里的黃金儲备量。因而，如果銀行发行銀行券 2 000 万英鎊，那末在它的地窖里就应有 600 万英鎊的黃金。銀行 Issuing department 的全部活动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調节銀行券的印制和发行。发行部将其所印制的全部数量的銀行券轉交給 Banking department，即原来意义上的銀行。这种銀行和一切其他的儲蓄銀行和貼現銀行一样，与公众发生关系，它通过票据貼現、发放有息证券的貸款、給国家債权人支付股息、发付銀行存款等办法使銀行券进入流通。这种令人惊叹的发明（把英格兰銀行分成两个互不依賴的部門以及对所发行的銀行券的数量进行这种調节）是罗伯特·皮尔搞出来的；罗伯特·皮尔以为，这样就能防止一切未来的貨幣危机，证券的流通就将借助于自动生效的机械規律而同金屬儲备協調一致起来。但是著名的国家活动家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他的調节只是調节了 Issuing 和 Banking department，即英格兰銀行的两个部門之間的流通，而决不是調节銀行部和外界之間的流通。銀行发行部把它根据法律有权印制的这些数量的銀行券（例如 2 000 万，假定在它的保險庫里有 600 万黃金的話）轉交給銀行部。但是，在这 2 000 万中究竟有多少数目真正进入流通，这取决于营业的状况，取决于商业界的需求。銀行不能使之进入流通因而留在 Banking department 的保險庫中的那个余额，則作为預备銀行券而列入銀行的賬目。

我們看到，銀行的黃金儲备量从 1855 年 1 月 20 日至 1855 年 5 月 12 日增加了 3 883 000 英鎊，預备銀行券的总数在这个时期

則从 5 463 000 增加到 9 417 000, 即增加 3 954 000 英鎊。預備銀行券, 即存在 Banking department 保險庫中的銀行券數量愈多, 則實際上進入流通的銀行券數量就愈少。但是從上面舉出的數字中可以得出結論說, 在銀行地窖中黃金積累的同時, 進入流通的銀行券數量減少了。這種流通量縮減的原因何在呢? 完全在於營業積極性的削弱和商業交易數量的減少。銀行賬目完全可以證實這種看法是正確的, 因為從這些賬目中可以看出, 銀行貼現的期票價值在 1855 年 1 月 20 日達到 25 282 000 英鎊, 到 1855 年 5 月 12 日反而下降到 23 007 000 英鎊, 即減少了 2 275 000 英鎊。可是銀行貼現的期票價值是銀行同商業界成交數字的最可靠的尺度。如果注意到銀行在 4 月 28 日把貼現率降低到四厘, 因而提供自己的商品——資本——比過去的 1 月份便宜 20%, 那末結果就更加令人吃驚了。同時從 4 月 28 日銀行降低了貼現率這個時候起, 到 5 月 12 日, 銀行為票據貼現而發行的銀行券數量不是增加, 而是減少了。這證明, 在目前的市場情況下, 資本即使按四厘的利率計算, 也還是太貴了, 它甚至不能找到像在 1 月初按五厘的利率計算時所獲得的需求量。這證明, 貼現率的降低並不是因為資本的大量流入, 而僅僅是因為工商業對資本的需求量減少而引起的。最後, 這證明, 銀行地窖里的金屬儲備量的增加只不過是放在那裡的目前沒有使用的資本的增加而已。

卡·馬克思寫於 1855 年 5 月 19 日

載於 1855 年 5 月 22 日
“新奧得報”第 233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争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克里木的野战行动大概已经开始了（关于这次野战行动的准备情况，我们在几天前已经谈到过了¹⁵³），因而局限于半岛范围内的这次战争，便进入一个新的、可能是决定性的发展阶段。皮蒙特军和法军的预备队迅速开到，特别是司令官突然易人，康罗贝尔调任军长，总指挥权被授予佩利西埃，这无疑证明联军改变战术的时候已经到来。

关于将成为新战场的地形的概述和应投入战斗的兵力的概略数字，读者可以从我们前一篇文章中找到。应当提醒的是，同塞瓦斯托波尔北区保持联系的俄国监视军的基本阵地，设在从因克尔芒起到巴拉克拉瓦—辛费罗波尔道路同黑河和贝尔贝克河分水岭的交叉点止这一綫的台地上。俄军在这个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阵地上几乎到处挖掘了战壕。这个阵地从塞瓦斯托波尔湾末端延伸到不能通行的山岭为止，长达4英里左右；俄军在这里至少可以集结5—6万名步兵和炮兵，——这些兵力用来防御是很够的了。

要想从正面攻击这一阵地，必须拥有巨大的兵力优势和付出重大的代价；然而联军既不能建立巨大的兵力优势，也不肯付出重大的代价。即使他们攻占了俄军的工事，其损失之大也将使他们不能积极而坚决地继续作战。因此，他们必须将部分俄军从这一

陣地上誘開，並尋找迂迴該陣地的道路。為此向刻赤進行了神秘的遠征。聯軍約 15 000 人乘船在俄軍眼前經過雅爾達開往刻赤，後來又返回原地。他們沒有試圖登陸，這似乎是因為接到了巴黎的電令。但無論如何，這個不配稱為佯動的行動應當被看做是徹底的失敗，——任何一個頭腦健全的將軍，都不會分兵去進行這種最後甚至連裝裝樣子的會戰都沒有發生的遠征。向卡法的進攻，即使司令部曾經作出過計劃，大概也終於放棄了。向葉夫帕托利亞調動部隊以便由該地出擊這一問題，目前也不可能存在；否則，皮蒙特軍和法軍的預備隊就可能立即調到那里去了。由於不論在巴拉克拉瓦和卡法之間或塞瓦斯托波爾和葉夫帕托利亞之間，沿岸都沒有別的港口或良好的停泊場，因此從海上迂迴俄軍的想法顯然終於打消了，現在別無他法，只有從陸上迂迴，可是我們已經說過，這種行動將是非常困難的。

除了俄軍在因克爾芒以北占領的那條道路外，僅僅還有一條從巴拉克拉瓦通到辛費羅波爾的大道。它沿南海岸到阿盧什塔，在那里折向半島腹地，在拔海 2 800 英尺的高度上穿過克里木最高的查特爾山（即沙特爾山）以東的山地，然後向下經過克里木最大的薩耳吉爾河的盆地通到辛費羅波爾。從巴拉克拉瓦到阿盧什塔是 4 天行程，從阿盧什塔到辛費羅波爾是 3 天行程，共約 95 英里。但是，由於附近沒有別的道路可供部隊成幾個縱隊齊頭並進，因此所有的部隊必須成一路特別長的縱隊沿一條道路行進；這就至少需要一個拉得很長的縱隊行軍 4—5 天。在阿盧什塔附近和在山口上原來就有若干個舊工事，而且不用懷疑，山口本身也一定是牢固地設了防的。本來只須 7 天就可通過查特爾山口，現在也許要 12 天，——這段時間足以使俄軍採取行動；或者對留下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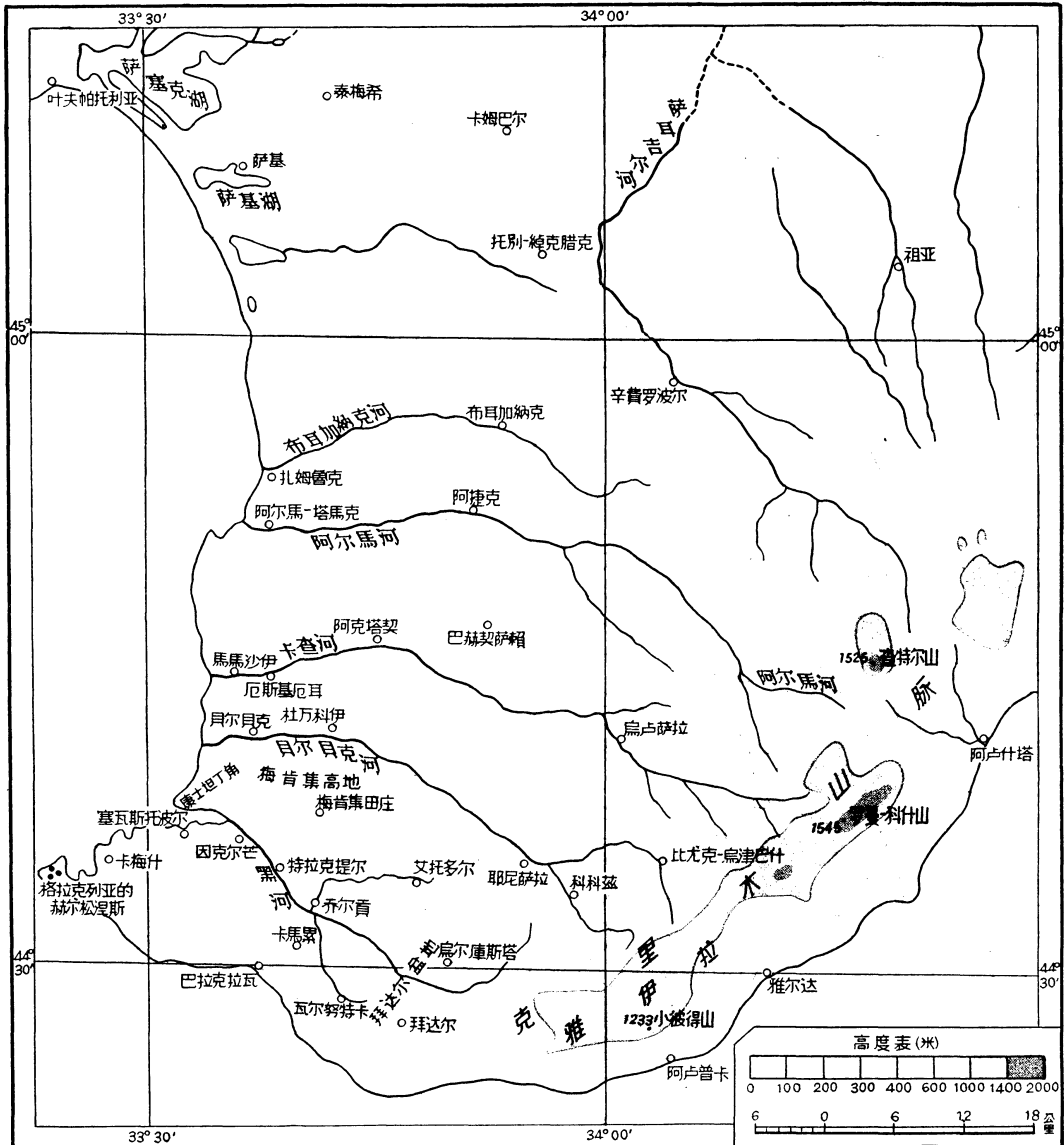
进行围攻的联军实行攻击；或者用大部分兵力去对付迂回的敌人，当敌人走出隘路时以优势兵力迎击，而轻装的机动纵队则可沿卡查河和阿尔马河上游的山径前进，从翼侧和后方进行打击。但是，联军经过阿卢什塔的侧敌运动的最大缺点，还在于那里没有作战基地。由于阿卢什塔的停泊场是暴露的，因此，即使把这座城市变成临时基地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甚至在联军还未通过阿卢什塔以前，俄军轻步兵就会沿山径而下，非常顺利地切断阿卢什塔与巴拉克拉瓦之间的交通线。

所以，经过阿卢什塔的行军未必会成为事实。这样行军所冒的危险远远超过它可能带来的好处。然而还有迂回俄军的另一个方法。既然联军经过阿卢什塔行进时俄军可利用山径进行袭击而使大路给联军造成的一切优越条件几乎完全消失，那末联军为什么不能同样地利用这些山径呢？不过，这样就意味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联军就得把野战部队的基本兵力，包括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北区的部队，直接配置在因克尔芒附近的俄军兵营前，以迫使他们把大量部队集中在战壕内。同时，按照从拜达尔盆地和从阿卢普卡（距巴拉克拉瓦 30 英里）附近的南海岸通向贝尔贝克河和卡查河盆地的山径的数量，把朱阿夫兵、法国猎兵、轻步兵、英国猎兵、甚至骑着马的 Chasseurs d'Afrique [非洲猎兵] 以及可能集中的山地炮兵编成几个纵队。经过一夜行程，担任迂回俄军极左翼的部队就可能通过拜达尔盆地，到达南海岸，在这里他们就已经摆脱了敌人。再经过一天行程，他们便可到达阿卢普卡。阿卢普卡以北矗立着雅伊拉的一连串陡峭的山岭，在它北坡上拔海约 2 000 英尺处是一片台地，上面有极好的牧羊草地，台地的北缘是悬崖峭壁，下面就是比尤克-乌津和乌津-巴什两条

小河的狭小的盆地，这两条小河汇合成貝尔貝克河。有三条山徑从阿卢普卡地区通到台地上，然后通向比尤克-烏津和烏津-巴什两河的狭小的盆地。这整个地区对惯于在非洲复杂得多的条件下在山地作战的朱阿夫兵或法国猎兵这样的步兵來說，是完全可以通行的。其次，从黑河上游盆地（通常叫做拜达尔盆地）至少有两条山徑通向貝尔貝克河上游盆地；最后，巴拉克拉瓦-辛費罗波尔道路在山口前又分出一条山徑，在梅肯集田庄东南3英里处越过山岭，直通俄軍筑垒陣地的左翼。不論这些山徑对軍队來說是多么难走，但来自非洲的法国輕装部队还是能够通过的。“山羊能通过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一个人能通过的地方，一个营就能通过；一个营能通过的地方，一两匹馬就能勉强通过；而最后連野炮也可能拖过去。”有时地图上标示的山羊能通行的小徑和人能通行的小路，事实上甚至是乡間土道，尽管道路很坏，但終究可供也許包括有炮兵的纵队作側敌运动之用，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在这种場合，应尽量以較多的兵力进行迂迴运动，那时，甚至不进行猛烈的正面攻击，俄軍也将很快被迫撤离战壕。如果这些山徑是野炮所不能通过的（火箭发射管和山炮則到处可以通过），那末迂迴部队就得变成普通的游动队，尽可能把俄軍赶出貝尔貝克河上游盆地，深入卡查河盆地，威胁俄軍的后方，切断俄軍的交通綫，消灭俄軍的运输纵队，收集确实的情报，偵察地形，吸引尽可能多的俄軍兵力，直到困难最少的一条道路改建得炮队也能够通过时为止。然后，可随这些游动队之后派出大量兵力，使俄軍后方受到严重威胁，迫使俄軍放棄他們的工事。我們并不认为，单靠步兵和輕騎兵通过这些山岭向俄軍左翼和后方前进，便能取得这种結果，因为这些部队不到达使炮兵能重新發揮全部作用从而使具

克里木战争 (1853—1856年)

克里木战区



有炮兵的一方占优势的地区，就不可能给俄军交通线造成严重威胁。然而无疑地，只要想出一定的办法，炮兵便能随迂迴纵队一起行动。拿破侖在耶拿会战¹⁵⁴时表明，通向陡峭的山顶的普通人行小道究竟可以利用来做些什么：在5个小时内就把它开辟成足以供火炮通行的大路，使普军的翼侧受到攻击，从而保证了次日胜利。克里木的大车能通过的地方，野炮也能通过；我们所谈的一些山径，特别是从黑河通向贝尔贝克河的那些山径，看来都是通行大车的旧乡间土道。

但是，实现这种机动的首要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兵力。无疑，俄军将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对地形很熟悉也是他们的有利条件。奥美尔-帕沙的部队从叶夫帕托利亚向阿尔马河大胆挺进，便可能抵消俄军在数量上的优势。虽然由于俄军在骑兵方面占优势，奥美尔-帕沙不能前进得又快又远，但是他只要巧妙地机动并很好地保障交通线，还是能迫使哥尔查科夫公爵用更多的步兵来对付他的。然而，联军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种次要的行动上，因为这样就等于碰运气。为了从巴拉克拉瓦实行进攻，联军可能采取的较好的办法，就是在实际进攻开始前一两天把大约2万名土军调到赫尔松涅斯（据不久前报道，联军已经这样做了^①），在那里，一个兵的作用可以抵得上在叶夫帕托利亚的两个兵。这就使联军有可能以将近11万人的兵力（包括约6000名骑兵）攻击俄军，而俄军能用来对抗的兵力约为65000—75000名步兵（包括北区守备部队中的15000—20000人）和1万名骑兵。但是，进行迂迴的部队一开始威胁俄军的左翼和后方，俄军可能用来对抗它们的兵力就将比较

① 括号内的句子，看来是“纽约每日论坛报”加的。——编者注

弱，因为如果从北区調动部队，他們同城砦周圍的营垒之間的联系便有被切断的危險；因此，联军由于能够将全部現有的野战部队用于任何一点而有了一個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們无疑可以指望获胜；但是，假如他們攻击俄軍时沒有外援，假如最可靠的权威人士所提出的双方兵力对比合乎实际情况，那末联军取胜的机会就将很少。联军进行迂迴的部队的兵力就会太小，俄軍就可以对它置之不理而从自己陣地上大胆出击，把兵力已經减弱的联军从高地上赶到黑河里去。

有人认为联军也可能采取另一种打法：立即强攻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甚至有消息說，巴黎用电报发出了无条件地进行这种强攻的命令，康罗貝尔辞职就是由于他认为这种打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他看来，这种打法要損失 4 万人。从路易-拿破侖在干預当前战局的指导工作时显示的軍事知識来看，也許可以认为曾发出过这种命令。但是，甚至像佩利西埃这样魯莽的 *sabreur* [武夫] 也不大可能去执行这种命令。最近一个月的事件应当使法軍兵士非常明确地認識到，他們在强攻时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况且不損失 4 万人(占担任强攻的全部軍队的三分之一以上)便不能实现的这一行动，获胜的可能性也无疑是很小的。佩利西埃也許渴望取得从康罗貝尔手中滑落的元帅杖，但是我們还是非常怀疑他是否够得上一个敢于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拿自己的命运和名誉去冒險的波拿巴主义者。假定这种强攻能够成功，联军不但夺取了第一道防綫，而且夺取了第二道防綫，甚至隔断通向岸防炮台的道路的街垒、設防的家屋和避彈所以以及这些岸防炮台本身也被攻占，整个南区落入联军手中，而且联军只損失了 3 万人，俄軍則損失 2 万人，那又怎样呢？联军比俄軍多損失 1 万人，所夺取的要塞又不

得不立即放棄，而进行野战也会更加困难。

但是，有一个情况能打消人們关于立即进行总攻的任何想法。我們純粹为了辯論起見，曾根据一些半官方的报道，在以前发表的关于圍攻的一篇文章^①中引用过一种推測，即俄軍被赶出了在塞瓦斯托波尔新构筑的外圍工事。但同时我們又指出，我們有一切理由怀疑这些报道的准确性，因为像这样的任何一个胜利，联軍都会用肯定的語气大肆宣揚的。情况果然如此，目前我們获得的来自俄国方面的可靠消息說明，堪察加(馬美朗)多面堡、色楞格多面堡和沃倫多面堡都还在俄軍手中，而来自联軍兵营的报道不仅证实了这一点，而且还承认被圍俄軍在构筑新的外圍工事这一事实。因此，联軍由于对要塞进行接近壕作业而取得的优势，便因俄軍筑有反接近壕而化为烏有，双方力量平衡的对峙綫仍离主壕很远。然而只有当进攻者用于圍攻的兵力同防御者的兵力相等的对峙綫已推进到防守主壕一綫时，才适于进行强攻。否則，强攻纵队在尚未冲到胸牆上面以前，显然就将被击潰和被消灭。这就說明为什么当联軍还不能将俄軍击退到主壕后面时，便不能强攻主壕后面的主牆。至于夺取主壕后面的第二道防綫，那在目前就更談不上了。

很可能，在法軍正进行主要的挖壕作业的地段上，即从卡兰亭棱堡到馬奇塔棱堡这一地段上，已經造成了对左面，即对市区进行局部强攻的有利形势。但是，由于法国政府的策略，我們对俄軍在这里的外圍工事的长度和强度一无所知，而最近仅用电报发来的俄軍方面的报告，也沒有任何明确而詳尽的說明。不过俄国人自己已承认，在馬奇塔棱堡附近法軍的工事已靠近主牆，并在主牆下

① 見本卷第 230 頁。——編者注

面进行了爆破,虽然沒有收到什么重大的效果。因此,这一地段的强攻可能会成功,但这个棱堡的位置突出在前面,它后面(俄軍的雅佐諾夫多面堡)的地形又居高临下,所以夺取这一棱堡能否取得某种进展是很值得怀疑的。在这个棱堡的后面,大概有一两道横墙把它同其余的工事隔开,这就使强攻纵队难以在棱堡里巩固下来,至少难以再向前作某些推进。

这样看来,不論联軍是否进行强攻或野战,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无论如何,联軍到达塞瓦斯托波尔地区以来所采取的毫无生气的作战方法就要告終,現在可以期待更重大的、从軍事观点来看是真正有意思的事件和行动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5 月 21 日

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6 月 8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41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关于改革运动

倫敦 5 月 21 日。倫敦各家報紙今天刊登了西蒂区改革派(或者更确切些說是他們的执行委员会)的告“英国人民”书。这个文件的文体枯燥无味,純粹談事务,不如那些定期出版的商业通报的文体高超,商业通报根据同样的材料,用比較巧妙地編造的华丽詞句向全世界推銷咖啡、茶叶、糖、香料以及热带地区的其他产物。协会答应提供暴露政府的各个主管部門真正生理現象的材料,以及揭露唐宁街¹⁵⁵——世襲賢明的唐宁街的全部秘密。这就是协会許下的諾言。协会从自己这方面要求英国的选民們把自己亲自选举出来的有功劳的候选人派到議會中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貴族俱乐部硬塞給他們的候选人派去。因此,它认为享有选举权的特权集团的存在是正常的,按照它的說法,这个选民集团对某几个俱乐部的依附关系、卖身投靠和缺乏独立性才产生了現今的下院,从而也产生了現今的政府。协会不想取消这个特权选民集团,更不想扩大这一集团;它只想从道义上来影响这个集团。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直接向寡头政体的良心呼吁以代替向它威胁要取消它的特权呢?要知道使寡头政体的头目們轉向正路似乎要比使寡头政体的选民集团轉向正路来得更容易些。西蒂区协会显然想煽起反貴族政治的运动,但这只是在合法的(按照基佐的說法)官

方的英国的範圍內进行的运动。它想怎样来扰乱这个选民集团的污浊的泥潭呢？它打算如何强迫这些选民們棄絕促使他們成为两三个貴族俱乐部的僕从和执政寡头政体的支柱的那些利益和习惯呢？依靠唐宁街的生理作用嗎？不全然。还要依靠从外部施加的压力,即借助于群众大会等。但是,为了对这个特权选民集团施加压力,它打算怎样使非官方的沒有选举权的人民群众参加运动呢？它号召人民群众放棄人民宪章（在这个宪章中除了要求普选权和那些保证在英国能真正实现普选权的条件以外,实质上沒有別的内容),并承认西蒂区改革派自己所說的正在分崩离析的那个狹小的选民集团的特权。西蒂区协会面前有“議會改革和財政改革派”的先例。它知道这个由休謨、布萊特、科布頓、华姆斯萊和湯普逊领导的运动遭到了失敗,因为他們提出了所謂“小宪章”来代替人民宪章,因为他們向人民群众只作了一些个别的让步,只想同人民群众締結妥协协定。他們虽然作了让步,但未能达到目的,难道协会能希望不作让步就能达到目的嗎？或者,协会也許从廢除谷物法的运动中得出結論說可以通过局部性的改革促使英国人民参加运动？然而这个运动的目标涉及最广泛的阶层,它是非常受人欢迎和非常显著的。大家知道,与保护关税派小面包不同的大圓面包是反谷物法同盟的象征。特别是在饥荒的1846年,大圓面包对人民說話自然要比“唐宁街的生理作用”更有效得多。沒有必要提起著名的小册子——“西蒂区的生理作用”¹⁵⁶。在小册子里确凿地证实了,不管西蒂区的先生們把他們自己的事情办得多好,在管理社会事业方面,如管理各种保險公司,他們多多少少是在仿效官方唐宁街的榜样的。他們在铁路管理方面所采取的欺詐哄騙手段以及完全忽視安全措施的态度引起了人們热烈的議論,他們的管理

情况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在报界、議會內和議會外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要不要把铁路从私人資本家手中收回来或要不要使铁路受国家直接监督的問題! 因此,唐宁街的生理作用产生不了什么結果,正如英国人所說的——«this will not do, sir!»〔“先生,这个行不通!”〕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21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5 月 24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237 号

卡·馬克思

評克里木局勢。——議會新聞

倫敦 5 月 23 日。召回刻赤远征軍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聯軍的陸海軍中所引起的嚴重不滿，在倫敦報刊上得到了反映，雖然反映得極為軟弱無力和毫無生氣。人們開始擔心，克里木軍事戲劇的統一行動和正常進程與其說是受到俄國人的威脅，不如說是受到軍事天才拿破侖第三這個 *Deus ex machina*^① 的橫蠻無理的肆意干涉的威脅。“通報”上刊載的著名軍事科學教學“經驗”¹⁵⁷ 中所提供的這位天才的事例，事實上絕不能令人快慰和安心。不過到目前為止，戰地遠離土伊勒里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不受巴黎軍事學門外漢的實際干涉。可是海底電報消除了這種距離，同時也毀掉了這種保證，一向自命為 «the most thinking people of the world» [“世界上最具有思想的人民”] 的約翰牛開始思考、發牢騷，並且埋怨英國陸軍和海軍不該充當一種供那個祖傳的、天賜的“軍事天才”作試驗的 *corpus vile* [毫無價值的東西]。

今天的“先驅晨報”十分肯定地說，召回远征軍是因為波拿巴又被從南面強攻塞瓦斯托波尔的冒險思想迷住了。我們一分鐘也不懷疑，土伊勒里宮的軍事天才被這種固執的念頭所控制，但是我

① 直譯是：“機器神”（在古代劇院中，扮演神的演員是借助於特別的機械裝置而出現在舞台上的）；轉意是：突然出現的挽回局勢的人。——編者注

們不能相信，甚至連佩利西埃这样一个普通的 «sabreur» [“武夫”] 也能执行这种毫无意义的毁灭性計劃。因此我們认为：曾經通过了 en masse [全部人馬] 渡过黑河的决定，把 12 000 人的队伍分成小队的分散兵力的做法被认为是冒險的。的确，不應該把这 12 000 人分成小队，相反地，应当在发动前让 15 000—20 000 名土軍在叶夫帕托利亚坐上軍舰去同主力軍会合，而在那里只留下防守这个地点所必要的守备部队。正像过去一篇通訊中指出的^①，战局的勝負完全取决于渡过黑河的軍隊的人数。無論如何，召回刻赤远征軍又一次证明了这位在摸索行动的門外汉的犹豫不决和动搖不定，可是現在这些都被当做 idées napoléoniennes [拿破侖观念] 了。

同时，为了 coup d'état [政变] 的需要而赶制出来的英雄們都飞快地退出舞台了。这帮英雄中头一个是埃斯潘納斯，在他不光彩的多布魯甲进軍¹⁵⁸ 之后，朱阿夫兵迫使他拚命地逃往巴黎了。正是这个埃斯潘納斯，在他負責保卫国民議會大厦的时候，把大厦交給了敌人。¹⁵⁹ 往下数第二名是勒卢阿，alias [換言之] 圣阿尔諾，12 月 2 日的陸軍大臣。随后是福雷，此人在迫害法国东南部的不幸农民时非常勇敢，而对俄国人却又異常殷勤和人道。軍隊中有人怀疑，他曾把法国軍事委員會的秘密泄露給俄国人，因此不得不把他从克里木調到非洲去。最后一个是由于明显的无能而被降級的康罗貝尔。历史真会捉弄人，佩利西埃被指定为他的继承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英法聯軍的統帥。关于这位佩利西埃，1841 年在議會里，在倫敦軍官俱乐部里，在省群众大会上，在“泰

① 見本卷第 197 頁。——編者注

晤士报”和“笨拙”上，人們反复地說过，永远不会有有一个正派的英国軍官能和这个“怪物”（«that ferocious monster»）在一起服务的。而現在英国軍隊不仅同他一起服务，而且整个英国軍隊要听从他的指揮！当輝格党人和它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頓被托利党人推翻的时候，帕麦斯頓在梯維尔頓召集了自己的选民，并向他們证明說他有权廢除英法同盟而同俄国联合，理由是法国政府、路易-菲力浦竟任用像佩利西埃这样的“恶棍”！应该承认，如果法国軍隊为自己的十二月叛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那末同复辟帝国結成的联盟給英国带来的也不光是“玫瑰花”。

昨天內閣在下院遭到了失敗，这种失敗只是证明議会往往由于 out of doors [在議会外] 受到鄙視而向大臣們进行报复。有一位魏茲先生提出了一項提案：

“本院认为，必須按照 1850 年选出的官員薪俸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办法来全面檢查我們的外交机关。”

魏茲先生是帕麦斯頓的朋友。他的提案两年来几乎一直列在下院的議程里面，但是一直沒有进行討論。昨天正是使不滿的下院注意它的好机会。魏茲发言了，他打算在帕麦斯頓提出某些意見后再玩弄老一套花招，撤回自己的提案。然而貝利先生却不管这种协定，竟支持魏茲所撤回了的提案，并違反魏茲和帕麦斯頓的心願，以 112 票对 57 票的多数通过了这项提案。这次失敗絲毫沒有使帕麦斯頓这样一个老的有經驗的策略家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議院为了維持自己外表的独立性，有时不得不判处內閣的提案以死刑而給反內閣的提案以生路。相反地，迪斯累里的提案¹⁶⁰ 倒像是对大臣席发出的一个晴天霹靂。帕麦斯頓本人，这个演議會喜剧的老手祝賀“这场无与伦比的戏的作者和演員”。这不是諷

刺。這是一個藝術家對在同一領域內戰勝了他的對手所給予的情不自禁的稱贊。在星期一的會議上，帕麥斯頓非常巧妙地同米爾納·基卜生、格萊斯頓、赫伯特、布萊特和魏恩勛爵玩了一套把戲，看來，把關於對外政策的一切辯論推遲到三一節假期以後是有保障的了，內閣和議院的既定的行動方針是保下了，高貴子爵本人的許多星期的獨裁也定下了。辯論還可能進行的唯一的一天是星期四，可是已經預先規定用來討論累亞德關於改革的提案。這樣一來，誰也不能妨礙帕麥斯頓在三一節假期內簽訂和約，並且就像他不止一次地做過的那樣，再以自己的一个臭名遠揚的條約來使再次開會的議院大吃一驚。議院方面也可能不會反對這種安排得如此巧妙的意外遭遇。背着議院簽訂的和約，甚至是 *à tout prix* [不惜任何代價] 的和約，也可能被議院通過，不過為了面子，議院會提出一些 *post festum* [事後的] 抗議。但是，如果內閣和議院不得不在假期以前發表意見，內閣就不能使議院措手不及了，而議院也不能讓自己遭到意外了。這就說明了迪斯累里站起來提出自己的提案而累亞德又把自己的那一天讓給他時所產生的混亂局面。因此，按“郵報”的論斷，這個“累亞德和迪斯累里之間的秘密勾結”打亂了還“沒有結束的維也納會議”“閉幕”以來所玩弄的一切詭計。

卡·馬克思寫於 1855 年 5 月 2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55 年 5 月 26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 241 號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帕麦斯頓勛爵官邸演出的喜劇
序幕。——克里木最近
事件的經過¹⁶¹

倫敦 5 月 24 日。当迪斯累里的建議剛一提供了在下院內 Ins [政府]和 Outs [反对派]之間目前這場搏斗的前景时，帕麦斯頓就决定敲起警钟，在开会前几小时把內閣的追随者們以及皮尔分子、曼彻斯特学派和所謂“独立党人”邀請到他的唐宁街官邸来。到了 202 位議員，其中包括累亚德先生，他感到自己无力抗拒內閣妖魔的迷人的召喚。帕麦斯頓运用了外交手腕，认错，道歉，撫慰和劝说。他含着微笑恭听了布莱特、委和累亚德的訓导。他让罗伯特·格娄弗諾勛爵和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去同“激动的”議員們商談。自帕麦斯頓在他的官邸中看到不滿分子同他的拥护者一起聚集在他周圍的时候起，他就明白，他們对他來說再也沒有有什么可怕的了。他們情緒不好，但都渴望和解。下院會議的結局就这样預先安排好了；剩下的只是在公众面前演一出議會喜劇。緊張局面已經过去。喜劇的最后一幕一演完，我們就将对这出戏作簡短的介绍。

随着温暖而潮湿的天气的到来，克里木春季和夏季所常見的

疾病又蔓延开来了。霍乱和間歇热又出現在联軍的兵营里；虽然流行病暂时还不很厉害，但是足以成为对未来的警告。在赫尔松涅斯，尸体只埋了几英寸深，到处可聞到大批腐烂尸体散发出的臭气。同时，圍攻部队的精神状态也远远不能令人滿意。圍攻部队經受了从未有过的冬季战役的困难和危險，兵士中間之所以还能保持一定的秩序和士气，只是由于春季的来临和依靠一再提出的迅速地胜利結束圍攻的諾言；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並沒有取得任何成就，而俄軍已推进到自己防綫以外的地方，并在双方爭夺的地区筑起了多面堡。朱阿夫兵不再服从指揮了，因此于2月23日他們被派到薩蓬山去送死。此后，联軍將領們开始表現出一点灵活性——这还不能称为积极性；但沒有提出任何明确的目标，也沒有坚决貫徹任何坚定的計劃。法国兵士中間的嘩变情緒像过去那样抑制了下来，这是因为俄軍以經常的出击来打扰他們，还因为开始了第二次轰击，而这次轰击似乎一定会以神奇美妙的总强攻而告終。但結果却一敗塗地。此后，便开始了緩慢而艰苦的、不能带来显著成績的、但为維持士气所必要的挖壕作业。兵士們很快就厌恶这种在战壕里的夜間格斗，因为在那里死了好几百人却沒有取得任何显著成果。又开始有人要求强攻，而康罗貝尔又不得不許下諾言，虽然他早知道諾言是不可能兌現的。佩利西埃以5月1日举行的夜襲，把他从再次出現的嘩变局面中救了出來。据报道，佩利西埃是不顾康罗貝尔的命令而举行夜襲的，当康罗貝尔的命令到达时，部队已經投入了战斗。据說，这次成功的攻击又提高了兵士的情緒。这时候，皮蒙特預备部队开到了；赫尔松涅斯駐滿了軍隊。軍隊认为，他們得到增援以后，就可以轉入直接行动。当时必須采取一种措施。曾决定派远征軍去刻赤，远征軍也启程了。但

是，在远征軍到达刻赤停泊場以前，从巴黎拍来了电报，責成康罗貝尔召回远征軍。当然，腊格倫是同意这一点的。而这支远征軍的不列顛陸軍和海軍司令布朗和萊昂斯曾央求法国同事不顾这道反命令而去攻打要塞。但是白費力气。远征軍不得不撤回。这一次軍队的憤懣情緒已經不可遏止了。甚至連英国人說的話也完全不是模稜两可的了；法国人則几乎要嘩变了。这样一来，康罗貝尔沒有別的办法，只好不再指揮軍隊，因为他已經失去了对軍隊的任何权力和任何影响。佩利西埃是他的唯一可能的继承人，因为兵士早已討厌在波拿巴主义的温室里栽培出来的將軍，屢次要求換上过去在非洲受过訓練的軍事长官。佩利西埃得到兵士們的信任，但他是在困难的条件下接受最高統帅的职务的。他必須行动，不得延誤。既然强攻沒有可能，那末就沒有別的办法，只好向俄国人进軍，而且不应采用我們以前談过的办法，即全軍沿着仅有的一条并且由俄軍大力防守的道路前进，而应把軍隊划成分队，沿着无数条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羊和牧人才能通过的小山道前进；这样，就可能从翼側迂迴俄軍陣地。但这里有困难。法軍拥有的运输工具大約能載运3万人，而且只能运到离岸不很远的地方。至于英軍的运输工具，如果用它們来运一师人，运到黑河的乔尔貢不远的地方，看来就再无所余了。很难設想，在这种缺乏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可以开始进軍，在順利时封鎖北区，把敌人追击到巴赫契薩賴并同奧美尔-帕沙取得联系。况且，俄軍照例都会設法做到除了殘垣断壁以外什么也不留下的；要保证軍隊有大車、馬匹、駱駝等等，只有在联軍使俄軍遭到决定性失敗之后才有可能。我們且看佩利西埃是怎样摆脱这些困难的。

以前我們已經指出过同任命佩利西埃有关的一些奇怪的情

况^①。但是，这里还必须指出一点。当战争开始的时候，担任总司令职务的是圣阿尔诺，一个 *par excellence* [真正的] 波拿巴主义的将军。他是这样为自己的皇上效劳的：上任不久便死了。在头等波拿巴主义者中间，无论马尼扬或是卡斯特朗，无论罗格或是巴拉盖·狄利埃，一个都没有被指定为他的继承人，却任用了康罗贝尔，一个对波拿巴主义的修养不深、资格也不老、但具有丰富的非洲经验的人。现在，指挥官又在更换，正像 *de la veille* [昨日的] 波拿巴主义者一样，*du lendemain* [明日的] 波拿巴主义者也是没有分的。这个职位给了一个普通的非洲将军，他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色彩，但服军役多年并且在军队中颇有名气。沿着这条线下去，将来是否必然会轮到尚加尔涅、拉摩里西尔或卡芬雅克即波拿巴主义队伍以外的将军呢？

“没有能力进行战争，同样也没有能力签订和约，——这就是我们的情况！”——一位把整个命运同帝国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法国国家活动家在几天以前这样指出过。复辟的帝国的每一个步骤，包括任命佩利西埃在内，都证明他是正确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5月24日

载于1855年5月29日“新奥得报”

第243号，并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

6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1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① 见本卷第271—272页。——编者注

卡·馬克思
議會改革。——維也納會議的中斷
和恢復。——所謂殲滅性戰爭

倫敦 5 月 26 日。關於帕麥斯頓前天在下院舉行會議前召集的 Comité du Salut Ministériel [拯救內閣委員會]，大家已經知道了某些細節，這些細節說明了議會機構的性質和給予內閣以 100 票多数的各個不同派別的態度。帕麥斯頓一開始就威脅說：如果迪斯累里的提案被通過，他就要辭職。他以成立托利黨內閣的前景相威脅。所謂激進的議員們，poor fellows [可憐蟲們]，從 1830 年起就享有這樣一種特權：每當他們開始嘩變時，就受到這種最後的可怕威脅。而這種威脅每一次都使他們屈服。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害怕在托利黨組閣時必然要發生的群眾運動。一位激進主義者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的自白可以證明這個論斷是多麼的正確。這位激進主義者本人現在就是一位大臣——雖然只不過是一個王室森林大臣。這個職位完全適合於一個生來就具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天才的人。作為倫敦一個區——南威克的代表，他接到了他的選民們邀請他出席上星期三在南威克舉行的一次公開的群眾大會的請帖。（請注意：正像過去在國內各地舉行的大多數群眾大會一樣，在這次群眾大會上也通過了一項決議，其中說，不預先進行議會改革，要求行政改革就是一種虛偽和欺騙。）摩耳斯沃

思沒有出席这次群众大会，但是送发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这个激进主义者和內閣閣員写道：“如果迪斯累里先生的提案被通过，那末行政改革的必要性就更加明显了。”这种“明显”意味着：如果托利党人組成內閣，那末改革运动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以辞职相威胁并不是帕麦斯頓的主要法宝。帕麦斯頓暗示要解散議會，暗示了仅仅在三年前不惜巨大牺牲才在“值得尊敬的議院”中給自己买到席位的許多倒霉的議員們所要遭到的命运。这个論据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現在已經不是他辞职的問題，而是他們辞职的問題了。

帕麦斯頓对一些人用自己辞职，对另一些人用他們被赶出下院这种办法进行威胁，他給一些人揭示和平的前景，給另一些人又揭示战争的前景，因此，較之迪斯累里提案，他获得了 100 票的多数。但是，已經恢复了的联合現在又重新解体了，而且正好是在事先排练好的喜剧在公众面前演出的时候解体的。大臣們在辯論过程中被迫发表的声明抵銷了他們 en petit comité [在小圈子內]所发表的声明。把各个固执己見的派別联結在一起的水泥不是被一陣颶風，而是被一陣議会的微風吹得四分五裂了。情况是这样的：罗巴克在昨天的會議上就有关恢复維也納會議的謠傳向首相提出了质詢。他希望知道，有沒有委派英国駐維也納大使参加这次會議。然而大家知道，自从不走运的外交家罗素从維也納回来以后，帕麦斯頓就借口不应妨碍“虽然中断了但决沒有結束的維也納會議”而拒絕任何有关战争和外交問題的辯論。上星期一，米尔納·基卜生撤回了（确切些說是擱下了）他的提案，因为依照高貴的勛爵的声明，“关于會議的問題尚未决定”。同时，帕麦斯頓特別強調指出，英國內閣已經让奧地利——“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的盟

友”——去寻找和平談判的新的出发点。他說，維也納會議將要繼續召開，這是無容置疑的。雖然羅素離開了維也納，但是威斯特摩蘭還留在那裡，此外，各大國的大使還在維也納商談；因而繼續不斷地舉行會議的一切因素是存在的。

但是，自從星期一帕麥斯頓賜與議會這些啟示以後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星期一的帕麥斯頓和星期五的帕麥斯頓之間出現了迪斯累里的提案和對這個提案的辯論日；迪斯累里說明他的提案的理由是：擔心在議院休會期間，內閣可能“把國家拖入可恥的和平”，就像在阿伯丁執政期間國家被“拖入”可恥的戰爭一樣。因此，表決的命運就取決於帕麥斯頓對羅巴克質詢的答復。帕麥斯頓決不能在這個時候喚起維也納會議的幽靈並對議會聲稱，在維也納作決定，而在聖斯蒂凡大廳¹⁶²進行討論，這裡是提議，而那裡是安排。因為羅素只是前一天才拋開奧地利、和約草案和維也納會議的，所以帕麥斯頓尤其不能這樣做。因此帕麥斯頓回答羅巴克說：維也納會議沒有恢復，英國大使在沒有得到唐寧街的特別指示前不得出席任何新的會議。在這以後，米爾納·基卜生懷着極其憤懣的情緒發了言。幾天以前，高貴的勳爵曾經聲明，會議只是暫時休會，威斯特摩蘭擁有無限的權力來進行談判。難道他的這些權力被取消了嗎？什麼時候被取消的呢？——帕麥斯頓答道：權力是有的！他的權力仍然像以前一樣是無限的，但是他沒有權利利用它。擁有權力和有權利利用它——這不是一回事。帕麥斯頓對羅巴克質詢的答復破壞了內閣同那依靠皮爾分子壯大起來的 *à tout prix* [不惜任何代價] 謀取和平的主和派之間的关系。同時這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誤會”。迪斯累里前天磨難和盤問了羅素幾個小時，用燒紅的針去刺他。迪斯累里一只手指出了這個阿西

德克輝格党人通常披挂着的外表美丽动人的獅子皮，另一只手指出了隱藏在这块獅子皮后面的用馬來樹膠做成的小人。羅素雖然由于他多年的議會經驗和冒險行為，就像無法傷害的齊格弗里特那樣頂住了這些尖銳的言辭，但是在這種對他的真正的“我”作了無情揭露的情況下，他終究不能保持平靜。他在迪斯累里發言時丑態畢露。當格萊斯頓在迪斯累里之後進行他的說教時，羅素在自己的席位上一直坐立不安。格萊斯頓的話一有停頓，羅素就站了起來，他聽到會場上發出的笑聲，才意識到還沒有輪到他發言。最後，格萊斯頓結束了他的發言，羅素終於能夠暢所欲言了。羅素向議院陳述了他恰當地向哥爾查科夫公爵和提托夫先生隱瞞了的一切東西。他在維也納會議上維護了俄國的“榮譽和尊嚴”，現在據他看來俄國是一個不可抑制地力圖統治全世界的強國，它締結條約是為了替掠奪性戰爭製造借口，它進行戰爭是為了以後用條約來毒化氣氛。在羅素看來，不僅英國，而且整個歐洲都受到了威脅，因此除了歼灭性戰爭以外別無出路。他還暗示到了波蘭。簡單說來，維也納的外交家突然變成了“下流的蠱惑家”（這是他所喜歡的用語之一）。迪斯累里巧妙地促使他作了這樣一篇過甚其辭的發言。

在表決以後，皮爾分子詹姆士·格萊安爵士馬上發了言。他沒有聽錯吧？羅素向俄國宣布了“新的戰爭”，這是一次十字軍遠征，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一場民族的戰爭。問題十分嚴重，以致不能不繼續辯論了。他說大臣們的意圖現在比任何時候都不明確。羅素以為在表決以後他照例可以脫下獅子皮。因此他決定採取不客氣的態度。他說格萊安把他“誤解”了。他只是希望“土耳其平安無事”。於是迪斯累里高喊道：請看吧，你們這些人否決了

我的提案，撤銷了對內閣“口是心非”的指責，現在請欣賞一下他的誠意吧！這位羅素在表決以後背棄了他在表決以前的講演！我祝賀你們和你們的表決！

在這種«demonstratio ad oculos»〔“明顯的證據”〕面前，議院的會議不能再支持下去了。辯論被延期到三一節休假以後舉行；內閣所取得的勝利轉瞬間又成了泡影。本來打算喜劇只分兩幕並以表決而告終。現在又增加了一場尾聲，而這場尾聲又有比演出的主要部分顯得更為重要的危險。然而議會假期倒使我們有可能更詳盡地來分析前面的兩幕。辯論在表決以後反而具有了嚴重的性質，這是議會史冊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直到目前為止，議會鬥爭通常都是以表決而告終的，就像戀愛以結婚而告終一樣。

卡·馬克思寫於 1855 年 5 月 26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55 年 5 月 30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 245 號

卡·馬克思 迪斯累里的提案

倫敦 5 月 28 日。按照文雅的格萊斯頓的說法，大家向下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菜单”——要在迪斯累里提案和貝林对迪斯累里提案的修正案之間、在威·希斯科特爵士对貝林修正案的 *sous-amendement* [补充修正案] 和麥先生旨在反对迪斯累里、貝林和威·希斯科特爵士的 *contre-sous-amendement* [对补充修正案的反修正案] 之間进行選擇。迪斯累里的提案包括对大臣們的譴責和送呈国王的关于战争問題的奏本：第一个問題談得明确，第二个問題談得含糊不清，两个問題是靠只有議会的思維过程才能理解的那种关系彼此連結在一起的。关于战争問題的奏本之所以采取怯懦的形式，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解釋。迪斯累里担心在自己的陣营里引起憤懣。一位托利党人格兰比侯爵表示反对这个奏本，另一位托利党人斯坦利勋爵則表示贊成，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和平拥护者。貝林的修正案是內閣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不同意对內閣进行譴責，而原封不动地接受迪斯累里提案中的軍事部分，只不过在前面加上了这样几个字：議院“遺憾地确认，維也納會議沒有导致軍事行动的停止”。貝林同时潑了两瓢水，一瓢是热的，一瓢是冷的。“遺憾”——是对主和派說的，“繼續战争”——是对主战派說的，內閣对这两派都沒有明确的义务——这既是对白票、也是对

黑票設下的 shell trap〔圈套, 陷阱〕, 既是給长笛用的乐譜, 也是給长号用的乐譜。希斯科特的 sous-amendment〔补充修正案〕用純粹是安宁閑逸的詞句来补充貝林的模稜两可的修正案, 它增加了这样一些字: “議院仍然抱着〈sherishing——这完全是不会得罪人的說法〉希望, 繼續举行的會議将获得成功。”相反地, 娄的修正案却声明和平談判是由于俄国拒絕第三項条款而結束的, 并且以这一点来論证送呈国王的关于战争問題的奏本。我們看到, 內閣的折衷主义修正案中所企图掩飾和中和的两个部分, 是和平地相互对立着的。希斯科特高喊: 繼續举行維也納會議! 娄回答: 不要举行任何維也納會議! 貝林低声說道: 要举行維也納會議, 也要繼續进行战争! 这部三重唱曲的主題的發揮, 我們过一个星期就能听到, 現在我們回过来談一談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辯論。头一个晚上对这个提案发表意見的只有三个主要的政界要人, 即迪斯累里、格萊斯頓和罗素: 第一个人的发言尖銳而中肯, 第二个四平八穩而善于論辯, 第三个——枯燥无味而又杂乱无章。

我們不同意說迪斯累里由于个人反对罗素而忽視了“問題的实质”这种指責。俄英战争的秘密不应当在战场上寻找, 而应当在唐宁街寻找。罗素是接获彼得堡內閣的秘密通知时期的外交大臣, 是最近維也納會議期間的特命全权代表, 同时又是下院的首領; 他是唐宁街的活的化身, 是唐宁街的**被揭开了**的秘密。这不是因为他是內閣的灵魂, 而是因为他是內閣的喉舌。

迪斯累里談到, 在 1854 年年底, 罗素曾經在議院全場热烈掌声下耀武揚威地宣称:

“在沒有得到足以把俄国的实力限制在对欧洲无危險的**範圍**以內并从而保证未来的完全安宁的这种物质保证以前, 英国不能放下武器。”

而这个人就是同意 1853 年 12 月 5 日維也納議定书的那个內閣的成員。在这份議定书中,英法代表曾作了保留声明:战争不应导致俄罗斯帝国的“物质条件”的削弱或改变。克拉倫登在答复林德赫斯特提出的关于这个議定书的质問时,曾以內閣的名义声明:

“不允許削弱俄国在欧洲的实力,这可能是普魯士和奧地利的願望,但不是法国和英国的願望。”

迪斯累里說,罗素在下院把尼古拉皇帝的行为形容成“虛伪的和阴險的”。1854 年 7 月,他吹嘘說即将攻入克里木,并声称,破坏塞瓦斯托波尔对欧洲是必要的。最后,他推翻了阿伯丁,因为在他看来,阿伯丁把战争进行得太无生气了。獅子皮的外表看起来就是这样的,——現在来談談獅子本身。在 1853 年的两三个月內,即在英国从彼得堡获得“秘密的和机密的信件”时期,罗素是外交大臣。在彼得堡的秘密信件中,尼古拉公然坚持要瓜分土耳其,其借口首先是要保护在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而这种保护,就像涅謝尔罗迭在最近一次急电中所承认的,是向来都不存在的。罗素做了些什么呢?他給英国駐彼得堡大使拍去了一份急电,其中有下面这一段話:

“土耳其政府愈是遵循公正立法和正义管理的策略,俄国皇帝就愈认为沒有必要行使自己的专有保护权,因为他认为行使这种权利是十分沉重和不方便的,虽然这种保护无疑是他应尽的义务,而且是被条約神圣化了的。”

由此可見,罗素事先就在这个爭执点上作了让步。他声称保护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应尽的义务。这种保护是他从凱納吉条約引伸出来的。而維也納會議的“第四項条款”談的是什么呢?它談的是“对庫楚克-凱納吉条約的錯誤解釋乃是目前战争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宣战前,我們看到罗素扮演了維護俄国权利(現在連

涅謝尔罗迭也放棄了這種權利)的角色,而在戰爭第一個階段結束時,在維也納會議上,我們又看到羅素扮演了維護俄國榮譽的角色。3月26日剛接觸到問題的實質的時候,即剛開始討論第三項條款的時候,反對俄國的羅素就起來鄭重地聲明:

“在英國及其盟國看來,最好的和唯一許可的媾和條件,就是那些能同俄國的榮譽和尊嚴最好地協調同時又能保證歐洲的安全等等的條件。”

因此,4月17日俄國代表拒絕主動提出有關第三項條款的建議;在羅素發表聲明以後,他們深信:同盟國代表提出的條件將比俄國自己所能提出的條件更符合俄國的精神。但是,限制俄國的海軍實力難道就是“同俄國的榮譽最好地協調”嗎?因此涅謝尔罗迭在最近一次通告中牢牢抓住羅素在3月26日發表的聲明。他引用了羅素的話。他問羅素,4月19日的建議是否是“最好的和唯一許可的”?在戰爭前夕,羅素扮演了俄國庇護者的角色。在戰爭第一個階段結束時,他又在布奧爾伯爵宮殿里的會議桌旁扮演了俄國庇護者的角色。

迪斯累里反對羅素的發言就是這樣。後來他解釋戰場上的失利和國內的不滿情緒的原因是內閣採取了自相矛盾的行動:內閣在克里木的行動是有利於戰爭的,而在維也納的行動却有利於和平,從而把尚武的外交同外交化的戰爭結合了起來。

他高聲喊道:“我不認為,只要徵稅和裝備遠征軍就足以進行戰爭了。必須支持人民的情緒。但是你們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你們經常在使國家相信:你們是致力於和平的,大家所爭論的那一項條款的意義畢竟是比較小的。如果人們確信將要同一個強大的敵人較量,那末他們就會去作巨大的犧牲。如果人們認識到他們參加的鬥爭是一場涉及國家的榮譽、生存和強盛的鬥爭,那末他們就會去作巨大的犧牲。如果你們把所得稅增加一倍或兩倍,如果你們驅使人們離鄉背井去服兵役,如果你們用血戰的消息來引起英國人心

灵的忧郁,如果你们做了这一切,那末人民就不应当听到,全部问题在于俄国在黑海是不是要有四艘或八艘巡航舰……要顺利地进战争,不仅需要支持本国的情绪,而且需要支持其他国家的情绪。你们要相信这一点:当你们向别的国家呼吁,请求它充当调停人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永远也不会成为你们的盟友了……帕麦斯顿勋爵保证他不会签订可耻的和约。高贵的勋爵替他自己担保,可是谁又能替高贵的勋爵担保呢?……你们依靠维也纳会议是不能摆脱困难的。你们利用外交只会增加危险和困难。你们在各方面所采取的态度都是错误的,要是你们得不到相信你们有决心的热情奋发的人民和盟国的支持,你们永远也不能顺利地进进攻性战争。我希望议院今晚进行表决,结束这种错误的两面手段,即同时采取战争和外交的手段;我希望议院公开而明确地声明:谈判的时机已经过去。我认为,凡是看过涅谢尔罗迭通告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2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5 月 31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247 号

卡·馬克思

*議會新聞：关于迪斯累里 提案的辯論

倫敦 5 月 29 日。格萊斯頓的演說術从来还没有像他在星期四晚上的 speech [演說] 中表現得那样完美无缺。文雅，流暢，玄奧，甜蜜而又含毒素，柔軟而又強硬，帶有經院哲学的色彩，questiones 和 questioniculae [有大問題，也有小問題]，或然主义的全部武器都使用上了，既讲詭辯的良心，也讲沒有良心的保留，有不容置疑的理由，也有理由充分的怀疑，温文尔雅的优越感，合乎道德的阴谋，詭計多端的朴实，既談拜占庭，又談利物浦。格萊斯頓的演說与其說是圍繞着英国和俄国之間的战争与和平問題，倒不如說是圍繞着下面這個問題：为什么不久以前还是主战內閣閣員的格萊斯頓現在变成了不惜任何代价謀取和平的主和派信徒？他作了分析，他从各方面研究了自己的良心界限，并以他特有的謙虛态度来要求不列顛帝国在格萊斯頓的良心範圍內进行活动。因此，他的演說帶有外交心理的色彩，如果說这种色彩把良心的因素带进了外交，那末在更大的程度上，也把外交的因素带进了良心。

对俄国进行的战争，据说最初是正义的，但是到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进行下去，那就有罪了。自从东方局势开始复杂化以来，我們不断提高我們的要求。我們的条件愈提愈高，而俄

国却步步退让。最初，俄国不仅要求对信奉正教的土耳其基督徒建立宗教保护关系，而且还要对他们建立世俗的保护关系，它不愿意放棄任何旧条约，甚至不愿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俄国拒绝参加在維也納召开的任何大国会议，而建議土耳其大使到圣彼得堡来，或者到俄国大本营来。这是俄国在1854年2月2日的論調。西方列强当时的要求和四項条款有多大的差别呀！就在1854年8月26日，俄国还声明，它决不能同意接受这四項条款，而宁愿进行长期的、殘酷的、无益的斗争。俄国在1854年8月和1854年12月的論調又有多大的差别呀！1854年12月它已經保证“无条件地”接受这四項条款了！这四項条款是我們所提出的要求的最高限度，同时也是俄国所能作出的让步的最高限度。所有超出这四項条款范围以外的东西，都超出了基督教道德的范围。就算这样吧！俄国接受了第一項；它也接受了第二項；它并没有拒绝第四項，因为第四項沒有討論。这样一来，剩下的只有第三項，因而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問題有分歧，甚至有分歧的不是第三項全部，而只是第三項的一半，也就是說，只在八分之一的問題上有分歧。問題在于：第三項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是保证土耳其的領土完整，第二部分的内容是削弱俄国在黑海的軍事威力。对于第一部分，俄国或多或少表示了諒解，因此剩下的只有第三項的后一部分。甚至在这个問題上俄国也表示不反对限制它在海上的統治，它所反对的只是我們实行这种限制的方法。西方列强只提出了一个方法。俄国提出的不是一个，而是另外两个方法；这就是說，在这方面俄国也走在西方列强的前面。西方列强所提出的方法，是有損俄罗斯帝国的尊严的。但是，不减弱国家的力量，就不能損害国家的尊严。另一方面，决不能减弱国家的力量，因为这样做，就

將損害它的尊嚴。在考慮到一切“方法”的同時，依靠一種方法就可以使八分之一的分歧變成三十二分之一的分歧，對於這一種“方法”是有各種不同看法的，但是難道應該為這點再犧牲 50 萬人的生命嗎？恰恰相反，應該聲明，我們已經達到了戰爭的目的。難道我們應該僅僅為了**威信**，為了作戰的光榮而繼續戰爭嗎？我們的兵士已經使自己獲得了榮譽。可是英國在大陸上已經**威信掃地**，

值得尊敬的紳士叫喊道，“看在上帝的面，不要因為這種**威信掃地**而讓人類去流血，應該向國外發出更確實的消息來恢復人們對英國的信任”。

的確，為什麼不去“糾正”國外的報紙呢？聯軍的進一步勝利會導致什麼後果呢？它們的勝利會迫使俄國更頑強地反抗。假如聯軍失敗了，那又怎樣呢？它們的失敗會引起倫敦和巴黎居民的憤慨，從而迫使聯軍採取更堅決的進攻。這樣，為戰爭而戰爭會導致什麼結果呢？最初，普魯士、奧地利、法國和英國對俄國的要求是一致的。現在普魯士已經退到一旁了。如果今後還堅持戰爭的話，奧地利也會退到一邊去的。同英國站在一起的就只剩下一個法國了。

如果英國根據那種除了法國以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同意的理由而繼續戰爭的話，那末“它的立場的道德威信就會大大削弱和動搖”。反之，如果英國同俄國締結和約，即使這個和約有損英國得自這個世界的**威信**，那就會增強它的“道德威信”，而這種威信是蛀不壞、鏽不了的。此外，不同意用俄國的方法來實行第三項條款的後一部分的人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呢？難道是要瓜分俄羅斯帝國嗎？不引起“民族戰爭”，這一點是不可能達到的。然而奧地利是否願意而法國是否可能支持這種民族戰爭呢？如果英國想挑起“民族戰爭”，那末它不得不單獨進行這個戰爭，而這意味着“它根

本不敢进行这个战争”。因此，沒有其他办法，只有提出俄国可以同意的那些要求。

如果不按字面而按精神实质来看，格萊斯頓的演說就是这样。俄国开始用另一种論調讲话了；这证明它**实际上**已經让了步。在可尊敬的皮由茲分子看来，言語是唯一的問題。他也开始用另一种論調讲话了。現在他因战争而訴起苦来；全人类的灾难使他感到精神痛苦。当譴責調查委员会的时候，他作了辯护性的发言，并认为英国軍隊遭受飢餓和鼠疫的重重灾难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时軍隊是为**和平**而作出牺牲的！自从軍隊为**战争**作出牺牲的时候起，罪恶就开始了。然而，格萊斯頓成功地证明，英国政府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同俄国作战的問題；他成功地证明，無論現在的英国政府还是現在的法国政府都不可能而且也不願意同俄国认真作战；他成功地证明，战争的**借口**是不值得一駁的。格萊斯頓只是忘記了，这些“借口”原是他和他以前的同僚捏造出来的，英国人民迫使他们进行了这个“战争”。对他们來說，指揮这个战争只是为了拖垮这个战争和保持住自己职位的一个借口。而从他們借以进行战争的虛假借口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中，格萊斯頓又成功地得出結論說：他們就在这些虛假的借口下也可以締結和約。他同他的老同僚只是在一点上有所不同。他是 Out〔反对派〕，而他們是 In〔政府〕。但是，适用于前任大臣的虛假借口，并不是适用于現任大臣的虛假借口，尽管加在母鵝肉上的調味汁也就是加在公鵝肉上的調味汁。

格萊斯頓的这种极度混淆概念的做法，正是罗素期待已久的信号。他站立起来，不顾企图替俄国辯护的格萊斯頓，开始对俄国进行誹謗。然而格萊斯頓是«Out»，而罗素是«In»。罗素大声疾呼

地重复了一切众所周知的、虽然是庸俗的但却是正确的关于俄国征服世界的计划的一般说法，然后他就转入了本题，即罗素的本题。他说，从来也没有过一个如此重大的民族问题像在迪斯累里的演说中那样被贬低到这种地步。的确，把一个重大的民族问题，甚至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和一个矮小的约翰，即约翰·罗素等同起来，难道还能够比这更轻视这个问题吗？在战争第一阶段开始和结束时，都是欧洲 contra [反对] 俄国，正像罗素 contra 涅谢尔罗迭一样，这并不是迪斯累里的罪过。这个矮小的人物在接触到四项条款的时候，非常滑稽地竭力设法摆脱窘境。一方面他必须指出，他的媾和条件是与与刚才所描绘的俄国的可怕情况相符合的；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指出，他是忠实于他自愿地、没有任何强制地向提托夫和哥尔查科夫提出的保证的，他提出的条件是能“同俄国的荣誉最好地协调”的。因此，他一方面证明，俄国只是一个虚有其名的海军强国，因而很容易就会同意对这种仅仅是想像中的力量所加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断定，俄国自己沉没的军舰是对土耳其因而也是对欧洲均势的一个可怕的威胁，因此“第三项条款的后一部分”有巨大的独立意义。敌人迫使他的对手陷入进退两难的死胡同。罗素自己使自己陷入不可自拔的绝境。他提供了说明他的外交天才的新证据。主动和奥地利结盟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只要打一个败仗，就会使俄军进入维也纳，他就是这样来鼓励他的同盟者之一。

他继续说道：“我们感到俄国有夺取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进行统治的打算，因为土耳其显然走上了瓦解的道路；我也不怀疑，关于法国和英国在这个国家崩溃时所作的打算，俄国抱有同样的看法。”

不仅如此，他还补充说：“其实俄国看错了；不是英国和法国，

而是英国一个国家应当控制君士坦丁堡。”偉大的外交家就这样唤起奥地利站在英国的一边，他就这样向土耳其泄露了土耳其的朋友和拯救者所抱有的而且是“明显地”抱有的意見。罗素作为議会的策略家在一点上毕竟是滿有成績的。1854年7月他大放厥詞，叫嚷克里木将被占領，当时迪斯累里把他弄得很窘，迫使他在議院投票表决以前就放棄了他的好战言論。这一次他把这种自杀行徑（放棄他所宣布的全世界反对俄国的斗争）推迟到議院举行投票表决以后。真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罗素在演說中还举了两个历史例证，他对同尼古拉皇帝就凱納吉条約进行談判一事作了非常有趣的描述，并对德国的情况作了概述。这两件事都值得簡略地提一提。正像讀者所想起的那样，罗素依据凱納吉条約，直接承认了俄国的保护制度。英国駐彼得堡大使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是一个比較不肯忍让和比較多疑的人。他向俄国政府作了探問，而罗素天真到这般地步，竟把这件事的經過情形說成这样：

“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悬請已故的俄国皇帝把条約中可以作为他提出要求的根据的那部分条文給他看。皇帝陛下說：‘我不能給您看条約中可以作为我提出要求〈要求建立保护制度〉的根据的那部分专门条文。請您去找涅謝尔罗迭伯爵吧，他会給您看的。’汉密尔顿·西摩尔就向涅謝尔罗迭提出了自己的請求。涅謝尔罗迭伯爵回答說，他不熟悉条約的条文，而介紹他去找布隆諾夫男爵，或者让他的政府去找他；布隆諾夫男爵会把条約中作为俄皇提出要求的根据的那一部分条文告訴他。我想，布隆諾夫男爵任何时候也不敢說出条約中的这部分条文。”

关于德国，高貴的勋爵这样讲道：

“俄国通过婚姻关系同德国为数极多的小君主保持联系。在这些君主中，不得不惋惜地承认这一点，有很多人在实行自己的統治时都对他們所預

料的臣民的革命情緒感到极大的恐惧，因此他們指靠他們的軍隊来保护自己。然而这些武装力量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他們的軍官受到了俄国宮廷的腐蝕和敗坏。俄国的宮廷授給他們勳章，发給他們奖章和奖金，在某些情况下，俄国还定期发給他們津貼以支付他們的債務，因此，德国本来應該成为一个独立的堡垒，領導欧洲防止俄国的統治，但是由于俄国的陰謀和俄国的金錢，多年来已經逐漸削弱和喪失了自己的独立。”

所以，为了喚起德国高举火把前进，为了促使它服从“无上的命令”，履行义务，罗素在維也納會議上宣布自己是“俄国的荣誉和尊严”的捍卫者，迫使德国来傾听这位自由独立的英国人的傲慢言詞。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29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6 月 1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249 号

卡·馬克思

对帕麦斯顿最近一次演說的批評

倫敦 6 月 1 日。如果說格萊斯頓用看来很深奧的东西迷惑人，那末帕麦斯顿就是用显然表面的东西迷惑人。他善于在一大堆动人的詞句和对目前的要求作什么也說明不了的让步下巧妙地隱藏自己真实的意图。他在內閣的講話一周前就为公众所知道了。日报和周刊討論了它、研究了它、批評了它。他的敌人說，他在过去許多个月內說的都是旧阿伯丁的語言，而現在在一个晚上他却认为說旧帕麦斯顿的語言又是适时的了。他們說：高貴的勛爵为自己担保，可是誰又为高貴的勛爵担保呢？他們把他的講話叫做巧妙的把戏，因为他成功地避免了对他的政策作任何明确的声明，并且使自己的講話显得如此从容不迫、不可捉摸，以致絲毫不能对它有任何揭露。相反，他的朋友們却沒有忘記把他用風琴作美妙动听的演奏时所掀起的那陣風宣布为音乐。他立刻正确地估計到了他自己在議院和国家面前所应处的地位。他說在我面前的是誰呢？一方面是那些认为我們进行战争不够坚决的人，而另一方面則是那些企图促使国家接受可耻的媾和条件的人；一方面是那些責备我們，說我們被拖入了同奥地利进行无益的、同时使战争瘫痪的談判中的人，而另一方面則是那些认为我們在这种談判中做得还不够并且用过分的要求破坏了談判的人。

于是，他自己就采取了中庸立場。他把战争拥护者的攻击轉

給和平擁護者，而把和平擁護者的攻擊轉給戰爭擁護者。反對絕對的和平擁護者，這給他提供了一個方便的機會來顯露早就有意顯露的愛國精神，來莊嚴地保證經常保持充沛的毅力，來玩弄他經常用來欺騙 niais〔頭腦簡單的人〕的所有豪邁詞句。他列舉了英國所擁有的巨大資源，來使民族自尊心得到滿足，——這就是他對指責他不能管理大量資源的唯一答復。

迪斯累里說：“高貴的勳爵使他想起了一位想在情人面前夸耀自己財富的暴发戶：我有別墅，在城里有房子，有繪畫陳列館，有精緻的酒窖。”

英國也是這樣：有波羅的海艦隊、黑海艦隊和每年 8 000 萬英鎊的國家收入等等。然而在所有這些動人聽聞的小事（帕麥斯頓講話的內容就是這樣一些小事）掩蓋下，帕麥斯頓成功地作了**某種聲明**，以後在適當的時候他就可以回到這個聲明上來，把它宣布為議院所批准的政策原則。任何一家英國報紙都沒有覺察到這個聲明，但帕麥斯頓的演說術也正是在於他善於把他講話的真正意思掩飾起來，善於用滔滔不絕的、空洞而圓滑的詞句把這種意思從聽眾的記憶中沖洗掉。既然帕麥斯頓不是僅僅追求片刻的成功，像什麼羅素那樣，既然他還考慮到將來，那他自然不滿足於當前所必需的演說手段，而是用心地為以後耍弄手腕奠定基礎。上述聲明一字不漏地照抄如下：

“我們參加了黑海上的大規模行動，我們認為而且希望，勝利將在我們這邊，我們深信，勝利將使我們爭得英國、法國和奧地利在目前的沖突狀況下認為自己有权要求的那些條件。”

因此，不論怎樣擴大黑海上的行動，戰爭的外交基礎却依然照舊。不論在軍事上取得怎樣的勝利，最終結局却事先已由“四項條款”所規定，所限制。這一點是帕麥斯頓在累亞德把掩飾親俄的那

四項条款的假面具摘掉以后过了几小时声明的。但是帕麦斯顿轉移了大家对累亚德批評的注意。他反駁格萊斯頓，而为第三項条款的后半条辯护，并把这半条說成是完整的一条，从而逃避了对真正重要問題——关于战争的任务和目的問題的考察。

有一件打断了帕麦斯顿讲话的事情是值得提一提的。英国的伪君子罗伯特·格娄弗諾勋爵責备帕麦斯顿，說他談到軍事上的胜利和估計战争的可能性时，沒有考虑到上帝的恩惠和庇护，甚至“沒有提到上帝的名字”。因而他协助天神賜与自己的国家以惩罚。帕麦斯顿于是立刻开始懺悔了，并且捶打自己的胸口，以此证明，在需要时他也可以傳道說教，而且翻起白眼来不会比格娄弗諾差。然而这次議會事件被人民繼續发展下去了。梅里勒榜（倫敦的一个区）的公民在考彼尔街的一个学校內召开了一个盛大的群众大会，抗議“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因为这里問題涉及到选民，所以参加群众大会的有作为法案辯护人的埃布林頓勋爵和罗伯特·格娄弗諾勋爵；这个法案就是他們向議會提出的。但是他們並沒有依靠上帝的庇护和恩惠，而是有远見地在会場的各个地方布置了一打領取报酬的专业捧場者和搗乱者。秘密很快就被揭穿了，伪君子雇佣的走狗立即被公民們抓住并被赶出会场。“高貴的勋爵們”这时无法反抗会場上发出的吵鬧声、口哨声和喊叫声，只好狼狽不堪地重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他們剛一离开会场，在他們的馬車后面就跟着一批“沒有領取报酬的”人群，臉上都明显地露出罪孽深重的譏笑和冷淡无情的表情。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1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6 月 4 日
“新奧得报”第 253 号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

*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

倫敦6月5日。行政改革协会在巴特取得了胜利。它的候选人泰特先生（他与托利党候选人竞选）以絕大多数票当选为議員。今天自由派的报纸把这种在“合法的”英国的领域内所取得的胜利当做一件大事来庆祝。关于 «poll» [“选举”] 情况的公报是以不亚于关于在阿速夫海的不流血胜利的公报的那种吹嘘口气发表的。巴特和刻赤！——这就是当前的口号。但是，各种报刊（不論是主張改革的报纸，还是反对改革的报纸；不論是內閣的报纸，还是反对派的报纸；不論是托利党的报纸，还是輝格党或激进派的报纸）都避而不谈一点，这就是行政改革协会最近几天在倫敦、北明翰和伍斯特所經受的那些失敗和絕望。当然，这一次的斗争并不是在特权选民集团的有限范围内进行的。而斗争的結果也沒有使西蒂区改革派的对方取得胜利。

改革协会在倫敦組織的第一次真正公开的群众大会（或者說是不收入場券的群众大会）是上星期三在梅里勒榜举行的。一位宪章主义者针对西蒂区改革派所提出的決議案提出了修正案，其中說道：

“西蒂区先生們所代表的金錢貴族也像土地貴族一样坏；在改革的幌子下，他們只是力图依靠人民而钻到唐宁街去，以便在那里同寡头政治家瓜分

职位，共享薪俸和荣誉；而人民运动的唯一纲领就是宪章及其五项条目。”

群众大会的主席，西蒂区的一个大亨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第一，他是否要把这个修正案付诸表决；第二，先表决什么，决议案还是修正案；最后，采用什么方式进行表决。听众对他的犹豫不决的态度、种种策略上的考虑和有失体面的手腕感到了厌倦，于是就宣布他不能继续主持大会，而选举厄内斯特·琼斯来代替他做主席；后来进行了表决，绝大多数人投票反对决议案，而赞成修正案。

在北明翰，西蒂区协会在市长的主持下在市会议厅举行了公开的群众大会。会上针对协会的决议案也提出了和在伦敦提出的一样的修正案。但是市长断然拒绝把修正案付诸表决，而要求把“宪章”这两个字换成另一些比较体面的字。他说否则他就不当主席。因此“宪章”这两个字就改为“普选权和秘密投票”。措词上作了这种改动的修正案以 10 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在伍斯特（西蒂区改革派也在这里举行了公开的群众大会），宪章派的胜利和行政改革派的失败更为明显。这里宪章未经任何拖延就被宣读通过了。

协会由于在伦敦、北明翰和伍斯特举行的大会取得了极不利的结局，因此就不再公开诉诸 *vox populi* [人民的呼声]，而是采用在一切最大城市里散发请愿书的办法，来向它的拥护者征集签名。西蒂区的头子同联合王国商界大亨之间的广泛联系以及这些大亨对他们的伙计、商行职员和“更小的”商务代理人的影响，无疑会使他们有可能悄悄地在暗地里给这些请愿书填满签名，然后再加上**英国人民的呼声**这样的题词，把这些请愿书送呈“值得尊敬的议院”。但是这些先生们如果认为依靠这些乞求来的和用阴谋诡计收集来的签名就可以吓倒政府，那末他们就想错了。政府怀着讥讽的自负心情观察到，协会的拥护者是怎样在口哨声中被赶出

theatrum mundi〔世界舞台〕的。政府机关报暂时保持沉默，一方面是因为不那样它們就不得不提到宪章主义的胜利，另一方面是因为执政阶级已經有领导行政改革协会运动的意思，如果人民运动过于坚强的話。它們保持着“誤解”以防产生这样的危險，这种誤解就是将来在某一个时候把协会的拥护者当做人民意志的代表者。这种誤解正是英国的“历史”发展的要点，誰也不像自由思想的輝格党人那样善于利用它。

宪章是一个十分簡洁的文件，其內容除了要求**普选权**外，只提出下列五点作为实现普选权的五項条件：（1）秘密投票（用球来进行表决）；（2）廢除議員的财产資格限制；（3）支付議員薪金；（4）議會每年选举一次；（5）各选区一律平等。1848年法国的实验使人們对**普选权**失去了信心¹⁶³，从此以后，大陆上的居民就有輕視**宪章**对英国的重要性的倾向。他們沒有看到，在法国社会中农民占人口三分之二而市民占人口三分之一；可是在英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住在城市而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农村。普选权在英国所产生的效果同它在法国所产生的效果相反，正像这两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的情况相反一样。这也就說明了法国和英国对普选权的要求具有恰好相反的性质。在那里，这是政治思想家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以他的信仰为轉移）能够得到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支持。而在这里，这种要求是貴族和资产阶级为一方和人民群众为另一方之間的分水岭。在那里，它具有政治问题的性质；而在这里，它具有社会问题的性质。在英国，当普选权成为人民群众的口号以前，爭取普选权的鼓动工作就已有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法国，普选权先实行，然后才开始它的历史道路。在法国，遭到毁灭的是普选权的实践；而在英国，

則是普选权的思想。在本世紀的最初几十年，在弗兰西斯·伯德爵士、卡特賴特少校和科貝特时代，普选权还带有不明显的唯心主义性质；由于这种性质，普选权就成为一切不直接屬於执政階級的居民阶层的良好願望。对于資產階級來說，普选权实际上只是資產階級在 1831 年通过議会改革所取得的那种东西的奇異的概括性表現。而在 1838 年以后，对普选权的要求在英国就不具有真正的特殊的性质。证据是：連休謨和奧康奈尔也在宪章上签了名。1842 年，最后的幻想消失了。这时洛維特做了一次最后的但是徒劳无益的尝试，企图把对普选权的要求說成是所謂激进派和人民群众的**普遍的要求**¹⁶⁴。从这时起，就不再存在对普选权实质的任何怀疑了。对它的名称也沒有疑問了。这是人民群众的宪章，它意味着人民群众取得作为实现他們的社会要求的手段的政治权力。1848 年普选权在法国被理解为全民团結的口号，而在英国却被理解为战争的口号。在那里，普选权是革命的直接內容；在这里，革命是普选权的直接內容。如果追溯一下普选权在英国的历史，那末可以看到，随着英国現代社会及其永无止境的矛盾——由于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矛盾的发展，普选权逐渐地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性质。

除了官方的和半官方的政党，以及除了宪章派外，我們在英国还看到“賢人”集团，这些人对政府和統治階級以及对宪章派都是同样的不滿。他們高喊道：宪章派想干什么呢？想加强和扩大議会的无上权力，把它变成人民的政权。他們并不要廢除議会制，他們是要把議会制提到更高的高度。而真正的目的在于摧毀代議制！領導这个集团的是一位东方賢人——戴維·烏尔卡尔特。他想恢复英国的 Common law（习惯法）。他想縮小 Statute law（成

文法)的界限。他希望用地方化来代替集中。他想重新挖掘“盎格魯撒克逊时代的古老的和真正的法律源泉”。让这些泉水自然而然地流出来灌溉和肥沃周圍的土地。但是戴維至少是彻底的。他打算把現代的分工和資本的积聚都恢复到古盎格魯撒克逊的水平,最好是恢复到东方的水平。他原籍苏格兰高地居民,根据自由選擇当了切尔克斯人和土耳其人的干儿子,他能够指責文明及其各种禍害,有时甚至还能对这种文明进行批判。但是他并不像一些幻想家那样庸俗,他没有把現代国家形式同現代社会分离开来,他并不幻想与資本积聚同时存在的地方独立性和与反个人主义分工同时存在的个人特殊性。戴維——这是一位目光注視着过去、对古老英国抱着古玩家贊美心情的預言家。因此,不管他怎样肯定地和坚决地叫喊:“戴維·烏尔卡尔特是唯一能够拯救你們的人!”(几天前他就曾在斯泰福群众大会上这样呼吁过)新的英国都没有理睬他而让他站在原地不动,他应当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5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6 月 8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261 号

卡·馬克思

*議會关于战争的辯論

倫敦6月6日。帕麥斯頓又施展了他利用議會把持外交、又利用外交把持議會的老本領。內閣的政策应当根据貝林、希斯科特和麥的修正案來討論。所有這些修正案都是以維也納會議為基礎的。在三一節為時一周的假期里，帕麥斯頓借口議會辯論已經結束而巧妙地迴避了維也納會議，並在奧地利面前作了表白，在議會復會時，又借口維也納會議已經結束（他說會議還在舉行只是一種傳說）而巧妙地迴避了辯論。維也納會議不存在了，要求維也納會議繼續開會的修正案也就沒有意義了；修正案沒有意義了，關於內閣政策的辯論也就沒有意義了；辯論沒有意義了，內閣也就沒有必要對“新”戰爭的趨勢、任務和目的作說明了。正如戴維·烏爾卡爾特（他就是戴維老爺）所斷言的，這個目的僅僅在於使聯軍在領教了克里木的冬季疾病後，再嘗一嘗克里木夏季疾病的滋味。如果說烏爾卡爾特對情況並不是全都了解，那末他對自己的帕麥斯頓却是了解得非常清楚的。他的錯誤只在於他認為秘密陰謀有無限的力量，即秘密陰謀可以影響正式的历史進程。總之，帕麥斯頓向復會的議會聲明，再也沒有討論的對象了，議會所能作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向國王送呈有關戰爭問題的奏本，換句話說，就是對內閣表示信任。起初，由於那些背熟了關於修正案的長篇發言和

希望販賣自己貨色的議員們的頑固態度，他受到了挫折。但是他解散了維也納會議以後，也就使這些發言失去了它們的鋒芒，而由於 horror vacui〔害怕空虛〕和寂寞無聊，議會終於被迫通過了他的奏本。為了擺脫這些發言，議會就抓住這個奏本。

俾的修正案隨着形勢的變化而改變了它的含義。原先它意味着維也納會議中斷。現在這個修正案意味着同意維也納會議和內閣的外交政策，因為修正案認為羅素所提出的削減俄國在黑海的海軍力量的要求是戰爭的**真正任務和最終目的**。修正案對主和派來說是一塊絆腳石，因為它的要求太多，對主戰派來說也一樣，因為它的希望太少，同時，它對內閣來說也是一塊絆腳石，因為它畢竟提出了戰爭的目的和正式承認戰爭的目的問題。由此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和平擁護者和托利黨人現在表示贊成就俾的修正案繼續進行辯論，而內閣卻表示反對；由此就產生了帕麥斯頓想把這個修正案拋棄掉的企圖。這種企圖沒有得逞。因此他把辯論推遲到星期四晚間的會議上進行。這樣就贏得了一天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發表了維也納會議的最後議定書。議定書提交給了議會。這樣就突然產生了新問題，而帕麥斯頓通過自己的 dissolving views〔漸淡和漸換他影的幻燈影〕，可以指望辯論的真正對象將從討論中取消。

兩天的議會辯論枯燥無比，冗長嚙嚙，毫無系統，——從事先就已失去鋒芒的發言中也不可能期望得到什麼別的東西。辯論的場面仍然突出地表現出了，和平擁護者在迪斯累里的決議案表決以前是怎樣向內閣獻媚的，而現在又是怎樣向反對派獻媚的，我們指的是官方反對派。其次辯論暴露了皮爾分子和曼徹斯特學派之間的 entente cordiale〔誠意協商〕。皮爾分子公開希望在和約簽

訂以后治理英国，成为工业資產階級的首領，他們以此自慰。在这种情况下，皮尔分子經過长期的徬徨之后終究会成为一個真正的政党，而工业家們也会找到自己的职业国家活动家。但是如果和平拥护者这样地得到了格萊斯頓、格萊安之流，那末他們就失去了他們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激进的”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摩耳斯沃思大概在他出版的霍布斯的著作¹⁶⁵中讀到：“理智是通过耳朵而来的。”因此他不是向理智呼吁，而是向耳朵呼吁。他做了哈姆雷特禁止演員做的事¹⁶⁶。他的殘酷胜过暴君，他比罗素本人更像罗素。此外，他还在霍布斯的著作中讀到，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能使別人失去生命。既然对他來說問題在于延长自己的大臣生命，因此他也就按照那些能够从他那儿夺去大臣生命的人的精神讲话。看看这架计算机怎样在唱贊歌是很有意思的。甚至拜比吉在自己的“机器哲学”¹⁶⁷中也沒有預見到这一点。曼彻斯特郊区从男爵米尔約·基卜生的讲话單調无味，使人昏昏欲睡，內容枯燥，听了使人厌倦。看来，他在离他很近的英国工业首府学会了用最少的生产費用生产尽可能多的东西。这种人的整个外表都說明他是很无聊的。为什么他还竭力使自己的同行們开心呢？你怎样对待我，我也怎样对待你！此外，看来他把說俏皮話，开玩笑，湊熱鬧也算作 *faux frais de production* [生产的非生产性費用]了，而他所屬的那个經濟學派的第一条法規就是要避免“非生产性費用”。布尔韦尔一方面有他的“国王制造者”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又有他的“尤金·阿拉姆”¹⁶⁸的消极情緒。在以前者的精神面貌出現时，他向俄国挑战，在以后者的精神面貌出現时，他就在梅特涅的头上編織桃金孃花冠。

米尔約·基卜生、摩耳斯沃思和布尔韦尔是第一个晚上的显

著人物。科布頓、格萊安和羅素是第二個晚上的顯著人物。只有科布頓的發言是值得分析的，然而現在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篇幅來分析了。我們只想指出一點：根據他的論斷，波拿巴已準備接受奧地利的最後建議。已故的羅伯特·皮爾爵士的 dirty boy [干髒活的小孩]最近獻身於 «sentiments» [“感情”]、“破碎的心”和“對真理的愛”，他為他最親近的人，即詹姆士·格萊安爵士本人辯護。他禁止納皮爾在任何一次戰役對英國艦隊都是致命的這樣的季節到來以前，就在波羅的海採取行動。他禁止鄧達斯轟擊敖德薩。這樣，他就使波羅的海和黑海的英國艦隊失去了活動能力。他以他所裝備的艦隊的数量來證明自己的行為是對的。這樣的艦隊存在本身就是英國強大的證明。因此艦隊的活動是多余的。幾天以前納皮爾給烏爾卡爾特的一個朋友寄去一封言簡意賅的信，烏爾卡爾特在斯泰福舉行的群眾大會上宣讀了這封信。此信的全文是這樣的：“先生！我認為詹姆士·格萊安爵士是能幹出任何卑鄙勾當來的。查·納皮爾。”

最後，羅素大顯身手。他在發言的開頭宣稱，議院面臨的主要問題是：

“如果我們打算簽訂和約，那末我們能接受什麼樣的媾和條件？如果我們打算繼續戰爭，那末我們繼續戰爭的目的是什麼？”

關於第一個問題，他說答案可以在維也納會議議定書中找到，至於談到第二個問題，即戰爭的目的問題，他對它只能作一個非常一般性的回答，換句話說，什麼也沒有回答。如果同意把“土耳其的安全”這句話當做回答，他一點也不反對。在維也納照會里對這種“安全”作了一種解釋，而在四項條款中又是另一種解釋；尋找第三種解釋——這不是羅素的事，而是戰爭的事。拿破侖的原則是

战争本身应该抵补自己的开支，罗素的原则是战争本身应该确定自己的目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6月6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5年6月9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263号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消息¹⁶⁹

星期四夜晚“亞細亞号”輪船带来的邮件，使我們能够在昨天发表佩利西埃將軍关于5月22日晚間塞瓦斯托波尔城郊会战的报告，以及关于联軍于5月25日向乔尔貢挺进的可靠报道。大約有25 000人在康罗貝尔的指揮下强渡了黑河，把俄軍前哨赶出了俯瞰黑河右岸的那些高地上的障地，并占領了沿河一綫。因为俄軍本来就沒有准备在这道防綫上进行会战，所以不出所料，他們退出了这一綫，把所有的部队集中到因克尔芒和它东面山巒之間的坚固地区。联軍由于向前推进，就把所占領的地区扩大了将近一倍，从而保证了部队人数增加后所急需的空間，打通了拜达尔盆地的道路，这将会有很大好处。恢复野战行动的第一步已經順利完成，但紧接着就該采取一些規模更大的行动了。

5月22日的战斗是在卡兰亭灣和中央棱堡（按俄軍編号为第五棱堡）之間的地段进行的。这是一场非常頑强的血战。現在从佩利西埃的报告中得知，俄軍利用独立堡垒和战壕守住了自卡兰亭灣南端直到墓地、再从墓地到中央棱堡的整个地段，虽然按照英国海軍部繪制的官方的攻城工事平面图来看，这一重要地段上已布滿了塹壕。現在已經弄清楚，当馬奇塔棱堡和中央棱堡剛受到严重威胁而掩护它們的外圍工事剛被法軍攻占时，俄軍便把这一

地段变成了一个大型堡垒。他们用几夜的时间就构筑了几条长长的相互连接的胸墙，把整个地段都围在里面，从而形成了一个大的 *place d'armes*〔屯兵场〕即防区，部队可以在里面安全地集中，以便在法军攻击时对他们进行侧击，甚至从翼侧对法军向前突出的工事进行大规模的出击。佩利西埃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俄军会怎样迅速地构筑这种工事并且在完成土工作业后会怎样顽强地防守这些工事。因此他决定立即对他们攻击。5月22日晚，联军分两路纵队进行了攻击。左路纵队在卡兰亭湾南端附近占领了俄军的塹壕，并在这些阵地上巩固了下来。右路纵队也攻占了向前突出的塹壕，但由于敌人火力猛烈而未能巩固下来，所以被迫在拂晓时退却。次日晚，联军以较大的兵力再度进行攻击，结果获得全胜。联军占领了整个筑垒地段，并把堡垒从塹壕的这一边移到那一边，使这一地段变成为对付俄军的阵地。据说，法军在这次战斗中极其英勇，表现了过去使他们闻名于世的那种 *furia francese*〔法兰西的猛劲〕，虽然应当承认，佩利西埃在描写他的部队不得不克服的那些困难时，是少不了要夸大一番的。

根据我们从哈里法克斯得到的消息，联军对城市的第三次炮击是从6月6日开始的，紧接着又在6月7日对马美朗和白色堡垒^①进行了强攻，并夺取了这些工事；在这方面，“亚细亚号”轮船带来的邮件没有提供新的消息，因此我们也就无法对星期三的报道作任何补充。可是我们已经得知，在叶夫帕托利亚的奥美尔-帕沙的部队有25000人调到赫尔松涅斯；显然，联军准备进行野战，因为如果打算再进行一次炮击和强攻，那末这些土耳其部队就应

① 色楞格多面堡和沃伦多面堡。——编者注

当留在他们原来的陣地上。但是也可以推測，联軍向半島腹地进军所必需的运输工具和粮食保障得很差。可能，佩利西埃在等待解决这些困难的时候，决定不让部队閑起来，于是就恢复了攻城的积极行动，但目的决不是为了在目前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强攻，而是想借此来保持部队的**士气**。

自从佩利西埃接任司令官以来，他的行为表明，他似乎决定按照自己的意見行动，而不重視路易·波拿巴头脑里可能想到的计划和方案。制定克里木战局的计划看来現在已成了巴黎的一件时髦的事情了。甚至年迈的瓦揚元帅也送去了一两份计划，可是佩利西埃却立刻回电說，既然瓦揚认为自己的计划很高明，那就让他到克里木来亲自实现它吧。很快我們就会看到，这位剛强的但固执而殘忍的司令官将如何行动。不管怎样，如果他确实认为甚至不需要費心把“命令”内容事先通知英軍、土軍和撒丁軍的司令官，就可以把命令直接下达給他們的參謀长，那末联軍內部很快就会发生严重的糾紛。要知道，到目前为止，联軍的最高机构并不是某一位將軍，而是一个包括各国軍队的司令官在內的軍事委员会。請設想一下：那位老元帅腊格倫勛爵怎么会服从一个法軍中將的指揮！

在这时，俄軍並沒有白白浪費時間。由于奥地利重新采取了“观望”态度，以及預备部队和新兵也从后方开到，俄軍已經能調生力軍到克里木去。那里除了几个騎兵师以外，已經有步兵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軍。早在一个半月以前就已听說，开到克里木的步兵第二軍，現在真的从沃倫調往戰場了，接着开去的是配屬給擲彈兵軍的輕騎兵第七师。这确实預示着：擲彈兵軍的步兵和炮兵部队調到克里木的时刻已快到来。現在他們已經在开往沃倫和波多

利亚的途中,以便到那里接替第二軍。帕紐亭將軍(曾經在匈牙利指揮过配屬給海璫軍团的俄軍 1 个师) 所指揮的第二軍将开往克里木的兵力除炮兵和輕騎兵外,为步兵 49 个营,共計 5—6 万人,因为没有参加过战斗的步兵軍无疑是按照战时編制补充足額的。第二軍的部队将在 6 月 15 日至 7 月 15 日之間,也就是在很可能开始决战的时期,到达戰場,因此,他們在当前克里木的軍事行动中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6 月显然将是克里木战局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月份。到 6 月底,或者至迟到 7 月底,不是俄国的野战部队被迫放棄克里木,就是联軍被迫准备撤出自己的軍隊。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6 月 8 日
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6 月 23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42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評克里木事件

倫敦 6 月 8 日。由于继撒丁軍的 2 个师以后又調来了法軍的 3 个預备师，联軍已經不能再留在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这一狹窄地区了。因此，5 月 25 日，在佩利西埃將軍接任司令官后不久，他們便把 20 000—25 000 人派到黑河，占領了沿河一綫，并把俄軍前哨赶出了俯瞰黑河右岸的那些高地上的陣地。讀者可能还記得，我們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已指出^①，俄軍这条突出在最前面的防綫并不是他們真正准备会战的地方，因此他們大概不会扼守这一地段和在这一綫应战，很可能在一遭到猛烈攻击时便放棄它，以便把自己所有的部队集中到因克尔芒和它东面山巒之間的坚固地区。情况果然如此。联軍由于向前推进，就把他們所占領的地区扩大了将近一倍，并打通了到富饒的拜达尔盆地的道路，这在今后将会有很大好处。可是已經取得的优越条件目前还利用得不够迅速和坚决。剛前进了一步就又停滯不前。这可能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而造成的。联軍司令官之間的意見分歧也被认为是一个原因。联軍在 6 月 6 日重新开始的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击，即第三次炮击，使人怀疑联軍已打算在一度积极行动以后仍然采取以往的拖延手段。但是，在炮击之后随着将进行野战的这种可能性也

^① 見本卷第 242—243 頁。——編者注

并不是沒有的。不管怎样，一項必要的措施（見“新奧得報”第241号^①）——把奧美尔-帕沙亲自指揮的約2万名土軍从叶夫帕托利亞調到赫尔松涅斯——終於實現了。这样，联軍現在就有整整20万人。只要运送粮食的組織工作和运输工具的現有数量能保障进行野战，联軍有这样多的兵力，便能有把握地开始积极行动。当然，这当中还需要克服不少的困难。

我們在叙述主力軍队作战經過时应当提到的另一事件，就是在卡兰亭灣和中央棱堡（按俄軍編号为第五棱堡）之間的地段进行的战斗。这是一场頑强的血战。現在从佩利西埃將軍的报告中得知，俄軍利用独立堡垒和战壕守住了自卡兰亭灣南端直到墓地，再从墓地到中央棱堡的整个地段，虽然按照英国海軍部繪制的官方的攻城工事平面图来看，在整个这一重要地段上出現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法軍工事。当馬奇塔棱堡和中央棱堡剛受到严重威胁而掩护它們的外圍工事剛被法軍攻占时，俄軍便把这一广闊的地段变成了一个大型堡垒。他們用几夜的时间就构筑了几条长长的相互連接的胸墙，把整个地段都圍在里面，从而形成了一个 *place d'armes* [屯兵場] 即防区，部队可以在里面安全地集中，以便在法軍攻击时對他們进行側击，甚至从翼側对向前突出的法軍工事进行大規模的出击。为了不使俄軍贏得时间以實現他們的計劃，佩利西埃决定在俄軍还没有完成土工作业以前立即對他們攻击。5月22日晚，联軍成两路纵队进行了攻击。左路纵队在卡兰亭灣南端附近占領了俄軍的塹壕，并在这些陣地上巩固了下来；右路纵队也攻占了向前突出的塹壕，但由于敌人火力猛烈，所以被迫在拂曉

^① 見本卷第271頁。——編者注

时退却。次日晚，联軍以較大的兵力再度进行攻击，結果获得全胜。联軍占領了整个筑垒地段，并把堡籃从塹壕的这一边移到那一边，使这一地段变成了对付俄軍的陣地。据說，法軍在这次战斗中表現了过去使他們聞名于世的那种 *furia francese*〔法兰西的猛勁〕，虽然应当承认，佩利西埃在描写他的部队不得不克服的那些困难时，是少不了要夸大一番的。

大家知道，联軍向阿速夫海的远征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主要是由英法两国舰队的輕型軍舰組成的区舰队，搭载了 15 000 名英、法、土軍，未遭抵抗便攻占了刻赤、叶尼卡列和通往阿速夫海的海峡。这些軍舰在这个內海前进，駛抵別尔疆斯克、格尼切斯克和阿拉巴特，毀坏了或者迫使俄軍自己毀坏了大量儲备的粮食和彈药，以及若干艘輪船和大约 200 只运输船。联軍幸运地在刻赤附近截获了哥尔查科夫給該地区部队司令官的一些信件。这位俄軍总司令埋怨塞瓦斯托波尔的粮食不够，坚决要求火速派出新的运粮队。原来，在整个这次战局中，阿速夫海是俄軍向克里木运送儲备品的主要孔道，而用来运输貨物的工具則是 500 只帆船。既然联軍到目前为止只发现并消灭了 200 只帆船，那末其余的 300 只大概是在更北的什么地方，即在塔干罗格或阿速夫附近。因此联軍派出了一队蒸汽舰去搜索这些帆船。联軍这次胜利的重要意义更在于它迫使俄軍改道經皮列柯普或臭水海用既緩慢而又不可靠的兽力車运送一切儲备品，并把主要仓库設在德涅泊河畔的赫尔松附近或別里斯拉夫附近，也就是說，設在比阿速夫海北部危險得多的地方。这次几乎沒有遭到任何抵抗的远征所获得的胜利，对于联軍統帅部却是一次最严重的非难。既然現在在 4 天內就取得了这样的战果，那末在去年的 9 月或 10 月——当时俄軍的交通綫

如受到这样的破坏，就可能被迫退出克里木和放棄塞瓦斯托波尔，——为什么不派出这样的远征队呢？

随同这支远征队一起行动的陆軍部队的使命，是在必要时保护軍艦，派出兵力駐守已占領的居民点，破坏俄軍的交通綫。这些部队的主力看来仅作为游动队以进行野战；他們应当在每个有利时机进行勇猛的攻击，然后在舰炮的掩护下退回自己的筑垒陣地，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即当他們受到敌人的很大优势的兵力的威胁时，甚至再回到舰上。如果陆軍部队的使命正是这样，那末他們是能够胜任愉快的，而 15 000 人用来完成这样的任务也并不算太多。如果他們的使命是作为有自己作战基地的独立单位来行动，对俄軍进行认真的側敌机动，企图对克里木的腹地造成严重的威胁，那末这 15 000 人（由于必須派出一些独立部队，因而兵力还要削弱）就未免太少了；这样会有很大的危險，他們将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切断、包圍以至歼灭。現在我們仅仅获悉，这些部队已在刻赤登陆，目前正在加固向陆方向上的城防工事。自从俄軍自动放棄苏茹克—卡列以后，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留在俄軍手中的唯一的要塞就是阿納帕。这个要塞由于自然条件本来已很坚固，現在又很好地加固了。我們怀疑联軍現在会去进攻阿納帕。如果他們沒有速胜的把握就进攻阿納帕，那末他們就会犯大錯誤。他們就会在需要最大限度集中兵力的时候把兵力分散，并且在既得的地区尙未巩固的时候把兵力浪費在对新目标的攻击上。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6 月 8 日
左右

載于 1855 年 6 月 11 日
“新奧得报”第 26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英国議會中的辯論

倫敦 6 月 9 日。議會大辯論結束了，或者更确切些說，唾沫已經吐干了。貝林的提案“在議院的哄堂大笑中”無異議地通過了。這個實質上很荒謬的提案是以向國王送呈有關戰爭問題的奏本結束的。議院真的沒有宣布戰爭是«une guerre pour rire» [“开玩笑的戰爭”]嗎？或者，也許議院宣布自己是«un parlement pour rire» [“开玩笑的議會”]？不管怎樣，兩周辯論的真正結果並不在於通過了貝林的提案——這是一種無謂的手續，而在於哄堂大笑，在於不由自主的、禮節所不容的痙攣性動作和不顧體面的狂叫；“值得尊敬的議院”把提案和反提案、修正案和反修正案、內閣和反對派、演說、反駁、說教、推論、辛辣的諷刺和動人的誓言、和平的祈禱和好戰的叫囂、有分寸和沒有分寸、自己和自己的投票統統湮沒在這種氣氛中。議院在自己把自己嘲笑一番之後才擺脫了令人發笑的狀況。這樣它就承認了，在議會這樣的環境里，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嚴肅性起先變成了一種有條件的嚴肅性，然後這種矯揉造作的嚴肅性突然又以自然而然的開心作樂而告終。

任何想迫使帕麥斯頓說明內閣政策、宣布戰爭的任務、趨向和目的的企圖最後都完全失敗了。他直截了當地說：“不能向大臣或哪怕是向熟人打听戰爭的目的。”首先幫助他的是和平擁護者。你

們想知道，我們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嗎？理查·科布頓就坐在这儿，他希望付出任何代价以求得和平。难道你們不认为不要付出任何代价的战争比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和平更好嗎？打理查·科布頓吧！帕麦斯頓总是这样把科布頓或布莱特、格莱安或格莱斯頓置于自己和自己的对手之間的。

棉花英雄們不仅作为一块供他縫制軍服的衬里来为他服务。不但如此，他还用棉花做了火药。同时，在辯論过程中表明，罗素和以前的阿伯丁一样，都是帕麦斯頓內閣的避雷針，都是內閣的神圣人物专用的避雷針。他把罗素派到維也納去正是为了要把他变成自己的避雷針。正如以前累亚德之流宣布阿伯丁要对英勇的帕麦斯頓的«shortcomings»〔“缺点”〕負責一样，現在罗巴克也宣布罗素要对此負責。正如以前的皮尔分子一样，現在的罗素分子也妨碍着他的“自由的灵魂展翅飞翔”^①。就像黑林山钟似的，在他身上挂着这些钟錘，但并不是为了使他能和钟一样地走动，而是为了不正确地乱报时辰。

在一場似真似假的交鋒以后，下院的一切集团都被击潰了。皮尔分子終於承认，直到目前为止他們还是沒有軍队的軍官。他們放棄了建立自己派別的要求，而公开投靠了曼彻斯特学派。在战争的第一年曾受委托指揮陸軍和海軍的这些人，承认了他們信仰永久和平，他們非常愚蠢地暴露了自己是联合內部的背叛者，这就使得帕麦斯頓—罗素又惊又喜。他們自己損害了自己。

曼彻斯特学派是真正願意和平的，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在國內和国外进行工业战争。它追求英国資產階級在世界市場和英国本

① 格·海尔維格“来自山巔”。——編者注

土的統治地位,在世界市場上,应当使用它的武器——棉花包來進行戰爭;在英國本土,作為現代生產的累贅的貴族應該被消滅,作為現代生產的簡單工具的無產者應該被奴役,而它本身,作為生產的領導者,也應該領導國家和佔據國家職位。但是現在,科布頓却在痛罵牧師格里菲思博士,因為他在一次公眾集會上宣稱上院可以不要,而布萊特則為王室子弟的命運痛哭,因為戰爭的破壞迫使他們自己洗自己的衬衣。他們兩人都痛罵人民運動。這就是反谷物法同盟的英雄,當人民運動的波浪把他們抬高的時候,他們就說“王權的不文明的光輝”,勳爵、土地貴族等等是“生產的非生產性費用”。他們的運動,包括和平說教在內,全部要點就在於反對貴族。而現在,他們却在貴族面前痛罵群眾! *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 [為了生命而喪失整個生命的根基]①。曼徹斯特學派在這些辯論中放棄了自己存在的基础。

托利黨人也發現了自己的營壘里存在着主和派,並且證明,他們很少保留有作為英國民族主義代表的傳統,正像他們對“波拿巴王朝”很少有仇恨一樣。

最後該談談內閣的支持者們!再也沒有比慌忙地企圖抓住提案這種情況更能說明他們的特點了。帕麥斯頓本人在一個星期以前曾不得不拒絕這個提案,原提案人也想放棄它,可是沃爾波爾卻以托利黨人的名義,格萊斯頓以和平擁護者的名義,議院則為了引起“哄堂大笑”而接受了這個提案。

“先驅晨報”收到了來自芬蘭灣的下述報道:

“5月28日‘奧里昂號’在距喀琅施塔得16哩處進行了偵察。據它報

① 尤維納利斯“諷刺”。——編者注

告，喀琅施塔得的俄国分舰队包括 6 艘可以航行的战列舰、同等数量的几乎拆卸了索具的战列舰、13 艘按其外形判断已被改装成浮动炮台的战列舰、8 艘大蒸汽舰和大批无法计算的炮艇。在訪問博馬尔松德时我們发现那儿的一切仍和过去一样；俄国人根本没有着手修复工事。那儿一个居民也看不到。由于对去年和联军分舰队做过生意的那些人进行了惩罚，因而使得居民特别小心谨慎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9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6 月 12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267 号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¹⁷⁰

“波罗的海号”輪船带来的邮件，給我們提供了有关最近塞瓦斯托波尔战况的官方文件。昨天我們已刊登了佩利西埃將軍和腊格倫勳爵的急电，今天准备根据这些材料和其他材料繼續报道一些事实。

6月6日，右翼的联軍炮队重新开始轰击城市。可是这一次不是全面的轰击，而是为了立即夺取一定的地点而进行的集中射击。俄軍2月23日和3月12日在这一防御地段上构筑的外圍工事——色楞格多面堡、沃倫多面堡和堪察加多面堡，暫時把圍攻部队及其炮队阻止在一定的距离上。在西段，即在联軍的左翼，沒有这样的外圍工事，因而这时几乎已逼近护城壕或隐蔽路（如果那里有隐蔽路的話）的法軍，也就比进展較慢的右翼部队前进得远多了。按照圍攻計劃，联軍把正面上的两大地段——內港^①以西的市区和內港东岸的軍港区——看做是两个独立的要塞，准备同时对它們强攻，因此必須加紧右翼的进攻并夺取外圍工事，以便在这一方向上的部队能推进到与左翼的突出的平行壕取齐的一綫。为此，必須夺取前面提到的那些多面堡和馬美朗（堪察加多面堡）右面采石場的一些次要工事。正因为如此，6月7日晚，法軍在炮击

① 南灣。——編者注

36 小时以后，开始越过基連谷向色楞格多面堡和沃倫多面堡以及向馬美朗推进，而这时英軍則攻击采石場。經過 1 小时的激战，联軍攻占了这些工事，繳获了数門火炮，俘擄了 400 名敌軍，其中有軍官 13 名。双方都遭到了惨重的損失。

因此，目前这一地段上的情况几乎又恢复到了 2 月 22 日以前那样。联軍攻占的这些多面堡中，以馬美朗（俄軍称它为堪察加多面堡^①）最为重要。它是在 3 月 12 日和以后几天內筑成的。早在那时我們就已指出这一工事的重大意义和它在战争中将起的重要作用¹⁷¹。当前的战事已完全证实我們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个仓卒筑成的野战工事竟把占长达圍攻綫的二分之一的地段上的圍攻部队阻擋了 88 天，也就是說比一般圍攻中足以用来两次攻克大要塞的时间还多。类似的奇迹在圍攻史上只出現过两次：1807 年普軍防守科尔貝克和 1813—1814 年法軍防守但澤。現在我們試圖解釋一下这个奇迹。

随着野战部队数量的增多，沃邦时代的那种旧式的而且通常不大的工事已失去作用。胜利者的主力部队往往安然地繞过这些工事，而其游动队对它們則几乎不予理会；占領这些工事已成为后續的預备队的任务。但是，在这些大軍的行进途中出現了几个大要塞的时候，軍隊的前进就一定会受到阻碍。拿破侖 1797 年在曼都亚附近和 1807 年在但澤附近就是这样。其原因是很明显的。当一支 15 万人的軍隊进入敌国时，一些小要塞不会在它的后方造成任何威胁，因为它們的守軍加在一起也不足以阻擋增援部队以及从后备兵力中派来补充作战部队的預备队的前进。其次，这些兵力不大的守軍也无力派出較大的队伍去搜索各个地区和破坏敌人

^① 指堪察加眼鏡堡。——編者注

的交通綫。如果軍隊在行進途中遇到了駐有 15 000—25 000 名守軍的大要塞,那末情況就不同了;這種要塞是整个地區的防禦中心,它可以向任何方向,而且向相當遠的地方派出一支既能進行野戰又能在遭到敵人優勢兵力攻擊時隨時退入要塞的大部隊。封鎖這種要塞所花費的力量幾乎同攻占它相等,因此以攻占它更為有利。

在沃邦和科爾蒙太涅工事體系的舊式要塞中,全部防禦力量都集中在主牆的周圍和主壕內。所有的凹角堡、眼鏡堡、堡障和塔樓式內堡配置成一道防綫。如果敵人楔入了這道防綫,那末在數日內他就能突破全綫;既然防綫已被突破,那末要塞也就被敵人攻占了。顯然,這種工事體系完全不適用於大要塞,因為后者本身就能阻止入侵的大軍的進攻;保留這種體系就意味着犧牲守備部隊,因為一旦防綫被突破,要塞就毫無防護。因此必須採用另一種體系——獨立堡壘體系。最先不顧當時盛行於軍界的偏見而大膽主張構築獨立堡壘的是卡諾的老師蒙塔郎貝爾將軍。但是,帶有形成完整防禦體系的獨立堡壘的大要塞的構築法,是在德國創立和改進的,而首先是普魯士的阿斯特將軍創立和改進的。他構築了科倫、科布倫茨、波茲南、科尼斯堡以及美因茲部分地區的那些出色的防禦工事,這些工事標志著築城史上的新紀元。最後,法國人也終於承認必須改用這種體系,於是建造了設計出色的第一流的帶有獨立堡壘的巴黎防禦工事。

獨立堡壘體系立即引起新防禦法的誕生。大要塞守備部隊的數量不得不大量增加,以致再沒有必要只進行消極防禦,即在敵人向斜坡前進而還未到達守軍可以出擊的距離以前只是消極等待。一支 20 000—25 000 人的守備部隊,已有足夠的力量到敵人的陣地上去攻擊敵人。要塞和它周圍的地區在獨立堡壘的掩護下,已

具有营垒的性质或守备部队野战基地的性质，这时守备部队实际上已成为一支不大的野战军队。在这以前防御是消极的，而现在则是积极的；它具有了进攻的性质。采用这种防御法的必要性已非常明显，如 1807 年法军围攻但澤时，为数约两万的普鲁士守军就修筑了这种独立堡垒，当时那里本来没有这种堡垒，但当必须使用这支人数众多的守军来真正保卫城市时，便立刻感到需要这种独立堡垒了。1813—1814 年法军防守但澤对抗反法同盟军时，更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原则。

从沃邦时代起，围攻一直是一种短时间的行动，如果没有什么外来的阻挠，它的目的几乎肯定能够在预定的期限内达到；而现在，围攻已成为像野战那样的一种军事行动，其结局取决于很多因素了。架在要塞围墙上的火炮一下子便失去了它的首要的作用，而野炮则甚至在防守要塞时也开始起比较重要的作用了。工程师的技能已经不仅用于修整被围时遭到破坏的工事，现在他们还必须像在野战部队中一样，选择和加固堡垒前面的阵地，朝着敌人的塹壕挖掘塹壕，构筑从侧面威胁敌人工事的反围攻工事，突然地改变防御正面，从而迫使敌人变换攻击方向。在围攻战中，也像在野战中一样，步兵成了主要的力量，而骑兵则成了几乎每一守备部队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在已不可能事先断定——即使是大致地断定——围攻的持续时间，而沃邦的关于夺取要塞的原则虽然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因为他谈的是关于炮兵攻击的细节，但对整个围攻来说，却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没有时间修筑独立堡垒。他们不得已而沿用了修筑要塞的老方法，构筑了主墙作为第一道防线，的确，在当时主墙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在主墙后面又修筑了第二和第三道

防綫，同时繼續加固第一道防綫。后来，俄軍逐漸地意識到甚至主牆以外的一定距离上还有对他們有利的地方，于是向前推进，修筑了色楞格多面堡和沃倫多面堡，最后，还在馬美朗修筑了工事和一道长的战壕綫；而在法軍主力所在的西翼上，他們只能在主壕附近修筑几座眼鏡堡，并在这些眼鏡堡前面不远的地方挖掘一些战壕。所以，俄軍自加强了馬美朗以后，东翼就比較安全了；而在沒有这种外圍防护工事的西翼，圍攻部队則已逐漸地推进到主壕的边沿。因此，圍攻部队要接近馬拉霍夫岡上的棱堡——他們右翼最重要的制高点，首先必須夺取馬美朗。可是馬美朗在掩护馬拉霍夫岡的同时，本身也有后方工事作掩护。从康罗貝尔在第二次炮击时沒有敢认真地强攻馬美朗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种掩护是多么有效。現在絲毫也不用怀疑，法軍在夺取这一工事时所遭到的損失是非常巨大的。

联軍恢复了炮击，那位不爱惜兵士生命、力图利用每一有利时机向敌人防御纵深挺进的佩利西埃將軍采取了有力的行动，与此同时，黑河上的行动却完全停止了。这些情况立刻使我們对佩利西埃將軍的性格有了一个了解，并证实他得到倔强、固执、死不回头的人的这种名声是完全正确的。他可以有两种打法：或者是开始野战，并从北区包圍塞瓦斯托波尔，然后以两倍的兵力重新圍攻，这样，迅速取得胜利的机会就会增加三倍；或者是繼續采取最近八个月以来的錯誤战术，即固执地对南区进行强攻，把它彻底摧毁，并把俄軍逐出要塞，这样即使俄軍放棄要塞，联軍同样也会因遭到北区炮台的射击而无法占領它。

在东西两半球上找不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軍人，在获悉佩利西埃被任命为司令官和联軍得到大量增援部队以后而不期待佩利

西埃选择第一种打法的。特别是在奥美尔-帕沙指挥的 25 000 名土军到达巴拉克拉瓦以后，联军毫无疑问已拥有足够的兵力可以一面继续围攻，一面派 15 000 人到刻赤去，同时以比俄军可能用来进行抵抗的更大的兵力进行野战，向前推进。为什么联军没有这样做呢？难道他们的运输工具还不够吗？还是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够在克里木作战呢？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佩利西埃不是由于非常重大的原因而放弃野战，那末他所以继续执行极其错误的方针，只是出于他的固执和任性；以他的部队在目前强攻中所不得不付出的同样的代价，他就能在野战中取得更大得多的战果，获得更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只去夺取南区，甚至不试图包围完全控制着南区的北区，这就是根本蔑视一切作战原则的做法，如果佩利西埃打算这样行动，那末他就会葬送他所统率的这支大军。

但是我们想尽量为这位新司令官的每个可疑的行动找出辩解的理由。可能左翼上的行动是不可避免的，那是由于俄军构筑了反接近壕而引起的。也可能围攻者在冒险把全部军队分成围攻部队和野战部队以前，必须先迫使俄军退到最初的阵线，对他们进行几次猛烈的、歼灭性的打击，借以显示一下自己的优势。但是，即使承认这一切，我们现在仍必须指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如果联军不用一切可用的兵力在战斗中预先疲惫俄国的野战部队，那末任何攻城的新的重大企图都显然是错误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6 月 12 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6 月 2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29 号，并载于 1855 年 6 月 15 日“新奥得报”第 27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根据“新奥得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拿破侖的軍事計劃

法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通过巴黎“立宪主义者报”¹⁷²再一次向全世界宣布最近几个月战争将如何进行。这样的 exposés〔論述〕现在不仅是时髦的，而且还是定期的，它們虽然时常互相矛盾，但仍然能使人們对法国政府在目前有些什么样的成功的希望有一个比較清楚的概念。这些論述綜合起来就是路易·波拿巴可能采取的各种对俄作战計劃的汇集，而像这样的論述，是值得給予某种注意的，因为它們涉及到第二帝国的命运和法兰西民族复兴的可能性。

总之，似乎任何«grande guerre»〔“大战”〕都不会发生，50万奥軍和10万法軍也不会出现在維斯拉河和德涅泊河上出現。一直在注視着西方的那些“被压迫民族”的全面起义，同样也不会发生。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的軍隊也不会因毁灭羅馬共和国¹⁷³的那个人的魔杖一揮而出現。所有这一切現在都已經过去了。奥地利对西方尽了自己的責任。普魯士尽了自己的責任。全世界都尽了自己的責任。大家彼此滿意。目前的战争根本不是大战。它的目的并不在于恢复法国人在以往对俄战争中取得的荣誉，順便說一下，尽管佩利西埃在他的一份报告中所說的与此相反。法軍被派到克里木，不是为了在那里获得胜利的荣誉；他們只不过是在那里执行警

察勤務。需要解決的黑海霸權問題是純粹局部性的，因此它將在那里就地解決。如果擴大戰爭範圍，那是不明智的。聯軍將會“有禮貌地但又堅定地”粉碎俄軍在黑海及其沿岸進行抵抗的一切企圖；而在做到了這一點以後，當然，聯軍或是俄軍，或者作戰雙方就會停戰議和了。

波拿巴主義者的又一個幻想就這樣破滅了。把法國的疆界伸展到萊茵河以及把比利時和薩瓦併入法國的宿願消失了，而代之以異常清醒的謙讓精神。——我們進行戰爭完全不是為了挽回法國在歐洲應有的地位。決不是的。我們也不是為了文明而戰，正如不久以前我們不止一次地講過的那樣。我們是很謙虛的，不會有擔負如此重大使命的奢望。戰爭完全是由於對維也納議定書的第三項條款的解釋而進行的！——請看，這位靠軍隊的恩惠和歐洲的容忍成為法國皇帝的拿破侖第三皇帝陛下，現在是用怎樣的語言在講話。

但是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麼呢？有人對我們說，戰爭是為了解決純粹局部性的問題而進行的，因此用純粹局部性的手段就可以順利地結束。只要剝奪俄國在黑海上的實際霸權，戰爭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只要成為黑海及其沿岸的主人，掌握住已經奪得的一切，俄國就會很快讓步。這就是巴黎大本營制定的許多作戰計劃中最新的一個計劃。現在我們來比較詳細地研究一下這個計劃。

首先談談目前的局勢。從君士坦丁堡到多瑙河的整個這一面海岸和切爾克西亞海岸、阿納帕、刻赤、巴拉克拉瓦直到葉夫帕托利亞的整個另一面海岸，都已經從俄軍手中奪過來了。目前只有卡法和塞瓦斯托波爾還在堅守，而且卡法已陷入困境，塞瓦斯托波

尔則由于所处的位置，在遭到严重威胁时也不得不放棄。不仅如此，联軍的舰队正在阿速夫內海破浪前进；他們的輕型船舰曾进到塔干罗格，并且襲击了所有重要的沿岸据点。除了从皮列柯普到多瑙河这一段，即俄軍在这一带原有海岸綫的十五分之一以外，可以说再也没有任何一段海岸留在俄軍手里了。現在假定卡法和塞瓦斯托波尔也已經陷落，克里木已經落入联軍手中，那又将怎样呢？俄国处于这种境地，是不会締結和約的，关于这一点，它已經公开宣布过了。从它这方面來說，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这等于在主力正赶来的时候由于前卫被击退而放棄战斗。联軍以巨大牺牲作代价取得这些胜利以后，又能做些什么呢？

有人对我们說，他們可以破坏敖德薩、赫尔松、尼古拉也夫，甚至派大軍在敖德薩登陆，并且在那里巩固下来，以便击退任何数量的俄軍的猛攻，而以后，再根据情况行动。此外，他們可以派兵到高加索去，似乎还能消灭穆拉維約夫指揮的現在駐扎在格魯吉亞和南高加索其他地区的那支俄軍。好吧，假定这一切都已实现，那仍然会发生一个問題：如果在这以后俄国还是拒絕媾和（它无疑会这样做的），那时又将怎么办呢？不应当忘記，俄国的情况与英法不同。英国是可能让自己去締結沒有好处的和約的。因为約翰牛只要一感到自己所担的風險和軍費太大，就会尽一切努力摆脱困境而让自己那些尊敬的盟友去单独收拾殘局。英国真正强盛的保证及其力量的源泉并不需要在这一方面寻找。而对路易·波拿巴來說，也会有那么一天，他将认为与其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还不如締結一个不光彩的和約，因为不应当忘記，当这样的冒险家陷入絕境时，他那种把自己的統治再延长半年的希望，就会压倒其余的一切想法。在决定性的时刻，土耳其和撒丁連同它們那些少得可

怜的資源將被拋下不管。這是無須懷疑的。可是俄國卻同古羅馬一樣，只要敵人還在它的領土上，就不可能締結和約。近一百五十年以來，俄國從來沒有締結過一次割讓領土的和約。甚至提爾西特和約¹⁷⁴ 都使俄國的領土擴大了，而這個和約是在連一個法國人都沒有踏上俄國土地的時候締結的。當俄國領土上有一支大軍正嚴陣以待的時候，締結一個割讓領土或者至少使沙皇的權力限制在自己領地範圍以內的和約，就會意味着根本違背最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的傳統。剛剛即位不久的沙皇，對於民眾說來是生疏的，有勢力的民族派正懷着不安的心情注視着他的行動，因此他是不会走這一步的。在俄國的全部進攻力量尤其是全部防禦力量尚未動用和尚未消耗殆盡以前，這種和約是不可能締結的。然而這樣的時刻必然會到來，那時俄國將被迫放棄對他國事務的干涉，但只有與路易·波拿巴和帕麥斯頓完全不同的敵人，而且經過比在俄國黑海沿岸領地上採用“局部性”討伐手段堅決得多的鬥爭，才能使俄國做到這一點。但是，假定克里木已被占領並在那裡駐扎了 5 萬名聯軍，高加索和南部所有領地上的俄軍已被肅清，聯軍把俄軍阻止在庫班河和捷列克河一綫，敖德薩已被占領並且變成了營壘，其中駐了比如說 10 萬名英法軍隊，而尼古拉也夫、赫爾松和伊茲馬伊耳也都被聯軍破壞或占領；甚至假定除了這些“局部性”的行動以外，聯軍在波羅的海還或多或少地取得了某些重要的戰果（儘管根據我們現有的材料很難預言那裡能取得什麼樣的成就）；這以後又將怎樣呢？

聯軍就只限于扼守自己的陣地和消耗俄軍的兵力嗎？疾病奪去在克里木和高加索的聯軍兵士的生命將比補充兵員的來到更加迅速。他們的主力，譬如說在敖德薩，將不得不依靠艦隊得到供

应，因为敖德薩周圍几百英里的土地全都沒有耕种。俄軍拥有在草原行动时特別有利的哥薩克部队，他們将会襲击任何企图越出营垒范围的联軍部队，而且还可能就在城市附近占領固定陣地。在这种条件下，是无法迫使俄軍进行会战的；他們总是具有能够誘敌深入本国腹地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对联軍的每一次进攻他們都将以緩慢的退却来对付。同时，也不能长期使一支大軍呆在营垒里无所事事。紀律敗坏和軍心涣散現象的逐漸增长，将迫使联軍采取某种坚决的行动。疾病也会使情况复杂化。总之，如果联軍在占領了沿海的重要据点以后，就在那里等待俄国认为有必要让步的时刻，那将会毫无結果。最先筋疲力尽的，十之七八将是联軍，而在黑海沿岸很快将会出現成千上万的联軍兵士的坟墓。

这样的行动就是从軍事观点来看也是錯誤的。要想控制沿岸地区，仅攻占沿岸的主要据点是不够的。只有占領內地才能确保沿岸地区。正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样，联軍占領俄国南部海岸这一事实本身所形成的情况，将迫使联軍向俄国腹地进军。可是困难也就从这里开始了。一直到波多尔斯克省、基輔省、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边境的这片土地，尽是灌溉条件很差、几乎还没有开垦过的草原，那里除了野草以外什么也不生长，就連野草在夏天也会被火热的太阳晒枯。假定說敖德薩、尼古拉也夫和赫尔松都将变成作战基地，可是联軍能派兵进攻的作战目标又在哪里呢？那里的城市不多，彼此相隔很远，而且其中沒有一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致攻占它就能使战斗行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直到莫斯科也沒有如此重要的地点，而莫斯科却在 700 英里以外。远征莫斯科需要 50 万人，可是，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情况无疑是这样：如果战事朝这个方向发展，那末“局部性”的战争無論如何不会取得决定

性的結果。還是讓路易·波拿巴用他全部豐富的战略想像力去尋找另外的途徑吧！

可是要實現這一切計劃，不僅需要奧地利嚴守中立，而且還需要它在道義上給予支持。但這個國家現在站在哪一邊呢？在1854年，奧地利和普魯士曾經聲明，它們將把俄軍向巴爾干山脈的推進看做對俄 casus belli [作戰的理由]。¹⁷⁵ 因此怎能擔保它們在1856年就不會把法軍對莫斯科甚至對哈爾科夫的進攻當做對西方大國作戰的理由呢？不應當忘記，任何一支由黑海向俄國腹地推進的軍隊，它的翼側暴露給奧地利的程度，並不亞於由多瑙河向土耳其推進的俄軍；因此在一定的距離上，這支軍隊同作戰基地之間的交通綫，也就是它本身的生命綫，將依靠奧地利的恩賜。要想使奧地利不參加戰爭（哪怕在某一時期的），就不得不賄買它，把貝薩拉比亞讓給它的軍隊。奧軍進到德涅斯特爾河以後，就會成為敖德薩真正的主人，就像這個城市被他們占領了一樣。聯軍在這種條件下還能夠狂追俄軍而進入俄國腹地嗎？那會是沒有理智的行動！可是應當注意到，這種沒有理智的行動卻是路易·波拿巴的最新計劃即“進行局部戰爭”計劃的必然後果。

第一個作戰計劃是聯合奧地利進行«grande guerre» [“大戰”]。這個計劃會使法軍在數量上同奧軍相比處於從屬的地位，就像目前英軍同法軍相比所處的地位一樣。同時，這個計劃會使俄國發動革命。路易·波拿巴既不能要前者，也不能要後者。奧地利拒絕參戰；計劃破產了。第二個計劃是“民族戰爭”。這個計劃一方面會在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中間引起風暴，另一方面也會在斯拉夫人中間引起起義，這就會立刻影響到法國，會使路易·波拿巴的沒落帝國 [Lower Empire]¹⁷⁶ 在比它建立所用的時間還

要短的时间內垮台。冒充拿破侖的这个假“铁汉”惊恐地退縮了。第三个計劃，即所有計劃中最小的計劃，就是这个“为了局部目的而进行局部战争”的計劃。它的荒謬性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于是我們又不得不提出这样的問題：以后又怎么办？总而言之，在一切都很順利的情況下登上法国皇位，比保住这个皇位要容易得多，即使皇帝陛下在穿衣鏡前面长期练习，已經熟练地掌握了帝王的一切举止动作。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6 月 15 日
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7 月 2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43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納皮爾的信。——羅巴克委員會

倫敦 6 月 15 日。查理·納皮爾爵士以下列內容的第一號信¹⁷⁷開始公布關於波羅的海艦隊的一批信件：

“有人問道，為什麼我們在波羅的海的分艦隊去年沒有干出什麼重要的事情來而今年大概也不會干出什麼事情來呢？對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因為詹姆斯·格萊安爵士對我去年 6 月寄給他的計劃不加理睬，甚至還裝出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的樣子；其次是因為海軍部對我去年 9 月寄給它的計劃不予重視。如果能保證鄧達斯海軍上將獲得我所指出的全部設備，那末，炮擊斯維阿波爾格就已經實現，而要塞也可能被摧毀了。他們不去作這件事，卻花了大約 100 萬英鎊去建造浮動裝甲炮台，這種炮台只能勉強地浮起來，如果把它們送到波羅的海去，就未必能回得來。而在建造這些炮台之前，在朴次茅斯就已經證實，在 400 碼的距離上，用六十八磅火炮就能擊毀它們，可是每個人都知道，在 800 碼的距離上它們就不能毀壞花崗石的牆壁。假如用同樣的錢來建造臼炮艇，那還可以有一點指望；或者只用這些錢的一半來實現丹多納耳德勳爵同我談過的計劃，那末無論是在波羅的海或者是在黑海，我們無疑地都會取得成就。我能揭露詹姆斯·格萊安爵士對待我的一切行為的那一天是總會到來的（這一天已經快了）。鄧科布先生已經揭露了他，〈在邦迪埃拉兄弟的案件中〉說他拆看私人信件。格萊安企圖把對不幸的克里斯提上尉之死所負的罪責推在累亞德先生身上，而我指責他歪曲了我的信件。他們不許我提供證據，說什麼公布出來會給敵人提供情報。這種借口很快就要破產了，那時候全國就會知道，值得尊敬的從男爵採用了一些什么手段來唆使貝克萊海軍上將和理查茲海軍上將簽署那些一旦加以執行就會招致皇家艦

队复灭的指令。要让全国知道，海軍首席大臣是否可以把一个軍官的私人信件宣揚出去，然后又阻止这个軍官用同样的办法对待海軍首席大臣的信件。

查·納皮尔爵士”

罗巴克委员会昨天又召开了會議（第四十九次），为的是对那个应当呈提給下院的报告作出一个結論。經過四小时的辯論，委员会的委員們如同在以往各次會議上一样，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他們又把會議延到星期一，“指望”那时候他們終于能够提出报告，說明自己的工作已告結束。

行政改革协会昨天在德留黎棧剧院組織了一次盛大的集会，然而，它不是公开的集会，而是 ticket meeting，即凭票入場的集会。因此，协会的先生們感到毫不拘束，就像是 «au sein de leur famille» [“在自己家里”]。他們声称，这次集会是为了給“輿論”开路。然而，为了防卫这种輿論不受到外来的風的吹襲，在德留黎棧剧院的入口处布置了半个連的警察。只是在警察和入場券的保卫下輿論才敢于成为輿論，这是多么微妙的有組織的輿論啊！这次集会首先是支持累亚德的一次示威，因为今天晚上累亚德終于要向議院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了。

前天在太恩河畔新堡举行的公开的集会上，戴維·烏尔卡尔特痛罵了“叛变的內閣和低能的議會”。

关于宪章派目前在地方上准备的集会，我們下次再来介紹¹⁷⁸。

当現狀受到各方面和各种观点的抨击时，阿尔伯特亲王利用在領港公会¹⁷⁹举行的一次宴会的机会，說明了宮廷对普遍不滿的态度。原来他也有防止危机的法宝。这就是：“对內閣表示爱国主义的舍己忘身的信任！”阿尔伯特亲王认为，只有內閣的专制才能使立宪的英国有能力同北方的专制制度作战，即利用俄国的武器

擊敗俄國。他所作的英俄之間的對比既沒有說服力，也不恰當。例如：女王無權召募兵士，除了自願為她效勞的以外，她手中再沒有其他的軍隊了！阿爾伯特親王忘記了，女王手中差不多有 3 000 萬英鎊可以用來僱傭兵士。從什麼時候起強迫勞動變得比僱傭勞動效率更高了呢？如果一個曼徹斯特的廠主在抱怨莫斯科的廠主同他競爭時，竟說什麼他手中只有一些“自願效勞”的工人，那末人們會說他什麼呢？阿爾伯特親王不去強調指出俄國皇帝已下令在教壇上明確地向人民宣布他的“神聖的”戰爭的目的，而英國打了兩年的仗，首相在議會談到戰爭的時候還說“誰也不能確定它的目的”，——阿爾伯特親王不去強調這一點，却抱怨說：

“女王政府不可能實施有利于繼續戰爭的任何一項措施，如果它不事先把這一點告訴議會的話。”

好像羅巴克委員會不是在英軍犧牲了三分之二以後才成立的！好像關於維也納會議問題的辯論不是僅僅在維也納會議閉幕以後才開始似的！實際上如果不把羅素關於塞瓦斯托波爾遠征的夸耀性聲明計算在內，政府在議會內一次也沒有報告過它為了進行戰爭而採取的措施，而羅素的聲明是他本人自動提出的，其目的顯然只是為了向彼得堡內閣及時提出警告。如果說關於封鎖問題進行過辯論，那末這不是因為內閣採取了這項措施，而是因為內閣宣布要封鎖而沒有實行封鎖。阿爾伯特親王不去抱怨那種議會陰謀，即迫使女王在對俄戰爭期間忍受公然親俄和顯然企求和平的內閣的專制獨裁，反而去抱怨議會中不利的表決結果“迫使女王撤掉了自己所信賴的僕人”。阿爾伯特親王不理直氣壯地去抱怨：所有那些錯誤、無能和卑鄙行為，在俄國任何一個將軍、大臣和外交官都可能因之而遭到流放西伯利亞，而在英國至多在報刊上和議

会內引起一些最无关痛痒的空談，——反而去抱怨

“沒有一次挫折（哪怕是极小的挫折），沒有一个缺点和弱点不会馬上遭到譴責，而有时甚至还被人怀着某种不正常的滿足心情而加以夸大”。

阿尔伯特亲王用这些不正常的气忿話来向自己的宿敌帕麦斯顿勳爵祝酒。但是帕麦斯顿根本沒有寬大的胸襟。他馬上利用了亲王所采取的錯誤立場，向亲王拍着胸脯大声說道：“我必須声明，英国人民給予了我們最慷慨的支持。”帕麦斯顿繼續讲下去。他直截了当地說，他享有英国人民的“信任”。帕麦斯顿反駁了亲王对人民所作的令人厌烦的訓誡。在亲王奉承了他之后，他奉承了人民一番。帕麦斯顿甚至不願花費一点口舌对王室說些恭維話作为回报。阿尔伯特亲王想把自己說成是內閣的庇护者，因此宣称內閣“不依賴”于議會和人民；帕麦斯顿的回答是，确认王室“依賴”于內閣。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15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6 月 18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277 号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下院的事件。——克里木戰爭

倫敦 6 月 16 日。关于累亞德提案的辯論，昨天沒有結束，辯論將在星期一晚間會議上繼續進行。因此，我們暫時也把對於辯論的評論延擱一下。

在下院的會議上有一件事倒值得提一提。在辯論維也納會議的問題時，帕麥斯頓順便談到，皮爾派曾提出以接受一定的媾和條件作為加入他的內閣的條件。羅素在維也納維護的正是這些條件。昨天，奧特韋要求帕麥斯頓表示態度，他是否支持皮爾派所倡議的、即自己承認是為俄國利益效勞的那個派別所倡議的媾和條件？這時格萊斯頓就站起來，要求這位指責他和他的朋友叛變的發言人遵守秩序。這一點是做到了。然而奧特韋還是重復了他對皮爾派的評語和對帕麥斯頓的質問。帕麥斯頓像他所應該做的那樣，拒絕回答。他說，媾和條件當然取決於戰爭事件。至於談到皮爾派，那末他們和他商定的，僅僅是他必須保守秘密的“某個”條件不要成為媾和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條件]。格萊斯頓在回答帕麥斯頓時聲稱，他從來沒有和帕麥斯頓就媾和條件問題進行過談判。也許他的朋友格萊安的做法不同。不過，他反對帕麥斯頓的那一套：一方面裝腔作勢地擺出官方的矜持態度，另一方面又給予一些含蓄的指示、模稜兩可的暗示和說些吞吞吐吐的話。

让內閣直截了当地說出来或者干脆沉默不語吧。格萊斯頓怀着恭順而痛苦的心情給了帕麦斯頓以这种应得的訓誡。

法国政府在“立宪主义者报”上对于今后几个月如何进行战争問題作了新的 exposé [闡述]。这样的 exposés 現在不仅成了一种时髦的、而且也成了定期的做法。尽管这些闡述相互之間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但是对于揭露路易·波拿巴反对俄国的“一切可能的”作战計劃來說还是有价值的。它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們证实了波拿巴的幻想一个接着一个地破灭了。第一个計劃是同奥地利联盟,以奥軍 50 万人和法軍 10 万人在維斯拉河和德涅泊河进行“**大战**”的計劃。这个計劃会使法軍在数量上同奥軍相比处于从屬的地位,就像目前英軍在克里木同法軍相比所处的地位一样。这个計劃会使俄国发动革命。可是奥地利拒絕参战。計劃破产了。第二个計劃是“**民族战争**”——“經常注視着西方的被压迫者”的普遍起义。这个計劃一方面会在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中間引起風暴,另一方面也会在斯拉夫人中間引起起义。这个計劃对法国有反作用,有使“第二”帝国遭到崩潰的危險。这个假“铁汉”惊恐地退縮了。計劃又破产了。現在这一切都成了往事。奥地利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普魯士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全世界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于是波拿巴就作出了第三个計劃,即最小的計劃——“**为了局部目的而进行局部战争**”。法国軍隊在克里木作战不是为了荣誉,仅仅是在那里担負警察勤务。需要解决的問題具有純粹地区性的意义(**黑海霸权**),这样的問題应当在这里就地解决。使战争具有較大的規模是不理智的。联軍一定会“恭敬地、然而坚决地”击退俄軍在黑海进行抵抗的任何企图。然后他們,或者俄国人,或者双方将提出議和。原来的豪言壯語沒有留下任何

痕迹,甚至連有关文明的字句也沒有留下,除了为維也納議定书的第三項而斗争外,什么也沒有留下。波拿巴的預言者指出,仅仅为了局部目的战争只能使用局部手段进行。只能剝夺俄国人在黑海的霸权!在下一篇通訊中我們將要指出:在波拿巴从“大战”轉到“民族战争”,又从“民族战争”轉到“为了局部目的使用局部手段而进行的局部战争”之后,这种局部战争也是“荒謬絕倫的”。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6月16日

載于1855年6月19日

“新奧得报”第27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 阿尔伯特亲王的祝詞。 ——報紙印花稅

倫敦 6 月 18 日。阿尔伯特亲王的演說和帕麦斯顿的答詞的发表使人感到有些奇怪。这些讲话本来是 6 月 9 日(星期六)在領港公会作的。星期一，各家日报只是順便提了一下領港公会一年一度的宴会，沒有談到阿尔伯特亲王的祝詞。只有 6 月 13 日(星期三)的“每日新聞”和 6 月 14 日(星期四)的“泰晤士报”发表了祝詞和答謝詞的全文。現在看得很清楚，这些讲话的发表是帕麦斯顿勋爵玩弄的把戏。他指望依靠这位至高无上的祝福人为自己赢得声誉。阿尔伯特亲王不得不为“絕對信任”高贵的子爵、为如此坚决地号召全国去信任他而付出代价。大部分周报对阿尔伯特亲王的祝詞反应如何，可以根据“雷諾新聞”¹⁸⁰上的一段話来判断。順便說一下，“雷諾新聞”的发行額是 2 496 256 份。報紙在作了一番詳細的評論以后就写道：

“至高无上的审查者断言，任何一个弱点，任何一个缺点都遭到譴責，而有时甚至还被人怀着某种**不正常的滿足心情**而加以夸大。英国人民有耐心已变成口头語了。英国人民像以薩迦一样，可以比作一头驴，背着高利貸和土地壟断这两付重担。然而女王的丈夫的这种指責是英国人曾經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最粗暴最駭人听聞的侮辱。好一个**不正常的滿足心情**！这就是說，英国人民看到叛变和貴族的愚蠢使我們英勇的兵士遭到可怕的苦难而感到

不正常的滿足；对奥地利欺騙我們感到不正常的滿足；对輕率地浪費 4 000 万英鎊和牺牲 4 万名最勇敢的兵士感到不正常的滿足；对我们引起我們仿佛要予以帮助的同盟者的不信任和我们所打算加以懲罰的敌人的輕視感到不正常的滿足。然而，亲王的責难不仅是粗暴的和帶有侮辱性的，而且是极端虛伪的和帶有誹謗性的。不管英国人民有什么錯誤，——上帝知道，錯誤是很多的——英国人决不会因自己的兵士和水兵遭受苦难和民族荣誉蒙受耻辱而感到滿足。但是，原籍德国的至高无上的人物、貴族叛徒和他們的应受到輕視和鄙棄的食客們却是例外…… 当然，我們乐意相信，游手好閑、飽食終日的奢侈淫佚之徒和睡在絨毛褥子上的兵士是很难理解真正的兵士和水兵們的苦难和遭遇的…… 然而，有一点我們是同意至高无上的战士的，那就是**立宪主义**是一个最大的 sham〔騙局〕，是一种特別龐大的、糟糕的、不公正的、不中用的政体。但是亲王认为除了专制以外沒有其他可以選擇的道路，那就錯了。我們建議他回想一下，共和主义这样一种政体还存在着，我們的民族可以選擇这种政体；我們感到，輿論現在正是越来越傾向于这方面了，要求共和主义而不是要求好战的亲王所希望的那种无限制的专制的願望越来越强烈了。”

“雷諾新聞”就是这样写的。

廢除報紙印花稅的新法令在上星期日得到了女王的批准并从 6 月 30 日起开始生效。根据这个法令，報紙印花稅只向那些由邮局免費递送的報紙征收。在倫敦的各家日报中只有“先驅晨报”宣布把每号的定价从 5 辨士降到 4 辨士。相反地，在周报中却已經有許多家報紙，例如“劳埃德氏周刊”、“雷諾新聞”、“人民报”等報紙宣布把每号定价从 3 辨士降到 2 辨士。有消息說，倫敦还将出版一种和“泰晤士报”同样大小的日报“信使电訊报”，每号定价 2 辨士。倫敦目前出版的每号定价 2 辨士的新的周报有：“舵手”（天主教報紙）、“泰晤士画报”和查理·奈特先生的“城乡新聞”。最后，威洛特先生和列哲尔先生宣布，他們要在倫敦每周出版 penny

paper〔“辨士时报”〕(定价1辨士的报纸)。然而由于废除报纸印花税,地方报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仅仅在格拉斯哥一地就将出版4种定价1辨士的日报。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到目前为止每星期只出版一次或两次的报纸都将改成日报,每号定价3辨士、2辨士和1辨士不等。使地方报刊摆脱伦敦的控制,使报业分散经营,这实际上是曼彻斯特学派在它顽强而长期地反对报纸印花税的运动中的主要目的。

卡·馬克思写于1855年6月18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5年6月21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283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奇怪的政策

德·普腊德神甫在他的“維也納會議”一书中公正地指責了这次如德·利奈公爵所說的跳舞式的會議，說它为俄国在欧洲的統治奠定了基础，并且批准了这种統治。

德·普腊德感叹地說：“这样，欧洲为爭取独立反对法国而进行的战争就以欧洲隶属于俄国而告終了。花費这么大的力气去获得这样的結果是否值得！”¹⁸¹

反对法国的战争，同时也是反对革命的战争，反雅各宾的战争，这种战争，正如早就应当料想到的，使政治势力的中心从西方轉移到了东方，从法国轉移到了俄国。維也納會議是反雅各宾战争的自然产物。維也納条約是維也納會議的合法成果，而俄国的統治則是維也納条約的非婚生子。因此不能容許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著作家根据下述事实而把全部罪过加在普魯士头上：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由于对亚历山大皇帝盲目忠誠和断然指示他的全权代表在一切重大問題上支持俄国而妨碍了可耻的三人同盟——卡斯尔里、梅特涅和达来朗去实现他們的密謀，即建立防止俄国入侵的可靠的区域性壁垒，以便預防他們自己十分热心地强加于欧洲的那种制度产生令人不快的、但是必然的后果。甚至那种不擇任何手段选举教皇的會議也沒有能釐造出事件发展的邏輯。

俄国在欧洲所取得的优势是同維也納条約有密切联系的；因此任何反对这个强国的战争，只要它不是从一开始就宣布廢除条約，就必然会造成一系列的訛詐欺騙和阴谋勾結。然而目前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廢除維也納条約，而是通过把土耳其补加到 1815 年的議定书中来巩固这个条約。有人希望，从这时起保守主义的千年王国就会开始，各国政府将能够仅仅为了使欧洲思想界“平靜”而作共同的努力。下面从一位普魯士元帅克奈澤貝克的小册子“維也納會議开会期間拟定的关于欧洲均势的备忘录”¹⁸²中摘出的几段值得注意的話的譯文可以表明，早在會議期間，會議的主要参加者就十分清楚地懂得，保存土耳其就像瓜分波兰一样，是他們的“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让土耳其人留在欧洲！土耳其人使你們受到了什么損害呢？这是一个强大而正直的民族；只要你們不去干涉他們，他們就会几世紀和平地生活下去，他們是完全可以信賴的。难道他們曾經欺騙过你們？难道他們在政策上不真誠不坦率？虽然他們是好战的、大胆的，但是就許多方面來說，这是好的，有益的。土耳其人是防止亚洲过剩人口入侵的最好的屏障，这正是因為他們在欧洲有領土，他們阻擋着各种各样的侵犯。如果把他們赶出欧洲，他們自己就要入侵。暫且假定他們被赶走了。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要么这些土地被俄国或奥地利侵占，要么在那里建立独立的希腊国家。你們是否真的想使俄国变得更强盛？你們是否也想从这方面使这个龐然大物成为自己的累贅？俄国已經从伏尔加河挺进到尼門河，又从尼門河挺进到維斯拉河，而現在大概又进一步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瓦尔塔河，难道你們觉得这还不够？如果不是这样，那末你們是否打算使奥地利的力量用在亚洲方面，从而削弱奥地利或者使它对自己保住强国中心的地位来防止西方侵犯这一点采取漠視态度？請回想一下，楊·薩比斯基、薩瓦亲王奥伊根和芒帖庫利在当时的处境是怎样的。难道起初法国爭得了对德国的統治，不正是因为奥地利不得不經常派出兵力去反对亚洲？你們是否想使奥地利靠攏亚洲而恢复从前的状况，并且更加深这种状况？

如果是那样，就应当建立独立的希腊国家或拜占庭国家！但这会改善欧洲的状况吗？在这个民族（希腊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况下，欧洲是否反而要经常武装起来保卫自己以防止土耳其人的卷土重来呢？由于俄国利用宗教、贸易和金钱对希腊发生影响，希腊是否就会单纯地变为俄国的殖民地呢？有土耳其人的地方，最好别去打搅它，当不安分的力量沉睡时，就不要去惊动它。

心地善良的慈善家会感叹地说：‘可是那里对待人的态度是多么坏啊！包括古雅典和斯巴达在内的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住的却是野蛮人！’

我的朋友，这一切可能是真实的：那里正在摧残人，或者说过去一直在摧残人；但是在别的国家也有用棍棒、树条和鞭子打人以及贩卖人口的。在改变一种状况前，应当想一下，改变之后是否会好些。用棍棒和树条抽打以及希腊人的背信弃义行为是否比土耳其人的细丝绳和敕令要好受些呢？首先必须在欧洲消灭这一切和贩卖奴隶的现象，不要再为土耳其人的野蛮而感到难过；在他们的野蛮中包藏着力量，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增添了勇气，而我们正需要力量和勇气，以便有可能沉着地观察俄国人是怎样在向瓦尔塔河推进的。

由此可见，土耳其人必须保存，而波兰人，作为民族来说则应当绝迹！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一切有力量坚持下来的事物则生存，一切腐烂的东西则应死亡。生活就是这样。每个人可以问问自己，如果波兰人保留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且具有它所固有的一切特点，那会产生什么后果。从宫廷到茅舍，到处都是酗酒、贪食、谄媚逢迎、对一切优秀民族和一切其他民族采取藐视态度、刻薄地嘲笑各种规章制度、挥霍浪费、淫佚放荡、卖身投靠、奸诈狡猾、隐瞒欺骗、荒淫无耻——这就是波兰人在其中生活的最如意的环境。为了这些他们歌唱着，奏着提琴或弹着六弦琴，吻着情人，用情人的小鞋喝酒，拔着剑，捻着自己的鬍子，跃上战马去同杜木里埃和波拿巴或者另外什么人战斗，他们过度地喝着伏特加酒和潘趣酒，同朋友和仇敌搏斗，他们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农奴很坏，他们变卖自己的财产，跑到国外去，他们骚扰着半个世界，并且当着考斯丘什科和波尼亚托夫斯基发誓，说波兰决不会灭亡——这些就同他们是波兰人一样的确实。

你们要求复兴波兰，你们看，你们支持的是什么。

这样的民族是否值得独立存在呢？这个民族的构成条件成熟了吗？民

族的任何一种构成都包含制度观念，因为它只是調整并向每个社会成員指出他的位置；为此它規定国家应由哪些阶层組成，并且明确規定每个阶层的位置、社会地位、体制、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器的活动方向和国家管理的基本方針。如果誰也不想要制度，那末又怎样来管理一个民族呢？一个波兰国王（斯蒂凡·巴托里）有一次曾經感叹地說：‘波兰人！你們之所以能存在，不是由于制度——你們是不承认制度的，也不是由于政府——你們是不尊重政府的，而仅仅是由于侥幸！’

而这种情况一直繼續到現在。杂乱无章、荒淫无耻——这就是波兰人的最如意的环境。不，最好还是让这个民族忍受棍打吧。这是天意。什么对人有好处，那只有天知道！

因此，今天必須打倒波兰人！”

目前的战争（其目的是扩大和巩固 1815 年的維也納条約）看来是要实现老元帅克奈澤貝克的心願。在法国复辟和七月王朝的整个时期，曾經散布过这样一种錯觉：似乎拿破侖主义意味着廢除正式把欧洲置于俄国托管下而把法国置于欧洲的 «surveillance publique» [“公共监督”] 下的維也納条約。現在这位为自己的悲惨处境遭到冷酷譏諷的念头所苦恼的摹仿自己伯父的皇帝向全世界证明，拿破侖主义意味着**不是为了**使法国摆脱維也納条約，而是**为了使土耳其服从这个条約而进行战争**。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存維也納条約，但是其借口却是削弱俄国的实力！

这就是来自巴黎的使拿破侖观念死灰复燃的人所解釋的真正的 «idée napoléonienne» [“拿破侖观念”]。作为第二个拿破侖的驕傲的同盟者的英国人当然认为，他們是可以像拿破侖第一的侄子对待拿破侖第一的观念那样来对待拿破侖第一的名言的。因此，当讀到一位現代英国作家（邓洛普）的作品¹⁸³时就不应当感到驚訝了，在这篇作品中談到，似乎拿破侖曾經預言过，即将同俄国进行的斗争会提出一个偉大的問題：欧洲应成为“立宪的还是哥薩克

的”。在沒落帝国形成以前，通常都认为拿破侖曾說过：“共和的还是哥薩克的。”然而人总是活到老学到老的。

由于“論壇报”对維也納条約和以維也納条約为基础的欧洲“制度”贊揚不够，人們竟指責它背叛自由和人权的事业！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19 日

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7 月 10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43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 辯論。——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

倫敦 6 月 20 日。波拿巴在“立宪主义者报”上宣称的局部战争，就是在黑海上的战争，其目的是消灭俄国在黑海的似乎是现有的 *suprématie* [优势]，順便提一下，甚至对土耳其人，这种海上的 *suprématie* 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证明。现在的情况怎样呢？从君士坦丁堡到多瑙河的整个这一面海岸，以及直到巴拉克拉瓦和叶夫帕托利亚的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都已经从俄军手中夺过来了。目前只有卡法和塞瓦斯托波尔还在坚守；卡法已陷入困境，塞瓦斯托波尔则由于所处的位置，在遭到严重威胁时也不得不放棄。不仅如此，联军的舰队正在阿速夫内海破浪前进，他们的轻型船舰曾进到塔干罗格，并且炮击所有重要的沿岸据点。除了从皮列柯普到多瑙河这一段（约占这个沿岸地区的十五分之一）以外，沿岸的任何一个地段都已不在俄军手中了。假定卡法和塞瓦斯托波尔也已经陷落，克里木已经落入联军手中，那又将怎样呢？俄国就像它已经声明的那样，是不会締結和約的。締結和約是不明智的。这等于在主力正赶来的时候由于前卫被击退而放棄战斗。而联军会做什么呢？有人对我们說，他们可以破坏敖德薩、赫尔松、尼古拉也夫。他们可能向前推进，派大军在敖德薩登陆，加强敖德薩的防御，以便击退任何数量的俄军的猛攻，而以后，再根据情况行动。此外，

他們可以派兵到高加索去，消灭駐扎在格魯吉亞和南高加索其他領地的那支俄軍（这支軍隊由穆拉維約夫將軍指揮），并且切斷俄羅斯帝國同它的南亞領地的联系。但要是俄國還不締結和約呢？当敌人还在它的領土上的时候，它是不可能締結和約的。一百五十年以来，俄國从来没有締結过一次使它受到任何損失的和約。甚至提爾西特和約都使俄國的領土擴大了，而这个和約是在連一个法國人都沒有踏上俄國土地的时候締結的。剛剛即位的亞歷山大二世不会冒險去做甚至对尼古拉來說也是危險的事情。他不会突然破坏帝國的傳統。假定克里木已被占領并在那里駐扎了5万名軍隊，高加索和南部所有領地上的俄軍已被肅清，聯軍把俄軍阻止在庫班河和捷列克河一綫，敖德薩已被占領并且变成了駐有10万名軍隊的營壘，尼古拉也夫、赫爾松、伊茲馬伊耳也都被聯軍破坏或占領。如果是这样，聯軍是否只会守住自己的陣地，并把希望寄托在俄軍的疲憊上呢？疾病夺去在克里木和高加索的聯軍兵士的生命将比补充兵員的来到更加迅速。集中在敖德薩的聯軍主力将不得不依靠舰队得到供应，因为敖德薩周圍几百英里的土地全都没有耕种。聯軍一想超越陣地就会遭到俄軍首先是哥薩克的攻击。迫使后者作战是不可能的。俄軍总是具有能够誘敌深入本国腹地的有利条件。对联軍的每一次进攻他們都将以緩慢的退却来对付。同时，也不能长期使一支大軍呆在營壘里无所事事。疾病和逐漸滋長的紀律敗坏、軍心渙散的現象将迫使聯軍采取坚决行动。可見，問題并不在于夺取沿岸地区的主要据点，然后等待俄國人自动地让步。这从軍事观点来看也是錯誤的。要想控制沿岸地区，仅攻占沿岸的主要据点是不够的。只有占領內地才能确保沿岸地区。当聯軍在俄國南部沿岸地区站住了脚以后，形势将迫使他們

把自己的部队向俄国腹地推进。可是困难也就在这里开始了。一直到波多尔斯科省、基輔省、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边境的这片土地，尽是灌溉条件很差，几乎还没有开垦过的草原，那里除了野草以外什么也不生长，就连野草也会被火热的太阳晒枯。假定說敖德薩、尼古拉也夫和赫尔松都将变成作战基地，可是联军能派兵进攻的作战目标又在哪里呢？这个目标只可能是莫斯科，而莫斯科却在 700 英里以外，向它进军需要 50 万人。但是这样的进军不仅需要奥地利严守中立，而且还需要它在道义上给予支持。但这个国家现在站在哪一边呢？在 1854 年，普魯士和奥地利曾經声明，它們将把俄軍向巴尔干山脉的推进看做 *casus belli* [作战的理由]。那为什么不能假定，在 1856 年，它們将把法軍对莫斯科或者甚至对哈尔科夫的进攻当做作战的理由呢？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記，任何一支由黑海向俄国腹地推进的軍队，它的翼側暴露給奥地利的程度，并不亚于由多瑙河向土耳其推进的俄軍；因此在一定的距离上，它的交通綫和它的作战基地，即它的存在本身，将都依靠奥地利的恩賜。联军在这种条件下，难道还能够狂追俄軍而进入俄国腹地嗎？那会是沒有理智的行动，純粹是沒有理智的行动，但是这种沒有理智的行动是波拿巴的最新計劃即“进行局部战争”計劃的必然后果。确定不移的辯证法使得“局部战争”在各个据点远远超出它所规划的地界而变成“大”战，只不过沒有大战的前提、条件和手段而已。但是波拿巴的最新“計劃”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承认在舞台上应该出現另一种力量来进行对俄战争，也承认复辟的帝国由于意識到自己的軟弱，它只得在局部范围内进行对俄战争，即只能在欧洲范围内进行这种战争。拿破侖的对俄战争轉向“局部战争”的这种变化，将超过 *idées napoléoniennes* [拿破侖观念] 在

复辟的帝国所經受的所有奇異的变化。

在今晚恢复的**关于行政改革的辯論**中，布尔韦尔代表托利党提出的修正案使政府能够以 7 票对 1 票的多数击败行政改革派。辯論的总的特点是带有**小官吏的性质**，它一分钟也没有超出这一点。大談寵愛和徇私的詳情細節，議論“最優等考試”的題目，对輕視功績这一点大发雷霆，——所有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和毫无意义的。人們会以为，是在听取一位下級林务官向可尊敬的閣部提出的书面申訴。格萊斯頓坚决地說，甚至阿伯丁 in petto [心中]也贊成改革官僚制度。迪斯累里肯定地說，得比也是如此。帕麥斯頓則发誓說，我的內閣也并不逊色。因此，西蒂区的先生們沒有必要准备斗争来改革、开导、改組我們的官厅了。請放心吧！

英国資產階級在自己过去的鼓动运动中曾出其不意地控制了执政集团，并且誘使群众同自己唱一个調子，因为它在自己的綱領里走得要比自己的实际目标远一些。这一次它在自己的綱領里甚至不敢提高到实际目标的水平。你們一个一个地說服我們，說你們不想消灭貴族政治，而只想同我們團結起来修好政府机器！Very well! [很好!] 以友誼对友誼！我們自己来为你們改革行政机关，自然不越出它的傳統範圍。你們断言，“行政改革”不是階級之間爭論的問題，談的只是“实际事务”、“善意的”改革。我們希望你們讓我們自己来制定行政改革的細節以首先证明你們的善意，因为这里談的只是細節。我們自己看得更清楚，我們能够走多远，既不使我們的階級受到損害，又不由于疏忽而把行政改革变成階級之間爭論的問題，也不使它失去仁愛的性质。主張改革的資產階級不得不装出一副样子，似乎它相信这种貴族的 bonhomie [好意]的諷刺語言，因为它自己就是用虛偽的語言同群众講話的。貴

族、內閣和反对派，托利党和輝格党，一分钟也沒有誤解行政改革派和群众之間的相互关系。他們知道，这种鼓动早在进入議會以前就以破产告終了。这样，他們还能誤解嗎？尽管行政改革协会只允許特殊人物出席在德留黎梭举行的大会，尽管它的听众是經過三番五次篩选过的，但是它对可能提出的任何民主提案或者議程沒有規定的任何发言都非常恐惧，以致主席在大会開幕前宣布：与会公众只是为了“听取程序单上所公布的发言人的讲话”，任何“提案”都不付諸表决，“因此不能提出任何修正案”，也不能“对已报名的发言人的名单作任何补充”。当然，这样的鼓动是不能对頑固的英国寡头政治发生作用并迫使它让步的。

前天晚上在下院宣讀的**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用空洞的大話掩盖了尖銳的問題。报告吞吞吐吐地譴責各个主管部門，例如軍械部，軍需部，医务主管部門等等。报告指責帕麦斯顿对民軍的管理，指責整个联合內閣实行塞瓦斯托波尔远征的輕举妄动。由于委员会在訊問证人时千方百計地迴避寻找惨敗的真正原因，它自然也就不得不在报告中老是搖摆不定，不是泛泛地指責政治領袖，就是瑣瑣碎碎地責难担任执行者角色的人們。一般說来，委员会完成了它作为減輕輿論压力的安全閥的任务。

日报对俄国人在汉格进行的“背信棄义的屠杀”发出了憤怒的叫喊。然而“紀事晨报”承认，英国人利用挂着白旗的船只測量海洋深度，并且在俄国人的陣地附近如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薩附近进行間諜活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6月20日
載于1855年6月23日
“新奧得报”第28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

关于占領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
——巴黎交易所新聞。——上院
关于汉格暴行的辯論¹⁸⁴

倫敦 6 月 22 日。“梦行者”¹⁸⁵ 第二幕剛演完，德留黎梭剧院的幕布剛落下，突然发出的响亮的击鼓声把拥向小卖部的观众又召回到大厅里来。幕布重新升起，剧院經理走上舞台，他用一种不自然的过度激昂的音調說了下面的話：

“女士們！先生們！我十分荣幸，能够向你們报告一件重要的事情：联軍占領了塞瓦斯托波尔。”

全場欢跃，高呼“万岁！”，“万岁！”，鮮花如雨点般地抛来。乐队奏乐，观众齐唱《God save the Queen》，《Rule Britannia》和《Partant pour la Syrie》¹⁸⁶。从上层观覽席发出了要求唱《La Marseillaise!》〔“馬賽曲！”〕的呼声，但是沒有得到响应。剧院經理的即兴作品是以一則电訊为根据的，但这則电訊根本沒有談到占領塞瓦斯托波尔的事，只是談到 6 月 18 日法国人对馬拉霍夫岡的强攻和英国人对大凸角堡的强攻都被击退了，而且損失很大。这位演員昨天晚上在德留黎梭的舞台上仿效了另一場戏的主持人的做法，这个主持人大約在一年前的一次盛大的軍事檢閱¹⁸⁷ 过程中曾

經临时編造了一句使人意料不到的和忘記不了的話：«Messieurs, Sevastopol est pris!» [“先生們，塞瓦斯托波尔被占領了！”]

佩利西埃坚持对南区进行单方面攻击，使联軍兵力繼續不断地遭到毀灭，这种不可理解的固执做法显然不是出于軍事上的原因，而是出于財政上的原因。大家知道，波拿巴已經发出了几十亿期票用来夺取塞瓦斯托波尔，而且强迫法兰西民族貼現这些期票。他还打算再发出 8 亿或接近这个数字的期票。因此，为偿清业已流通的期票而进行支付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如果說，越过黑河保证了实际的效果，那末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南区就預示了表面上的輝煌成就。“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会对发行新公債的前途产生有利的影响；既然为战争而发行公債，那末为什么不为公債而进行战争呢！在这样的論据面前，任何軍事科学評論都必然不再发生作用了。一般說来，在克里木战争和巴黎交易所之間有着奥妙的联系。大家知道，正像条条大路通羅馬一样，条条电綫都汇聚到土伊勒里，这些电綫在这里都最后成了“內閣的秘密”。据了解，巴黎发表最重要的电訊要比倫敦迟几小时。据說，在这几小时內，一个名字叫**奥尔西**的科西嘉人就在巴黎交易所內大肆活动。这个奥尔西过去曾經是当时的被放逐者^①在倫敦交易所的“命中注定的”代理人，这在倫敦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英国內閣已經发表的邓达斯海軍上将的急电证明了这样的事实：絲毫沒有容許由“哥薩克”調遣的船只上的軍官或船員濫用軍使旗从而使俄国人有可能为**汉格的暴行**制造借口，那末“俄国殘廢者”关于这件事的叙述¹⁸⁸就不会令人产生任何疑問。显然，俄

① 路易·波拿巴。——編者注

国人沒有料想到有一个名叫約翰·布朗的船員从那里活着回来，并且还会提出反駁他們的证詞。因而“殘廢者”认为沒有必要控告英国船只从事間諜活动、探測海洋深度等等，它同西哀士神甫一起深信“死人不会說話”，而仓促地編造了自己的一套說法。昨天上院已經討論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們不能同意“泰晤士报”这样的論断：“在习惯上和原則上总是十分冷靜和态度端正的上院”这一次却无法抑制极端的憤慨情緒的真实流露。我們看到，口头上装腔作势地表示憤慨，而实际上却温情脉脉地关怀着“俄国的荣誉”，胆怯地畏惧民族复仇。托利党的外交大臣馬姆茲伯里伯爵站起来簡略地叙述了問題的实质，然后感叹地說道：

“我逐次回忆了全部英国历史，找不到这样殘暴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对于欧洲每一个軍官、每一支軍隊來說，特別重要的是：彻底追究这次事件，使这次罪行的执行者受到应有的懲罰。”

輝格党的外交大臣**克拉倫登**声明，他对自己同僚的“憤慨”表示贊同。这个如此駭人听闻和无与倫比的暴行是同文明国家所采用的方法和习俗完全相違背的，因此可以設想，它的执行者不可能是根据他們长官的命令或在他們长官同意下进行活动的。很可能500名俄軍的指揮官不是 *commissioned officier* [有軍官官銜证书的軍官]（所有英国軍官包括尉官在內都有 *commission* [官銜证书]，但是軍士和士官沒有）。因此完全有可能俄国政府并不同意这种行动。为此他委托英国駐哥本哈根大使通过丹麦駐彼得堡公使向俄国政府轉达以下的意見：英国政府十分殷切地希望知道，俄国政府采取了或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表明自己对这种行动的态度；这种行动如果发生在太平洋某一个野蛮的島屿上，也許不会引起任何惊讶，但发生在文明的欧洲是意想不到的；如果俄国政府不

严格地和适当地惩办这一行动的肇事者，那末就需要对这种行动采取最严峻的压制手段。克拉倫登最后表示：英国内閣期待着俄国方面的声明，以便根据声明而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科尔彻斯特勋爵认为，

“每逢发生这种事情，指挥官的职責就是通过举白旗的軍使而同他所能取得联系的俄国較高級的机关进行直接联系，向它說明情况，并要求譴責这种暴行”。

馬姆茲伯里勋爵第二次发言，声称他一般同意政府的行动，但是当听到克拉倫登說采取“压制手段”时，他就不寒而栗了。英国这方面不能按俄軍的方法办事。必須从道义上惩罚俄国沙皇，必須喚起欧洲各国宮廷都对彼得堡宮廷提出抗議，从而使俄国受到国际的判决。一切帶有“报复”性质的办法只能加深輿論的“反感”。英国内閣的挂名主席格蘭維耳伯爵热烈响应托利党人的发言，并且像基督徒那样地祈求：“不要进行任何报复！”

如“泰晤士报”所說的上院的这些极端憤慨的表現究竟說明什么呢？义憤填膺的托利党人提出質問。輝格党人的憤懣情緒更为强烈，但自己同时却在給俄国政府暗示辯护的理由，并且給它指出一条出路：拒絕承认，同时用某个下級軍官来当牺牲品。他低声而含糊地說“可能”采取压制手段，从而掩飾自己的退縮行为。科尔彻斯特勋爵想用派遣另一个打着白旗的軍使去同俄軍接头的办法来惩罚俄軍对打着白旗的軍使进行凶恶攻击的行为。这时托利党人再次发言，他們从要采取压制手段轉而訴諸道义了。輝格党人因有放棄采用压制手段（虽然只是可能采取的压制手段）的可能而感到高兴，随声附和他們說：«No retaliation!»〔“不要进行任何报复！”〕真是一出地道的喜剧！上院为了掩护俄国而置身于人民

的激憤情緒和俄国之間。不再扮演角色的唯一貴族是布魯姆。他說：“如果說国家曾經号召过流血的話，那末現在就是这样。”至于談到英国在采取“压制手段”、行使 «jus talionis» [“报复权”] 方面的敏感性，馬姆茲伯里勳爵在一幕幕回忆英国历史时，显然忽略了英国史中关于爱尔兰、印度和北美等篇頁！英国的寡头政治曾經在什么时候表现出像对待俄国那样温情脉脉呢？

在議院宣讀过的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中，最后一段話——罗巴克提出的、由委员会表决通过的一段話很奇怪地不見了。这一段話是这样的：

“对情况沒有应有的了解就計劃实行或着手进行的一切事情，都缺乏足够的預見性和預防措施。政府所采取的这种行动方式是使我軍在克里木遭到一切災难的首要的和主要的原因。”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22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6 月 25 和 26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289 和 290 号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馬克思 六月十八日的失利。 ——增援部队

倫敦 6 月 23 日。滑铁卢会战¹⁸⁹ 紀念日（6 月 18 日）这一次自然不是在倫敦举行庆祝。本来打算在克里木通过不是对法国人的胜利，而是同法国人一起取得的胜利来庆祝这个日子。这个事件之所以特別聳人听闻，是因为威灵頓的 *famulus*〔僕从〕腊格倫反正是听从拿破侖第三的一个將軍的命令来进行指揮。报道的标题已經拟就，只是这个报道本应使之永垂不朽的事件却令人失望。在复辟帝国的历史上，不能不承认那种致命的癖好：通过再版即修訂版来肯定成績、否定失敗，竭力使 *Empire*〔帝国〕的偉大日子重显光輝。在过去反对共和国的战斗中已經取得的这种拿破侖日子的光荣复活，在目前反对外敌的战斗中却遭到了破灭。沒有 *Empire* 胜利的 *empire* 使人想起了对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所作的加工，經過这种加工，不仅使丹麦王子的忧郁心情大为减弱，而且把丹麦王子这个人都弄得看不到了¹⁹⁰。巴黎原定在 1854 年 12 月 2 日在克里木建立軍事上的丰功偉績。但由于多雨和彈药不足而未能立功。1855 年 6 月 18 日曾經打算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演出修訂版的、另一种結局的滑铁卢会战。但結果是英法軍隊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失敗。

倫敦的气氛阴沉，有价证券跌价了，帕麦斯顿在一天之内又丢掉了他在几个月内利用极其巧妙的策略所获得的东西。遭到失败的那天是6月18日；报道失败消息的电报在6月22日大家才知道。上星期四官方报纸“地球报”¹⁹¹按照帕麦斯顿的指示声明：“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同一天，帕麦斯顿在下院的晚间会议上郑重地证实了这个保证性的声明。而现在很清楚，他早在6月20日星期三午后4点钟就接到了电报。“先驱”断定拖延的原因在于巴黎的坚决要求，因为战场上的失利在巴黎变成了交易所中的成功。不管怎样，cockney〔科克奈（伦敦居民）〕却对帕麦斯顿大为恼怒。打败了——已经够糟糕的了。但由于大臣们的狡猾手段竟在德留黎梭和康文特田园剧院中参与令人发笑的欢呼，庆祝塞瓦斯托波尔的占领，this is too bad, sir!〔这太不像话了，先生！〕

我们已经充分地预先告诉了读者，佩利西埃坚持强攻南区的固执态度是联军失利的预兆。当他接受指挥权时，我们还指出过一个可以谅解的情况，即运输工具的不足会使佩利西埃在野战中遇到很大的困难。¹⁹²这两种情况现在在英国报刊上都得到了证实。例如，在今天的“先驱晨报”中谈到：

“军队不能出动——而按照一切战略规则它本来应当去粉碎驻在辛费罗波尔的辅助部队。军队不能出动的原因是：**主要的掘墓人**——当局所固有的疏忽态度和拖延时间的做法——在这里起着破坏作用，我们本来需要28000头役畜，可是我们手里只有4000—5000头；而且这一切又是在疾病再度悄悄地蔓延到已经蕴藏着寒热病、霍乱和鼠疫病原体的兵营里的时候发生的。这种无法向前推进的情况（正像在瓦尔那和死亡盆地曾经发生的情况一样）乃是我们的将军们不得不每天在对几乎是无法攻克的土质工事作绝望的进攻中摧残我们兵士的生命的原由，而应当行动的英勇军队由于缺乏骑兵和运输工具而只好在黑河边按兵不动。”

剛剛公布的財政報告再一次证明了战争初期內閣在利用交給它支配的資金問題上采取了特別疏忽的态度。根据这个官方報告，到1854年1月1日，在撥給軍队的款項中庫存金額有1 835 882英鎊，而到1854年4月1日，用在軍队上的數目总共只有227万英鎊；这样，招募新兵所用的錢还不到議会所表決撥付的數目的四分之三。根据罗巴克委員會的報告，軍队复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疲劳过度。而疲劳过度的原因又何在呢？——在于数量太少。而軍队的数量太少，就像財政報告所表明的，是由于內閣搞陰謀的結果。可是阿尔伯特亲王还埋怨說女王自己沒有掌握軍队！說內閣的两手被束縛住了！在关于累亚德提案的辯論中揭露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內閣，一方面埋怨运输工具不够，同时却派遣运输船只經過太恩河畔新堡到朴次茅斯去装运煤炭，或是派遣船只从克萊德到利物浦、从德普弗德到烏里治，让 Surveyor [航海船只檢查員] 去进行巡視。

由于6月18日的失利，因此必須火速派遣**增援部队**。根据这种情况，昨天发布了命令，要不久前从錫兰回来的第十五步兵团立即登舰；第五十一皇家輕步兵团，第八十和九十四步兵团，由各个后备連組成的原来預定用于印度的所有小部队以及1 200名騎兵必須立即开往战区。同时打电报到馬賽命令急速調汽船給馬尔他島的总督和直布罗陀的总督以及伊奧尼亚群島的 Lord High Commissioner [高級專員] 使用，以便在派去換防的团和民軍到达**以前**，就利用这些船只把駐防軍和近卫旅預备队的全部适于服役的人員以及一切可以調出来的后备营都調出来。而且要立即从直布罗陀調出第十三輕步兵团，从伊奧尼亚群島調出第三十一步兵团，从科尔富島調出第四十八步兵团，从直布罗陀調出第五十四、

第六十六步兵团和苏格兰高地的第九十二步兵团。这样一来，不列颠在克里木的兵力就将增加 13 000 人以上。此外还应加上 4 个野炮连、1 个骑炮队和攻城炮队的增援部队——所有这些部队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就只等待运输船只。然而英国现在就像处在 1854 年的状况。它没有后备部队。而且情况比 1854 年更坏。在 1854 年，正如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断言的，帕麦斯顿阻挠建立民军，迟迟不实行这一措施，而在 1855 年，已经建立起来的民军几乎被他解散。从上面所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出，增援部队不仅包括军队的主力，而且还包括后备营和骨干。这样，英国的情况就使人想起了孟德斯鸠著作中的那个野蛮人，他为了获取树上的果子，把树也砍倒了。这个 *par excellence* [最道地的] 节俭的国家所花费的是它的军事资本，而不是金钱。阿尔伯特亲王要求给予绝对信任的内阁玩弄手腕的结果就是这样！大陆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看法，说英国人口太少，提供不了军队；没有比这更错误的看法了。在 1815 年，即在二十二年战争以后，英国的武装力量在 35 万人以上！然而内阁却故意轻视这样两种办法：提高常备军的薪饷和进行民军的抽签工作！1827 年，利文公爵夫人偿还了这位首相的债务，1830 年利文公爵夫人使他当上了外交大臣，首相通过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使俄国对土耳其实行了八年的统治，而在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期满前一星期又在达达尼尔海峡条约中使俄国仍旧保持了这种统治¹⁹³——对这位首相还能期望什么呢？

昨天罗巴克在下院宣称，7 月 3 日（星期二，即再过一个星期）他要提出下列提案：

“议院对军队在克里木的冬季战局中遭受苦难深感悲伤，它同意它的委员会的报告中的意见：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是使军队遭到灾难的首要的和

主要的原因,因而它严厉譴責这个內閣中由于自己的建議而导致这种悲惨結局的**每一个成員。**”

这样,罗巴克的提案就有意識地把帕麦斯頓、罗素、克拉倫登、格蘭維耳和兰斯唐——这些既是这一届內閣的成員同时又是上一届內閣的成員都包括进去。这个渺小的、刻薄的、与瑟息替斯很相像的、而且又是老练的、完全掌握了議会策略的道道地地的律师,看来是被迫提出这种提案的,因为罗巴克在設菲尔德的选民曾經在公开的群众集会上投不信任票威胁过他——这个在星期二指責过帕麦斯頓而在星期四又投票信任同一个帕麦斯頓的人。阿尔伯特亲王对內閣和議会之間的关系进行的倒霉的干涉以及他对議会自主权的挑衅行为,是提出这个再一次威胁女王要夺去她“所信托的僕从”的提案的第二个原因。

关于**行政改革派**最近的活动和詭計以及迷信宗教的人的阴谋,我們下一次再談。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2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6 月 26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291 号

卡·馬克思
*反教会运动。——海德
公园的示威

倫敦 6 月 25 日。过了时的社会力量，虽然它存在的基础早已腐朽，可是，在名义上它还控制着权力的一切象征，它继续苟延残喘，同时在他尚未宣告死亡和宣读遗嘱的时候，继承者们就为遗产而争吵了起来。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现在英国寡头政治的表现就是这样。它的孿生姊妹——教会的表现也是这样。英国国教会内部（“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都包括在内）曾无数次地试图改组，企图调和与非国教徒之间的分歧¹⁹⁴，以便集中力量来和全国不信上帝的群众相对抗，现已迅速地接二连三地采取了一系列宗教方面的强制性措施。以前叫做艾释黎勋爵的那位虔诚的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上院悲痛地确认：仅仅在英格兰就有 500 万人不但完全离开了教会，而且根本不信奉基督教。国教会答道：«Compelle intrare» [“强迫进来”]^①。国教会要艾释黎勋爵和像他一样的那些

① 福音书里的话。——编者注

非国教的、宗派主义的、歇斯底里的信徒們为它火中取栗。

第一个宗教方面的强制性措施是 Beer Bill [啤酒法案]；这个法案規定：星期日任何公共娱乐場所除晚上6点到10点以外，一律不准营业。这个法案是在虔誠的先生們以答应延长专卖制的有效期限，即答应保持大資本的壟断地位来换取了倫敦大啤酒店老板的支持以后，在議院的几乎无人出席的會議快結束时偷偷地通过的。接着就是 Sunday Trading Bill [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这个法案現已在下院三讀通过，个别条文剛剛在下院全院委员会¹⁹⁵的會議上討論过。这个新的强制性措施也得到了大資本的支持，因为星期日做买卖的只是一些小店鋪，而大商店总是願意用議會的手段来消除小店鋪的星期日的竞争的。从这两件事中我們看到教会和壟断資本共同策划的阴谋；这两件事情表明，宗教的惩治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下层阶級，而使上层阶級在良心上可以安靜下来。Beer Bill 对貴族的俱乐部妨碍不大，正如 Sunday Trading Bill 并不影响特权阶級的星期日活动一样。工人阶級是在星期六晚上領到工資的。因而星期日的买卖只是为它而存在的。只有工人才不得不在星期日购买他們所需的一点点东西。所以新的法案打击的对象只是工人阶級。在十八世紀法国貴族說过：伏尔泰，給我們；弥撒和什一稅，給人民。在十九世紀英国貴族說：信奉上帝的话，由我們來說；执行上帝意志的事，让人民去做。基督教的古圣先賢为了拯救世人的灵魂而鞭笞自己的肉体；今天的有教养的圣者們却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鞭笞人民的肉体。

这一驕奢淫逸、腐化墮落、貪求享乐的貴族阶級和教会的联盟，这一靠啤酒店大老板和壟断資本家大商人齷齪的利潤来維持的联盟，昨天在海德公园引起了自乔治四世这个“欧洲第一位紳

士”死后倫敦从来未見過的大規模的示威。这个示威我們从头到尾都看到了，如果說英国的革命昨天已在海德公园开始，我們认为这并不是过甚其詞。最近从克里木来的消息对于这个“非議会的”、“議會外的”和“反議会的”示威說来，有效地起了酵母的作用。

人們向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的起草人罗伯特·格娄弗諾勋爵提出了譴責，說他的法律只是为了反对穷人而不是反对富人，而格娄弗諾勋爵这样回答道：

“貴族已大为节制，在星期日不再使他們的僕人和馬匹过分劳累了。”

上周周末，在倫敦的墙上到处可以看見貼着宪章派所出的这样一張用大鉛字印的宣傳品：

“新的星期日法案禁止穷人讀报、修面、吸烟、吃喝，禁止穷人享受他們現在还能享受的一切生理上和精神上所需要的飲食和休息。星期日午后，在海德公园将召开一次手工业者、工人和首都‘底层’的其他代表的露天群众大会，讓我們亲自来证实，貴族究竟是怎样虔誠地遵守假日誠条的，他們究竟是如何操心在这一天不再使他們的僕人和馬匹过分劳累的，看看究竟是不是像格娄弗諾勋爵所說的那样。大会定于3点钟在瑟盆坦湖（海德公园里的一条小河）的右岸，在通向肯辛頓公园的路上举行。欢迎参加，并請携带妻子儿女，以便讓他們也能从‘上等階級’給他們树立的榜样中吸取教益！”

应当指出，正如巴黎人的朗香一样，海德公园瑟盆坦湖畔的馬路是英国 haute volée〔上层〕人士在下午，特別是在星期日炫耀自己的豪华的馬車和服飾的地方，他們带着大群僕役在这条馬路上昂首馳騁。从上述的宣傳品可以看出，反对僧侶主义的斗争，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严重斗争一样，同样具有穷人反对富人、人民反对貴族、“下层”階級反对“上层”階級的階級斗争的性质。

到那天下午3点钟，約有5万人聚集在指定的地点，即海德公

园瑟盆坦湖右岸的广阔的草地上。不久，由于左岸的人不断涌来，聚集的人数至少增加到了 20 万。可以看到，一小群一小群的人在挤来挤去。在场的大批警察显然企图剥夺大会组织者们的那件阿基米得为了扭转全球而要求的东西——立足点。终于，人数比较多的一群人守住了一块地方，宪章主义者**布莱**就在这群人中间的一小块较高的地方站了起来执行主席的任务。可是他刚开始讲话，警察局督察员班克斯就带领 40 名手里挥动着警棍的警察走过来，并向他们宣布，公园是**皇家的私产**，不准在这里开会。于是进行了工夫不大的 *pourparlers* [交涉]，布莱当时想证明公园是公共财产；班克斯对他說，按照上级的命令，如果布莱坚持自己的意图的话，就要把他逮捕起来。布莱随即在周围群众的愤怒的呼声中喊道：

“女王陛下的警察宣布海德公园是女王的私产，女王陛下不愿把自己的地方借给人民开会。那我们就到牛津市场去吧。”

人们一面讽刺地高喊：«God save the Queen!» [“愿上帝保佑女王！”]，一面散开，各自向牛津市场转移。可是在这时候，宪章派执行委员会¹⁹⁶的一个委员**芬伦**被挤到比较远的一棵树那里去了。跟在他后面的那些群众转眼间就把他紧密地围起来，以致警察也只得放弃了捉他的念头。

他说道：“一个星期有六天他们在压迫我们，而议会还要抢走我们在第七天所享有的一点点自由。寡头们、资本家们和翻白眼的牧师们一起昧着天良杀害人民的子弟，使人民的子弟在克里木惨遭牺牲，他们自己不去贖罪，却要我们替他们贖罪。”

现在，我们抛开这一群人，去看看另外的一群人吧。那里有一个演说者伸着两手倒在地上，就这样平卧着向听众讲话。忽然四

面发出了喊声：“到馬路上去，到馬車那儿去！”这时大家已經开始向馬車上的人和騎馬的人发出了侮辱性的嘲笑声。不断从城里获得增援的警察，赶走了在馬路上閑逛的人們。这样，他們就使得从阿普斯利大楼經罗敦路直到肯辛頓公园这段沿着瑟盆坦湖要走一刻多钟的道路上两边都密密麻麻地排滿了人。这些人大約有三分之二是工人，三分之一是資產階級人士，全都带着妻子和孩子。坐在高大而华丽的馬車上并由身穿制服的僕役前后呼拥着的、温文尔雅的女士們和紳士們、上下两院的議員們，以及葡萄酒喝得全身燥热的騎着馬的上了年紀的老爷們，这些不由自主的演員們，这一次却不能大摆闊綽勢派了。他們簡直就像穿过棒列似的。譏諷的、激憤的、侮辱的字眼（这种字眼在哪种語言里也沒有像在英語里这样丰富）立即像連珠炮似地从四面八方他們打来。由于这个音乐会是临时凑起来的，所以缺少乐器。因此合唱者們可以利用本身的可能条件而使演出只限于声乐。大声訕笑、发嘘声、呼哨声、嘶哑的叫喊、跺脚声、喃喃的埋怨、咆哮声、高声尖叫、呻吟声、呐喊、哭訴、咬牙切齿声，所有这些声音結合成一个什么样的恶魔的音乐会啊！这是一种足以使人发狂、使頑石点头的音乐。真正古英国式的幽默和压抑已久的狂怒奇特地混在一起爆发了。唯一可以听得清楚的喊声是：«Go to the church!»（“到教堂去！”）有一位女士为了使气氛緩和一下，很虔誠地从馬車里递出一本精装的 prayer book（祈禱书）来。千百个人的声音像霹雷一样地回答：«Give it to read to your horses!»（“叫你們的馬去讀吧！”）每当馬因受惊而直立或跑跳起来狂奔因而威胁着它們身上的文雅貨物的生命时，嘲笑声就来得更大、更猛、更无情。高貴的勛爵們和女士們，其中有格蘭維耳伯爵夫人，即大臣、樞密院院长的夫人，不得

不走下車來，用自己的兩條腿走路。當那些可敬的紳士們（他們穿的衣服，尤其是他們戴的寬邊帽子，就說明他們特別要裝出一副篤信宗教的樣子）騎着馬走過的時候，就像有人下了命令一樣，怒吼聲忽然變成了不可遏制的哄笑。這些紳士中間有一位忍無可忍了。他像靡菲斯特斐勒司一樣扮了一個鬼臉——向敵人吐舌頭。在路一邊有人喊道：「He is a word-catcher, a parliamentary man! He fights with his own weapons」（“這是個專門吹牛的傢伙，是議員，他用他自己的武器打仗！”）另一邊有人就回喊：「He is a Saint! He is psalm singing!」（“他是個聖者，他是唱聖詩的！”）這時候，通過市內電報通知了所有的警察派出所說海德公園發生暴動，命令他們立即開赴戰場。過了不多一會兒，就有一隊隊警察接連着從站在阿普斯利大樓到肯辛頓公園的馬路兩旁的人群中間開過，人們每次都用下面這首民間小調來迎接他們：

«Where are gone the geese?

Ask the police!»

（“要問鵝哪里去了？

那只有警察才知道！”）

這裡指的是不久以前一個警察在克勒肯威爾偷鵝那件遠近皆知的事情。這個場面繼續了三個鐘頭。只有英國人才能有這樣的本領。在人們大喊大叫時，在各個人群中都可以聽到：“這只是開始！”“這只是第一步！”“我們恨他們！”等等。在工人們的臉上可以看到憤怒的表情，而在資產者的臉上卻浮現出我們一次也還沒有見過的那種怡然自得的微笑。在快要結束的時候，示威者們的激憤情緒更加強烈了。他們揮舞起棍棒要打馬車，無休止的喧嘩匯合成一種喊聲：「You rascals!」（“你們這些壞蛋！”）在這三個鐘頭

里，积极的男女宪章主义者一直挤在人群中散发传单。传单上面用大字印着：

“重整宪章运动！” 兹定于下星期二，即6月26日在弗来尔街的文学科学研究会，在民法博士会館举行群众大会，选举参加首都的重整宪章运动会議的代表。自由入場。”

今天絕大多数的倫敦報紙关于海德公园的事件，只刊登了簡短的报道。除帕麦斯顿的“晨邮报”以外，沒有一家報紙对此事发表社論。

“晨邮报”写道：“在海德公园发生了最不成体統的、最危險的事情。这是公开侮辱法律、不顾臉面的举动，是用暴力非法干涉立法当局的自由活动。必須防止下星期日再度发生这种事情的危險。”

同时該报却又宣布“狂热的”格娄弗諾勋爵是这次騷动唯一“应負責任的”禍首，責备他引起了“人民的正当的憤懣”。好像議會沒有三讀通过格娄弗諾勋爵的法案似的！或者也許高貴的勋爵也“用暴力”影响了“立法当局的自由活动”吧？

卡·馬克思写于1855年6月25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55年6月28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295号

卡·馬克思 消息數則

倫敦 6 月 26 日。昨天在下院的會議上奧特韋先生站起來問道：

“帕麥斯頓勳爵是否打算採取某些措施以促使格婁弗諾勳爵撤回自己的 Sunday Trading Bill [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全場發出贊同的呼聲)

帕麥斯頓勳爵回答說：

“如果我的高貴的朋友〈格婁弗諾〉聽到了全場的這些贊同的呼聲，那末，我想他會重視這些呼聲的。”(表示贊同的呼聲)

顯然，海德公園的群眾示威吓壞了下院。下院拒絕了這個法案並且 *bonne mine à mauvais jeu* [強作歡顏]。“泰晤士報”把海德公園星期日的場面叫做“應得報應的偉大舉動”，把法案叫做“階級立法”的產物，“有組織的偽善手段”，並拿“議會的神學”來取樂。

關於漢格的暴行，海軍首席大臣查理·伍德爵士通知說，他收到了海軍上將鄧達斯的新的報告。從報告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被俄軍炮火擊斃的有 5 名水兵和 1 名芬蘭艦長，負傷被俘的有 4 名水兵和 2 名芬蘭人，無傷被俘的有 3 名軍官、4 名水兵和 2 名芬蘭人。海軍上將鄧達斯給赫爾辛福斯的省長去了一封信，信中說明了事實，並對射擊掛有白旗的船隻的暴行提出最堅決的抗議。

邓达斯得到了答复，省长在答复中表示道歉，并对已发生的事作了某种程度的辯白。他解釋說，据軍官和兵士們說，他們沒有看見白旗。他們曾經非常激怒，因为在其他一些情況下船只升起的是俄国旗帜；此外，報紙报道过英国船只为了測量海洋深度曾在別的地方用过白旗。这样一来，全部辯解都归結为俄国兵士和軍官們的眼睛近視。不管怎样，俄国兵士能讀报并且報紙的报告引起他們的“非常激怒”，这已經是文明的标志。

行政改革协会通知明天在德留黎棧召开新的群众大会。和从前一样——凭票入場，演讲人也是事先指定的。本丢·彼拉多問道：真理是什么？帕麦斯頓問道：功績是什么？行政改革派回答說：人的功績就是他一年的收入^①。根据这一点，我們的改革派在自己的組織內进行了改革。从前总委员会的委員們——实际上是自己选举自己的——表面上应由协会全体會員投票选出。而現在凡是每年向协会捐獻 50 或更多英鎊的人，都能自动地成为总委员会的委員。从前为了防止下层階級分子参加“运动”，加上 10 个基尼和 1 个基尼的附带条件就够了。現在 10 个基尼的先生已經不那么“受人尊敬”，而 1 个基尼的先生們就完全被看做 «mob» [“平民”] 了。在通知召开群众大会的宣傳品上明确地写着：

“仅凭发給协会会员的票入場。繳納 50 和更多英鎊者为总委员会委員，繳納 10 个基尼和 1 个基尼者为协会会员。”

由此可見，协会內會員的权利是按照基尼的調节制計算的。肆无忌惮地在宣揚着基尼的毫不掩飾的、赤裸裸的統治。西蒂区改革派泄露了自己的秘密。原来是这样的鼓动家！而且，最近的

① 双关語：«Verdienst»意思是“功績”，也是“收入”，“利潤”。——編者注

情况对他们并不十分有利。德拉蒙德在议会内公开责备他们“一贯不道德”和“贪污”。说明他们阶级纯洁性的例证就像是按照口令那样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起初“手术刀”（医学杂志）举出证明说：各种商品和食品的伪造和变坏决不只是小商人的罪过，批发商业公司通常也干这些事情。后来又听说，西蒂区的“受人尊敬的”公司发行了伪造的 dock warrants [船塢仓库证券]。最后是斯特兰、约翰·保罗爵士和贝茨的私人银行的大规模 fraudulente [预谋的] 倒闭，同时直接吞没了寄存的有价证券。最后这件事也教会了贵族要重视西蒂区先生们的“管理”天才，因为银行“管理”的首先是贵族们的基尼。帕麦斯顿受了损失，克兰里卡德侯爵受了损失，而纳皮尔海军上将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全部财产。教会也失去了不少的尘世的福利，因为斯特兰、保罗和贝茨等先生们特别以自己的虔诚出名，他们有时主持“向多神教徒传教”的埃克塞特会堂会议，他们是“圣经传播”协会的主要捐献人，并且担任了“罪犯改造协会”的理事。他们的信仰为他们创造了威望。他们的银行成为信教老爷们和私人团体特别喜欢的银行。但是，银行家们的“管理”天才对什么也不爱惜：既不爱惜孤儿寡妇的钱财，也不爱惜水兵们的微小的存款。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支配他们现在正向其伸手的“公款”呢？

Par excellence [主要是] 西蒂区改革派机关报的“每日新闻”忧郁地感叹道：“现在在我们中间正出现这样一些预兆，这些预兆表明不用花多少时间，就可以在工业阶级中举出一些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斯特兰之流的先生们的破产自然造成了公众对西蒂区私人银行出纳处的«run» [“挤兑”]。在这以前，这种私人银行比股份银行更具有不可比拟的威信。大的私人银行家已经意识到不能不“公

开鼓励”相互定期檢查寄存在他們那里的有价证券，也不得不通过“泰晤士报”邀請自己的賬戶来亲自檢查他們存放在銀行里的貴重物品。还有一个情况对西蒂区改革派先生們來說也极不凑巧：大家知道，西蒂区巨头之一路特希尔德正作为他們的当选人站在下院的門外，但是还没有被允許进入殿堂，因为他不願宣讀“真正基督徒的誓詞”¹⁹⁷，而他的同僚約翰·罗素勋爵不想“实现”关于犹太人的法案。因此，昨天邓科布发了言。在他知道根据 1782 年議會法令，每一个当选后同政府訂立任何供应合同的議員都要被褫夺在下院的席位，以及不久前路特希尔德給国庫提供了 1 600 万英鎊的貸款后，他声称明天晚上他要提出关于在西蒂区进行新选举的目的的提案。不但如此。馬林斯接着邓科布发言，他对林賽提出类似的提案，因为在辯論改革問題时，查理·伍德爵士曾公开指責林賽同政府訂立了船只供应合同，可是林賽过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議員。这整个事件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是因为像西蒂区的巨头和改革派当中的巨头这样一些人物被弄得身敗名裂。它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它提醒公众：藐視 1782 年法令的皮特、派西沃和利物浦正是通过西蒂区最显赫的生意人，即通过一些同政府訂立貸款和供应合同的人士为自己在議會內外找到了支持。这批金融貴族——在当时，比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更为卖身投靠——曾是反雅各宾战争的灵魂。財政寡头們一方面摘下了赫斯貝里德姊妹的金苹果，同时在西蒂区的臭名昭彰的群众大会上劝說，全国人民

“要献出金錢和鮮血，以便把我們神圣宗教的极美好的安宁生活从褻瀆教堂的法国人的手中拯救出来，把自己从无神論的悲观絕望中拯救出来”。

因此，使全国人民在最不适当的时候想起了：現在起来反对寡

头政治的西蒂区恰好就是这个寡头政治賴以生长和开出絢烂花朵的苗圃。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26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6 月 29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297 号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¹⁹⁸

出乎人們意料之外，昨天早晨“太平洋号”輪船带来的邮件中沒有关于6月18日联軍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敗北的詳細报告。誠然，我們有几篇談及这次行动中死伤人数的貧乏的报道，这在下面将要簡略地提到。大家所期待的报道沒有送到，最后，送来了佩利西埃將軍关于攻占馬美朗和采石場的詳細报告。不过就連这份报告也沒有清楚地說明这位实际上在克里木指揮着20万联軍的人物所遵循的作战計劃。如果我們想就这个問題得出什么結論，那末我們与其依靠正面的材料，倒不如依靠反面的材料。要判断佩利西埃准备怎样行动，主要的应当不是去分析他在干什么，而是分析他不干什么。但是，我們想再談談攻占馬美朗的情况；这一行动的某些特点值得加以分析。

6月6日和7日，联軍的炮队对全綫进行了轰击。这次轰击在左翼（自馬奇塔棱堡至卡兰亭棱堡）仅是虛張声势，而在右翼（自大凸角堡至薩蓬山）則是認真进行的。这里俄軍的外圍工事受到特別猛烈的轰击。6月7日傍晚，当看来俄軍炮台的火力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压制下去，而炮台的防守者也被大大削弱时，曾下达了强攻的命令。法軍应以猛攻夺取两个互不相連的陣地；它們是被一条山谷隔开的两个台地；英軍則应夺取兩側都是山谷的一个台

地。两支军队在准备强攻时采用的方法反映了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传统。法军派出了四个师，每两个师强攻一个阵地。这样，就为强攻馬美朗（堪察加多面堡）集中了两个师，又为强攻薩蓬山集中了另两个师。而且每个方向上的第一梯队都有编成强攻纵队的两个旅，另两个旅作为预备队。由此可见，担任强攻的有 18 个营，又有同等数量的营作为预备队，两者合计至少有 28 000—30 000 人。这种战斗队形完全符合法军的操典和传统，因为他们在进行大规模的攻击时总是列成纵队，有时似乎是过于庞大的纵队。英军如果以同样的战斗队形来完成他们的任务，那就需要两个师：以两个旅进行强攻，两个旅作为预备队。然而，他们却按照自己的战术原则，派出了 1 000 人左右担任强攻，这大致相当于两个营，也就是说，几乎还不到法军半个旅的兵力。毫无疑问，他们有强大的预备队；然而，在法军要用三个人的地方，英军却只用一个人。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军用横队的而不用纵队的进攻方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英国兵在防御阵地上具有高度的顽强精神。应当指出，甚至这 1 000 名英国兵也不是一下子都投入战斗的，而是先用 200 人进行攻击，以强攻夺取了俄军的工事，然后再派出 200 人前往增援，其余的兵士也都是这样投入战斗的。在这以后，所有 1 000 名英国兵都在俄军阵地上巩固下来，扼守住了这些阵地，在俄军工事的不间断的正面射击和纵射之下连续击退了六次攻击。到拂晓，英军伤亡过半；但他们守住了阵地，而且个别小股英军在追击俄军时甚至冲进了大凸角堡。1 000 名法国兵永远也不会取得这样的战果。英国兵在敌人火力下表现出的那种镇静沉着的精神几乎是无限度的；像那天夜晚那样，当白刃格斗使英国兵想起他们最喜爱的消遣——街头打架时，他们就感到是在自由的天地里，就毫无惧色

地、如醉如狂地一个人和六个人对打起来。

佩利西埃將軍在談到法軍攻击的情况时，給我們詳細地叙述了参加攻击的各旅和各团的情况，并对每个部队都用了褒奖的詞句；但是他对每个纵队的出发地区和攻击綫却說得极不明确，对战斗过程也写得非常含糊，而且在他的报告里根本没有提到損失的数字。把这份官方报告同其他报道对照一下，我們便可得出結論：法軍在第一次攻击时就夺取了馬美朗，把退却的俄軍一直追到馬拉霍夫岡，并在某处冲进了这个棱堡，但被俄軍逐出；接着法軍又失去了馬美朗，成半圓形臥倒在它的周圍，終于，在第二次攻击后又将它占領。而基連谷另一面的沃倫多面堡，法軍未受重大損失就把它占領了；爭夺这个多面堡后面的色楞格多面堡的战斗虽較为激烈，但远不能同爭夺馬美朗的战斗相比。由于佩利西埃派往攻击地点的部队人数众多，而且显然又是列成龐大的纵队，因此法軍的損失一定很大。官方沒有公布損失数字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依我們看来，如果把这次的損失估計为 1 500—2 000 人，也并不夸大。

至于說到俄軍，他們的处境是困难的。他們不能派遣大量的兵士到外圍工事去，因为那样必定会使一部分俄軍还在强攻开始之前就被敌人的炮火歼灭。因此，他們在这几个多面堡里只能保留最低数量的守軍，而且必須依靠馬拉霍夫岡和大凸角堡上控制周圍地区的炮兵的火力，以及依靠配置在要塞內的預备队的行动。在馬美朗，他們有两个营，約 800 人。但是在这些多面堡被敌人攻占以后，俄軍就不能把它們夺回来并在里面很好地巩固下来。他們懂得，被圍攻的軍隊失去一个陣地可能很快，但要再把它夺回来就不那么簡單了。此外，馬美朗多面堡构筑得如此复杂（堡內的橫

牆和避彈所构成了某种临时的穹窿),以致堡內的守軍即使能极好地躲避敌人的炮击,但在敌人强攻时却几乎束手无策,因为每个隔間只能勉强容納火炮和炮手。因此火炮从炮架上一卸下来,那些应在强攻时防守工事的步兵,就沒有足够的地方用作射击位置来对强攻纵队同时进行猛烈的密集射击了。这些步兵由于分散成小队,因此經受不住强攻者的猛攻。他們又一次证明:当俄国步兵不能用大量兵力作战时,在行动的迅速和机动灵活方面便不如法軍,而且也沒有英軍那种死咬住不放的精神。

在6月7日的战斗以后,平靜了10天。在这段時間里,联軍的塹壕和交通壕已經挖好,炮队的陣地已經选好,火炮和彈药都已运到。同时联軍向腹地派出了两支偵察队。派往拜达尔(位于通往南海岸的道路上,距巴拉克拉瓦12英里)的一支偵察队只进行了試探性的偵察。派往艾托多尔(位于靠黑河的乔尔貢以东6英里处)的另一支偵察队則派到了需要的方向。艾托多尔位于通往貝尔貝克河上游盆地的高地上,要知道,正像我們早已指出的^①,只有經過这条路才能真正迂迴因克尔芒附近的俄軍陣地。但是仅向那里派出一个偵察纵队,而不紧接着以强大的兵力去占領这一地区,也不立即开始战斗行动,这只意味着向敌人指出危險的方向,使他預有戒备。当然,艾托多尔周圍的地形可能是难以通行的,但是我們对这点有怀疑;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联軍所采取的机动也过于明显地暴露了从翼側迂迴敌人的意图。如果这次側敌行軍可以作为吸引敌人注意力的佯动,那才可能是完全适当的,但是我們确信,这次行軍是主要的行动,因此,联軍不应当在真正

^① 見本卷第259—263頁。——編者注

着手执行这样的计划以前就把它暴露出来。

可是佩利西埃将军不去扩大这些小规模机动，却采取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行动。6月18日，滑铁卢会战纪念日那天，英军和法军一起在右翼对俄军阵地发起了强攻，英军攻击大凸角堡，法军攻击马拉霍夫冈。他们本来打算这样来为滑铁卢会战雪耻，但是遗憾得很，进攻没有成功。联军被击退，损失很大。官方公布这次伤亡约5000人，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法国的官方报道一向是不真实的，因此不得不再增加百分之五十。因为还没有详细的材料，我们暂时还不能谈论这次会战的战术特点。现在要研究的只是这次会战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

欧洲的所有报刊都把佩利西埃描写成一个无法从巴黎用电报加以指挥的、独断独行的人物。但是我们理由怀疑他是否真正具有这种独特的固执性格。他企图以法军和英军的共同胜利来“真正地”为滑铁卢会战雪耻，就完全证实我们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这样的想法只能出自法国的皇帝陛下——这个迷信节日的人，这个每逢12月2日一定要竭力设法用某些不寻常的举动来表示庆祝的人，这个曾经在贵族院宣布过为滑铁卢会战雪耻是他的特殊使命的人。毫无疑问，佩利西埃曾收到必须隆重纪念滑铁卢会战的最严格的命令。他本人所负的责任，只是用什么方式来纪念它而已。

对军港区防线的强攻，应当认为是错误，这一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深信不疑。但目前我们还没有彻底了解佩利西埃，因此我们仍试图为他所有的那些在离开战区这样遥远的地方都会使人发生疑问的做法寻找辩护的理由。也许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的卫生状况（关于这一情况我们早就提请读者注意）使他很希望赶快结束在这一小块土地上的行动。25000具腐烂的人尸和1万具马尸

发出的恶臭,在夏季对于兵士的健康有严重的危害。关于他们在那里必然会碰到的另一些可怕的现象,我们准备谈了。显然,佩利西埃认为可以在短时间内把俄军逐出南区,并将要塞彻底摧毁,只留下少数人在那里防守,然后以强大的部队开始野战。我们作出这样的假定,是因为想从这位老兵的行动中找出哪怕是稍许合理的动机。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就说明他对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力量估计不足。我们曾经谈过,想扩大6月7日的战果并开始对塞瓦斯托波尔城市本身进行强攻的任何企图,都一定会遭到失败;①我们的意见被战事证实了。我们曾经指出过,塞瓦斯托波尔的锁钥是因克尔芒以北地区;依我们看来,6月18日的会战就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愿意承认,佩利西埃将军宁愿强攻军港区而不愿进行野战,是以完全合乎逻辑的想法作根据的;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在战区的人们往往喜欢把一些次要的事实作为自己的结论的根据,而佩利西埃正像6月18日的失败所表明的那样,显然是受了这一弱点的影响。诚然,固执地力求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这是毅力的表现,但如果只是由于事情已经开始就要勉强地继续下去,即使是潦草地进行下去,这也同时说明了缺少理智。佩利西埃无论如何都要攻下塞瓦斯托波尔,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他看不到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捷径是经过因克尔芒和防守该地的俄军阵地,那末他无疑是错了。

如果联军不注意立即利用自己的优势,那末他们很快就会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俄国早就认为必须增加克里木的兵力。现在由于补充了正规军的各后备营,征集了非常后备军并用以组成了

① 见本卷第324—325页。——编者注

200个营，特别是由于奥地利的监视军已缩减到18万人（其余的或者已归休，或者已调驻帝国内地），俄国就有了这种可能性。结果是在敖德萨建立了一个预备军团，其中一部分约为25000人，据说驻扎在尼古拉也夫附近，距塞瓦斯托波尔约12—15天行程。还有人說，两个掷弹兵师已由沃伦出发。因此到7月中旬，也可能更早一些，俄军就能够重新恢复数量上的优势，只要在这段时间内同联军对抗的俄军不遭到决定性的失败。诚然，据报道又有5万名法军正在开往土伦和马赛途中，准备在那里登舰，但是毫无疑问，等他们到达就已经太晚了，他们除了用来弥补由于战斗和目前联军兵营里再度发生的疾病所造成的损失以外，未必能够用来解决什么问题。

阿速夫海上的行动虽然破坏了俄军的一条供应线，但是由于德涅泊河是一条比顿河重要得多的俄国产粮区的天然水路交通命脉，因此毫无疑问，在赫尔松会有很多粮食，比克里木俄军所需要的还要多。由赫尔松不费太大的力气就可以把粮食运到辛费罗波尔。因此谁期望阿速夫海的远征会立刻严重地影响塞瓦斯托波尔的粮食供应，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久前向联军一方倾斜的天平可能又要恢复平衡状态了，甚至还可能向他们的对方倾斜。如果俄军行动迅速，克里木战局就决不能认为已成定局。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6月29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7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39号，并载于1855年7月2日“新奥得报”第30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根据“新奥得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消息數則

倫敦 6 月 30 日。由于格娄弗諾勋爵拒絕自动撤回他的 Sunday Trading Bill [禁止星期日交易的法案]，所以今天倫敦最繁华的街道上出現了号召参加明天下午在海德公园举行的新的大規模游行示威的宣傳品。当格娄弗諾問道：大多数議員意見的突然改变是不是由于海德公园的 mob [平民] 的行动引起的，下院和藹地回答 No! No! [不是! 不是!] 下院的这种行为是相当幼稚的。

在回答一位托利党貴族的質問时，潘繆尔順便提到：大臣們以女王的名义向軍隊发出了一項文告，文告宣布决定大大增加某些軍和团（正在克里木战区的軍和团）的薪餉，不仅包括他們現在服役期間的薪餉，而且包括过去数月的薪餉，同时退休金也要增加。这件事現在仅是以女王的名义宣布的；虽然这时下院正在开会，但是大臣們什么也沒有通知它。这样，大臣們便把按照宪法規定仅仅屬於下院的权利——确定軍隊薪餉数額的权利攬为己有。不过，再过几个星期或几天，大臣們还得在下院出面，以便取得对所許諾的增餉的批准。但是文告走在議會表決的前面。如果議院拒絕增餉要求，那末它就会同軍隊发生冲突。对罗巴克委员会关于內閣要对軍隊所受的灾难負責的結論的回答就是如此。这是根据阿尔伯特亲王指示的方針中所采取的步骤之一。

昨天在下院二讀通过的**包法利法案**，对英国的商业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英国，到目前为止，凡是获得貿易公司一份利潤的人，都算作股东，因此，他以他的**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商业債務負責。按照包法利代表內閣提出的法案，这种法律規定就应当廢除。更为重要的是包法利关于**股份公司**的法案。到現時为止，这种公司的每个成員不仅对他的**股票总值負責**，而且也以他的**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全部債務負責**。按照所提的法案之一規定，責任的大小以各个股东的股票总值为限，但是这只是在那些全部資本最少为2万英鎊，开业合同由股金不少于15 000英鎊的股东签字，而且股金的已付部分又不少于資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的公司中才是这样。需要这类法律这件事本身就已經說明，到目前为止財政寡头已經把立法权操纵到了什么程度，財政寡头又怎样成功地在世界上头等商业国家里使貿易协定受到最荒誕和最放肆的法律限制。新法案希望实现“使劳动和小資本跟大資本处于同等地位(在商业法中)”的原則。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呢？用这种方法：少于2万英鎊的股本不再享受法律規定的优惠，而繼續受到过去的限制。大資本不願滿足于它用来打敗小資本家竞争的經濟手段中的优势，在英国大資本也采取了各种法律上的特权和各种特別法，这些事实，从英国的有关股份公司和一般貿易公司的法律上得到了最雄辯的证明。例如几年以前，还規定銀行不得拥有6个以上的股东。过了很長時間，股份公司才取得了起訴和代表董事会在法庭上答辯的权利。但是为了利用这项特权，它們应当进行登記，也就是进行合并，可是按照1837年的法律，合并是要由王权根据 Board of Trade [貿易部] 的呈报来实现的；因此，某一公司能否合并实际上是听凭于 Board of Trade 是否大发慈悲。銀行、慈善协会、互助会

等絲毫不受新法律的影响。

今天一家日报引证了以下一項議會統計数字：一共有 327 个选区。其中受資本巨头控制的情况是：有 1 个資本巨头控制 9 个选区，有 4 个資本巨头各控制 8 个选区，有 1 个資本巨头控制 7 个选区，有 3 个資本巨头各控制 6 个选区，有 8 个資本巨头各控制 5 个选区，有 26 个資本巨头各控制 4 个选区，有 29 个資本巨头各控制 3 个选区；因此 72 个資本巨头控制着 297 个选区。所謂“独立的”选区仅仅 30 个。下院总共有 654 个議員，其中 594 个議員是由 297 个受控制的选区选出来的。这 594 名議員中有 274 名不是貴族的直系亲屬，就是貴族。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30 日

載于 1855 年 7 月 3 日

“新奧得报”第 30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关于更严格地遵守星期日例假制的 法案所引起的風潮

倫敦 7 月 2 日。反对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的示威昨天又在海德公园重演了；这次規模更大，情况更危險，后果也更严重。今天籠罩着倫敦的阴沉而激动的气氛就证明了这一点。

号召大家再度举行群众大会的宣傳品同时还邀請大家在星期日上午 10 点钟到虔誠的格娄弗諾勋爵的公館門前集合，并且伴送他到教堂里去。可是这位虔誠的紳士在星期六晚上就离开了倫敦，他乘着遮掩好的馬車，不給人知道就偷偷地跑了。他在倫敦所有报纸上发表的那項声明中，一方面坚持他的法案，另一方面却极力证明这个法案毫无意义、毫无目的、毫不重要，这就說明他很会想办法使別人替自己成为殉教者。星期日一整天他的公館都布滿了人——不过不是唱圣詩的，而是 200 名警察。他的兄弟、有名的富豪韦斯明斯特侯爵的公館也布滿了警察。

星期六，倫敦警察局长理查·梅恩爵士在倫敦街上貼出布告，不但“禁止”在海德公园开大会，而且还不准在那里“成群結队”，不准以任何方式表示贊同或反对。这个命令引起了这样的結果：連警察局的报告也承认，早在两点半钟，公园里就已經有 15 万不同阶层、不同年齡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而且人越来越多，多到連倫

敦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程度。倫敦人不仅大批前来，而且又在瑟盆坦湖畔的馬路两边排列开来，这次比上星期日排得更密更寬了。只是 *haute volée* [上层人士] 沒有在場。馬車大概一共有 20 輛，多半是小的双輪輕便馬車和四輪敞篷馬車，这些馬車走过的时候沒有遇到什么阻碍，然而比較华丽、車身比較寬大、駕馭台很高、扎有金銀色緋帶的馬車經過时則遇到了和上次一样的接待和雷鳴般的吼声，这次轰隆的吼声把周圍一里以內的地方都震动了。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就在群众大会和成千上万的人的叫喊声中被取消了。*Haute volée* 沒有上戰場；他們不在，也就等于承认了 *vox populi* [人民的呼声] 压倒一切。

已經到 4 点钟了，示威由于缺少对象，看来变成了不会得罪人的星期日的游逛。可是警察們的估計却不是这样。难道警察們会遺憾地以告別的目光望着自己貼在公园入口处的大字布告，在人們的大笑声中撤走嗎？况且警察局的长官們都在場：騎着馬的有理查·梅恩爵士、警察局監督員吉卜斯和沃克，步行的有督察員班克斯、德尔金、伯萊南。800 个警察作了战略性的分散，大部分隱蔽在建筑物里，埋伏以待。更强的小队則布置在附近作为后备。瑟盆坦湖畔的馬路和通向肯辛頓公园的林蔭道相交地方的公园管理处、火药庫、救护站，都变成了有强大的警察队伍守卫着的临时防舍，用来收容被捕者和受伤者。在皮卡第萊区的外恩街警察派出所附近，停了很多車輛，准备派赴戰場把抓到的人稳稳当当地押回来。簡而言之，警察局拟定了这样一个作战計劃，如“泰晤士报”所說的，根据这个計劃要进行一場比“我們在克里木听到的任何作战計劃”所要进行的都更“激烈的战斗”。警察們需要把人們打得头破血流，需要抓人，为的是使自己不至于連轉臉的余地都沒有就一

下子由耀武揚威的样子落到滑稽可笑的地步。于是，当路旁的人流刚刚稀疏了一些，人群刚刚向离馬路較远的公园的辽阔的空地一堆一堆地散开的时候，警长們就騎着馬跑到路中央，夹在两旁的人群中間，左右顾盼地以挑衅的口吻发号施令，好像是为了保护来往的馬車和騎馬的人。可是因为既沒有馬車也沒有騎馬的人过来，也就沒有人可保护，于是警察們就开始在“虛假的借口”下从人群中拖出一些人来，把他們当做 pickpockets (扒手) 而加以逮捕。当这种把戏耍多了，这种借口失效了的时候，人們发出了怒吼。这时警察的队伍就从埋伏的地方跑出来，揮动警棍向人群打来，直把人們打得头破血流，同时还从人群中拉出一些人来，把他們拖到临时防舍去(这样总共逮捕了 104 人)。馬路的左边和瑟盆坦湖只隔着一条狹窄的地段。一个警官带着一帮警察巧妙地把看熱鬧的人們赶到湖边，要把他們赶下湖去洗个冷水澡。有一个人为了免吃警棍，就泅水游到瑟盆坦湖对岸，可是一个警察坐了小船去追他，得意洋洋地把他捉了回来。

今天的場面和上星期日比起来，具有多么不同的特点啊！今天看到的不是富丽堂皇的馬車，而是骯髒的馬車，这些車輛一直在从外恩街警察派出所到海德公园的临时牢房之間的道路往返奔馳。坐在駕馭台上的不是僕役，而是警察和喝得醉熏熏的馬車夫。車里坐的不是温文尔雅先生們和女士們，而是被那些穿着倫敦警察制服的爱尔兰流氓无产者中的形迹可疑的家伙押着的头破血流、头发松乱、衣服撕得稀烂、赤身露体的被捕的人。今天已看不到輕揮羽扇，却只听到包着皮子的警棍(所謂警察的 «truncheon») 的呼嘯声。統治階級上星期日摆出了上流社会人士的面孔，这一次則摆出了国家执政者的面孔。在滿面堆笑的老紳士、花花公子、

显貴的高齡寡妇背后，在用开司米披肩、鸵鳥羽毛、花环、钻石打扮起来的香气四溢的美人背后，站着身穿雨衣、头戴亮光光的油布帽、手持 truncheon 的警察。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上星期日群众碰到的統治阶级是統治阶级的个别代表人物。今天这些阶级是以国家政权、法律、truncheon 的形式出现的，这一次反抗它们，就意味着造反。而在英国人造反之前是必須长期地逐漸地把他們鼓动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示威者的反抗一般只限于：对警車发嘘声、叫罵和嘲笑，作一些想解救被捕者的有气无力的尝试、而主要是进行一些消极抵抗和冷淡地守卫着陣地。

值得注意的是兵士在这些場面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兵士有的屬於近卫軍，有的屬於第六十六团。他們来的人很多。其中有12个是近卫軍战士，有的胸前还佩戴着克里木奖章，他們都站在一群正在挨警棍的男女老少的中間。一个上了年紀的人經不住毆打，倒在地上了。一位克里木英雄喊道：“倫敦的 stiffstuffs（罵警察的綽号）比因克尔芒的俄国人还厉害！”警察想要抓他，可是群众高喊“軍队万岁！”警察也就立刻住了手。警察見势不妙，轉身想溜走。这时来了一些擲彈兵，兵士們排成了队伍，在群众前呼后拥之下，挑衅地在公园里走来走去，高呼：“軍队万岁！打倒警察！打倒星期日法案！”警察們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来了一个近卫軍軍士；他大声斥責警察們的粗野行为，使兵士們平息了下来，并劝說一些兵士跟他一起回兵营去，以免发生更严重的冲突。可是大多数的兵士却仍旧站在人群中，对着警察尽情地发泄自己的憤懣。英国的軍队和警察之間很早以来就存在着对抗，而現在，当軍队成了人民群众的«pet child»（寵儿）的时候，这种对抗就更不可能减弱了。

据說，一个姓罗素的老人今天因受伤而死去了。还有六个受

伤的人躺在圣乔治医院里。示威的时候，人們曾經试图在各个地方分别举行群众大会。在阿尔伯特門附近，即在公园里警察最初所占的那块地方的外面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有个不知名的人向群众发表了演說，內容大致如下：

“古老的英国的人們！醒来吧，从你們的睡梦中清醒过来吧，否則你們将永远倒下了。每个星期日都来和政府对抗吧！都来示威，反对教会法案，就像今天你們所做的那样！不要怕要求本来屬於你們的那些权利，掙脫寡头政治的压迫和暴力的鎖鏈。不这样做，你們就一定会被压死的。文明世界中的这个最大的首都的居民，竟让一个叫什么格娄弗諾勋爵或埃布林頓勋爵来保护自己的自由，难道这不可耻嗎！勋爵閣下认为必須把我們赶进教堂，并通过議會立法强迫我們信教。枉費心机！我們是誰？他們是誰？看看現在的战争吧！难道这个战争不是依靠从事生产的階級，依靠他們的流血牺牲来进行的嗎？而不事生产的階級干些什么呢？他們就只能把事情搞坏。”

当然，这位讲演人的讲演和大会本身都被警察打断了。

在格林威治，在天文台附近倫敦人也組織了群众大会，参加群众大会的有 10 000 到 15 000 人。这个大会也被警察驅散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7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7 月 5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307 号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人民同警察的冲突。——論 克里木事件¹⁹⁹

倫敦7月6日。从星期一到昨天晚間，倫敦的警察同«mob»〔“平民”〕发生了一連串的冲突，前者用警棍进攻，后者用石头还击。在馬尔波罗街及其附近的街道上，我們看到了使我們生动地想起巴黎情景的一些場面。昨天晚間邓科布在下院提出了調查上星期日警察的“卑鄙殘酷”行为的提案。群众准备后天到派尔·麦尔²⁰⁰的俱乐部去。宪章派打算組織一次从黑袍僧桥到海德公园的武装的（不是用刀枪武装，而是用工具和木棍武装）游行，要打着旗帜，喊着«No Mayne law»（“廢除梅恩法”）的口号（宪章派有意赋予这个口号以双重意思。大家知道，Maine law 是美国清教徒关于禁止飲用酒类的法規名称，而 Mayne 是倫敦警察局长的姓）。从过去的报道^①中可以看出，海德公园里的群众性示威是自发地发生的。由于警察局的挑衅性的粗暴行为，風潮后来就扩大和加剧了，而警察局长理查·梅恩爵士也就显示了他对得自巴黎的勳章是受之无愧的。然而，現在已經可以識別那些为了达到自己的进一步的目的地而竭力想激发、領導和利用群众运动的各个派別了。

① 見本卷第 363—369、385—389 頁。——編者注

这些派别如下：

首先是政府本身。在波拿巴逗留倫敦期間，所有反对他的標語和漫画好像变戏法一样都从墙上消失了。可是現在警察局又让那些最激烈的宣傳品挂在墙上。一切都表明了正在策划着一个密謀：警察們的暴命的粗暴，律師們在馬尔波罗街法庭上为政府辯护的挑衅性的辯詞，違法地使囚犯踩 Treadmill²⁰¹，官方報紙的帶侮辱性的語調，閣員們在議會內的吞吞吐吐的发言。也許，帕麦斯頓需要一个小規模的 coup d'état [政变] 以保持自己的內閣？或者他需要一个內部的大混乱以轉移大家对克里木的注意？我們知道这位过于自信的国家活动家善于以表面的輕率来掩盖他的深奥而冷靜的打算，因此我們认为他像哈巴谷式的伏尔泰那样是一个 «capable de tout» [“什么都能干的人”]。

其次是行政改革协会派。他們竭力利用群众运动，一方面是为了吓唬貴族，一方面是把群众运动当做自己爭取声誉的手段。因此，巴兰坦曾經代表他們并为了他們的利益而作为上星期日被捕者的辯护人在馬尔波罗街的 Police-Court [治安法庭] 上說了話。因此，行政改革派昨天还为所有犯人偿付了罰金，贖出了他們。因此，他們的報紙既保护 «mob» (就像政府報紙“地球报”那样称呼人民)，又攻击警察局和內閣。

第三是宪章派。他們的目的是大家都知道的。

有关 6 月 18 日进攻失利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消息終於公布了。官方电文的发表推迟了几天，当然并不是沒有原因的。毫無疑問，6 月 18 日事件是在东方問題上經常发生的那些荒唐和錯誤的最完善的典型。

法軍的前进塹壕距离俄軍炮台 400—500 碼，英軍的前进塹壕

距离俄軍炮台 500—700 碼。这恰好是进攻纵队在强攻时暴露在俄軍炮火下而自己又无炮火支援的情况下所必須跑过的距离；在快跑时，任何像样的战斗队形都免不了会被打乱，部队在 3—5 分钟內遭到敌人步枪的射击（而这段时间是足以使他們完全瓦解的），便会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仅仅这一事实就說明了整个进攻計劃的特点。本应当一开始就**完全**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并用不断的曲射火力**有效地**阻碍敌人在其工事內集結大量部队——不这样就毫无成功的希望。

俄軍似乎識破了联軍的計劃，如果他們不是像佩利西埃所认为的那樣，事先就得到了关于联軍計劃的情报的話。6 月 17 日他們仅仅用微弱的火力回击联軍的炮火，白天把自己的火炮掩蔽在胸牆內，采取了在他們第二天抵抗攻击时几乎毫无必要的預防措施。但一夜之內火炮便移到了自己的陣地，調来进行防御的各个纵队和預备队也都占据了自已的崗位。

佩利西埃和腊格倫之間商定的最初的計劃是：6 月 18 日拂曉恢复炮击，并在数小时內全力射击，然后以七个纵队突然和同时开始强攻。一个纵队（法国纵队）进攻基連谷附近的棱堡，两个纵队（法国纵队）进攻馬拉霍夫岡，三个纵队（英国纵队）进攻大凸角堡和一个纵队（英国纵队）进攻大凸角堡和內港末端之間的一片房屋和墓地。既然原就打算进行强攻，那末这个計劃是十分明智的。計劃如果实现，俄軍的火力就会被压制下去，俄軍为了进行防御而集結的部队也会在进攻开始以前就被击潰。另一方面，联軍部队在塹壕內集結时也必然会因俄軍的射击而遭受損失，而且防御者大概也会很快发现用来向他們的陣地进行白刃冲击的纵队。但这是最小的灾难。尽管有着这些缺点，最初的計劃仍不失为当时条

件下的最好的計劃。至于这个計劃怎样被破坏，佩利西埃对月桂冠的期望怎样落空，联軍怎样不得不在复辟帝国之鷹的庇护下經歷“步兵的巴拉克拉瓦”——所有这些我們明天再談。

今年的夏天好像会給“圣徒們”带来严重的考驗。倫敦的第一个銀行家、教友派的著名首脑、既篤信宗教又同样富有的葛尼（本生的儿子娶了他的女儿为妻）好像由于在斯特倫德的預謀的破产而名誉扫地了。他知道斯特兰商行倒閉了，但是又給它貼現了37 000 英鎊的期票，从而使这家商行能够再哄騙公众达数月之久，而自己也能毫无所失地摆脱困境。尘世的报刊因为上帝的选民也不是渾身清白而正在幸災乐禍。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7月6日左右
載于1855年7月9日“新奧得报”
第313号，并作为社論載于1855年
7月2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44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并根据
“紐約每日論壇报”校对过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六月十八日的强攻

倫敦7月7日。昨天我們分析了聯軍6月18日强攻的最初計劃。6月17日夜晚，佩利西埃获悉俄軍企图在次日对馬美朗发起新的大規模进攻。本来，佩利西埃应当把这看成是真正的幸事，因为馬美朗的防御无疑能够經得住俄軍可能派来的任何兵力的猛攻。否則，馬美朗（現名布兰西昂多面堡）还怎么能成为强攻馬拉霍夫岡的作战基地呢？因此，俄軍在进攻馬美朗失敗后，就必然要很不幸地接着进行一次防守馬拉霍夫岡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聯軍对这一陣地进攻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可是佩利西埃却另有考虑。他在深夜撤銷了炮击的命令，确定清晨3点钟进行强攻。强攻的信号是三发信号彈。关于命令变动的情形也通知了英軍。

整个这次行动以其应有的結局而告終，这完全符合拿破侖——真拿破侖对那些优柔寡断、庸碌无能的將軍們一生的活动所說的一句名言：«Ordre, Contreordre, Désordre» [“朝令夕改，一片混乱”]。在規定的時間前半小時，右翼上最靠边的法軍纵队已經进入战斗。它究竟是被俄軍的假出击拖入战斗的，还是像佩利西埃所断定的那样，是由于一位將軍把法軍的爆炸彈看成了信号彈而进入战斗的，現在还不十分清楚。但不管怎样，佩利西埃

被迫提前发出了进攻信号，而那些还正在塹壕里寻找指定地段的纵队，只好在有一半人处于混乱状态和一部分人不是从指定的出发地点出发的情况下开始进攻。原定从翼侧迂迴馬拉霍夫岡的法軍的中央纵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突入了俄軍的工事；可是另外两个纵队却未能冒着雨点般的霰彈和枪彈冲进去。每一个纵队由一个旅（四个营）組成；每个师的另一个旅作为第二綫部队，而近卫軍則組成总預备队。可見司令官掌握的兵力約为四个师，即两万人。第二綫的部队曾被用来支援最初的攻击，但未成功。最后，近卫部队也投入了战斗，但同样受阻，接着也被击退。这时司令官手里只剩下了两个营。時間已經是8点半了。組成中央纵队的那个旅突入俄軍的工事，但是被赶了出来。在所有的地方法軍都被击退，損失惨重，而手边又沒有生力軍。英軍的进攻同样沒有成功。于是佩利西埃下令退却，按他的說法，退却进行得“頗为体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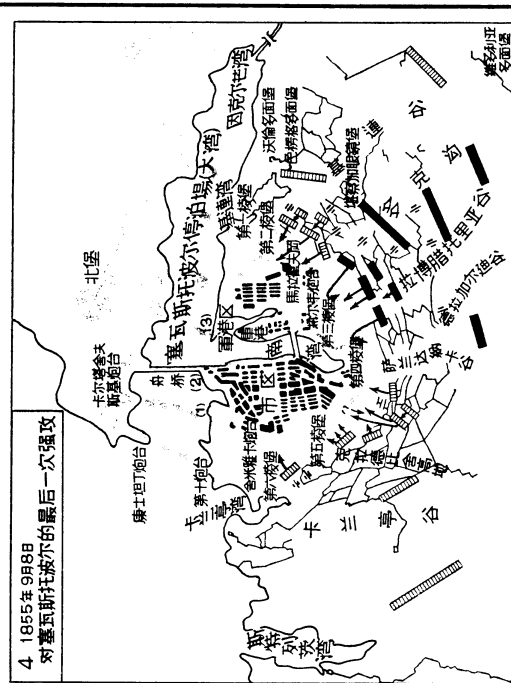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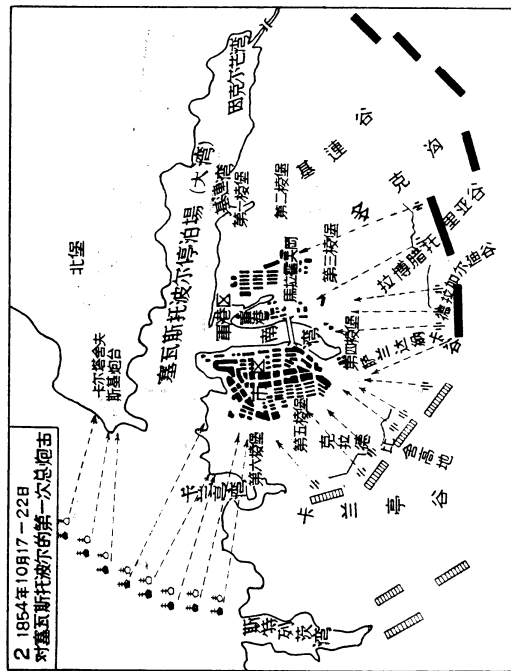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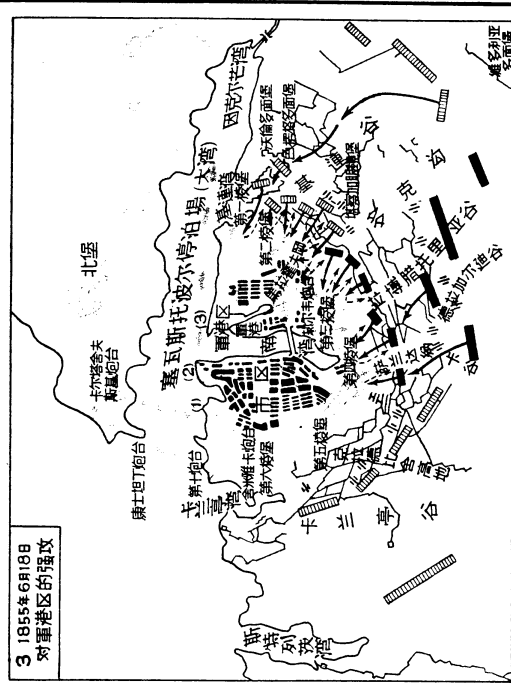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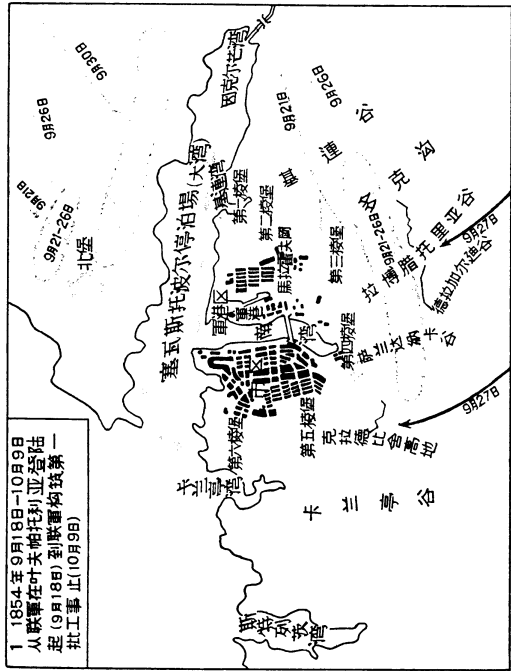
在英軍的攻击地段上，每一个先头纵队只有1800人，比法軍的每个先头纵队少1000人。这1800人当中，1000人用于战斗，其余的800人則用来完成各种必要的作业。每旅派出先头纵队后余下的1200—1400人配置在先头纵队后面作为第二綫部队。每个师的另一个旅則配置在前一个旅后面作为第三綫部队。最后，由近卫部队和苏格兰高地部队（第一师）組成总預备队。可見，集中在作战地区的英国步兵的总数中，只有7200人准备用来投入最初的攻击，而其中只有4000人能真正参加战斗。先头纵队的人数所以这样少，一方面是由于英軍的傳統，一方面是由于英軍成橫队进攻的習慣。所有的报告可以使我們得出結論，英軍这一次仍是成橫队进攻的，使自己白白地成了敌人霰彈的好靶子。部队在狹

窄而又不正规的塹壕里前后排成四个横队的困难，一开始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带来了损失。如果战斗稍许激烈一些的话，还会使部队完全乱成一团。第一和第三纵队（从右向左算起）应当从两侧迂迴大凸角堡，而第二纵队则应当在这两个纵队达到目的以后，立即对大凸角堡进行突然攻击。第四纵队，即最左边的纵队，应向内港南端方向攻击。

当信号发出时，英军各纵队也和法军一样，还正在向指定的阵地前进。第一纵队毕竟还是越过了塹壕的胸墙，但立即遭到极其猛烈的霰弹射击。在翻越胸墙时各列混在一起的部队怎么也排不成战斗队形。指挥这个纵队的耶伊上校曾经呼唤号兵，以便命令他发出退却信号，但没有找到号兵，因此部队继续毫无秩序地前进。有些兵士突入大凸角堡周围的鹿砦区，但是这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这个纵队大部分立即退了下来，在塹壕里寻找掩蔽地点。第三纵队晚了一两分钟才出动。他们迷失了方向，没有从侧面迂迴大凸角堡，却从正面向大凸角堡攻击。他们冒着致命的弹雨勉强前进，但队形被破坏，几分钟以后就混乱不堪地退却了。在腊格伦勋爵的复杂的预备队的任何部分还没有来得及去支援以前，对大凸角堡的攻击就这样结束了。第二纵队看到应当从两侧支援自己的那些部队遭到如此意外的失败后，吓得甚至没有跃出塹壕。只有第四纵队在墓地及其周围的房舍里站住了脚。约1800人在这里坚持了整整一天；他们无法退却，因为后面是处在俄军交叉火力之下的开阔地。他们奋战到晚上9点钟，然后在夜暗的掩护下退了下来。伤亡占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佩利西埃对军港区的大规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这次行动是仓促地决定的，而在最后的时刻又更加仓促地根本改变了这个决定，战斗指挥也显得特

克里木战争 (1853—1856年)

塞瓦斯托波尔尔的围攻



俄 军

联 军

作战的船壳
尔茨的船壳

亚历山大罗夫炮台
丘古拉也夫炮台
巴甫洛夫炮台

重炮区的配置
重炮区的行进路线
工事

重队的配置
重队的行进路线
重队的行进路线
重队的行进路线

炮台及其射击方向
汽船
帆船

2公里

別无能。6月19日休战时有个俄国軍官向英国軍官提的問題很对：“昨天你們的將軍們在指揮强攻时，該不是喝醉了酒吧？”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7月6日左右

載于1855年7月11日“新奧得报”第317号，并作为社論載于1855年7月2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444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并根据“紐約每日論壇报”校对过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議會新聞：罗巴克和 布尔韦尔的提案

倫敦7月11日。大家知道，对上一届联合內閣的**全体**閣員表示譴責的罗巴克提案，原訂于下星期二进行討論。在北明翰、設菲尔德、新堡和其他地方都組織了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来支持他的提案，同时在倫敦各个角落公开征集在有关該問題的請願书上签名，可是，議員們却跑到巴黎、那不勒斯及自己的田庄逃避表决。罗巴克竭力想制止这种为帕麦斯顿所大力支持的逃避行为，他昨天要求授权宣布下星期二在下院实行«Call»〔“点名”〕。«Call»是一种旧的議會程序，自从进行有关解放天主教徒的辯論以后就被人遺忘了。这个程序要求在會議開幕时对所有的議員进行点名。不到会者应由議會警卫逮捕，他們必須在議會會議上当众认罪，并处以一定数量的罰金。但是下院以133票对108票的多数否决了罗巴克采用«Call»的强制办法。沒有什么东西比对待罗巴克提案的态度更能說明英国議會和作为議會喉舌的报刊的特点了。提案不是由一个“官方”反对派的成員提出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缺陷。这个提案不仅反对这一届內閣的閣員，而且也反对上一届內閣的閣員。因此，它不是純粹的党派的計謀。这个提案宣称，新內閣的成立还不能贖回上一届內閣的罪过。这个提案是关于追

究責任的提案的前提，这也就是提案的第二个大缺陷。不言而喻，官方反对派只願意“在更換大臣的範圍內”进行議會斗争。他們根本不願意就大臣們的責任問題进行斗争。Outs〔反对派〕集团对保存內閣的万能权力所表現的热心程度并不比 Ins〔政府〕集团差。議會斗争的技巧恰好在于：在短兵相接的格斗中打击的不是职位，而仅仅是当时占据职位的人，并且在进行打击的时候，要使这个人在作为大臣下台以后，馬上又能作为大臣的候选人而上台。寡头政体不是靠把政权經常保存在同样一些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輪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因此，托利党人像輝格党人一样也不滿意罗巴克的提案。

至于报刊，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泰晤士报”的立場。当罗巴克委员会可以被用来一方面促使大臣的更換，另一方面发泄社会的激憤的时候，拥护成立罗巴克委员会的呼声哪家报纸喊得最响亮呢？而自从罗巴克采取进一步行动，依靠自己的委员会的工作成績，用使联合內閣的所有閣員遭到議會方面的譴責这种办法相威胁的时候起，又是哪一家报纸保持比“泰晤士报”更頑强的沉默呢？对这家报纸來說，罗巴克提案并不存在，昨天在議會內发生的关于《Call》的事件与它无关，关于北明翰和設菲尔德等地的群众大会，在它的各栏內也只字未提。显然，罗巴克本人不是布魯士斯；他一方面看到，輝格党人对他多年的服务給予的报酬是何等的菲薄，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他有他自己的选民的支持。他是具有大量选民的选区的代表，既然他不能用現金来报答他們，他就应当报之以声誉。最后，当代的沃里克、議会的“国王制造者”的角色不能不符合沽名釣誉的、但至今未必有很大成就的律师的口味。作

为反对派的托利党人自然不能够采取輝格党人的方式来进行反对罗巴克提案的斗争。因此，他们极力要走在它的前面。这就是**布尔韦尔**根据約翰·罗素勋爵对維也納會議所作的令人惊奇的揭露而提出的向內閣投**不信任票**的提案的秘密。布尔韦尔的提案完全是“在更換大臣的範圍內”兜圈子。这个提案从罗巴克手中夺走了內閣的命运。如果他的提案能通过，这就意味着托利党推翻了輝格党，一旦托利党人控制了內閣，那末他们通常所有的“**寬宏大量**”就不会允許他们利用自己的胜利和进一步去支持罗巴克。但是，托利党人的狡猾手段同时也使帕麦斯顿有可能采取旧的議會手段。**罗素**的辞职——不管是自願的还是被迫的——会擋开布尔韦尔的提案，就像布尔韦尔擋开了罗巴克的提案一样。如果罗素的辞职不是发生在會議的結束时期，那末他的辞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帕麦斯顿內閣的垮台。而現在相反，罗素的辞职可以延长帕麦斯顿內閣的寿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說，在帕麦斯顿之前还没有一个英国大臣能这样巧妙地和成功地利用人民的怨言来硬使議會各党派接受自己的意見，利用各种微小的議會利益、議會派別和議會手續来硬使人民接受自己的意見。他好像是一个能施妖法的老人，有一次航海家辛伯达让这个老人爬到自己的肩膀上以后，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摆脱他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7 月 11 日

載于 1855 年 7 月 14 日
“新奧得报”第 32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
*議會新聞：布尔韦尔提案，
爱尔兰問題

倫敦 7 月 13 日。不知道法学秘密的人們难于理解：怎么在最普通的訴訟案中竟突然发生不是由該訴訟案件的实质、而是由訴訟程序方面的規定和条文所引起的法律問題。善于运用这些法律条文使人成为律师，就同善于主持宗教仪式使人成为婆罗門教的祭司一样。無論在宗教的发展过程中，或是在法律的发展过程中，形式都在变成內容。但是，法庭上訴訟程序所起的作用，在立法机关中却是屬於日程和會議規則的。土地立法的历史表明，羅馬的老寡头政治家——訴訟程序中的訟棍手段的創造者首先在立法程序中采用了訟棍手段。但是，在这两方面英国都超越了他們。把一个提案提到日程上时所遇到的技术困难，一个法案在成为法律前所必經的各式各样的改变；允許提案的反对者不让提案进入議會、法案的反对者不让法案通过議會的那种規則——所有这些就构成議会的訟棍手段、造謠中伤和纵横捭闔的一个无穷无尽的武庫。在帕麦斯顿以前，毕竟沒有一位英国大臣能够这样充分地使下院具有 Court of Chancery²⁰² 的面貌、風度和特质。在权术无能为力地方，他就采取訟棍手段。在他的支配下，有关他所不喜欢的提案的辯論每次都变成应当把这一辯論定在哪天、什么时候討

論本提案的初步的辯論。过去对米尔納·基卜生的提案是这样，对累亚德的提案是这样，現在对布尔韦尔的提案也是这样。在常会末期日程安排很滿的情况下，布尔韦尔为了提出自己的提案当时只能選擇下院作为 Committee of Supply²⁰³ 开会的日子，也就是內閣向下院提出撥款要求的那一天。为此目的而开会的日子通常規定在星期五。可是什么时候向下院要錢，自然是由內閣决定的，也就是說由內閣决定什么时候下院应当作为 Committee of Supply 举行會議。帕麦斯頓当时立即对布尔韦尔說，这星期五他不能用来 Supply —— 術語就是这样—— 而要用来討論关于有限責任貿易公司的法案。让布尔韦尔本人挑一个“对自己合适的日子”吧。因此，迪斯累里上星期二正式声明他要在下星期四(昨天)向議院要求消除这种訟棍手段。但帕麦斯頓赶在他的前头了。昨天开会时，帕麦斯頓站了起来，在全場笑声中声称：他当然沒有这样的目的：要拖延辯論布尔韦尔的关于举行不信任投票的提案和用技术性的障碍来阻撓值得尊敬的議院作出自己的判决。但是，尽管作了一切努力，有关維也納會議的补充文件仍然无法在明天以前提交議員們审查，而不先了解有关問題的文件，議員們又怎能作出判决呢？他准备把星期一用来討論布尔韦尔的提案。迪斯累里強調說，“补充文件”同布尔韦尔的提案完全无关。关于有限責任貿易公司的法案在某一点上說是很重要的法案。但是国家首先希望了解下面这一点：

“內閣对自己的行动是否完全負責，或者难道有限責任的原則在这里也适用？国家首先希望了解唐宁街的商行股東們办理自己事务的条件是什么？”

布尔韦尔宣称他同意把辯論移到星期一举行。而罗素則枉然地企图利用这个事件以削弱和变换他在上星期五所作的声明的意

思。但是，正像今天的“泰晤士报”所令人信服地证明的，这个第二次修正版出得太迟了。許多天以来，“泰晤士报”就施展了自己的全部技艺，用牺牲罗素来挽救帕麦斯顿內閣。在这件事上，老实的“晨报”也坚定不移地支持它。每当帕麦斯顿有失去議会的信任的危險时，“晨报”总是完全恢复对帕麦斯顿的信任。同时帕麦斯顿赢得了好几天时间来玩弄新手法。昨天在下院演出的爱尔兰的 row [丑剧]，证明他是多么巧妙地在利用着这样的每一个日子。

大家知道，三个关于調整爱尔兰土地所有者和佃农之間关系的法案在議會中已經討論了两年。一个法案規定着佃农因改良土地而可以要求的补偿数额，如果土地所有者拒絕同佃农重新訂約的話。迄今为止，爱尔兰佃农（佃农几乎都是临时的——期限为一年）所进行的改良只不过使土地所有者有可能在租佃期滿后提高租金。因此，如果佃农拒絕在不利条件下重新訂約，那他就失去农場和他花費在改良上的資本，要不他就得为那种用自己的資本对土地所作的改良而向大地主繳付超过原来地租的租金。支持上述三个法案是保证联合內閣获得爱尔兰旅的选票的条件之一。因此，1854年这些法案在下院通过了，但是在上院由于大臣們的暗中协助，它們起初被擱置到下届常会（1855年），后来則被删改得失去了任何意义，就这样面目全非地被送回下院。上星期四，补偿法案的主要一項在下院作了土地所有制的牺牲品，爱尔兰人惊異地发现，使他們的对手获得优势的，一部分是內閣的票，一部分是与內閣有直接联系的人的票。Serjeant^① 施氏对帕麦斯顿的猛烈攻击有可能酿成議会的“爱尔兰人区”的 riot [騷动]，而騷动的后

① Serjeant at law——皇家法官。——編者注

果恰好在这时是危险的。因此，帕麦斯顿请求前联合内阁阁员爱尔兰旅的捐客萨德勒调解，结果由 18 个爱尔兰議員組成的代表团在前天訪問了他，問他是否利用自己的影响以取消議会的决定，并在再度表决时使主要的一項在議院获得通过。帕麦斯顿当然宣称自己准备做一切，只要在举行不信任投票时能获得爱尔兰的票。这个阴谋在下院的过早揭露引起了一场丑剧，而这类丑剧都是說明寡头制議會衰退的。爱尔兰人有 105 票以上。但是事实表明，他們的大多数沒有授予 18 人代表团以任何全权。总之，帕麦斯顿在內閣危机期間已經不能像奥康奈尔时代那样利用爱尔兰人了。随着議會所有旧派系的瓦解，議会的“爱尔兰人区”也四分五裂了。无论如何，这个事件表明帕麦斯顿怎样在利用他所赢得的时间来籠絡各种集团。与此同时，他期待着来自战区的哪怕是很小的有利的消息，期待着任何微小的事变，而这种事变，他即使不能从軍事观点也能从議會观点来加以利用。海底电报夺去了將軍們手中的战争指揮权，使它服从于波拿巴的肤淺的占星术的奇想以及議會外交的阴谋。这就是克里木第二次战局的难以理解的和前所未見的特点的由来。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7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7 月 16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 325 号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罗素的辞职。——克里木事件²⁰⁴

倫敦7月14日。我們在前一篇通訊^①中談到了約翰·罗素勳爵被迫或者自願辞职这样一个 *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的問題。辞职是在昨天下午提出的，应当說，这是一种綜合性的辞职：自願的同时又是被迫的。其原因是帕麦斯顿把包法利所率領的一部分最貪图职位的輝格党人弄到犯上作乱的地步。他們声明，如果罗素不提出辞呈，他們将不得不投票贊成布尔韦尔的提案。罗素对此进行了抗拒，但是毫无效果。背信棄义的輝格党小人对这种功績还不滿足，就在下院的接待室里在給帕麦斯顿的請願书上征集签名，要求帕麦斯顿說服女王接受罗素已經提出的辞呈。这些卑劣的手法無論如何会使罗素得到一种滿足：他按照自己的模样建立了党。

如果下院的大多数不死命抓住能使下院延期解散的每一个借口，那末烏尔卡尔特所說的那种“为了保证自己精神上的支柱而常常暗自活动”的人的辞职，未必会对內閣的存在产生任何影响。而一旦通过了布尔韦尔提案，下院的解散就不可避免。如果投了不信任票，帕麦斯顿仍然留任，他就一定会解散下院；如果他的继承

^① 見本卷第400頁。——編者注

者是得比，那末得比也一定会那样做。但是下院未必乐意为祖国而牺牲自己。

乔治·格雷爵士成立了一个警察暴行調查委员会。它是由倫敦、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法官們組成的，它将在下星期二开始举行會議。

如果說在貿易上時間是金錢，那末在戰爭中時間就是勝利。放过有利的时机，不利用机会調派优势兵力去对付敌人，这就是犯了戰爭中可能犯的最大的錯誤。如果不是在防禦时而是在进攻时，即在侵入敌人的領土时犯这种錯誤，那末它就会造成加倍的危險，因为防禦时疏忽所造成的后果还可以糾正，而在进攻时这样的疏忽便会招致全軍复沒。这都是老生常談，任何一个准尉都会认为这是陈腐的道理。虽然一般不会經常違反任何一条战略或战术規則，但是似乎佩利西埃將軍，这位行动迅速的人，这位克里木軍隊的“一往直前的元帅”却有天賦成为一貫忽視这些人所共知的原理的鮮明榜样。

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是經由因克尔芒到达要塞的北区。佩利西埃及其司令部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是要占領北区，联軍必須展开野战行动，动用主力部队击潰俄軍，包圍北区，并且抽出一支能把俄国野战部队阻擋在相当的距离上的部队。采取这种行动的适当时机是在撒丁軍和奥美尔-帕沙指揮的土軍到达的时候。联軍当时比俄軍强大得多。但是他們沒有做諸如此类的任何事情。他們向刻赤和阿速夫海进行了远征，多次企图强攻塞瓦斯托波尔。野战行动只不过是进行偵察和把营地扩大到拜达尔盆地的入口处。現在終於查明，这种按兵不动的原因似乎是運輸工具不足，因此联軍在进行了 15 个月的战斗以后仍然被困在海

上，被困在卡梅什和巴拉克拉瓦！这真令人奇怪。克里木不是南极什么地方的一个荒凉岛屿。虽然它是一个粮源可能已经枯竭的地区，但是它今后仍能提供大量的饲料、役畜和车辆，只要有本领和勇气去夺取它们。在黑河周围数英里的范围内犹豫不决而缓慢地来回调动，当然不是得到这些物资的办法。但是即使完全不考虑到克里木现有的骆驼、马匹和大车，在欧洲和亚洲的黑海沿岸地区也有充足的、可用轮船在两天内运到的运输工具。为什么联军不征用这些运输工具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呢？原来俄军在实践上给他们上了一堂很生动的课，告诉他们应当怎样行动。当联军感到把粮食从巴拉克拉瓦运到塹壕里已经不可能的时候，俄军把第三、第四和第五军以及各种后备师运到了克里木。部分军队是用大车穿过草原运来的，看来他们的粮食非常不足。因为在皮列柯普 200 俄里方圆内人烟稀少。然而他们用征用的办法从比较遥远的省份弄到了物资，而本来俄军要把大车从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波尔塔瓦、哈尔科夫等地运到克里木比联军从鲁美利亚、安那托里亚得到运输工具更困难得多。总之，联军推说运输工具不足，错过了夺取克里木（直到辛费罗波尔为止）的机会。现在情况改变了。俄军在敖德萨和赫尔松之间的地区为克里木组织了一支后备军团。我们只能根据从西方军团中调来的部队来判断这支军队的实力；他们由整个第二军和 2 个掷弹兵师组成。这支军队的总兵力为 5 个步兵师（82 个营），1 个骑兵师（32 个骑兵连）和 80 门火炮。此外，还应当加上步兵和骑兵的后备队。这样，如果扣除在行军中遭受的损失，则集结在敖德萨和皮列柯普之间奉命开往克里木的军队的人数，可以大致确定为 7—8 万人。这支军队的先头部队现在可能已经越过皮列柯普，而到 7 月底就会使联军觉察到它的到来。

联軍能够用什么抵抗这些援軍呢？联軍的兵員还会因霍乱和寒热病而逐渐减少，其减少的数量不会少于因企图进行种种强攻而伤亡的数量。不列顛的援軍来得很緩慢，实际上只有很少几个团上船出发。我們不久前报道启程出发的有 13 000 人^①，这是內閣的一种虛張声势。而法国政府声称，它不打算派遣新銳师，而只从后备部队中派出一些小部队去弥补战场上所遭到的損失。如果这些补充部队能及时到达，那末他們勉强能使联軍的人数凑足 6 月間原有的人数，即 20 万人，其中包括土耳其軍隊和撒丁軍隊。最可能的是联軍的人数不超过 18 万人，而俄国在 8 月初用来对付联軍的軍隊至少为 20 万人，而且这支軍隊占据着有利的陣地，支配着自己的后方地区，控制着作为登陸場的塞瓦斯托波尔南区。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联軍再度被逼退到黑河彼岸的狹窄的台地上，那末，挤滿了那么多人的台地必然会变成墓地。

发动战局的时机还没有失掉。虽然最适当的时机是错过了，但是尽管如此，联軍只要勇往直前，甚至現在仍能保证有更广闊的活动地区。然而联軍似乎不打算利用这种可能性。

为了替佩利西埃辯白，也許应当补充一点，无论倫敦或巴黎的輿論都在路易·波拿巴这位远方的將軍的干預中寻找和找到第二次克里木战局全部 misère〔失敗〕的原因。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7 月 14 日

載于 1855 年 7 月 17 日“新奧得报”

第 327 号，并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7

月 27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45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并根据

“紐約每日論壇报”校对过

① 見本卷第 361 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 羅素的辭職

倫敦7月17日。羅素的辭職，不管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會擋開布爾韋爾的提案，就像以前布爾韋爾擋開了羅巴克的提案一樣。我們在7月11日的通訊^①中發表的這種看法在下院昨天的會議上完全得到了證實。有一句輝格黨的老格言：“政黨像蝸牛，尾巴帶動頭。”現在的輝格黨內閣很像一個水螅；它好像是靠切除術長大的，隨便切掉肢體、頭部，它都容易忍受過去，就是不要切掉尾巴。雖然羅素不是內閣的首腦，但是他是組織內閣的政黨的首腦，而這個內閣又代表着那個政黨。Board of Trade〔貿易部〕副大臣包法利代表着輝格黨水螅的尾巴。他發現，為了保存輝格黨軀體的生命，必須砍掉輝格黨的頭部，並且代表輝格黨的尾巴和受尾巴的委託把這個發現通知了帕麥斯頓。羅素昨天聲明他“蔑視”這條尾巴。迪斯累里用“友誼的生理現象”和對不同類（其中以“朋友”著稱的類本質占有特殊的地位）的天性的描繪來長期折磨包法利。最後，包法利替自己辯白的企圖（他說，他和尾巴是為了拯救羅素本人才把羅素推開的）完成了一幅描繪這個追求名位者的政黨的風俗畫。

① 見本卷第400頁。——編者注

当輝格党的天生的头部这样被砍掉的时候，它的已被篡位的头部——帕麦斯顿勋爵却更加牢固地长在躯体上。阿伯丁和紐卡斯尔下台后，帕麦斯顿为了占有联合內閣的遺產，利用了格萊斯顿、格萊安和赫伯特。格萊斯顿、格萊安和赫伯特辞职后，帕麦斯顿为了組織純粹的輝格党內閣，又利用了約翰·罗素勋爵。最后，他又利用輝格党的尾巴来巧妙地排斥罗素勋爵，从而成为內閣的独裁者。每一次变形都是走向組織純粹帕麦斯顿內閣的阶段。从罗素本人的声明中我們知道，他不止一次地向帕麦斯顿提出辞职书，但是帕麦斯顿每次都劝他把辞职书收回。帕麦斯顿也同样地劝說阿伯丁內閣用各种手段去反对罗巴克的調查委员会。在这两种場合他都取得了同样的成果，达到了同样的目的。

布尔韦尔的提案同罗素个人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 *corpus delicti* [犯罪要素，犯罪证据的总和]——罗素刚从內閣消失，提案本身就已失去了意义。这就迫使布尔韦尔声明收回自己的提案。然而他忍不住要发言来論证自己的提案，而忘掉了他在自己的发言中所論证的提案本身已經不存在。帕麦斯顿利用了已造成的尷尬局面。剛一声明斗争不再进行，帕麦斯顿馬上就摆出一副斗士的姿态，不顾体面、大喊大叫、过于自信地干起来；但是迪斯累里为此而严厉地斥責了他，这位十足的伪君子——他的面部表情說明了这一点——甚至也不能保持他通常所有的毫不知耻的平靜态度。然而在迪斯累里的答复中最重要的是如下的声明：

“我知道罗素勋爵从維也納带来的那些观点不仅得到大多数人的賞識，而且甚至得到他的全体同僚的賞識，只是他們所沒有預料到的情况阻碍了高貴的勋爵的計劃被愉快而一致地通过。我这样說是有充分根据的。我是以一个半月前談論政府的模稜两可的声明和不果断的行为时所抱的那种信心

来谈这件事的；后来所发生的事件都证明我的论断是正确的。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次议会常会结束以前，议院就会得到这些论断的证据。”

迪斯累里所暗示的“情况”，正像他发言时所阐明的，是“法国方面进行的阻挠”。迪斯累里指出，提供议会参考的克拉伦登的通讯是与内阁的秘密指令相矛盾的。迪斯累里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发言：

“国内有一种意见，认为主要的过错在于对我们事务的拙劣领导。发现了一份外国的文件（布奥尔的通令）；人民的愤懑情绪正在增长，人民在思索、在讨论，人民的代表在向议院提出质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们最杰出的国家活动家甚至不敢同提出这类问题的人争论。他偷偷地隐匿起来。究竟谁敢这样做呢？女王陛下的首相。首相今天晚上在议院讲话时的那种腔调和神气与他的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并且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这种腔调和神气使我相信，如果国家的荣誉和利益今后仍掌握在他手里，那末这只能导致荣誉被凌辱，利益被出卖。”

罗巴克说话的尖锐性胜过了迪斯累里：“我想知道，现在谁是内阁的叛徒？”起初叛徒是阿伯丁和纽卡斯尔。后来是格莱安、格莱斯顿和赫伯特。以后是罗素。Sequens〔再下一个〕是谁呢？

然而这个以前暗中领导联合内阁、而现在正式领导内阁的人的地位大大地巩固了。如果在常会结束前议会会因某种原因而投不信任票（这是不大可能的），那末他就会解散议会。不管怎样，他还有六个月时间可以全权执掌英国的对外政策；而且在下院既不会有喧嚷，又不会有臆想的争吵来打扰他。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7 月 17 日

载于 1855 年 7 月 20 日

“新奥得报”第 33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在議會內

倫敦7月18日。7月16日晚間下院舉行的激烈的、熱鬧的和興奮的會議的必然結果是普遍的萎靡不振、沒精打彩和漠不關心。熟知議會病態秘密的內閣打算利用這種情緒來阻撓對羅巴克提案的表決，不僅是阻撓表決，而且還阻撓辯論。雖然已近午夜，會快散了，下院卻出現了一瞬間的、好像是邀請大臣們進行解釋似的寂靜，儘管四周不止一次地發出了要求進行解釋的喊聲，還是沒有一位政府成員起來發言。內閣頑固地堅決保持沉默，因而使埃克塞特侯爵的代表們、華德勳爵的代表和下院議員中與他們類似的貴族代理人有可能把值得尊敬的下院沉沒在永無止境的混合物中。但丁在他的“地獄”中把在這種混合物中存身描繪為冷漠無情的人的終身命運²⁰⁵。對羅巴克的提案提出了兩個修正案——皮爾將軍的修正案和阿德爾上校的修正案，兩個修正案都是代表軍人提出的，兩個修正案都不過是迴避問題的一種手腕。皮爾的修正案要求下院將“先決問題”²⁰⁶提付表決，也就是要下院對基本提案既不表示贊成也不表示反對，從而迴避對羅巴克的問題作任何回答。阿德爾上校要求贊同“據以進行塞瓦斯托波爾遠征的政策”，並呼喚“堅決支持這一政策”。因而他用對克里木遠征的良好開端的夸奖擋開了羅巴克的關於譴責對這次遠征的惡劣領導的提案。

內閣對於哪一個修正案將被提升為內閣級提案的問題未作任

何声明。显然，內閣是想先摸清下院的情緒，然后决定是跟皮尔將軍一起躲在沒有解答的問題后面，还是同阿德尔上校一起躲在沒有問題的解答后面。最后，下院显然进入了正是帕麦斯頓所期待的那种半睡意朦朧之境了。帕麦斯頓立即派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閣員查理·伍德爵士到讲台上，宣布皮尔的修正案是內閣的修正案。随后帕麦斯頓在来自对他友好的議員席上的“表决！表决！”的喊声的支持下发言了，他表示“希望下院立即作出决定”。他以为他已經把罗巴克“扼死”了，甚至使他失去了“大辯論”、議會决斗的倡导者的光荣角色。然而表决不仅仅遭到迪斯累里的反对。**布莱特**也以通常所有的分外严肃的神情站起来說：

“政府显然想用欺騙手段迴避正在討論的問題，所以直到午夜还不发表任何声明。其实這個問題是过去提請下院注意的所有問題中最重要問題。即使這場辯論再繼續一个星期，国家也只可能从中得到好处。”

这样一来，帕麦斯頓只得同意**延期**辯論，而放棄了自己原来的作战計劃。他遭到了失敗。

罗巴克发言的最大优点是簡單扼要。他不是像一个律師，而是像一个法官那样簡單明确地論证了他所作的判決；他的发言也应当是这样，因为他是調查委員會的主席。显然，他不得不同阻碍联軍舰队进入塞瓦斯托波尔灣的障碍——**沉沒的船只**一样的阿伯丁輩、赫伯特輩、格萊斯頓輩、格萊安輩等开战。只有在战胜他們之后，他才能收拾帕麦斯頓和**寿命比阿伯丁等人长**的其他联合內閣的閣員。他們堵住了他进入这届內閣的道路。罗巴克曾企图利用恭維話来排除他們，因此他声称，紐卡斯尔和赫伯特因为热心职守應該得到表揚，格萊安也是如此。何况他們因为情况了解不够犯了錯誤而已經被逐出了唐宁街。現在的問題是要收拾还逍遙

法外的罪人。他說他的提案的本来目的就是如此。他特別攻击了帕麦斯顿，不仅把他当做被告之一，而且首先是把他当做一个领导过民軍的人加以攻击。为了使自己的提案适合傳統的議會框子，罗巴克明显地磨掉了提案的鋒芒。內閣的辯护人所引证的論据是这样的空洞，以致在說明这些論据时所采取的使人昏然欲睡的形式起了真正良好的效用。一部分人喊道：证人的证据不够充分。另一部分人喊道：你們用排斥手段威胁我們。塞西耳爵士說：事情已經过去了。为什么不回过头也去譴責罗·皮尔爵士呢？“自由派的”菲利莫尔說：每个閣員都对整个內閣的全部活动負責，但沒有一个閣員单独地对某一件事情負責。娄（通过“泰晤士报”）說：你們使同法国的联盟受到威胁，你們想审判法国皇帝！跟在娄后面的是詹姆斯·格萊安。格萊安是一个心地純洁的人，甚至他也宣称他不滿意对皮尔將軍的“完全否定”。他坚持下院的裁决：“有罪”或“无罪”，他不滿意«Not proven»（查无实据）的公式，而苏格兰法院是根据这个公式拒絕受理可疑的刑事案件的。你們是不是又想实行已經过时的和非議会的“起訴”（impeachment²⁰⁷）公式呢？这全是报刊即輿論的过錯。是輿論促使大臣們在时机不利和經費不足的条件下采取了远征。如果你們譴責內閣，那末你們也应当譴責支持內閣的下院！末了是查理·伍德爵士的辯护：如果罗巴克甚至为紐卡斯尔、赫伯特和格萊安辯白，那末他又怎么能控告我們呢？我們是微不足道的，我們不負任何責任。伍德就是这样說的，他“痛切地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7 月 18 日

載于 1855 年 7 月 21 日
“新奧得报”第 33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战争的前景

根据最近的一些报道看来，克里木的战事暂时寂靜下来了。联軍再沒有試图强攻，火炮几乎完全停止了射击。如果双方陣地之間沒有經常的步枪互射，如果联軍沒有挖掘对壕和地道向馬拉霍夫岡推进，如果俄軍沒有时常出击，那末就可以认为軍事行动已完全停止了。然而，这不过是風暴前的暂时寂靜，也許現在風暴已經爆发了。有一切根据推测，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已經发生并結束了一場比因克尔芒会战、馬美朗战斗或6月18日的强攻更为激烈的搏斗。

事实上，8月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战局的胜負。到那个时候，俄軍的增援部队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一定能够开到，而联軍的队伍却由于疾病将不可避免地逐漸减少。联軍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扼守赫尔松涅斯台上的陣地。現在甚至連英国的报刊也放棄了在今年內占領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想法。联軍只有指望分区地彻底摧毀塞瓦斯托波尔，如果他們仍然像以前那样緩慢地行动，圍攻在時間方面就可能同特洛伊的圍攻一样了。然而我們沒有理由指望，他們能加快速度完成自己所面临的任務，因为有人向我們几乎正式地宣布：迄今所遵循的那套拙劣的战法今后仍将頑固地保持下去。巴黎“立宪主义者报”駐克里木的通訊員，一位在

法軍中担任要职的人(据说,他就是近卫軍司令官雷尼奧·德·圣让·丹热利將軍)曾經宣称,人們对于进行野战和可能包圍塞瓦斯托波尔北区所作的种种推測都是枉費心机的。他說,在目前条件下,不撤除圍攻,不把整个台地让給俄軍,就决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已决定对那些以前攻击过的陣地尽量加强炮击,力求将它们彻底摧毁。应当說,这篇通訊中报道的消息是可以完全相信的,因为我們有一切理由认为,从这一方面发出的一切消息,在刊登前法皇不仅要审批,甚至还要修改。同时他对雷尼奧又特別賞識。

不难預見,这一切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結果。在塞瓦斯托波尔及其周圍的俄軍現在有第三軍和第四軍,第五軍的2个师和第六軍的1个师,以及海軍陆战队、水兵、地方部队、哥薩克和騎兵,总共为180个营,即9万名步兵,3万名炮兵和騎兵,其中不包括約4万名伤病員。甚至法国“通报”所計算的俄軍兵力也有11万人。另外,整个第二軍(50个步兵营,32个騎兵連,96門火炮),2个擲彈兵师連同1个騎兵师(24个步兵营,32个騎兵連,72門火炮)正在开赴塞瓦斯托波尔的途中或者已經接近該地。这是一批包括55 000名步兵、1万名騎兵和哥薩克以及5 000名炮兵的补充兵力。这样,俄国人最近能集中的軍队至少为175 000人,也就是說,将大大超过联軍不久前在战斗中以及因疾病所遭到的損失以后所剩下的人数。有了这样的兵力,俄軍無論如何也能守住自己的陣地,何况他們还能經常派出生力軍去替换疲劳过度的守軍。毫無疑問,这是对俄軍兵力的最低估計。

与此相反,联軍却不能指望得到这么多的增援部队。目前他們有:21个步兵师(法軍12个师,英軍4个师,土軍3个师,皮蒙特軍2个师),約190个营;3个騎兵师(法軍、英軍、土軍各1个

师),約 60 个騎兵連;以及相应数量的火炮。但是由于联軍的步兵营,特别是騎兵連在作战中遭到重大損失,因此联軍的总人数不会超过:步兵——11 万人;騎兵——7 500 人;炮兵、輜重部队和适于担任非战斗勤务的人员——20 000—25 000 人^①。如果說在俄軍增援部队到达以前交战双方的兵力完全不相上下,那末在俄軍增援部队到达以后,优势显然不会在联軍方面。盟国以前派去和目前派去的所有增援部队,都是从后备部队中抽調的个别小部队,是用来补充已在克里木作战的步兵营和騎兵連的,而且如果相信报刊上的消息,那末他們的人数是很少的。不过据报道,3 个师正在开赴馬賽和土倫的途中,輪船也正在向这两个地点集結;在英国,指定派往克里木的各团已奉命作好立即上船的准备。它們大約是 1 个步兵师和 1 个騎兵师。因此,在 8、9 两月就会有 33 000 名左右的步兵,还可能有 2 500 名騎兵和炮兵陸續到达克里木,可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們能否迅速上船出发。不管怎样,联軍在人数方面仍将少于俄軍,而且还可能重新被箝制在他們凄凉地度过去年冬季的那个台地上。俄軍这一次能否把联軍逐出这个要塞,还很难說。显然,联軍要是得不到大量的增援部队,他們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扼守已占領的陣地。这样,战争也就会变成一連串毫无結果的流血小战斗,双方每天都派出生力軍,时而在要塞的圍牆或塹壕的胸牆上,时而在因克尔芒和巴拉克拉瓦周圍陡峭的高地上进行白刃格斗。交战軍队为了取得如此微小的战果也許会比在类似的战斗中洒下更多的鮮血,这样的情况是难以想像的。

^① 在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議會新聞。——战区消息”一文(見本卷第 422 頁)中,此处列举的数字是 30 000—35 000 人。——編者注

但是，决定性的会战仍然可能发生。如果俄国人除已派出的部队之外，能再调 5 万人到克里木，从而保障自己的军队占绝对优势，那末他们就能够使联军遭到严重的失败，并迫使他们登船返国。要判断这种可能性，就必须弄清楚俄国在整个边境上究竟拥有多少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在克里木的军队，包括上述增援部队在内，我们计算约有 175 000 人。在高加索，除地方部队和哥萨克外，作战的是第十六师和第十七师，它们的人数应为 6 万人左右。在贝萨拉比亚，据说有利迭尔斯指挥的 6 万俄军；可以推测，这些部队主要是由一些混成营和预备部队组成的，因为那里只驻有第五军的一个步兵师，而且我们并没有得到第一军或第二军所属部队已调往该地的消息。在波兰和沃伦，看来目前只剩下 2 个近卫师和 1 个掷弹兵师以及第一军的 3 个师和各种预备部队，共约 16 万人。大部分预备部队和一部分近卫军集中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其配置如下：西韦尔斯指挥的 5 万人驻德意志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贝尔格指挥的 3 万人驻芬兰；里迪格尔指挥的 5 万预备部队驻彼得堡及其附近一带。全部共约 585 000 人。俄军其余的部队约 65 000 人分驻内地。由此可见，俄军的全部武装力量为 65 万人。如果考虑到俄国正在大量征兵，那末这个数字绝对没有夸大。

十分明显，现在，在夏末，俄军丝毫不用担心敌军会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登陆；因而它完全能够进行全面调动，把各种部队从此地派往南方，而用非常后备军或从内地调来的其他部队来替换它们，这样，比如说，就可以抽出 3 万人。这 3 万人可以调往波兰，而从波兰抽出同等数量的部队；当奥地利把它的边屯部队缩减到没有威胁性的数量即 7—8 万人时（这在最近一定会进行），从驻波兰

的俄国部队中还可以再抽出 3—4 万人。结果，俄军就可以得到相当多的补充兵力，使得联军在沒有外援的情况下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攻占克里木，而且这些补充兵力在 10 月中旬就可能开到战区。但是，这里却产生了一个问题：政府在整个冬季能否供养这样庞大的军队，特别是现在，当阿速夫海上的俄国船只已被肃清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由于沒有充分的材料，不准备回答；但是，如果这是可能的，如果它真正采取这些措施，那末联军将不得不离开环绕巴拉克拉瓦的悬崖峭壁，撤离为 25 万军队所直接或间接地保卫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围墙。

到目前为止，奥地利的 30 万军队一直在通往克里木的交通线的一侧威胁着俄国。只要俄国一摆脱这种障碍，联军很快就会相信，他们将不得不与之较量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力量。他们错过了在奥地利的间接帮助下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时机。而现在，当来自奥地利的威胁正在消失而俄国唯一的敌人只剩下同盟国的时候，已经晚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7 月 20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8 月 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5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議會新聞。——战区消息

倫敦 7 月 20 日。关于罗巴克提案的辯論絕對沒有发生內閣所指望的那种变化。一直到昨天早晨，內閣还在自己的半官方机关报上預言，罗巴克提案将以 5 票对 1 票遭到否决。到了昨天夜里，內閣能够以 289 票对 182 票通过了关于 Previous Question〔先决問題〕的決議，也就是說使議院完全拒絕就罗巴克提案作出任何決議，这时候內閣就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了。就是强迫阿伯丁辞职（因为他拒絕任命調查委员会）的那个議院拯救了帕麦斯顿，它终于拒絕作出关于自己的委员会的結論的決議。由于議會會議延期，帕麦斯顿內閣的命运也可以延續到下一次常会举行的时候了。到那时候內閣的美妙时光就将过去。关于會議本身，我們回头还要來談。

目前克里木的战事暫時寂靜下来了。联軍再沒有試图强攻，火炮几乎完全停止了射击。如果双方陣地之間沒有經常的步枪互射，如果联軍沒有挖掘对壕和地道向馬拉霍夫岡推进，如果俄軍沒有时常出击，那末就可以认为軍事行动已完全停止了。

这是風暴前的暫時寂靜。两三个星期后将开始一場比因克尔芒会战、馬美朗战斗或 6 月 18 日的强攻更为激烈的斗争——搏斗。8 月应当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月；正在途

中的俄軍到那个时候一定能够开到，而联軍的队伍却由于疾病将逐渐减少。那时就将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联軍将不得不花费不少的力气来扼守他们所占領的台地上的陣地。

现在甚至连英国的报刊也放棄了在今年內占領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想法。联軍只有指望分区地彻底摧毁塞瓦斯托波尔，如果他们仍然像以前那样緩慢地行动，圍攻在時間方面就可能同特洛伊的圍攻一样了。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指望，他們能加快速度完成自己所面临的任務，因为現在有人向我們几乎正式地宣布：迄今所遵循的那套拙劣的战法今后仍将頑固地保持下去。巴黎“立宪主义者报”駐克里木的通訊員，一位在法軍中担任要职的人（据說，他就是近卫軍司令官雷尼奧·德·圣让·丹热利將軍）曾經宣称，人們对于进行野战和可能包圍塞瓦斯托波尔北区所作的种种推測都是枉費心机的。他說，在目前条件下，不撤除圍攻，不把整个台地让給俄軍，就决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已决定对那些以前攻击过的陣地尽量加强炮击，力求将它们彻底摧毁。这篇通訊中报道的消息可以被看做是半官方性的，因为我們有一切理由认为，从这一方面发出的一切消息，在刊登前波拿巴不仅要审批，甚至还要修改。他对雷尼奧是特別賞識的；这就是那个在立法国民議會期間在尚加尔涅辞职书上签署的陸軍大臣。

不难預見，这一切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結果。在塞瓦斯托波尔及其周圍的俄軍有第三軍和第四軍，第五軍的2个师和第六軍的1个师，以及海軍陆战队、水兵、地方部队、哥薩克和騎兵，总共为180个营，即9万名步兵，3万名炮兵和騎兵等，其中不包括約4万名伤病員。甚至法国“通报”所計算的俄軍兵力也有11万人。另外，整个第二軍（50个步兵营，32个騎兵連，96門火炮），2个擲

彈兵師連同 1 個騎兵師 (24 個步兵營, 32 個騎兵連, 72 門火炮) 正在開赴塞瓦斯托波爾的途中或者已經接近該地。這是一批包括 55 000 名步兵、1 萬名騎兵和哥薩克以及 5 000 名炮兵的補充兵力。這樣, 俄國人最近能集中的軍隊至少為 175 000 人, 也就是說, 將大大超過聯軍不久前在出擊時以及因疾病所遭到的損失以後所剩下的人數。俄軍無論如何也能守住自己目前的陣地, 何況他們還能經常派出生力軍去替換疲勞過度的守軍。

與此相反, 聯軍却不能指望得到这么多的增援部隊。目前他們有: 21 個步兵師 (法軍 12 個師, 英軍 4 個師, 土軍 3 個師, 皮蒙特軍 2 個師), 約 190 個營; 3 個騎兵師 (法軍、英軍、土軍各 1 個師), 約 60 個騎兵連; 以及相應數量的火炮。但是由于聯軍的步兵營, 特別是騎兵連在作戰中遭到重大損失, 因此聯軍的總人數不會超過: 步兵——11 萬人; 騎兵——7 500 人; 炮兵、輜重部隊和非戰鬥人員——30 000—35 000 人。因此, 如果說在俄軍增援部隊到達以前交戰雙方的兵力完全不相上下, 那末在俄軍增援部隊到達以後, 優勢顯然不會在聯軍方面。盟國以前派去的所有增援部隊, 都是從後備部隊中抽調的個別小部隊, 是用來補充正在作戰的步兵營和騎兵連的, 而且如果相信報刊上的消息, 那末他們的人數是很少的。不過據報道, 3 個師正在開赴馬賽和土倫的途中, 輪船也正在向這兩個地點集結; 在英國, 指定派往克里木的各團已奉命作好立即上船的准备。它們大約是 1 個步兵師和 1 個騎兵師。因此, 在 8、9 兩月就會有 33 000 名左右的步兵, 還可能有 2 500 名騎兵和炮兵陸續到達克里木, 可是這完全取決於他們能否迅速上船出發。不管怎樣, 聯軍在人數方面仍將少於俄軍, 而且還可能重新被箝制在他們淒涼地度過去年冬季的那個台地上。

俄軍这一次能否把联军逐出这个要塞,还很难說。显然,联军要是得不到大量的增援部队,他們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扼守已占領的陣地。这样,战争也就会变成一連串毫无結果的流血的小战斗和白刃格斗,双方每天都派出生力軍,时而在要塞的圍牆或塹壕的胸牆上,时而在因克尔芒和巴拉克拉瓦周圍陡峭的高地上进行白刃格斗。很可能的是,事态就是这样变化。交战軍队为了取得如此微小的战果也許会比在类似的战斗中洒下更多的鮮血,这样的情况是难以想像的。这一切所以会发生,都是由于双方总司令的庸碌无能,巴黎的草率从事和倫敦的蓄意背叛。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7月20日

載于1855年7月23日

“新奧得报”第33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帕麦斯頓。——大不列顛

統治階級的生理現象

倫敦7月23日。如果保證給土耳其貸款²⁰⁸的問題今天晚上遭到像上星期五那樣的反對，那末帕麥斯頓就一定會立即解散下院。一切情況都對這個狡猾的人有利。在過去，由於布尔韦尔提案而解散議院或由於羅巴克提案而解散議院——這兩種做法都是同樣冒險的。維也納會議上的外交活動，冬季戰役期間政府機關的活動——根據這些問題不向議會而向選民發出呼喚是很困難的。但是“保證給土耳其貸款”的問題出現了！布景、場面、情節都好像隨着魔棒的揮動在變化着。現在已經不是議會譴責內閣背叛和無能。現在是內閣指責議會，說它阻撓戰爭的進行、使同法國的聯盟有遭到破裂的危險以及讓土耳其聽天由命。內閣不再為了使自己擺脫議會認為有罪的判決而向全國呼喚了。它向全國呼喚是為了譴責議會。實際上貸款的條件是這樣擬定的：土耳其直接得不到錢，而只是在對任何一個國家都大失體面的條件下受到保護，在這種保護下，所謂給予土耳其的貸款應由英國的專員來分配和開銷。而且事實上，既然英國的管理制度在東方戰爭中顯得如此卓越，那末怎能不情不自禁地要對他國賜以恩惠呢？西方列強把君士坦丁

堡的外交部抓到了手，并且不仅是外交部，还有内务部。自从奥美尔-帕沙由保加利亚乘船到达克里木时起，土耳其就不再指挥自己的军队了。现在西方列强正把手伸向土耳其的财政。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在借国债，而且是在得不到贷款的情况下借国债的。它陷入了这样一个地主的境地，这个地主不仅抵押土地来进行借贷，而且必须让抵押物的持有者有权支配贷给他的钱款。他剩下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把地产本身也交给抵押物的持有者。帕麦斯顿曾经用这种贷款的方式使希腊萎靡不振，使西班牙陷于瘫痪。但是表面现象是对他有利的。主和派参加反对贷款的一派加深了这种表面现象。帕麦斯顿靠着玩弄诡计又作为战争拥护者的代表来反对代表和平拥护者的联合起来的反对派。他打算进行怎样的战争，我们是知道的。在波罗的海利用徒劳无益而毫无结果的大火使芬兰同俄国更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在克里木使流血牺牲无止境地延长下去；而能使流血牺牲停止的只会是失败，不会是胜利。他按照老习惯利用外交联盟以争取在议会内获得成功。波拿巴已经命令他的所谓“立法团”批准给土耳其贷款。英国议会除了成为“立法团”的回声，即成为回声的回声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否则联盟就有破裂的危险。帕麦斯顿一方面利用同法国的联盟作为挡箭牌来避开对自己的一切攻击，同时又为这个联盟受到攻击而感到高兴。为了证明“他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帕麦斯顿任命摩耳斯沃思先生为殖民大臣，而本·霍尔爵士则代替摩耳斯沃思担任王室森林和庄园大臣。摩耳斯沃思属于主张殖民地化的威克菲尔德学派²⁰⁹。这个学派的原则是：在殖民地人为地提高土地的价格和人为地降低劳动力的价格以达到“生产力的必要结合”。由于试图在加拿大采用这种理论，所以就把移民从加拿大赶到了合众国

和澳大利亞。

現在在倫敦有三個調查委員會在開會：一個是由內閣成立的，另外兩個是由議會成立的。由倫敦、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的審判員組成的第一個委員會是為了調查**海德公園事件**而成立的，每天向它提出的許多證據，不僅證明警察犯了不可思議的粗暴行為，而且證明他們是**按照上級命令**蓄意那樣干的。如果要公正地進行調查，那末調查就應該從主要的禍首——**喬治·格雷爵士**和內閣開始。由**貝克萊**主持的第二個委員會專門研究禁止“星期日出賣酒類”的法令的影響，它揭露了想用調整星期日休息時間來改善社會的那種偽善的庸俗的企圖。因酗酒而造成的破壞社會秩序的事件並沒有減少，反而增多了。這些事件僅僅是部分地從星期日移到了星期一。由**斯科菲爾德**領導的第三個委員會，研究食品、飲料和一切與飲食有關的商品的摻假問題²¹⁰。摻假是常規，質量好倒是例外。為了使不好的食品也具有色香味而摻進的物質，大部分都有毒，對健康起着破壞作用。商業就好像是一個龐大的欺騙實驗室，價目表是摻假的物品的嚇人的一覽表，自由競爭則是進行毒害和遭受毒害的自由。

包括到4月30日為止這半年來的情況的“**工廠視察員的工作報告**”²¹¹已呈交議會兩院。這份報告為說明**曼徹斯特的**和平擁護者和爭取從貴族那里奪得治理國家壟斷權的那個階級的特點作出了無可估價的貢獻。“由於機器而發生的不幸事故”在報告中分成下列各項：

(1)“死亡事故”，(2)“失掉右手或右手腕；失掉一部分右手；失掉左手或左手腕；失掉一部分左手；折斷手和腳；頭部和臉部受傷”以及(3)“組織破裂、內傷和上面沒有舉出的其他損傷”。

在报告中我们读到一个年轻的女人“失掉了右手”，一个儿童的“鼻梁骨被机器压扁并由于双目受伤而失掉了视觉”，一个男人“左腿被折断，右手被折断三四处，而头部则被毁坏得很可怕”，一个青年人“被折断了一只手臂，还有其他损伤”，以及另一个青年人“两只手臂都被折断，躯体下部被压裂，以致内臟露出体外，头和两条大腿也被压碎”等等。工厂视察员的这份工业通报比关于克里木战役的任何一份通报都更可怕、更吓人。妇女和儿童不断地为伤亡者名单提供大量名额。死亡和受伤如同种植场主的鞭子在黑人身上留下的伤疤一样被看得平淡无奇。几乎所有的不幸事故都是忽视法律所规定的防护机器的结果。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曼彻斯特这个主和派的首府的厂主们曾经不惜任何代价派出代表团与政府纠缠，反对规定在使用机器时必须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的法令。既然厂主们目前不能达到废除法律的目的，他们就企图阴谋撤销工厂视察员莱·霍纳的职务，把他撵走，并以一个更好说话的法律维护者来代替他，但是目前没有得到成功。厂主们断言，装置安全设备会吞没他们的利润。然而霍纳证实说，在他的区里，如果花上10英镑还不能保障安全的工厂只是少数。在报告涉及的6个月中，由于机器而发生的不幸事故的总数为1788起，其中死亡事故为18起。对厂主所处的罚金、由他们缴付的赔偿费等等总数在这段时间内达到298英镑。为了凑成这个总数，其中列入了因“在法律禁止的时间内工作”、因“使用未满八岁的儿童的劳动”等等所处的罚金；因此，因18起死亡事故和1770起重伤事故所处的罚金还远远没有达到298英镑。298英镑！这比一匹参加赛马的三等马的价值还少呢！

罗巴克委员会和英国寡头政治！斯科菲尔德委员会和英国商

业階級！工厂視察員的報告和英国厂主們！在这三个标题下可以明显地看出現時大不列顛統治階級的生理現象。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7 月 2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7 月 26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343 号

卡·馬克思

約翰·羅素勳爵²¹²

卡·馬克思寫于 1855 年 7 月 25 日
— 8 月 12 日

載于 1855 年 7 月 28 日、8 月 4、
7、8、10 和 15 日“新奧得報”第
347、359、363、365、369 和 377 号
及 1855 年 8 月 28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447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并根據
“紐約每日論壇報”校對過

—

倫敦7月25日。約翰·羅素勳爵愛引用輝格黨的一句老格言：“政黨像蝸牛，尾巴帶動頭”。大概他沒有料想到，尾巴為了自救，是會把頭砍掉的。而羅素勳爵雖然不是“**歷屆輝格黨內閣中上一屆內閣**”的首腦，但無疑是輝格黨的首腦。伯克有一次說道：

“羅素家族從英國人民那裏搶去的房產、田地、城堡、山林等等的數目，簡直是難以想像的(*quite incredible*)。”²¹³

約翰·羅素勳爵所享有的榮譽以及他敢於在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以上的時間內所扮演的那種顯要角色，是更加難以想像的，如果羅素家族所攫取的“田產的數目”不是揭開這個謎的鑰匙的話。

約翰勳爵好像一生只致力於獵取**職位**，而當職位弄到手之後，便死命地抓住不放，甚至連**實權**都一點也不想要了。1836—1841年，當他取得下院領袖的地位時是這樣。1846—1852年，當他獲得首相名位時也是這樣。他在作為向國庫衝擊的**反對派**領袖時所具有的那種虛幻的力量，每次都在他上台執政的那天就消失了。羅素只要一從 Out [反對派] 的人變為 In [政府] 的人，便立即**失去作用**。英國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活動家都沒有具備同等的能把有力量化為無力量的本領。但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同樣巧妙地把自己的無力量充作有力量。

那種虛幻的權力之所以周期性地落在約翰勳爵手中，除了靠培德福德公爵（約翰勳爵是他的幼子）家族的勢力之外，還靠他缺

乏所有那些一般說來使人能夠控制別人的特點。他對事物的那種淺薄的看法像傳染病一樣感染別人，而且比對真理進行最精巧的歪曲還更能給他的聽眾造成概念的混亂。他的真正的才能在於能夠把他接觸到的任何事物都降低到自身那種矮小的程度，把整個外部世界無限地縮小，變成一個他自己創造出來的庸俗的小天地。他的那種把大事化小的天賦才能，只有他的那種把小事充作大事的罕有本領才能比得上。

約翰·羅素勛爵的一生是建立在利用騙人的幌子上的。對他來說，議會改革是一種騙人的幌子，信仰自由是一種騙人的幌子，貿易自由也是一種騙人的幌子。他對騙人的幌子的力量的信念如此真誠，以致認為在騙人的幌子下不僅可以成為英國的國家活動家，而且還可以成為詩人、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只有這一點才能解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些胡謔出來的東西，如他的悲劇“唐·卡洛斯，或迫害”、“自亨利七世到現在英國政府及憲法的歷史經驗”以及他的“烏得勒支和約以來歐洲事務札記”²¹⁴。由於頭腦里充滿了狹隘的自私觀念，羅素把每一件事物都只看做是一塊供他寫上自己名字的 *tabula rasa* [白板]。他的見解從不以實際事實為依據，相反地，在他心目中事實本身是由他對事實的說法來決定的。作為一個演說家，他沒有給人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獨到見解，沒有一句至理名言，沒有一點真知灼見，沒有一點鮮明的記述，沒有一點美妙的思想，沒有一個生動的隱喻，沒有一點幽默的描寫，沒有一點真實的情感。“一個最可憐的庸才”（正如羅巴克在他的改革內閣的歷史一書²¹⁵中所認定的），這就是他甚至在進行他的社會生活中的一件最偉大的壯舉——向下院提出他的所謂改革法案的時候使他的聽眾感到驚異的地方。他具有一種獨特的手法：把他

那种像拍卖时估价人的喊叫一样的枯燥无味、呆板单调的话，同一些幼稚的历史例证和以“宪法的美妙”、“国家的普遍自由”、“文明”、“进步”等为题的冠冕堂皇的令人莫名其妙的词句结合起来。只有当他本人受到触犯的时候，或者当他被自己的敌手逼得放下他那副假装的高傲自负的姿态而露出心绪不宁的种种迹象的时候，他才会表现出真正的热情来。在英国，一般都认为他所遭到的无数次失败都是由于他的特殊的天生的急躁情绪所致。实际上这种急躁情绪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幌子。这种急躁情绪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他那种只是为了应付目前而使用的诡计和被迫采取的手段同后来形成的不利情况必然发生了冲突。罗素不是凭感情行动的，而始终是凭盘算行事的，可是他的盘算正像他本人一样浅薄，永远只能敷衍一时。因此他经常摇摆不定，支吾搪塞；突然冲上前去，忽又厚着脸退却；出言不逊，但又立刻转舵；提出高傲的保证，却又可耻地收回，而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时，他就泪流满面呜咽哭泣起来，以期赢得全世界的怜悯。因此他的一生可以看做或是一连串的 sham [骗局]，或是一连串连续不断的失算。

有人也许会奇怪，一个社会活动家，有这样多的措施成了死胎，这样多的草案失败了，这样多的计划早产了，他竟然还能站得住脚。可是正像被切除后而繁殖起来的水螅一样，约翰·罗素勋爵只是由于这些早产儿才飞黄腾达起来。他的大部分计划都只是为了缓和他的同盟者即所谓激进派的不满情绪而提出的，然而他同他的敌对者即保守派的妥协又保证了他“扼杀”这些计划。从议会改革以来，难道有谁能够举出一项他的“广泛的自由主义的措施”，一次“伟大的改革的兑现”（他是把这种兑现和他的内阁的命运联系起来的）吗？恰恰相反。为了讨好自由派，他提出了一些措

施，为了討好保守派，他又撤回了这些措施；这种做法最有助于他的內閣的巩固和持久。在罗素的一生中有过这样的时期：皮尔有意識地让他掌权，免得被迫去做他知道罗素只会瞎吹一通的事情。罗素在这些同自己的正式敌对者达成秘密協議的时期，对自己的正式同盟者采取了挑衅的态度。他在騙人的幌子下成了勇士。

讓我們来看一看他过去的活动，即从 1830 年到现在的活动吧。对于这样一个庸碌的天才是完全值得我們这样做的。

二

倫敦 8 月 1 日。

科貝特說過：“如果我是一個畫家，我就會把英國的憲法畫成一棵老橡樹，這棵樹的樹根已經腐爛，樹梢已經枯死，樹干上有窟窿，根基已經動搖，一刮風就搖擺不停，而把約翰·羅素勛爵畫成這棵樹上的一隻小鳥，這隻小鳥竭力想把一切整頓好，正在最下面的一根樹枝的一半已經腐爛的樹皮上啄蟲窩。有些人甚至疑心他是在清除樹皮上的害虫的幌子下啄食着嫩芽。”

在羅素飛黃騰達的史前時期，即從 1813 年到 1830 年，他的改革嘗試就是這樣微不足道的，這些嘗試不但極其微不足道而且甚至不是真心誠意的。只要有一點可以獲得大臣職位的跡象，他就一分鐘也不猶豫地放棄這些嘗試。

從 1807 年起，輝格黨人就夢想染指官家的羹餚，但無結果，直到 1827 年，他們在貿易和對外政策問題上似乎與之意見一致的坎寧內閣的成立，看來給了他們盼望已久的機會。羅素這時已經聲明，他準備提議討論他的“小鳥般的”關於議會改革的法律草案，突然坎寧表示只要他還活着他就堅決反對議會的任何改革。於是約翰勛爵便請求發言以撤回自己的提案。

他說：“議會改革是一個在改革的擁護者之間存在着很大分歧的問題，而輝格黨的領袖們始終反對把議會改革看做是黨內的問題。現在他是**最後一次**提出這個問題。”

他厚着臉皮在結束發言時宣稱：“人民不再希望議會改革了。”

約翰·羅素一向是以自己曾大叫大嚷地反對過 1819 年卡斯爾里的六條臭名昭彰的非常法²¹⁶而自夸的，而現在却在表決休謨關於廢除這些法令中的一條的提案時棄權，這條法令規定，任何出版物，只要從中看出哪怕一點點詆毀上院或下院的傾向，作者就要受到終身流放的懲罰。

這樣，約翰·羅素勳爵在他的議會生涯的第一時期的末尾，就背棄了他吹噓了十多年的主張議會改革的豪言壯語。這完全符合現代輝格黨人的原型霍雷修·沃爾波爾對康威表白的話：

“民主的法律草案從來不是嚴肅地提出來的，它們只是政黨的工具有而不是實現這些古怪思想的保證。”

因此，羅素在 1827 年 5 月**最後一次**提出議會改革提案的四年以後，於 1831 年 3 月 1 日再度提出這個提案即著名的改革法案，這決不能怪他。他迄今一直用來證明他應該獲得全世界特別是英國的贊美的這個法案，決不是他的創造。這個法案的主要特點是：取消大部分的腐朽的市鎮，增加各郡的代表人數，給予官冊農和契約農²¹⁷以及 24 個英國最重要的工商業城市以選舉權。從這些特點看來這個法案是格雷伯爵（1830 年組成的改革內閣的首腦）在 1797 年向下院提出的那個法案的翻版，當時格雷伯爵是反對派，可是當他 1806 年參加了內閣之後，就機靈地把這個法案置諸腦後了。這就是那同一個法案，只不過稍微變了一下樣子而已。威靈頓因為表示反對議會改革而被趕出內閣，法國爆發七月革命，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北明翰、曼徹斯特和倫敦等地成立的巨大政治組織表現出具有威脅性的積極性，各農業郡發生農民戰爭，赤公雞把自己的火焰遍布在英國最富饒的地區²¹⁸——所有這些情況迫使輝格黨人不得不好歹提出一個議會改革法案。輝格黨人屢

次想通过同托利党妥协的办法来保住自己的职位，但都枉費心机，于是就无可奈何地、勉强地作了让步。他們遇到的阻碍是：人民群众的可怕行动和托利党的死不妥协。然而，当議會改革法案刚刚完成了立法手續开始实施的时候，人民就像布莱特在 1849 年 6 月 6 日所說的，“感到自己受騙了”。

恐怕从来还没有一个这样强大的、看来似乎成功的人民运动得到这样微不足道的表面的結果。不仅工人阶级仍旧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影响，而且资产阶级本身也很快就了解到，改革內閣的中心人物，即奥尔梭普勛爵对他的托利党营垒中的敌对者所讲的下面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空話：

“議會改革法案是曾經向国民提出过的措施中最貴族化的一个。”

农业区的新的代表名額大大超过城市增加的票数。給佃农^①以投票权，使得各郡更加变成了貴族的工具。以每年收入 10 英鎊以上房租的房主这一类代替納稅人这一类，这样就剥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投票权。給某些人以选举权和剥夺某些人的选举权，一般地說来，不是为了增强资产阶级的势力，而是为了削弱托利党的势力，加强輝格党的势力。輝格党人用一連串令人很难置信的詭計、狡猾手段和欺騙，保存了选区之間的不平等状态，恢复了代表名額同某些选区的人口和这些选区的重要性之間的极不适应的情况。約有 56 个居民极其稀少的腐朽的市鎮被取消了，可是整个整个的郡和人口稠密的城市却变成了腐朽的市鎮。約翰·羅素本人在給他的选民——斯特勞德的选民一封“論改革

① 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里是这样写的：“每年交納租金 50 英鎊的佃农”。——編者注

法案的原則”(1839年)的信中也承認:“十英鎊投票權受到各種各樣條例的限制,每年的選民登記成了挑剔和浪費的根源。”在不能再使用恐嚇手段和利用傳統影響的地方,就採用一套收買的办法,這套办法在議會改革法案通過之後便成了英國憲法的基石。這個只是由羅素提出而不是由他草擬的議會改革法案就是如此。能夠明顯地看出是他的發明的只有以下兩條:一條是規定所有自由農²¹⁹,除神職人員外,占有土地的期限為一年;另一條規定羅素家族所在的“腐朽的市鎮”——塔維斯托克原封不動地保留自己的特權。

羅素在改革內閣(1830年到1834年11月)中只不過是一個次要人物——陸軍財務主任,在內閣中沒有表決權。他在自己的同僚中幾乎是最不重要的,然而他是有勢力的培德福德公爵的幼子。因此大家都同意給他在下院提出改革法案的榮幸。可是要實現這個各家族之間的協議有一個障礙。在1830年以前的改革運動期間,羅素一直當 Henry Brougham's Little man (亨利·布魯姆的下手)。當布魯姆同他一起在下院開會的時候,是不能委託他來提出議會改革法案的。不久這個障礙就消除了,這位好虛榮的平民被調到上院去坐羊毛口袋²²⁰了。因為初期的改革內閣的一些最重要的閣員,不久有的跑進了上院(如奧爾梭普在1834年),有的死掉了,有的轉到托利黨去了,所以羅素不但成了這屆內閣的唯一繼承人,而且還獲得了改革法案之父的名聲,但充其量他不過是這個法案的教父而已。他冒充改革法案的起草人,在這騙人的幌子下出足了風頭,其實連改革本身也不過是一種騙人的東西和狡猾的手腕。在1830—1834年期間,除改革法案外,他引起過人們注意的只是他在反對審查養老金名單的措施時所表現的那種暴躁態度。

三

倫敦 8 月 3 日。我們再來品評一下羅素吧。我們之所以要多費些筆墨來談論他，因為第一，他本人是當代輝格主義的典型代表，第二，他的歷史——至少從某一方面來說——是議會自改革以來的歷史。

羅素在為他的改革法案辯護時，關於 *Ballot*（秘密投票）和短期議會（大家知道，輝格黨人在 1694 年把英國議會任期由一年改成三年，又在 1717 年改成七年）作了如下的聲明：

“毋庸置疑，*Ballot* 有很多優點。主張 *Ballot* 的人們所持的論據，同在討論某個爭論問題時我所聽到的任何理由一樣是既機智而又令人信服的。可是議院畢竟應該避免作出過分倉促的決定……關於短期議會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讓別的議員有機會在將來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不能讓我的大題目包括過多的細節。”

1833 年 6 月 7 日，羅素聲明，

“為了避免同上院衝突，他不顧深深扎根在他心靈的信念（！）而放棄了這兩項建議。他深信這些措施對於國家的幸福、繁榮和安寧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你們看，這就是他玩弄辭令的典型例子。）

由於這種“深深扎根的信念”，他在內閣任職的整個時期中始終如一地、毫不妥協地反對秘密投票和短期議會。在他發表這些聲明的時期，這些聲明都是追求雙重目的的詭計。它們要安定下院多疑的民主派，又要引起上院頑固的貴族們的恐懼。但是，當羅

素一有把握获得維多利亞女王新宮廷的支持(見 1839 年布魯姆对罗素的致斯特勞德選民书的回答)因而自以为将永远有官可做时,就在 1837 年 11 月发表声明为“改革法案实行得极其緩慢”进行辯护,說什么这个改革排除了进一步发展的一切可能。

他說:“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土地占有者的优势**,并且按照設想,它是对一个重大的宪法問題的**最終解决**。”

簡單地說,正是这个关于已經达到极限的声明,使他获得了«Finality John»〔“頂点約翰”〕这样一个綽号。可是他对待«Finality»、对待停在原地的决心,并不比他对待以前的前进的决心更加認真。在 1848 年,他反对休謨关于議会改革的提案。当休謨在 1849 年再度提出同样的提案时,他依靠輝格党人、托利党人和皮尔分子的联合力量,以 268 票对 82 票的多数又一次击败了休謨。由于保守派的支持,他的胆子大起来了,他以挑衅的口吻宣称:

“当我们拟定并提出改革法案的时候,我們力求使下院的代表名額适应其他的国家政权机关,使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宪法。布莱特先生和他的同道者**目光这样短淺**,他們的判断力和理解力被这样狹小的眼界所限制,簡直沒有办法向他們讲明白我們祖先用以奠定我国宪法基础并应为我们后人心悅誠服地贊頌和力求仿效的那些偉大原則。下院在改革以来的 17 年中,沒有辜負人們公正地对它寄予的一切希望。現行制度虽然有些脫离常軌,但是恰恰是由于脫离常軌,它才很好地在起着作用。”

但是,1851 年,在罗素反对洛克·金的在各郡扩大选举权(凡年收入 10 英鎊的小土地占有者都有选举权)的提案遭到失敗并看出自己不得不辞职几天的时候,他的“广闊的眼界”突然使他看到有必要提出一項新的改革法案。他向下院保证提出这样一項法

案。他不談新“措施”的实质是什么，只是开了一張答应在最近的一次議會常会上兌現的期票。

同羅素結成聯盟的所謂激進派的機關刊物“韋斯明斯特評論”當時聲稱：“目前的內閣還妄想繼續執政，這已成了眾人嘲笑和責難的對象；最後當內閣的倒台和執政黨的崩潰看來已經不可避免的時候，約翰勳爵就答應在1852年提出新的改革法案。他喊道，請堅持到那個時候吧，我一定會滿足你們對於廣泛的自由主義的改革所抱的強烈願望。”

1852年他果真提出了一項新的改革法案，這一次倒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不過規模渺小得連保守派也認為不必加以攻擊，自由派則認為無須為它辯護。無論如何，這項早產的改革卻給了這位終於不得不離開內閣的矮小人物一個借口，使他能夠在逃跑時回身向他的勝利的繼任者得比伯爵放了一支暗箭。他在離開時大聲威嚇說，“將堅持擴大選舉權範圍”。擴大選舉權範圍從此就成了“他衷心熱愛的事情”。這位剛剛被趕出內閣的常常採取不得已措施的英雄，現在已被自己的擁護者稱為《Foul weather Jack》（“壞天氣傑克”^①），他在切舍姆街的私邸召集了各個不同的派別開會，這些派別的結合便產生了一個虛弱而奇怪的聯盟。他沒有忘記邀請“目光這樣短淺”的布萊特和科布頓，沒有忘記在這個莊嚴的會議上因自己的廣闊眼界而請求他們原諒，並給他們開了一張新期票，保證另外提出一個“意義更大的”改革法案。1854年羅素作為聯合內閣的一個閣員又提出了一個選舉法改革草案來取悅下院。這個草案事先已經確定要成為新的伊菲姬尼亞，由羅素這位新的亞加米農獻出來，作為取得新的特洛伊遠征勝利的祭品。他主持

① 這是英國人給海軍上將約翰·拜倫(1723—1786)取的綽號。因為他在海上航行或作戰時總是遇到倒霉的事。——譯者注

祭礼仪式时用的是梅塔斯塔西奥的音乐話剧的風格，眼泪汪汪，可是一当他在內閣所占据的“沒有薪俸的”职位，由于他用卑鄙的阴谋反对自己党的党员斯特腊特先生而变为薪俸2 000 英鎊的樞密院院长的职位时，眼泪立刻就干了。

第二个改革草案的目的是要巩固他的搖搖欲墜的內閣，第三个則是在迫使托利党內閣垮台。第二个草案是騙局，第三个草案是詭計。他的第二个草案所具有的形式使得誰也不願理它，而第三个草案則是在誰也沒有可能做那样事情的时候端出来的。这两种情况都证明了虽然命运使他当了內閣大臣，但他的本性却注定了他只配扮演像克里斯多弗·史賴一样的流浪的补鍋匠的角色。甚至在第一个，也就是唯一付诸实施的那个改革草案中，他所抓到的不过是寡头政治的詭計，而不是整个策略的历史含义。

四

倫敦 8 月 4 日。从反雅各宾战争时起，輝格党在英格兰的势力就每况愈下了。因此，他們就把視綫轉向爱尔兰，决定借爱尔兰来挽回自己的势力，于是他們就在自己的党旗上写上“解放爱尔兰”。他們在 1806 年执政的短时期內，确实向下院提出了在爱尔兰实行細小的改革的法案，这项法案經二讀通过了，可是后来为了討好伪善而愚蠢的乔治三世又自願把它撤回了。1812 年，輝格党人曾试图（当然沒有成功）强迫摄政王（后来的乔治四世）容納他們，他們的借口是：他們是可能同爱尔兰达成和解的唯一的工具。無論在改革运动以前或是在改革运动期間，他們都百般奉承奥康奈尔，而“爱尔兰的希望”也作为强有力的武器为他們使用。尽管如此，改革內閣在改革后的議會的首屆常会时期作出的第一道法令却是对爱尔兰宣战，却是一种“野蛮而血腥的”措施：使爱尔兰处于戒严状态的“非常法”^①。輝格党人用“火、監獄、流放甚至死刑”来履行自己过去的諾言。奥康奈尔被起訴，并被判以叛乱的罪名。而輝格党人向議會提出并在議會通过为爱尔兰制定的非常法只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坚决保证提出另一个法案，即关于在爱尔兰的英国国教会的法案。这个法案必須包括这样一条，即国教会在爱

^① 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这句话的結尾是这样的：“……为爱尔兰制定的非常法——‘关于紅衣法庭的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在爱尔兰設立了軍事法庭以代替普通法庭和陪审法庭。”——編者注

尔兰的收入中的一部分**余額**应交議會支配（这就是輝格党人承担的义务）。而議會方面則应当把这笔錢用来做有利于爱尔兰的事情。这一条的意义在于承认議会有权征用国教会的財產的原則，这个原則在約翰·罗素勋爵看来当然特別显得正确，因为他的家庭的大量地产都是过去教会的土地。輝格党人保证坚持这个教会法案，否則就提出辞职。可是非常法剛一通过，輝格党人就以必須避免同上院发生冲突为借口，撤銷了上述的唯一使他們的教会法案具有意义的条款。他們投票反对自己的提案，使它遭到了否决。这件事发生在1834年。可是，就在这一年的年底，輝格党人对爱尔兰的好感就像受到电流刺激一样又复活起来了。原因是1834年秋，他們不得不把內閣的席位給罗伯特·皮尔的內閣让出来。他們又被拋到反对派的位子上去了。于是我們立刻就看到我們的約翰·罗素在同爱尔兰和好方面的非常热心的活动。1835年1月，他是出席簽訂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²²¹的談判的主要代表。按照這項协定，輝格党人給予奥康奈尔在爱尔兰有 patronage（分配职位等等的权力）。奥康奈尔这方面則保证爱尔兰在議會內外都投他們的票。可是要把托利党人赶出唐宁街必須有一个借口。于是罗素就以他固有的那种“一絲不苟的精神”選擇了爱尔兰的**教会收入**問題作为戰場，而以他和他的改革內閣的同僚們在这不久以前就已自己放棄和撤回了的那項臭名昭彰的所謂“征用条款”作为战斗口号。皮尔內閣果然在“征用条款”的旗帜下被推翻了。成立了墨尔本內閣，約翰·罗素勋爵得到了內务大臣的职位并当了下院的領袖。于是他就自吹自擂起来，一方面說他有堅韌不拔的精神，因为他虽然已經当政，但仍繼續坚持他的关于“征用条款”的**信念**，另一方面說他有道德上的节制力，因为他並沒有根据这些信念行事。

他的信念总是停留在口头上，因而他也就从来没有把它实现过。1846年他当了首相后，他的道德上的节制力是这样完全战胜了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以致他连自己的“信念”也放弃了。罗素声称，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措施比侵害国教会的物质基础即它的收入的措施更为有害的了。

1833年2月，約翰·羅素以改革內閣的名义激烈地反对爱尔兰的 *Repeal* [取消(取消合并)]运动。

他在下院高喊道：“这个运动的真正目的是力图直接推翻联合議會，并以奥康奈尔为首領和主腦的議會来代替联合王国的国王、上院和下院。”

1834年2月，国王的演說又对 *Repeal* 运动加以攻击，于是改革內閣在答詞中建議

“郑重宣布，保持三个王国的立法机构合并的不可侵犯和完整无缺的形式是議会的不可动搖的意志”。

可是，一当約翰·羅素又停擱在反对派淺滩上的时候，他就宣称：

“談到 *Repeal* 合并一事，这个問題之可以作为修正和质問的对象，完全像立法机构的任何其他法令一样”，

也就是說，簡直就像任何啤酒法案一样。

1846年3月，約翰·羅素同那些对自己的領袖在谷物法問題上的变节行为急欲加以懲罰的托利党人联合起来，推翻了皮尔政府。借口是皮尔为爱尔兰提出了“武器法案”，罗素义憤填膺地坚决抗議这个法案。他当了首相。他的第一步就是向議會提出同样的“武器法案”。可是，这只是使他白白地丢了臉。奥康奈尔已經及时地組織了許多次大規模的群众集会来反对这个法案，并且在

請願书上征集了5万人的签名；他那时在都柏林，从那里领导整个运动。King Dan（丹王——人民这样称呼丹尼尔·奥康奈尔）如果这时被认为是和罗素一伙的话，那他就会失去他的王国和收入。因此他以威胁的形式警告这个矮小人物，要他立即撤回他的武器法案。罗素撤回了这个法案。尽管奥康奈尔和辉格党人有秘密的勾结，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在巧妙地打败了他们以后又侮辱了他们一番。为了不使人有一点点怀疑退却信号是根据谁的指示发出的，8月17日，即约翰·罗素在下院宣布撤回武器法案的同一天，奥康奈尔就对在都柏林和好大厅集会的取消合并运动的参加者宣布了撤回武器法案这件事。1844年，罗素责备罗伯特·皮尔爵士，说“他使爱尔兰驻满了军队，他不是治理那个国家，而只是占领了它”。1848年，罗素占领了爱尔兰，在那里实行了叛国法，使 Habeas Corpus Act²²² 暂时停止生效，并吹嘘克拉伦登的“果断措施”。可是这种果断也只是骗人的幌子。在爱尔兰有两派人互相对立着，一方面是同辉格党人有秘密勾结的奥康奈尔的拥护者和神甫们，另一方面是斯密斯·奥勃莱恩及其信徒。后一派入只是一些 dupes [受骗者，糊涂虫]，他们把取消合并的把戏当成了正经事，结果是以闹剧终场。罗素政府所采取的“果断措施”和干下的暴行，完全不是由于实际情况所引起的。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巩固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而是为了延长辉格党在英国的执政。

五

倫敦 8 月 6 日。1815 年在英國實行了谷物法，因為托利黨和輝格黨共同決定用向國民徵稅的辦法來提高他們的地租。托利黨和輝格黨所以共同決定這樣做，不僅僅由於谷物法（反對從國外進口谷物的法律）能在幾年內人為地提高谷物價格。如果我們把 1815 年到 1846 年這段時期考察一下，我們會看出，起着更大作用的大概是租佃農場主的幻想：似乎在任何條件下谷物法都能使谷物價格保持在 *à priori* [原定的] 水平上。這種幻想對租佃契約是有影響的。為了經常保持這種幻想，我們看到議會經常在忙於修訂和改進 1815 年的谷物法。但儘管有谷物法的規定，谷物價格還是不斷下跌了，這時，議會就成立了一些委員會來調查造成 *agricultural distress*（農業災難）的原因。作為議會調查對象的 *Agricultural distress*，實際上只是租佃者付給土地占有者的土地租金和他出售給消費者的農產品價格之間的不相適應的狀況，換句話說，就是地租和谷物價格之間的不相適應的狀況。因而這種不相適應的狀況是很容易克服的，只要降低土地貴族收入來源——地租就可辦到。土地貴族自然寧可利用立法手段來“降低”谷物價格，而不願降低地租；一個谷物法換成另一個谷物法，只不過稍微改變一下外表而已；他們把谷物法不起作用的原因每次都歸咎於一些不重要的細節問題，這些問題他們認為只要議會頒布一項新的法令就可以解決。因此，谷物價格只是在某些情況下才保持在不正常

的高水平上，而地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在不正常的高水平上。由於問題涉及到了土地貴族“最神聖的利益”，涉及到了他們的現金收入，所以他們的兩個派別——托利黨和輝格黨——都同樣樂於把谷物法看做是懸在他們黨派鬥爭戰場上空的恆星。輝格黨人在這個問題上甚至沒有想要宣布他們的“自由主義觀點”，尤其是因為以重獲官職、取得世襲年金的辦法來彌補他們在地租方面可能出現的虧空，當時在他們看來還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情。這兩派人由於都希望得到金融貴族的支持，所以在1819年都投票贊成銀行法；根據這條法律，以貶值的貨幣計算的國債，其利息應以足值的貨幣償付。國家所借的假如是50英鎊，它就得償還100英鎊。他們就這樣買得了金融貴族對谷物法的同意。以欺詐手段提高國債的利息換取以欺詐手段提高地租——這就是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狼狽為奸的意圖。這以後，就無怪乎約翰·羅素勳爵在1835年和1837年議會選舉的時候，宣稱對谷物法的任何改革都是有害的、荒謬的、不實際的和不必要的了。從他踏上內閣的宦途時起，他就反對任何這類的提案，起初還比較斯文，後來就惱火了。他在維護高額的谷物關稅方面，遠遠超過了羅伯特·皮爾爵士。1838年和1839年飢荒的前景沒有能夠動搖他和墨爾本內閣其他閣員的意志。國家的災情不能觸動他們，但內閣的災情卻把他們打動了。750萬英鎊的國家財政赤字和有引起對法戰爭危險的帕麥斯頓的對外政策，促使下院根據皮爾的提議對墨爾本內閣投了不信任票。這件事發生在1841年6月4日。總是那樣貪婪地追求職位、那樣不稱職、但又那樣不樂意放棄職位的輝格黨人，試圖（當然是枉費心機）用解散議會的辦法來逃避自己的命運。這時在約翰·羅素的心靈深處產生了一個想法，就是先利用反對谷物法運

动，然后再把这个运动化为烏有，就像过去在他的帮助下先利用改革运动，然后再把这个运动化为烏有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突然表示贊成用“适度的固定关稅率”来代替关稅調节制的原因——要知道他总是主張“适度的”政治上的貞节和“适度的”改革的。他恬不知耻地同政府候选人的队伍一起在倫敦大街上游行，队伍中还有人在他們拿的旗杆上挂了两个对比鮮明的面包：一个是两辨士的面包，上面写着“皮尔的面包”；另一个是一先令的面包，上面写着“罗素的面包”。可是这一次人民不上他們的当了。人民从經驗中知道，輝格党人答应給面包，而拿出来的是石头。所以尽管罗素举行了滑稽的熱鬧的游行，輝格党政府在新的选举中还是只得到了76席的少数。輝格党政府終于不得不让出內閣的席位。罗素对1841年沒有替他好好效劳的那个适度的固定关稅率进行报复，罗素在1842年心平气和地让皮尔的“調节制”成为法律。現在他鄙視“适度的固定关稅率”，已經不再理它，一声不响地听任它破产了。

1841年到1845年間，反谷物法同盟发展到了巨大的規模。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之間的旧盟約已經不再是維護谷物法的保证了，因为工业資產階級排挤着金融貴族，日益成为資產階級中的主导部分。而廢除谷物法对工业資產階級來說，是一个重大的切身問題。在工业資產階級看来，廢除谷物法意味着：降低生产費用，扩大对外貿易，增加利潤，縮小土地貴族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而也就削弱他們的权力，加强自己的政治勢力。1845年秋，爱尔兰馬鈴薯发生病害，英格兰谷价上漲和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歉收，这些都大大地帮助了工业資產階級。被帶有危險性的行情吓坏了的罗伯特·皮尔爵士于1845年10月底和11月初举行了一系列的內閣

會議，在会上提出了暫時廢除谷物法的建議，甚至暗示有永久廢除的必要。由于一个閣員斯坦利（即現在的得比勛爵）的拚命反对，內閣当时沒有作出决定。

这时正在利用議會假期在爱丁堡游覽的約翰·罗素，嗅到了皮尔內閣所发生的事件。他决定利用斯坦利造成的阻碍，以便赶在皮尔的前头，第一个占領必能給他带来声望的陣地，冒充为皮尔的鼓舞者，从而使皮尔想要作出的决定失去任何道义上的力量。与此相适应，他借口內閣迟迟沒有就爱尔兰的災情問題作出决定，于1845年11月22日从爱丁堡写信給他的西蒂区的选民們，信中充滿了針對皮尔的刻薄而恶毒的暗語。1831、1835、1837和1839年在爱尔兰发生的周期性的饥荒，沒有一次动摇过罗素和他的同僚們对谷物法的信心。現在他却突然热心起来了。甚至像两个民族的饥荒这样可怕的災难，也只是被这个矮小人物用来作为給他的“身居要职的”对手設置陷阱的借口。他在这封信里企图隱匿他突然变成貿易自由拥护者的真实动机，用一个悔过的罪人的如下的自白来掩飾：

“我承认，我在這個問題上的信念在20年中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过去总认为谷物是政治經濟学的一般規則中的一个例外，但是观察和經驗使我确信，我們應該放棄对食物輸入問題的任何干預。”

就在这封信里，他責难皮尔，說皮尔至今还没有干預爱尔兰輸入食物的問題。于是皮尔就使这个矮小人物跌进了他自己所設的陷阱。他呈請辞职，但他上书女王，表示如果罗素負責廢除谷物法，那他就支持罗素。女王召見了罗素，委托他組織新內閣。他亲了一看……宣布这事即使有自己对手的支持也是力不胜任的。他沒有想到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在他看来，一切本来都只是個騙

人的幌子，可是現在有人威脅着要用他的話來揪他了！於是皮爾重新上台，並且廢除了谷物法。他的這種行動打垮了並瓦解了托利黨。羅素又同托利黨聯合起來準備推翻皮爾。這就是他可以用來辯明他有資格取得“貿易自由大臣”稱號的全部東西，幾天以前他還用這個稱號為自己吹噓過。

六

倫敦 8 月 12 日。我們再來談一談約翰·羅素勳爵，以便完成對他的評述。他在他的政治生涯開始的時候，以虛假的容忍態度騙得了一定的聲譽，他在他的政治生涯結束的時候，又以虛假的虔誠騙得了某種聲譽；在前一種情況下，他用的是關於廢除《Test- and Corporation-Acts》²²³ 的提案，在後一種情況下，則用的是他的《Ecclesiastical Titles Bill》（教會聖職法案）²²⁴。宣誓法和市鎮機關法使非國教徒失去了擔任國家職務的可能性。而羅素在 1828 年提出他的轟動一時的關於廢除這些法令的提案時，這些法令早已成為僵死的字句了。他提出他那提案的論據是：他確信，“廢除這些法令能加強國教會”。當時有人寫道：“對這個提案順利通過一事最感驚訝的是提案人自己。”只要回想一下，一年以後（1829）托利黨內閣自己提出了解放天主教徒的法案，當然就是希望預先擺脫宣誓法和市鎮機關法，那末，這個謎是不難猜透的。可是非國教徒從約翰勳爵那里除了他在當反對派時許給他們的一些諾言以外什麼也沒有得到。而一旦他上台執政，他甚至反對廢除教會稅（church rates）了。

他對羅馬教皇^①的攻擊，更加清楚地說明此人的空虛和他所抱動機的卑鄙。我們看到，他在 1848 年和 1849 年把輝格黨和托

① 庇護九世。——編者注

利党及皮尔派联合起来，搞垮了他自己的同盟者所提出的关于改革的提案。1850年，当教皇关于对在英国的羅馬天主教僧侶实行圣秩制度和任命紅衣主教魏茲曼为韦斯明斯特大主教的圣諭在一部分最虛伪、最短視的英国人中間引起了某些波动的时候，他的內閣是极端軟弱和不穩固的，因为它那样依赖于保守的反对派。但不管怎样，对罗素來說，教皇的举动并不是出乎意外的。当“羅馬日报”于1848年发表任命魏茲曼的消息的时候，他的岳父敏托勳爵就住在羅馬。从紅衣主教魏茲曼“給英国人民的信”中我們知道，教皇还在1848年就把在英国实行教会圣秩制度的圣諭給敏托勳爵看过了。罗素自己还事先采取了一些措施，迫使克拉倫登和格雷正式承认爱尔兰和各殖民地的天主教的教会圣职。可是現在他考虑到自己的內閣不穩固，回忆起1807年輝格党政府因反对天主教而倒台这段历史就感到不安，惟恐斯坦利在議會假期中仿效派西沃和他自己来赶在他前头，就像他自己曾經試图靠廢除谷物法来赶在罗伯特·皮尔爵士前头一样——被所有这些預感和怪影所苦恼的这个矮小人物突然燃起了不可遏制的新教的狂热，于是便实现了 *salto mortale* [致命的一跳，冒險的一步]。1850年11月4日，他发表了臭名远揚的“給德勒穆主教的信”，他在信里向主教保证說：

“我完全同意您的这一看法：教皇最近对我们新教的侵犯，不能不认为是蛮橫的、陰險的，因此我和您一样对这种情况表示憤怒。”

他談到了“目前为了束縛精神和奴役灵魂而作的頑强的嘗試”。他把天主教的仪式称作“大多数国民所鄙視的迷信的伪装”，最后他向主教保证：如果旧法律不足以对付教皇的这种僭越行为，他就提出新的法案来。同一位約翰勳爵，在1845年，在他确实还

沒有掌权时却曾宣称：

“我想，我們可以廢除那些阻止羅馬天主教主教取得國教會主教們所取得的聖職的條款。沒有比保持這種差別更荒謬更幼稚的了。”

1851年，他向議會提出了教會聖職法案來鞏固這些“荒謬而幼稚的差別”。可是由於在同一年，在討論洛克·金的關於擴大選舉權的提案時他被愛爾蘭旅、皮爾派、曼徹斯特派等所組成的聯盟所擊敗，他的新教狂熱也就煙消雲散了，同時他還答應修改這個法案，而實際上這個法案早已是一個死胎了。

不僅羅素對羅馬教皇進行的攻擊是騙人的幌子，就連他熱烈擁護解放猶太人也是騙人的幌子。大家知道，他的 Jewish Disabilities Bill [關於取消對猶太人權利的限制的法案] 是每年都要上演的滑稽劇，是對被奧地利路特希爾德男爵所控制的西蒂區選民們的誘餌。此外，羅素反對奴隸制的宣言也是騙人的幌子。

布魯姆勳爵在給他的信中寫道：“您反對一切有利於黑人的提案，您反對即使只是想阻止重新恢復起來的奴隸買賣的企圖，這都擴大了您和國家之間的鴻溝。誰要是相信，您，一位在1838年攻擊一切反對奴隸制法律的人，一位反對對殖民地奴隸主會議的活動進行任何干涉的人，真的突然對黑人產生了這樣的熱愛，以致在1839年不顧有失去一切職位的危險，提出了保護黑人的法案，那他就有有一種驚人的自欺的癖好。”

對於羅素來說，司法改革也是一種騙人的幌子。當1841年議會對輝格黨內閣投了不信任票，而且即將採取的解散議院的手段看來也無濟於事的時候，羅素就企圖使下院倉卒通過 Chancery Bill [關於大法官法庭的法案]，以便

“通過設置兩個新的 judges of equity [正義法官] (這種法官應該遵循的不是法規，而是正義) 的職位來醫治我們制度中的一個最令人苦惱的毛病——courts of equity [正義法庭] 的拖拉現象”。

羅素把他的這個法案叫做“在司法改革方面的一次重大的發現”。他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在托利黨人組閣看來即將成為事實以前偷偷地把他的兩個輝格黨朋友安置在新設的職位上。愛德華·薩格登爵士（現在的聖萊昂納茲男爵）看透了羅素的用意，提出了一個修正案，根據這個修正案，法案要到10月10日（即在新選出的議會召集起來以後）才能生效。儘管對這個法案（用他的話來說，這個法案是這樣“迫切”需要）的實質沒有作絲毫的變動，但是當那個修正案一被通過，羅素馬上就把它撤回了。法案變得“淡而無味”，它失掉了自己的鹽分。

殖民地的改革、國民教育方面的草案、“臣民的自由”、出版和公開集會的自由、戰爭熱情和對和平的渴望——這一切對於約翰·羅素勳爵來說都不過是騙人的幌子。他整個人就是騙人的幌子，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一派謊言，他的全部活動都是為了達到骯髒的目的，為了侵吞公共財富和篡奪僅僅是表面上的權力而使用的一連串卑劣的陰謀詭計。聖經上有一句格言：人是不可能使自己的身長增加一英寸的。要證明這句話，除羅素外，很難找到更好的例子了。他的出生和親朋關係以及时勢給他造成的機緣使他爬上了高峰，可是他始終是一個在金字塔頂上跳舞的矮子，一個侏儒。像他那樣名位顯赫的渺小人物，歷史上恐怕是獨一無二的。

卡·馬克思

北明翰代表會議：丹麥王位繼承 問題和四項保證問題²²⁵

一

倫敦 7 月 27 日。倫敦成立了同“行政改革協會”相對抗的“國家改革協會”²²⁶。這個協會吸收了厄內斯特·瓊斯和憲章派其他一些領袖參加它的委員會。前天在群眾大會上宣布的這個協會的主要宗旨是：在普選權的基礎上實行議會改革。

北明翰代表會議於 7 月 23 日閉幕。出席代表會議的有哈得茲菲爾德、太恩河畔新堡、倫敦、哈里法克斯、設菲爾德、里子、得比、布萊得弗德、諾定昂和北明翰的代表，他們在北明翰集會是為了對統治階級及其在內閣和議會的代表的對外政策作出自己的判斷。正如“北明翰每日新聞”所指出的，憲章派

“拒絕參加任何人發起的任何運動已經有好幾年了；但是這一次他們的表現卻不同。他們十分興奮地參加了這次運動，因為他們感到，這次運動並不追求任何同他們敵對或不相容以及一般的任何階級的利益”。

烏爾卡爾特在工廠區逗留，對於這次值得注意的代表會議的召開，無疑是一種促進；他出席了代表會議的所有會議。由於時間不夠，我們未能應邀參加北明翰代表會議，我們只是在現在才有可

能从一些值得注意的文件中作出摘录，这些文件包括在寄給我們的关于代表會議工作情况的鉛印报告²²⁷中。卖身投靠的倫敦报刊对这次代表會議要就是只字不提，要就是歪曲事实。馬姆茲伯里伯爵同代表會議选出的委員會的秘书有过下列信件往来：^①

“先生！我荣幸地接到了您要我参加北明翰代表會議的邀請。我不能接受这一邀請。但是我急于要把您所感到兴趣的关于1852年5月8日簽訂的**丹麦条約**的材料告訴您。您对这个条約的目的所作的估計是錯誤的。說‘条約保证俄国继承丹麦和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王位’是不正确的。無論現在或是将来，俄国都不会得到它在条約締結以前所未曾有过的任何权利。目前，有权要求丹麦王位的四个男性继承人还健在。条約規定：一旦所有的继承人都去世，締約各方，即奥地利、普魯士、俄国、英国、法国和瑞典必須考虑丹麦国王为了保证王位的继承而根据丹麦君主国完整的原則所提出的任何建議。因此，如果发生上述事件，締約各方就会着手妥善解决关于丹麦王位

① 在“紐約每日論壇报”发表的卡·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上述这段话，而是下列原文：

“如果根据倫敦报刊的报道来判断英国的运动，那是很大的錯誤。例如最近一次北明翰代表會議倫敦大部分報紙連提都沒有提，其余的報紙只报道了會議召开的消息。这次代表會議是一次什么样的會議呢？这是一次有北明翰、倫敦、哈得茲菲尔德、新堡、哈里法克斯、設菲尔德、里子、得比、布莱得弗德、諾定昂以及其他地方的代表参加的公开的代表大会。代表們集会是为了从腐败无能的議會手里夺取审查当时最重要的問題——英国的对外政策的权利。

毫無疑問，由烏尔卡尔特先生在所有工厂区召开的群众大会促进了这次运动，而在北明翰举行的代表會議的特点就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代表共同参加了这次會議。代表會議成立了若干个委員會，这些委員會就英国对外政策的一些重大問題提出报告。我得到了关于代表會議历次會議的詳細报告和有关文件。我現在把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材料介紹給‘論壇报’的讀者。首先介紹代表會議秘书和得比勳爵政府的外交大臣馬姆茲伯里勳爵之間的来往信件，这些信件是說明1852年5月8日簽訂的关于丹麦王位继承問題的条約的。馬姆茲伯里勳爵写道：”。——編者注

的繼承問題，我請您自己判斷一下：在這種情況下，5月8日同俄國簽訂條約的五個強國是否會願意讓作為霍尔施坦-哥托爾普王朝首腦的俄國把整個丹麥君主國併入自己的領土。”

馬姆茲伯里勳爵的信的內容就是這樣。代表會議秘書對這封信的答复如下：

“閣下！北明翰代表會議委託我對您函告丹麥條約一事表示感謝。從您的來信中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一旦四個法定繼承人去世，英國和俄國有責任干預以丹麥國王為一方和以某些國家如丹麥、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為另一方之間的关系。我們不了解，這種干預的權利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我們堅信，同俄國交戰的事實應當被用來杜絕這種十分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行为。您使我們了解到，按照您的看法，六個強國本身就是不容許俄國繼承王位的保證。閣下，我們很想從您那里知道，整個君主國如果**不**轉交給俄國，那轉交給誰呢？如果英國不認為俄國是一切領土的繼承者，那末它為什麼不提出俄國放棄霍尔施坦-哥托爾普的權利作為簽訂條約的條件呢？既然這個條約是您簽訂的，那就可以這樣設想，要麼對這些問題根本不能回答，要麼只有您才比其他任何人更能回答這些問題。因此我受委託請求閣下您回答這些問題，從而使我們消除嚴重不安的理由。”

不用說，通訊到此中斷了，雖然勳爵閣下可以說，他只是形式上參與了這件事。帕麥斯頓早就同布隆諾夫男爵簽訂了一項議定書，其中明確規定了未來的這個條約的章節和原則。^①

代表會議成立了一些委員會來研究和草擬各項問題的報告。最值得注意的無疑是**關於四項條款問題的委員會的報告**，現在我

① “紐約每日論壇報”發表的不是這段話，而是下列原文：

“通訊到此中斷了，——馬姆茲伯里勳爵不想把通訊繼續下去。勳爵閣下不能回答所提的問題這一事實是有一定理由的：一切有關丹麥王位繼承的條文已經由帕麥斯頓勳爵在1850年7月8日簽訂的議定書中明確規定了，以致崇高的勳爵除了在條約上簽字外，確實別無他事可做。”——編者注

們从这个报告中摘引一些最重要的地方：

“委員會力图揭示作为簽訂和約的基础的四項条款的意义，因而考察了：这些条款在維也納會議上得到了哪些发展；各有关国家提出的有利于发展这些条款的每一个建議得到了怎样的支持或遭到了怎样的反对；法国和英国內閣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來說明这些条款的；这些条款的根据是什么，它們符合于公认的战争目的——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的程度如何。我們认为，1854年6月29日涅謝尔罗迭伯爵的急电中談到的題为‘保障基督徒在土耳其的权利’的下列建議是四項条款的根据：‘土耳其政府所有基督教臣民应当受到保障的公民权利是同他們的宗教权利分不开的，我們根据这种認識曾經声明：如果承认这一点，那末皇帝向土耳其政府所提出的要求就能实现，爭端就能解决，陛下就准备促使欧洲保证实现这些特权。’

这个建議——即不是由一个强国而是由五个强国經常干涉土耳其內政的建議——被英国和法国以第四項条款的形式採納了，并且由德魯安·德·路易斯在1854年7月22日答复涅謝尔罗迭伯爵的急电中表述如下：‘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应当要求有对土耳其政府的臣民（不論他們信仰什么教）給予某种正式保护的權利；相反地，法国、奥地利、大不列顛、普魯士和俄国将共同努力，促使奥斯曼帝国政府宣布并且遵守各种基督教团体的宗教特权，使苏丹陛下对各派基督徒的幸福予以寬大的关怀，但不損害苏丹陛下最高权力的尊严和独立。’

採納这第四項条款，就必然会使奥斯曼帝国丧失独立，但是公认的战争目的是保卫它的独立；这个条款的非法性在于：英国和法国未經土耳其同意就作出这样的让步，而且不顾土耳其的反对，英国和法国还是坚持要在維也納會議上討論这项条款。用悉尼·赫伯特的話來說，就是：‘問題复杂化的原因在于我們同我們的敌人、而不是同我們的盟友达成了協議。’

要知道，如果我們在同俄国的战争中遭到失敗而不得不要求和平，那末我們就沒有权利代表第三国提出这样的建議。为了消除这种非法性，英国和法国应当一开始就公开轉到俄国这一边而向土耳其宣战。同第四項条款意味着放棄土耳其的独立一样，第一項条款意味着放棄它的完整；第一項条款同第四項条款一样，未經有关方面同意就作出了让步，因为土耳其的全权代表已經明白表示，他将不同意討論第一項条款。

我們认为，在保证必須使莫尔达維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維亚依旧归土耳其統治的背后，却暗含着把这些地方从土耳其夺走的意思。‘今后不应准許对这些地方作任何特殊的保护’这句话在第五节作了解釋，即把五个强国同土耳其政府列于同一地位——几国的最高执政者共同实现自己的权力的地位。这句话最后体现在英法在維也納會議第六次會議上提出的建議中：把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联合为一个統一的国家，由欧洲的一个执政王朝的王室成員中选出的某个世襲君主来統治。英国放棄了它所宣布过的打算，不承认我們的盟友土耳其的权利，而且由于这一切是在俄国軍隊被迫撤离土耳其領土而法国和英国軍隊又未給土耳其以任何援助时发生的，因此英国的这种行为就更为可耻了。因为**放棄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发生在**远征塞瓦斯托波尔之前**，由此就必然得出結論：**这次远征是为了用武力来取得**对这种放棄的同意，即一方面利用土耳其資源已經耗尽的情况来强使土耳其同意，另一方面以**表面上对俄国的胜利安慰英国**来强使英国同意。”

二

倫敦 7 月 28 日。北明翰文件中关于第二項条款談到：

“第二項条款規定在多瑙河可以自由航行。多瑙河停止自由航行是从 1829 年阿德里安堡条約簽訂的时候开始的；当时土耳其被迫把多瑙河口让給俄国。把多瑙河口让給俄国，是同 1827 年 7 月 6 日簽訂的禁止俄国占有土耳其任何領土的倫敦条約相違背的。英国起初默認这种非法的占有，后来又支持并承认这种占有，这一事实证明了英国不止一次地在破坏国际法。所有这一切是在維護和平的借口下作出的；而現在由于战争状态，这个借口自然就不成立了。把多瑙河口归还給土耳其，这是英国和俄国之間一切真正的战争中的重大要求之一。但是在英国向俄国提出的建議中，根本没有提到多瑙河口的問題。这样英国就把这个問題变成了对奥地利进行侮辱的一种手段，因为奥地利在多瑙河自由航行方面的利益也許只是稍低于土耳其本身的利益。在 1855 年 3 月 21 日維也納會議的第四次會議上，奥地利的全权代表普罗克希男爵提出了一項建議，要求俄国同意多瑙河口中立化。俄国的全权代

表回答說，‘他不会同意这种采取間接剝夺形式的条件’。約翰·罗素勋爵沒有支持奥地利的这个极为温和的建議，3月23日，問題解决了，决定多瑙河口留归俄国占有。在这一点上向俄国作了彻底让步后，罗素于4月12日写信給克拉倫登勋爵說：‘布奥尔伯爵对我說，他不坚持要求多瑙河口諸島屿中立化，因为他确信，如果这样，俄国就会破坏會議。’4月16日約翰·罗素勋爵打电报給克拉倫登勋爵說，‘奥地利不打算支持任何有关出让領土的要求’。罗素一开始就错过了支持奥地利的机会，同意它所提出的关于多瑙河口中立化的治标办法，后来又深信奥地利不会完全支持整个这一办法，即把河口让給土耳其（由于約翰勋爵在3月23日对俄国所表現出的那种唯命是从的态度，这个办法本身就已失去意义了），罗素現在乃向克拉倫登勋爵建議，‘要求把土耳其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約让出的多瑙河口諸島屿归还給土耳其’。

第三項条款写道，1841年7月簽訂的条約应当根据維持欧洲均勢和限制俄国在黑海的实力的精神由締約双方进行修改！如果說在这項条款后面还隐藏着一些真实的意图，那末其中就应包括：第一，限制俄国的实力，第二，恢复土耳其在达达尼尔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权利。恢复苏丹对海峽的專門監督权并不需要另外达成協議。这种权利过去由于簽訂一些条約而暂时丧失了，現在因战争而廢除了这些条約，于是这种权利也应同时归还給苏丹。这些简单的理由，甚至在維也納會議上也沒有提出来。

至于限制俄国的霸权問題，布奥尔伯爵在1855年5月20日的信中曾公正地指出：‘在我們看来，盟国应当共同努力来限制俄国的政治霸权，即使不可能做到使俄国不去濫用它的物质資源，至少也要使它在这样做时感到极大的困难。要消除俄国因其地理位置而产生的对土耳其的优势，单是减少和甚至全部消灭在黑海的俄国舰队还是不够的。’

在英国政府企图把議會引入迷途的所有方法中，只有一个失败了，这就是关于限制俄国在黑海的海軍实力的提案。如果进行战争的确是为了所宣布过的那种目的，那末奥斯曼帝国的領土完整一开始就有保障了，那时媾和条件就可能是这样的：（1）把直到現在 *de jure*〔在法律上〕仍归土耳其占有的多瑙河口归还給土耳其，（2）俄国負責抵偿軍事費用。”

在提出了一些意見以后，文件以下面一段話收尾：

“委员会认为，并不是所有閣員都是同样有意識地犯下过錯的。委员会不能不指出四个外交大臣——克拉倫登、罗素、阿伯丁以及首先是帕麦斯頓所起的特殊作用。帕麦斯頓保证了对阿德里安堡和約的承认，甚至在战争时期向俄国偿付了久已失效的債務，拟定或批准了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达达尼尔条約、巴尔塔利曼尼条約和 1850 年的丹麦議定书；帕麦斯頓对波兰、西西里島和倫巴第的背信棄义以及他在很大程度上对法国、波斯、西班牙和丹麦的背叛行为——所有这一切都暴露出他不仅是土耳其的、而且是所有欧洲国家的不可調和的敌人。英国内閣的全体閣員都听命于帕麦斯頓；他能够使他們参与自己的罪行，而他們却无法識破这些罪行。这样也就使帕麦斯頓有可能完全使他們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只有根据英国的法律懲罰叛国行为，才能从为了外国利益而出卖人民的阴謀家手里把人民拯救出来。”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7 月
27 和 28 日

載于 1855 年 7 月 30 和 31 日
“新奧得报”第 349 和 351 号
及 1855 年 8 月 10 日“紐約
每日論壇报”第 446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并根据
“紐約每日論壇报”校对过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欧洲军队²²⁸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6 月底—9 月

载于 1855 年 8、9 和 12 月
“普特南氏月刊”第 32、33
和 3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普特南氏月刊”

第一 部 分

近两年来席卷黑海沿岸的战争，引起了人们对欧洲平时就保持着的 200 万军队的特别注意，这些军队的数量可能很快就增加一倍。假如战争仍继续下去，——这几乎是无需怀疑的，——那末我们就会亲眼看到，这 400 万军队将在两海之间的横贯整个欧洲大陆的战场上，投入一场激烈的军事行动。

因此，不仅对那些已经卷入东方冲突的军队，而且对其他一些比较强大的欧洲军队的评述就不能不引起我们读者的兴趣了，何况在大西洋这一岸幸而从来还没有过在数量上甚至可以多少同欧洲第二流军队相比的军队；因此，在美国，关于这样一些军队的组织，外行人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

从前因猜忌和竞争造成的各国军队严守秘密的状态，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不论人们多么惊奇，但是，即使在最不赞成公开的国家，在一切民政部门至今仍然处在专制政体所特有的保密状态中的国家，军队的组织也已经为广大的各界人士所熟知了。现在关于军队公布有许多官方的情报，不仅说明了军队的区分，如军、师、旅、团、营（骑兵连），而且也说明了军队的配置；以及指挥官的数量和姓名。当举行大规模检阅的时候，不仅允许外国军官参加，而且甚至表示欢迎；请他们提出批评的意见并叙述自己的观感；和他们认真地讨论各国军队在体制上有什么区别和有什么革新。由此可见，同其他管理部门相反，这里是完全公开的。欧洲各国的陆

軍部現在能保守秘密的只不过是几种化学成分的配方、某些火箭或炮彈信管，然而就連这些秘密也很快就泄露，或者由于新的发明而过时。例如，英国的康格里弗火箭就被黑耳先生的軍用火箭所排斥，后者曾在北美軍隊中使用，現在也被英国軍隊所掌握了。

由于这种公开情况，文明世界各国的陸軍部在平时可以說是組成了一個大的軍事委員會，它的目的是討論某种新措施的优点，使每一个成員都能够利用所有其他成員的經驗。这样一来，几乎一切欧洲軍隊的体制、組織和一般管理制度就大体上趋向一致，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說，一国軍隊同另一国軍隊是相近似的。然而民族性格、历史傳統、特別是不同的文化水平，却又造成了許多差異，并形成了各个国家軍隊所特有的长处和短处。法国人和匈牙利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俄国人和德意志人——他們在一定条件下都能成为同样优秀和灵巧的兵士；但是，尽管訓練方法相同（这好像可以消除一切差異），各国兵士由于自身的条件不同于对手，而仍然各有所长。

这就使我們面对着各国爱国軍人不止一次討論过的这样一个問題：哪一国的兵士最好呢？当然，每一民族都热心維護本民族的荣誉，而且在那些受了既缺乏批判又不够准确但却强烈地渲染着爱国感的傳奇軼事的熏陶的公众人士看来，某个国家的一个团能够“消灭”其他任何国家的两三个团。以正确評價事实为唯一指导原則的軍事史，作为一門科学还很年輕，因此目前还談不上拥有大量的文献。然而，它已經跨进了科学的領域，并且日益把愚蠢无耻的吹牛当做糟粕清除出去。这种吹牛在长時間內是那些只故意歪曲每一傳說的事实の所謂历史著作的特点。过去，編写战史的作者常常能够在締結了和約而不允許再用炮彈轰击敌人的时候，安

然无事地对原先的敌人口誅笔伐，以此作为这场战争的继续，然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军事史中的许多次要问题目前还是悬案，但仍然无需怀疑，每一文明的民族有权因为它曾在某一时期拥有当代最好的兵士而自豪。中世纪末期的德意志雇佣兵、十六世纪的瑞士兵在一定时期内是号称无敌的，就像优秀的西班牙战士后来代替了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步兵”一样；路易十四的法国军队和奥伊根亲王的奥地利军队一度争夺过这种荣誉称号，直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普鲁士军队打败了这两国军队，结束了这场争夺时为止；然而普鲁士军队在耶拿遭到打击后又丧失了这种荣誉，法国军队再度被公认为欧洲最优秀的军队。但这并没有妨碍英国军队在西班牙在一定的条件下和战斗的某些时机表明自己比法国军队优越。无疑地，拿破仑于1805年从布伦兵营调到奥斯特利茨²²⁹的军团是当时最好的军队；无疑地，威灵顿也知道，在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²³⁰结束后，把他的军队誉为“无往不利、无战不胜的军队”意味着什么。但是，这支曾在比利牛斯作战的不列颠军队的精华，又在新奥尔良²³¹被既无技能又无组织的非常后备军和志愿兵击溃。

从所有过去战争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而且每个不抱成见、思想健全、富有经验的军人都会证实这一结论，这就是：勇敢善战这种军事素质，在世界各民族中基本上是相同的；其次，各民族兵士的区别与其说在于他们的长处，不如说在于他们的特点；最后，就是在目前军事公开的情况下，只有多动脑筋，在军事领域和国家资源的利用方面不断地改进和发明创造，以及发展本民族特有的军事素质，才能在一个时期内使一个国家的军队在竞争者中间跃居首位。因此，我们就看到，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对

不够发达的邻国在軍事上具有怎样的优越条件。我們可以拿俄国軍隊为例。它的兵士虽然具有一切优良的战斗素质，但是从未超过文明的欧洲的任何一国的軍隊。在同等条件下，俄国人不論怎样殊死奋战，結果总是——至少到目前的战争为止——被敌人打败，有时被法国人、有时被普魯士人、波兰人或英国人打败。

在开始分述各国軍隊以前，需要作几点与它們全体有关的綜合論述。

軍隊，特別是 30—50 万人以上的大軍隊，需要加以区分，需要有不同的兵种、大批的人員和物資及一套編制机构，因此它是如此复杂的有机体，以致必須最大限度地加以簡化。軍隊所必不可缺的部門是如此之多，因而想要人为地、毫无意义地进一步細分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然而，傳統的习惯和腐蝕了一切旧軍隊的那种讲究豪华排場的風气，使几乎所有欧洲軍隊的組織极端复杂化了。

在每一个国家里，由于人員的身长、体力和气质的不同以及馬匹的特长不同，由重步兵和重騎兵区分出輕步兵和輕騎兵是必要的。要想完全消除这种区分，就是說要把具有本质上相反的战斗素质的人員合并在一个部队里因而使这些素质中和，便会削弱整个这一部队的战斗力。因此，每一兵种就自然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重装的、动作不灵巧的人員（和相应的馬匹）組成，主要用来进行大規模的坚决的攻击和成密集队形作战；第二部分由輕装的和灵巧的人員組成，特別适合于散兵战，适合于担任警戒和前卫，适合于迅速机动等等。这种区分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几乎在每一国的軍隊里，除了这种自然的区分以外，各兵种又有各种区分，这种区分仅仅表現在光怪陆离的服装上，而且是以經常被經驗和实

踐所駁倒的理論观点为根据的。

例如,在欧洲各国军队中,都有一种兵,叫做近卫军,他们自命为军队的 *élite* [精华],但实际上不过是由征集来的人员中身軀最高大、最魁梧的一些人组成的。在这方面俄国和英国的近卫军特别突出,尽管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他们比同一兵种的其他团队更勇敢善战。老拿破侖的近卫军则完全不同,他们确实是军队的 *élite*,在編組这种军队时,并不以身材作为标准。然而就連这种近卫军,也因为吸收了军队中的优秀分子而削弱了军队的其他部分。拿破侖由于过分爱惜这支精銳部队,有时也犯了錯誤。例如,在博罗迪諾²³²,他在决定性时刻沒有把近卫军調到前面,結果坐失战机,使俄军有秩序地退走了。在法国,除皇家近卫军外,每个营里还有类似的 *élite* 部队,它由两个連即擲彈兵連和輕騎步兵連組成,这样就毫无必要地使营的战术动作复杂化了。其他国家也有这种类似的部队。所有这些精銳部队不仅編組的方法特殊,服装奇異,而且軍餉較高。据說,这套办法能够激发兵士的功名心,尤其对易于激动的民族——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更是如此。但是,假如把应该享有这种待遇的兵士留在原先的連里,而不使他們妨碍营的战术統一和行动协调,那末,仍然可以达到同样目的,而且收效也許会更大。

在騎兵中还可以看到更加令人吃惊的蠢事。这里,把輕装和重装馬匹的差別作为划分各类騎兵——胸甲騎兵、龙騎兵、馬枪兵、枪騎兵、猎騎兵、驃騎兵等的依据。所有这些分类不仅是无益的,而且由于过分复杂而簡直是毫无意义的。驃騎兵和枪騎兵起源于匈牙利和波兰。不过在匈牙利和波兰,这两种騎兵有着一定的意义;他們是本民族的军队,服装也是本民族式样的。把这些特

点搬到沒有这种民族精神因而使特点失去意义的其他国家中去，至少是荒唐的。无怪在 1814 年，一个匈牙利驃騎兵回答一个称他为“同行”的俄国驃騎兵时說道：“什么同行？我是驃騎兵，而你是小丑！”（«Nix Kamarad, ich Husar, du Hanswurst!»）另一种同样荒唐的騎兵，是几乎在一切軍隊中都有的胸甲騎兵。这种騎兵实际上沒有战斗力，并且由于胸甲很重（法国的胸甲重 22 磅）使馬匹也失去了战斗力；况且，胸甲甚至不能抵御从 150 碼距离射来的枪彈！几乎所有的欧洲軍隊都廢棄过这种胸甲，然而由于拿破侖喜欢排場和迷恋帝制傳統，在法国又采用了胸甲，不久，欧洲各国也都仿效法国了。

假如把人数較少的美国軍隊除外，那末撒丁軍隊就要算是文明国家中唯一把騎兵仅分为輕騎兵和重騎兵而不再細分并彻底廢棄了胸甲的軍隊。

各国軍隊的野炮由于口徑各式各样，因而非常复杂。在理論上，英軍火炮的区分最多，共有 8 种口徑和 12 种式样，但在实际使用中，由于火炮的儲备量很大，而得以大大簡化它們的种类。譬如在克里木，英軍几乎全部采用九磅加农炮和二十四磅榴彈炮。法軍在最近几年中大大簡化了炮兵，用一种輕型十二磅加农炮代替了四种不同口徑的火炮，关于这种加农炮我們将在适当的地方論述。在其余的大多数軍隊中，直到現在还有三四种口徑的火炮，至于炮架、炮車、車輪等的差別，那就更大了。

关于技术部队、工程部队等等，这里我們还可以加上司令部，它們的編制在各国軍隊中几乎相同，但英国軍隊除外，它的司令部完全不是独立的机构，这給它的害处很大。至于其他次要的區別，我們将在适当的地方再談。

我們首先从革命时期和拿破侖时代建立的法国军队談起，因为它从本世紀初起就成为一切欧洲军队的榜样了。

一、法国军队

到目前的战争开始时，法国有 100 个基干步兵团（从第七十六团到第一〇〇团不久前称为“輕步兵”团，不过它們在訓練和編制方面同其他基干团毫无区别）。每团 3 个营，第一、第二营为基干营，第三营为后备营。但在战时第三营可以很快地編入作战军队，这时由 3 个营中抽出的各补充后备連編成的第四营，便成为后备营。这在拿破侖战争时期就被采用了，当时甚至还編成了第五营，有时还有第六营。不过現在每团只有 3 个营。每营由 8 个野战連（1 个擲彈兵連，1 个輕騎步兵連和 6 个基干連）組成；战时每連由 3 名軍官和 115 名軍士和兵士組成。由此可見，法国的基干营在战时約 960 人，其中第八連（輕騎步兵連）专门用来担任輕步兵的勤务。

担任輕步兵勤务的特种部队由 chasseurs-à-pied [猎步兵] 和非洲部队組成。战前共有 10 个猎兵营，但在 1853 年增到 20 个营，这样几乎每个步兵师（4 个团）在編成时都可得到 1 个猎兵营。每个猎兵营有 10 个連，約 1 300 人。专门在非洲服役的部队，是由 3 个朱阿夫团（9 个营）、外籍軍团 2 个团（6 个营）和 6 个輕步兵营（其中有 3 个土著猎兵营）組成的，共計 21 个营，約 22 000 人。

騎兵分为四个不同的部分：

1. 重騎兵即預备队騎兵——12 个团：2 个馬枪兵（披有甲冑的射手）团和 10 个胸甲騎兵团 = 72 个騎兵連；
2. 基干騎兵——20 个团：12 个龙騎兵团和 8 个枪騎兵

- 团 = 120 个騎兵連；
3. 輕騎兵——21 个团：12 个猎騎兵团和 9 个驃騎兵团 = 126 个騎兵連；
4. 非洲輕騎兵——7 个团：4 个 chasseurs d'Afrique (非洲猎兵团) 和 3 个斯帕吉团 = 42 个騎兵連。

按战时編制，預备队騎兵和基干騎兵每連 190 人，輕騎兵每連 200 人。平时勉强可征集 4 个騎兵連，其中装备齐全的仅有 120 人，所以每次軍队动員时，都必須召集大批归休兵回队并为他们安排馬匹。在像法国这样缺馬的国家里，这只有从国外大量輸入馬匹才能解决。

炮兵經過不久前的改編以后，現有 17 个团：5 个步炮团(担任警备和攻城勤务)，7 个基干团(在步兵师內担任勤务)，4 个騎炮团和 1 个架桥团。步炮兵看来仅在特殊情况下才用于野战。在野战炮兵中，炮架和前車的构造便于炮手在迅速移动时乘坐。騎炮兵的編制和其他炮兵相同。野战炮兵和騎炮兵共有 137 个連，每連 6 門火炮；还有作为預备队的 60 个步炮連。总計有 1 182 門火炮。此外，炮兵还有 13 个工役連。

軍队的专门业务部門包括：总参謀部，計有 560 名軍官；要塞司令部、炮兵司令部和工程兵司令部，共約 1 200 名軍官；3 个工兵-地道爆破兵团，5 个馱載連，5 个輜重連，1 187 名医官等。軍队的总数如下：

步 兵

| | |
|-----------------------------|-----------|
| 基干步兵：300 个营和 300 个后备連 | 335 000 人 |
| 猎兵：20 个营 | 26 000 人 |
| 非洲部队：21 个营 | 22 000 人 |
| 共 計 | 383 000 人 |

騎 兵

| | |
|------------------------------|----------|
| 預备队騎兵：72 个騎兵連和 12 个后备連····· | 16 300 人 |
| 基干騎兵：120 个騎兵連和 20 个后备連 ····· | 28 400 人 |
| 輕騎兵：126 个騎兵連和 21 个后备連 ····· | 31 300 人 |
| 非洲騎兵：42 个騎兵連 ····· | 10 000 人 |
| <hr/> | |
| 共 計····· | 86 000 人 |

炮兵和专门业务部門

| | |
|----------------|----------------------|
| 1 200 門火炮····· | 70 000 人 |
| <hr/> | |
| 以上总計 ····· | 1 200 門火炮和 539 000 人 |

这里应加上由 1 个步兵师（2 个擲彈兵团和 2 个輕騎步兵团）、1 个騎兵旅（1 个胸甲騎兵团和 1 个吉德团）、1 个猎兵营和 4—5 个炮兵連新組成的近卫軍，以及由 25 000 人組成的宪兵队，其中 14 000 人为騎宪兵。此外，不久前又編成了 2 个步兵团——第一〇一团和第一〇二团，并且正在編組外籍軍团的 1 个新的旅（瑞士人）。因此，法国军队按其目前的編制应当有将近 60 万人，这个数字十分准确地反映出法軍的現有兵力。

軍队以抽签的方法在年滿 20 岁的青年中征集兵員。按理每年应征集約 14 万人，然而实际上平时服兵役的仅有 6—8 万人。其余的人可在中签后 8 年內随时征集入伍。此外，平时大部分兵士归休，所以就連已征人員的实际服役時間也不超过 4—5 年。这种制度虽然能够保证現役部队受到良好的訓練，但却不能保证培养出受过一些訓練的預备部队以应付紧急情况。一旦爆发大規模的大陆战争，法国必須投入 2—3 个龐大的軍团作战时，在第二次战局中它就势必以大量缺乏訓練的新兵补充作战軍队，而在第三

次战局中，就会显著地表现出军队的质量降低。无疑地，法国人很容易掌握军事这门职业，但是，究竟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这么长的服役期限，使得很大一部分青年不能受到军事训练呢？

凡兵役制带有义务性质而服役期限长的国家，欧洲社会认为必须给有产阶级规定以某种形式出钱免除本人服役的特权。例如在法国，代役制是法律所规定的，因此约有 8 万代役兵经常在法国军队中服务。他们通常是由所谓“社会的危险阶层”中招募来的；这些人很难控制，但只要善于管理，他们就会成为优秀的兵士。为了迫使他们服从，需要有极严格的纪律，而他们对于秩序和服从的理解有时是很独特的。当一个团的大部分兵士是代役兵时，如果让他们担任警备勤务，那就必定会招来许多麻烦。因此一般认为，最适合他们的地点是在面对敌人的前线。非洲的轻装部队主要是从他们中间招募的，例如朱阿夫兵几乎全都是作为 *remplaçants*〔代役兵〕入伍的。克里木战局清楚地表明，朱阿夫兵在任何地方从不改变他们非洲人的习惯——喜欢抢劫和在困难时刻自由行动。和他们气味相投的已故的圣阿尔诺元帅在阿尔马河会战的报道中说：“朱阿夫兵确实是世界上优秀的兵士！”大概就是指的这一点。

法国军队的武器和装具都是头等的。兵器构造精良，尤其是马刀，它的式样美观，虽然也许稍微长了一点。步兵的服装是按照法国和普鲁士同时采用的新式样置备的。佩戴子弹和剑（或刺刀）用的交叉式皮带已不采用。这些东西挂在有两根背带的腰带上，背包则用两条绳子舒适地背在背后，而不是用旧式的连结带横束在胸前。这样一来，胸部完全不受束缚，因此现在的兵士已经一点不像过去被皮带束紧和按旧式样被一种皮胸甲捆缚起来的那种不幸的兵士了。服装的式样普通，但很美观；应当承认，不论便服或

軍服的式样，法国人的确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讲究。藍色的上衣，衣領低硬而且前面开口的、衣长到膝的独特外衣，瘦小的紅褲子，輕便的軍帽（它是在所有曾經設計的式样中最适合于兵士的帽子），带护腿的皮鞋和輕便的灰色大衣——这些就是法国步兵的服装，它是欧洲军队所从未有过的最簡便的服装。在非洲，兵士头戴白法兰絨的披巾式遮阳帽，并領到法兰絨貼身衬衣。在克里木，兵士在去年冬季披着可以遮住头、頸和两肩的带風帽的厚呢斗篷。Chasseurs-à-pied〔猎步兵〕穿着全身灰色的衣服，带有綠色飾帶；朱阿夫兵穿着看来为适应气候和他們所执行的勤务而仿照土耳其的式样制作的奇異服装。猎兵和某些非洲步兵营装备着米涅式步枪，其余的步兵装备着普通的短銃枪。然而有根据推測，装备綫膛枪的军队数量将会增多。

騎兵是由体格匀称的騎手組成的，比起其他許多国家的兵士来，他們的体重較輕，但质量絕不亚于其他国家的兵士。騎兵平时全部配备着充足的馬匹，有的馬是从国外运来的，有的是由国家养馬場和养馬区供給的。这些养馬区改良了不久前还认为是很不好的当地馬种。但在战时馬匹的需要量一下就增加一倍的情况下，法国出产的馬根本不够，因此势必要从国外购买成千上万匹馬，但是有許多馬匹对騎兵未必适用。这样一来，在持久的战争，只要政府不能像 1805、1806 和 1807 年那样把盛产馬匹的国家的馬源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国的騎兵就会丧失其战斗素质。

炮兵目前全部装备着新式的輕型十二磅加农炮，即路易-拿破侖的所謂发明。但是由于装药量等于实心彈重量四分之一的輕型十二磅加农炮在英国和荷兰军队中原已存在，由于比利时人已經停止在他們的榴彈炮內安装药室，而普魯士人和奧地利人已习惯

在某些場合用他們普通十二磅和二十四磅的加农炮发射爆炸彈，因此路易-拿破侖的所謂發明，只不过是把這種輕型十二磅加农炮改装在法軍八磅加农炮的普通炮架上而已。然而法國炮兵由於這種革新而顯著地得到了簡化，並提高了效率，不過是否因此降低了炮兵的运动性，以及十二磅加农炮是否不適合於发射空心彈，還需要查明。不管怎樣，我們得到消息：已經承認必須將更大口徑的榴彈炮運往東方供軍隊使用。

法國軍隊的操典，是軍人健全的理智和陳腐的傳統的驚人結合。大概沒有一種語言像法語那樣不適合於用來下達簡潔、準確和有說服力的口令了，而且通常下達口令時要用很多字；本來用兩三個字就夠了，但軍官却必須說一整句話，有時還要說兩句。動作是複雜的，在隊列教練方面也存在著許多與現代戰術水平絕對不相容的陳舊的東西。善於進行散兵戰，看來是法國人天生的本領，但是在訓練兵士進行散兵戰的方法上，其呆板程度甚至為俄國所不及。騎兵和炮兵在操練的某些方面也是如此。不過只要法國人一作戰，情況就會很快地迫使他們拋棄所有這些過時的和呆板的方法；誰也不能像法國人那樣迅速地掌握和運用適合於新條件的新的作戰方法。

總的說來，輕裝部隊是法國軍隊的 forte [中堅]。他們確實是歐洲最輕便的部隊。沒有一個國家的兵士的平均身材像法國兵那樣矮小。1836年，在將近8萬名法國兵中，僅有743人身長5英尺8英寸以上，僅有七人身長達到6英尺，而有38000人身長4英尺10英寸半到5英尺2英寸。但是這些身材矮小的兵士不僅善於搏鬥，而且能經得住高度的緊張，在运动性方面也能超過幾乎所有其他國家軍隊的兵士。納皮爾將軍斷言，不列顛兵士是世界上所

有的兵士中最能負重的作战的动物。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法国兵——非洲远征的参加者，他们除了武器和个人的行囊外，还背着帐篷、木柴、食品——这些高出他们所戴的高筒军帽的物品；同时在炎热的阳光下每天步行30—40英里。而现在就请你们把平时军队中身长至少为5英尺6英寸的高个的、笨拙的英国兵同身长4英尺10英寸的矮个、短腿、轻巧的法国兵比较一下吧！这种矮小的法国兵虽然背着自己所有的东西，却仍旧是出色的轻步兵：他们成散开队形作战，善于奔跑、猛扑、卧倒、跃起，同时装弹、射击、进攻和退却、散开和重新集结以及变换队形；他们表现出不仅比从“里脊”岛来的身材高大的对手具有加倍的运动性，而且具有加倍的机智性。在20个 chasseurs-à-pied [猎步兵] 营中，轻步兵的勤务达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无与伦比的部队——在特殊勤务方面是无与伦比的——被训练得能在敌人眼前以一种所谓 pas gymnastique [运动步伐] 的独特的跑步（每分钟160—180步）完成各种运动。他们不仅能够跑半个小时以上（中间只作短暂的休息），而且还善于匍匐、跳跃、攀登、游泳等，一句话，只要需要，能以任何一种方法运动；同时他们也是头等射手，因此，在同等条件下，很少有人能在同这些善于在极其平坦的地形上掩蔽的、弹无虚发的神枪手进行互射时坚持下来。

至于法国步兵在密集队形中的行动，则法国人固有的狂热性不仅使步兵具有很大的长处，而且也给它带来了很大的害处。通常法国步兵第一次攻击的特点是整齐、迅速、坚决，甚至是猛烈的。在顺利的情况下谁也抵挡不了他们。在失利的情况下他们很快就整顿好自己的队伍，重新投入战斗；但是在形势不利或者甚至在互有胜负的战局中，法国步兵便迅速丧失自己的坚定性。一切军队

都需要打胜仗，但罗曼-赛尔特民族的军队尤其需要打胜仗。条顿人在这方面绝对比他们强。法国军队在拿破仑为他们铺平了道路时能在15年间排除一切障碍，直到失败时为止；但是法国军队从来未能像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七年战争²³³中那样取得胜利，在那次战争中，弗里德里希大帝曾不止一次地处于毁灭的边缘，常常败北，但最终赢得了胜利。1809—1814年的西班牙战争，可以在这方面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

拿破仑时代的法国骑兵同步兵相反，他们成密集队形时的行动远比担任轻装部队的勤务时享有更大的声誉。法国骑兵被认为是无敌的，就连纳皮尔也承认他们胜过当时的英国骑兵。威灵顿也在某种程度上同意纳皮尔的意见。然而奇怪的是，这支无敌的骑兵却是由那些一般只用快步冲锋而在万不得已时才用轻跑步冲锋的、骑术不精的骑手组成的！但是只有在炮兵以猛烈的火力为他们开辟道路后，他们才能以密集队形运动，开始冲锋，而且就在这时也仅以大群的兵力进攻。勇敢和必胜的信念常使战斗得以胜利结束。现在的法国骑兵，特别是阿尔及利亚团队中的骑兵，都是很优秀的兵士，虽然他们的骑术还不如英国、普鲁士，尤其是奥地利的骑兵，但他们通常都是出色的骑手，同时更是击剑的能手。可是由于在战时不得不将骑兵的兵力扩充一倍，因此无疑地，骑兵的质量必将降低；然而大家知道，法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我们称之为勇猛[dash]的那种对骑兵来说是重要的素质，它可以弥补许多缺点。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的兵士像法国兵那样不爱惜自己的战马。

法国的炮兵一向水平很高。近三四百年以来，炮兵方面的一切改进几乎都从法国开始。拿破仑战争时代，法国炮兵善于选择

发射障地的本领对敌人威胁最大，那时其他国家的军队对这种本领掌握得还很差。一切证据都表明，谁也不能像法国人那样善于把自己的火炮设置在既能避开敌人火力、又能取得良好射击效果的地形上。炮兵理论也一向是法国人喜爱的一门知识，他们的数学头脑有助于掌握这门知识；鲜明的语言、科学的方法、正确的观点——这些都是法国炮兵书籍的特征，它表明这门知识是怎样地符合于法国人的民族精神。

关于专门业务部门——工程部队、司令部、卫生部门和运输部门，只能说它们是精通本行业务的。军事学校是这类部门的雏型。对于一个法国军官来说，并不要求他具有在普鲁士被认为是必需的那些一般知识；但学校教给他卓越的专业技能，其中包括辅助学科的良好知识和至少一门现代外国语。法国军队里还有一类军官，他们是从年老的军士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很少晋升到上尉以上的军阶。因此，在法国军队里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年轻的将军和年老的上尉，并且这种制度完全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整个说来，法国军队以自己的全部特点表明，它属于尚武的和刚毅的民族，而这个民族也以自己有这样的保卫者而自豪。这支军队由于有良好的纪律和战斗力而战胜了路易·波拿巴对它的诱惑这一事实，以及1851年12月的近卫军能够那样迅速地转变为克里木的英雄这一情况，——所有这一切无疑都说明了法军的优点。从来还没有一支军队，政府要那样去谄媚它，那样在它面前讨好，没有一支军队像1851年秋季法国军队那样得到公开的指示胡作非为，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像十二月内战时的法国军队那样受到纵容；然而法国军队重新又成为有纪律的军队，并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诚然，近卫军兵士在克里木曾数次故态复萌，但每次都被

康罗貝尔压制下去了。

二、英国军队

英国军队与法国军队完全相反，在它們之間找不到一点相同之处。法国军队强的一面，正是英国军队弱的一面，vice versa〔反过来〕也是如此。正像古老的英国到处盛行着大量惊人的舞弊行为一样，英国军队的組織也是腐朽透頂的。军队中的一切似乎都安排得使它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只是由于某种偶然的 机会，一些最大胆的改进做法——誠然是为数不多——才能在大量毫无意义的陈旧措施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是不管怎样，当这架龐大的、吱吱作响的机器开动起来时，它仍然是多少能执行自己的任务的。

要說明不列顛军队的編制，用不着花費很多笔墨。步兵由 3 个近卫团、85 个基干团、13 个輕步兵团和 2 个猎兵团組成。在目前的战争中，近卫团、猎兵团和某些其他的团各有 3 个营，而其余的团，則每团各有 2 个营及 1 个后备連。但是兵士的招募难以补充战争中的伤亡，因此各团的第二营是否存在还很难說。目前步兵的現有人数大約不超过 12 万人。

除了正規部队外，步兵中还包括作为預备部队即新兵来源的民軍。根据議会的决定，民軍的数量可达 8 万人，現在他們的总数实际上不超过 6 万人，虽然仅在郎卡郡一个郡就招募了 6 个营。根据現行法令，民軍可以自願在殖民地服务，但不能把他們派遣到帝国疆界以外的战区去。因此，目前他們只可能用来替換在科尔富島、馬尔他島、直布罗陀等地担任警备勤务的基干部队，而以后还可能到更远的殖民地去。

騎兵由 3 个近卫团（胸甲騎兵）、6 个近卫龙騎兵团（重装）、

4个重龙騎兵团和4个輕龙騎兵团、5个驃騎兵团和4个枪騎兵团組成。每团按战时編制应达1000人(4个騎兵連,每連250人,預备兵員除外)。就是这样編成的一些团被派遣到克里木,但由于冬季的災难、巴拉克拉瓦城郊的无意义的攻击以及新兵补充的不足,它們总的來說已减少到平时的編制名額。我們不认为目前所有26个团的人数会有1万人,即每团平均会有400人。

炮兵由1个炮兵团(12个营,96个炮兵連)和1个騎炮旅(7个炮兵連和1个火箭連)組成。每个炮兵連有5門加农炮和1門榴彈炮;加农炮有三磅炮、六磅炮、九磅炮、十二磅炮和十八磅炮五种;榴彈炮的口徑有 $4\frac{2}{5}$ 、 $4\frac{1}{2}$ 、 $5\frac{1}{2}$ 和8英寸四种。而且,每个炮兵連中都有几乎包括各种口徑的輕重两型的加农炮。但在实际使用时,野战炮兵只用輕型的九磅和十二磅加农炮,以及 $4\frac{1}{2}$ 和 $5\frac{1}{2}$ 英寸的榴彈炮;一般地可以說,目前英国炮兵普遍采用的是九磅加农炮和作为輔助火炮的 $4\frac{1}{2}$ 英寸(十二磅)榴彈炮。除上述火炮外,还使用六磅和十二磅的火箭。

因为平时編制的英国军队仅作为战时的基干,而且因为它完全按志願入伍的原則补充兵員,所以不可能在各个有关时期准确地确定它的实际人数。然而我們觉得,假如把它現有的兵力大致确定为以下数字是不会錯的:步兵12万人,騎兵1万人,炮兵12000人,火炮約600門(其中驃馬牵引的火炮不到五分之一)。在这142000人中,約有32000人在克里木,約5万人駐在印度和各殖民地,其余的6万人(一半是未訓練过的新兵,另一半是訓練这些新兵的人員)駐在英国。此外还有6万左右的民軍。領优撫金的兵、地方騎兵以及不适于在国外服务的其他人員,我們根本沒有計算在內。

志願兵制度不可能使軍隊在戰時保持足夠的兵力，現在英國軍隊又遭到了這種困難。我們又看到了威靈頓時代的情形，即英國軍隊在一定的戰區內所能集中並隨後所能保持的兵力最多為3—4萬人；而由於英國人的同盟者現在已不是西班牙人，而是法國人，因此英國這支“英勇的小部隊”在聯軍的總數中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在不列顛軍隊中，有一種能充分說明不列顛兵士是從哪些社會階層招募來的制度。這就是用鞭笞來懲罰兵士。不論是法國軍隊或普魯士軍隊都不採用體罰；就是在許多其他人數較少的軍隊里，也不採用體罰。甚至在大部分新兵為半野蠻人的奧地利，也有廢除體罰的明顯願望；例如，驅使受罰者穿過棒列的那種體罰，不久前已經從奧地利軍隊的條例中取消了。相反地，在英國“九尾皮鞭”——類似鞭笞盛行時期的俄國皮鞭的一種刑具——仍舊繼續採用。奇怪的是，每當議會里提出改革軍隊條例的問題時，軍紀方面的老頑固總是極力維護“皮鞭”，而老头子威靈頓本人特別顯得熱心。在他們眼里，沒有受過鞭笞的兵士是某種不可想像的怪物。他們認為，勇敢的精神、高度的紀律性和不可戰勝的氣概這些素質，只有背上帶有傷疤，至少挨過50鞭的兵士才會具備。

不應忘記，“皮鞭”不僅是造成一個人肉體疼痛的刑具，它還給他留下永不可磨滅的傷痕和終身的記號，給他打上了烙印。現在甚至在不列顛軍隊里，這種體罰，這種烙印實際上也等於是終身的恥辱。受過鞭笞的兵士在自己的伙伴眼里是可恥的。同時，根據不列顛軍隊的條例，對在前綫的兵士的一切懲罰几乎都是鞭笞；因此，同是這種懲罰，在它的維護者看來是在決定性時刻維護紀律的最好手段，而實際上它卻破壞紀律，渙散士氣並挫傷兵士的 point

d'honneur〔荣誉感〕。

这就说明了两件非常奇特的事实：第一、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有大批英国逃兵。冬季，当英国兵为了在战壕内担任警戒而不得不作出超人的努力时，谁要是不能连续在两个至两个半昼夜内不睡觉，就要受到鞭笞！试想一下吧！受鞭笞的是那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战壕里英勇奋战的英雄，是那些在因克尔芒会战中出乎自己将军意料之外获得胜利的兵士！但是纪律条例的条文未留有选择的余地。军队中最好的兵士因疲劳而受到鞭笞，他们蒙受侮辱后就逃到俄军方面去了。未必再有什么比这种逃跑更能清楚地表明鞭笞制度的全部罪恶了。在以往的战争中还没有发生过某个国家的兵士大批地逃到俄国人那里去的情况，因为他们知道，那里对待他们会比在家里更坏。第一次出现这种大批逃兵现象的荣誉属于不列颠军队，英国人自己证明，正是鞭笞迫使兵士逃跑的。第二个事实是想建立遵守不列颠军队条例的外籍军团的企图完全破产了。看来，皮肉受苦的事外国人是决不愿干的。那种遭受鞭笞的前景压倒了获得高额奖赏和优厚薪饷的诱惑。到6月底，外籍军团招募的人数还不到1000人，而需要的是15000人；而且无疑地，假如当局试图对这不听话的1000人采用鞭笞制度，那就会引起怒潮而迫使当局让步或立即解散外籍军团。

英国兵的服装和装具是最不合适的。直到现在通行的仍是1815年军队中所采用的式样，没有作过任何改进。旧式后开襟的、奇怪的倒翻袖口的难看制服，仍旧是不列颠兵士的独特之处。裤子瘦小而不方便。佩挂刺刀、子弹盒和背包用的交叉式皮带的旧式样，几乎为所有的团一致采用。骑兵的制服比步兵的方便，并且质量要好得多，但它终究太瘦小，因而妨碍行动。此外，英国人是

唯一在軍隊中保存了紅色制服的民族，納皮尔称它为“驕傲的紅制服”。据说这种制服——英国兵穿上它时就像打扮起来的猴子——能用它耀眼的色彩給敌人造成恐惧。但是，天哪！凡是看見穿紅磚顏色制服的英国步兵的人，都必然承认，这种制服穿上四个星期后就完全不能唬人，反而令人可怜。为了恐吓敌人，应该选择耐髒的、不易沾灰和受潮的任何其他顏色。丹麦人和汉諾威人过去也曾穿过紅色制服，但很快就不穿了。第一次什列斯維希战局向丹麦人表明，紅色制服和白色武装带对敌人来说是多么好的靶子。

根据新的服装規定，英国的紅色制服采用了普魯士的式样。步兵带着奥地利式的高筒軍帽或法国式軍帽；騎兵带着普魯士式的头盔。交叉式的皮带和瘦小的紅褲子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这样，变化就等于零了，所以，同服装和装具比較合理的其他欧洲軍隊比起来，不列顛兵士和过去一样，仍将是一种奇观。

然而，不列顛軍隊取得了一項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成就。这就是全部步兵都装备着經過普里契特改进的米涅式步槍。平时那样固执己見的、統率軍隊的老將們怎样能作出这样大胆的决定，是难以想像的，然而他們却这样做了，因而将自己步兵的火力增强了一倍。无疑地，在因克尔芒会战中，米涅式步槍以其极大的准确性和巨大的威力使英国軍隊获得了胜利。每逢英国步兵成散兵綫进行射击时，它必定对装备普通槍的任何敌人占上风，因为米涅式步槍装彈像滑膛槍那样快。

在騎兵中服务的是装备着极好的馬刀的善騎的出色兵士；他們的本領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中已經显示出来。然而整个看来，騎手对馬匹是太重了。因此几个月的积极行动必将使不列顛騎兵消耗殆尽。这在克里木又得到了新的证实。假如重騎兵的平均身长

能降低到 5 英尺 6 英寸，輕騎兵能降低到 5 英尺 4 英寸甚至 5 英尺 2 英寸，就像我們所知道的步兵所做的那樣，那末，就会建立一支更适于他們現在所担任的野战勤务的部队。而在目前的条件下，馬匹負載过重，在有效地被用来同敌人作战以前，它們就已經累垮了。

在炮兵中服务的同样是身材过高的人。正常的情形是，炮手的身长應該使他能够将十二磅炮从前車上卸下来，要做到这一点，身长 5 英尺 2 英寸至 5 英尺 6 英寸就足够了，这是我們根据許多亲身經驗和观察知道的。的确，凡身长约 5 英尺 5—6 英寸的人，只要他們身体强壮，一般就是最好的炮手。但是英国人追求的是外表，因此他們的兵士虽然身材高大匀称，却不具备真正优秀的炮手所必需的那种体力。英国炮兵的兵器是头等的。火炮是欧洲最好的，火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形炮彈和长炮彈的表面做得极为光滑。虽然如此，但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火炮所发射的炮彈都不会有那样大的誤差，这說明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操纵火炮。恐怕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军队的炮兵軍官像英国軍官那样缺乏专业訓練。英国炮兵軍官的理論知識很少超出炮兵基本知識的範圍，而在实际运用时，英国軍官只会操纵野炮，甚至連这一点也不精通。然而，英国炮兵——不論軍官或兵士——有两点长处：极好的目測能力和战斗中非凡的沉着。

总之，不列顛军队的战斗素质由于軍官在理論和实践方面的无知而大大地降低了。現在对軍官进行的考試是可笑的：对上尉要求的是欧几里得的著作²³⁴前三册上的知識！但不列顛军队的人事任命主要就是为貴族子弟（长子除外）安排荣誉的职位，所以軍官的訓練水平必然不适合职务的要求，而适合英国“紳士”一般的

貧乏的知識水平。至于軍官的实用軍事知識，那也是欠缺的。英国軍官认为，他只应当履行一种职责：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向敌人，給兵士做出勇敢的榜样。对他來說，并不要求具有指揮軍隊、利用有利情况等等的才能；至于談到关心自己的兵士，了解他們的需要，那末这种想法恐怕从沒有在他的脑子里出現过。不列顛軍隊在克里木失利一半是由于它的所有軍官不称职。誠然，英国軍官的一种特长有助于他們完成自己的职责：他們大多数是酷爱打猎的人，善于迅速和本能地判断有利的地形。这种特长无疑是由于他們的爱好而形成的。

軍官不懂本行业务在參謀部門造成的害处比在其他任何部門都大。由于沒有系統地訓練參謀軍官，所以每个將軍从各团抽調完全不懂這門业务的軍官組成自己的司令部。像这样的司令部还不如完全沒有的好。偵察工作特別草率，这是必然的，因为担任偵察的人想不到他需要干些什么。

其余的各專門业务部門訓練得稍好一些，但訓練水平比其他国家的軍隊仍然低得多。总之，英国軍官在任何其他国家的軍官的心目中是出名的不学无术之徒。英国人的軍事著作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几乎任何著作都是錯誤百出，在其他国家里即使一个尉官犯这种錯誤也是不会得到原諒的；对事实的叙述既不認真，又不用专业用語和軍事術語，而且对事情的本质也不加注意。一眼就可以看出，作者是不懂本行业务的。这是輕易相信外国书籍中最荒謬的論断的結果^①。不过，我們应当說，有一些可喜的例外，像威廉·納皮尔著的“比利牛斯半島战争史”一书和霍华德·道格拉斯

^① 切斯尼上校关于火器的著作²³⁵ 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作者被看做是大不列顛的优秀炮兵軍官之一。

著的“海軍炮兵”一书²³⁶就在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行政、卫生、軍需、运输及其他輔助勤务都处于可怜的状态，在克里木一遭到考驗就彻底垮台了。現在，对上述勤务正設法改进，试图集中管理，但是在民政机关，实际上是整个国家政权沒有改变以前，这些尝试未必能有什么結果。

不列顛军队尽管有着自己的一切严重缺点，但仍能将每次战局进行到底，它虽沒有取得突出的胜利，却也沒有蒙受耻辱。不列顛军队的損失、指揮的无能以及所犯的錯誤之多，在我們把这一切和在同等条件下的其他国家的军队的情况相比时，都使我們大吃一惊。不过不列顛军队毕竟沒有丧失軍人的荣誉，它很少退却，几乎从未遭受彻底的失敗。这是兵士个人非常勇敢頑强、遵守紀律和絕對服从的結果。尽管不列顛兵士在独立行动或执行輕装部队的勤务时不灵活、不机智、缺乏才能，但当他們成密集队形行动时，在正規战中誰也不能胜过他們。他們的 forte [长处] 是成橫队行动。英国步兵由于編成橫队战斗队形，能做其他任何国家的步兵未必敢做的事——以橫队迎击冲鋒的騎兵，把子彈装好，一直到最后时刻，即让敌人进到 30 碼的距离时才进行齐射，并且几乎总是获得全胜。英国步兵甚至在最危急的关头也能十分沉着地射击，因而射击效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例如苏格兰人在巴拉克拉瓦以橫队行动，击退了俄国騎兵的冲鋒。英国步兵的坚定和頑强精神从沒有像在因克尔芒会战中表现得那样明显；法国军队要是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被击潰；但是法国军队却决不会让自己在那种陣地上遭到突然的襲击。在进攻和防禦中的坚定性和頑强性是不列顛军队的重要素质；正是这些素质，才不止一次地使它免于因軍官的无能、指揮的荒謬和运动的不灵活而遭到完全应得的、

似乎預定的失敗。

三、奧地利軍隊

奧地利利用了 1848—1849 年嚴酷考驗后的最初喘息時機，在現代化的基礎上改編了自己的軍隊。幾乎全部軍隊都進行了根本的改組，所以現在它的戰鬥力比過去大大提高了。

首先是步兵。它由 62 個基干團、1 個獵兵團和 25 個獵兵營、14 個邊屯步兵團和 1 個邊屯步兵營組成。邊屯步兵和獵兵共同組成輕步兵。

1 個基干步兵團包括 5 個野戰營和 1 個後備營，共計 32 個連，其中每個野戰連 220 人，每個後備連 130 人。這樣，每個野戰營約有 1 300 人，每個團將近 6 000 人，即等於英國 1 個師的人數。因而全部基干步兵按戰時編制約為 37 萬人。

邊屯步兵每團有 2 個野戰營和 1 個後備營，共計 16 個連，3 850 人；全部邊屯步兵的人數為 55 000 人。

獵騎兵，或者獵兵，共有 32 個營，每營約 1 000 人；總數為 32 000 人。

軍隊中有重騎兵：8 個胸甲騎兵團和 8 個龍騎兵團；輕騎兵：12 個驃騎兵團和 12 個槍騎兵團（其中 7 個團原為輕龍騎兵，或者 *cheveu-légers* [輕騎兵]，不過後來改編為槍騎兵）。

重騎兵團由 6 個騎兵連組成，另有 1 個騎兵後備連；輕騎兵團由 8 個騎兵連和 1 個騎兵後備連組成。每個重騎兵團為 1 200 人，每個輕騎兵團為 1 600 人。全部騎兵按戰時編制的人數約為 67 000 人。

炮兵包括 12 個野炮團，每團按戰時編制有 4 個六磅步炮連和

3个十二磅步炮連，6个騎炮連，1个榴彈炮連，共計1344門火炮；还有1个岸防炮团和1个火箭团；20个炮兵連（160个火箭发射管）。共計1500門火炮及火箭发射管和53000人。

战时作战军队中战斗人員的总数为522000名。这个数字还应加上16000名左右的工兵-地道爆破兵及架桥兵，2万名宪兵和运输勤务人員等，所以总数約为59万人。

如把預备兵員征集起来，军队可以增加10—12万人；如最大限度地利用边屯部队的兵源，奥地利还可以增加10—12万人。但由于这些兵力不能在規定時間內調集在一起，而是将陸續开到，因此他們主要用来补充军队的伤亡。所以奥地利未必能一下子武装起65万以上的人。

军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正規軍和边屯部队。正規軍的服役期限为八年，随后兵士还有两年的預备役。但是如同在法国一样，奥地利兵士可以长期归休，因此实际上他們在军队中的時間可以肯定为五年。

边屯部队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則編成的。他們是南方斯拉夫（克罗地亚或塞爾維亞）、瓦拉几亞移民的后裔，还有一部分是德意志移民的后裔。他們在給帝国服兵役的条件下获得自己的土地，过去被用在达尔馬威亞到特兰西瓦尼亞的边境上抵御土耳其人的襲击。現在这一勤务已流于形式，但是奥地利政府决不願放棄这个雄厚的兵源。正是有了这个边屯部队的組織，1848年拉德茨基的军队在意大利才得到了拯救，而1849年在文迪施格雷茨統率下的奥軍才有可能第一次入侵匈牙利。弗兰茨-約瑟夫保全了帝位，不仅应归功于俄国，而且也应归功于南方斯拉夫边屯团。在各团駐防的边疆地区，皇室土地的佃戶（几乎每个居民都是这种佃戶），

凡是年齡在 20—50 岁的，須随时应征服役。这些边屯团的主力当然是青年，至于中年人，主要是輪流担任边防哨兵勤务，一直到战争爆发征召入伍时为止。这就說明，为什么在大約 150—200 万居民中，必要时能提供 15—17 万人，即占居民总数的 10—12%。

奥地利军队有許多特点与不列顛军队相似。两者都包括許不同的民族，虽然每个团通常都由单一的民族組成。苏格兰的赛尔特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的差別，并不比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和馬扎尔人的差別大多少。不論在奥地利军队中或在不列顛军队中，都有不同民族的軍官，其中有許多是外国人。在奥地利和英国，軍官的理論素养都是很差的。这两国军队的战术队形保留了旧綫式战斗队形中的許多东西，而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采用纵队和散开队形。这两国军队的服装顏色也是異乎寻常的：英国军队的服装是紅色的，奥地利军队的服装是白色的。但就編制的特点、軍官的实战經驗和素养以及军队的机动性來說，奥地利军队远远超过不列顛军队。

兵士的服装，假如不把步兵的稀奇的白色上衣算在內，就其式样來說完全合乎現代的标准。类似普魯士式的短上衣，淺藍色褲子，灰色大衣，法国式的輕便軍帽，合起来是一套便于执行軍事勤务的好服装；只有匈牙利团和克罗地亚团的瘦小的褲子——构成他們民族服装的一部分——很不方便。兵士的个人装具不合要求，交叉式皮帶仍被采用。边屯部队和炮兵穿着褐色的上衣，騎兵穿着白色的、褐色的或天藍色的上衣。枪枝很笨重，而猎兵和各連的大部分兵士所装备的步枪是相当老式的，比米涅式步枪的质量低。一般的兵器是用旧式燧发枪改制成的极不完善的短銃枪，这种枪时常不发火。

步兵擅长于以密集队形作战，但作为轻步兵执行勤务时，其运动性较差，在这方面也同英国步兵相似。不过，我们对边屯部队和猎兵应作别论。前者，至少是其中大部分，都极善于互射，特别是作战时惯用伏击的塞尔维亚人更是如此。猎兵是优秀的射手，他们几乎全部是提罗耳人。步兵中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通常以坚定性著称，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他们不止一次地证明在这方面不亚于英国步兵。他们也不止一次地以横队迎击骑兵，而并不认为有必要变换成方队；但当他们变换成方队时，敌人的骑兵就很少能打败他们。阿斯佩恩会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骑兵是卓越的。由德意志人和捷克人组成的重骑兵，即“德意志”骑兵拥有良马，装备又好，所以行动总是成功的。轻骑兵打败仗可能是由于把德意志 *chevau-légers* [轻骑兵] 和波兰枪骑兵编在一起的缘故，但匈牙利骠骑兵永远是轻骑兵的表率。

炮兵——它的兵士主要是从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征集的——一向具有高度的水平，这不仅是因为它及时地和慎重地进行了改革，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对自己的官兵进行了实际训练。军士受过特别严格的训练，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的军士都要高明。至于军官，他们的理论教育过多地迁就了他们个人的自愿，但是奥地利毕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军事著作家。在奥地利，所有军官，至少是下级军官，通常都要学习，而在英国，军官研究本行的专业却被看做是侮辱自己团队的行为。奥军的专门业务部门、司令部和工程部队也是出色的，根据地形测绘的资料制成的精确的地图，特别是伦巴第的地图，就说明了这一点。英国炮兵指挥用的地图虽然也不坏，却不能同它相提并论。

军队的多民族成分是个很大的麻烦。在不列颠军队中，至少

人人都会說英語，而在奧地利的非德意志团队中，甚至連軍士也只能勉强用德語講話。这当然造成很大的混乱，产生許多困难，甚至軍官同兵士談話时也需要翻譯。由于駐区經常变更，軍官不得不多少学习一些在奧地利使用的各种語言，这虽减少了一部分困难，但这种不方便終究沒有消除。

經常靠榛树条的鞭打才在兵士中維持下去的严格紀律以及长久的服役期限，使不同民族之間不易发生严重冲突，至少在平时是如此。但是 1848 年表明，奧地利軍隊內部是如何的不稳定。在維也納，德意志部队拒絕鎮压革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民族部队几乎未作任何抵抗就投到了起义者方面。这正是奧地利軍隊的弱点。誰也不敢說它的团結將保持到什么程度，能維持多久，以及有多少个团会在某个时刻离开它，开始反对自己过去的战友。在奧地利軍隊中有六种民族，信仰两三种宗教。至于談到有助于軍隊团結的相互諒解，那末，当所有的民族像現在一样，渴望自由地使用自己的部队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来代替相互諒解。当同俄国发生战争时，难道能够指望受泛斯拉夫主义宣傳影响的、信仰正教的塞爾維亞人会反对与自己同血統、同宗教的俄国兄弟嗎？在爆发革命战争时，要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牺牲本乡本土的利益，为不同語言和不同民族的皇帝去打仗，这可能嗎？这是很难指望做到的。因此，不論奧地利軍隊多么强大，它还需要具备完全特殊的条件，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兵力調动起来。

第二部分

一、普鲁士军队

普鲁士军队有其独特的一套组织，因而值得特别注意。在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中，平时编制的军队就是整个军事组织的基础，而对于大战爆发时立即需要组成的新部队的骨干是不进行任何训练的。但在普鲁士，像有些人肯定地对我們說的那样，为转入战时编制好了一切周密的准备。因而平时编制的军队就像一所学校，国民在这里学习使用武器，进行操练。有人认为，这种制度规定所有适合服兵役的男子在战时都将编入军队，因此采用这一制度的国家似乎在遭受任何袭击时都能保证安全；可是情况远非如此。采用这种制度，只能使国家拥有比在采取法国或奥地利的征兵制时几乎多百分之五十的兵员。正因为这样，一个人口不超过1700万、领土不大、既无海军又不直接进行海外贸易的农业国家，一个工业不太发达的国家，才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持欧洲大国的地位。

普鲁士军队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由尚在训练中的兵士组成的常备军；另一部分是由已受过训练的、也可以说是由归休的兵士组成的后备军。

常备军的服役期限为五年。凡是年龄在20—25岁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兵士服满三年现役就够了，以后可以归休，在其余的两年被编为所谓预备兵。在这一期间，他们仍然列入原

步兵营或原騎兵連的預备兵名册,随时都可能应召归队。

預备兵两年期滿后,轉入第一类后备軍 (erstes Aufgebot des Landwehrs),直到 32 岁为止。在这段時間內,每两年应召参加一次后备軍的操练,这种操练通常規模极大,而且是和常备軍共同进行的。操练照例是一个月,为此集中的往往有 5—6 万人。第一类后备軍的使命是和常备軍共同进行野战。它同常备軍一样,編成独立的团、营(騎兵連),并且团的番号相同。但后备軍的炮兵仍分屬常备軍的各个炮兵团。

凡年齡在 32—39 岁的兵士列入第二类 (zweites Aufgebot) 后备軍。在这一段時間內,除非爆发战争,便不再服現役。如果发生战争,則第二类后备軍应担負要塞警备勤务,以便全部常备軍和第一类后备軍都能够用来进行野战。

年滿 40 岁的兵士可以免征,但在征召有名无实的所謂民軍或宣布 en masse [总动員] 时例外。民軍包括所有不在現役內、也未編入第一、二类后备軍的 16—60 岁的男子,以及所有因身材矮、体质弱或其他某种原因而免服兵役的人。但是关于这种民軍,說它有名无实甚至都不恰当,因为从沒有认真考虑过它的組織編制,也沒有規定过它的武器装备。如果真有一天能把它召集起来,那末除了担負国内的警察勤务和消耗大量的酒以外,它是什么也干不了的。

既然在普魯士 20—40 岁的每一个公民按法律都要当兵,那末 1 700 万人口似乎便可組成一支至少 150 万人的軍队。但实际上連这个数字的一半也征集不到。事实上要在三年服役期間在团內訓練出这样大批的人,那平时編制的軍队就至少应达到 30 万人,而实际上普魯士現在只有 13 万人左右。人們用各种办法使相当数

量应服兵役的人免服兵役：把一些完全适合服役的人称之为体质过弱，体格检查委员会不是只挑选应征者中体格最强的，就是在挑选适合服役的人员时徇私受贿等等。过去曾采用使步兵的现役期缩短到两年的办法，把平时编制的军队缩减到 10 万或 11 万人。但是在革命以后，政府确信，增加一年服役期对于使兵士服从军官以及使兵士在国内发生起义时仍然忠于政府有很大意义，因而又恢复了三年的服役期。

常备军由 9 个军组成：1 个近卫军和 8 个基干军。现在我们来看看它们的编制的特点。在它们的编成中有：36 个步兵团（近卫团和基干团），每团 3 个营；8 个预备团，每团 2 个营；8 个混成后备营和 10 个猎兵（Jäger）营；总共 142 个步兵营，计 15 万人。

骑兵由 10 个胸甲骑兵团、5 个龙骑兵团、10 个枪骑兵团和 13 个骠骑兵团组成，每团 4 个连，共 800 人；总计 3 万人。

炮兵由 9 个团组成，每团按战时编制有：8 个步炮连（4 个六磅炮连，3 个十二磅炮连，1 个榴弹炮连），3 个骑炮连，并附有 1 个后备连，后者可以作为第十二炮兵连；此外还有 4 个要塞炮连和 1 个工役连。但是，为了维护这些火炮和补充各连的兵力，还需要全体预备兵和第一类后备军中的炮兵，因而可以算出，常备军炮兵由 9 个团组成，每团约有 2 500 人和将近 30 门火炮，他们全都配备有马匹和装具。

这样，普鲁士常备军的总数约有 20 万人；但是，有充分的根据可以从这一数字中扣除那些经过三年服役而归休的预备兵 6—7 万人。

第一类后备军是按常备军每一个近卫团或基干团就有后备军的一个团这种标准建立的，8 个预备团除外；此外，第一类后备军

还有 8 个后备营；总计 116 个营，约 10 万人。骑兵由 2 个近卫团、32 个基干团和 8 个后备连组成；共计 136 个骑兵连，约 2 万人。炮兵则如上所述分属常备军的各炮兵团。

第二类后备军同样有 116 个步兵营，另有 167 个骑兵连（包括使命与第二类后备军相同的各种后备骑兵连在内）和一部分要塞炮兵；共约 15 万人。

此外加上 9 个工兵营、各种辅助部队、约 3 万名领优抚金的兵以及按战时编制不少于 45 000 人的辎重部队，普鲁士整个军队的人数约有 58 万人。其中 30 万人担任野战勤务，54 000 人在后备部队中训练，17 万人担任警备勤务和作为预备队，约 6 万人担任非战斗勤务。全军的野炮数量为 800—850 门，分编为炮兵连，每连 8 门（加农炮 6 门，榴弹炮 2 门）。

所有这些部队都不仅配有经过相当训练的骨干，而且还有武器装备，因而在军队**动员**时，只要收集马匹就行了。但是因为普鲁士马匹很多，而且牲畜和人同样是属于紧急征用之列的，所以在这方面也不会有很大的困难。如按规定来看，情况就是这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1850 年的军队动员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第一类后备军领到了武器装备，虽然也不是没有很大困难的；但第二类后备军的物资却毫无准备，既没有衣服鞋子，也没有武器，因而成了一个大笑柄。曾在普鲁士军队中服务的专家在这以前早就说过，将来的情况必然是：普鲁士在需要用兵时实际上只能依靠常备军和一部分第一类后备军。以后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个预测。无疑地，第二类后备军的武器装备从那时起就已有所储备了，如果现在征召这支后备军，那末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后它就可以完全胜任警备勤务甚至野战勤务。但是，要知道，在战时有三个月的时间就

足以把新兵训练好去担任野战勤务，因而普鲁士所采用的这套笨拙的制度决不能保证人们所说的那些巨大的优越性。此外，为第二类后备军准备的物资在两三年后将会不知去向，就像过去也曾储备过，但到 1850 年需要使用时却不见了一样。

普鲁士虽然规定了每一个公民都要当兵的原则，但是半途而废，损害了这一原则，因而也就损害了整个军事组织。既然废除了征兵制而代之以普遍义务兵役制，那末也应该废除像现在这样的常备军，而只保存军官和军士的骨干；由他们来训练青年，而且这一训练的期限也不应超过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需的时间。如果确能如此，那末平时的服役期就可以缩短到一年，至少对所有步兵来说是适当的。然而不论政府或守旧派军人都不同意这样做。政府希望有一支驯服可靠的军队，在必要时可以用来镇压国内的骚乱；而守旧派军人则希望军队在练兵方面、在军容和坚定性方面能够与由年龄较大的兵士组成的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相媲美。由服役期不超过一年的新兵组成的军队，不符合上述任何一个要求。因此折衷地确定了三年的服役期，普鲁士军队的各种缺点和弱点也就由此而产生了。

我们已经说过，至少有一半适合服役的人没有入伍。他们一下子就被列入第二类后备军的名册中，以致第二类后备军名义上数量大为增加，但实际上由于大批人都从未拿过枪，并不比未经训练的新兵强，所以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国家的实际军事力量至少削弱了一半，这是延长服役期所造成的第一个恶果。

但是，就连常备军和第一类后备军本身也由于这种制度而受到损害。每一个团有三分之一的兵士服役不到三年，三分之一的兵士服役不到两年，其余的不到一年。不可能指望用这种方法补

充兵員的軍隊會具有英國、奧地利、俄國甚至法國軍隊中的老兵所特有的那些軍事素質，如嚴格的紀律性，作戰部队的穩定性和 *esprit de corps* [團結精神]。英國兵的服役期長，因而英國人是這方面有權威的評判人，他們認為必須有整整三年的時間才能把新兵完全訓練好^①。可是在平時，普魯士軍隊的兵士中沒有一個是服役滿三年的，因此，十分自然，老兵的那些戰鬥素質，或至少某些與此類似的素質只是靠粗暴的練兵方法強迫普魯士年輕的新兵練出來的。普魯士軍隊的尉官和士官由於無法完成所擔負的任務，所以對待自己的部屬粗暴、殘忍，同時這種態度由於還帶有學究氣而加倍地令人厭惡。這種學究氣之所以顯得更加荒謬，是因為它完全與普魯士所規定的簡單合理的訓練制度相抵觸，而且又經常要求遵守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傳統，但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當時採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戰術，訓練的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兵士。這樣，軍隊的真正的戰鬥力就成為操場練兵的犧牲品，而且整個說來，普魯士常備軍要比歐洲任何一個大國在對普魯士戰爭開始時所能使用的那些老的步兵營或騎兵連都差。

普魯士軍隊的情況就是這樣，儘管它具備其他國家的軍隊所沒有的許多優點。普魯士人正像一般的德意志人那樣，是很適合當兵的。這個既有遼闊的平原又有大片山地的國家，能為任何兵種提供充足的兵員。而且大部分德意志人的體質既適合擔任輕步兵，又適合擔任基干步兵，這是任何其他民族所難以相比的。國家盛產馬匹，並能提供大量從小就習慣於乘騎的騎兵。德意志人穩健沉着的性格使他們特別適合在炮兵中服務。同時，德意志人是

① 見威·納皮爾爵士“比利牛斯半島戰爭史”。

世界上最好战的民族之一，他们在战争中寻求快乐，当自己的家门前无仗可打时，就出外找仗打。从中世纪的德意志雇佣兵起到目前的法国和英国的外籍军团止，德意志人一貫地提供了大批为作战而作战的雇佣兵。如果说法国人在攻击的敏捷和积极性上胜过德意志人，如果说英国人在抵抗的顽强性上超过德意志人，那末德意志人无疑比欧洲所有其他民族都更适合于担任各种军事勤务，这使德意志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优秀的兵士。

普鲁士军官在全世界的同行中是最有学识的。在他们接受普通学科的考试时，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中都高得多。在各旅、各师中都附设有学校以提高军官的理论知识；至于更高深的军事专业知识，军官还可以在许多军事学校中获得。普鲁士的军事著作具有很高的水平。近二十五年来著作充分证明，它们的作者不仅熟谙本行业务，而且在科学知识的渊博方面也可以与任何国家军队的军官相媲美。诚然，在个别著作中有不少形而上学的肤浅的论述，但这毫不奇怪，因为在柏林、布勒斯劳或科尼斯堡，你们可以看见军官在大学里和学生一起听课。克劳塞维茨在军事方面同若米尼一样，是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而阿斯特工程师的著作则开辟了筑城学中的新时代。虽然如此，“普鲁士尉官”一词在整个德意志却成了普通名词；发展到可笑程度的 *esprit de corps* [团结精神]，学究气和由于军队中的整个气氛而在交往中所习惯的那种蛮不讲理的腔调，完全可以说明这一事实。同时，任何地方都不像普鲁士这样，在校官和将官中有这样多的顽固的老学究，而且其中大部分是 1813 年和 1815 年的遗老。在叙述了以上这一切以后，应当承认，由于荒谬地试图使普鲁士常备军变成它所永远不可能做到的、由老兵组成的军队，因而降低了

兵士的质量，同样也降低了军官的质量，也许，后者甚至比前者降低得更多。

普鲁士军队的操典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它简单扼要，条理分明，以几条合理的原则为依据，几乎不能希望有比这更好的了。这一操典是夏恩霍斯特的天才结晶。他大概是自拿破仑的摩里茨以来最杰出的军事组织家了。大军统率要则也很好。可是，正式推荐给军官阅读的一些学术性的炮兵指南却内容陈旧，完全不符合现代的要求。不过，这只是就多少带有官方性质的著作而言，与普鲁士整个炮兵方面的书籍无关。

工程部队享有完全受之无愧的极好的声誉。自蒙塔郎贝尔以来最优秀的军事工程师阿斯特就出身于工程部队。从科尼斯堡和波兹南起到科伦和科布伦茨止，普鲁士的军事工程师建筑了一系列的要塞，这些要塞博得了整个欧洲的赞扬。

普鲁士军队的装具自1843年和1844年实行改革以来，虽然不十分美观，但是十分便于兵士佩戴。头盔能很好地遮蔽阳光和防雨，服装宽大而舒适；全部装具甚至比法国军队的还合用。近卫军和轻步兵营（每团一营）装备有针发的线膛枪；其余的常备军则装备有普通的火枪，这些枪经过很简单的改装后都已成为性能良好的米涅式步枪。至于后备军，再过两三年也将领到米涅式步枪，目前仍是装备着短铳枪。骑兵的马刀过宽过弯，因而劈刺的效果不大。炮兵的武器装备——火炮、炮车和马具——在很多方面还有待改善。

总的说来，普鲁士军队即常备军和第一类后备军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但决不是像普鲁士的爱国作家所夸耀的那样。常备军投入战场后会很快摆脱操场练兵的束缚，经过几次战斗就能同敌人

相抗衡。第一类后备军，只要一激发起他们的老兵精神，而如果战争又是深得民心的话，那末他们将不亚于欧洲最好的老部队。普鲁士所害怕的，是行动积极的敌人在战争初期就投入组织得比较严密的、经受过较多考验的军队来对付它；但是如果战争拖延下去，则普鲁士将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老兵。战争开始时，常备军将是军队的基本核心，但是，第一类后备军很快就会把它挤到次要地位，因为第一类后备军的兵士具有更强的体力和更好的战斗素质。这是普鲁士的真正老兵，而不是常备军里的那些后生。关于第二类后备军，我们现在不谈，它还需要证明：它究竟能做些什么。

二、俄国军队

俄国也曾采取过一定的措施，采用在某些方面与普鲁士后备兵制度相似的预备兵制度，为战时储备骨干。但总的说来，俄国的预备兵员是如此有限，把他们从广大帝国的各地调集起来又是如此困难，以致在英法宣战半年以后，在克里木响起第一枪之前，就已觉察到必须废除这种制度，着手编组新的大部队，随后又陆续地成立了新的部队。因此在俄国，应当把战争开始时的和现在的军队编成情况区别开来。

平时俄国军队由下列几部分组成：（1）作战军队——6个基干军（第一军至第六军）；（2）预备队军队——1个近卫军，1个掷弹兵军，2个预备队骑兵军；（3）地区军队——高加索军、芬兰军、奥连堡军、西伯利亚军；（4）内勤部队——老兵、卫兵、残废兵等等；（5）非正规部队。这里还可以包括由归休兵组成的预备部队。

6个基干军的编成如下：每军有3个步兵师，每师有1个基干

旅和1个輕步兵旅，每旅2个团，每团4个基干营；以上共为6个旅，即12个团，48个营，外加1个猎兵营和1个工兵营，合計50个营。此外还有1个輕騎兵师，由1个枪騎兵旅和1个驃騎兵旅組成，每旅2个团，即16个騎兵連，合計32个騎兵連。炮兵1个师，由3个步炮旅和1个騎炮旅組成；共14个炮兵連，計112門火炮。每个軍总计：50个营，32个騎兵連，112門火炮。全部基干軍共計：300个营，192个騎兵連，672門火炮。

近卫軍由3个师，即6个旅組成，包括12个团（9个擲彈兵团和3个馬枪兵团即輕步兵团）；近卫团和擲彈兵团每团只有3个基干营，因此共有36个营。此外还有1个猎兵营和1个工兵-地道爆破兵营，3个騎兵师（胸甲騎兵师、枪騎兵师和驃騎兵师），包括6个旅，即12个团，共計72个騎兵連。还有1个炮兵师，包括5个旅，有15个炮兵連（9个步炮連，5个騎炮連，1个火箭連），共計火炮135門。擲彈兵軍由3个师，即6个旅組成，包括12个步兵团，即36个步兵营，外加1个猎兵营和1个工兵-地道爆破兵营。这个軍也有1个騎兵师，下屬2个旅（1个枪騎兵旅和1个驃騎兵旅），包括4个团，即32个騎兵連。炮兵由3个步炮旅和1个騎炮旅組成，有14个炮兵連，共計112門火炮。

預备队騎兵軍的編制如下：第一軍有3个师（2个胸甲騎兵师，1个枪騎兵师），包括6个旅，即12个团，共計80个騎兵連（48个胸甲騎兵連，32个枪騎兵連）。还有一个騎炮师，由3个旅（6个炮兵連）組成，共計48門火炮。第二軍有3个师（1个枪騎兵师，2个龙騎兵师），即6个旅，包括12个团，即112个騎兵連（32个枪騎兵連，80个龙騎兵連）。还有2个騎工兵連和6个騎炮連，有48門火炮。

高加索軍包括：1个預备队擲彈兵旅，有2个团，即6个营；3

个步兵师，有 12 个团，即 48 个营；1 个猎兵营；1 个工兵营；高加索防区 47 个营（非常后备军）；共计 103 个营。骑兵由 1 个龙骑兵团组成，有 10 个骑兵连。炮兵为 1 个师，有 10 个普通炮兵连和 6 个山炮连，共计 180 门火炮。

芬兰军为 1 个师，包括 2 个旅，即 12 个步兵营。奥连堡军为 1 个师，也包括 2 个旅，但只有 10 个步兵营。西伯利亚军为 1 个师，包括 3 个旅，计有 15 个营。

平时的正规部队的总数见下表：

| | 步兵营 | 骑兵连 | 火炮 |
|-------------|-----|-----|-------|
| 6 个基干军····· | 300 | 192 | 672 |
| 近卫军····· | 38 | 72 | 135 |
| 掷弹兵军····· | 38 | 32 | 112 |
| 预备队骑兵军····· | — | 194 | 96 |
| 高加索军····· | 103 | 10 | 180 |
| 芬兰军····· | 12 | — | — |
| 奥连堡军····· | 10 | — | — |
| 西伯利亚军····· | 15 | — | — |
| 共 计····· | 516 | 500 | 1 195 |

内勤部队由 52 个卫兵营，800 个老兵和残废兵连，11 个半骑宪兵连以及 98 个炮兵连组成。这些部队是很难列入国家的实际兵力之内的。

非正规部队，主要是骑兵，区分如下：

1. 顿河哥萨克——56 个团，每团 6 个百人队^①；共计 336 个百人队，13 个炮兵连；
2. 黑海哥萨克——72 个百人队，9 个营，3 个炮兵连；

^① “百人队”一词在原稿上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字。——编者注

3. 高加索防区哥薩克（駐庫班河和捷列克河一帶）——120 个百人队和 3 个炮兵連；
4. 阿斯特拉罕哥薩克——18 个百人队，1 个炮兵連；
5. 奧連堡哥薩克——60 个百人队，3 个炮兵連；
6. 烏拉尔哥薩克——60 个百人队；
7. 巴什基里亚部队——85 个百人队（几乎全是巴什基里亚人和卡尔梅克人）；
8. 西伯利亚哥薩克——24 个营，84 个百人队，3 个炮兵連，其中有一部分是通古斯人、布里亚特人和其他民族；
9. 阿速夫海哥薩克担任海軍勤务；
10. 貝薩拉比亚的多瑙河哥薩克——12 个百人队；
11. 外貝加尔哥薩克，是不久前編成的；其組織和兵額不詳。

以上約計 847 个百人队（百人队由“一百”^①一詞而来，每个百人队相当于 1 个 100 人的騎兵連），33 个营，26 个炮兵連。共約騎兵 9 万人，步兵 3 万人。但是目前能用在西部边境作战的大概只有騎兵 4—5 万人，炮兵几个連，而步兵則一个营也沒有。

由此可見，在平时俄国軍队（除內勤部队外）包括：步兵 36 万人，騎兵 7 万人，炮兵 9 万人，共計 50 万人（哥薩克不算在內，其人数随着情况而变化）。但是在这 50 万人中，地区軍队——高加索軍、奧連堡軍和西伯利亚軍——在任何一次战争中都不能用在帝国西部边境，因而俄国能調来对付西欧的兵力最多是步兵 26 万人，騎兵 7 万人和炮兵 5 万人，火炮約 1 000 門，此外，还有哥薩克約 3 万人。

① “一百”一詞在原稿上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字。——編者注

这就是俄国军队平时编制的情况。为了对付战争，俄国采取了下列措施：整个服役期根据情况而规定为 20 年、22 年或 25 年，但服役满 10 年或 15 年后，兵士可以归休，编入预备役。这种预备役的组织常常改变，但正如大家现在所知道的，归休兵在头 5 年内根据原属的兵种而分别列入步兵预备营（在近卫团和掷弹兵团内为第四营，在基干团内为第五营）、骑兵预备连或炮兵预备连。5 年期满后转入本团的步兵后备营，即近卫团和掷弹兵团的第五营以及基干团的第六营，或转入骑兵后备连和炮兵后备连。这样，一旦征召预备兵员，步兵和炮兵的实际兵力就几乎可以增加 50%；骑兵则几乎可以增加 20%。所有预备兵员应由退伍军官指挥，其骨干都受过充分的或相当程度的训练。

但是，在这次战争爆发时，一切都改变了。从作战军队中不得不调两个师到高加索去，虽然这两个师原定在西部边境作战。在英法联军乘船开往东方之前，俄国作战军队中的 3 个军（第三军、第四军和第五军）都已卷入对土耳其的战局中。虽然这时正在集中预备部队，但是要把他们从帝国各地调集到各个指定地点，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联军的陆军和海军已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上出现，以及奥地利的态度摇摆不定，都要求俄国采取更坚决的措施；征召的名额增加了一两倍，这样征召来的形形色色的大批新兵连同预备兵员，在所有的步兵团中组成了第四、五、六、七、八营；骑兵也有同样的增加。这样，在 8 个近卫军、掷弹兵军和基干军中，便不是原先的 376 个营，而是现在的 800 个营左右，每两个平时编制的骑兵连和炮兵连都至少增加了一个骑兵后备连或一个炮兵连。但是，所有这些数字在书面上看来要比实际上更惊人一些；由于俄国官吏贪赃枉法，军队指挥拙劣，以及长途行军（新兵必须从自己的

家中到集合地点，再从集合地点到军队的驻地，然后开往作战地点），大部分兵士在尚未与敌人接触以前便死亡或离队了。此外，疾病造成的减员和最近两次战局期间战斗中的伤亡数目很大，因此我们并不认为俄军的1000个步兵营、800个骑兵连和200个炮兵连的人数目前会超过60万人。

但是，政府对这种情况是不满意的。第七营和第八营刚一编成，政府便宣布征召非常后备军，其行动之快，证明政府已经完全认识到，要把大量的人从辽阔的帝国的各个地区调集到一起有多么困难。这种国民军，即**非常后备军**^①，按各省人口比例组成若干**大队**^②（营），每一大队1000人；名额比例是在每1000个男性成年人中为23人，即几乎占全体居民的0.25%。目前只在西部各省征召非常后备军。这次征召是在1800万居民中进行的，其中男子约占一半，所以征召的人数应为12万人左右，而这个数字与俄国官方的统计是相符的。毫无疑问，非常后备军在这方面甚至比不久前成立的预备部队还差，但不管怎样，它毕竟大大增加了俄国的兵力，如果让它来担任波兰的警备勤务，就可以把大量的基于团抽调出来作战。

另一方面，已经开到西部边境的，不仅有很多哥萨克，而且还有巴什基里亚人、卡尔梅克人、吉尔吉斯人、通古斯人和其他蒙古民族组成的大批部队。这一事实说明把上述部队调往西部的命令是早就下达了的，因为其中许多部队都必须用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开到圣彼得堡或维斯拉河。

这样，俄国几乎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它的兵源，在两年战争中虽

① “非常后备军”一词在原稿上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字。——编者注

② “大队”一词在原稿上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字。——编者注

然它一次决战也没有失利过，但是仍然不能提供 60 万人以上或者至多 65 万人的正规部队、10 万人的非常后备军或者 5 万人的非正规骑兵。我们并不想以此来说明，俄国的兵源已经枯竭了，然而我们十分清楚，进行了两年战争的俄国决不能像进行了二十年战争而精锐部队又在 1812 年全军复灭后的法国所做到的那样，再补充 30 万新兵并抵擋住（哪怕是暂时的）敌军的攻击。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和另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在军事实力上的差异是这样大。假如法国与俄国接壤的话，那末 6 600 万俄国人会比 3 800 万法国人弱。毫无疑问，4 400 万德意志人是一支比信奉正教的沙皇的 6 600 万臣民更大的力量。

俄国军队是用各种方法征集的。它主要是采用定期征兵的方法来补充的，每年一次，一年在欧洲俄国的西部各省进行，另一年则在东部各省进行。通常征集的比例为每千名（男）“丁”中征新兵 4 或 5 人，因为在俄国的丁籍上只登记男性居民，根据正教的等级观念，女子是不算作“丁”的。在帝国西部征集的兵服役 20 年，在东部征集的则服役 25 年。近卫军服役 22 年；军屯中的青年服役 20 年。除了这种征集的人员以外，新兵最大的来源是兵士的儿子。凡是兵士在军队服役期间生的儿子，一律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这一规定适用的范围很广，甚至兵士在 5 年或 10 年内远在帝国另一端服役期间，其妻子所生的儿子也都在国家的征召之列。这些兵士的儿子称为**少年兵**，其中大多数由官费教养；大部分军士是从他们中间提拔出来的。最后，在军队中服役的还有法庭判决的罪犯、流氓和其他根本无用的人。贵族有权将没有生理缺陷的农奴送去当兵。每一个父亲如果不满意自己儿子的行为，也可以这样做。«S'bogom idi pod krasnuyu shapku!»“上帝保佑你，去戴红帽子吧！”就是說

去当兵吧，——俄国农民平时对不听话的儿子就是这样说的。

我們已經說过，軍士大部分是由在官办学校中受教育的兵士的儿子补充的。这些从幼年就充满了服从軍紀的思想的年輕人，与那些以后应受他們訓練和指揮的兵士毫无共同之点。他們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的特殊集团。他們属于国家，沒有国家就不能生存下去；他們逍遙自在，一无所长。在政府豢养下生活，这就是他們的全部希望。这些軍士在軍隊中的情况和由下級官吏的子弟补充的下級官吏在民政机关中的情况相同。这是一群仰人鼻息、奸詐狡猾、目光短淺、自私自利的人，受过一点点肤淺的教育使他們更加令人厌恶；虛荣心重，唯利是图，把自己的灵魂和軀体出卖給国家，而同时又时时刻刻想零星地出卖国家，只要这对他們有什么好处的話。居斯丁先生在游历俄国以后所著的游記²³⁷中描写得非常出色的那个信差，即伴随他游历的那个送信人，就是这类人的极好的典型。因为有了这类人，那种渗透到俄国的各級国家机构中的貪污之風才在軍政部門中大为盛行。但是无疑地，假如俄国廢除这种子弟完全归国家所有的制度，那末它便不可能得到它所需要的一批民政机关中的下級官吏和軍隊中的軍士。

軍官的情况看来更坏。訓練未来的上等兵或司务长花費較少，但是培养百万大軍的軍官（根据官方材料，俄国正是为这样龐大数量的軍隊而培养骨干的），却是一件耗費很大的事。私立学校在这方面什么都不做，或者做得很少，一切都得由国家进行。但是十分明显，国家沒有力量使上述目的所需的大量青年受到教育；因而施加精神上的压力，使貴族子弟必須在軍隊或民政机关至少服务5年或10年。凡貴族家庭，其成員連續三代“未服公职”的，便失掉貴族特权，其中包括农奴所有权，而沒有这种所有权，大量地

产在俄国便毫无价值了。因此，大量青年到军队里来，取得准尉或中尉军衔，他们的全部教育充其量也只是用法语比较容易地进行一般的交谈，稍许懂得一点简单的数学、地理和历史，——把所有这些东西灌输给他们也不过是做个样子罢了。对他们来说，服公职是不得不干的苦差事，他们怀着难以掩饰的厌恶心情来对待它，把它看做是长期的疗程；只要规定的服役期一满或获得少校军衔时，他们便立刻退伍，列入后备营的名册中。至于说到军校学生，也主要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应付考试才给他们灌输一些知识，因此就连在专业知识方面，他们也远不如在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军事学校里学习的青年。另一方面，有天才而又勤学的热爱本行专业的青年在俄国非常罕见，因此只要他们有所表现，不管他们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都立即受到重视。国家非常慷慨地供给他们学费，使他们能够受完教育，并在职务上迅速提拔他们。这些人通常被当做俄国文明的成果来向欧洲炫示。如果他们有写作的愿望，只要不超过俄国政府规定的范围，总是受到百般鼓励；正是这些人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在俄国军事著作中有价值的东西。但直到目前为止，俄国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层，都还十分野蛮，不能在学术研究或脑力工作（玩弄阴谋除外）中得到乐趣，因此几乎所有在俄军中服务的杰出人物都是外国人或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德意志人，即“波罗的海东部沿岸地区的”^①德意志人（也可以算作外国人）。这一部分人中间最近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今年7月负伤后死去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总工程师托特列本将军²³⁸。不论从俄军方面或联军方面来说，在整个围攻战的所有参加者中间，他无疑是

^① “波罗的海东部沿岸地区的”一詞在原稿上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字。——編者注

在工程方面最有学識的人，但他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是普魯士人的后裔。

这样看来，在俄国军队的军官中，有很好的，也有很差的，不过两者比起来，前者的数量极小。俄国政府对本国军官的看法如何，这一点可以根据它的操典明显而无誤地判断出来。这些操典不仅規定了旅、师或軍編組战斗队形的总則，即指揮官可以根据地形条件和其他情况加以改变的所謂“标准部署”，而且还規定了在各种可能的場合应当采用的各种部署，不給將領留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使他受到約束而尽量不让他負任何責任。例如，操典規定軍可以按照五种不同的方法进行部署，而在阿尔馬河会战中俄軍果真是按照其中之一，即按照第三种部署列成陣勢的，結果当然被击败了。这种对一切可能的情况都事先作出規定的癖好，使指揮官的行动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并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他利用地形的有利条件，因此一位普魯士將軍在批判这种制度时曾这样說道：

“只有在大多数將軍都愚蠢到連政府也不能放心委以指揮全权或准其机断行事的军队中，才能容忍这种一切都按規定办事的制度。”

俄国兵屬於欧洲最勇敢的兵士之列。他們的頑强精神几乎不亚于英国步兵和奥地利的某些步兵。他們所固有的特点正是約翰牛所自我夸耀的那一点——挨了打，他也感觉不到。俄国步兵的方队即使被騎兵突破后仍能長時間地抵抗和进行白刃战；人們一貫认为，射死俄国人比迫使他們退却要容易一些。在1813—1814年作为俄国的盟友而1854年在克里木則作为俄国的敌人的乔治·卡瑟克特爵士，曾亲眼看到过俄国兵，他以欽佩的心情证明，他們“从来不惊慌失措”。²³⁹此外，俄国兵体格好，身体壯，步伐矯健，要求不高，吃喝随便，而且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国的兵士更能

听从自己的长官。虽然如此，俄国军队却没有什么可以特别夸耀的。自建国以来，俄国军队还从来没有在兵力优势不很大的情况下战胜过德意志军队、法国军队、波兰军队或英国军队。在兵力相等的条件下，他们总是败于其他国家的军队，只有对普鲁士军队和土耳其军队是例外，但在切塔特和锡利斯特里亚²⁴⁰，土耳其虽然兵力较弱，却也战胜了俄国军队。

俄国兵的主要缺点在于他们是最不灵活的兵士。他们既不适于当轻步兵，也不适于当轻骑兵。哥萨克在某些方面来说虽然是出色的轻骑兵，但总的说来很不可靠，以致在和敌人接触时在哥萨克前哨的后方总要布上第二道前哨线。此外，哥萨克完全不适宜于攻击。至于说到正规部队中的步兵和骑兵，他们是不善于进行散兵战的。俄国人处处仿效别人，只能完成命令他们或迫使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如果他们不得自行作战，他们便什么也干不了。的确，对于那些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责任心的人，以及对于那些奉命去死就好像奉命去汲水或鞭笞自己弟兄一样地驯服的人，是很难期望他们做到这一点的。期望俄国兵在担任前哨或进行散兵战时能表现出法国人那样的机灵和德意志人那样的理智，那是要落空的。俄国兵所需要的是命令，是清楚明白的命令，如果他沒有接到命令，那末他可能不退却，但也不会前进，而且不知道该怎么行动。

骑兵虽然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并受到特别重视，但始终不是优秀的骑兵。不论在对法战争或向波兰进军中，它都未能树立战功。俄国人消极的、能忍耐的和驯服的服从并不是骑兵所需要的品质。一个骑兵的主要优点，恰恰是俄国人最欠缺的，这就是“勇猛”。例如，当 600 名英国龙骑兵以真正骑兵的那种英勇果敢精神在巴拉

克拉瓦附近向人数多得多的俄軍猛冲时，他們打垮了俄国的炮兵、哥薩克、驃騎兵和枪騎兵，一直冲到密集的步兵纵队前才不得不調回头去；但是，在这一次騎兵攻击中，究竟誰称得上胜利者，这还是一个疑問。假如这种輕率的攻击是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軍队进行的話，那就不会有一个人生还，因为敌人就会从翼側和后方包圍攻击者，很容易把他們的退路切断。可是俄国的騎兵却勒住馬不动，等待敌人，及至想起策馬前进时，已被敌人击潰了！老实說，如果要找一个事实来证明俄国正規騎兵不行的話，那末这就是一个。

俄国炮兵装备着质量不同的火炮，凡是装备有好炮的部队，就能很好地完成他們的任务。炮手在战斗中表现出很大的勇敢，可是他們总是缺乏机智。俄国炮兵連一旦失去自己的指揮官，便什么事也做不成；但是即使指揮官活着，炮兵連也只能按照操典的規定占領陣地，尽管那是荒謬的。当被包圍于要塞中而需要忍耐、刻苦和随时准备遭到危險时，俄国炮兵常常表现出崇高的品质，但这主要的不是說他們射击准确，而是說他們在敌人的火力下能奋不顾身地履行职责和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一点可以从塞瓦斯托波尔的整个被圍过程中得到证明。

然而，在炮兵和工程部队中我們遇到的正是俄国向欧洲夸耀的那些受过高深教育的軍官，他們确实受到鼓励去尽量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可是比方說在普魯士，即使最有才干的人，如果軍銜不高，一般都要受到自己长官的压制，而他們所提出的一切改良措施則都被斥責为标新立異，自作聪明，因而其中許多人不得不到土耳其謀事，在那里建立了欧洲第一流的正規炮兵。但在俄国所有这样的人都受到鼓励，有一技之长的都官运亨通，升迁迅速。吉比奇和帕斯凱維奇两人成为將軍时，一个只有 29 岁，一个只有 30 岁，

而托特列本在塞瓦斯托波尔不到 8 个月的期间，便由上尉擢升为少将。

俄国人最引以自豪的是步兵。步兵具有惊人的坚定性，无论在横队或纵队内，或者在胸墙后，都是危险的敌人。可是他们的长处也仅限于此。他们几乎完全不适于当轻步兵（所谓猎兵只是名义上的轻步兵，而实际上担任轻步兵勤务的只是配属给轻步兵军的 8 个猎兵营）。俄国步兵一般不是好射手，虽然长于步行，但是速度不快；他们的纵队通常编得很差，还没有发起攻击，便常常被敌人的炮火击溃。将军们所不敢改变的“标准部署”，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促成作用。例如在阿尔马河，早在英军编成极不灵便的横队渡河而后再改变队形进行攻击以前，英国炮兵就已使俄国纵队遭受惨重的伤亡。在因克尔芒，8 000 名英国步兵在尚未完全占领阵地和警戒不严的情况下遭到突然的袭击，他们同 15 000 名进攻的俄军进行了白刃战，抵抗达 4 小时以上，并胜利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攻击。从此以后，即使在谈论俄国人引以自豪的步兵的惊人坚定性时，也只好有所保留了。因克尔芒会战应当使俄国人明白，在他们最强的一方面，他们也碰上了劲敌。俄军的每次攻击都遭到失败，是因为英国兵勇敢，军士和兵士机智灵活、士气旺盛。在这次会战后，我们可以说英国人自命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基干步兵是有理由的。

俄军的服装几乎完全仿效普鲁士的式样；装具的佩戴非常不便；胸前交叉挂的不仅有佩刺刀和子弹盒的皮带，而且有扎背包的带子。不久前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装具有无变化，我们还不知道。枪枝则非常笨重，只是在最近才采用了短铳枪；俄国枪枝是现有一切枪枝中最沉重、最不利于使用的。骑兵的马刀是旧式的，鑄

造得也很差。至于在克里木使用的新式火炮,据报道性能良好,效果甚佳;但是否整个炮兵都装备有这种火炮,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最后,俄国军队仍然受到超过本国一般文化水平的学院式教育的影响,因此具有这种温室教育的一切害处和缺点。在小规模的战争中,哥萨克由于积极顽强,所以是值得注意的一支唯一的战斗力量,但是他们嗜酒如命、掠夺成性,因而在指挥官的眼里他们是极不可靠的。在大规模的战争中,由于俄军行动迟缓,只要对方不像去年秋季英军那样的疏忽大意,则俄军的战略机动是没有什么大危险的。在正规的会战中,俄军对于进攻的兵士来说是顽强的敌人,但对于进攻的将领来说却并不可怕。在大多数场合俄军的部署都极其简单、按常规办事,因而很容易被识破;同时,俄军将领和指挥官缺乏机智,军队又不灵活,这使俄军在战场上所作的任何复杂的机动都带有极大的冒险性。

三、德意志各小邦的军队

巴伐利亚有2个军,每军有2个师。每师由2个步兵旅(共4个步兵团和1个猎兵营),1个骑兵旅(2个团)和3个步炮连及1个骑炮连组成。此外,每军有1个炮兵总预备队——6个步炮连和1个工兵-地道爆破兵队。这样,全军总计:16个步兵团,每团3个营,加上6个猎兵营,共为54个营;2个胸甲骑兵团,6个轻龙骑兵团,共为48个骑兵连;2个步炮团(每团6个六磅炮连和6个十二磅炮连),1个骑炮团(4个六磅炮连),共28个炮兵连,每连8门火炮,合计224门,另有6个要塞炮连和12个辎重连未计算在内;此外,还有1个工程兵团(8个连)和2个卫生连。按照战时编制,除了预备兵和目前尚无骨干的后备军外,全军共有72000人。

在德意志联邦²⁴¹的军队中，奥地利提供第一、二、三军，普鲁士提供第四、五、六军，巴伐利亚提供第七军，维尔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斯塔特共同提供第八军。

维尔腾堡有 8 个步兵团（16 个营），4 个骑兵团（16 个骑兵团），1 个炮兵团（4 个步炮连和 3 个骑炮连，计 48 门火炮）。战时编制总额约为 19 000 人。

巴登有 4 个团（8 个营），2 个火枪营和 1 个猎兵营；共计 10 个步兵营，3 个骑兵团（12 个连），4 个步炮连和 5 个骑炮连，共有 40 门火炮。战时编制总额为 15 000 人。

黑森-达姆斯塔特有 4 个步兵团（8 个营），1 个轻骑兵团（6 个连），3 个炮兵连（其中 1 个是骑炮连），18 门火炮。共 1 万人。

第七、八两个军的唯一的独特之处，是炮兵采用了法国式的炮车。德意志联邦的第九军有两个师，一个师由萨克森提供，另一个师由黑森和拿骚的选帝侯国提供。

萨克森师包括：4 个步兵旅（每旅 4 个营），1 个猎兵旅（4 个营）；此外，还有准备编成预备队的 4 个基干营和 1 个猎兵营；4 个轻骑兵团，每团 5 个连，1 个炮兵团，有 6 个步炮连和 2 个骑炮连。以上共计：20 个步兵营，20 个骑兵团，50 门火炮，按战时编制 24 500 人。黑森选帝侯国所提供的军队有：4 个步兵团，即 8 个营，外加 1 个火枪营和 1 个猎兵营；2 个胸甲骑兵团，7 个骠骑兵团；3 个炮兵连，其中 1 个是骑炮连。共计：10 个步兵营，9 个骑兵团，19 门火炮。战时编制总额为 12 000 人。拿骚的军队有：7 个步兵营，2 个炮兵连，战时编制总额为 7 000 人，12 门火炮。

汉诺威和不伦瑞克的军队组成第十军的一个师，而梅克伦堡、霍尔施坦、奥登堡和汉撒各城市的军队则组成该军的另一个师。

汉諾威提供：8个步兵团，即16个营；4个輕步兵营；6个騎兵团，即24个連；4个步炮連和2个騎炮連。共計：22 000人，36門火炮。炮兵是按照英国形式組織的。不倫瑞克提供：5个步兵营，4个騎兵連，12門火炮，共5 300人。至于提供另一个师的那些小邦就不值一提了。

最后，德意志最小的几个邦共同組成一个預备师。德意志联邦按照战时編制的軍队总額以及該預备师的人数可見下表：

| | I. 編制員額 | | | | II. 預备兵員額 | | | |
|------|---------|--------|-----|---------|-----------|--------|-----|---------|
| | 步兵 | 騎兵 | 火炮 | 合計 | 步兵 | 騎兵 | 火炮 | 合計 |
| 奧地利 | 73 501 | 13 546 | 192 | 94 822 | 36 750 | 6 773 | 96 | 47 411 |
| 普魯士 | 61 629 | 11 355 | 160 | 79 484 | 30 834 | 5 660 | 80 | 39 742 |
| 巴伐利亚 | 27 566 | 5 086 | 72 | 35 600 | 13 793 | 2 543 | 36 | 17 800 |
| 第八軍 | 23 369 | 4 308 | 60 | 30 150 | 11 685 | 2 154 | 32 | 15 075 |
| 第九軍 | 19 294 | 2 887 | 50 | 24 254 | 9 702 | 1 446 | 25 | 12 136 |
| 第十軍 | 22 246 | 3 572 | 58 | 28 067 | 11 107 | 1 788 | 29 | 14 019 |
| 預备师 | 11 116 | — | — | 11 116 | 5 584 | — | — | 5 584 |
| 共計 | 238 721 | 40 754 | 592 | 303 493 | 119 455 | 20 364 | 298 | 153 767 |

当然，这还不能說明德意志联邦实际武装力量的全部情况，因为普魯士、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在必要时所能提供的軍队数量比上述兵額多得多。第十軍和預备师，或許再加上第九軍，可以組成警备部队，以免由于編制杂乱和特点不同而影响野战行动的速度。这些軍队的兵士在战斗素质方面大致相当于奥地利和普魯士兵士的水平，但是很明显，在这些兵力不大的軍队中沒有發揮軍事才干的有利条件，而且在其現有的規章制度中有很多陈旧过时的东西。

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即最后一部分，我們將研究西班牙、撒丁、土耳其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軍队。

第三部分

一、土耳其軍隊

在这次战争初期，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强。自馬茂德登基以来，經過了对土耳其近卫軍的屠杀²⁴²，特别是在签订了阿德里安堡和約以后，对军队进行改組和改革的各种做法已經統一起来而形成了一套制度。第一个最大的障碍——边远各省帕沙的割据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了；总的說来，他們已逐漸做到像欧洲地区的长官那样服从紀律。然而帕沙的昏庸、蛮橫和貪婪依然像在过去亚洲各省独裁者作威作福的时代一样，毫无改变；近二十年来关于帕沙叛乱的消息，我們听到的不多，但是各省起义反抗貪婪的統治者的消息，却听到不少。这些統治者——过去是最微不足道的家奴和“无所不为的小人”——利用了自己的新权势，采取敲詐、受賄、无耻盜窃国家資財的手段来发财致富。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紙空文而已。

土耳其军队由正規現役軍(尼查姆)、預备軍(列季弗)、非正規部队和附庸国家的輔助部队組成。

尼查姆由 6 个軍(奥尔杜)組成，各軍都在本軍駐防地区征集，这一点与普魯士各省駐軍在本省征集新兵的情况相同。我們可以看到，土耳其的尼查姆和列季弗的組織形式一般是模仿普魯士的。6 个軍司令部的駐地为：君士坦丁堡、苏姆拉、托利-莫納斯特尔、

埃尔斯倫、巴格达和阿勒頗。各軍均应由穆希尔(即元帅)統率,下屬 2 个师,即 6 个旅,共計 6 个步兵团, 4 个騎兵团, 1 个炮兵团。

步兵和騎兵的組織制度仿效法国,炮兵則仿效普魯士。

步兵团由 4 个营組成,每营 8 个連,滿額时包括指揮人員和參謀人員在內应为 3 250 人,即每营 800 人;但是,战前每营很少超过 700 人,而在亚洲地区,几乎一向是缺得更多。

騎兵团包括 4 个枪騎兵連, 2 个猎騎兵連;每連应为 151 人,然而騎兵連通常較步兵連缺額更多。

每一炮兵团由 6 个騎炮連和 9 个步炮連組成,每連有 4 門火炮,因而 1 个团的火炮总数为 60 門。

由此可見,各軍应有:步兵 19 500 人,騎兵 3 700 人,火炮 60 門。而实际上每一个軍的总数从未超过 20 000—21 000 人。

除了 6 个軍以外,尚有 4 个炮兵团(1 个預备团, 3 个要塞炮团), 2 个工兵-地道爆破兵团,以及派往干地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去的总数为 16 000 人的 3 支独立的步兵部队。

这样,战前尼查姆,即常备軍的总数大致如下:

| | |
|------------------------------|-----------|
| 36 个步兵团,每团平均 2 500 人 | 90 000 人 |
| 24 个騎兵团,每团平均 660—670 人 | 16 000 人 |
| 7 个野炮团..... | 9 000 人 |
| 3 个要塞炮团..... | 3 400 人 |
| 2 个工兵-地道爆破兵团 | 1 600 人 |
| 独立部队..... | 16 000 人 |
| <hr/> | |
| 合 計..... | 136 000 人 |

在尼查姆服役滿 5 年的兵士可以归休,在以后 7 年內轉入列季弗,即預备軍。这支預备軍和常备軍一样編有同等数量的軍、

师、旅、团等等；它与尼查姆的关系在实质上就是普鲁士第一类后备军与常备军的关系，其唯一不同之处是：在普鲁士旅以上的大部队中，常备军和后备军总是混合编在一起的，而在土耳其军队中则是分开建立的。列季弗的军官和士官永远在预备部队中服务。列季弗一年一次操练，在操练期间可以获得与常备军相等的薪餉和口粮。但是，这样的组织首先要求有良好的民政管理和相应的文化水平，而土耳其距离这种水平还很远，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所以我们说列季弗的数量和尼查姆相等，显然只是指其最大的可能数字而言的。

在各地征召的辅助部队名额如下：

| | |
|--------------------|-----------|
| 1. 多瑙河各公国····· | 6 000 人 |
| 2. 塞尔维亚····· | 20 000 人 |
| 3.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 30 000 人 |
| 4. 上阿尔巴尼亚····· | 10 000 人 |
| 5. 埃及····· | 40 000 人 |
| 6. 突尼斯和的黎波里····· | 10 000 人 |
| 合 計····· | 116 000 人 |

在这支部队中还应当加上志愿兵——巴希布祖克；在小亚细亚、库尔德斯坦和叙利亚可以招到大量的这种志愿兵。这是过去几世纪遍布匈牙利并两次进逼维也纳²⁴³的大帮非正规部队（主要是骑兵部队）的最后一批残余；近两世纪以来他们屡战屡败，这证明他们连欧洲装备最差的骑兵都比不上。他们丧失了以往的自信心，现在所起的作用只是聚集在军队的周围，吃尽耗光正规部队所需要的给养品。巴希布祖克掠夺成性，极不可靠，因而甚至像俄国人交给哥萨克的那种驻军警戒勤务也担负不了；往往在最需要他

們的时刻，却无法找到他們。因此，在目前的戰爭中，人們认为减少这种部队的数量是适当的，据我們估計，召集起来的这种部队至多不过 5 万人。

这样一来，关于土耳其軍隊在这次戰爭开始时的兵力，我們就可以計算如下：

| | |
|-------------------------|-----------|
| 尼查姆····· | 136 000 人 |
| 列季弗····· | 136 000 人 |
| 埃及和突尼斯的正規輔助部队····· | 50 000 人 |
| 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非正規輔助部队····· | 40 000 人 |
| 巴希布祖克····· | 50 000 人 |
| 合 計····· | 412 000 人 |

但是，在上述总数中應該扣除一部分人数。可以充分相信的是：在欧洲駐防的各軍情况比較好，土耳其也能尽力使他們得到补充；但是在亚洲，在伊斯兰教居民占优势的边远各省中，人可能是現成的，然而武器、服装和彈药的情况就很不好。多瑙河軍团主要由欧洲的三个軍組成。这是核心，圍繞着这个核心的是：欧洲的列季弗，叙利亞軍或至少是該軍的大部分，阿尔納烏特人²⁴⁴和波斯尼亚人的部队以及巴希布祖克。可是，奥美尔-帕沙的十分謹慎的态度——他坚持不到最后关头决不动用自己的部队——有力地证明了他对土耳其自有正規軍以来唯一最优秀的这支軍隊的战斗力是多么缺乏信心。但是在亚洲地区，——土耳其过去那种貪污盜窃、不尽职守的風气在那里依然盛行，——尼查姆的两个軍、全部列季弗，加上全部非正規部队都未能抵住人数少得多的俄国軍隊；每次会战都是以土耳其人的失敗而告終，到 1854 年战局結束时，土耳其的亚洲軍隊几乎已不再存在了。由此可見，軍隊不仅缺少

严密的組織，而且大部分军队本身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从卡尔斯和埃尔斯倫的外国軍官以及报社記者那里經常可以听到有关武器、服装、彈药和粮食不足的怨言，他們一致肯定地认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那些帕沙不尽职守、昏庸无能和貪得无饜。經費是按期撥付給他們的，但他們却每次都納入了私囊。

土耳其正規军队的兵士服装大体上是仿效西欧军队的式样的；主要的差別是帽子，这是一种最不适合于当地气候的带穗的紅色平頂圓錐形帽，在炎热的夏天戴它常会使人中暑。軍服的质料很差，同时又不能在規定的期限內更換，因为軍官通常把用来更換軍服的公款占为己有。至于武器，不論在步兵或騎兵中，都是旧式的；只有炮兵才装备着在欧洲籍軍官和国内工程师领导下在君士坦丁堡鑄造出来的性能良好的野炮。

土耳其人本身是一些不錯的兵士。他們素来勇敢，最能吃苦耐劳，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听从指揮。得到土耳其兵士信任的欧洲籍軍官，是可以信賴这些兵士的；格拉赫和巴特勒在錫利斯特里亚的情况，以及伊斯甘德-貝伊(伊林斯基)在瓦拉几亚的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这是特殊情况。整个說来，土耳其人对“異教徒”的敌意生来就是如此强烈，他們的風俗和观念与欧洲人是如此不同，以致只要他們依然是国内的統治民族，就决不会服从内心所蔑視的人，而认为这些人比自己低下得多。自从军队采取了欧洲式的編制以后，这种蔑視感甚至扩大到对军队編制的看法。一个土耳其兵仇視異教徒的各项制度不下于仇視異教徒本人。不仅如此，現代军队所要求的严格的紀律、持久的积极性和經常集中的注意力，与懶惰的、主張消极宿命論的土耳其人是极不相容的。甚至軍官宁可坐視军队被击潰，也不想發揮自己的积极性和智慧。这

是土耳其军队最大的弱点之一，就这一点也足以使土耳其军队不适于进行任何一种进攻战了。

兵和士官是用志愿报名和抽签的办法补充的；下级军官也有从兵士中提升的，但通常是些非战斗兵和勤务兵，即侍候高级军官的僕从。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学校水平很低，训练不出足够的青年来补充缺额。至于谈到较高军阶的人事情况，那末在这里盛行着西方国家所不能理解的那种任用宠人的做法。大部分将军在年轻时都是切尔克斯奴隶，某些显贵的 *mignons* [宠人]。极端的愚昧无知、目光短浅和傲慢自负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而宫廷倾轧则是晋升的主要手段。甚至那些为数不多的、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务的欧洲籍将军(背教者)，如果不是由于绝对需要他们，以免整个军事机器垮台，那末也是不会去任用他们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们是真正值得器重的人，或者不过是些冒险家，都一律不加选择地被录用了。

现在，经过了三次战局，除了分驻多瑙河和克里木两地的奥美尔-帕沙原有的 8 万军队以外，土耳其军队可以说已不存在了。亚洲部分的军队由各色各样的坏分子组成，约 25 000 人，他们不适于野战，并且由于打了败仗而士气颓丧。在原有的 40 万人中，其余的人消失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也许一部分人阵亡在战场，死于疾病，或因残废而退伍，而一部分人则沦为土匪。现有的几万人很可能将是土耳其最后的军队，因为很难设想，由于和英法结盟而受到打击的土耳其还能恢复元气。

在沃耳特尼察战斗²⁴⁵和切塔特战斗中，土耳其人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曾引起了人们过分的喜悦，现在这一时期已经过去。奥美尔-帕沙固执地按兵不动，这足以使人们对土耳其军队的其他

素质产生怀疑；甚至出色的錫利斯特里亚的保卫战也不可能完全打消这一疑团。土耳其人在亚洲的挫败，在巴拉克拉瓦附近的溃退，在叶夫帕托利亚的单纯守势，以及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按兵不动——这一切使我们能够更正确地认清土耳其军队的素质。关于土耳其军队的组织，直到目前为止还根本不可能就其优点作出任何总的评价。无疑地，某些团作战勇敢，有优秀的指挥官，能执行各种勤务，但这样的团为数很少。数量庞大的步兵缺乏团结精神，因此在阵地战中虽然也表现了良好的素质，但是却不宜于执行野战勤务。正规骑兵绝对比不上欧洲任何大国的骑兵。炮兵的水平较高，野炮团很出色；兵士似乎生来就能担任炮兵勤务，然而军官却远不能令人满意。在列季弗中，看来组织不好的现象表现得极为明显，虽然兵士无疑是准备尽力效命的。在非正规部队中，阿尔纳乌特人和波斯尼亚人只是优秀的游击队员，但却经常被用来防守工事。而巴希布祖克几乎是毫无用处的，甚至是有害的。埃及部队的水平看来与土耳其的尼查姆的水平相仿，而突尼斯部队差不多什么也干不了。因此，这一支混杂的军队，军官的质量既差，指挥又不当，经过三次战局几乎全军复没，这是不足为奇的。

二、撒丁军队

撒丁军队包括 10 个步兵旅，10 个猎兵营，4 个骑兵旅，3 个炮兵团，1 个工兵-地道爆破兵团，以及撒丁岛的一队马枪兵（警察部队）和轻骑兵。

在 10 个步兵旅中有 1 个近卫旅，4 个掷弹兵营，2 个轻步兵营和 9 个基干旅。这 9 个旅共有 18 个团，每团有 3 个营。此外，尚有 10 个猎兵营（bersaglieri〔意大利猎兵〕），即每旅各 1 个营，因

此現在撒丁軍隊中受過訓練的輕步兵數量比在任何其他國家的軍隊里都大得多。

此外，每團有 1 個後備營。自 1849 年以後，由於財政方面的原因，各營的人數大為縮減。戰時 1 個營約有 1 000 人，而平時每營最多不過 400 人；其餘的人都是歸休兵。

騎兵的編成中有 4 個重騎兵團和 5 個輕騎兵團。每團包括 4 個野戰連和 1 個後備連。戰時每團的 4 個野戰連共約 800 人，而平時勉強可達 600 人。

炮兵 3 個團由 1 個工役和技工團，1 個要塞炮團（12 個連）和 1 個野炮團（6 個步炮連，2 個騎炮連，2 個重炮連，每連有 8 門火炮）組成。輕炮連裝備八磅加農炮和二十四磅榴彈炮；重炮連裝備十六磅加農炮；共計 80 門火炮。

工兵-地道爆破兵 1 個團，有 10 個連，約 1 100 人。馬槍兵（騎馬的和徒步的）的數量對於這樣小的王國來說是很大的了，他們約有 3 200 人。在撒丁島上執行警察勤務的輕騎兵約 1 100 人。

在 1848 年第一次對奧地利戰局期間，撒丁軍隊的人數無疑地達到了 7 萬，而在 1849 年幾乎增加到 13 萬，以後軍隊會縮減到約 45 000 人。目前撒丁究竟有多少兵力，很難確定，但毫無疑問，在與英法訂約²⁴⁶後軍隊又重新有了擴充。

皮蒙特軍隊之所以具有在任何時間都能增減作戰部队的這種巨大的伸縮性，是因為它有着與普魯士極為近似的兵役制；實際上撒丁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稱為意大利的普魯士。撒丁各邦的每個公民也有服兵役的義務，與普魯士不同的一點是容許代役；公民服兵役的期限與普魯士相同，分為現役期和預備役期兩種，歸休兵留在預備役內，一旦發生戰爭即可重新征召入伍。這種制度介乎普魯

士制度与比利时和德意志各小邦的制度之間。因此，在征召预备兵員后，步兵人数便大致可从 3 万人扩充到 8 万人。騎兵和野战炮兵可以增长的人数不多，因为这两个兵种的兵士在整个服役期間通常都必須留在团內。

皮蒙特军队就其軍容和战斗素质來說，都不亚于欧洲任何一国的军队。皮蒙特兵和法国兵一样身材不高，步兵更是如此；近卫軍平均身高甚至不到 5 英尺 4 英寸。但是由于美观的服装、端正的軍人姿态、匀称灵活的体格和意大利人的漂亮面貌，因而看起来他們比許多身材高大的兵士更神气。基于步兵和近卫軍的服装式样和装具基本上和法国的相似，在某些細小之处則仿效奥地利。意大利猎兵的服装有其特殊的式样：戴着插有鸡翎的水兵帽，穿着褐色上衣。騎兵穿着遮不住臀部的褐色短上衣。步兵基本上装备的是短銃枪，猎兵則装备有提罗耳式短馬枪，这是一种性能良好、完全适用的武器，但在各方面仍然不如米涅式步枪。第一橫列中的騎兵主要使用长矛；这一常规在輕騎兵中是否保留，我們还不能說。騎炮連和輕步炮連由于装备了八磅炮，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一点和曾拥有同样火炮的法国军队的情况是相同的。但是，重炮連由于装备有十六磅加农炮，因而成为大陆上最重型的野战炮兵。这种加农炮只要架設好，便可极有效地进行射击，这一点已为黑河会战所证实，在这次会战中，十六磅炮的准确射击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联軍的胜利，从而博得了一致的贊揚。

在意大利各国中，皮蒙特所处的位置最有利于建立一支优良的军队。波河及其支流的平原地区出产駿馬，而且有着魁梧漂亮的兵士，他們是意大利人中身材最高的，特別适于在騎兵和重炮兵中服务。在从南、西、北三面环绕平原的山地中居住着勇敢的人

民，他們虽然身材不很高，但同一切山民一样，强壮有力、精力充沛、勤劳机智。正是他們組成了步兵的核心，特别是意大利猎兵部队的核心，这支猎兵部队在訓練方面几乎不亚于 chasseurs de Vincennes [文森猎兵]，而在体力和吃苦耐劳方面无疑地超过了他們。

整个說来，皮蒙特軍事学校的水平是高的，因而軍官都受过良好的訓練。在 1846 年以前在軍官任免方面有重大影响的是貴族和教会。当时查理-阿尔伯特认为他統治国家所依靠的力量只有两种：教会和軍隊；的确，在意大利到处可以听到这种說法：在皮蒙特街道上遇見的三个人当中，一个一定是軍人，另一个是僧侶，第三个才是平民。現在当然沒有这种現象了；教会已經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虽然貴族仍保留有許多軍官职务，但 1848 年和 1849 年的战争毕竟对軍隊起了作用，使軍隊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质，并且这种民主并不是輕易就能破坏的。某些英国报社駐克里木的記者肯定地說：几乎所有皮蒙特軍官都“出身于貴族”，但是事实远非如此；我們就亲自認識一些出身于兵士的皮蒙特軍官，因而可以有把握地說：現在大部分尉官都是在对奥地利的斗争中由于勇敢而理应获得自己軍阶的人，或者至少也是与貴族无关的人。

我們认为，皮蒙特軍隊过去的敌人之一、1848—1849 年任奥地利軍隊副參謀长的雪恩哈耳斯將軍所发表的意見，便是对皮蒙特軍隊所作的最好的贊語。这位將軍是奥地利軍隊的优秀軍官之一，也是千方百計地阻碍意大利独立的人，但在他所著“意大利战争回忆录”一书中，却始終以极其尊敬的口吻談到皮蒙特軍隊。

他写道：“皮蒙特炮兵是由精干的人組成的，担任指揮的是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优秀軍官；火炮性能良好，口徑也比我們的大。”“对騎兵不应輕視，第一

横列的騎兵装备长矛，但因为这种武器只有最熟练的騎手才能掌握，所以我們不想把这项新措施看做是一种很大的改进。然而他們的騎术則具有高度的水平。”“在桑塔路其亚会战中，双方都表现了惊人的勇敢。皮蒙特人攻击时非常坚决和勇猛；皮蒙特人或奥地利人都建立了許多战功，表现了各自的勇敢精神。”“在談到諾瓦拉会战时，皮蒙特军队是不会感到羞愧的”等等²⁴⁷。

曾参加 1848 年战局、而且决不同情意大利独立的普魯士將軍維利森也同样称赞过皮蒙特军队。

从 1848 年起，意大利某些方面的人士就把撒丁国王看做整个半島未来的首領。我們虽不贊同这种看法，但仍然认为，意大利人要想爭取到自由，皮蒙特军队将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軍事力量，而且它将成为未来意大利军队的核心。在实现这一点以前，皮蒙特军队也許要經歷一系列的內部的革命的变化，但其中的优秀分子必能經受住一切考驗；这支军队甚至由于編入真正的民族军队而将显得更加出色。

三、意大利各小国的军队

羅馬教皇的军队看来只是一紙空文而已。步兵营和騎兵連从来沒有足額过，只能組成 1 个兵力薄弱的师。此外还有 1 个瑞士籍近卫团，这是政府多少尚能信賴的唯一部队。托斯卡納、帕尔馬和摩地那的军队兵力太小，不值得一提；只要說明它們基本上是仿效奥地利形式組成的就够了，另外还有那不勒斯军队，但是关于它也不值得多談。这支军队在敌人面前从未表現过勇敢；無論是在 1799 年为国王而战或在 1821 年为宪法而战，他們总是因善于逃跑而出名的²⁴⁸。甚至在 1848—1849 年，那不勒斯军队的地方部队到处被武装起义者所击败，要不是依靠瑞士籍部队，那末炮彈国王

現在就不能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了。在羅馬被圍期間，加里波第率領一小隊兵士出擊那不勒斯師，並且兩次擊潰了這個師²⁴⁹。那不勒斯軍隊按平時編制的人數為 26 000—27 000 人，但在 1848 年，據說為 49 000 人，在全軍足額時似已達到 64 000 人。在所有上述部隊中，只有瑞士籍部隊是值得注意的。他們編為 4 個團，每團 2 個營。足額時每營應為 600 人，4 個團共計 4 800 人。但在目前骨幹過多，因而每營約有 1 000 人（僅第四團——伯爾尼團就有 2 150 人）；瑞士籍部隊的總數約為 9 000 人。這是由瑞士自己的軍官指揮，並在內部組織和軍隊管理方面不受那不勒斯政府支配的真正第一流的軍隊。它最初受雇於 1824 年或 1825 年，當時那不勒斯國王不再信任不久前叛變的本國軍隊，而認為必須有一支強大的禁衛軍來保衛自己。因此與瑞士各州簽訂了條約，即所謂“定約”30 年；瑞士籍部隊保持自己的紀律條例和軍事組織，其薪餉為當地那不勒斯兵士的 3 倍；軍隊是由瑞士各州的募兵處招募的志願兵組成的。退伍的軍官、老兵和傷兵都可領到優撫金。如果 30 年期滿後沒有訂立新約，則各團應予解散。現在的瑞士憲法禁止招募兵士到外國軍隊中服務，因而在 1848 年以後募兵條約便宣告無效；在瑞士的招募至少在表面上是中止了，但在克亞索以及倫巴第的各地都設立有集合站，許多招募代理人仍在瑞士境內秘密地繼續干他們的勾當。那不勒斯政府如此迫切需要新兵，以致連當時逃亡瑞士的政治犯中的背叛者也不拒絕接收。在這種情況下，那不勒斯國王確認了條約規定的關於瑞士兵的特權，去年 8 月，在定約 30 年期滿的時候，又頒布特別法令，只要瑞士人繼續為國王效勞，這項特權始終有效。

四、瑞士军队

瑞士没有本国的常备军。每个瑞士人只要适合服兵役，都应在民兵部队中服务。民兵按年龄分为三种(Auszug, erstes 和 zweites Aufgebot [适龄的、第一类应征的和第二类应征的])。青年在服役的头几年必须应召受训，有时也把他們集中在兵营内。但是，无论誰，只要有机会看到瑞士兵的笨拙的步伐和丑陋的仪容，或是听到新兵与训练他們的軍士相互間的戏謔，就一定会承认他們的軍事素质是很差的。关于这种民兵的战斗力，我們只能以1847年反宗得崩德的战争²⁵⁰为例来加以評述。这次战争的特点是：伤亡的人数与参战的兵力比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虽然民兵的总的体制是联邦法所确定的，民兵受联邦司令部领导，但民兵的組織几乎完全掌握在各州政府的手中，这种做法不可能不造成制度的紊乱和不統一。同时，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妨碍必要的預备兵員的积累，妨碍改革的实施，以及妨碍在重要地点、特别是瑞士最易受到攻击的地区——与德意志交界处系統地构筑工事。

瑞士人和一切山民相同，如果受到严格的训练，就是很好的兵士；他們無論在哪一国的正規軍中服务，作战都很出色。然而他們缺乏机智；为了加强他們的自信心和团結精神，就需要对他們进行比对法国人或北德意志人更长时间的训练。也許，在外国侵犯瑞士时，高涨的爱国热情会弥补这些缺点，但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一支8万人的正規軍，甚至人数更少一些，也一定能打败瑞士人所自认为能提供的16万人以上的民兵。1798年法国人只用了几个团的兵力就战胜了瑞士人²⁵¹。

瑞士人以他們有优秀射手而极为自豪。无疑地，除了奥地利

的阿尔卑斯山領地以外，瑞士的优秀射手比欧洲任何国家的都要多。但是一看到軍隊中几乎所有这些神枪手都装备着普通的不便使用的短銃枪时，对瑞士优秀射手的敬意便会大大地降低。为数不多的猎兵营可能是由优秀的射手組成的，然而他們的短而重的猎枪(Stützen)陈旧过时，根本不能和米涅式步枪相比，而且这种枪采用角形火药筒装填火药的方法，既笨且慢，不能保证他們战胜装备有較完善的武器的軍隊。

瑞士軍隊的武器、装具、編制、訓練制度都已过时，看来只要各州政府繼續干預軍事，則今后情况仍将如此。

五、斯堪的那維亞各国的軍隊

瑞典和挪威的軍隊，虽然联合在一个国王的旗帜下，但同他們的国家一样具有独立性。这两个山国和瑞士不同，它們都有常备軍。但就其严寒的自然条件以及居民稀少的情况来看，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与瑞士极其近似，甚至在两国的軍事組織方面也具有同样的制度——民兵制。

瑞典有三种部队——以招募的方法編成的部队(värfvade trupper)、地方部队(indelta trupper)和預备部队。Värfvade包括：3个步兵团，計6个营；2个騎兵团；3个炮兵团，計13个步炮連和4个騎炮連，共有96門六磅炮，24門十二磅炮，16門二十四磅炮。总計7700人和136門火炮。瑞典軍隊的全部炮兵都編在这种部队中。

Indelta有20个团，每团2个营，另有5个独立步兵营和6个騎兵团，各团的騎兵連为1—8个不等。这种部队的人数为33000人。

預备部队的人数占全軍总数的大部分，征召时可有95000人。

此外，在哥特兰島有一支經常保持战斗准备的特种民兵部队，它分为 21 个連，計 7 850 人和 16 門火炮。这样，瑞典军队的总数約为 14 万人和 150 門野炮。

第一种部队內，志願兵的服役期通常为 14 年，但法律也准許召募时以 3 年为期。Indelta〔地方部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兵，兵士在受訓以后，可以同自己家庭一同住在分配給他們的农場里，每年只操练一次，为期一个月。农場收入就是他們的薪餉，但在集訓期間可以領到特別奖励金。軍官同样可以在国内适当的地区获得一块王家土地作为暫时的領地。凡年齡在 20—25 岁适于服兵役的瑞典人都編入預备部队；他們受短期的軍事訓練，以后每年操练两个星期。由此可見，除了为数不多的 värfvade〔召募的部队〕和哥特兰部队以外，瑞典军队的 indelta 和預备部队在实质上全都是民兵。

瑞典军队在軍事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与其有限的人口是完全不相称的，在这有限的人口中却組成了著名的瑞典军队。古斯达夫·阿道夫在三十年战争²⁵²期間进行了許多改革，从而开辟了战术的新紀元。查理十二的巨大的軍事天才被他的冒險的癖好所毁灭，但他仍然使瑞典人創造了真正的奇迹，例如用騎兵攻击来夺取堡垒。在对俄国的最近几次战争中，瑞典人表現了自己的最优秀的一面；在 1813 年，貝尔納多特曾尽可能不使瑞典军队去冒險，因而他們几乎沒有受到炮火的威胁，除非他們犯了錯誤；只有萊比錫会战是一个例外，在这次会战中瑞典军队仅占联军极小的一部分。Värfvade，甚至 indelta 无疑地一定能永远保持瑞典军队的光荣；但是預备部队，如果在軍事行动前不集中进行長時間的訓練，就只能作为新兵来使用。

挪威有 5 个步兵旅, 包括 22 个营, 計 12 000 人; 1 个騎兵旅, 包括 3 个猎兵大队, 計 1 070 人; 1 个炮兵团, 約 1 300 人。此外尚有民兵形式的預备部队 9 000 人。挪威軍隊总共約 24 000 人。这支軍隊在体制上同瑞典軍隊很少有区别。其唯一特点是: 少数猎兵連配备有滑雪板, 兵士穿上滑雪板, 用两根长棍支撑, 就和拉普兰人一样能在雪上迅速滑行。

丹麦軍隊包括: 4 个步兵旅, 包括 23 个营(1 个近卫营, 12 个基干营, 5 个輕步兵营和 5 个猎兵营), 每营按平时編制約 700 人; 3 个騎兵旅(3 个近卫騎兵連, 6 个龙騎兵团, 每团 4 个騎兵連; 平时每个連 140 人); 1 个炮兵旅(2 个团, 計 12 个炮兵連, 共有 80 門六磅炮, 16 門十二磅炮); 3 个工兵連。总計: 步兵 16 630 人, 騎兵 2 900 人, 炮兵和工兵部队 2 900 人, 火炮 96 門。

按战时編制每个步兵連为 200 人, 步兵营为 800 人, 騎兵連为 180 人, 因而全部常备部队的人数可达 25 500 人。此外, 从預备部队中还可征集 32 个步兵营, 24 个騎兵連和 6 个炮兵連, 共計 31 500 人。这样, 全軍总数約达 56 000—57 000 人。但在必要时人数尚可增加。例如在最近一次战争中, 不算霍尔施坦和什列斯維希在內, 仅丹麦一处就提供了 5—6 万人, 而丹麦現在又重新获得在上述两个公国内征兵的权利。

丹麦軍隊是在 22 岁以上的青年中采用抽签的方法来补充兵員的。服役期为 8 年, 但实际上炮兵留在团內只 6 年, 常备部队的兵士只有 4 年, 而其余的时间他們則被編入預备部队。丹麦人在 30—38 岁时屬于第一类应征民兵, 到 45 岁为止屬于第二类应征民兵。所有这一切都組織得很好。但是一旦同德意志发生战争, 将近半数的丹麦軍隊, 即在两个公国中征召的軍隊就会逃散, 并将調

轉枪口来攻打现在的战友。大量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人混杂在丹麦军队中，这正是它的弱点，因此在同較强大的邻国发生任何冲突时，丹麦军队实际上将几乎完全没有战斗力。

丹麦军队从 1848—1849 年改組以后，武器和装具都很好，各方面具有十分牢固的基础。丹麦本土人是优秀的兵士，几乎在三年战争的所有战斗中都表現得很出色，然而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人看来无疑地較丹麦人更出色。丹麦军官一般說来是好的，但军官中間出身于貴族的太多，他們所受的理論教育极差。军官的报告通常都写得极为草率，就像英国军官写的报告一样；丹麦军队同不列顛军队还有一点近似之处，就是运动性差。但是它还没有表現过因克尔芒会战的胜利者所表現的那种不可摧毀的坚毅精神。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人无可爭辯地应屬於欧洲优秀的兵士之列。他們是卓越的炮兵，就像他們的同族人——英国人一样，在战斗中能保持冷靜。虽然他們是平原上的居民，但却适合在輕步兵中服务；他們在 1850 年建立的第一个猎兵营可以与任何一个同兵种的部队媲美。

六、荷兰军队

荷兰军队共有 36 个步兵营，編成 9 个团，計 44 000 人；4 个龙騎兵团，包括 20 个連，另有 2 个猎騎兵連和 2 个騎宪兵連，共为 24 个騎兵連，計 4 400 人；2 个野炮团（5 个六磅步炮連和 6 个十二磅步炮連，2 个六磅騎炮連和 2 个十二磅騎炮連，共計 120 門火炮）和 1 个工兵营；全軍总数为 58 000 人，殖民地的各团不計算在內。但在平时这支军队并不是經常存在的。只是由军官、士官和人数不多的志願兵組成的核心保持着战斗准备。大部分兵士虽应服役 5

年，但实际上受訓 2—3 个月后即解散回家，以后每年野营集訓数星期。此外，还有一种分为三类应征的預备部队，其中包括所有从 20—35 岁适合服兵役的公民。第一类应征者可組成步兵和炮兵約 53 个营；第二类——29 个营。但这些部队根本沒有組織起来，因而很难把他們計算进去，甚至也不能把他們算作民兵。

七、比利时軍隊

比利时軍隊由 16 个步兵团組成，計 49 个营，每团附屬的 1 个后备营除外；步兵总数为 46 000 人。騎兵由 2 个猎騎兵团和 2 个枪騎兵团、1 个吉德团、2 个胸甲騎兵团組成，除 7 个后备連外，共計 38 个騎兵連；騎兵总数为 5 800 人。炮兵由 4 个团組成（4 个騎炮連，15 个步炮連，4 个炮兵后备連，24 个要塞炮連），計有 152 門六磅的和十二磅的加农炮；此外还有 1 个工兵—地道爆破兵团，計 1 700 人。全軍除預备部队外总共 62 000 人；加上預备部队，就同最近一次征召所表明的那样，全軍人数可增加至 10 万人。軍隊是以抽签方式补充兵員的；服役期 8 年，但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兵士可以归休。因此按平时的編制，比利时的实际兵力未必能达到 3 万人。

八、葡萄牙軍隊

葡萄牙軍隊在 1850 年由下列部队組成：

| | 平时編制 | 战时編制 |
|---------------|--------------|--------------|
| 步 兵····· | 18 738 | 40 401 |
| 騎 兵····· | 3 508 | 4 676 |
| 炮 兵····· | 2 707 | 4 098 |
| 工程部队和司令部····· | 728 | 495 |
| | <hr/> 25 681 | <hr/> 49 670 |

炮兵由 1 个野炮团（1 个骑炮连和 7 个步炮连）、3 个阵地炮兵和要塞炮兵团以及驻防岛屿的 3 个独立营组成。火炮有六磅炮和十二磅炮两种。

九、西班牙军队

在所有的欧洲军队中，由于特殊情况，西班牙军队是美国最感兴趣的一支军队。因此，在结束对欧洲军队的简评的时候，我们对西班牙军队给予较多的注意，虽然同大西洋彼岸西班牙的邻国的军队相比，这支军队就其作用来说，似乎是不值得这样重视的。

西班牙的兵力由国内的军队和殖民地的军队组成。

国内的军队计有 1 个掷弹兵团，45 个基干团（每团 3 个营），驻休达的 2 个团（每团 2 个营），18 个 cazadores（猎兵）营。所有这 160 个营在 1852 年组成一支 72 670 人的作战军队，为此，国家每年要开支 82 692 651 雷阿耳，合 10 336 581 美元。骑兵在 1851 年由 16 个马枪兵、龙骑兵和枪骑兵团组成，每团 4 个骑兵连，另有 11 个 cazadores 连即轻骑兵连，共计 12 000 人，为此国家每年要开支 17 549 562 雷阿耳，合 2 193 695 美元。

炮兵计有 5 个步炮团（每团 3 个大队，王国境内每一地区驻 1 个团），5 个重炮大队，3 个骑炮大队和 3 个山炮大队，共计 26 个大队，或者按现在的名称为 26 个营。每个骑炮营有 2 个连，每个山炮营和步炮营有 4 个连。92 个步炮连和 6 个骑炮连共有 588 门野炮。

工兵-地道爆破兵为 1 个团，计 1 240 人。

预备部队包括每个步兵团的 1 个营（第四营）和每个骑兵团的 1 个后备连。

兵力总数,据記載 1851 年为 103 000 人;1843 年,埃斯帕特罗下台后,总数仅为 5 万人,但有一个时期納尔瓦艾斯又把軍隊增加到 10 万人,平均来看,服現役的最多为 9 万人。

殖民地的軍隊如下:

1. 古巴軍隊:老兵 16 个步兵团,志願兵 4 个連,2 个騎兵团,2 个步炮营(每营 4 个連),1 个山炮营(4 个連),1 个騎炮营(2 个連)和 1 个工兵-地道爆破兵营;除了这些基干部队外,还有 *milicia disciplinada* [国民軍惩戒部队]^① 4 个步兵营和 4 个騎兵連, *milicia urbana* [国民軍城市部队] 8 个騎兵連;共計 37 个步兵营,20 个騎兵連和 84 門火炮。近几年来,古巴的常备軍得到了由西班牙調来的大量部队的补充。如果我們把原有的数量算作 16 000—18 000 人,那末現在古巴軍隊大概有 25 000—28 000 人。不过这只是一个概略的統計。

2. 波多黎各軍隊:老兵 3 个步兵营,国民軍惩戒部队 7 个营,地方志願軍 2 个步兵营和 1 个騎兵連,4 个步炮連。由于大部分西班牙殖民地都被人忽視,因此无法較为准确地确定这支軍隊的数量。

3. 菲律宾群島的軍隊:5 个步兵团(每团 8 个連),1 个呂宋猎兵团,9 个步炮連,1 个騎炮連和 1 个山炮連。另外 9 个土著步兵队(每队 5 个营)以及原先从土著居民中征召的其他部队,已于 1851 年解散。

軍隊是用抽签的方法来补充兵員的,允許代役。每年征召一批,总数为 25 000 人,但在 1848 年征召了第三批,共 75 000 人。

① 国民軍惩戒部队是由受惩戒的人組成的部队。——編者注

西班牙军队之所以采用现行的编制，主要应归功于纳尔瓦艾斯，虽然 1768 年查理三世制定的条例仍然是军队体制的基础。纳尔瓦艾斯废除了各团旧有的地方团旗（各团曾有自己的团旗），而换上了统一的西班牙旗。他还取消了地方部队的组织，集中了军队的领导和恢复了军队的统一。他根据经验深知，对这样一支几乎从未领过薪饷和缺少吃穿的军队来说，钱是基本的动力，因此他曾试图调整兵士的薪饷和军队的财务管理。纳尔瓦艾斯是否全部实现了他的创举，无人得知，但他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改良措施，在萨尔托里乌斯及其继任者统治时期便迅速化为乌有了。过去一贯“无饷、无食、无衣”的状况完全恢复了；一方面，将官和校官穿着金光闪闪的制服，甚至穿着按个人的喜好制作的、不合乎任何规定的服装，另一方面兵士却衣衫襤褸，没有鞋穿。一个英国军官在叙述 10—12 年前西班牙军队的情况时这样写道²⁵³：

“西班牙兵完全没有军人的姿态，哨兵站岗时踱来踱去，帽子搭在后脑勺上，枪在肩上晃荡，并且无所顾忌地大声唱着快乐的 *seguidilla*（西班牙舞曲）。他们常常根本没有什么军服，或者虽有上衣和裤子，但却如此襤褸，以致即使在暑天也不得不在军服外面套一件灰大衣；三人中总有一人的鞋子破烂不堪，露出脚趾——这就是西班牙 *vida militar*（兵士生活）的壮观！”

塞拉诺于 1843 年 9 月 9 日发布的一项命令中规定：

“今后，全体军官和军队的高级长官在出入公共场所时，凡不穿便服者，应一律穿本团的制服，并需佩戴规定的军刀；全体军官只许佩戴确系规定的勋章奖章，禁止随意佩戴许多军官认为可以炫耀自己的奇异的装饰品。”

这是关于军官的情况，现在引证一段关于兵士情况的叙述：

“科尔多巴旅长亲自带头在加迪斯发起了一次募捐，为的是筹款给阿士土里亚团的每个勇敢的兵士买一条呢裤。”

这种財政上的混乱情形,可以說明从 1808 年起西班牙軍隊几乎一直处在連綿不断的騷动状态的这一事实。但是,这一方面的真正原因还要更深远些。在同拿破侖的长期战争中形形色色的部队及其司令官取得了政治势力,这次战争使西班牙軍隊第一次带有羅馬近卫軍的色彩。远从革命时期起,許多奋发有为的人士就一直留在軍隊里;游击队并入正規軍就更增强了这个成分。因此,如果說高級軍官保持了他們那种羅馬近卫軍式的野心,那末兵士和下級軍官直到現在还受到革命傳統的鼓舞。所有这一切就为 1819—1823 年的起义逐漸作好了准备,以后,在 1833—1843 年²⁵⁴,內战又把軍隊及其首領推上了首要地位。被一切党派当做工具使用的軍隊,暫時把政权抓在自己手里,这是不足为奇的。

德·普腊德神甫曾說：“西班牙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不是一个擅长軍事的民族。”²⁵⁵ 在欧洲各民族中,西班牙人无疑对軍事紀律抱有最大的反感。但是这个曾以步兵聞名世界达一百余年的民族,要重新建立一支可以引以自豪的軍隊,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需要改变軍事制度,而且需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民政方面的整个制度。

卡·馬克思 辛普森將軍的辭職。 ——議會新聞

倫敦 8 月 3 日。两天前“晨邮报”用明显地表露出它受窘的語句向英国公众报道了下面这个消息：辛普森將軍借口健康不佳即将卸去他的英軍总司令的职务，并将不任命他的继任者。換句話說：英国軍隊將服从法国的总指揮。这样一来，內閣有意地推卸了进行战争的任何責任，而把責任轉嫁給“我們光荣而偉大的盟国”。議會从而也失去了最后的表面的监督。同时找到了把英法同盟变成这两个国家間的殘酷无情的敌对的可靠手段。我們知道这一切也是那个行家一手干出来的，早在 1839 年，*entente cordiale*²⁵⁶ 就是在他的粗暴压力下撕毀的。

議會用以下几件丑事体面地結束了自己的會議。**第一件丑事**：按照大資本家們的要求拒絕了关于私人（非股份的）貿易公司有限責任的法案，这些大資本家們的眉头一皺，就会使最妄自尊大的人——帕麦斯顿发抖。**第二件丑事**：无限期地延期討論关于調整爱尔兰租佃关系的法案，这个法案已經在議會两院漫游了四年之久；延期——这是胆怯的妥协，它可以让下院放棄它自己的創作，让內閣——違背自己的諾言，而让“爱尔兰人区”——把問題留作悬案，以便在 *hustings*〔选举大会〕期間再利用它。**最后一件丑**

事：里德少校的提案責成內閣在議會假期內締結和約时应召开議會。大家知道，里德是帕麦斯頓所豢养的老奸巨猾的人。他提出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用狡猾的办法来取得議院对政府的信任。但是議院嘲笑了里德的提案，嘲笑了帕麦斯頓，也嘲笑了它本身。它竟然弄到这般地步，就像一个被唾棄的人除了用“嘲笑”来否定自己以外，再也沒有什么別的方法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8 月 3 日

載于 1855 年 8 月 6 日
“新奧得报”第 36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評議會的辯論

倫敦 8 月 8 日。昨天下院會議上关于印度的辯論，是維农·斯密斯(現在他集大莫臥儿和摩拏于一身)提出的关于不列顛帝国在亚洲的財務报告以及布萊特提出的将这一重要問題在将来“适于辯論”的时候提交下院討論的提案引起的。我們暂时不闡述这些辯論，因为在議會休会期間我們打算对东印度的情况作一番詳尽的評論。

約翰·罗素勋爵不能不設法利用行将来临的議會休会来为自己的微妙处境积累政治資本。他的处境的微妙在于他已經不在政府內，但又还不是反对派。托利党反对派的首領位置已經被人占了，因而罗素在这里无所作为。在自由主义反对派內，格萊斯頓正在拚命攫取領導权。格萊斯頓在他最近一次自认为是典范的有关土耳其貸款的演說中，巧妙地为同俄国的媾和进行辯护，证明这场战争是靠牺牲土耳其和一些正在斗争的民族、特别是意大利人进行的。罗素已經預感到議會休会期間的可怕的失敗和議會复会时的关于媾和的叫喊了。他預感到必須以自由主义的各种幌子作掩护来要求媾和，何况托利党已經处于 *par excellence* [主要是] 主战派的地位。意大利正好是同俄国締結和約的一个幌子！罗素羨慕格萊斯頓，这样一个主意竟首先由格萊斯頓想出来了，既然罗

素已經不能**趕到格萊斯頓前面去**，首先占領如此有利的障地，他便決定吞沒格萊斯頓的主意，把格萊斯頓演說的高尚風格換成庸俗的格調。羅素既不同於帕麥斯頓，因為已經不在政府內，又不同於格萊斯頓，因為還不是反對派——這種情況使他能夠把剽竊作為有利可圖的事情。因此，昨晚羅素起來發言，一開始他就保證說，他“不打算縮小也不打算夸大政府的責任”。但是他說這個責任是巨大的。今年就已為戰爭花去4500萬英鎊，為這筆巨額款項而應遭到譴責的時刻正在到來。艦隊在波羅的海沒有取得什麼成就，看樣子也不會取得任何成就。在黑海，前景也不見得好些。奧地利政策的改變使俄國能夠將它在波蘭和其他地方的部隊調往克里木。在亞洲沿岸，土軍正面臨着大的災難。派遣一支為數2—3萬人的外籍軍團作為增援部隊到那里去的希望已經破滅。他說他感到遺憾的是他從維也納發出的緊急報告沒有提交給議會。關於能否接受以奧地利最近提出的建議為基礎的和約，土耳其大使完全同意他的意見。如果違背土耳其的意志繼續進行戰爭，那末將來的問題就不是貸款的保證問題，而是津貼問題。皮蒙特已歸并于西方列強，但為此他有充分的根據要求改變意大利的狀況。羅馬被法國人占領，教皇國被奧地利人占領；這種占領既支持了這些國家的專制統治，也支持了西西里王國的專制統治，並且阻礙意大利人民仿效西班牙的榜樣。俄國占領多瑙河各公國成了目前戰爭的借口。怎樣把法國、奧地利占領意大利同這一點聯繫起來呢？羅馬教皇的獨立地位以及與此相連的歐洲均勢正在遭受威脅。可不可以同奧地利和法國達成協議，改變教皇國的管理形式，以便能從那里撤出部隊呢？最後，是一個什麼內容也沒有的忠告：他說大臣們只應同意締結光榮的和約，但同時他們不應錯過和平談判的

机会。

帕麦斯顿回答说：他不是那种先对宣战承担重大責任然后又害怕对进行这场战争負責的人。他說他不是这样的人。（帕麦斯顿的确知道“負責”的結果是什么。）帕麦斯顿宣称：媾和的条件取决于战争的結果，而战争的結果取决于各种情况，也就是取决于机会。（因而机会对战争的結果負責，而战争的結果又对媾和条件負責。）据他（帕麦斯顿）所知，土耳其完全同意法国和英国的看法。即使不是这样，那末也应当記住，土耳其仅仅是反对俄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說“文明的”西方列强应当比衰老的东方列强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有利的。（当战争被称作保卫土耳其的单纯“防御战争”的时候，这是对向俄国宣战的多妙的評論，是对“文明的”西方列强想强使土耳其接受的臭名昭彰的維也納照会等等的多妙的評論。）至于意大利，他說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那不勒斯的情况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那不勒斯是俄国的盟国，一个专制国家的盟国。至于談到被奥地利和法国（非专制国家？）占領的意大利的情况，那末，“虽然那里实行的統治形式跟人民的感情并不相投”，但是为了維持“秩序”，占領仍然是必要的。何况，据說法国已經縮减了駐羅馬的軍隊，奥地利也完全撤出了在托斯卡納的軍隊。帕麦斯顿用庆賀同法国的联盟結束了自己的发言，据他說，这个联盟現在是这样地紧密，以致管理拉芒什海峽两岸的实际上只是“一个內閣”。帕麦斯顿剛才譴責了那不勒斯同一个专制国家的联盟！可是現在他又祝賀英国有这样的联盟！帕麦斯顿演說的全部精华在于：他順利地用好战的冗长讲演結束了他很輕易地使之不采取任何好战行动的这次會議。

当然，罗素現在毫不害羞地利用意大利作为締結和約的騙人

的幌子，正像他从維也納回来后利用波兰和匈牙利作为繼續战争的騙人的幌子一样。罗素毫不害羞地忘記了 1847—1852 年他当首相时，曾让帕麦斯顿先是用虛假的諾言激动意大利，然后使意大利仍旧置于波拿巴和斐迪南国王、羅馬教皇和皇帝的控制之下。这并没有使罗素感到不安。他所感到不安的是：怎样从格萊斯頓的手里夺取“意大利的幌子”并将其攫为己有。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8 月 8 日

載于 1855 年 8 月 11 日

“新奧得报”第 37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反对俄国的兵力

倫敦 8 月 11 日。目前由盟国調集起来反对俄国的兵力,除了它們本国的軍隊外还有:

(1) 由 15 000 人組成的一个不大的皮蒙特輔助軍——借助于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共同进行威胁而从皮蒙特抽出的一个軍。这种拿皮蒙特来放血的做法,是奥地利提出的作为参加“12 月 2 日条約”²⁵⁷的条件之一。

(2) 只由几千人組成的外籍軍团——由西方各国雇佣兵組成的 olla podrida [杂牌軍隊], 这些雇佣兵是被人違背警察条例而一个个秘密地从他們本国誘騙出来的。

(3) 正在組織中的由 4 000—5 000 人組成的意大利軍团。

(4) 仅仅在計劃中的波兰軍团。

(5) 最后, 今后还打算建立一个西班牙輔助軍, 但是这个軍必定会引起“財政上的萎黃病”。

這張形形色色的志願部队和一些規模不大的軍隊的清單, 反映出目前英国和法国所領導的那个欧洲的地图。能否提供一幅描繪拿破侖第一派去反对俄国的各国軍隊的更完美的諷刺画呢?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8 月 11 日

載于 1855 年 8 月 14 日

“新奧得报”第 37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 波兰集会

倫敦 8 月 13 日。政府的報紙对上星期三在圣馬丁大厅举行的紀念波兰的盛大集会²⁵⁸ 不止一次地加以憤激的抨击, 因此我們也來簡短地談談這個問題。这个集会无疑是由內閣自己发起的。它推出“波兰之友文学协会”²⁵⁹ 这个一方面由查尔托雷斯基的拥护者, 另一方面由对波兰有好感的英国貴族参加的协会作为幌子。这个协会从成立时起就是帕麦斯顿手中的盲目工具, 他通过不久前死去的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指导和控制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每年給帕麦斯顿送去的波兰信件和派去的代表团是他維持他的“反俄”声誉的最主要手段之一。查尔托雷斯基的拥护者們也从这种关系中撈取大量的好处: 这种关系使他們能够扮演唯一值得尊敬的所謂“正式的”波兰流亡者代表的角色, 排挤波兰流亡者的民主派, 最后是利用这个协会的大量撥款帮助流亡者, 作为招募會員参加自己党派的手段。在文学协会和“集中”²⁶⁰ 即波兰民主协会之間正不断进行着頑强的斗争。1839 年集中曾在倫敦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公众集会, 会上揭露了“文学”协会的阴谋, 揭发了查尔托雷斯基分子过去的历史 (这是用英文出版的波兰史²⁶¹ 的作者——奥斯特罗夫斯基干的), 并响亮地声明同波兰的外交貴族的“复兴者們”勢不两立。从这时起, “文学”协会所僭窃的地位便动

搖了。順便必須指出，1846年、1848—1849年的事變²⁶²形成了波兰流亡者的第三个組成部分——社会主义派，但是它同民主协会一起反对查尔托雷斯基的拥护者。

由政府发起举行的这次集会的目的有三：第一，建立一个波兰軍团，把它派到克里木，以便摆脱一部分“波兰流亡者”；第二，恢复帕麦斯頓的声誉；最后，把可能发生的任何波兰运动轉交給帕麦斯頓和波拿巴去控制。政府的报纸断言，俄国代理人十分秘密地策划的阴谋使集会未能达到目的。沒有比这种断言更可笑的了。来到圣馬丁大厅的人大多数是倫敦的宪章主义者。反对政府的修正案^①是由一个烏尔卡尔特分子提出，并得到另外两个烏尔卡尔特分子即科勒特和哈特支持的。大厅內散发的傳单的内容如下：

“这次集会是由英国貴族們召集的，他們只是想极力維護古老的不列顛政府制度”等等，“波兰譴責同目前欧洲統治者們締結的一切联盟，它不願成为被任何一个現政府所复兴起来的国家，也不願降到充当外交阴谋的工具的角色”等。

这些傳单是由“波兰民主委员会”主席和秘书签署的。如果注意到倫敦的宪章主义者，烏尔卡尔特分子和原来意义上的“民主的”波兰流亡者相互之間的关系远远談不上友好，那末关于“阴谋”的任何怀疑便会立即消失。集会时的激烈場面完全是由于担任主

① 集会通过的科勒特的修正案全文如下：“这次集会真诚希望波兰国家的复兴，但同时不能忘記这个国家的破坏首先是帕麦斯頓在1830—1846年間的詭譎行为的結果，因此，当帕麦斯頓仍然在王国任职的时候，任何关于复兴波兰的提案都只能是一种圈套和欺騙。如下的事实也說明这一論断的真实性：帕麦斯頓抱着尽可能小地伤害俄国的那种目的領導着战争，而他所提出的媾和条件最終会把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化为烏有。”——編者注

席的哈林頓勳爵的行為而引起的。他用完全非議會的方式拒絕宣讀和表決科勒特的修正案。由於“波蘭之友文學協會”的秘書舒爾舍夫斯基上校竟然想起要叫警察來逮捕科勒特，因而憤慨的情緒就更加激昂了。當哈林頓勳爵、羅伯特·皮爾爵士和他們的朋友們跑下講台離開會場時，吵嚷之聲當然就達到了頂點。在喬治·湯普遜被選為主席代替哈林頓之後，秩序才馬上恢復下來。

在這次波蘭集會上出足風頭的英國執政階級的代表們，決不能喚起人們對貴族階級的特別尊敬。哈林頓伯爵也可能是一個很好的人，然而無疑他是一個很壞的演說家。不能設想更令人難受的場面了。這位閣下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擠出兩句有連貫的話，而在这以前他的講話中的每一句話都是不完整的，而由速記員來替他完成。這位閣下是一個軍人，勇敢是無疑的，但是從他領導波蘭集會來看，那末很明顯，他干什麼都行，只是不能擔當領導者的角色。星期日法案的產科醫生埃布林頓勳爵說起話來也不比哈林頓伯爵強多少。他的面孔表情頑固，腦袋的樣子像個撞槌。他有一個無可辯駁的優點：不能用講道理來說服他。拿破侖曾經說過：英國人從來就不覺得自己是失敗者。在這方面，埃布林頓是英國人的模範。

緊接勳爵們之後發言的是一些從男爵。埃布林頓勳爵宣讀了政府關於復興波蘭的提案。然後，羅伯特·皮爾爵士發言支持這個提案。在許多方面都難以想像出比“代表塔姆沃思的議員”（皮爾）和“代表梅里勒榜的議員”（埃布林頓）之間的差別更大的差別來。前者是一個天生的放肆的吹牛家，後者則是一個矯揉造作的清教徒式的膽小鬼。前者使人發笑，後者令人厭惡。羅伯特·皮爾爵士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爬上了貴族地位的葡萄酒推銷

員，埃布林頓勛爵給人的印象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宗教裁判者。如果把湯尼·朗普金和美男子布腊默耳合而为一，那末我們就会想像得出皮尔的面貌、服装和風度的那种奇形怪状。他是小丑和花花公子的惊人的混合物。帕麦斯頓对来自塔姆沃思的怪物抱着偏爱，认为它是有用的。当他想知道人民情緒之風在往那个方向吹时，他便把罗伯特·皮尔爵士作为風向仪摆出来。当他希望证实英国輿論是否准許把維克多·雨果等人驅逐出境时，他就吩咐罗伯特·皮尔尖銳地攻击流亡者和贊揚波拿巴²⁶³。現在在波兰問題上也正是如此。帕麦斯頓利用他作“触鬚”。皮尔非常适于充当这种并不十分体面的角色。他被英国人称为 «a chartered libertine» [“天下公认的浪子”]、道道地地的輕佻的人、享有特权的怪物，既沒有一个內閣，也沒有一个政党对他的謊言、狂妄、举止和言行負責。罗伯特爵士穿得漂漂亮亮，据說是打扮得像一个演員一样来到了波兰集会会场。他好像一个女时装裁縫一样穿着女人束腰的紧身，扣环中插着一朵鮮紅的玫瑰花，洒了香水，右手轉动着一把大伞，在讲话时用它打着拍子。在勳爵們和从男爵們讲话之后，由于一个可笑的偶然机会，行政改革协会前副会长泰特先生立即起来发言了。大家知道，从泰特由于这个协会的影响而被宣布为巴特的梭倫时起，他就投票反对斯卡利的关于局部实行行政改革的提案和投票贊成帕麦斯頓的給土耳其貸款而开始了他的議會生涯；同时他又異常謹慎地在表决罗巴克的提案时棄权。勳爵和从男爵們好像嘲笑地指着他說：“瞧，这就是应当接替我們的人！”沒有必要更詳細地說明泰特先生的特点了。因为莎士比亚已經作到了这一点，他創造了不朽的夏祿的形象；福斯泰夫把夏祿比作是一个人們在飯后吃甜食时用干酪皮刻成的

人型^①。

同所有这些先生們相反，一个年輕的、毫不知名的貧民哈特，一开始講話时就給人一种印象：他是一个有吸引群众和領導群众天賦的人。政府对波兰集会的不滿現在可以理解了。集会不仅变成了帕麦斯頓的失敗，而且变成了他所代表的那个階級的更大的失敗。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8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8 月 16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379 号

① 見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后篇第三幕第二場。——編者注

卡·馬克思 对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 立場的批判

倫敦 8 月 15 日。最近，布腊提昂諾写信給“每日新聞”，描述了多瑙河各公国居民在奥地利占領軍的压迫下所遭受的痛苦，暗示法国和英国的領事有两面派的行为，随后他提出了一个問題：

“如果奥地利在多瑙河各公国保持一支为数 8 万人的軍队，依靠这支軍队来阻止土耳其軍队进入貝薩拉比亚（像官方的急电所证明的那样）和阻止羅馬尼亞軍队建立起来（虽然羅馬尼亞軍队能够积极参加战争），如果奥地利同时从加里西亚撤出 20 万人，从而使俄国有可能以同等数量的軍队开入克里木，那末奥地利是否会充当同盟者或至少充当中立国的角色？”

奥地利自从充当中介人，即既非同盟者又非中立国的角色时起，就采取了两面性的立場。据我們看来，从 1853 年 6 月 14 日克拉倫登勋爵寄給維也納內閣的急电中摘引的下面一段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多多少少把奥地利推上了这条道路。

“如果俄国軍队通过多瑙河各公国侵入土耳其的另一些地区，那末大概会发生基督教居民不是为了俄国的利益、也不是为了支持苏丹，而是为了争取本身独立的总起义；不用多說，这种起义很快就会蔓延到多瑙河沿岸的奥地利地区。但是，要判断这些事件会对匈牙利和意大利发生什么影响，会怎样鼓舞那些使奥地利有理由担心的欧洲叛乱者（这些叛乱者认为实现自己計劃的良机現在恰好就要来到了），这乃是奥地利政府的事情。正是这些理由

促使女王陛下政府同奥地利共同爭取达到一个对社会利益十分重要的共同目的,同它一道寻求一个使俄国的正当要求与苏丹的主权能够調和的办法。”

議會常会快要結束了,但还有一个涉及奥地利政策的問題仍然像在常会开始时一样沒有搞清楚。奥地利对克里木远征采取了什么立場?今年7月23日,迪斯累里問約翰·罗素勛爵,他根据什么說“克里木远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奥地利拒絕越过普魯特河”。

約翰·罗素勛爵記不起来了,更确切些說,他表示“他的根据就是模糊的回忆、一般性的回忆”。于是迪斯累里又向帕麦斯頓提出这个問題,帕麦斯頓

“不願意回答这样的問題,因为这样的問題涉及女王陛下政府和在某种程度上是女王陛下的同盟者的一个君主政府之間长期談判中的某些方面”。

我們看到,帕麦斯頓用这种显然是支吾搪塞的回答证实了罗素的声明,但只不过是間接地、在对“某种程度上的同盟者”使用的委婉詞句的掩盖下证实了罗素的声明。現在我們从下院轉到上院来看一看。今年6月26日,林德赫斯特勛爵发表演說猛烈攻击奥地利:

“6月初(1854年)奥地利决定要求俄国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要求的詞句极其强硬,带有某种类似威胁的口吻:如果要求不予实现,就要采用武力。”

林德赫斯特作了一些历史性的評語以后,繼續說道:

“当时奥地利果真对俄国实行了某种进攻嗎?它打算把軍隊开进多瑙河各公国嗎?根本沒有。在几个星期以內,一直到錫利斯特里亚解圍,俄国軍隊开始撤退,俄国自己宣布打算过一些时候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并把軍隊調回普魯特河彼岸的时候,奥地利都沒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在这以后,奥

地利才想起了自己的义务。”

克拉倫登勋爵在回答这篇演说时说：

“当奥地利始终如一地担负了对英法的许多义务并且进行了广泛的开支庞大的战争准备时，以及当它坚决地要求英法派遣军事代表去海斯将军的司令部时，奥地利无疑是打算参与战争并把希望寄托在战争上的。但它也指望在有利于军事行动的季节远未到来以前，联军就能在克里木取得决定性胜利，指望联军能腾出力量，同它的军队配合采取另外的行动。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一旦奥地利应我们的要求宣战，它也许只得单独作战了。”

更令人惊异的是埃倫伯勒稍晚一些时候在上院所作的声明，这篇声明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位大臣反驳过：

“还在军事远征以前，奥地利就提議和盟国讨论未来的军事行动问题。但是盟国却根据事先作出的决定行动起来，进行了远征，这时奥地利就立即声明，它不能单独同俄国作战，克里木远征使它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动方式。在以后一个时期，正好在维也纳会议召开初期，当时特别重要的是要奥地利同我们一起行动，但你们那时仍然只想到怎样保证你们在克里木的行动取得胜利，于是从直接邻接奥地利的领土上撤走了5万名有战斗力的土耳其军队，从而使奥地利失去了在同俄国作战时可以指望的唯一支援。大人们，从这里，以及从克拉倫登伯爵不久前的声明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我们的不明智的克里木远征使奥地利的政策陷于瘫痪，使奥地利处于目前所处的困难境地。还在远征克里木以前，我就预先警告过政府。我曾向政府指出过，这次远征会对奥地利的政策起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看到外交大臣克拉倫登、約翰·罗素勋爵和埃倫伯勒勋爵的声明是完全矛盾的。罗素说，进行克里木远征是因为奥地利拒绝越过普鲁特河，即拒绝用武力反对俄国。而克拉倫登宣称：不，奥地利不能反对俄国，因为克里木远征没有得到所期望的结果。最后，埃倫伯勒勋爵宣称：克里木远征是违反奥地利的愿

望的,使它不得不拒絕同俄国作战。这些矛盾不論怎样解釋,反正都证明,具有两面性特点的不只是奥地利的政策。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8 月 15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8 月 18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383 号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英法对俄战争²⁶⁴

一

倫敦 8 月 17 日。英法对俄战争毫无疑问将作为“不可理解的战争”而载入战史。言語夸大而行动却微不足道；准备的規模巨大而成果却小得可怜；近乎怯懦的小心謹慎有时却由于完全无知而变为輕率的大胆；將軍們出奇地平庸而軍隊却出奇地勇敢；失敗似乎出之有意而胜利却由誤会得来；軍隊由于疏忽已瀕于复灭，却又由于奇異的偶然性而得救，——这是一系列的矛盾和不合邏輯的現象的交錯。而所有这一切是俄軍的特点，正像是他們的敌人的特点一样。如果說英国人由于文官的拙劣管理和軍官的无能而毀了一支模范的軍隊，如果說法軍只是由于路易·波拿巴妄图从巴黎指导战争而使自己遭到无謂的危險和巨大的損失，那末俄軍由于拙劣的管理和彼得堡的愚蠢的但却是坚决的命令而受到了类似的損失。关于俄皇尼古拉的軍事天才，自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以来，甚至連他的奴顏婢膝的阿諛者們也都尽量“避而不談”了。如果說俄軍有托特列本，——順便說，他不是俄罗斯人，——那末另一方面他們也有哥尔查科夫和其他姓上带“夫”字的人，这些人的平庸絲毫不亚于圣阿尔諾和腊格倫。

看来至少是現在，当这么多有才智的人忙于制訂形形色色的进攻和防禦計劃的时候，当兵員和物資也日益增多的时候，应当想出某种能够获得胜利的主意。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战争在拖延，而且它以后的进程只是促使战区扩大。战区开辟得愈多，各个战区的行动就愈少。目前我們看到有6个战区：白海、波罗的海、多瑙河、克里木、高加索和阿尔明尼亚。可是关于在这些辽阔无垠的空间内正在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报道，只要报纸上一栏的位置就能登下了。

关于白海，英法方面总是慎重地避而不谈。联军在这里只追求两个军事目的：阻碍俄国人在这个海面上作近海的和其他的貿易航行，以及在有利时机夺取阿尔汉格尔斯克。他們曾试图完成第一个任务，但也只是部分地。联合分舰队在去年和今年都是来得太迟，离开得太早。第二个任务——夺取阿尔汉格尔斯克，他們甚至还没有试图去完成。封锁海岸的联军分舰队不去设法完成这一主要任务，却胡乱地攻击俄罗斯人和拉普兰人^①的乡村，毁坏贫苦漁民少得可怜的财产。英国記者們竟以分舰队感到自己不能做任何重大的事而烦恼和忿怒作理由，为这种可耻的行为辯护！好一个辯护！

在多瑙河，沒有任何行动。甚至鬧得河口不得安宁的海盜都沒有肃清。奥地利握有从这方面进入俄国大門的鎖钥，而且显然决心牢牢地掌握住它。

在高加索，一切平靜无事。可怕的切尔克斯人同一切野蛮的和独立的山民一样，似乎对俄軍行軍纵队从他們山谷中撤走已經

① 拉普兰人是居住北欧北部的民族，又叫薩阿米人，主要从事漁猎。——譯者注

十分滿足，除非为了搶掠，便沒有一点下山到平原去的願望。他們只会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此外，并入土耳其的前景看来也决不会使他們感到高兴。

在亚洲，土耳其暴露了它现在的真实状态，因为它在亚洲的军队完全反映出整个帝国的腐朽状况。看来必須求救于法兰克異教徒；但是法兰克人^①在这里除了构筑野战工事以外，什么也不能做。他們强迫军队学习文明战法的一切企图毫无結果。俄軍包圍了卡尔斯，看来，还准备对它进行有計劃的进攻。除非奥美尔-帕沙率領 2 万人的军队在巴士姆登陆，从翼側打击俄軍，此外就很难找出一条援救这个城市的办法了。俄軍拥有一支 2—3 万优秀兵士的部队，但是却如此緩慢地、不坚决地同这样缺乏訓練的敌人作战，这种情况是难以理解的，也絕對不是俄軍可以引以为荣的。不管他們在这个战区取得怎样的胜利，他們能够取得的最大的成果也无非是攻占卡尔斯和埃尔斯倫，因为通过小亚細亚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亚洲的战争暂时只有更局部性的意义；由于我們离那里远，而且只有不精确的地图，对战术或战略情况未必能作出正确的估計，所以不准备詳細討論这个題目。現在就剩下两个主要的战区：克里木和波罗的海。

二

倫敦 8 月 18 日。在克里木，圍攻进行得毫无生气。整个 7 月份，法軍和英軍都在忙于把圍攻工事向大凸角堡和馬拉霍夫岡作

^① 近东对西欧人的通称。——編者注

新的推进,虽然我們一直听說,圍攻工事已“紧逼”俄軍的工事,但是現在我們探听到,8月4日对壕頂端距俄軍主壕还不下115米,而且可能还要远些。当然,能迫使易于激动的佩利西埃承认他的“强攻法”已遭到破产和只有正规的圍攻作业才能給他的部队开辟道路,这已經是好的。但是,那种让20万人靜悄悄地躺在帳篷里等待塹壕挖成和死于霍乱及寒热病的作战方法,是非常奇特的。正如巴黎的报纸所說的,如果由于黑河彼岸的俄軍障地难以接近而不能渡过該河,那末从海上向叶夫帕托利亚出征,試图从这方面迫使俄軍进入开闊地并暴露其現有兵力和輔助部队的状况,也許会得到某种有益的结果。在目前的情况下,土軍、撒丁軍以及半数的法軍和英軍只能袖手旁观。这些軍队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本来可以用来进行各种牵制行动,然而我們所知道的唯一的牵制行动却出现在阿斯特利馬戏院、薩里劇場和克勒莫恩广场剧院的舞台上,在那里每晚在爱国的 cockney〔倫敦人〕的热烈掌声中俄軍都遭到了可怕的失敗。

俄軍这时想必已經得到了自己的全部援軍,并且使部队数量达到了最近一个时期的最大限度。英軍还要派出几个团,法軍已經派出10 000—15 000人,还有更大的兵力将随后开到;联軍在克里木总共应得到5—6万生力軍的增援。此外,法国政府登記或征购了大量的內河輪船(根据不同的材料,共有50—60艘),打算用于黑海上的远征。至于这些船只是用于阿速夫海还是用来进入德涅泊河和布格河的河口(在这里,奥查科夫、金布恩、赫尔松和尼古拉也夫将成为攻击目标),暫時还不清楚。我們已經說过,在8月中旬将发生激战,因为这时俄軍将得到援軍而重新取得主动。① 实

① 見本卷第420—422頁。——編者注

际上，俄軍在利普兰迪將軍的指揮下已經襲击了黑河附近的法軍和撒丁軍隊，但被击退，損失很大。联軍的損失沒有說明，一定很可观。要想更詳細地談論这一事件，就必須掌握比電訊更为充分的材料。

在波罗的海，終於“給了一个沉重的打击”：«A great blow has been struck!»請看英国的報紙：炮击斯維阿波尔格！斯維阿波尔格被毀！一切土质工事和其他工事都已成为廢墟！斯維阿波尔格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联軍的輝煌胜利！舰队一片欢騰！現在我們来看看事实本身。由6艘战列舰、4—5艘大型巡航舰（blockships）以及約30艘臼炮艇和炮艇組成的联軍舰队，8月7日由列維里向斯維阿波尔格进发。8月8日它們占領了陣地。吃水淺的舰船通过了要塞西面的、較大的軍舰不能通过的淺水滩和岩礁，显然停泊在斯維阿波尔格所在諸島上的远射程炮的射程以內。大型軍舰則停泊在远处，据我們判断，是在要塞炮射程以外。然后，炮艇和臼炮艇开始射击。看来沒有采用直接瞄准射击，只用加农炮所許可的最大射角射击。炮击持續了45小时。造成了一定的損失，但是由于沒有关于双方的詳細的消息，所以暫時还不能肯定損失究竟多大。軍火庫和各种火药庫（显然是較小的）已被毀坏。斯維阿波尔格“城”（据我們所知，这只是不多的几幢房屋，里面住着在舰上或要塞里当差的人們）被火燒毀。要塞工事直接遭受的損失看来并不大，因为正如两位海軍上将所报告的那样，舰队无一个人陣亡，仅有少数人受伤，船只也未受任何損失。这就最好地证明了，分舰队是停在能进行炮击但不能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安全距离上，而要塞工事只有用直接瞄准射击才能破坏。邓达斯在他那份措詞比法国海軍上将的报告較适当和較有分寸（至少根据“通

报”上发表的、可能被巴黎修飾过的报告来判断是这样的)的报告
中承认：斯維阿波尔格所在的 7 个島屿中，只有赫尔幸福斯灣主
要入口处以西的 3 个島受到損失。对主要入口处看来沒有試图攻
击。大的船舰在袖手旁观，而关于通过类似的攻击进行决定性的
打击和派部队登陆以便夺取并破坏工事，甚至連想都沒有想过。
因此，受到損失的只是儲备物資和仓库，也就是容易恢复的东西。
如果俄軍有效地利用時間和器材，斯維阿波尔格經過 3 个星期就
会完全恢复原状。从軍事观点来看，斯維阿波尔格一点也沒有受
到損失。整个这一过程归結起来，也許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行动，所
以采取这一行动，一部分是因为联軍的波罗的海舰队在回去以前
应当有所作为，一部分是因为帕麦斯頓想施放焰火来結束本届議
会常会。可惜，就这个目的來說行动已經迟誤一昼夜了。这就是联
軍舰队对斯維阿波尔格进行的有名的破坏。等詳細的报道一到，
我們就再来談談这个問題。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8 月 17 和 18 日

載于 1855 年 8 月 20 和 21 日

“新奧得报”第 385 和 387 号，并

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9 月 1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48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并根据

“紐約每日論壇报”校对过

卡·馬克思 論战区事件

倫敦 8 月 22 日。佩諾及邓达斯两位海軍上將的報告证实了我們提出的关于“光荣地摧毁斯維阿波尔格这个北方的直布罗陀”（按照“泰晤士报”的說法）的判断。而今天我們在一家倫敦報紙上讀到下面的消息：

“关于这次对斯維阿波尔格进行大規模炮击的特点，只能說是由于战火的蔓延，敌人想必遭到了相当大的損失。然而并没有給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們由此已占了很多便宜。所取得的胜利既不輝煌，也不巩固。同从前一样，波罗的海的全部情况还有待今后的发展。”

的确，在英国女王訪問法国期間，“泰晤士报”必須表現良好的情緒和报道良好的消息，它一味描写 *couleur de rose* [美好的事情] 已經有好几天了，它假装成非常乐观的样子，絕不願拋棄毁灭斯維阿波尔格“城”的幻想。

至于談到黑河会战，首先需要比較詳細的情报，才能对它作出評价。整个問題在于是否爭取渡过黑河，以及河水深到什么程度才成为真正的障碍。如果会战是在法軍正面沒有这种障碍的情况下发生的，那末它就使俄軍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相反，如果談到征服无法迂迴的隘路，那末俄軍大批人馬的損失是完全可以解釋的，所以会战对双方都可以說是光荣的。但是，毕竟还有一点不

明白，为什么俄軍不试图通过拜达尔盆地实行迂迴呢。但有一点还是无疑的：只要联軍不是自願撤离，那末俄軍就正像它們現在所表明的，是沒有力量迫使联軍撤离台地及黑河地区的。这样一来，先前的那种拖延做法又重新开始了。

强攻馬拉霍夫岡的消息是指日可待的。如果强攻不成功，联軍就会陷于困难的境地。如果强攻成功（这还是可能的，虽然要以巨大的損失作代价），那末这还并不意味着俄軍失去南区；除非俄軍因缺乏粮食而不得不放棄南区。无论如何，联軍在冬季以前有可能将俄軍从那里排挤出去。关于在克里木的英国兵士的健康状况的报道是矛盾的。根据一份报告，每月有 1 000 名在塹壕里的英国兵士失去战斗力。据查明，仅在一个有 676 人的驃騎兵第十团里就有 161 人患病。政府派到克里木的医疗委员会主席薩特倫德医生在他給舍夫茨別利伯爵的一封信中談到以下事实：

“7月7日周末：英国军队人数为 41 593 人；死亡总数为 150 人，患霍乱病死的有 71 人，寒热病——17 人，腹瀉——19 人，痢疾——2 人。7月14日周末：军队人数为 42 513 人；死亡总数为 123 人，霍乱——55 人，寒热病——18 人，腹瀉——10 人，痢疾——5 人。第一周因伤死亡 44 人，第二周因伤死亡 30 人，共計 74 人。”

因此，在 7 月份头两个星期內，因病死亡人数和因伤死亡人数的比例大致为 4：1。薩特倫德医生把去年冬天和今年夏天军队的健康状况作了如下的比較：

“去冬死亡現象和今夏死亡現象相比，具有完全另一种性质。去冬发生过的几乎在全軍引起 scorbatis〔坏血病〕的那些原因：飲食不好、睡眠不足、身体过度疲劳、缺少衣服和掩蔽所、对恶劣天气預防不好等等，現在連一种也未必有。那时的各种疾病都带有坏血病的性质，因此在斯庫塔里医院里死亡現象非常可怕；可以把它同爱尔兰因饥饿而死亡的现象〈1847〉相比較；而現

在相反，我們碰到的是寒热病和霍乱，由于对兵士的巨大关怀，在我們兵营里，这两种病的蔓延程度无疑已經减弱了。”

目前被圍部队的兵士的健康状况无疑要比圍攻部队的健康状况坏。但是薩特倫德医生不可能要求絕對相信他的信，因为不久前的一次事件证明，在英国兵营中提出批評要受到處罰。大概在一个半月以前，“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匿名信，信中报道了6月18日血战后对待伤員的不可容忍的态度。軍事当局要求“泰晤士报”說出記者的姓名。該报拒絕了这一要求，提出只有在弗雷德里克·皮尔先生坚决保证对揭露真相的記者不予追究的条件下，才同意說出姓名。皮尔沒有同意这个条件，然而在議會中指責了“泰晤士报”的拒絕态度。当时这封匿名信的作者貝克韦耳先生(外科医生的助手)因病在斯庫塔里休假。这件事发生在7月中旬。兵营的长官通过某种方式揭露了貝克韦耳的手笔。背着貝克韦耳并趁他不在的时候成立了一个由高級医官(其中大部分人的名誉恰好是因貝克韦耳的信而受到了影响)組成的調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作出了貝克韦耳犯罪的結論，既不給他申辯的机会，也不让他有可能对他們提出的控告进行論证。8月3日在軍队的通常命令中宣布了解除貝克韦耳的职务。从这个事件来看，也可以估計到英国官方的或半官方的关于兵士健康状况、伤員护理等等的报告的可靠程度。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8 月 22 日

載于 1855 年 8 月 25 日

“新奧得报”第 39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納皮爾的信

倫敦 8 月 24 日。查理·納皮爾爵士今天在日報上發表了一封信²⁶⁵，這封信基本上證實了我們關於炮擊斯維阿波爾格的意見。我們從這封信中摘錄如下：

“從我自己寫的信中，以及從海軍上將鄧達斯的報告中都可以看出，如果完全按照我的計劃行事，斯維阿波爾格就已被擊毀了。現在很清楚，聯軍共有炮艇和臼炮艇 43 艘，而且很多臼炮艇不能使用，可是這種臼炮艇至少應有 100 艘。詹姆士·格萊安爵士在給我的一封信中（1854 年）估計臼炮艇的需要量是 200 艘。如果確有這樣多數量的臼炮艇，那末，就可以像在戰壕里那樣輪換人，繼續進行炮擊。臼炮就來得及冷卻，而炮擊也能連續不停，一直到徹底摧毀並給戰列艦打出一條通路時為止，戰列艦通過了這條路，就能完成任務。但是，海軍部顯然沒有考慮到臼炮艇是不能無限期地停留在一個地方的，雖然關於塞瓦斯托波爾的報告看來應使它學到一些東西。因此，好像是經過周密考慮的軍事行動，只取得了局部的勝利。海軍上將鄧達斯在自己的報告中也承認，俄國的海防工事幾乎沒有遭受破壞。如果海軍上將鄧達斯有更多的器材，他就可以在天氣好的時候，繼續進行炮擊，分艦隊就可以不回納爾根，而在斯維阿波爾格拋錨。

在戰爭的第一年是由於器材不足，這一切還是可以原諒海軍部的，但在第二年，就無論如何不能原諒了。海軍部不去建造炮艇和臼炮艇，而建造了勉強可以浮在水面的金屬浮動炮台，這些浮動炮台即使能夠浮動，但仍然是無濟於事的：它們離斯維阿波爾格 400 碼時，就一定要被擊毀，而在 400 碼以外，它們就起不了任何破壞作用。

第一次利用金屬的實驗，國家花了整整 100 萬英鎊，這 100 萬英鎊到哪裡去了呢？第二次實驗也花了不下 50 萬，但是金屬浮動炮台仍然沒有離開我國的港灣，而且往後也未必會離開。這是無能的人領導的結果。大臣們已經不得不改組軍事部門。他們什麼時候才考慮海軍部的改革呢？在他們沒有做到這一點以前，人民的錢將白白地被浪費掉。看來，海軍部沒有想到炮擊的後果，雖然我在一年多以前就預先告訴過它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如果他們讀一下歷史，就會知道馬提尼克是依靠臼炮艇拿下來的；而且，那里全部守軍的穹窿，也和斯維阿波爾格的一樣少。按照海軍上將鄧達斯的說法，他的計劃沒有規定要用戰列艦向防禦工事發起總攻，所以他採取的軍事行動的有限任務是：利用臼炮尽可能地擊毀要塞和軍火庫。

如果海軍上將鄧达斯擁有足夠的器材，他就會在自己的計劃中規定進攻防禦工事並把自己的全部艦隊集中起來，以便艦隊準備好來利用炮艇和臼炮艇所造成的慌亂局面。熊熊大火就已經使守軍不能使用武器了，而且艦隊在靠近斯維阿波爾格後，就能徹底摧毀要塞工事和小島嶼等等；否則，就只能破壞木建築物和軍火庫，而基本任務又要拖到明年去完成。”

納皮爾在信的末尾是這樣寫的：

“詹姆斯·格萊安爵士是在 9 月間把不列顛軍隊派往塞瓦斯托波爾去的那些大臣中間的一個，這支軍隊沒有運輸工具，沒有糧食、帳篷、衣服和軍醫院，因此就要在那里忍受冬季的嚴寒和死亡。正是這位大臣催促我在 10 月底開始英國艦隊的行動，而這可能使英國艦隊復沒於斯維阿波爾格的岩礁之下。他收羅到了兩個海軍軍官，他們恬不知恥地在格萊安給我的那封侮辱信上簽了字。這兩個人現在還在海軍部。這就是我國指揮艦隊的方法。兩個夏天，我們在波羅的海採取的軍事行動，對海軍部來說是一個教訓。海軍部有我擬定的進攻喀琅施塔得的計劃，大概也有海軍上將鄧達斯的計劃。因此，明年夏天詹姆斯·格萊安爵士和他的兩位助手大概會親自前去實現這些計劃。”

卡·馬克思寫於 1855 年 8 月 24 日

載於 1855 年 8 月 27 日

“新奧得報”第 397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卡·馬克思

奧地利和战争

在另一頁上，我們刊登了一个奧地利軍官写的关于弗兰茨-約瑟夫皇帝不久前視察加里西亞駐軍的报告。作者所描述的同这次視察有关的事件以及他对帝国軍隊配置情况的意見，证实了我們以前談过的看法，即奧地利在去年进行的战争准备，决不是弄虛作假，故意要欺騙西方列强。毫無疑問，它不可能仅仅为了蒙混世人耳目而作这样的牺牲。²⁶⁶

只有在万分必要时，奧地利才不得不用武力来对付俄国，这种看法是对的；只要能拖延時間，奧地利对于俄国外交作为誘餌向它提出的維持和平的一綫希望总是抓住不放的。但是最后，它忍无可忍了。圣彼得堡惊奇地、近似恐惧地得知，奧地利軍隊正在向加里西亞边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已經发生的时候，俄国人甚至还没有想到奧地利会采取这样的軍事手段，那时俄国根本不可能同样迅速地把自己的相应数量的軍隊集中到加里西亞边境。因此，不得不重新使用外交艺术。这是怎样进行的以及結果如何，沒有必要重复了。不久前还集中在加里西亞边境的龐大的奧地利軍隊突然分散了²⁶⁷，因而俄国人对这个地区的忧虑就部分地消除了。我們說部分地，是因为随着奧地利軍隊的集中而产生的还有两个重要情况，这两个情况即使在軍隊分散后也必須加以考虑。这里指

的是军队在加里西亚驻扎期间新建的、修建的或补建的工事和铁路。

当时在帝国的所有其他地区，政府通常是让私人企业主来建筑铁路的，而对连接维也纳和慕尼黑的西部铁路根本没有给以任何注意，但加里西亚驻军总司令海斯男爵却使用了数千名兵士来修筑铁路线。这条铁路线的战略意义不论有多大，但是现在从商业观点来看，其价值无论如何是十分值得怀疑的。要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修建这条铁路线的计划大概要在私营公司的工程师那里再搁置 30 年。俄国对修筑这些铁路极其不满，因为奥地利现在可以利用它们来重新集中刚刚分散了的军队，而且所花的时间要比俄国集中同样数量的军队所需要的时间少五分之一。任何人，只要他肯花些工夫去了解一下有关奥地利铁路运输的统计材料，并且把在东部纯粹为了政治目的而做的一切工作同很少注意西部商业利益的情况比较一下，就一定会对在加里西亚如此仓卒地修筑这条铁路线仅仅是为了欺骗世界这一点发生怀疑。十分明显，迅速建成连接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西部铁路线对实现这一目的具有更重大得多的意义。

不久前在奥地利东部各省改进了旧工事，修筑了新工事，这一点更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如果说修筑铁路可以用战略的和其他的理由来解释，那末修筑工事和建成工事体系以及由于这些工程而引起的非生产开支，就只能解释成是为了实现这些工事所直接服务的目的。我们已经谈到的关于奥地利东西部铁路建筑规模的对比情况更可以用来说明修筑工事的问题。在奥地利帝国的 36 个要塞中，有 7 个直接属于东部防线，有 9 个间接属于东部防线；其中大部分（如克拉科夫、普泽米希尔和扎列斯基）只是在不久

前才改建好的。克拉科夫和普澤米希尔，以及由于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不能成为强大要塞的里沃夫，瞰制着通往华沙的道路。扎列施基位于加里西亚东部的末端，同俄国的重要要塞霍亨相对。克拉科夫变成了第一流的要塞，它的全部工事同加里西亚的其他工事一样，完全处于备战状态。从前在奥地利军队中任命年迈体弱的老将军担任要塞司令，这被看成是一种光荣的退休，而在这样的要塞中服役，则被认为是在宫廷中失宠的军官的一种流放。可是现在指挥东部和东北部的要塞的都是一些真正有才干的人，是有功劳的将军和司令部的著名军官。克拉科夫由伏尔特将军指挥，普澤米希尔由艾布纳尔少将指挥，扎列施基由格累澤尔少将指挥，卡尔斯堡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指挥官是澤德耳迈尔将军，西北侧的奥里繆茨的指挥官则是馮·柏姆将军。而西部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那里的东西和人都是衰朽的，而且听任其衰朽下去。但是如果西方列强哪怕是在口头上对奥地利政策的真实性怀疑一下，那末这种情况不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奥地利当局就会十分匆忙地着手恢复林茨和它的40座馬克西米利安式塔楼（林茨现在甚至不算是一个要塞，而薩尔茨堡曾经是一个第一流的堡垒）！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呢？毫无动静，没有任何战斗准备。甚至那些在东部希望夺取胜利桂冠的兵士，回来时愈接近巴伐利亚边境，就愈丧失自己的战斗精神。

事实就是这样一目了然；需要弄清楚的只有一个问题，即谁妨碍了奥地利政策的执行，由于谁的过错而使国家负担大量附加的民族义务，而无论自己或自己预定的同盟者都得不到任何直接的利益？我们知道，維也納流行着一种在德国得到普遍赞同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奥地利害怕普魯士成为自己的第二个敌人，同时还

因为没有德国的援助而进行的战争不会有迅速结束的保障，而迅速结束战争又是帝国的特殊地位所需要的，因此奥地利拒绝参与战争。然而我们坚持相反的观点。我们认为，如果奥地利敢于进攻俄国军队，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部分即使是缓慢的和勉强的，也会不得不仿效它的榜样。

谁应当对奥地利目前的政策负责呢？是出色的伪君子 and 爱吹牛的空谈家帕麦斯顿勋爵所领导的英国。为了证明这种推测，我们不得不离开军营而深入外交迷宫。7月23日，迪斯累里先生质问约翰·罗素勋爵，他根据什么声明“克里木远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奥地利拒绝越过普鲁特河”。约翰勋爵记不起来了，更确切些说，他表示“他的根据就是一般性的回忆”。于是迪斯累里先生又向帕麦斯顿勋爵提出这个问题，帕麦斯顿

“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涉及女王陛下政府和在某种程度上是女王陛下的同盟者的一个君主政府之间长期谈判中的某些方面。至于他自己，他只能说，他一向认为克里木是一个可以给俄国在黑海的霸权以最沉重打击的地方；假使没有其他的原由的话，这种考虑在他看来就是远征的最充分的根据”。他声称：“我认为，向克里木远征是一个最好的步骤”。

这样，我们就从帕麦斯顿勋爵那里知道，出师克里木的主意不是奥地利出的，也不是波拿巴出的，而是他自己出的。6月26日，林德赫斯特勋爵发表演说猛烈攻击奥地利，他说，

“6月初奥地利决定要求俄国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要求的词句极其强硬，带有某种类似暗示的口吻；如果要求不予实现，奥地利就要采用武力来实现这一要求。”

高贵的勋爵在作了一些历史性的评语以后继续说道：

“当时奥地利果真对俄国实行了某种进攻吗？它打算把军队开进多瑙河

各公国嗎？根本沒有。在几个星期以內，一直到錫利斯特里亚解圍，俄国軍隊开始撤退，俄国自己宣布打算再过一些时候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并把軍隊調回普魯特河彼岸的时候，奥地利都沒有采取任何行动。”

因此，林德赫斯特勋爵責难奥地利，說它言行不一。在他之后，克拉倫登勋爵发表了演說。他的演說使我們了解到一些使5月和6月的奥地利变成7月和8月的奥地利的原由。他說：

“当奥地利始終如一地担負了对英法的許多义务并且进行了广泛的开支龐大的战争准备时，以及当它坚决地要求英法派遣軍事代表去海斯將軍的司令部时，奥地利无疑是打算参与战争并把希望寄托在战争上的。但它也指望在有利于軍事行动的季节远未到来以前，联军就能在克里木取得决定性胜利，指望联军能騰出力量，同它的軍隊配合采取另外的行动。遺憾的是这种情况沒有发生，一旦奥地利应我們的要求宣战，它也許只得单独作战了。”

由此可見，約翰·罗素勋爵所作的解釋同克拉倫登勋爵的声明是完全矛盾的。根据約翰勋爵的推断，远征克里木是因为奥地利拒絕越过普魯特河，即拒絕反对俄国。可是克拉倫登勋爵說，由于克里木远征，奥地利不可能反对俄国。

我們再看一看誰也沒有提出反駁的埃倫伯勒勋爵的声明，是会有好处的：

“还在远征克里木以前，奥地利就提議和盟国討論未来的軍事行动問題。但是盟国却根据事先作出的决定行动起来，进行了远征，这时奥地利就立即声明，它不能单独同俄国作战，克里木远征使它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动方式。在以后一个时期，正好在維也納會議召开初期，当时特別重要的是要奥地利同我們一起行动，但你們那时仍然只想到怎样保证你們在克里木的行动取得胜利，于是从直接邻接奥地利的領土上撤走了5万名有战斗力的土耳其軍隊，从而使奥地利失去了在同俄国作战时可以指望的唯一支援。大人們，从这里，以及从伯爵的声明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我們的不明智的克里木远征使奥地利的政策陷于瘫痪，使奥地利处于这样的困难境地：它不得不立

即放棄保證使它獲得榮譽、尊嚴和利益的行動路線。還在遠征克里木之前，我就會大膽提醒政府注意這一措施所產生的必然後果。我曾向政府指出過這次遠征會對奧地利的政策起什麼樣的影響。”

埃倫伯勒勳爵的建議沒有得到重視。正是在遠征會迫使奧地利放棄對俄國的初步軍事行動這一點已很明顯的時候，帕麥斯頓派出了前往塞瓦斯托波爾的遠征軍。看樣子好像帕麥斯頓準備援助英國的最凶惡的敵人，好像他故意使奧地利處於目前它在多瑙河各公國所處的模稜兩可的地位，讓奧地利受俄國外交的支配，把奧地利推近它所必然要面臨的絕境。不管帕麥斯頓願意不願意，他採取這種行動，也和他在自己漫長而不光彩的生涯中所採取的其他許多措施一樣，只是很好地為俄國一個國家效勞罷了。

卡·馬克思寫於 1855 年 8 月底

作為社論載於 1855 年 9 月 13 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4493 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对英国兵士的懲罰办法

倫敦 8 月 28 日。在不列顛軍隊中，有一種能充分說明不列顛兵士是從哪些社會階層招募來的制度。我們說的是用鞭笞來懲罰兵士。不論是法國軍隊、普魯士軍隊或其他規模較小的軍隊都不再採用體罰。甚至在大部分新兵為半野蠻人的奧地利，也有廢除體罰的明顯願望，例如，驅使受罰者穿過棒列的那種體罰，不久前已經從奧地利軍隊的條例中取消了。相反地，在英國 «cat-o'-nine-tails»（“九尾皮鞭”）——類似俄國皮鞭的一種刑具——仍舊繼續採用。每當議會里提出軍事立法改革問題時，所有老將軍總是熱烈贊成採用 «cat» [“皮鞭”]，老頭子威靈頓特別顯得熱心。在他們眼里，沒有受過鞭笞的兵士是某種怪物。他們認為，勇敢的精神、高度的紀律性和不可戰勝的氣概這些素質，只有背上帶有傷疤，至少挨過 50 鞭的兵士（像過去侍從武士在他們的盾牌上刻有徽章一樣）才會具備。

唯一的改革是把鞭打的數目限制在 50 下以內。這種改革的效果可以從下面的事實中看出：大約一星期以前，在阿爾德肖特，有一個兵士挨了 30 下皮鞭后就很快死去了。在這次事故中所採用的是慣常的辦法——先把 «cat-o'-nine-tails» 放在尿里浸濕。在用刑時尿隨着皮鞭落到赤裸的血迹斑斑的軀體上，這種刑罰是使

受折磨的人精神失常的最好办法。“九尾皮鞭”不仅是一种刑具，它还给人留下永不可磨灭的伤痕——给人终身打上了烙印。甚至在不列颠军队里，这种烙印也等于是一种终身的耻辱。受过鞭笞的兵士在自己的伙伴眼里是可耻的。同时，根据不列颠军队的条例，对在前线的兵士的一切惩罚几乎都是鞭笞；因此，同是这种惩罚，在它的维护者看来是在决定性时刻维护纪律的唯一手段，而实际上它却是破坏纪律、涣散士气和挫伤兵士 *point d'honneur* [荣誉感] 的最好手段。这就说明了两件奇特的事实：第一、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有大批英国逃兵。冬季，当不列颠兵士为了在战壕内担任警戒而不得不作出超人的努力时，谁要是不能连续在两个至两个半昼夜内不睡觉，就要受到鞭笞。试想一下吧！受鞭笞的是那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战壕里和在因克尔芒会战中英勇奋战的英雄！但是纪律条例的条文未留有选择的余地。军队中最好的兵士因疲劳而受到鞭笞，他们蒙受侮辱后就逃到俄军方面去了。除这些事实外，大概想不出其他比鞭笞制度更为严酷的判决了。在以往的战争中还没有发生过某个国家的兵士大批地逃到俄国人那里去的情况。因为他们知道，那里对待他们会比在自己军队里更坏。第一次出现这种大批逃兵现象的荣誉属于不列颠军队。英国人自己证明，正是 *«cat-o'-nine-tails»* [“九尾皮鞭”] 给俄国军队提供了逃兵。

另一个情况是：英国每当试图成立外籍军团时就会遇到一些困难。早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虽然官方一直认为不列颠军队的条例在外籍军团中也有效，但是实际上在这些部队中体罚已经废除了。在十九世纪初，有些英国将军（包括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在内）受到异教邪说的熏染，曾发表过攻击兵士体罚制度的文章。弗

兰西斯·伯德特爵士十多年来一直在議會中大声疾呼，反对 «cat-o'-nine-tails»，并罵英吉利民族是 «a flogged nation»（一个挨打的民族）。他在下院得到福克斯頓勛爵和著名的柯克倫勛爵（現在的海軍上将丹多納耳德伯爵）的大力支持。科貝特曾經在报刊上猛烈抨击过 «cat» [“皮鞭”]，为此他被监禁了二年。在反拿破侖战争的最后几年，有一个时候人民和軍隊的憤懣情緒高漲到了极点，甚至約克公爵（这位公爵虛伪地崇拜机械练兵，他曾經从法国人那里逃出来，并且同克拉克夫人有曖昧关系，这三件事同样使他出名）也不得不在短时期內发布一道命令通知全体軍官說，在他們的部队中多次发生的鞭答事件，将成为他們升級的障碍。

然而，为什么半世紀以来 «cat-o'-nine-tails» 仍然順利地經受住了所有这些猛烈的攻击呢？原因很簡單。“九尾皮鞭”是这样一种工具，利用它，可以保持不列顛軍隊的貴族性质，依靠它，从准尉一級开始的所有指揮官职位可以通过封建特权的形式固定由貴族和紳士的年幼子弟来担任。廢除 «cat-o'-nine-tails» 就会消灭目前把兵士和軍官分隔开来并把軍隊分成两个像是不同种族的那种重大差别。同时，由此还会給那些比軍隊迄今所招募的兵士占有較高地位的居民阶层开辟入伍的途徑。不列顛軍隊里的旧制度必須廢除。軍隊必須彻底革命化。“九尾皮鞭”——这是保护貴族階級宝物的塞卜洛士。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8月28日

載于1855年8月31日

“新奧得报”第40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1854—1855年論文书信集”（1924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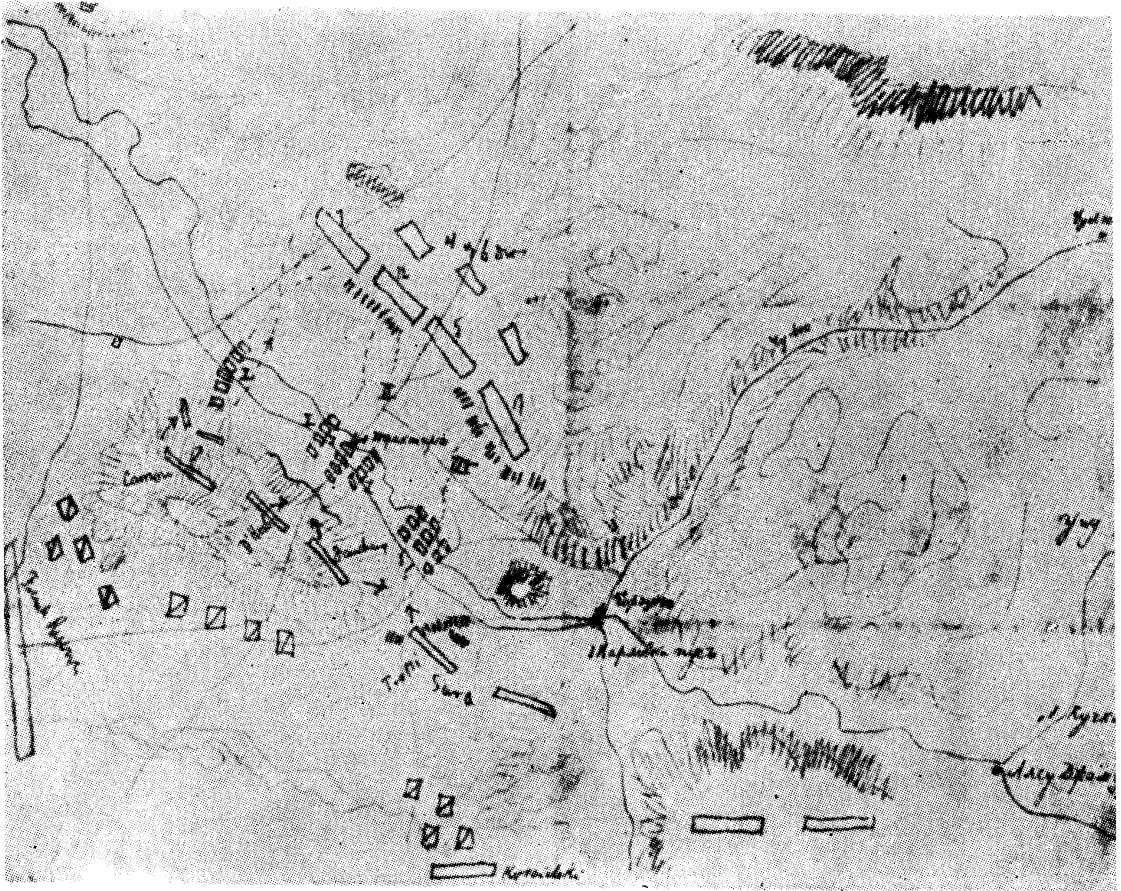
弗·恩格斯 黑河会战²⁶⁸

与我們的希望相反，在“阿非利加号”輪船星期三夜間带来的邮件中，沒有哥尔查科夫公爵关于8月16日黑河会战的报告。但是我們昨天公布的法軍和英軍的报道，却提供了足够的材料，使我們能对这次会战作出比較正确的評价。在法軍报告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这次竟沒有表现出法国武夫所特有的、而且在佩利西埃的头几次公报中显得很突出的那种吹嘘。这一次，这位老將軍写得異常清楚、認真和切实，甚至对俄軍在这次会战中表现的勇敢精神也給了应有的評价。他的报告比辛普森將軍关于参加这次会战的人数的可笑的統計要强一些。根据这些統計，似乎数量不过15 000人的法軍和撒丁軍并不特別費力就打敗了6万人的俄軍。事实上，情况看来是这样的：

8月16日晨，拂曉前，俄軍从梅肯集高地下來，在黑河边的一些山崗上占領了陣地。俄軍由哥尔查科夫公爵亲自指揮。隶属于他的有：列阿德將軍指揮的第七师和第十二师（为右翼），利普兰迪指揮的第五师（居中央），以及第十七师（为左翼）。第四师和第六师的部分兵力也在这里，大概是担任預备队。第五师以及第四、第六两师的部分兵力是剛剛来克里木的第二軍（帕紐亭軍）的一部分；其余的都是早先在克里木的部队，显然，它們都已大量減員。

黑河对岸的地形基本上是平坦的，它是一直伸展到黑河的巴拉克拉瓦平原的延伸部分；在紧靠河岸的地方，这一平原被两群小山崗切断。这些小山崗从巴拉克拉瓦方面逐渐隆起，而向黑河方面傾斜，因此是拦阻敌人渡河的良好防御障地。在这两群山崗之間有一片盆地，在巴拉克拉瓦会战期間英軍的輕騎兵曾經在这里进行过攻击。东面的一群山崗，为拉·馬尔摩拉指揮的撒丁軍两个师占領，构成障地右翼；西北面的另一群山崗則为法軍的3个师占領，构成障地的中央和左翼。法軍由埃尔比昂將軍指揮，他把卡穆的1个师配置在左面，把自己的1个师配置在中央，把福舍的1个师配置在右面，使它的障地同撒丁軍的特罗蒂师的障地相接。障地的防御力量由于紧靠障地的前方有两重障碍而得到了加强：第一重障碍是黑河，它在当时无疑是可以徒涉的，但仍然使俄軍不得不仅仅在一定的地点和狭窄的地段渡河；第二重障碍是水渠，它在多数地方都是从山岩中开凿出来的，因此，敌人即使渡过了水渠，还得攀登陡峭的岩壁。在山頂上，法軍和皮蒙特軍构筑了不大的胸牆，只足以掩护他們的火炮。这两群山崗好像是几座能以炮火互相掩护的棱堡。在撒丁軍极右翼的乔尔貢附近架有桥梁的黑河对岸以及法軍中央障地对面的小飯店（俄国人叫小飯館）附近，皮蒙特軍派出了两个連担任战斗警戒，而小飯館桥則由法軍占領的一个小桥头堡来掩护。再往远去，便是法軍的前哨。

8月16日晨，俄軍在黑河以东的高地上架好火炮后，派先遣部队下到盆地。当时尚未破曉，而且和因克尔芒会战时一样，濃霧也有助于突然襲击。联軍的前哨当即被击退，在快要破曉的时候，桥头堡和整个东岸都已落入俄軍手中；俄軍繼續与法軍两个团进行爭夺桥梁的战斗。随后，与法軍卡穆师和埃尔比昂师的位置正



弗·恩格斯繪制的 1855 年 8 月 16 日(4 日)黑河会战略图

好相对的俄軍第七师和第十二师，成两路密集纵队下到盆地，在这里变换为强攻纵队，分成两路前进；第七师徒涉和利用临时搭的桥通过了河和水渠，向卡穆师进攻；第十二师（它的部分兵力留作预备队）经过小饭馆桥向埃尔比昂师进攻，该桥的守卫者在一轉眼間就被俄軍显著优势的兵力击退了。俄軍斗志昂揚，以他們从未有过的速度通过水渠，爬上山坡。当俄軍第七师差不多到达山頂的时候，展开成一綫的卡穆的部队，向俄軍齐射，并从翼側和后方向俄軍猛攻，迫使俄軍立刻向后轉，在猛烈的火力下退过河；如果佩利西埃的話是可信的，那末在这次会战中第七师再也沒有在戰場上出現过。中央的第十二师登上了高地，楔入了法軍几个团的防地。会战一时竟难分勝負，但在这时埃尔比昂命令福舍师的一个旅向俄軍纵队的左側攻击，经过短時間的格斗，俄軍被赶下山崗，法軍开始追击，并暂时夺回了桥梁。

然而，哥尔查科夫准备了新的攻击。第十二师的部分兵力和第五师下到盆地，掩护退回来的部队調整部署，然后，整个第十二师和第五师发起第二次攻击。他們从桥上过河和在桥的两側徒涉过河，猛冲联軍的中央障地（埃尔比昂师和福舍师）。但这时法軍的全部火炮都已架好，从正面轰击俄軍纵队，同时撒丁軍的炮兵則从翼側轰击。尽管火力十分猛烈，俄軍还是頑强、迅速地前进，再次登上了高地，在那里遭到在棱綫稍后的地方展开成一綫的法軍的迎击。当纵队的头几列剛剛露出棱綫，法軍就向他們齐射，并从正面和翼側向他們进行刺刀冲鋒。同第一次一样，格斗的时间很短。俄軍在联軍的步炮火力的追击下，混乱地退过河。俄軍第二次的失敗实际上已經决定了会战的結局。他們五分之三的步兵已参加了攻击，而且已不能指望得到增援的生力軍开到戰場上来。

联军 5 个师里面也有 3 个师参加了会战，但是从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兵营派出的增援部队正在赶来援助他们。佩利西埃还召唤了 2 个基干师和 1 个近卫师，这些部队已经开近了。这时大约是早上 8 点钟。

尽管兵力这样悬殊，哥尔查科夫仍决定再进行一次攻击。这次派出的必然是第十七师，由它组成被击溃的部队中那些还能够投入攻击的兵力的核心。攻击的方向又转移到左面；这次俄军向福舍师进行突击，但是没有结果。他们还没有到达山顶，就遭到法军和撒丁军炮兵的交叉火力的严重杀伤；法军又一次冲散了俄军的纵队，把他们赶回对岸，而皮蒙特军（特罗蒂师）则从翼侧来包围他们，从而取得了胜利。只有第四师和第六师的部分兵力还没有动用，他们的人数相当于一个师。把他们投入进攻已无济于事。俄军败局已定，于是把炮兵调到前面，然后就开始退却了。俄军自己的阵地如此坚固，以致连佩利西埃也十分清楚，向它们攻击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些阵地仅遭到了火炮和步枪的射击。同联军比较，俄军在这次会战中的损失是巨大的。他们死伤和被俘的共约 5 000 人，而联军损失仅 1 500 人左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俄军不得不冒着联军的尤其是皮蒙特军的极其猛烈的炮火进行一切攻击；皮蒙特军的十六磅炮搬运困难，但是当它们在阵地上架好后，却能发出异常有效的火力。

这次俄军只采取了正面攻击。在因克尔芒附近从左侧迂回法军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设在因克尔芒对面的山岭支脉上的法军炮台瞰制了那一地区。如果要迂回联军右翼，则俄军的基本兵力就需要下到拜达尔盆地，而那里的地形对于行动如此不灵活的军队来说，是太复杂了。因此俄军选择了正面攻击，并且完全正确地

采取了行动，突然地襲击了敌人。襲击的突然性虽然带来了局部的胜利，但是并没有被十分有效地利用到底。俄軍攻占黑河的各个渡口后，本来应当把現有的全部兵力都投入攻击，以便在法軍受到第一次打击而尚未清醒过来的时候就巩固胜利。然而，相反地，他們却让敌人的步兵和炮兵有时间作好战斗准备，因此本来可能使法軍所占高地轉入俄軍之手的突然襲击的效果，在俄軍剛剛到达黑河的时候就几乎已經丧失了。这再一次证明，当情况要求軍队迅速行动而下級指揮官应当独自作出决定时，要使俄軍进行机动有多么困难。

法軍对于駐軍警戒勤务向来有些輕視。即使他們占領着最好的陣地，积极行动的敌人也总是能够在夜間突然襲击他們的步哨，并且无须特別冒險就能够襲击他們的营地。在这次会战中，法軍的做法表明，甚至动作迟緩的俄軍也能做到这一点。法軍的主要陣地靠黑河太近，因此，他們的前进部队应当大大地向前推进，如果地形不允許这样做，就需要适当地加强前进部队，使他們能支持到营地作好战斗准备时为止。而法軍却没有用足够的前卫来保障自己的营地，結果，俄軍便能够接近到他們的主要陣地，使他們来不及調动全部兵力进行抵抗。如果是比俄軍更积极的敌人，就会非常迅速地投入优势兵力，在法軍还来不及进行真正有組織的抵抗的时候，就把他們手中的高地夺过来。但是俄軍害怕在夜战中拿一两个师的兵力来冒險，因而失去了突然襲击所贏得的一切优势。

法軍在抗击已經登上高地的俄軍纵队进攻的时候所以能够那样容易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法軍采用了他們在这以前很少采用的战术。这种战法，显然法軍是从擅长这一手的英軍那里

学来的。在防守連成一綫的山崗时，十分有利的做法，就是把部队直接配置在能完全隐蔽起来的棱綫后面，并且展开成一綫，等待敌人纵队的出現。当纵队的先头一出現在棱綫上，展开成一綫的防御部队就向他們齐射（而他們却只能用几支枪回击），然后就从正面和翼側向他們进行刺刀冲鋒。英軍在布薩庫、潘普洛納、滑铁卢以及其他会战²⁶⁹中都采用过这种战术，而且总是成功的。然而，欧洲大陆各国的軍队却似乎完全忘記了这种十分可靠的防守高地的方法。在战术教材中虽然提到了这种方法，可是在实践中它却被人們普遍对散兵綫掩护下的纵队的偏爱所排挤了。法軍从他們过去的敌人那里学会了这种簡單而又有效的战法，是值得特別称贊的。如果他們排成纵队，那末俄軍无疑地会占上风，而且可能取得会战的胜利。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同那些为猛烈炮火所打乱并由于攀登陡坡而疲憊的敌人作战时，展开成一綫的步兵的火力具有歼灭性的威力，而强有力的刺刀冲鋒就足以打退敌人的纵队，不待閃閃发光的刺刀刺到敌人身上，敌人的士气就已經受挫了。

这是这场战争中的第三次正规会战。它和阿尔馬河会战及因克尔芒会战一样，也是比較短促的。拿破侖战争期間的会战特点，是預先有一个較长的小战斗阶段；双方在使用主力进入决战以前，都力求探明敌人的兵力；只有在双方大部分兵力都投入战斗以后，才进行决定性的攻击。而在这里我們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沒有任何拖延，沒有任何逐漸消耗敌人兵力的行动；突击是一下子就开始的，会战的命运也就取决于一两次攻击的結果。这看起来比拿破侖的战法要更大胆一些。但是，如果說两倍于敌的兵力优势（像联軍在阿尔馬河会战中拥有的优势那样）以及众所周知的俄軍行

动笨拙这两点似乎可以作为采取这种直接行动的理由，那末这种行动仍然表明，双方都非常缺乏干练的军事指挥。无论如何，按照这一原则作战的武夫们，如果碰到一位很懂得如何开始战斗、设置一些什么样的圈套以及如何把他们诱入圈套的将军，那末他们就会很快陷于非常不妙的境地。

最后，再重复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兵士的勇敢和将领的平庸是目前战争中交战双方的特点。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8 月 31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9 月 1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94 号，并
载于 1855 年 9 月 3 和 4 日“新奥
得报”第 409 和 41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新奥得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英国的新揭露材料

亞·白恩士爵士的一些文件是在他死后由他父亲发表的，发表的目的是为了洗刷帕麦斯顿加在他儿子身上的假罪名，即誣指白恩士是那場可耻的和失败的阿富汗战争的主謀，并且也为了清楚地证明，由帕麦斯顿提交給議會的那些轰动一时的亞·白恩士爵士的急电，不仅被歪曲得完全失去了原意，而且实际上是伪造的，里面还插入許多专门为了混淆视听而捏造的文句²⁷⁰。如果不算亞·白恩士爵士的这些文件，那末，一直到現在为止所发表的任何一种文件，大概都沒有像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和查理·納皮尔爵士的通信那样严重地败坏了英国政府和把英国国家职务继承权占为己有的那一帮人的声誉。为了給自己恢复名誉，老海軍上将不久前发表了这些通信²⁷¹。

在激烈的爭論里，詹姆斯·格莱安爵士較之自己的对手具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就是沒有那种可能在輿論界更加損害他威信的揭露材料。正是这个人，公然夸耀他参加了杀害邦迪埃拉兄弟的事件，正是他曾被揭露經常在倫敦邮政总局拆看私人信件，并利用这些信件来为神圣同盟效劳²⁷²，当尼古拉皇帝在英国海岸登陸的时候，他阿諛逢迎地前去亲吻尼古拉皇帝的手；正是他用独特的方法来实行英国新济貧法，使这个本来就很厉害的法律变得更

为残酷；最后，仅仅几个月以前，他在挤满了人的议会里枉费心机地企图把他自己侮辱不幸的克里斯提上尉的过错推到累亚德先生身上。此人的名声可以说是已确立起来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有一种谜一样的东西。他既没有那种可以使帕麦斯顿勋爵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的特殊才能，也没有那种可以使约翰·罗素勋爵不要特殊才能也能过得下去的党内传统威信；然而他却能够在英国国家活动家当中扮演一个显要的角色。揭开这个谜的锁钥不应该到世界史年鉴上去找，而应该到“笨拙”杂志中去找。在这本颇有教益的杂志里年年都有一幅写生漫画，画上有言简意赅的题词：“罗伯特·皮尔爵士手下干髒活的小孩”。罗伯特·皮尔爵士虽然不是一个伟人，却是一个正派人物，然而他首先是英国的国家活动家，政党的领袖；地位责成他去干髒活，但他是很不愿意干的。正因为如此，詹姆斯爵士便成了他真正的求之不得的宝贝，正因为如此，詹姆斯爵士便成了一个完全必要的人物，而且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查理·纳皮尔爵士的一家人，无论按他们的天分或他们的古怪性情来说，都同样是与众不同的。在现代温和的人们当中，纳皮尔兄弟使人产生一种仿佛他们是某个原始部落的代表的印象，他们的天分使他们掌握了文明的成果，但是并没有使他们拜倒在文明的陈规俗套面前，并没有使他们拘泥于它的礼节和屈从于它的纪律。一方面纳皮尔兄弟始终忠实地为英国人民服务，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经常同自己的政府争吵，并且起来反对它。一方面他们具有荷马笔下的人物的优点，可是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这些人物的好说大话的特性。

我们举已故将军查理·纳皮尔爵士为例。他无疑是马尔波罗时代以来英国的一个最有才能的军人，但是，他在同东印度公司的

訟爭中（他死后這場訟爭由他的家族來繼續）出了大名，這種名氣並不亞於他占領信德省²⁷³ 時的名聲。再拿一個將軍威·納皮爾爵士來說，他是英國的第一流軍事著作家，但是，他和英國軍事部門經常的爭吵也是相當有名的；他很少考慮到自己同胞的狹隘偏見，以致他的著名的比利牛斯半島戰爭史²⁷⁴ 被英國批評界一致辱罵為“關於這次戰爭所從未有過的一份最好的法國報告”。詹·格萊安爵士的對手，老海軍上將納皮爾也是由於他取消了自己上司的命令而著名。至於談到納皮爾一家的最後這位強壯的子孫，那末詹·格萊安爵士只是覺得，他就像夾蟒蛇一樣地夾住了納皮爾；然而夾蟒蛇的鐵環檢查起來不過是一圈普通的蜘蛛網而已。

作為海軍首席大臣的詹姆斯·格萊安爵士，在查理·納皮爾回到英國後免去了他的司令職務。他在下院指出納皮爾要對在波羅的海的失敗負責，為了證實這一點，他從納皮爾的私人信件中引證了幾處。格萊安指責納皮爾避不執行他從海軍部接到的獨創性的命令。他希望將來任何一位海軍大臣都要慎重行事，不要讓查理·納皮爾爵士的旗幟升起；他還在受他影響的報紙上嘲笑納皮爾，稱他為“好戰的查理”，把納皮爾譬喻成神話中的法蘭西國王，“帶著 2 萬名兵士攀登一座小山，然後又下山回來”。查理爵士按他自己的話來說，

“曾要求調查他的行動，他遭到了拒絕；他向內閣申訴，但也沒有得到任何回答；最後他向下院呼喚。他被拒絕的借口是，討論有關案件的文件可能危害女王陛下的艦隊”。

在炮擊斯維阿波爾格以後，這個理由當然不成立了。

詹姆斯爵士相信他的陰謀一定會得逞，因此為了防范起見，他在所有的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損害他自己的名譽和恢復他所挑選的

牺牲品的名誉的信件上都做了“私人的”[«private»] 记号。至于“私人的”这个神圣的字眼的含义，那末詹姆斯爵士本人在向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提供证词时声称，当不列颠海军首席大臣有充分理由认为必须把官方的指示不仅对公众保密，而且甚至对议会保密时，他通常在这些文件上打上“私人的”记号。对于詹姆斯爵士这种认为自己有权公开私人通信的人来说，把官方文件变为私人财产是完全自然的事。但是，这一次他却打错算盘了。查理·纳皮尔爵士大胆地打破了“私人的指示”的束缚，他可能使自己遭到从英国海军军官正式名册中除名的危险，而且还可能不定什么时候失去重新升起自己旗帜的权利；但同时，他不仅阻碍了詹姆斯爵士在海军部继续担任职务，而且向英国人民指出，他们的舰队同他们的军队一样腐败透顶了。当克里木战局使不列颠军队失去它昔日的荣誉的时候，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的维护者们婉言拒绝承认自己的过错，说什么英国从来也没有妄想成为头等军事强国。然而他们却不敢断言，大不列颠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海军强国的要求。战争使民族经受考验——这是战争的补偿的一面。正像木乃伊在接触到空气时立即解体一样，战争给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的社会制度作出了最后的判决。

詹姆斯·格莱安和海军上将纳皮尔的通信包括从1854年2月24日到11月6日这段时期，由于它的数量很大，不可能全部拿来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所以只能加以归纳，摘要发表。在8月底以前，大家知道，波罗的海的航行季节结束，一切都相当顺利，虽然在远征一开始查理·纳皮尔爵士就已经向詹姆斯·格莱安爵士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海军部拨给用以装备和补充北海舰队的经费对完成预定的目的是不够

用的，不能为迎击俄軍創造有利条件。”

在整个这一时期內，詹姆斯爵士在自己的信中除了表示对自己的“亲爱的查理爵士”的賞識以外，什么也沒有表示。3月12日他“祝賀”他的舰队“十分有次序地”駛离英国海岸；4月5日他“对他的向前推进表示滿意”；4月10日他“非常滿意他的行动”；6月20日他称納皮尔为“无与伦比的舰队司令”；7月4日他“确信查理爵士将会做出一个人所能够做出的一切事情”。8月22日他“衷心地祝賀他在博馬尔松德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而在8月25日他以一种充滿詩意的喜悅心情写道：

“我十分滿意您的行动，我对您的預見和您的正确思想得到了证明表示欽佩。”

整个这段时间詹姆斯爵士只担心查理爵士

“由于热切地追求树立偉大的功勋和滿足迫不及待的人們的野心，会受到一时冲动的影響，会忘記履行一个最崇高的义务——在精神上有勇气去做你所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不怕受到对不正确的行动的指責”。

早在1854年5月1日，他就在給查理爵士的信中写道：

“我认为，斯維阿波尔格也好，喀琅施塔得也好，从海上是几乎无法攻下的，特别是斯維阿波尔格，只有大量的軍队才能从陆地上順利地攻击俄国很容易地在直接通往首都的要冲集中的那些兵力。”

6月12日查理爵士写信告訴他：

“經過反复仔細考虑之后，他得出了一个結論（海軍上将查茲也同意这个結論）：占領斯維阿波尔格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装备大量的炮艇。”——

詹姆斯爵士于7月11日給他的回答是：

“有5万人和200艘炮艇，您就很可能在9月底以前获得巨大的和决定

性的胜利。”

但是冬天一到，法国军队和舰队就开回去了，而秋分前后的强大风暴已经开始掀起波罗的海的巨浪，从查理爵士那儿收到了这样的报告：

“我们军舰上的锚链已经开始断裂，‘苍龙号’只剩下一个锚，‘女王号’和‘妖龙号’在昨天深夜也都失去了一个锚；‘女巫号’不得不在雾中抛锚，夜间在纳尔根附近起锚后，又在廉斯卡尔灯塔附近抛了锚，因为风把它吹到暗礁上去了；‘埃弗里阿尔号’触了暗礁，幸好没有沉没。”

这时詹姆斯爵士突然发现，“打仗不能不冒险，不能没有危险”，因此，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一艘炮艇和一艘白炮艇，斯维阿波尔格也应该拿下来！的确，我们只能重复老海军上将的话：“假如俄国皇帝是海军首席大臣，他也可能会写出这样的信。”

从这些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海军部里，正如在陆军部里一样，也是一片无政府状态。詹姆斯爵士同意纳皮尔经过贝耳特向前推进，但是内阁对这一点抱否定态度。在8月间，詹姆斯爵士写信给纳皮尔，要他预先作好离开波罗的海的准备，然而内阁在这个时候却拍给他一个内容相反的电报。詹姆斯爵士对尼耶尔将军的报告有一种看法，而内阁对它却有另一种看法。但是这些通信中最有趣的东西，看来是它们对英法同盟所作的新的说明。法国海军上将把8月13日召回法国军队的命令告诉了查理爵士。法国军队在9月4日启程，而法国舰队的剩余部分也在9月19日启航了。然而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却向查理爵士肯定地说，他只是在9月25日才得知法军离开的消息。因此詹姆斯爵士错误地认为，“这个决定是在取得纳皮尔同意后就地通过的”，但是，正如他强调指出的，“没有向英国政府征求任何意见”。另一方面，尼耶尔，法

国工程部队的將軍和路易·波拿巴的密友,仿佛曾經建議过“用战列舰在两小时內击毀斯維阿波尔格”。由此可見,他想促使英国舰队采取盲目攻击,使英軍一无所获地在暗礁和俄軍的防御工事上碰得头破血流。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9 月 8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9 月 24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502 号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²⁷⁵

倫敦 9 月 11 日。昨晚 9 时，圣詹姆士公园和倫敦塔²⁷⁶ 的炮声向倫敦宣告了攻占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消息。使利塞烏姆、草市和阿德菲剧院的經理們滿意的是，这次欢呼“万岁”和高唱《God save the Queen》〔“上帝保佑女王”〕和《Partant pour la Syrie》〔“出征叙利亚”〕的贊歌，終于不是像从前那样是由虛假的报道所引起，而是由官方的快报所引起的。

克里木战局終于到了一个轉折点。近一星期以来，俄国人在电訊中不得不报道說，联軍的火力使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受到很大的破坏，被破坏的地方已“尽可能地”、因而也就是說不是完全地得到修复。昨天我們又得悉，9 月 8 日（星期六）下午联軍强攻四个棱堡。联軍在攻打一个棱堡时被击退了；有两个棱堡被联軍攻占，但其中的一个又不得不放棄；最后，在第四个也就是最重要的位于馬拉霍夫岡上的一个棱堡（科尔尼洛夫棱堡）上，联軍巩固下来了。正是这一棱堡的失守迫使俄軍破坏和放棄了南区。^①

① 在弗·恩格斯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文章中，沒有这一句話，而有以下一段話：“这一地点的失守，迫使俄軍于 9 月 9 日把部队由南区撤至北区，从而放棄了塞瓦斯托波尔市区。临撤走前，俄軍炸毀了倉庫和建筑物，用炸药破坏了防

黑河会战后大量增援部队的开到，使联军将领不致受到因克尔芒附近俄军的任何进攻的威胁；即使俄军把第四师和第六师剩下的一部分兵力以及两个掷弹兵师都调上来，联军也仍然能够成功地抵抗俄军所能调过黑河来的任何数量的部队，同时还能分派出足够强大的兵力来继续围攻甚至实行强攻。应当承认，法国政府这次异常迅速地调运了部队，用它们同俄国从波兰和沃伦调来的、现在已在行军途中的增援部队相对抗。7月初以来被派往东方的法军，已不下5万人。在这种条件下，由于调到前面的英、法臼炮队有效的行动，联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把塹壕挖到了护城壕边。至于塹壕已挖得多远以及是否已 *secundum artem* [完全按学术规则] 围绕斜堤挖好工事，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对市区的轰击日益带有正规炮击的性质；联军成功地采用了曲射，使俄军在火力控制的区域内无法配置大部队。最后，接到了强攻命令。

在馬美朗，俄军在春季构筑了许多带有横墙和避弹所（它们既不怕火烧，也不怕炮击）的独立工事。这些工事は他们良好的掩蔽所，但是在强攻时发现，它们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集中为防守工事所必需的部队。仅由小群兵士防守的工事一个接一个地落到法军手里，并立即被法军用来配置自己的部队。在构筑馬拉霍夫岡上的防御工事时，显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俄军对工事的构造过于热心了，以致法军一攻占该岡的制高点后，就能利用俄军的工事来防避俄军的火力。由于俄军的大凸角堡（第三棱堡）和軍港小凸角堡（第一棱堡）设在比较平坦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就不能像在

御工事，使它们再不堪使用，并且，用佩利西埃将军的话来说，俄军使整个地区变成了一座烈火熊熊的大火炉；俄军还烧毁了自己的蒸汽舰，凿沉了剩下的军舰，最后，还破坏了巴甫洛夫炮台附近的桥梁。”——编者注

馬拉霍夫岡上那樣構築梯階配置的複雜工事。顯然，這裡在棱堡內筑有將棱堡的突角隔成兩部分的普通二重堡，因此從二重堡能夠以猛烈的火力射擊突角的內部。由於這一點，防守棱堡的部隊就能夠更安全地集中在棱堡的深處，而工事的內部，則可以用從二重堡出擊的方法來防守。由於俄軍按這種場合通常採用的築城法構築了工事，因而成橫隊進攻的英軍以及成縱隊向這些障地強攻的法軍，能夠容易地越過幾乎完全被放棄了的外部的壘牆，但是在二重堡跟前就不得不在彈雨下退却和放棄強攻了。

攻占馬拉霍夫岡後，法軍左翼的德·薩爾將軍就立刻試圖攻占中央棱堡（即馬奇塔棱堡和卡蘭亭棱堡之間的第五棱堡），但是被擊退了。我們不知道，這次攻擊是他個人主動發起的，還是總的計劃的一部分。我們也不知道，法軍的塹壕是否已經挖到了離棱堡足夠近的地方，以致能夠證明這次大膽的嘗試是正確的。

馬拉霍夫岡的攻占，是圍攻過程的一個轉折點。^① 馬拉霍夫岡完全瞰制着軍港區以及塞瓦斯托波爾市區所在的高地的東坡。它從背後威脅着大灣南岸的岸防炮台，並且使俄國軍艦不可能防守整個內港以及外港的大部分。由於馬拉霍夫岡被攻占，塞瓦斯托波爾的防綫就恰好在整個防禦安危所系的那個地點上被突破了。因此，馬拉霍夫岡的失守，就意味着軍港區被占領，市區毀于炮擊，馬奇塔棱堡從翼側和後方被攻占以及堅守塞瓦斯托波爾的最後機會已不復存在。在這以前，塞瓦斯托波爾和一切現代的大

① 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這後面還有一段話：“根據這次引人注目的圍攻戰中所發生的事件來看，完全有理由認為，法軍只要好好地執行任務，就根本沒有從新陣地上被趕走的危險。”——編者注

要塞一样，一直是一支龐大軍隊的營壘。馬拉霍夫岡失守后，它就只起着北区守軍的普通桥头堡、而且是沒有桥的桥头堡的作用。^①港內的几艘俄国軍艦已經被联軍炮彈击毀。法軍在馬拉霍夫岡架設火炮，就使殘存的俄国船艦根本再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停泊場所，如果不算紧靠着尼古拉也夫炮台和亚历山大罗夫炮台的那一块地方的話（在那里也只能停泊很少的船艦）。这就是俄軍凿沉和燒毀自己的战列艦和蒸汽艦的原因。联軍完全占領軍港区后，就可以开始野战。虽然，由于軍港区遭到北区的炮击，联軍不能在該地配置大量火炮和大的兵力，但他們还是使俄軍至少丧失了塞瓦斯托波尔的一半地区（与9月8日以前的情况相比），而俄軍手中还保存着的，是一个只能容納有限兵力的要塞。守軍不仅完全失去了进攻的力量，而且他們的防御能力也显著地削弱了。联軍只需用比过去少得多的兵力繼續圍攻，而騰出来的兵力，加上目前正在途中的以及在馬斯拉克兵营的部队，将能够用来向叶夫帕托利亚远征。我們对于联軍和俄軍在黑河的陣地研究得愈多，就愈相信，目前任何一方如果不預先造成巨大的兵力优势和付出巨大的代价，就不能把对方从这些陣地上赶走。因此，在联軍兵营中日益普遍地流傳着一种意見，即认为有必要向叶夫帕托利亚派出6—7万人，以便从該地开始进攻辛費罗波尔附近的俄軍交通綫。这样就能迫使俄軍在開闊地接战，而開闊地战斗的胜利，从現有条件来

① 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这后面还有一段話：“因此，放棄市区是正确的决定。誠然，我們不止一次地听說过，在馬拉霍夫岡的后坡上已构筑新的工事，以便在該岡失守时还能繼續防守軍港区。但是，这些工事显然不够坚固，因此哥尔查科夫公爵不能繼續在这里进行防御。大概我們很快就会知道，它們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工事。”——編者注

看,显然是屬於联軍的。然而,現在一切都取决于联軍能否以必要的速度和毅力来利用这一时机。①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9 月 11 日左右

載于 1855 年 9 月 14 日“新奧得报”第 429 号,并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9 月 28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50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并根据“紐約每日論壇报”校对过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沒有最后这两句話,而有以下几段話:“假定俄軍在克里木有 20 万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那末,防守北区各堡垒需要 8 万人,防守黑河的陣地需要 6 万人,对付叶夫帕托利亚的联軍需要 6 万人。根据联軍目前的士气,可以肯定,在人数相等和陣地同样有利的情况下,联軍能打败俄軍;既然联軍切断俄軍交通綫后,就可以迫使俄軍应战,那末采取这一步驟显然是絲毫不冒險的。况且,俄軍所能調来对付这一支远征軍的兵力,很可能最多 6 万人。然而,联軍采取这一机動愈早就愈有利,如果他們行动坚决,就能收到很大的效果。現在他們在士气和数量方面占着优势,我們并不怀疑,在台地的又一个冬天使他們的人数减少和士气受挫之前,他們会利用这两方面的优势。

果然,据最近的消息称,在 9 月 13 日前,已經向叶夫帕托利亚派出了 25 000 人;我們一定很快就会知道,随后派出的还将有更大的一批兵力。

暂时我們还只有关于这些事件的极簡短的电訊。等收到更充分、更詳細的消息以后,我們再来談这个題目。”(最后两段是“論壇报”編者加的)——編者注

卡·馬克思 奧康瑙尔的葬礼

倫敦 9 月 11 日。宪章派領袖奧康瑙尔的葬礼在昨天下午举行。大約有两万人参加了送殯行列，他們几乎全都是工人。送殯行列从芬斯貝里方場和斯密斯菲尔德出发，向停放灵柩的諾亭山行进，然后再把灵柩护送到肯薩尔-格林公墓(倫敦最美丽的公墓之一)。

送殯馬車走在行列的最前面，每輛馬車套着四匹馬，按照英国的風俗在馬头上飾有一束大纓球。馬車后面是旗手。黑色的旗帜上鑲着白色的字：«He lived and died for us»(“他為我們而生，也為我們而死”)。在一面鮮紅的大旗上显现出«Alliance des peuples»[“民族同盟”]的字样。在先头旗帜的旗杆尖端微微摆动着一頂象征自由的紅色尖頂帽²⁷⁷。在門前有圓柱的美丽的公墓小教堂里举行了祭禱以后，威廉·琼斯发表了紀念死者的临葬悼詞。最后，葬仪在圣歌声中結束。大示威的一切特征都具备了；只是不够尖銳，因为厄內斯特·琼斯由于妻子病重不能前来出席和发表演說。当参加葬礼的人在傍晚五时半左右回到城里的时候，他們遇到了五队警察；人群以一种諷刺的得意的口吻叫喊 «too late» (“太迟了”) 来欢送他們。由于奧康瑙尔死时非常穷困，他是由倫敦工人階級集資安葬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9 月 11 日

載于 1855 年 9 月 15 日
“新奧得报”第 43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争的前景

“亚美利加号”輪船带来的报纸，我們已很仔细地阅读过，其中除了一份不完全的英軍軍官伤亡名单外，几乎找不到一点材料可以补充我們所知道的那些导致塞瓦斯托波尔南区陷落的情况。固然，这些报纸发表了不少意见，说明了哥尔查科夫从防守得如此长久、如此坚决的陣地突然撤退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在这些意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报駐倫敦的和駐巴黎的记者的看法。但是尽管他們的立場不同，对有些观点和見解却都沒有給予足够的注意和应有的重視。²⁷⁸

克里木事件現在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轉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迫使俄軍放棄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原因。十分明显，这个突然的决定决不是出于純战略或战术的考虑。如果哥尔查科夫认为南区甚至軍港区在馬拉霍夫岡失守后不可能守住，他就不会在这一带郊区构筑那样多的內圍防御工事。虽然，可以认为这个制高点的攻占就已經保证了圍攻的最后胜利，但是，如果俄軍首先頑强地防守郊区的內圍防御工事，然后頑强地防守市区，那末該城的失守仍然可以再推迟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根据最好的地图、平面图和略图来判断，以及从純战术或战略观点来看，都沒有任何必要这样仓卒地退出至今仍在坚守着的陣地。用純軍事理由是不能解

釋这一步驟的，就像不能用意外的慘敗所引起的惊慌和恐惧来解釋它一样。看来，另外性质的一些情况促使哥尔查科夫采取了这个如此严重地損害他在軍隊中的地位和他的整个前途的步驟。

只可能有两种解釋。或者是俄軍的**士氣**已沮喪到如此地步，以致不可能恢复起碼的秩序和繼續防守內圍防綫；或者是不僅在塞瓦斯托波尔，而且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外的兵營中都已開始感到糧食不足。从沃耳特尼察會戰和切塔特會戰開始，到黑河會戰和9月8日強攻為止，俄軍几乎連續不斷地遭到失敗，這不可能不挫傷塞瓦斯托波尔守軍的士氣，何況他們基本上又是在多瑙河和隨後在因克尔芒吃過敗仗的那些部隊。俄國人不是很容易沖動的，他們比大多數其他國家的軍隊更能經得起失敗；但是，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在受到一個又一個敵人的打擊時，除了採取頑強的和長時間的抵抗這樣的消極辦法以外，除了進行像6月18日會戰那樣唯一的一次成功的積極防禦戰以外，再沒有什麼可用來對付這一連串的失敗，那它是不能無限制地支持下去的。在被圍的要塞中進行的這種抵抗，時間一久，自然就會起一種使士氣沮喪的作用。隨着這種抵抗而來的是生活艱苦的考驗、休息的不足以及疾病和危險——不是那種鍛煉鬥志的急性病似的危險，而是那種最後必然使鬥志低落的慢性病似的危險。在黑河和馬拉霍夫岡接踵而來的失敗，必然使士氣完全沮喪，而哥爾查科夫在市區內的部隊，大概確已不能用來同敵人作積極的鬥爭了。既然馬拉霍夫岡瞰制着通往另一區的橋梁，這座橋梁隨時都可能被法軍炮火擊毀，而獲得援助又是不可能的，那末退却至少還能挽救部隊。守備部隊終於發生了士氣沮喪的現象，這是絲毫也不奇怪的；但奇怪的是，它沒有在更早的時候發生。

现在还有各种征候表明，哥尔查科夫公爵突然退却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整个军队的粮食不足。俄军在阿速夫海的航运的中断，虽然没有像当时那么急于报道胜利消息的英法报纸所期待的那样，立刻表现出它的影响，但一定还是给俄军带来了许多困难，因为他们只剩下一条作战线，输送的物资也因此而减少了。从赫尔松经过人烟稀少的草原运送粮秣和弹药，本来就很难，当这一条路线成为军队唯一的供应线以后，困难就更大了。在乌克兰和顿河军区征集来的运输工具已逐渐损坏；大量的马匹和犍牛由于劳累过度 and 饲料不足而倒毙；随着附近各省物力的枯竭，必要的储备物资的征集已日益困难。显然，最先受到供应间断的影响的，与其说是塞瓦斯托波尔（那里为了防备北区也被封锁，自然储存了各种物资），不如说是因克尔芒兵营、巴赫契萨赖和增援部队所经过的各个地点。联军统帅部的公报已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俄军供应不足的情形，而其他的一些情况也同样地证实了这一点。只有用俄军无法保证目前在克里木的部队的粮食这一原因，才能解释，为什么在途中耽搁那么久而现在据说已到达皮列柯普的两个掷弹兵师，没有被允许继续前进和参加黑河会战；用同样的理由也能解释，为什么尽管在开去支援塞瓦斯托波尔的大部分军队还没有到达，俄军仍然决定用兵力过少、不足以完成既定任务的现有部队来进行这一会战。

可见，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我们的推测，即俄军大部分部队的士气沮丧和野战部队的粮食不足使得哥尔查科夫对于暂时延迟退出已经无法守住的要塞的做法，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哥尔查科夫利用最后的机会挽救了守备部队，看来他是做对了。如果不这样做，那末从一切情况来看，他都只好丢下守备部队不管，而集合自己的野战部队，退到克里木腹地去，假如不是一直退到皮列柯普

的話。在這種情況下，南區的守備部隊很快就會被迫偷渡到北區或投降；而北區的守備部隊在失去一切換防的希望和士氣沮喪的情況下，也會迫於飢餓而投降。

只要俄軍還有希望不僅能在克里木保持與聯軍人數大致相等的兵力，而且還能得到增援部隊以造成很大的數量優勢，那末塞瓦斯托波爾北區就仍然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障地。用守備部隊的兵力堅守北區，同時用野戰部隊占領我們從最近的報道中所知道的那些障地，就意味着把聯軍兵力牽制在格拉克列亞的赫爾松涅斯台地。這還意味着阻止聯軍軍艦進入塞瓦斯托波爾灣，並使它不可能在比博斯普魯斯海峽更近的地方找到一處合適的海軍作戰基地，因為無論卡梅什或巴拉克拉瓦在這方面都是不合适的。只要俄軍還能夠在克里木進行野戰，那末，正像馬拉霍夫岡曾經是南區的鎖鑰一樣，北區就同樣是整個克里木的鎖鑰，它決定着克里木在陸戰和海戰中的意義。但是，如果俄軍不能進行野戰，那末北區也就沒有什麼重大意義了。當然，它是相當堅固的筑壘障地，但是，如果用足夠的兵力對它進行正規圍攻，那末它勢必失守，因為它無從得到援助。

如果想起，北區曾怎樣合理地受到極大的重視，那末上述看法就可能使人感到奇怪了。然而，這個看法却是完全有根據的。目前的戰爭整個來說給人一種筑城戰和圍攻戰的印象，在肤淺的觀察家看來，它似乎使那些由於拿破侖的迅速機動而取得的軍事學術上的成就化為烏有，使軍事學術又回到了七年戰爭的水平。實際上却恰好相反。現在，要塞和要塞群的作用，只是作為野戰部隊在機動過程中所依托的據點。例如，卡拉法特營壘是奧美爾-帕沙借以威脅俄軍翼側的橋頭堡；錫利斯特里亞、魯舒克、瓦爾那和蘇

姆拉可以说是一个大营垒的四个突角，奥美尔-帕沙随时可以退到这个大营垒中去，而敌人如果不把四个突角中的至少两个夺下来或封锁住，就无法跟踪追击。而塞瓦斯托波尔则是俄军在克里木的一个据点。每当俄军在数量上少于敌军或在其他方面受到威胁时，塞瓦斯托波尔就能给它喘息的机会，以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对联军来说，塞瓦斯托波尔是必须摧毁的俄国舰队基地，又是必须攻占的海军作战基地；对俄军来说，有塞瓦斯托波尔，就等于有克里木，因为它是能够用比敌人少得多的兵力坚守待援的唯一阵地。可见，最后的胜负总是由野战部队来决定的，而要塞的作用并不是取决于它们天然的或人工赋予的威力，即它们本身固有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它们所能给予野战部队以掩护和支援 (appui) 的程度。它们的价值是相对的。它们已不是战争中的独立因素，而只不过是一些有利的阵地，这些阵地有时应当用一切手段坚守到底，而有时则不必如此。塞瓦斯托波尔战局比其他任何战局都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塞瓦斯托波尔和所有真正的现代要塞一样，起着有一个有永备工事掩护的营垒的作用。当现有的兵力还足以防守这种营垒的时候，当补给品尚不缺乏而要塞与主要的作战基地的联络又还可靠的时候，特别是当这种营垒尚为强大的守备部队所扼守，而敌人不冒险就不可能绕过它的时候，这个营垒就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能够打乱敌人在整个作战期间的计划。但是，当所有这些条件已不再存在的时候，当守军一次又一次地被挫败，他们储备的粮食快用完，他们与自己基地的联络有被切断的危险，他们有可能遭到1805年乌尔姆会战中奥军的命运²⁷⁹的时候，首先应当考虑的，当然不是阵地的抽象价值，而是军队的安全，这时，军队应当尽快地退到另一道比较有利的防线上去。

看来，俄軍現在正处于这样的境地。他們原有的作战軍隊的大部分——24个师中的14个师——已經投入战斗，并且其中有一部分在克里木已經被消灭，而他們現有的預备部队、非常后备軍和其他新編的部队則根本不能同已經損失的部队相比。俄国人如果今后不再向这个危险的半島派遣部队，并且尽快地放棄这个半島，那就做对了。联軍無論在数量上或者在士气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哥尔查科夫用現有的兵力在要塞以外应战，則势必敗北。联軍沿克里木南部海岸和薩耳吉尔河谷或者在叶夫帕托利亚附近都可以迂迴哥尔查科夫。在这两种場合，他和塞瓦斯托波尔北区的交通綫都会被切断，而且沒有任何恢复的希望，因为联軍在数量上的优势正日益增大。看来，哥尔查科夫現在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可能坚守战綫，以便作好炸毀北部工事的准备，然后比敌人搶先一两天的行程。他到达皮列柯普的时间愈早愈好。据我們从巴黎方面获得的消息称，似乎联軍在攻占塞瓦斯托波尔后已立即派兵前往叶夫帕托利亚，如果这个消息得到证实，那末形势更是如此。如果联軍在这个方向上或者在南部海岸和查特尔山的山道上采取相当坚决的行动，那末战局很快就会結束，克里木就将落入联軍之手。按我們所能判断的，联軍現在可能犯的唯一錯誤，就是向因克尔芒附近的俄軍陣地进行认真的正面攻击，或者在一星期內按兵不动。明晚将駛抵本地的下一艘輪船，大概会带来关于联軍最近的意图的确实消息。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9月14日
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1855年10月1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450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克里木事件

倫敦 9 月 14 日。“钟声当当,炮声隆隆”——目前整个英国就处在这样的气氛中。到处一片欢呼声,每一幢稍能引人注目的建筑物,无论公共建筑物也好,私人建筑物也好,都飘扬着英国和法国的国旗。曼彻斯特的情况和倫敦一样,尽管存在着“曼彻斯特学派”,爱丁堡的情况也和曼彻斯特一样,尽管存在着苏格兰哲学。现在什么东西都不能消除这种普遍的因胜利而陶醉的现象,甚至大批陣亡者的名单用电报拍到倫敦来也无济于事。只有英軍在大凸角堡遭到失敗而法軍却占領了重要据点馬拉霍夫岡这样一个**对照**才使胜利的欢呼声低沉下来,才略为抑止了一下自夸的情緒。过去由于不加批判地把现代社会制度和古代社会制度以及把許多其他东西混淆在一起而产生了一种偏見,即认为工业和商业似乎会消灭人民的好战性格,凡是同意这种旧偏見的人,现在在英国,甚至在英国工业首府曼彻斯特,也会相信相反的看法了。問題非常簡單。在現代世界,即使不是每一个人的財富,无论如何也是国民財富是随着**劳动**的增加而增加的,而在古希腊羅馬,民族愈是**游手好閑**,財富愈是增加。苏格兰經濟学家**斯图亚特**在**亚当·斯密**以前的十年內就发表过卓越的著作²⁸⁰,发现并发展了这个原理。

同时,群众的热情要在新的电訊中寻找养料,那是徒劳无益

的。它們是那樣的貧乏，而最初却是那樣的豐富。佩利西埃寫道：在塞瓦斯托波爾，*«matériel immense»* [“大批財物”] 落到了聯軍手里。據我們推測，落到它們手里的是許多舊鐵，而這些舊鐵很快就會不值錢的。

事件現在會發生什麼樣的轉變，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迫使俄軍如此突然地放棄南區的原因。十分明顯，這個決定決不是出於純戰術或戰略的考慮。如果哥爾查科夫認為，在馬拉霍夫岡失守後，必然要放棄軍港區和市區，那末難道他會在這一帶郊區構築那樣多的內圍防禦工事嗎？儘管馬拉霍夫岡是一個重要的障地，但是如果首先頑強地防守郊區的內圍防禦工事，然後頑強地防守市區，那末塞瓦斯托波爾的失守仍然可以再推遲五、六個星期。根據最好的地圖、平面圖和略圖判斷，以及從純戰術或戰略觀點來看，都沒有任何必要這樣倉卒地退出至今仍在堅守着的障地。只可能有兩種解釋：或者是俄軍的士氣已沮喪到如此地步，以致不適於在市區的內層工事後面再繼續進行抵抗；或者是不僅在城市里，而且在兵營里都已經開始感到糧食不足。最後，也許這兩種原因都存在。

從沃耳特尼察會戰和切塔特會戰開始，到黑河會戰和9月8日強攻為止，俄軍幾乎連續不斷地遭到失敗，這不可能不影響到被圍部隊的士氣，何況他們大部分人都親眼看到在多瑙河和因克爾芒打了敗仗。俄國人固然不是很容易衝動的，因此他們比別的軍隊更能經得起失敗。但是一切都有它的限度。在被圍困的要塞里進行過於長久的抵抗，這種情況本身就會使士氣沮喪。隨着這種情況而來的是生活艱苦的考驗、困難、休息的不足以及疾病和危險——不是那種鍛煉鬥志的急性病似的危險，而是那種使鬥志低落的慢性病似的危險。在黑河上打了敗仗（去支援守軍的那部分

軍隊中有半数、恰好也就是本来应当去解救南区的那部分增援部队是在这里作战的), 以及馬拉霍夫岡这个鎖钥陣地被占領——这两次失敗使軍隊完全丧失了斗志。既然馬拉霍夫岡瞰制着通往另一区的桥梁, 这座桥梁随时都可能被法軍破坏, 任何增援部队的到达都是有問題的, 那末退却也就成了拯救軍隊的唯一办法。至于說到粮食不足, 一切迹象表明, 缺粮的情况已經开始感觉到了。自从俄軍在阿速夫海的航行中断后, 他們只剩下一条作战綫, 运输也就减少了。在只有一条来自赫尔松方面的道路可以通行以后, 运送粮食、彈药等等就要通过人烟稀少的草原, 因此, 本来就很大的困难自然就更为增多。在乌克兰和頓河軍区征集来的运输工具已逐渐损坏, 而要邻近的本来就已被劫掠一空的省份供应新的工具来代替它們, 那是越来越困难了。显然, 最先受到供应間断的影响的, 与其說是有大量儲备的塞瓦斯托波尔, 不如說是因克尔芒兵营、巴赫契薩賴和增援部队所經過的各个地点。只有这一原因才能解釋, 为什么在途中耽擱那么久而現在已到达皮列柯普的两个擲彈兵师并没有向前推进和参加黑河会战; 用同样的理由也能解釋, 为什么尽管开去支援的大部分軍隊还没有到达, 俄軍仍然决定用兵力过少、不足以完成既定任务的現有部队去进行这一会战。如果这些看法是正确的, 那末, 哥尔查科夫除了利用馬拉霍夫岡的被占領作为挽救他的守軍的漂亮借口外, 的确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9月14日

載于1855年9月18日

“新奧得报”第43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

貿易和財政狀況

倫敦 9 月 24 日。在目前，不僅是大不列顛的貿易和財政狀況，而且特別是法国的貿易和財政狀況，几乎像克里木戰爭一樣，吸引着輿論界的注意。大家知道，法兰西銀行把國庫期票和同它類似的有担保的有价證券的貼現率提高到五厘，而商業票據則按四厘貼現。法兰西銀行的董事們非常害怕貴金屬从銀行的地窖里流失，已決定把商業票據的貼現率也提高到五厘，然而財政大臣却加以干涉，并禁止他們辦理這項業務。不言而喻，政府力求尽可能長久地保持廉价的金融市場和貸款充足的假象，从而使小店鋪主維持良好狀況。

“曼徹斯特觀察家”²⁸¹ 写道：“最近两年來，对法国財富的貪求是极大的。在两年以內，路易-拿破侖政府消耗了 2 亿英鎊；巴黎市政厅把大量借款用来裝飾首都；在政府的发起和庇护下制定了需要大量經費才能完成的规划；仅仅 *Crédit Mobilier*²⁸² 就至少創辦了六家大公司，每家大公司都提高自己的股票行市，并使它大大高于票面价額；这些公司的資本本來还有待于投进去，可是无数股票却在人們手里轉來轉去，根本不顧結算日期。政府的財政狀況，所有这些企业大部分所帶有的純粹投机性质，法国金融市場的現狀，連年不好的收成对人民群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它对交易所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可能发生足以破坏东方戰爭的进程和法国的安寧昌盛的災難。”

上述報紙在談到**糧食市場問題**時指出：

“毫無疑問，法國和英國這兩個國家將成為巨大的糧食進口國家。這裡已經向多瑙河地區發出的定貨單將促使美國向歐洲運入糧食而不是運入黃金。英國去年的收成比往年好，但是從1854年8月到1855年8月，我們仍然輸入了3 335 000夸特的小麥和1 558 892公担的面粉，而全年的平均價格仍然高於70先令。今年我們還需要數量更大的進口，以防價格更高的上升。如果不從北美輸入，那末從哪里輸入呢？德國北部的收成也比平常低，因此美國把面粉運到波羅的海地區，在需要時，我們通常可以從那里進口大量的糧食。根據奧地利政府的通報，奧地利的年景一般，然而它能否有多餘的糧食輸出，是值得懷疑的，而整個意大利南部嚴重缺糧，即使從黑海各港口輸出糧食也仍然像過去那樣不能滿足需要。因此，法國在購買糧食時不僅要同英國競爭，而且要同歐洲大陸的大部分國家競爭。這種情況是夠使法國政府傷腦筋的了。‘通報’上的一篇半自我安慰、半教訓別人的文章在這方面作了最好的說明。”

至於“曼徹斯特觀察家”上提到的法國的許多新的股份公司，那末正如不久前巴黎出版的“交易所業務”一書²⁸³所指出的，僅僅是股份銀行這一部門，從二月革命以來，它們的數目僅僅在巴黎就增加了5倍。1848年以前在巴黎只有兩家股份銀行，革命以後就創辦了12家這樣的銀行。現在有：Banque de France〔法蘭西銀行〕、Caisse Commerciale〔商業儲金局〕、Comptoir d'Escompte〔貼現銀行〕、累迪厄公司所屬合資公司銀行、Crédit Foncier de France〔法蘭西土地信貸公司〕、馬提尼克銀行、Banque de Guadeloupe〔瓜德羅普銀行〕、Banque de l'île de la Réunion〔留尼汪島銀行〕、阿爾及利亞銀行、Crédit Mobilier〔動產信用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aritime〔海洋信貸總公司〕、Caisse et journal des chemins de fer〔鐵路信貸寄托銀行〕、Comptoir central〔中央貿易銀行〕、Crédit Industriel〔工業信貸公司〕和

Banque de Sénégal [塞內加爾銀行]。這些銀行的已支付的資本一共只有 15 123 萬法郎，它們的銀行總資本也只有 25 248 萬法郎，或 1 000 萬英鎊左右——這個數目不及英格蘭銀行一家的資本。

倫敦的政府機關刊物“經濟學家”寫道：“在這種資本的狹小基礎上利用信貸建立起來的巨大上層建築，不能不使人擔憂。例如，擁有資本 9 125 萬法郎的法蘭西銀行發行了 542 589 300 法郎的銀行券，即超過資本 5 倍多。Crédit Mobilier [動產信用公司] 有權發行比它的資本多 9 倍的債券。Crédit Foncier de France [法蘭西土地信貸公司] 的名義資本只有 3 000 萬法郎，卻發行了為數 2 億法郎的債券。因此，可以預料，數目這樣大的債券所引起的混亂或貶值，一定會在巴黎和法國造成嚴重的災難。”

卡·馬克思寫於 1855 年 9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55 年 9 月 28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新奧得報”第 453 號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俄国的抵抗力量²⁸⁴

俄国沙皇駕临敖德薩，皇后由彼得堡搬到神圣俄罗斯的心脏——莫斯科，国事暂时交给沙皇最好战的弟弟康斯坦丁，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俄国充满了进行最顽强的抵抗的决心。尼古拉也夫和赫尔松，南俄罗斯的最坚固的两个据点，已经成了目前在塔夫利达省和赫尔松省编成的预备部队的集中地。除了人数无法准确估计的预备部队（即各团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各营）以外，在尼古拉也夫大概集中了约4万非常后备军，同时在敖德薩还大约有25 000人。现在还不能断定这些材料的准确程度。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南俄罗斯大量的兵力正在集中。

俄军的**战略计划**不仅估计到克里木失守的可能性，甚至还估计到敌人侵入南俄罗斯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把主要防线选择在德涅泊河一綫，而把赫尔松和尼古拉也夫作为第一綫作战基地，把叶加特林諾斯拉夫作为第二綫作战基地的原因。由于赫尔松和尼古拉也夫位于炮舰甚至輕巡航舰的活动范围以内，因此还必需有一个在内地的基地。叶加特林諾斯拉夫正是这样的基地。它位于德涅泊河约成75度角的弯曲部，对于退向腹地的军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中心地点，因为在这里能指望首先在德涅泊河下游（即由东北流向西南的一段）、然后在中游（即由西北流向东南的一段）地

区得到掩蔽。从皮列柯普向俄国腹地进攻的军队，首先必须在赫尔松附近强渡德涅泊河，然后向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推进，在该城附近再次强渡德涅泊河。沿德涅泊河左岸前进的任何一支部队，都容易被阻于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以南数英里的沃耳契亚河一綫（该河在这里流入德涅泊河）。此外还有另一些有利的条件：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以南的整个地区是一片长达 200 英里的大草原，在这里，无论军队的调动或供给都是同样困难的，而位于草原北端的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则靠近富庶的和人口比较稠密的基辅省和波尔塔瓦省，因而不难得到必要数量的粮食。最后，叶加特林诺斯拉夫能保证与基辅附近中央地区的部队的联络，并能掩护通往莫斯科的道路。这就说明为什么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构筑了工事并储备了南方军队所需要的一切补给品。在这里集中着大量的粮食、被服和弹药。所有这些，如果一方面能说明俄军具有战略远见，——那位老将军和逃兵若米尼总算没有白白地长期教导了他们，——那末，另一方面又同样表明，俄军认为他们在一个长时期内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假如联军从皮列柯普向俄国腹地前进，当然就需要攻占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但是，在今年的战局条件下根本谈不到这样的进攻，而且在 1856 年也未必能举行这样的进攻。因为首先要做到的是使俄国完全退出克里木，退出整个南高加索和高加索（直到捷列克河和库班河一綫），需要烧毁敖德萨和破坏尼古拉也夫港，以及肃清加拉兹以下的多瑙河流域的俄军。换句话说，联军即使只考虑向俄国腹地进军的问题，也必须首先夺取俄国所有这些边远地区。由此可见，俄军的有远见的战略计划是一个 *de mauvais augure* [不祥之兆] 的计划。

联军正将兵力调往黑河上游盆地，以便在艾托多尔或者在具

尔貝克河上游地区迂迴俄軍的极右翼。哥尔查科夫和佩利西埃的报告对这一点的說法是相同的。我們认为，联軍的这一机动具有太明显的佯动性质，因此不会是真正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現在联軍的任务，显然是把俄軍驅逐出梅肯集高地上的筑垒陣地。假如联軍能做到这一点，那末俄軍将不得不放棄北堡，并从而放棄整个克里木。在梅肯集高地和辛費罗波尔之間沒有一处陣地是联軍可以迂迴的；在辛費罗波尔的另一面則是一片草原，不适于大部队行动，不能提供任何の陣地。俄軍能否守住克里木，就要看他們能否守住現有的陣地，尤其是梅肯集高地上的陣地。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9 月 25 日
載于 1855 年 9 月 29 日“新奧得报”
第 455 号，并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10 月 17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52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并根据
“紐約每日論壇报”校对过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將軍們的報告。——英國的
法庭。——來自法国的消息

倫敦 9 月 27 日。辛普森、佩利西埃和尼耶爾將軍的報告，特別是英國報紙駐克里木記者的信件，包含有大量的和各種各樣的材料。對這些材料進行批判的研究要花費時間。因此，關於 9 月 7 日和 8 日的事件，我們只能在下一篇通訊中作比較詳細的說明。²⁸⁵ 而現在應當指出的一點是：英國報界幾乎一致地、有充分根據地在嚴厲指責辛普森將軍和受他指揮的英國高級軍官。在強攻大凸角堡時，完全證實了俄國軍隊中流傳的一句俏皮話的正確，這句俏皮話就是：«L'armée anglaise est une armée des lions, commandée par des ânes»（“英國軍隊是一支受驢子指揮的獅子軍隊”）。一家倫敦報紙要求成立新的塞瓦斯托波爾委員會，它忘記英國軍隊領導上的不中用是陳腐的寡頭政治統治的必然後果。一切準備工作從一開始就進行得很糟。英國的塹壕距大凸角堡的塹壕溝還很遠（250 碼），部隊必須用一刻鐘以上的時間在敵人的火力下跑過開闊地，因而他們在到達目的地時已經完全精疲力盡了。法國工程師們曾及時地提醒英國人注意這個缺點，然而卻從他們那里得到了下面的回答：

“如果我們再推進幾碼，那末我們的部隊在前進時，就要受到馬奇塔棱堡

的纵射火力的射击，因而就会遭到更大的損失。”

首先，这种遭受損失的危險性要比部队在强攻时所遭到的小得多。此外，还可以局部用构筑横墙和锯齿形塹壕的办法，以及局部用建立反炮垒的办法来削弱纵射火力的效果。然而法国人的一切不同意見在冷酷的辛普森的頑固态度上碰碎了。其次，法軍的塹壕很寬闊，不仅能够容納而且能够掩蔽大量部队，而英軍的塹壕却很狹窄，而且挖成这个样子：使得每一个体格比較粗壮的英国人一下子就会引起俄軍司令部对他的注意。由于英国軍队不得不通过一段很长的距离，所以在到达攻击目标后，他們不是立刻就攻击敌人，而是首先想掩蔽起来，然后再开始步騎枪射击，这样就使得俄軍有時間重新集結力量。一切战斗准备做得如此之糟，从下面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英国軍队在占領垒墙后，甚至沒有想到把那里的俄軍大炮鉤接起来。在攻击部队里既沒有带着必要工具的工人，也沒有不要專門工具就能完成这个任务的炮手。但是，最出色的是辛普森將軍在强攻前和强攻时所发布的战术性的命令。（我們从“每日新聞”的一篇通訊中知道，在进行强攻时，辛普森患着傷風，裹着一件寬大的带風帽的斗篷坐在馬美朗炮台的軟椅上。）半年以来，英軍对大凸角堡的攻击都被粉碎了，为了攻打这个可怕的大凸角堡，他派遣了 200 人的强攻部队，320 人組成的掩护部队和不到 1 000 人的主力部队。英軍在占領大凸角堡的凸角以后，就处在变成了內堡的多面堡和位于它后側的穹窿的猛烈火力之下。如果攻击部队的人数充足的話，英軍就能迂迴多面堡，这样就能很快地决定战斗的結局。然而增援部队沒有到达，虽然温德姆上校三次派人要援兵，要求增援部队迅速开到，而且最后他不得不亲自去寻找他們。部队就这样冒着猛烈的炮火在胸墙上呆了三小时；

他們兩次深入工事，都毫無意義地被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掉，最後不得不潰亂撤退。像辛普森所做的那樣，以數量不多的兵力進行強攻，起初投入戰鬥的部隊還不到他所指揮的兵力的二十分之一，而後方卻保持着戰鬥所必需的後備力量，由於個人的專橫使得勇敢的戰士遭受無謂的犧牲——所有這一切，是現代戰爭史上最大的丑事之一。這種情形要是發生在拿破侖第一時代，辛普森無疑就要被提交軍事法庭了。

大陸上對財產繼承法院的專橫作了許多公正的批評。然而不取報酬的英國審判官²⁸⁶的裁判權卻恰恰是現代化了的、得到憲法掩護的領主裁判權。我們從一家英國地方報紙上逐字逐句地摘錄了下面一段引文：

“上星期二，一位年邁的農業工人納薩涅爾·威廉斯出現在伍斯特的治安法官面前。他被處 5 先令的罰金和 13 先令的費用，因為他在 8 月 26 日星期日割了屬於他個人所有的一小塊地的小麥。威廉斯證明說，他這樣做是必需的，假如他不收割小麥，小麥就要毀掉，他在整個星期內從早到晚為租給他土地的地主忙個不停。但這些話毫無用處。坐着 reverends (牧師) 的法庭是哀求不動的。”

工廠主、鄉紳和組成不取報酬的審判官的特權階層的其他代表所採取的做法，也和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處理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牧師一樣。

我們從一位居住在巴黎的英國人(輝格黨人)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摘錄如下一段引文：

“今天(即 9 月 24 日)在‘立憲主義者報’上刊登的一篇好戰的文章，看來大大地挫傷了巴黎資產階級的銳氣，我在市內三個不同的地點(都是重要的商業區)听到了幾乎是用一樣的詞句表達出來的同樣意見：請看吧！差不多有整整一年了，人們對我們說拿下塞瓦斯托波爾之後就馬上會開始和平談

判。現在，塞瓦斯托波爾拿下來了，却又對我們說這純粹是一個軍事上的勝利，在沒有占領整個克里木以前，就根本不要想和平。情況還會這樣繼續下去，只有上帝才知道，和平何時來臨。這些話都是帶着最沮喪的神色說出來的。必須公道地承認，拋開民族威信的問題不談，由於許多原因目前的戰爭對法國來說也不是個時候。在秋季的報告中，每下一個周都比上一個周所能預料的情況要壞。例如，目前四磅重的麵包在盧昂值 26 蘇，而在巴黎值 3 法郎或 60 蘇。在波爾多，市政委員會已不得不撥出一大筆錢以便在四磅重的麵包的價格提高到 1 法郎（這在吉倫特被認為是飢荒時期的價格）時幫助居民。這種情況正在全國逐漸出現。因此，法國的國內情況是非常嚴重的；擁護革命的人在全國到處皆是，一旦貧困變得不可忍受時，他們就能把成千上萬的人集合到自己的旗幟之下。重新組織各省總委員會和市政委員會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因為這套辦法會引起致命的後果。目前在很多省份里根本沒有總委員會，而政府任命的地方長官現在也不得不經常解散自己的市政委員會。幾乎每天都能讀到這樣的官方消息：某個城市的地方長官解散了市政委員會或某某行政官解散了總委員會。原因在這裡都沒有指明，雖然不允許對這種實際情況作正式的評論，但事實本身却使得有這種情況的省的居民十分激怒。所有這一切都證明最好把更有經驗和更可靠的兵士派到很多地方去。”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寫于

1855 年 9 月 27 日

載于 1855 年 10 月 1 日

“新奧得報”第 457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战争的決定性事件²⁸⁷

現在，根据联軍各司令官的正式报告以及欧洲报刊的报道（其中最重要的已在本报发表过），我們已經完全了解9月8日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的胜利总强攻的詳情。这些引人注目的报道，当然大家都已讀过，沒有必要再来重复它們所列举的事实。因此，我們想使讀者清楚地了解强攻得以进行的条件，并說明为什么在这次强攻中，联軍在各个地段上的战果会有如此的不同。^①

据尼耶尔將軍的报告称，法軍在所有地段上的塹壕都掘到了距俄軍工事相当近的地方。在基連谷的小凸角堡（第一棱堡）和馬拉霍夫岡（第二棱堡）的方向上，对壕的前端距俄軍的护城壕不超过25碼。在馬奇塔棱堡（第四棱堡）的方向上，距离为30碼，在中央棱堡（第五棱堡）的方向上則为40碼。可見，在所有这些地点，强攻纵队距离他們所要攻击的工事都非常近。可是英軍在剛靠近大凸角堡（第三棱堡）有240碼远的地方就停止了对壕作业。原因在于英国軍隊里仍然盛行着那种墨守陈規的作风。英軍剛把塹壕掘进到这个距离时就发觉，如果再繼續前进，俄軍就能从馬奇塔棱

① 本文在“新奧得报”上发表时，沒有这一段話，而有以下的一段話：“9月8日动用了法軍5个师以及英軍2个师的部队。联軍自称，在总共約45000人当中，損失了1万人，即将近四分之一。俄軍的損失无法确定。”——編者注

堡對他們進行縱射，因為該稜堡比俄軍其他工事要突出得多。而圍攻學中有一條总的原則，即塹壕不應當掘進到敵人占領的那一綫，因為這會使它們遭到縱射火力的威脅。

如果能夠避免用這種錯誤方法來挖掘塹壕，那當然很好。但在當時無法避免縱射火力的情況下（总的圍攻計劃和地形特點，不允許預先攻占馬奇塔稜堡），挖掘這樣的塹壕，無疑比根本不挖掘要好些。其實，理論原則規定了許多防止這種不可避免的弊端的方法。在這種場合，可以構築橫牆和複雜的對壕。據說，法國軍事工程師曾經同他們的英國同行們爭論過，他們向英國人證明，雖然在這種不利條件下挖掘塹壕會損失大量的人員，但是為了完成能保證強攻勝利的作業而遭受這些損失，總比在強攻時遭受這些損失要好，因為如果隱蔽的塹壕不夠，強攻能否勝利就很成問題。然而英國工程師們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強攻的結果表明，他們的意見是絕對錯誤的。

法國將軍把自己的兵力部署如下：麥克馬洪師面對着鎖鑰陣地——馬拉霍夫岡；拉莫特盧日師在他的右方，面對着聯結馬拉霍夫岡與第一稜堡的中堤；杜拉克師在最右翼，面對着第一稜堡。由於馬拉霍夫岡是一個即使在敵人頑強抵抗下也要堅決攻下的唯一工事，麥克馬洪配備了一支預備隊——梅利奈近衛師。這就是法軍用來強攻軍港區的兵力。至於市區方面，由於馬奇塔稜堡好像是一個向前突出的堅固的衛城，並且有相當強大的內層工事，所以聯軍沒有打算立即對該稜堡進行正面攻擊。但是，勒韋昂師必須強攻中央稜堡，如果得手，還將得到德·奧特馬爾師的支援；德·奧特馬爾師則奉命繞到馬奇塔稜堡的背面，為了同時從正面強攻該稜堡，在塹壕內還集中了皮蒙特的查耳迪尼旅。馬拉霍

夫岡和馬奇塔棱堡之間的陣地由英軍占領。他們負責向大凸角堡攻击。

首先打算強攻馬拉霍夫岡，占領它以後，其餘的縱隊應向各自的目标攻击。馬拉霍夫岡是指瞰制周圍地區的馬拉霍夫岡頂上的一個大多面堡。它是各面閉合的，但在背面有幾個大出入口，以便增援部隊進入。它的右方和左方各有中堤與大、小凸角堡相連。這兩個凸角堡也是各面閉合的多面堡，並附設有作為內堡使用的較小的工事；后面的壘牆上，有用來向多面堡內部射擊的射孔，因而形成二重堡。這些二重堡的背面，則由第二道中堤即內層中堤與馬拉霍夫岡相連，形成第二道防綫。在大、小凸角堡內部，障碍物較少，因而完全能以二重堡和內堡的炮火來控制。但在馬拉霍夫岡（敵人在攻占馬美朗以後已集中火力向這裡射擊）則沿壘牆筑有許多中空的橫牆，用作炮手和戰壕內的兵士的防彈掩蔽所；棱堡內部則筑滿了帶防彈掩蓋的大框舍；框舍是作為營房使用的，完全不適於防禦。當攻占馬拉霍夫岡的第一批消息傳來時，我們就說過，俄軍無疑地又犯了在构筑馬美朗的堪察加多面堡時所犯的錯誤，那就是：他們力求避開敵人的火力，把棱堡的內部分成了一些小隔間，這樣顯然就使棱堡的內部不適於抗擊強攻。²⁸⁸ 現在已經完全證明我們的看法是正確的。馬拉霍夫岡的迷宮和馬美朗的迷宮一樣，根本不適於防禦；它在10分鐘內就被攻占，以後就再也沒有奪回。

法軍對強攻馬拉霍夫岡的準備是很出色的。考慮周到，並且一切都有保證。他們為了越過護城壕，曾採用了一種新式橋（我們還沒有關於這種橋的說明資料）；用不了一分鐘就能把這些桥架好。強攻一開始，工兵即從自己的塹壕向俄軍的護城壕挖掘急造

对壕，在俄軍的胸牆中开辟了寬闊的出入口，填平了第二道护城壕，构筑了一条通往馬拉霍夫岡多面堡內部的道路，使增援部队、預备队以至野炮都能沿着这条方便的道路推进。在攻占整个多面堡以后，法軍迅速封閉了背牆的出入口，开筑了射孔，运来了野炮，几个小时以后，当俄軍還沒法认真地試图夺回堡垒时，堡垒已完全被用来对付俄軍，因此俄軍的行动就显得迟緩了。法軍炮手还做好了在必要时鉚住火炮的准备，步兵在腰带上也挂了輕便的土木工具。

攻击是在佩利西埃元帅和尼耶尔將軍的直接监督下进行的。我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攻击是否也做了这样充分的准备；但是其中的大多数攻击，尤其是对中央棱堡的攻击，并没有成功。德·薩尔將軍显然是以数量不足的兵力强攻中央棱堡的，因为法軍刚一接近俄軍的胸牆，就不得不利用它隱蔽起来。强攻变成了互射，当然也就被击退了。辛普森將軍在强攻大凸角堡时，曾力图表明这样的行动会导致什么結果。对小凸角堡的攻击是一场特別激烈的血战；俄軍出色地防守了这一陣地，仅仅在这一个地方就击潰了法軍 5 个旅。

在前几篇文章中，我們已經談到不列顛軍队的荒謬的战法，根据这种战法，为强攻編成的纵队十分薄弱，因此，只要敌人稍作认真的抵抗，它們就可以說是注定要被消灭的。这种錯誤，在腊格倫勋爵制定的 6 月 18 日的强攻計劃中已暴露得很明显，而辛普森將軍显然是决心要超过他的已故的老上司。^① 由于大凸角堡的突角

① 在“新奧得报”上，沒有这一句，而有以下一段話：“英軍墨守陈規的原因在于，英国人以前在各地(包括威灵頓在西班牙)攻打过的要塞，主要是按意大利-西班牙的陈旧的体系筑成的，因而只有很少的要塞能容納 500 名以上的兵士。

已遭到英軍炮兵的轰击，辛普森便决定，在馬拉霍夫岡完全为法軍攻占后，即向这一地点攻击。因此，辛普森將軍从第二师和輕装师中抽出一部分兵力組成了强攻队，总共約 1 800 人，也就是說只有两个旅的編制的一半！这两个师的其余两个旅被指定为增援部队，第三师和第四师則組成預备队；此外，那里还有一个近卫师和一个苏格兰师，总共 25 000 人。而从这些部队中派去担任强攻的，实际上大約只有 1 800 人（后来又有 2 000 人支援）！而且，这 1 800 名兵士与法軍不同，法軍能从自己的塹壕跳进俄軍的护城壕，而他們却需要冒着大凸角堡中堤的側射火力，通过 250 碼的開闊地。英軍尸积如山，但还是前进，利用梯子越过了护城壕，冲进了突角，遭到了从大凸角堡后方的战壕和內堡的霰彈和步枪的猛烈射击。于是他們就散开，尽力隱蔽在橫墙后面，并且开始与俄軍互射，就像法軍在攻中央棱堡时一样。如果增援部队和預备队开来，从近距离发起攻击以擴張战果，那末这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可是开来的只是很少的增援部队，而且是一小群一小群地、断断续续地开上来的。指揮强攻纵队的温德姆旅长三次派軍官回去，請求派出成正規战斗队形的增援部队，但是沒有結果。所有这三名軍官在通过平原时都受了伤。最后温德姆亲自回去，劝說科德林頓將軍再派出一个团，但这时英軍却突然退却，放棄了大凸角堡。俄軍調上来的增援部队肃清了大凸角堡內的敌人。这时，手里还有 2 万預备兵員的辛普森老头，竟决定在次日清晨再进行强攻！

英国人一切都讲傳統，所以他們的强攻法也成了傳統，尽管条件早已改变。例如，腊格倫勳爵在 6 月 18 日就曾仿效威灵頓的老方法，大家都知道，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結果。辛普森不但沒有从腊格倫的失敗中吸取教訓，反而认为不仅有必要仿效他，甚至有必要超过他。”——編者注

英軍对大凸角堡进行的这一次可怜的攻击，表明了 in 克里木的英軍將領十分无能。显然，他們生来就有一种比賽犯錯誤的爱好。巴拉克拉瓦会战和因克尔芒会战就是明显的例子。但 6 月 18 日和 9 月 8 日的强攻在这方面还大大地超过了它們。强攻組織得这样草率，以致当英軍控制住大凸角堡的突角时，竟然沒有把火炮鉤住，因而当他們退却时，就和进攻时一样，又遭到这些火炮的霰彈和榴霰彈的猛烈轰击。英軍是否曾企图占領适当的战壕，我們不知道；辛普森和各报的記者都沒有提到这一点。看来連最必要的預防措施也沒有采取。

誠然，对大凸角堡、中央棱堡和小凸角堡的攻击，在某种程度上來說不过是一种佯攻。然而对大凸角堡的攻击也还有一定的独立的意义。占領这一陣地，能立即使攻占馬拉霍夫岡成为定局，因为馬拉霍夫岡由于地勢高而瞰制着大凸角堡，而大凸角堡又瞰制着馬拉霍夫岡的接近地，攻占大凸角堡，就意味着从翼側包圍俄軍为了夺回馬拉霍夫岡而向該地派出的一切纵队。占領馬拉霍夫岡，迫使俄軍放棄了整个南区；攻占大凸角堡，也許至少能迫使俄軍仓卒撤离軍港区，并且使俄軍来不及用射击和爆破的方法进行有效的系統的破坏工作，而現在却正是这种破坏工作保证了俄軍安全的撤退。因而，英軍在一个很重要的地点未能完成他們的盟軍有权期待他們完成的任务。不仅將軍不称职，而且兵士也表現得不如往常。兵士大多数是不久前来到克里木的年輕小伙子，他們千方百計地想隱蔽起来进行互射，而不去进行白刃战。他們的队伍缺乏紀律和秩序；不同的团队混在一起，軍官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几分钟以后，整个机器就失灵了。但是应当承认，尽管如此，英軍在沒有增援部队的情况下，仍在大凸角堡支持了将近两小时，

进行了顽强的消极抵抗；可是，我們到底不习惯看到，英国步兵下降到了俄軍的水平，只在消极的勇敢里面寻找荣誉。

这一天胜利的荣誉属于博斯凱將軍和麦克馬洪將軍。博斯凱指揮法軍的整个右翼，麦克馬洪則指揮攻占并守住了馬拉霍夫岡的那个师。这一天是法軍在勇敢方面真正超过英軍的少有的日子之一。在其他各方面，法軍早已证明自己优越于英軍。我們是否应当由此得出結論說，不列顛軍隊已經退步，它的步兵再也不能夸口說他們成密集队形作战时是世界上最好的步兵了呢？得出这种結論恐怕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地，在克里木的英軍將領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消耗軍隊的体力和挫伤他們的士气；另一方面，不久前才入伍的新兵比以前补充的兵士要差得多。英国人应为此深思；要知道，在三个月內打了两次敗仗，这在英国战史上还是空前的現象。

关于俄軍，我們只能說，他們是以他們常有的消极的勇敢精神作战的，但在为夺回馬拉霍夫岡而进行的攻击中，也表现了高度的积极的勇敢精神。在俄軍的报告公布以前，我們还不能評論他們的战术措施。有一点很清楚：馬拉霍夫岡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失守的。当时全部守軍都在吃午飯，只有守在火炮旁的炮手作了抵御攻击的战斗准备。

如果我們要看看攻占南区以后的情况，那末从哥尔查科夫的报告中可以知道，2万人的联軍部队（国籍未指明）已开往叶夫帕托利亚，并且强大的偵察队也被派去对付拜达尔盆地的俄軍左翼，迫使該地的俄軍前进部队向烏尔庫斯塔，向楚林河（黑河的支流之一）的上游盆地退却。目前在叶夫帕托利亚的一个軍（3万人），力量相当薄弱，不能由該城向較远的地方出动。但可能有增援部队

Krimkrieg: 1854. 14. Sept. Landung bei Solford,

- Sept. 20. Offensiv an Tchernia.
- 25. Kampf bei Alay auf dem Hügel bei Solford & S. Kalkstein.
- 28. Plünder der Hauptstadt / Besatz der drei Festungen mit 8 Btl. in der Hauptstadt
- 1 Ort Lagerung. 2 Btl. für Bombardement der Thürme.
- Oct. 9/10 Erste Parade: 4-600 Mann u. 3 Ordn.
- 17 Bombardement Tchernia / Die Feinde hatten 7 Kanonen, 200 Mann / 126 Btl. (Lagerung) für die u. 2 Kanonen / Die Feinde wurden geschlagen - Thürme jetzt zerstört.
- 25. 1. K. Abalekhan.
- 26. Aufst. d. Hügel, 700 u. 800. d. J. Babinski
- Nov. 4. Kampf d. Alay u. Solford, Angriff
- 5. Kampf bei Solford. Erst übergeben, jetzt Stellung eingestrichelt, nur Truppen u. Wollung stattvoll geg. Aufst.
- Dec. 11. Besetzung von T. Alay durch die Feinde u. Aufbruch.
- Jan. Aufst. d. Solford u. S. Kalkstein, 4000 Mann u. 2 Kanonen, Aufstellung der Feinde.
- 27. Viel Land am Solford u. S. Kalkstein, 1. K. Abalekhan, 1. K. Babinski, 1. K. Solford
- Febr. ab - im Ding 1. März, 1. K. Babinski
- Febr. 22/23 Schlacht bei Tchernia, am 23. wurden die Feinde abgetrieben, 1100 Mann getötet
- 28/11. 2. K. Alay u. S. Kalkstein
- 29/12 - Kanonenschüsse Linienschiffe, 700 Mann, die Feinde wurden mit den Feinden u. S. Kalkstein
- 22/23 Angriff auf Tchernia, 700 Mann, die Feinde wurden mit den Feinden u. S. Kalkstein
- April. Kampf bei Solford, 200 Mann, die Feinde wurden mit den Feinden u. S. Kalkstein
- 15/20. 1. K. Alay u. S. Kalkstein, 200 Mann, die Feinde wurden mit den Feinden u. S. Kalkstein
- Mai. 1. K. Alay u. S. Kalkstein, 200 Mann, die Feinde wurden mit den Feinden u. S. Kalkstein
- 23. Kampf bei Solford, 200 Mann, die Feinde wurden mit den Feinden u. S. Kalkstein
- Juni 7. Thron u. Hauptstadt u. S. Kalkstein, 200 Mann, die Feinde wurden mit den Feinden u. S. Kalkstein
- 18. 1. K. Alay u. S. Kalkstein, 200 Mann, die Feinde wurden mit den Feinden u. S. Kalkstein
- Aug. 16. Thron u. Hauptstadt u. S. Kalkstein, 200 Mann, die Feinde wurden mit den Feinden u. S. Kalkstein
- Sept. 16. Thron u. Hauptstadt u. S. Kalkstein, 200 Mann, die Feinde wurden mit den Feinden u. S. Kalkstein

开到。无论如何，野战行动已经开始。最近两个星期将表明，俄军或者能够守住阵地，或者不得不把整个克里木让给联军。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9 月 28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10 月 13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519 号，并
载于 1855 年 10 月 4 日“新奥得报”
第 46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新奥得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官方財政報告

倫敦 10 月 2 日。我們手里現在有一份关于去年全年、半年和季度的国家收入的官方报告(根据格萊斯頓的新办法,英国的財政年度——包括支出和收入——都以 9 月 30 日為結算期)。报告一方面证明了英国預算中的补充来源的伸縮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根据或然率理論进行結算不是英国財政家的 forte [长处]。收入的純增长額和上一个財政年度比較是 8 344 781 英鎊,和上一个半年比較是 2 929 699 英鎊,和上一个季度比較是 1 924 124 英鎊。如果一方面考虑到在格萊斯頓和路易斯时期稅收的增长,另一方面考虑到稅收的預定增长額和实际增长額不符,那末,这些数字的意义立刻就会发生变化。了解了各个項目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關稅收入全年增加了 1 290 787 英鎊,半年增加了 608 444 英鎊,一个季度增加了 364 423 英鎊。这完全應該归功于茶叶、食糖和咖啡的新稅收。“每日新聞”的資產階級乐观主义需要从这些統計数字中作出工人階級的物质福利在增长的結論。大家知道,格萊斯頓已停止了降低茶叶稅和食糖稅的做法,而这种做法是在 1854 年下院根据他的提案决定实施的。他的继承人路易斯把每公担食糖再增加 3 先令,按照他的估計,就可以再增加 120 万英鎊;每磅茶叶再增加 3 辨士,按照他的計算,就能使關稅收入增加 75

万英镑；最后，每磅咖啡再增加 1 辨士，surplus〔补充收入〕的数目就可达到 15 万英镑。然而关税收入增加的总数在最近一个季度却只有 364 423 英镑，因而还远没有达到食糖税一项的预定增加数的一半。从税收项目中可以看出，咖啡的消费比 1853 年大概下降了 2 %。烟酒税的收入也大大减少了。

消费税的收入在英国被认为是社会下层阶级 comforts〔幸福生活〕的标志。消费税的收入甚至在较好的季度也减少了 266 006 英镑。然而乔·康·路易斯爵士的新的酒类税却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充分地实施了。路易斯指望他的附加税会增加到 100 万英镑。与此相反，他在一个季度内就丢了 266 006 英镑。至于印花税，全年它增加了 100 472 英镑，而在半年内却减少了 48 402 英镑，最近一个季度减少了 103 344 英镑。如果考虑到格莱斯頓第一次实行的遗产税正在充分实施，这就尤其值得注意了。属于这一类（印花税）的邮政收入全年亏空 206 819 英镑，半年亏空 175 976 英镑，最近一个季度亏空 81 243 英镑。地产税的收入全年增加了 6 484 147 英镑，半年增加了 2 195 124 英镑，一个季度增加了 1 993 590 英镑。然而，不应该忘记，格莱斯頓把原来的税率提高了一倍，由此得到的新税收可达 650 万英镑，此外，乔·康·路易斯爵士还实行了每英镑征收 2 辨士附加税的办法，这样可使税收增加 400 万英镑。由此可见，在地产税的收入方面，收入的增加无论如何也不能和税率的增长相适应。

在这里人们对 Crédit Foncier〔土地信贷公司〕、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以及其他波拿巴银行的代理机构或注定要破产的代理机构的舞弊行为和未来的命运还颇感兴趣。不妨回想一下艾米尔·貝列拉和这些机构的其他董事们——老圣西门主义者。这

些先生們始終认为可以拯救世界的是銀行，可能也就是破产。总之，他們认为这是自己拯救自己的办法。如果不談圣西門主义創始人的一般的偉大思想，那末圣西門主义在波拿巴时代是以它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实现的。还能希望什么呢？貝列拉波拿巴是在財政方面的主要騙子手，而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則是“辯論日报”²⁹⁰的主編之一和主要的經濟学家。Habent sua fata libelli〔书都有自己的命运〕。但是偉大的思想也有自己的«fata»〔“命运”〕。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10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10 月 6 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新奧得报”第 467 号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法兰西銀行。——克里木的
增援部队。——新元帅

倫敦 10 月 4 日。英格蘭銀行重新又把貼現率從五厘提高到五厘五。這個措施首先是為了對付 Banque de France [法蘭西銀行]，因為這家銀行在最近六個星期內，利用發給倫敦的並在那裡貼現的期票，把 460 萬英鎊的黃金從英國運到了法國。這裡的交易所盛傳着一些關於 Banque de France 財政狀況的最令人不安的謠言。有些人認為一切硬幣支付將要延期，另一些人認為 Banque de France 的銀行券“為了更加保險起見”，應當得到穩定的擔保。然而這種擔保必然會造成銀行的«run»[“擠兌”]，並使它的銀行券迅速貶值。最後，還有人斷言，Banque de France 企圖用認購的辦法發行新股票來把自己的資本提高一倍。不管這些謠言在細節上是怎樣傳說不一，它們畢竟證明 Banque de France 的處境危急，證明這個從拿破侖第一時代成立起就被認為是不可動搖的、穩固的機構，在拿破侖第三時代不過是一個**翻倒了**的信貸金字塔（而這些金字塔應當看成是他的統治時代的特有的紀念碑）。法國社會有一部分人首先要求的是信貸充足和«prospérité toujours croissante»[“日益繁榮昌盛”]的**假象**，因此，當需要為這個愉快的騙局付出代價的時刻到來的時候，他們是不能抱怨的。總之，財政業

务、交易所詭計和銀行投机，虽然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时代的最后几年造成过真正强烈的印象，并促成了像“高利貸者——当代之王”、“路特希尔德王朝”²⁹¹ 等等的論战性巨著的出現，但是，同1852年到現在这个时期在这个領域內所发生的事情相比較，就算不得什么了。

現在人們正等待着关于把大約 6 000 人用輪船运往克里木去的命令，这 6 000 人中有 800 名炮兵，900 名騎兵，其余的都是步兵。此外，还應該从直布罗陀、馬尔他島、伊奥尼亚群島和比里尤斯抽調 4 000 名左右的步兵送往战区。这些增援部队，甚至加上外籍軍团，也远远不能使英国作战部队达到哪怕是它原来的編制人数。**布萊特**昨天在罗契得尔的群众大会上就这个問題說道：

“如果我拥护战争的話，那末我就要在我們国内的軍事設施方面遵循完全另外一种政策。我就要充分地实行征兵制，就像俄国、奥地利和法国所实行的一样，这样就能促使所有階級的人們都能相应地参与所謂民族事业。”

授予年迈的康伯米尔、斯特腊弗德和哈丁勋爵和伯爵以元帅称号，作为对辛普森將軍(順便說一下，他應該被召回了)在大凸角堡失败的奖励，这不过是帕麦斯顿在上了年紀的时候喜欢用来为自己开心的許多平淡无味的俏皮話和玩笑中的一种罢了。头两位將軍完全可以认为是死人，因而提升他們的职位不如說帶有死后追諡的性质。在他們的尘世生存早已结束后，他們就被列为軍事圣者。哈丁勋爵占据着英国軍队的 *Commandeur en chef* [总司令]这个太过时的职位，由于对阿尔伯特亲王元帅坚决的一貫的奴顏婢膝和逢迎討好，他是完全應該得到元帅杖的。用提升那些已被遺忘了的、曾經和俄国人一起打过法国人的軍官的官銜来庆祝和法国人一起取得的对俄国人的胜利，这样就使得这件事情特別

聳人听闻。例如,斯特腊弗德勋爵的功劳在于:他在滑铁卢战役时指挥过近卫旅,在进军巴黎时,指挥过英军的前进部队,并且在攻占伯利维尔高地和蒙马特尔高地后占领了巴黎。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0 月 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10 月 8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469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軍事行动的进程

从战区傳来了很多新消息。星期六开到的輪船带来了关于在叶夫帕托利亚附近的庫卢魯进行的騎兵战斗的公报（关于这次战斗我們以前曾經談到过），这些公报可以作为对哥尔查科夫的报告补充；关于哥尔查科夫的报告，我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評述。此外还收到一些消息說，俄軍强攻卡尔斯沒有成功，联軍破坏塔曼和法納哥里亚堡，以及联軍在金布恩半島登陆。²⁹²

参加叶夫帕托利亚附近的騎兵战斗的，有法軍的 12 个騎兵連（驃騎兵第四团，龙騎兵第六和第七团）。根据德·阿朗維耳將軍的既清楚又令人信服的报告，法軍和土軍曾沿三条不同的道路——一条由薩塞克湖向南，两条由該湖向北——深入內地进行广泛的偵察。沿后两条道路行进的纵队在多耳沙克村相遇，在那里发现俄軍騎兵正向他們接近。从这一点起双方的报告开始有矛盾。德·阿朗維耳將軍說，俄軍 18 个騎兵連利用法軍下馬和喂馬的时机，企图从南面迂迴他們，切断他們返回叶夫帕托利亚去的退路；于是德·阿朗維耳命令自己的騎兵上馬，冲向俄軍翼側；把俄軍击潰并追击了 2 里約。哥尔查科夫却說，俄軍仅有 1 个团（枪騎兵第十八团），即 8 个騎兵連，正当他們下馬把炮兵連的火炮从前車上卸下来的时候，遭到法軍的突然攻击，于是只好逃走。他把这

一錯誤归咎于科尔弗將軍。为什么一整团的枪騎兵忽然下馬來帮助一个炮兵連从前車上卸下 8 門火炮，以及为什么应当亲自做这件事的炮手班当时却不在場，——这就要由我們自己来猜想了。哥尔查科夫的整个报告写得含糊不清，不像一份軍事报告，而且竭力为騎兵的第一次失敗辯解，因而很难认为这是一份认真地陈述事实的材料。同时我們看到，哥尔查科夫把这次失敗的責任推卸到科尔弗將軍身上，就像他把錫利斯特里亚失敗的責任推卸到謝耳万身上、把因克尔芒失敗的責任推卸到索伊蒙諾夫身上以及把黑河失敗的責任推卸到列阿德身上一样。哥尔查科夫本人尽管在每次战斗中都遭到失敗，却依然是一位常胜將軍。不是他打了敗仗，决不是的；每次都是有某一个倒霉的下級指揮官由于某种严重錯誤而破坏了統帅的英明的計劃，并且通常都是罪有应得地死在战斗中了。然而这一次犯了严重錯誤的將軍却不走运，他还活着。可能，这位將軍今后会对哥尔查科夫的报告提出些什么意見来，而目前他不得不用这一点安慰自己，就是敌人关于他的行为的說法比他那位永不会犯錯誤的統帅的說法要好得多。这次战斗以后，为了增援法軍，英軍一个輕騎兵师已开往叶夫帕托利亚。

另外两次远征是在克里木战区的极东和极西两翼进行的。其中一次是由刻赤和叶尼卡列出发而到达海峡对岸，破坏了塔曼和法納哥里亚这两个不大的要塞，繳获火炮約 100 門；这样，联軍就完全控制了阿速夫海的入口。这一行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它的直接結果并不能产生严重的影响。

另一次远征具有較大的意义。載有約 1 万部队的联軍舰队，首先在敖德薩附近进行佯动，但一炮未发，随后就开往金布恩。金布恩位于一个砂咀末端附近，該砂咀从南面环抱着德涅泊河和布

格河所形成的一个大河口灣。河口灣在这里寬約 3 英里，入口处有一淺灘，根据最好的海图标示，該灘水深仅 15 英尺。河口灣入口处的北面是奥查科夫，而南面就是金布恩。这两个要塞都是在 1787 年俄土战争中第一次出名的，那时布格河是两个帝国之间的界綫，所以奥查科夫屬土耳其，金布恩則屬俄国。在那次战争期間，苏沃洛夫指揮俄軍的左翼（俄軍总司令是波将金），駐守金布恩。当时在黑海称霸的土耳其人，从奥查科夫橫渡河口灣的入口处，最初在金布恩城的东南登陆，企图轉移苏沃洛夫的注意力，但确信这一伴动沒有能够使苏沃洛夫迷惑以后，就用主力在奥查科夫正对面的砂咀西北端登陆。他們在这里挖掘了战壕，向要塞攻击，但是苏沃洛夫用比土軍少得多的兵力出击，打了一仗，在增援部队的协助下把土軍赶下了海。后者損失惨重。苏沃洛夫本人在这次战斗中負伤；一年以后，即在 1788 年，俄軍对奥查科夫进行了强攻。

这一次联軍不是在金布恩城的下方，而是在它的上方离城約 4 英里的地点登陆，企图切断該城同赫尔松和俄国内地的陆上交綫。他們的炮舰大概很快也能把海上交通綫切断。砂咀在金布恩城以北 6 英里的地方是很窄的；它像阿拉巴特砂咀一样，地勢很低，又是砂质土壤，以致战壕只挖到几英尺深就出水。因此在那里要迅速构筑带深壕的强大工事是不可能的；土耳其人在 1787 年构筑的工事都是些防栅或沙袋圍起来的炮台。由于同样的原因，金布恩的工事也不可能是很坚固的，因为不可能为石质內岸建立牢固的基础；但从俄土战争以来，那里无疑地曾挖掘了一些灌滿着水的寬壕。虽然这样，我們仍认为，金布恩如果受到联軍强有力的攻击，是不能够坚守多久的。联軍攻下金布恩，就有可能向赫尔松和

尼古拉也夫方向，也就是向克里木俄軍的作战基地的方向采取重要的軍事行动。因此，这次登陆可能是很重要的，如果在登陆之后随即采取相应的行动的話。然而，到輪船开出时为止，还没有傳來任何关于坚决行动的消息，这使我們得出一个結論，即联軍是以他們慣有的那种慢条斯理的习性来进行这一次远征的。

俄軍在卡尔斯城郊的失敗，很可能是結束阿尔明尼亚战局的事件。土軍組織很差，缺乏作战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他們在这个作战地区担任着一个可怜的角色。他們沒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防守卡尔斯、埃尔斯倫以及这两个要塞附近的一些地方。在土軍中服务的威廉斯將軍指揮着卡尔斯的守备部队，并領導他們构筑了适当的防御工事。在夏季的大部分時間里，双方的战斗行动只限于互射、破坏性的襲击和到山区搶收馬秣的进軍。总的和主要的結果則是：俄軍逐漸前进，包圍了卡尔斯，甚至切断了它和埃尔斯倫之間的交通綫。卡尔斯的位置是在通往阿腊克斯河上游地区的一个横方向的盆地內；埃尔斯倫位于幼发拉底河发源地附近；巴士姆則位于乔罗赫（巴提斯）河口，該河支流的上游流經卡尔斯和埃尔斯倫附近地区。因此在这两个城市之間有一条道路是从埃尔斯倫沿乔罗赫河流域通到沃耳特城，然后經過山区折向卡尔斯。沃耳特是土軍的一个中心点，因为来自巴士姆的一条道路同上面談到的那条道路在这里相交，而巴士姆則是可以指望派出最大量的增援部队的最近的地点。俄軍如果能够攻占卡尔斯，他們首先就会在沃耳特巩固自己的陣地，从而切断埃尔斯倫同黑海和君士坦丁堡之間最近而且最好的一条交通綫。但是土軍的斗志已經这样消沉，以至于退到了埃尔斯倫，仅仅控制着幼发拉底河上游和阿腊克斯河发源地之間的一条山道，而沃耳特則完全沒有設防。

最后，当卡尔斯周围已形成紧密的包围圈的时候，土军企图在沃耳特组织运粮队，使它在强大兵力的护送下突入卡尔斯。一部分骑兵已由卡尔斯派出，因为骑兵在那里没有用处，他们实际上是且战且走地穿过俄军占领的地区而到达沃耳特的。在这以后不久，就从沃耳特派出了运粮队。可是这次俄军早有戒备。土军全部被击溃，粮食被俄军截获。这时卡尔斯已经感到粮食不足。奥美尔-帕沙被派往亚洲，以便担负起指挥的责任，并且在巴士姆组织一支能进行野战的军队。然而，建立一支新的军队需要很多时间，而且经过沃耳特去解救卡尔斯，并不是奥美尔-帕沙所能够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因为在援军开到之前，卡尔斯的守军随时都可能由于粮食不足而被迫投降。

这就是土军在9月底所处的困难境地。卡尔斯实际上被认为是已经失守了的，而且俄军并不怀疑，仅仅用封锁的办法就足以迫使该城守军由于已经开始了的饥饿而投降。可是，看来俄军并不打算等到卡尔斯的守军吃完最后一袋面粉和最后的一匹马。他们可能是由于害怕即将来临的冬季，担心道路变坏和粮食不足，也可能是由于接到上级命令，或者由于惧怕奥美尔-帕沙的部队，因而突然决定采取坚决行动。他们从距卡尔斯数里约的边境要塞亚历山大罗波尔运来了攻城炮。在进行了几天的接近壕作业和轰击以后，俄军主力在穆拉维约夫指挥下开始强攻卡尔斯。激烈的战斗继续了8小时。在野战中往往一见俄军就逃跑的巴希布祖克和非正规步兵，这次在比较有利的地形上作战。虽然攻城的兵力看来比守军兵力多3—5倍，但是突入城内的一切企图都没有成功。土军在这次战斗中终于又表现出了勇敢和机智。俄军虽然好几次占领了土军的炮台（大概是些背面敞开并能遭到第二道防线射击

的眼鏡堡)，可是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巩固下来。据说，他們的損失是惨重的，——土軍掩埋了 4 000 具俄国兵的尸体。但我們必須在收到更詳細和确实的消息后，才会相信这一点。

至于奥美尔-帕沙的行动，他現在有两种选择：或是沿乔罗赫河經沃耳特进军，給卡尔斯解圍，这样，他就有到达过晚而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危險，因为他要率领他的軍队在阿尔明尼亚高原上行动，俄軍在那里可以凭借坚固的要塞綫抵御积极的正面攻击，而奥美尔-帕沙又不可能向俄軍翼側进行攻击；或是沿里昂河进军到庫泰依斯，然后翻过山岭进入庫拉河盆地，向梯弗里斯方向前进。这里，他不会遇到比較坚固的据点，但却能立刻威胁俄国在高加索南部的統治中心。这是迫使穆拉維約夫退出阿尔明尼亚的最好的办法。本报讀者大概还記得，我們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只有在这一个作战方向上行动，才有可能給俄国在亚洲的势力以有力的打击。这一进軍的适当的作战基地可以选在列杜特-卡列，但該地沒有安全的港灣，所以奥美尔-帕沙选择了苏胡姆-卡列，因为那里有良好的港灣，沿岸地区有比較方便的道路。在目前季节里开始在那里采取重大的行动是否已經太晚，我們不久就会知道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10 月 19 日
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11 月 5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53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俄国军队

在西方列强和俄国之间宣战的时候，英法报刊曾认为，俄国不会感到兵员不足，然而很快就会感到财力不足。他们估计，财政上的困难会削弱军队，使数百万的兵员（据说俄国在任何时候都能拿出这些兵力来对付敌人）难以调动。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虽然俄国在形式上被赶出了欧洲的一切大交易所，但是它却毫不费力地得到了贷款²⁹³；它虽然一再增发纸币，但是纸币并没有贬值；它的军队在行军期间，以那种只有在纯粹农业国里才可能采用的方式从居民方面得到了粮食和运输工具。尽管它的港口被封锁，但是到目前为止，它始终能够避开财政上的一切暗礁，而伦敦的聪明人会断言它会碰上这些暗礁的。至于说到取之不尽的兵员，实际情形则完全不然。当英国采取在国内外招募志愿兵的办法而逐渐使它在克里木的军队增加到近4万人的时候，当法国仅在今年就征召了14万人而不是8万人，并且已经能够向东方派出人数甚至超过佩利西埃作战所需的一支大军的时候，俄国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呢？在所有抽丁地区，已经两次普遍征兵，每次的比例大致是每1000名男丁中征10人，以后又普遍征召非常后备军，每1000名男丁中征23人，现在又颁布了为基干部队重新普遍征兵的法令，每1000名男丁中征召10人。平时的征兵比例，是在帝国的一

半地区內平均每 1 000 名男丁中約征 5 人，另一半地区則在下一年度征兵。这样，整个帝国（不抽丁的省份当然除外）每年平均的征兵比例，是在每 1 000 名男丁中征 2.5 人。可是，两年来的战争已迫使俄国在每 1 000 名男丁中共征召 53 人，約占全国人口（包括男女居民）的 2.5%。可見，近两年来，每年的征兵数等于平时征兵数的 10 倍。假定法国在宣战后的两年中共征兵 30 万人（这无疑是超过实际数目的），这在 3 600 万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 $\frac{1}{120}$ ，每年的比例則为 $\frac{1}{240}$ ，也就是說，剛好是俄国已經不得不征召入伍的人数的 $\frac{1}{6}$ 。誠然，在平时，俄国每年征兵数約占全国人口的 $\frac{1}{900}$ ，法国則約占 $\frac{2}{900}$ 。但是由于俄国的現役期比法国的服役期长一倍多，所以就完全抵銷了征兵比例上的差異。

我們从各方面听說，俄国已开始感觉到这样不断抽出男劳动力的影响，而法国却几乎还感觉不到这一点。据报道，在波兰尤其感到农业方面人手不足；这一事实的另一个证据，就是貴族对于不断抽走他們最强壮的农奴一事表示了很大的不滿。一位显赫的貴族兰斯科伊被任命为內务大臣，他向貴族們发布了一項公告²⁹⁴，宣布亚历山大皇帝已用特別法令保证貴族的一切权利和特权，这就說明，农奴主中間的这些不滿情緒的征兆已經使宮廷感到多么惊慌。

然而，这种接二連三的征兵的最令人惊奇的一个特点，是軍队的实际人数增加得并不多。假定抽丁地区內的男丁总数为 2 200 万人（这无疑还是偏低的估計），那末两年来应征編入基干部队的不少于 66 万人，編入非常后备軍的不少于 56 万人。誠然，非常后备軍只实行了局部动員，大概为 20 万人；这样，实际抽出的男劳动力約为 86 万人。那些在服役期最后 5 年或 10 年归休而在战争爆

发前征召入伍的预备役兵士，也可以加在这个数字内；但是，他们大部分在 1853 年就已征召入伍，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把他们列入计算数字以内。

尽管有组成每个步兵团的第五营和第六营的这些预备兵员，尽管征召了 66 万新兵（其中一部分编入每团的前 4 个基干营，另一部分则分配到新编的第二期后备营，即各团的第七和第八营），但是很多部队还远没有补齐自己的编制名额。这方面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证据，是南方军团司令利迭尔斯将军在尼古拉也夫发出的一项命令。他宣布，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附属南方军团的 23 个非常后备军大队^①（23 000 人）应即编入基干部队，补充每团的第三营和第四营。但是这一措施仅能表明，南方军团所属的各团已经大量减员，因而需要把第三营和第四营的大部分兵士调到第一营和第二营，而他们空出的位置则由非常后备军的兵士填补。换句话说，在得到非常后备军兵士的补充以前，这些团的 4 个营的人数只勉强相当于 2 个满额的营。大部分人员还从未见过敌人、所有的部队从锡利斯特里亚会战以来一直没有参加过战斗的这样一支军队如果还减员这么多的话，那末，在克里木以及在亚洲的损失又该有多么大！俄国军队的真实景象就突然暴露在我们面前了。这使我们能够对俄军的损失作出一个估计，并且使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征召入伍的 66 万多人并没有使军队人数有显著的增加。

但是，这样巨大的、不相称的损失是由于什么原因而造成的呢？首先是在于新兵要进行长途行军：他们必须从居住地点走到

^① “大队”一詞在原稿上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字。——編者注

省会，然后走到分配站，最后走到自己的团队，——他們到达团队以后的行軍还不算在內。从皮尔姆行軍到莫斯科，从莫斯科行軍到維尔諾，最后从維尔諾行軍到敖德薩或尼古拉也夫，这对于新兵來說，的确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既然这种迢迢万里的强行軍是按照像尼古拉这样一个人的最高旨意来进行的，他准确地規定了到达的时间 and 出发的时间，并且对任何違背命令的行为都予以懲罰；既然这些旅、师、軍都是急如星火地从帝国的一端被赶到另一端，而不顾有多少人由于疾病和疲憊而掉队；既然需要用一般的强行軍速度从莫斯科走到皮列柯普，而这种强行軍在其他国家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从来不持續到两天以上的，——那末，巨大損失的原因就可以找出来了。除了兵士体力过度緊張以外，还要看到一点，就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俄軍主管部門的各个环节、特别是軍需部門的管理工作恶劣所必然造成的混乱現象。同时应当注意到兵士在行軍期間的給养方法，他們的給养是尽可能依靠沿途各地的居民来解决的。如果組織得好，这种方法在一个純农业国里是完全适用的；但是在像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由于軍需部門和指揮官都把从农民那里征来的一部分备用品貪污自肥，这种方法就不可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而且还会造成极大的困难。最后，还須估計到在下列情况下必然会发生的严重的計算錯誤，即軍隊散布在这样广闊的空間里，它們必須按照中央的統一命令运动，并且需要像钟表一样准确地执行这些命令，而这些命令所依据的一切前提却又都是錯誤的和沒有根据的。1853年的俄軍几乎已全部从地面消失，却未能使敌人遭到相当于自己損失的三分之一的損失，造成这一可怕的事实的原因，不在于敌人的刀劍和子彈，不在于南俄罗斯許多地方无法避免的疾病，甚至也不在于使俄軍大大減員的

长途行軍，而在于俄国兵士应征、受訓、行軍、操练、飲食、衣着、居住、接受指揮以及作战等所处的那些特殊的条件。

利迭尔斯將軍最近的命令在另一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这个命令公开承认，非常后备軍的兵士完全沒有作好对敌作战的准备。他劝老兵不要嘲笑新兵，不要因为新兵在队列中的动作不灵而輕視他們；这个命令承认新兵几乎沒有受过队列訓練，并且对操典也作了一些看来完全得到皇帝贊同的修改。不要拿沒有用处的閱兵式教练来引起兵士的“反感”；只应当訓練兵士做最必需的动作，即：持枪、装彈、瞄准、射击、成纵队运动以及成散开队形运动，——其余的一切都被宣布为沒有用处的閱兵式教练。就这样，一位俄国將軍在皇帝的直接贊同下，指責整个俄軍操典有三分之二是无用的蠢話，这些蠢話只能引起兵士对自己职务的反感。而这部操典却剛好是已故皇帝尼古拉所特別引以自豪的杰作！

每一个姿势和步伐都会引起伙伴們一陣大笑的“年輕的新兵”，在任何一个別的国家里都不能算作是新兵的。他們入伍6—10个月，却依然和剛放下犁耙时一样的不灵敏。不能借口說，长途行軍使他們沒有時間进行訓練。拿破侖在他最后几次战局中，都是把剛經過两个星期訓練的新兵編入相应的各个营，随后就把他們派往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他們在行軍期間，無論在途中或在宿营地，都受到訓練；當他們經過6个或8个星期的行軍而編入部队时，已經被认为是适于执行勤务的兵士了。拿破侖把他的新兵訓練成兵士，从来沒有用过3个月以上的時間；即使在1813年，当他不得不建立一支新的軍隊、培养新的軍官干部以及建立其他一切的时候，他的新兵从到达分配站后只經過3个月的時間，就被他帶上了薩克森的戰場；而他的敌人很快就知道了，他对这些“粗野

的新兵”已經做了些什么。在法国人的迅速适应环境的能力和俄国人的笨手笨脚之間有着多么大的差别！这是俄国非常后备軍軍官无能的一个多么好的证明！而利迭尔斯竟声称，几乎所有这些軍官都在軍隊中服务过，而且其中許多人还聞过火药味呢！

訓練仅限于一些最必要的动作的操练这一点还表明，利迭尔斯对他的新增援部队的期望是什么。成散开队形和成纵队运动——这就是兵士受訓的全部内容；根本沒有正面展开，也根本沒有由橫队变成纵队的动作。俄国兵的确最不适于成橫队运动，正像不适于成散开队形运动一样。他們的长处是成密集纵队进行战斗，在这种战斗队形中，指揮官的严重錯誤引起的混乱最小，对会战的总进程的影响也不大，同时，勇敢但却被动的人群的合群本能可以弥补指揮官的过失。俄国兵好像草原上被狼追逐的野馬一样，混乱地挤成一团，不易机动，无法控制，但却能坚守自己的陣地；敌人要費极大的力气，才能把他們打垮。然而，無論如何，橫队在許多場合仍是必需的，甚至俄軍也采用它，虽然不太經常。如果一支軍隊根本不会展开成橫队，或者費了很大力气展开成橫队以后，却不能再变成纵队而不引起全盘混乱，那末对它还能期待些什么呢？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11 月 2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11 月 16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548 号

卡·馬克思 傳統的英国政策

关于英国輝格党人的对外政策，广泛地流行着一种极其錯誤的看法，仿佛他們始終是俄国的誓不两立的敌人。历史清楚地作了相反的证明。在“第一个馬姆茲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的日記和通信集”中（此人过去在輝格党和托利党执政时期当过几年英国駐圣彼得堡宮廷的大使），以及在約翰·罗素勋爵出版的“查理·詹姆斯·福克斯的回忆录和通信集”²⁹⁵中，我們发现了揭露輝格党政策的令人吃惊的材料。福克斯正是这种政策的鼓舞者和策划者，他一直是輝格党人的最高政治謀士；輝格党人对他的尊敬并不亚于土耳其人对穆罕默德的尊敬。因此，为了了解英国一向是怎样討好俄国的，我們不妨簡略地提一下在福克斯进入內閣以前所发生的事情。

从馬姆茲伯里伯爵的日記中我們知道，在美国独立战争²⁹⁶时期，英国就迫不及待地竭力向俄国施加外交压力。英国大使受命无论如何要同俄国訂立进攻和防御同盟。女皇的答复一开始就是模稜两可的；叶卡特林娜认为“进攻”这个字眼本身是不受欢迎的；她认为必須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最后，英国的外交家才明白，全部問題在于俄国希望它的反对土耳其的計劃事先得到英国的支持；哈里斯向自己的政府建議，如果它想在反对美洲殖民地这方面

保证自己能得到俄国的援助，那就要鼓励俄国的野心。

次年，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提出的建議就比較温和了；他不再力求和俄国联盟。英国将对俄国的一个以海軍力量为后盾的、可以压制住法国和西班牙的抗議感到滿意。女皇在答复时宣称，她沒有充分的根据来采取这种步驟。英国大使諂媚地、奴顏婢膝地劝說道：

“只有十七世紀的俄国君主才会这样說，但是从那时起俄国已成为欧洲的領導强国，因而欧洲的利益也就是它的利益。假如彼得大帝看到俄国舰队和英国舰队結成联盟，那他就不再认为自己是第一个俄国君主了”

——如此等等。

女皇对这种奉承表示賞識，但拒絕了大使的建議。过了两个月，即在 1779 年 11 月 5 日，英王乔治用旧式法文給自己的“姐姐夫人”——女皇亲笔写了一封信。他已經不坚持要求正式的抗議，而对于一般地表示一下抗議就感到滿意了。

英王写道：“只要帝国的部分舰队出动一下，就足以恢复和保持欧洲的和平；已形成的反英同盟就会立即消失。”

一个大国如此低声下气地請求援助，过去有过这样的情形嗎？

但是，英国的所有这些諂媚的話，都沒有达到目的，在 1780 年俄国宣布了武装中立。英国只得温順地把苦水往肚子里咽。为了減輕它的苦味，英国政府預先宣布，俄国商船不会受到英国巡洋舰的阻拦或扣留。这样，英国沒有受到任何一点压力就放棄了檢查外国船只的权利。在这以后不久，英国外交家又向圣彼得堡內閣保证：不列顛的軍艦不会对女皇臣民的商务活动进行阻撓。而在 1781 年，詹姆斯·哈里斯爵士认为，英国海軍部对俄国船只經常給英国的敌人运送造船材料一事佯装不見，以及每当这些船只誤

被扣押或阻拦时海軍部为这种阻拦付出可观的賠償費，这是海軍部的功劳。为了說服俄国放棄中立，英国内閣使用了一切手段。例如，斯托蒙特勋爵給駐圣彼得堡的英国大使这样写道：

“能不能利用女皇的虛荣心，把某种重要的东西，或某种对她的舰队和貿易有利的东西让給她，从而促使她援助我們鎮压我們的叛乱的殖民地呢？”

哈里斯回答道，把米諾尔卡島让出来，可以作为这种誘餌。1781年，确实打算把米諾尔卡島让給叶卡特林娜，但是这个礼物被她拒絕了。

1782年3月，福克斯进入了内閣，他立刻向駐倫敦的俄国大使声明，英国准备开始和荷兰談判(上届内閣根据承认航行和貿易自由的1674年条約向荷兰宣了战²⁹⁷)，并且打算立即簽訂停战协定。福克斯指示哈里斯，要他把这个步驟当做英王对女皇的願望和意見重視的证明。但是福克斯不局限于这一点。在一次大臣們的會議上决定向英王建議，命他向俄国大使(大使的官邸离王宮不远)示意，英王陛下希望更进一步了解女皇的意图，希望和圣彼得堡宮廷建立最密切的关系，并把中立宣言作为两国間的協議的基础。

在这以后不久，福克斯辞职了。他的继承者格兰瑟姆勋爵证实：圣彼得堡宮廷之所以比較諒解倫敦，是由于福克斯的政策的结果；当福克斯重新进入内閣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思想：和北方的强国結成同盟应该是每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的政策，而且必須一貫遵循这个政策。他在一封給哈里斯的信中提醒哈里斯說，和圣彼得堡宮廷的友誼对大不列顛來說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并且声称，当他在政府里第一次短期任职时，他就抱有一个崇高的目的，即向女皇证明，英国内閣何等真誠地力求遵循她的意見和博得她

的信任。福克斯竭尽全力爭取和俄国結成联盟。他說服英王給女皇写信，請求她諒察英国的事务。

1791年，福克斯(当时他是反对派)，在議會里宣称：

“在英国議院里，談到俄国日益强大，就像談到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一样，这听起来是很奇怪的。20年前英国把俄国船只引进了地中海。他(福克斯)劝告过英王不要阻碍克里木归并俄国。英国支持了俄国在土耳其廢墟上建立它的大业的意图。如果对俄国在黑海的日益强大表示妒嫉，那是不明智的。”

在进行这些辯論的时候，伯克(当时他是輝格党人)指出：

“把土耳其帝国看做是欧洲均势的組成部分，那是很奇怪的。”

伯克——英国各党派公认他为英国国家活动家的榜样——在他的政治生涯快結束的时候，越来越經常而坚决地发表过这类見解；后来这些見解被那位继承了党内領導地位的有名的輝格党領袖所支持。

格雷勋爵在他执政时期(1831年和1832年)，曾利用討論对外政策的机会表示过这样一种信念：俄罗斯帝国并吞土耳其对土耳其本身是有利的，并且能促使欧洲繁荣昌盛。难道那时的俄国不及有人向我們描繪的現时的俄国那样野蛮嗎？难道那时候它不是像現代輝格党人所描述的那么可怕的令人厌恶的专制国家嗎？但是英国自由派的国家活动家仍然不仅向俄国卑躬屈膝，乞求和它結成联盟，而且还鼓动它去实现那些現在为人們所严加斥責的阴谋。

卡·馬克思写于1855年12月28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1856年1月12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4597号

弗·恩格斯 亚洲战争

我們逐漸知道了卡尔斯陷落的詳情²⁹⁸；而到現在这些情况完全证实了我們不止一次地談过的关于土軍在小亚細亚处境的估計。現在再也不能否认：这支軍隊由于土耳其政府的懈怠和土耳其人的极端懶惰、迷信命运和行动笨拙而不断地瓦解了。不仅如此，現在已經暴露的事实完全足以证明，甚至在土耳其是习以为常的这种直接叛变，对于卡尔斯的陷落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还在去年的战局剛剛开始的时候，我們曾有机会向讀者描述了土軍在埃尔斯倫和卡尔斯的絕望处境，并且談到了造成这种境况的那些大規模的盜窃行为。集中用来防守阿尔明尼亚高原的，有两个軍（小亚細亚軍和美索不达米亚軍）和叙利亚軍的一部分。这些軍都得到了預备部队（預备营）的加强，它們是人数众多的庫尔德和貝都英非正規部队的核心。但是，在 1853 年和 1854 年中，从阿哈尔齐赫会战起到巴雅澤特会战止的四五次失敗的会战，已使这支軍隊的团结精神和士气受到挫伤，而冬季的缺衣缺粮更使它遭到彻底的毁灭。一伙形形色色的匈牙利和波兰流亡者（其中既有冒險家，也有值得尊敬的人物）聚集在这支軍隊的司令部里，虽然他們并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在无知的、爱嫉妒的和阴險的帕沙們的眼里，这些冒險家被看做是头等专家，而流亡者中真正有

用的人却被看做是冒险家；结果争名夺利和互相倾轧之风大盛，因而使全部流亡者声名狼籍，使他们的威信几乎完全扫地。以后来了英国军官，他们受到了莫大的尊敬，像对待盟国政府的礼节所要求的那样；而在土军指挥官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这是很自然的。这些军官曾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在阿尔明尼亚作战的部队的士气，但是也没有成功。他们经过努力之后，有时也能使某一帕沙从无所作为的状态中暂时振作起来，争取到在卡尔斯构筑最必要的防御工事，并且偶尔也能防止某种令人气愤的贪污行为或者甚至通敌密谋，——但也不过如此而已。去年春天，威廉斯将军曾竭尽全力为卡尔斯建立最必要的粮食储备，但总是碰到障碍。土耳其的军需部门事先没有考虑到可能被围，没有注意准备马匹运送储备品。等到发现有足够的馱子时，它又认为用馱子运送苏丹的物品有损苏丹的体面，等等；结果，卡尔斯这个距俄军居姆里的要塞只有两天行程的阿尔明尼亚的重镇，没有一点粮食，不得不在附近地区寻取粮食。弹药的情况也是这样。虽然围攻实际上并没有进行，——9月29日是整个封锁期间双方真正作战的唯一的一天，——可是在9月29日俄军攻击以后，守军的炮弹就大约只够3天用的了。运给军队的医药箱里装了各种陈旧物品；而为了外科医生查伤和截肢，竟由君士坦丁堡运来了产科器械！

卡尔斯的情况就是这样。由士气沮丧的安那托里亚部队组成的守军，9月29日能在物资极端缺乏的情况下作如此拚命的抵抗，以后又不顾饥饿坚守了那么久，这是土耳其历史上功罪相抵的事例之一，这种事例在目前战争中层出不穷。正是使上层人物漠不关心和无所作为的那种宿命论，在群众中产生了这种顽强抵抗的精神。这是那种曾经使伊斯兰教的旗帜由麦加城插到西班牙、一

直到普瓦提埃才被阻²⁹⁹的尚武精神的最后残余。它的进攻力量虽然消失了，但是残余的防御能力依然存在。依托要塞围墙和垒墙进行抵抗的顽强精神是土军的特色；如果认为所以有这种顽强精神是由于那里有欧洲军官，那末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1854年和1855年在卡尔斯和锡利斯特里亚曾有过欧洲军官，但是1829年在瓦尔那、布莱洛夫和锡利斯特里亚并没有他们，可是土军当时却建立了同样英勇的功绩³⁰⁰。欧洲军官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纠正错误，加固多面堡，统一防御体系，预防直接叛变。但是不管有没有欧洲人，兵士个人的勇敢精神总是一样的；在卡尔斯，甚至在几乎完全瓦解的安那托里亚部队里也不缺乏这种勇敢精神。

在这里我们应当对那些曾在卡尔斯防御战中起过显著作用而目前却在梯弗里斯当战俘的英国军官的功绩作一个评价。毫无疑问，他们为准备抵抗做了很多工作；在加强城防并供给一切可能提供的物资方面的全部功劳也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还克服了帕沙们死气沉沉的无所作为的状态，领导了9月29日的防御战。但是，像英国报刊现在所做的那样，硬把9月29日的胜利和整个防御战的光荣完全归于他们，把他们描写成一群英雄，说他们为了土耳其人而牺牲自己，可是在危险的时刻怯懦的土耳其人却抛下他们不管，那是荒谬的。在俄军强攻时，他们位于前列兵士之间，这一点我们不想否认。英国人生性好斗，因此英国军官在战斗中的最多而且最常见的错误，正是他忘记了自己作为指挥官的职责，而像一个普通兵士那样作战。他这样做时，深信会得到自己同胞们的热烈称赞，可是在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里，军官这样行动却会由于缺乏自制力而有降级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土耳其兵士对自己的军官临危逃跑的情形已经司空见惯，以致在战斗正酣的时候，很

少想到还有什么军官或命令，而是碰到哪里，就打到那里；因此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注意到身旁还有几个英国人正在极力表现自己的勇敢，更不会因此而受到鼓舞。此外，卡尔斯工事的平面图是绘制得完全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得到9月29日强攻的消息后的第二天就详细地指出来了，我们当时所作的判断完全为英国政府公布的官方的工事平面图所证实。因此，只能用法国谚语来评价英国军官在卡尔斯的功劳，这就是“瞎子国中，独眼称王”。许多没有真才实学的、并且在法国陆军少尉考试中落第的人，在印度支那就很可能被看做是一员大将；如果英国军官在本国以不通本行而出名，那末他们在土耳其服务时，就未必会突然变成知识渊博而具有军事才干的人物。我们认为，克美蒂应受的称赞不应低于卡尔斯防御战的其他参加者。

卡尔斯的情况就是这样，而这时埃尔斯伦的情况又怎样呢？十来个年迈的帕沙在那里衔着烟管消磨时光，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担负着某种责任，完全没有认识到卡尔斯的困难处境以及敌人就在德韦-博荣山岭的那一面，相距仅数天行程。几千正规部队同为数不多的非正规部队一起徘徊不前，从来不敢攻击敌人，并且一发现敌人前哨就立即退却。他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援救卡尔斯，因此卡尔斯全城都在挨饿，而埃尔斯伦的部队甚至不敢以佯动来支援它。威廉斯将军大概明白，他从这方面是得不到什么援助的。至于他收到了关于奥美尔-帕沙移动顺利的哪些报告，他得到了什么诺言，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传说威廉斯曾决定在万不得已时率领守军穿过俄军的队伍突围，但是我们怀疑，这样的计划是否认真考虑过。那里的山地只有很少几条山道可以通向埃尔斯伦，这就给俄军提供了一切有利条件；如果俄军坚守那里的几条隘

路，那末这样的计划就不能实现。况且那里海拔 5 000—8 000 英尺，冬季来得很早，而且长达 6—9 个月，在这样的地区，到 10 月底军队就无法调动了。如果卡尔斯能够支持到冬季，那末守军中正規部队 6 000 人的伤亡同长期防御所赢得的时间相比就是微不足道的。集中了土军在阿尔明尼亚的一切储备物资的埃尔斯伦，几乎没有工事，因此如果赢得时间，就可使它在 1856 年 5 月前有安全保障；同时，俄军可能取得的真正的好处，也只限于实际上占领那些位于卡尔斯-查伊河附近和阿腊克斯河上游附近的居民点而已，而这些居民点是不可能从俄军手中夺回的，纵然卡尔斯守军成功地冲往埃尔斯伦也是如此。埃尔斯伦几乎没有设防，因此即使卡尔斯守军在 10 月中旬能到达那里，也仍然没有充分的力量守住它。要守住这个不设防的城市，就只有扼守德韦-博荣山岭，在城市前面的狭谷里进行会战。因此，埃尔斯伦是由于卡尔斯守军的坚守而得救的。

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奥美尔-帕沙当时能不能援救卡尔斯。对于这个问题，几乎在东方的每一个欧洲记者的回答都不一样。甚至现在，有些人还企图把卡尔斯的陷落完全归罪于奥美尔-帕沙，然而正是这些人不久前还对他备加赞扬。首先，必须注意到，实际上奥美尔-帕沙并非出自本意地被留在克里木，以致在入冬以前采取较大规模的行动，已为时过晚。以后他为了确定自己的作战计划而来到君士坦丁堡时，又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同各种各样的阴谋作斗争。最后，当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英军答应运输工具却没有给他；当土军集中在巴士姆附近、以后又集中在苏胡姆-卡列附近的时候，他们没有粮食，没有弹药，也没有运输工具。很难设想，奥美尔-帕沙在这种情况下能直接援救卡尔斯。

我們已經知道：在明格列里亚远征时，他沒有一次敢离开海岸超过两三天的行程，而那时他还是沿着很好的俄国軍用道路行进的。但是，假如他經埃尔斯倫或阿尔达汉去卡尔斯，他就必須在离开海岸远达 20 天或 12 天行程的地方沿河床和山道行进，而且除用馱馬外就无法运送物品。从特拉比曾德到埃尔斯倫的商队沒有其他的道路可走，而他們从来不使用馬車这一事实最好地說明了他們是在什么样的地形上行进的。一般說来这就是現在唯一的可以通行的道路；至于所謂由巴士姆通向內地的道路，究竟有沒有还是个問題，因为沒有大批人馬沿这些道路行走过。責备奥美尔-帕沙沒有直接向卡尔斯进軍的那些聰明的軍事評論家，应当先讀一下游历过这些地方的人所写的报道，例如柯尔曾或博登施泰特的游記³⁰¹。至于倫敦“泰晤士报”所說的，威廉斯將軍曾建議奥美尔-帕沙把巴士姆作为直接向卡尔斯进軍的出发点一事，我們只能指出，威廉斯对于他居住多年的阿尔明尼亚知道得非常清楚，他还不致于出这样的主意。

在目前条件下，奥美尔-帕沙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也只是威胁俄軍通向卡尔斯的交通綫。他能怎样順利地做到这一点，决定于他自己的部队的运动性如何以及与它对抗的俄軍的兵力有多少。我們不談第一个問題，因为它只能根据已有的事实来判断；我們一开始就說明，对这支进攻部队來說，俄軍的兵力很可能太强大了。我們原来对別布托夫現有兵力所作的、現在看来完全正确的估計表明，俄軍甚至在庫泰伊斯稍微变更一下部署，就可以派出优势兵力对付土軍。他們也正是这样做了。即使在移动順利的条件下，奥美尔-帕沙也无法使自己的部队渡过里昂河。况且，供应迟緩而且不正常一开始就使奥美尔-帕沙的全部行动发生困难。每經過两

三天行程，他便不得不几乎停留一个星期来建立最必要的粮食储备；最后当他向内地前进到距列杜特-卡列尚有三天行程时，他就完全瘫痪了。这时奥美尔-帕沙碰到了比较强大的部队，他只得向沿岸地区退却，俄军尾随于后，不断袭击他的后卫。由于同敌人遭遇和发生疾病而遭到严重困难的土军，曾在沿岸地区露营，现在正前往巴士姆、特拉比曾德等地。明格列里亚除岸防炮台以外又落入了俄军手中。

俄军在亚洲的第三次成功的战局就这样结束了：卡尔斯及其帕沙辖区被攻占了；明格列里亚从敌人手里解放出来了；土军作战军队的最后残余部分——奥美尔-帕沙的军队——在数量和士气方面都大大削弱了。对于像高加索西南部这种由于地形性质和缺少道路而必然使一切战斗行动迟滞的地区来说，这是相当重要的战果。如果把这些胜利和实际战果同联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南区、刻赤、金布恩、叶夫帕托利亚和高加索沿岸地区的几座堡垒等这些战绩加以比较，那就会很清楚地看出：联军的战果实际上并不像英国报纸所吹嘘的那样大。最值得注意的是，巴黎“立宪主义者报”的一篇在法国宫廷授意下写的文章中，直接指名道姓地说雷德克利夫勋爵是亚洲失利的祸首，指责他不仅妨碍土耳其政府获得盟国所拨给的经费，而且还慫恿它迟迟地不把指定用于这一战区的援军派出去。

弗·恩格斯写于 1856 年 1 月 11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6 年 1 月 25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60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

西方列强在对俄战争中所采用的作战方法完全失败了。今年的战局,如果要进行的话,也决不能按照过去所执行的那个计划来进行。集中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的全部兵力去对付克里木的一个地点,而这个地点本来是可以迂回的办法顺便夺取的;争夺这个地点整整 11 个月之久,而结果仅攻占了它的一半;如此忽视用其他一切可能的方法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以致使俄国能够攻占卡尔斯,从而弥补了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丧失,——在交战双方的要害地区由于中欧的中立而得到屏护的战争中,是可以这样进行一两次战局的。但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刚在巴黎召开过的军事会议³⁰² 最清楚地证明:只要战争一般还继续进行,我们立刻就会看到一场真正的战争。

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这一战争,是一种被异常的礼貌所缓和的、官样文章似的敌对行动。我们这里指的不是打着军使旗进行互相交往时所应有的礼貌,而是交战双方的军事会议本身对敌人所表现的礼貌。战争的起因是由于俄皇尼古拉的失算。他绝没有料到,法国和英国会联合起来反对他对土耳其所打的主意;他原打算只同苏丹进行一场小规模平静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能够使自己的军队重抵君士坦丁堡城下³⁰³,使欧洲外交界在为时已晚的

情况下惊动起来，最后，使他自己的外交官像往常一样，可以在各种会议上取得比自己的军队用武力所能夺得的还多一倍的东西。但不幸得很，俄国和西方列强却因此而出乎意外地、事与愿违地、不知不觉地被拖入了战争，尽管它们谁也不愿意打仗，但却不得不这样做。然而双方都希望采用估计不致使对方采取极端手段的作战方法。人们本来期望，这场战争将是维护原则的战争，它多少会带有革命的性质，德国及其附属国——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都会参加这场战争。西方的 *ultima ratio* [极端手段，最后办法]，是挑起被压迫民族即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的斗争，并在某种程度上挑起德国内部的斗争。俄国的 *ultima ratio*，则是宣扬泛斯拉夫主义，实现欧洲斯拉夫居民中的狂热分子在近五十年来所梦寐以求的理想。

但是，无论俄国政府或路易·波拿巴政府（更不用说帕麦斯顿）非万不得已都不愿意采取这样的手段，因此战争便在相互宽容和谦恭的基础上进行，这在旧日王朝正统君主的相互关系中也未必是常见的，而在罗曼诺夫王朝、汉诺威王朝的代表和假波拿巴之流这样一些暴发户和僭位者之间，当然更是不常见的了。战争几乎没有波及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联军从未企图在那里建立坚固的立足点。同白海的情形一样，那里私有财产所受到的威胁要比国家财产受到的大得多；尤其在芬兰沿海一带，英国舰队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使芬兰人顺从俄国的统治。联军在黑海的活动也是这样。联军被派到那里去，似乎就是为了迫使土耳其人期待俄国入侵；根据联军从 1854 年直到今天的所作所为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联军在土耳其最无可非难的时期就是他们驻在瓦尔那的那一段时间，那时他们无力做什么有益的事情，除了使自己受到损

失以外，至少沒有使任何人受到严重的損害。最后，他們开赴克里木。在那里他們非常巧妙地作战，以致俄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對他們表示十分滿意。不久前，劍橋公爵給从克里木归来的法国兵士分发了大量奖章；但是俄国政府無論用任何奖章、十字章、大十字章、星章和綬帶，都不能表达出它对 1854—1855 年各次战局的領導者所应有的感激。实际上，到俄国守軍放棄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时候，联軍已死伤 25 万人，并耗費了数百万金錢。在平地战斗中每次都打敗仗的俄軍，却以他們的决心、毅力和他們的工程长官^①的技巧胜过了敌人。如果說因克尔芒会战是俄軍洗刷不掉的耻辱，那末，俄軍在敌人眼前、在薩蓬山和馬美朗筑起的多面堡，便是英軍和法軍的洗刷不掉的耻辱。还有一点也很清楚：塞瓦斯托波尔沒有耗尽俄軍的兵力就像沒有耗尽联軍的兵力一样，因为它並沒有妨碍俄軍攻克卡尔斯。

卡尔斯的陷落的确是联軍的最大耻辱。联軍在海上拥有巨大的兵力，从 1855 年 6 月起陸軍人数也超过了俄国的作战部队，但是却从来沒有襲击过俄国最薄弱的地点——南高加索領地。不仅如此，他們还听任俄国人在这个地区建立某种像总督管区的独立作战基地，这种基地在遭到优势兵力进攻时，甚至在与俄国本土的交通綫被切断时，也还能支持一段時間。但是联軍还不以此为滿足，并且不从土軍 1853—1854 年在亚洲遭到的一連串失败的沉痛經驗中吸取教訓，却阻撓奧美尔-帕沙的部队去挽回亚洲的局勢，把他們留在克里木，而且在克里木也只讓他們給自己的部队劈柴和提水。因此，从刻赤海峽到巴士姆的整个沿岸地区的俄軍据点

① 托特列本。——編者注

被完全消灭以后，也就是說，在可以找出 10—15 个据点作为作战基地向高加索和南高加索（我們經常指出，这是俄国最薄弱的地方）采取各种行动的那一綫被占領以后，联軍沒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发现卡尔斯陷入困境而埃尔斯倫的部队又不能有所作为时为止。到这时才允許奧美尔-帕沙进行他那倒霉的明格列里亚远征，可是要挽回頹势已經晚了。

联軍頑固地把全部兵力集中在一个不比长島大的半島^①上，这无疑帮助他們避开了一切不愉快的問題。無論民族問題，泛斯拉夫主义問題，中欧所造成的困难問題，或是夺取領土的必要性問題都沒有提出来；双方都沒有取得会迫使对方同意作出巨大牺牲因而可能使即将举行的談判发生困难的重大的决定性的战果。可是对于直接参加作战的人來說，这一切远不是那么愉快的。对于他們，至少对于上士以下的人，战争是严峻的现实，是冷酷的事实。自有战争以来，还从来没有像这次克里木战争那样，把如此光輝夺目的勇敢精神濫用在取得极不相称的战果上；还从来没有为了获得如此可疑的胜利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牺牲这么多优秀的兵士。显然，要使軍队再忍受这种苦难是不可能的了。他們需要比空虛的“荣誉”更实在的战果。一年只进行两次大会战和四五次总攻，而且老停留在一个地方，像这样的战争决不能再繼續下去。任何一支陸軍对此都不能长久忍受。任何一支海軍都不能忍受像过去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两次战局那样毫无成就的第三次战局。战争如果繼續下去，那就会像我們听說的那样，联軍将攻入芬兰、爱沙尼亚和貝薩拉比亚；瑞典軍队会答应帮忙，奥地利方面也会答应助

^① 指克里木的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半島。——譯者注

威。但有消息說，俄国已同意把奥地利的建議作为談判的基础³⁰⁴，虽然这远沒有解决媾和問題，但总算有了結束战争的可能。

由此可見，新的战局可能不会发生；如果它一定会发生，那末可以預料，它将会有更大的規模和更大的成效。

弗·恩格斯写于 1856 年 1 月 18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56 年 2 月 4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616 号

卡·馬克思

英美冲突。——法国的局势³⁰⁵

1856年2月8日星期五于倫敦

除了官方报界中的一些卖身投靠的先生以外，看来，在英国誰也不会相信英美冲突³⁰⁶的严重性。有些人把它看作是一种故意用来轉移对和平談判注意力的巧妙手段。另一些人則断言，帕麦斯顿将在辞职后力求做到相互召回大使，就像皮特在簽訂亞眠和約³⁰⁷前所做的那樣，以便在重新用得着真正的英国大臣时，他好东山再起。根据論战进行的情况来看，一些十分有远見的人认为，所有这一切不过是通常的总统^①竞选花招而已。民主派报纸认为这是对挑起大西洋两岸的盎格魯撒克逊人的內战感到滿意的波拿巴的幕后活动。然而所有的人完全确信，不論官方的言論何等尖銳，都不会有軍事冲突的絲毫危險。显然，建議自己的主子对旧世界、也对新世界作个和事佬的法国官方报纸“立宪主义者报”也持有这样的观点。

在評述这一冲突时不应忽視的一个主要情况，就是英法之間的 entente cordiale [誠意协商] 实际上几乎完全停止了，英国报界也或多或少地公开承认这一点。例如，倫敦“泰晤士报”，不久前

① 皮尔斯。——編者注

它还宣称现在的波拿巴是一个比真正的拿破侖更偉大的人物，并提出要赶走所有不承认这条教义的心怀恶意的人。可是现在它的一篇社論却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签订和約的唯一障碍是波拿巴在这个問題上所表现的过分的热心。在这篇文章以后又出现了另一篇文章，它暗示这位“上帝所选定的工具”，归根到底不过是 pis aller [在最坏场合下] 使用的工具，法国社会之所以要使用它，只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国家能給以信任和尊敬的人”。在第三篇文章里，“泰晤士报”把整个大本营包括將軍、大臣和大小官員等等痛罵为一群形形色色的交易所强盜。英国地方报纸的言論就更沒有分寸了。另一方面，請注意法国报纸已經改变了的腔調，它們对俄国的一味奉承討好，这同它們对英国抱有矜持的厌恶态度形成了鮮明的对照。也請注意一下奥地利、比利时和普魯士的报纸发表的有利于建立統一的大陆同盟的十分明显的威胁。最后，我們来看看俄国的报纸，它在鼓吹和平时故意只談法国，而几乎沒有提到英国。

“北方蜜蜂”写道：“地平綫上出现了为文明社会的一切朋友所欢迎的和平长虹…… 在同四个强国进行战争的这两年内，俄国人民充分地显示了自己崇高的和高貴的性格，甚至博得了敌方人民的尊敬…… 至于法国，那末可以肯定地說，全体法国人民是热爱和尊敬俄国人的，他們欽佩俄国人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在克里木短时的休战期間和俄国俘虏通过法国的时候——都表现了对俄国人的同情。而俄国人对待法国俘虏也就像对待兄弟一样。”³⁰⁸

布魯塞尔的“北方报”直接指出，波拿巴一开始就鼓励奥地利出面調停，它打算一有机会便放棄和英国的联盟。

因此，既然和法国的联盟很可能一下子就变成了和这个国家的破裂，那末显而易見，仍然和俄国处在战争状态的英国就不会准

备同美国打仗，所以这两国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除了上面已谈过的情况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意义。

欧洲的和平决不能认为是有保证的。至于谈到盟国向俄国提出的条件，那末接受这些条件的事实，也未必能看做是俄国方面让步的表现。对俄军占领卡尔斯（在这以后，彼得堡的一家报纸就可疑地把卡尔斯称为俄国的一个省）所持的顽强的沉默，大大补偿了在貝薩拉比亚的让步：让出某块以一条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的神秘山脉作记号的土地。同时，俄国巧妙地利用停战和事态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其他机会，在一切最重要的地点集中武装力量，很可能是想继续进行战争。然而，对波拿巴说来，无论如何签订和约已成为迫切需要的事了，这种情况倒是和平的可靠保证。因为，一方面，他缺少继续进行战争的资金，另一方面，“在法国内部”，就像蒙塔郎貝尔所说的进行罗马远征那样³⁰⁹，再进行一次克里木远征的必要性已经成熟。

在俄国接受初步的媾和条件前不久，在巴黎非常广泛地流传着波拿巴打算发行强制性公债的说法，这种公债必须按直接税的数目的比例进行分配。法军在克里木的状况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他的国库是空虛的。不久前记者们就指出了佩利西埃的军队的凄惨处境。一位不列颠士官于1月5日从塞瓦斯托波尔寄给“北明翰报”一封信，信中作了如下的真实描写：

“今天一早就是一个好天气。三点钟左右刮起了猛烈的北风，天气变得十分寒冷，我们不得不很快地扣上了全部钮扣。我们的兵士并没有因寒冷而受苦，然而可怜的法国人却很令人同情。他们成天从塞瓦斯托波尔给自己搬运燃料，他们穿的衣服很坏，我猜想，他们吃得也比我们坏。白天他们总有人在徘徊着寻找面包干。我们的兵士很可怜他们，对他们也很好。我们的哨兵

曾得到不准放他們进入营地的命令，因為他們有些人喜欢出卖白兰地酒，有时就会引起我們兵士的酗酒行为。但有时候可怜的法国人躲开了哨兵，而潛入到 bono Inglis [善良的英国人] 当中来。当然，我們的兵士知道他們需要什么，所以从来不讓他們空着手回去的。这些可怜的人們甚至沒有取暖的手套。从夏天以来，給他們增添的唯一东西就是一頂縫在大衣領上的風帽和一付粗呢的、用几条小皮帶裹在膝盖上的护腿套。他們不穿袜子，而靴子呢，他們曾經有過。的确，法国人成了貧穷的化身；他們也感到这一点，特别是當他們看到不列顛兵士們戴着暖和的海豹皮的帽子，穿着呢子的皮大衣，頸上和腰部圍着寬大的圍巾和腰帶，脚上穿着堅固的長統牛皮靴的时候。”

由此可見，如果拿破侖使軍隊（軍隊對他來說就是一切）處在上面所描寫的那種狀況，那末他的財政狀況確是够慘的了。另一方面，這兩年進行戰爭所花費的代價，比他的伯父在 1800—1815 年期間的全部出征費用還要昂貴，這一事實也證明了財政管理狀況是怎樣的了。據說，甚至從克里木回來的波拿巴的將軍們也憤慨地指責莫爾尼之流依靠軍隊發財的無耻勾當。這些抗議曾經發表在一家半官方的報紙上，其中寫道：

“如果將來簽訂了和約，皇上就會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財政問題上去，特別將注意在投機狂的情況下極其廣泛流行的一些營私舞弊行為，例如會注意兼任一些不能兼任的職位和某些十分迅速地得到大量財產的情況。”

同時，在青年大學生中間，在工人階級中間，在一部分資產階級中間，以及波拿巴認為最糟糕的是在軍隊里，都出現了傾向革命的跡象。

關於 Ecole Polytechnique [高等綜合技術學校] 事件³¹⁰，大家知道，波拿巴起初是考慮同學校妥協的，雖然他對 12 月 29 日大學生們表現的頑強沉默十分惱怒，因為當時他正在對軍隊扮演羅

馬元老院的角色（正像他喜欢对自己的元老院扮演羅馬皇帝的角色一样）。他让大学生們知道，如果在—給他們机会时他們就表示对他的王朝的好感，那末皇上就会保存他們的学校。然而 Ecole [高等綜合技术学校] 通过自己的代表对这一点的回答是：大学生們不仅不会喊 «Vive l'Empereur!» [“皇帝万岁!”]，而且还要从学校里赶走任何一个敢喊这种口号的同学。随着这个答复而来的就是关于封閉这个无政府主义学校的决定。一部分被指定去服兵役的大学生，将被送往文森，那里将建立一所簡陋的炮兵学校。另一部分被派給民政部門的大学生，将被送到 Ecole Normale³¹¹ 去。而校舍本身将改成兵营。这所拿破侖皇上所喜爱的学校落得的下場就是这样。

馬扎斯監獄挤滿了巴黎大学的学生和其他的年輕人，因為他們在雕塑家大卫的葬礼上曾高呼：«Vive la liberté!» [“自由万岁!”] 有一个与反对尼扎尔的示威游行事件有关的情况特別使波拿巴感到不愉快。一些大学生由于尼扎尔把提比利烏斯頌揚为羅馬社会的救主而对尼扎尔喝倒彩，在警察的襲击下，这些大学生被捕了，沒有被捕的大学生就排了队，通过了巴黎全城，来到庫尔謝尔大街的尼扎尔家門前，要求他釋放他們的同學。在大学生后面派来了一队步兵，他們几乎和大学生同时到达那里。大学生对兵士高喊«Vive la ligne!» [“軍隊万岁!”]，兵士們就立即听任形勢“自由”发展并且拒絕采取行动。为了防止兵士和大学生进一步結合起来，就立即把他們調走了，换来了一批 sergents de ville [警察]。大学生的游行队伍直奔奧德昂剧院，他們占了正座并且不停地高声唱着«Sire de Franc Boissy» [“弗兰·布瓦西先生”]，当着坐在包廂里的波拿巴和欧仁妮的面高唱最带侮辱性的諷刺歌。

波拿巴的报纸承认，在各省逮捕的人数达 5 000 人；根据其他方面的消息，这个数字是 15 000 人，看来，这个数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现在查明，工人們的这次密謀³¹²也扩展到了军队。因此，不得不完全解散拉弗勒舍的士官学校和全部調換駐扎在法国中心的卫戍部队。为了鎮压军队中的叛乱情緒，波拿巴又一次重复王朝复辟时期最冒險的試驗，即在军队中普遍建立間諜系統。由于建立这种新的可敬的军队，馬尼揚元帅和一些高級軍官之間发生了一场十分激烈的爭吵，因为这些高級軍官认为，这样做是不合军队的口味的。

在严重的事件到来以前，巴黎的工人运动往往是以唱 quod libets〔祝願歌〕为标志的，他們最喜爱的是下面一首歌曲：

«Voilà qu'il part, voilà qu'il part
Le petit marchand de moutarde,
Voilà qu'il part pour son pays
Avec tous ses outils» etc.①

为了不让“卖芥末的小販”指的是誰这样的疑問存在，警察禁止人們唱这首歌。

根据“北方报”上登載的一件趣事，也可以判断波拿巴的机关是被尊重到何种程度了。有一些参議員毫不犹豫地贊同德魯安·德·路易斯先生的拒絕接受参議員称号的行为，然而他們却不认为仿效他的榜样是明智的。有人問莫尔尼，他們中間是否也会有

① “他就要走了，他就要走了，
卖芥末的小販，
他就要回到自己的故乡
带着自己的全部东西”等等。——編者注

人仿效这个榜样，他回答说，他有充分的根据认为不会这样。“然而这是些什么样的根据呢？”——交談者又問他。莫尔尼泰然自若地回答道：“我有三万条有力根据，每条值一个法郎。”

还可以指出在法国人民目前处境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沒有必要再来談論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对他们來說战争与和平同样是有利的。法国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对以前所一直迷恋的«la gloire»〔“光荣”〕表现了冷淡。1848年革命的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結果无可爭辯地证明，波拿巴主义的繁荣时代已經过去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2 月 8 日

載于 1856 年 2 月 25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63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SATURDAY, APRIL 4, 1858.

卡·馬克思 小波拿巴法国³¹³

“像偶像那样鍍了金的”^①小波拿巴法国为祝賀蒙蒂霍生儿子而大摆喜庆筵席，把国家財富揮霍在令人耻笑的排場上面；这个法国同那个在凱恩受尽折磨，在拉姆別薩吃尽苦头，在貝耳島要塞里弄得筋疲力尽³¹⁴和飽尝苦役滋味的法国，同那个在克里木遭到餓死威胁的法国，同那个瀕于破产境地的法国本土的法国，形成一种非常可怕的对照。

从塔西利埃公民的信中（这封信是根据原文逐字逐句譯出来的³¹⁵），讀者可以看到被流放到凱恩的法国公民的令人感触极深的真实遭遇。可是，那些以真正英国式的卑躬屈节而著称的报刊，却以夸張的华丽詞句向沉寂的世界喋喋不休地宣揚关于薩托里兵营灌腸英雄³¹⁶的寬大无边和簡直是超人的仁慈的重大消息，因为他宣布大赦，使数千名获得自由而重返家园的法国人所发出的欢呼声压倒了他自己的任性的嬰兒的最初的啼哭声。

然而我們暫且不談諂媚者卖身投靠的狂喜心情，而来听听那些收买不了的事实的表白吧。布斯特拉巴³¹⁷表示願意让那些被

① 莎士比亚“亨利八世”第一幕第一場。——編者注

他折磨了4年之久的人們得到自由，条件是他們必須同意蒙受洗刷不掉的耻辱，同意穿过沒落帝国的 *furcae Caudinae*³¹⁸。如果他們能宣布自己忠順地服从帝国，即贊同 *coup d'état*〔政变〕而放棄共和国，如果他們能出卖自己的灵魂，那末布斯特拉巴願意把他們的生命卖給他們。

“通报”說：“早在帝国庄严地宣告成立时就发出了这个寬大的号召。”这样一来，“通报”自己就坦率地承认了，目前被吹嘘为惊人消息的大赦，只不过是4年前所玩弄的陈腐的无耻把戏的重演而已。善于收买人心的天才滿怀着这样的希望而自慰：他的受害者如今被降低到他本人的水平，他們变得十分馴服，以致他們在1852年当作侮辱而憤怒地加以棄絕的东西，在1856年却把它当作恩典来接受了。

“通报”用巧妙地編造出来的虛假材料来掩飾它对卑鄙行为的“寬大号召”。該报断言，在1848年六月事件以后被判处流放阿尔及尔的11 000人中，由于总统的仁慈，在非洲只留下306人。但是根据我們所掌握的同一家“通报”的材料，我們断定，在1848年6月被捕的11 000人中，到同年11月，即在 *Assemblée Constituante*〔制宪議會〕討論流放法令执行情况的时候，只留下1 700人，其中1 500人被送到貝耳島要塞。1849年3月8日，在奧·巴罗內閣执政时期，1 500人中間有700人被送到非洲的崩港。因此，布斯特拉巴的恩典，就是把这最后的数字700名縮减到306名，而决不是像它的好撒謊的“通报”所說的，是11 000人这样一个大数目，而这个微不足道的恩典本身只不过是用来反对制宪議會的一种手腕而已。然而我們应当感謝“通报”，因为它使法国想起了卡芬雅克和資產階級共和国所干的丑恶的殘暴行为。

至于談到被放逐的十二月受害者，同一家“通报”肯定他們的人数为 11 201 人，并断言現在已縮減到 1 058 人。然而，仅仅在下阿尔卑斯、埃罗、瓦尔和涅夫勒等省份，就有 11 000 多人是 coup d'état [政变] 的受害者，而目前被判处放逐或服苦役的至少还有 12 000 人。大家都很清楚，因 coup d'état 而受难的人在 5 万名以上。其次应当指出，“通报”的“寬大号召”仅仅是对那些被送到阿尔及利亚和其他海外領地的人发出的，它絲毫沒有提到在翁热判罪的人，以及因参加秘密协会而被关入監獄的那些人；它也不涉及 1851 年被巡迴軍事法庭判服苦役的那些人、貝耳島的囚犯和因嘲罵布斯特拉巴所豢养的辯護士而被捕的大学生等等。作为弥补不足，“通报”宣布对盜猎者、走私者、偽币制造者、小偷、逃兵、苦役犯以及 id genus omne [类似这些人] 实行完全的絕對的大赦。同沒落帝国的性质以及假波拿巴过去的所作所为完全相适应，儿子的誕生，对于所有同父亲相似的敗类來說，应当是一件喜事。

現在我們不談 coup d'état 的受害者，而来談談它的工具，不談反对它的人，而来談談实现它的奴才，不談自由的兵士，而来談談克里木的軍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征兆是：尽管波拿巴迷醉于新建的王朝和在进入腐敗的合法王朝的香气襲人的行列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他仍然需要得到他的不幸的受害者的承认，因此，他假仁假义地力爭他們順从帝国。然而下面的事实也是一个同样显著的历史諷刺的例子：正当十二月十日会³¹⁹的首脑和成員們为庆祝 coup d'état 胜利而在巴黎大摆筵席大肆揮霍的时候，强使法国接受这种令人厌恶的統治的軍隊，正在克里木遭受貧困、飢餓、作垂死掙扎和以最可怕最痛苦的形式死亡为自己贖罪。

在东方战争初期，即自 1854 年 11 月至 1855 年 3 月，人們把

十二月的爆发戶捧为第二圣灵，用种种方式頌揚光荣帝国的了不起的軍事管理制度，并把它同因国内的預謀叛变和陈腐制度所产生的必然后果而使不列顛軍队遭受的可耻災难相对照。然而，在这方面以及在沒落帝国的其他一切行为中开始着手实现的东西，只不过是為了直接取得舞台效果而故意弄成的戏剧幻影而已。波拿巴用了两年的时间专门进行备战。他把龐大的中央集权的法国的力量全部动員起来，以便保证自己的軍队^①获得初步的胜利。的确，甚至斯特拉斯堡和布倫的这位可怜的冒险家在自己的极恶劣的統治的头两年內也未能摧毁第一次革命所遗留下来的法国軍队的卓越組織，这原是不足为奇的。可是他在这一次战争的头两年却终于做到了这一点，这应当认为是一个奇迹。他消耗在他的老鼠与青蛙之战³²⁰上的錢財比拿破侖大帝在他 15 年的伊利亚特中的总开支还多，这样他在第三年初就发现法国已經民穷財尽，它的軍事管理制度已經千疮百孔，軍队由于貧困而正在縮減。腐蝕法国軍队的毒瘤——偷窃財物和盜用公款——是沒落帝国的固有原則；只用了两年功夫，它的毁灭性作用就显示出来了。

法国軍队的悲惨状况不仅在法国报刊上而且在英国报刊上都被細心地掩飾起来。現在到处都在大談这个秘密。在波拿巴的私人报纸“通报”辟謠以后，这个秘密就真相大白，用不着再爭論了。本文只須从“泰晤士报”駐塞瓦斯托波尔記者的最近一封来信中摘出一段話就足以說明問題：

“法国軍队不管在公文上怎样被形容为一支人数众多的軍队，但是它的

① 卡·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在这个字的后面还写着：“这支軍队在当时是被他篡夺的政权的主要支柱，但它还没有显示出自己的力量。”——編者注

人数却在非常可怜地日益减少，因为坏血病和寒热病正在蹂躏着它的队伍。不久以前，我计算了一下，法国军队每天要减少 170 人……现在法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的军队每天要死亡 120 人，有时候还多得多。在拜达尔盆地的法军右翼遭受的灾难最大……天气要暖和了，疾病会更加厉害起来……法军病员之多将是骇人听闻的……法军人数减少得十分快，就像在最残酷的围攻时期由于炮弹和射击而造成的伤亡情形一样。”

记者认为，法国人受苦的主要原因是：缺少有顶篷的住房，缺少外衣，给养不足。记者描绘了严酷的寒冷情况，说“在板房里，桶内的水结成的冰有 3 英寸厚”，暴风雪几乎连续不断，“只有少数板房没有遭到大雪的侵袭”，然后记者问道：住在帐篷（不是周密地具有一切必要设备的板房，也不是在周围用土培好的双层帐篷，而是单层的没有遮掩物的帐篷）里的法军怎么能挺得住呢？最后他写道，“碰到法军运送病员时，简直是惨不忍睹”，佩利西埃元帅不努力设法减轻病员的痛苦，却花费更大的力气把他们隐藏起来，不给不列颠军队看见。

此外，我们还要从“晨报”上摘一段话来说明这种情况。这家报纸在祝贺 1851 年波拿巴登台执政这一点上，是同“晨邮报”共享卑鄙的特权的，它至今还赞扬帕麦斯顿勋爵，说他是一位真正的英国大臣：

“在黑河的法军兵营里有 3 000 个病员，行军医院挤满了病人，医务人员队伍由于疾病和极度惫困而日渐缩小，军需部门完全陷于混乱状态，不能供养军队，人们简直在向前哨兵士讨面包干吃。因缺乏植物性食物而引起的坏血病和因缺乏肉类而引起的伤寒病特别猖獗；两国军队之间的对照是造成法国兵士公开不满的根源。运输工具不足，无法把病员运送到君士坦丁堡去（在当地的医院里已经有 12 000 多个病员了），流行病是真正的灾难，因此而造成的死亡率是骇人听闻的；从东方驶抵马赛运输船只挤满了寒热病患

者，載着伤寒病人的船只正在开往弗利烏尔檢疫所。”

对于人数正在迅速减少的这支军队应当怎么办呢？^①难道用关于阿尔及利亚王“誕生”³²¹的阿拉伯神話，或者对于在謹慎的英雄身旁的嬌嫩的近卫軍所穿着的綉金制服作一番描繪，来安慰他們嗎？应当記住，法国兵士是不会像英国人那样容忍侮辱的。如果需要证明的話，可以举出在拉德茨基那里起“通报”作用的“米兰报”所提到的下列事实：在法国军队里，有人不止一次地图謀枪杀佩利西埃將軍。同时也不要以为，法国本土的基干团会是克里木悲剧的冷眼旁观者。巴黎警察已經开始在营房里进行圍捕了。被召回到巴黎以其外貌鼓舞群众热情的朱阿夫兵，現在已被当作不可靠分子而調离首都了。其他两个从克里木回来的团也被調往地方上去了。近卫軍和基干团之間的对立日益尖銳，因为波拿巴目前正在建立几个人数相当多的新的近卫团，以便这个享有特权的軍团在沒有基干部队的情况下也能担当起巴黎的警备勤务。波拿巴收买了军队，从而引起了军队和国家之間的对立，他現在企图在军队內部收买军队，这种試驗是够危險的了。

如果要全面地描述財政状况（我們不想把財政状况說成是这位非凡的阿基里斯的脚后跟，因为这个脚后跟实在太大了），就需要写一篇專門的論文。这里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說明問題：虽然有价值证券最近已經跌价，但是随着宣布締結和約和新波拿巴的誕生，人們曾經自然而然地預料它們必然又会漲价。但这一点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實現的。不仅政府下了命令，可以自由使用現

① 卡·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句话不是这样写的，而是：“对于这些怀有不滿情緒的、因軍需部的无能、可耻的疏忽大意和公开偷盜行为而造成不断死亡的军队，应当怎么办呢？”——編者注

有的国家資金来收购国家有价证券，而且 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以及迅速成立起来的与此类似的波拿巴信貸机关接連两天在加紧收购有价证券。虽然采取了所有这一切手段，但是在宣告“誕生”的时候，证券沒有漲价，反而下跌了，并且一直在往下跌。波拿巴大为恼怒，就禁止在交易所出售一切有价证券，除非按政府牌价买卖，后来又命令警察局傳訊交易所的主要經紀人。

据說雅典娜·帕拉斯的雕像在帕德嫩神殿上跌倒这件事，是雅典共和国的不祥之兆。那末波拿巴的半身像在犹太教堂（这里規定着对政府的市場价格和貼現着人民的历史）的台座上搖晃不定，就預示着进行证券投机交易的帝国即将垮台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4 月 1 日
左右

載于 1856 年 4 月 5 日“人民报”
第 205 号，署名：卡·馬·；并作
为社論載于 1856 年 4 月 14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67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并根据
“紐約每日論壇报”校对过

卡·馬克思

卡尔斯的陷落³²²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3 月底—4 月

載于 1856 年 4 月 5、12、19 和 26 日
“人民报”第 205、206、207 和 208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同时发表在 1856 年 4 月 8 日“紐約
每日論壇报”第 467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并根据
“紐約每日論壇报”校对过

—

卡尔斯的陷落是虛假的对俄战争史上的一个轉折点。沒有卡尔斯的陷落,就不会有五項条款³²³,就不会召开會議,就不会有巴黎条約³²⁴,一句話,就不会有虛假的和平。此外,假如我們根据政府自己的藍皮书³²⁵ (尽管藍皮书的内容殘缺不全,省略得歪曲了事实并且用捏造来粉飾和修补)能够证明,卡尔斯的陷落一开始就是帕麦斯顿勋爵的内閣所預見到的,而且是它事先所系統安排好了的,——假如我們能够证明这一点,那末幕布将被揭开,充滿着各种惊人事件的东方战争的悲剧就会冲破至今还在外交上被用来籠罩着它的那片烟雾而呈現出来。

1855年5月底,威廉斯將軍告訴雷德克利夫勋爵,而雷德克利夫勋爵又轉告克拉倫登勋爵:

“大量俄国軍隊,包括步兵 28 000 人,騎兵 7 500 人,火炮 64 門,正在向居姆里集結。同时,穆希尔也得到了敌人企图进攻卡尔斯的消息。而我們在这个营垒中有步兵 13 900 人,騎兵 1 500 人,炮兵 1 500 人以及野炮 42 門。”

一星期后,即 6 月 3 日,威廉斯告訴克拉倫登:

“目前卡尔斯守軍的粮食可以維持四个月,我希望中央政府和盟国尽快向剩下的这些部队表明:沒有完全忘記他們。”

这份报告 (見卡尔斯文件第 231 号) 是在 6 月 25 日送到唐宁街的。因此,英国政府在这一天就已經知道: 如果不去援助卡尔斯,卡尔斯就会在 10 月 3 日失守。于是政府就根据这种情况确定

了下一步的行动。

7月11日，克拉倫登勳爵收到了威廉斯將軍于6月15、17和19日发出的三份报告。这三份报告接連說明在前哨已发生了小战斗，6月16日俄軍对营垒的一次正規攻击已被土軍英勇击退；最后，俄軍向营垒作了側敌行軍，并且在距离土軍最薄弱的陣地只有一小时行軍路程的地方驻扎了大批軍隊（3万人）。威廉斯在最后一份报告的結尾写了如下的一段話：

“很遺憾，我們沒有非正規騎兵…… 敌人已經局部地切断了我們与埃尔斯倫之間的交通綫。”

当君士坦丁堡收到这些消息时，雷德克利夫勳爵正在博斯普魯斯应邀出席在总理大臣的宮殿里举行的會議。土耳其大臣們建議支援卡尔斯，从列杜特-卡列派遣远征軍取道庫泰依斯前往格魯吉亞，远征軍由下列各部分組成：

| | |
|------------------|--------|
| 維維安將軍的部队····· | 20 000 |
| 比特桑將軍的部队····· | 3 000 |
| 巴士姆的一部分守备部队····· | 12 000 |
| 阿尔巴尼亚兵····· | 2 000 |
| 从保加利亚調来的部队····· | 5 000 |
| 埃及正規騎兵····· | 800 |
| 突尼斯騎兵····· | 600 |
| <hr/> | |
| 总 共····· | 43 400 |

土耳其政府同意由英国人指揮这次远征，由維維安將軍担任指揮官职务。关于这个建議，克拉倫登勳爵在7月11日就知道了。7月12日，雷德克利夫又給他补发了一封电报：

“可能举行的远征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如果您能立即来电告知政府是

否同意这次取道列杜特-卡列和庫泰依斯向格魯吉亞的大規模的牽制行動，那末，就可以節省許多寶貴的時間。”

在6月25日至7月12日這個期間，英國政府是了解卡爾斯岌岌可危的處境的，但是它袖手旁觀，沒有去支援這個要塞，甚至連一封電報也沒有打過。可是，自從決定要打亂土耳其的任何一個支援卡爾斯的計劃那天起，英國政府突然表現積極，大肆活動。7月13日（見卡爾斯文件第248號）克拉倫登給雷德克利夫發出一封急電，內容如下：

“女王陛下政府認為，比較明智的是派增援部隊去土耳其軍隊的後方，而不是派遠征軍去俄國軍隊的後方。增援部隊可以先派到特拉比曾德，然後從那里再開赴埃爾斯倫。從特拉比曾德到埃爾斯倫的距離比利杜特-卡列到梯弗里斯的距離要短些，而且所經過的道路在盟國境內而不在敵國境內。在埃爾斯倫，軍隊將要遇到的是準備給予援助的朋友，而不是對抗的敵人，在那里，軍隊會得到充足的貯糧，而不會挨餓。假如卡爾斯的軍隊在同俄軍作戰中不能堅守這個陣地，那末它應當向埃爾斯倫撤退；土耳其的全部兵力正是應當在那里集中起來。如果說必須擊敗俄軍，那末用聯合兵力就要比單獨一部分兵力更容易促成這一點。這樣，俄國人越深入土耳其境內，他們所遭受的失敗就會越徹底。”

在收到雷德克利夫的電報的第二天，克拉倫登顯得更加慷慨了。他甚至把埃爾斯倫也列為應當撤退的地点。

電報

克拉倫登伯爵致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勳爵

1855年7月14日于外交部

您在6月30日和7月1日（應當是7月12日）發出的急電中談到的加強卡爾斯兵力的計劃沒有得到同意。在土耳其部隊尚未適于作戰之前不得加以利用，這方面的論據將在今天由信使送上。作戰基地應當是特拉比曾德，如果卡爾斯和埃爾斯倫的土軍無力對抗俄軍、不能守住埃爾斯倫，那末就讓他們退到特拉比曾德，在那里他們比較容易得到增援。

如果說卡爾斯是埃爾斯倫的門戶，那末埃爾斯倫就是君士坦丁堡的門戶，也是安那托里亞的戰略要道和商業要道的匯合點。卡爾斯和埃爾斯倫一旦落入俄國手里，英國 via〔通過〕特拉比曾德到波斯的陸上貿易就會立即中斷。英國政府對這一切情況非常了解，但它卻在這些地點都還平安無事的時候就冷靜地建議土耳其政府交出它在亞洲門戶的鑰匙，並且請被圍的卡爾斯軍隊撤退到曾被禁止去援助被圍部队的援軍那里去。“如果說必須擊敗俄軍”，——伯爵閣下這樣說（他好像是在問：需要這樣做嗎？）——那末根據他的意見，俄軍越是深入土耳其境內，也就是說，土耳其的要塞和領土落入俄軍手里越多，俄軍實際上越是接近君士坦丁堡，他們所遭到的失敗就越徹底，而且也越容易。

綽號 «Take care of Dowb»³²⁶ 的潘繆爾閣下，這位英國的卡諾，在給維維安中將的下列急電中恰如其分地充實了克拉倫登勳爵的急電中的意見。

潘繆爾勳爵致維維安中將

1855年7月14日于陸軍部

先生！

克拉倫登伯爵給女王陛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發送了一份關於土耳其政府提出的支援卡爾斯土軍的計劃的急電，現將該電文的副本寄上一閱。我謹通知您，我完全同意這份電文中所談的意見，即土耳其政府提出的計劃是不能接受的。我非常信賴您的軍事經驗，因此，我一點也不擔心您會接受像土耳其政府所設想的那種輕率而冒險的遠征計劃。當然，您不僅是部队的司令官，而且是一個得到女王陛下政府信任的英國軍官，您的職責就是在可能的時候給予我們的盟友土耳其人以大力的援助，但同時，您應當特別小心謹慎，不要拿不列顛的榮譽和自己個人的聲望去冒險，在有關的基地沒有建立、交通綫沒有保證、物資沒有貯備以及運輸工具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不要貿然採取軍事行動。為了威脅敵人的要塞，或者甚至向敵人的要塞進行攻擊而

采取军队突然登陆的办法，实行 *coup de main*〔大胆突击〕，这是一回事；为了事先有准备地攻入敌区，在敌人的领土上作战而进行远征，这是另一回事。在前一种情况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冒险；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在采取行动之前就必须有全面的准备。此外，从我所接到的全部情报来看，我有充分根据认为，巴士姆军队的处境很悲惨。我知道部队尚未充分组织好，关于保加利亚部队的情况你们一点消息也没有，至于比特桑的骑兵，我认为正像您自己的部队一样，很难使他们做到服从命令和严守纪律。总之，我确信，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援助威廉斯准将是不明智的。所采取的政策已经使这位勇敢的军官和他的军队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现在要后悔也太晚了，但是要实现那些为援助他而提出的计划，就等于走上新的失败道路。您应当抓紧时间，使自己的军队作好战斗准备，一俟您作好了准备，毫无疑问，您就将在这个或那个地方采取战斗行动，对于这一点，您显然也是很明白的；对于军队来说，组织就像坚韧不拔和英勇顽强的精神一样同样是非常必要的，没有前一种特性，单有坚韧不拔和英勇顽强的精神是无济于事的。

帕麦斯顿勋爵的陆军大臣在这份急电中扮演了仅能使自己主人开心的十足的小丑角色。威胁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或者甚至”向俄国 20 年来不断加强防御工事的塞瓦斯托波尔进行攻击，在他看来是一件极其明智的事情，因为这是联军进行的一次轻率的 *coup de main*；可是，土耳其政府为了使敌人遭到失败而想“事先有准备地攻入”敌区，——这在“多布”看来，却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他完全同意克拉伦登的意见：战略的真正实质是巩固自己军队的后方，而不是在敌人的后方展开活动——我们让他同拿破仑第一、若米尼和其他所有伟大的战略家就这个问题去展开争论吧。他还同意他的朋友这样的意见：在战争时期，军队无论如何不应当通过敌区，而永远只能通过“粮食储备充足、无饥饿之忧”的友军地区——这真是饕餮之徒的哲学。但是，在丑角的自负的蠢话里，我们可以捉摸到他的后台老板的意图！格鲁吉亚是敌区而不

是友区,这并不是可怜的“多布”的发现。格魯吉亚,这是俄国在高加索的波兰。

“多布”称之为輕率而冒險的土耳其的建議,从它总的意图来看,是一个大胆而正确的建議,我們认为它是这次战争进程中所产生的唯一的战略思想。这个建議就是:占領圍攻部队的离开中心的障地,威胁梯弗里斯这个俄国在亚洲的統治中心,使穆拉維約夫的作战基地和交通綫有被切断的危險,从而迫使他从卡尔斯城郊撤退。进行这样的明格列里亚远征,不仅可以援助卡尔斯,而且可以在各个地区轉入进攻,因而能取得在战争中可能出現的最大的优势——迫使敌人轉为防御。但是,危局已經临近;所以,为了使这种計劃能够得到順利的結局,就必須迅速地、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来实现这个計劃,并且还要保证自己得到运输工具和粮食供应。因为穆拉維約夫把居姆里(专门用来防御土耳其人的要塞)当做在他的直接后方的第一个作战基地,因此,在沒有确信敌人向梯弗里斯的推进确实会对他造成威胁以前,他是能够坚守自己的障地的。要实现这个計劃,就至少要有 55 000 人从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登陸,占領庫泰依斯并穿越哥里盆地。后来奥美尔-帕沙率領 36 000 人进行了这样的远征,当他快到里昂河时,他的部队只剩下一共不到 18 000—20 000 人。

毫無疑問,在埃尔斯倫,一支 2 万人的軍队比在明格列里亚一支 4 万人的軍队会带来更多的好处。但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記,在土耳其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議时,根据藍皮书的材料,俄軍在梯弗里斯的数量沒有超过 15 000 人,而別布托夫的增援部队当时还未到达。此外,据奥美尔-帕沙的判断,一支为了执行自己的任务因而相当龐大的軍队带着必需的貯粮、彈药和武器,从特拉比會德开赴

埃尔斯倫，然后再开往卡尔斯，就要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最后，既然土耳其政府提出了正确的计划，而又没有必要的器材，那末它的盟国就有责任保证向它提供足够的器材，而不是自己另提一个错误的计划。当时有 6 万土耳其军队被封锁在克里木，动弹不得，而这是土耳其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

6 月 28 日雷德克利夫勋爵写道：“在巴士姆、苏胡木-卡列以及其他靠近海岸的各地点，要征集 11 000 多人是非常困难的…… 帝国的其他地区（保加利亚除外）也不能再提供什么预备兵员，只有波斯尼亚，也许还能调出几千人，我指的是正规部队；巴希布祖克倒是可以募集一些，但是，阁下，您知道，怎么能指望这种不守纪律的乌合之众呢…… 我不相信保加利亚驻军包括守备部队在内，会超过 5 万人。诚然，奥地利声明它打算把俄军越过多瑙河看做是 *casus belli*（战争的理由），并答应不让俄国侵犯多瑙河各公国。但是未必能指望土耳其政府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在自己的行动中遵循这些保证性的声明，而不考虑到使重要障地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是多么不明智的事，——尽管这种决定过去和现在都会得到应有的赞赏。”

除了英土部队外，土耳其政府还掌握有什么部队呢？而这部分部队，从克拉倫登和潘繆尔的急电中可以看出也只不过是一种，旨在使土耳其政府丧失它所掌握的最后一批兵力的诱饵而已。

然而英国政府提出过自己的什么计划来反对土耳其的计划没有？难道它不准备派英土部队去特拉比曾德，然后再从特拉比曾德到埃尔斯倫或卡尔斯去吗？克拉倫登在 7 月 14 日的急电中表示“在土耳其部队尚未适于作战以前，不得加以利用”。但是，既然部队不适于作战，那就是说，它不适于参加明格列里亚的远征，正像不适于参加埃尔斯倫的远征一样。可是就在那一天，小丑潘繆尔在给部队司令官维维安的急电中写道：

“您应当抓紧时间，使自己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一俟您作好了准备，毫无疑问，您就将在这个或那个地方采取战斗行动。”

他要求維維安作好准备，不是为了直接采取行动，也不是为了到埃尔斯倫去，而是为了**在这个或那个地方**采取行动，換句話說——**什么地方**也不采取行动。克拉倫登还在9月7日（見文件第302号）就认为英土部队的訓練非常差，不适于占領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筑垒障地。因此，十分明显，英国政府提出埃尔斯倫方案，不是为了实现这一方案，而是为了打乱土耳其政府的明格列里亚远征計劃。它反对的不是援助卡尔斯的某一个具体計劃，而是援助卡尔斯的一切計劃。

潘繆尔在給維維安的急电中写道：“企图援助威廉斯准将的軍隊是荒謬的……所采取的政策（帕麦斯頓的政策）已經使这位勇敢的軍官和他的軍隊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現在要后悔也太晚了。”

克拉倫登对雷德克利夫說，除了把卡尔斯再加上埃尔斯倫都交給俄国人以外，采取什么别的措施都已經太晚了。这个計劃不仅早在7月13日就被帕麦斯頓的政府所通过，而且在藍皮书內也得到了承认，而政府，像我們下面要看到的那样，从来没有放棄过这个計劃。

雷德克利夫在7月份发出的所有急电（列入卡尔斯文件第254—277号）证明，土耳其政府十分热心地准备着維維安的明格列里亚远征。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們还記得，1855年7月12日，雷德克利夫勋爵給克拉倫登伯爵打了一封电报說：由維維安將軍领导的明格列里亚远征的准备工作正在順利进行，“为了节省宝貴的时间”，他請求政府回电指示。因此克拉倫登回电表示反对土耳其方案；虽然回电的日期是7月14日，但是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日期却是7月30日，我們看到，这时雷德克利夫勋爵又給克拉倫登写道：

“女王陛下政府对最近提出的支援卡尔斯苏丹军队的计划表示了不赞同的意见，自然这更加加深了土耳其政府的恐慌。当时我的职责是把这个意见传达给土耳其的大臣们，这不仅是反映意见，而且是对利用维维安将军的部队的否决。之后就立刻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僵局。女王陛下政府不仅禁止使用部队，而且宁愿坚决采取另一个计划——派遣增援部队取道特拉比曾德前往埃尔斯伦。这个意见在这里遭到土耳其政府以及简直是所有官方和非官方人士的反对。土耳其陆军大臣^①、奥美尔-帕沙、盖昂将军和我们自己的军官们全都赞同土耳其政府和法国大使馆的意见：必须首先考虑从列杜特-卡列方面采取牵制行动，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取得巨大的胜利，当然，同时也必须相应地保证供应运输工具、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然而，来自卡尔斯的消息决不是令人快慰的，宝贵的时间正在因怀疑和动摇而必不可免地白白浪费掉。”

从君士坦丁堡到伦敦的路程丝毫不比由伦敦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程远，因此，雷德克利夫在7月12日从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急电，在7月14日就到达伦敦，而克拉伦登在7月14日由伦敦发出的急电，君士坦丁堡却在7月30日或30日前后才收到，这种情况就使人感到非常奇怪。雷德克利夫在7月19日的急电中对政府的沉默表示不满，因为他曾恳请政府“立即发表自己的意见”。在7月23日发出的另一份急电中，我们看到，他仍然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早已说过，实际上在7月30日以前并没有得到答复。因此，毫无疑问，克拉伦登从伦敦发出的急电的日期是假造的，实际上这份急电发出的日期要比蓝皮书上所标明的日期晚几个星期。这个假造日期的事件暴露出英国政府的目的在于拖延时间。本来就是要使土耳其政府失去宝贵的时间，引起它的怀疑和动摇，而最重要的是要迫使它把整个7月份白白浪费在维维安远征的准备工作上面，因为根据英国政府的决定，这次远征是不应当进行的。

^① 卢什迪-帕沙。——编者注

二

英国政府由于在战略上动摇不定，三个月来不能对土耳其政府打算采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因此，它最多能做到的是：在当时急速派遣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 via〔取道〕埃尔斯倫去负责恢复这个城市和卡尔斯之间的交通线。联军是黑海的主宰，而英国政府又完全掌握着由比特桑将军指挥的4000名巴希布祖克——这是土耳其唯一具有战斗力的非正规骑兵部队。这支部队在特拉比曾德登陆以后，过十天就能到达埃尔斯倫，给卡尔斯护送军粮，从而使要塞能继续抵抗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也就是说，可以坚持到阿尔明尼亚的严冬的来临，到那时候，围攻者将不得不停止进攻。比特桑将军于7月7日写信给雷德克利夫，请求雷德克利夫利用他的军队来展开积极的军事行动。

他的请求没有受到重视。8月14日部队又呈递了请愿书，请求不要再让他们闲着，而派他们到亚洲去。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9月12日比特桑第三次冒昧陈述自己的意见。因为英国政府不愿再忍受这种不知轻重的请愿者的纠缠，所以就施展了军事外交的阴谋手段，结果比特桑从军队中被召回。既然比特桑本人已被召回，那末他同政府之间的全部通信也就从蓝皮书中一笔勾销了。

我们已经知道，英国政府是固执地坚持 via 特拉比曾德向埃尔斯倫远征的。可是，在俄军占领了埃尔斯倫和卡尔斯之间可以

通行的大道并切断了一部分給卡尔斯军队准备的軍粮的运输綫这个消息傳來以后，土耳其政府就背着英国大使館独自采取行动，企图立即从特拉比曾德进行支援。在1855年7月16日雷德克利夫写的报告中附有一封斯蒂文斯副領事的信，内容如下：

1855年7月9日于特拉比曾德

閣下！

我荣幸地通知您，哈菲茲-帕沙昨天帶領300名炮兵和20門野炮动身到埃尔斯倫去了。現在已經組成一支估計能达1万人的龐大的非正規部队；这支部队今天也将开往埃尔斯倫。

(署名：斯蒂文斯)

雷德克利夫立即按自己的职分去詢問土耳其陸軍大臣，請他解釋：为什么他避而不談关于在特拉比曾德集結1万名非正規部队和哈菲茲-帕沙到埃尔斯倫去的問題。

他抱怨地說：“我从閣下那里听到关于这方面的全部消息是：土苏姆-帕沙曾接到命令，要他到特拉比曾德去，可能再从特拉比曾德到錫瓦斯去，他必須在錫瓦斯招募4000名非正規部队，然后再率領他們开往战区去。”

如果在特拉比曾德、錫瓦斯和埃尔斯倫之間划三条綫，那末就可以看出，这三条綫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底边，正是从特拉比曾德到埃尔斯倫的那条綫，这条綫比每根腰綫約短三分之一。因此，把增援部队直接經特拉比曾德派到埃尔斯倫去，而不是把土苏姆-帕沙从君士坦丁堡派到特拉比曾德，經特拉比曾德又“可能”派到錫瓦斯，在錫瓦斯他再花些時間去招募非正規部队，然后又可能率領他們到埃尔斯倫，——这就意味着，事态的发展太迅速了，因而使英国大使不能不責备土耳其人。雷德克利夫勛爵不想对土耳其陸軍大臣說，对被圍城市的援助取决于經過再

三考虑的拖延政策，而向他提出了一个問題：

“这样大的一支仓卒而混乱地集合起来的巴希布祖克部队只会对敌人有利，这难道还用怀疑嗎？”

可是土耳其陸軍大臣公正地反駁了这一点，他說：

“他曾經坚决要求撥出一笔經費来支付巴希布祖克的軍餉，因为这是使他們服从命令的基本条件，他甚至还威胁地說过要辞职，假如他的要求不能得到滿足的話”，这时候，雷德克利夫勳爵的听觉立刻变得迟鈍起来了。

如果我們来看一看土耳其政府提出的、而被它的盟国所破坏的另一个作战計劃，那末我們就会陷入錯綜复杂的迷宮，而难以找到一条出路。

从西蒙斯中校（奥美尔-帕沙兵营中的不列顛代表）7月15日給克拉倫登勳爵的报告以及附在报告里的奥美尔-帕沙的备忘录中，可以肯定以下的事实。6月23日奥美尔-帕沙接到了威廉斯將軍的来信，說同埃尔斯倫的交通綫已經中斷，并且用最坚决的口吻要求立即派遣增援部队到卡尔斯来，或者从列杜特-卡列方面进行大規模牽制行动。7月7日奥美尔-帕沙向联軍最高統帥——辛普森和佩利西埃——提出备忘录，坚决要求他們召开联軍陸海軍的司令官會議，以便立即作出决定。他在备忘录中提出：

“他本人可以率領他的駐在这里（巴拉克拉瓦）和刻赤的一部分軍隊、叶夫帕托利亚的25 000名步兵和3 000名騎兵以及相当数量的炮兵开赴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的某一个地点；他从那里威胁俄軍的交通綫，就会迫使俄軍撤除对卡尔斯的圍攻。”

奥美尔-帕沙在說明自己的建議时指出，土耳其在亚洲的軍隊有1万人，他們被俄軍的優勢兵力圍困在卡尔斯營壘，現在他們的处境是：由于粮食缺乏而可能被迫投降；卡尔斯的守軍实际上也就

是土耳其在亚洲的军队；如果卡尔斯的守军投降了，埃尔斯伦就会落到敌人的手里，由于地理形势关系，这个城市是很难固守的，这样，敌人就会控制通往波斯和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的交通线；联军如果采纳了他的建议，就能够利用他们所具备的主要优越条件，那就是：海上运输的便利条件和土耳其唯一具有充分战斗力和已经作好出发准备的军队，即奥美尔-帕沙本人的军队。佩利西埃元帅和辛普森将军对这份备忘录的答复是：“由于没有得到补充的情报，因此他们认为召开会议为时尚早。”尽管这样，奥美尔-帕沙还是在7月12日再次写信给他们，信中说：

“这时他已经接到了他的政府拍来的急电，根据急电来看，整个土耳其的亚洲部分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城门都处在不设防状态，因为每一个小时都很宝贵，所以政府要求他立即设法动员和利用一切必要的器材和资源来防止那种威胁到土耳其政府因而也威胁到盟国事业的巨大危险。”他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同时由于在克里木的6万名兵士大部分是亚洲人，他们的家庭和财产正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又鉴于这支军队在克里木没有展开行动，而且看来最近不能指望利用它来积极展开行动，因此，根据我对我的国王应尽的义务，并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我再次提出我过去的建议。”

因此，他要求联军将领们在英军大本营开会。他在写信给联军将领的同时，又说服西蒙斯中校给辛普森将军和莱昂斯海军上将发了一封密信，现在我们从这封密信中摘引一段如下：

“土耳其政府建议维维安将军率领土耳其部队到列杜特-卡列去……然而奥美尔-帕沙认为把这些部队派到那里去是很大的冒险行为，因为兵士们还不习惯同自己的军官相处，而军官们又不会说土耳其话，因此不能在战场上指挥他们作战；这支部队虽然可以担当警备勤务，但还不能派他们深入腹地。此外，这支部队在数量上也太少，不能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奥美尔-帕沙还有这样的意见：他得到土耳其人的信任，他已经在亚洲打过几次仗，在亚洲是相当有名的，因此他将比语言不通、国情不明的外国人更容易取得当

地居民的好感，更容易得到必要的糧食和情報。”

7月14日召开了會議，参加會議的有奧美爾-帕沙、西蒙斯中校、辛普森、佩利西埃和馬丹普雷將軍以及萊昂斯、布律阿和斯圖亞特海軍上將。奧美爾-帕沙詳細地敘述了俄軍在亞洲的兵力以及它們在卡爾斯城郊的軍事行動。他詳盡地闡述了上面所提到的論據，并堅決主張：

“必須準備進軍以阻止俄軍繼續向亞洲推進，在這方面決不能再浪費時間了。”

然而，正像西蒙斯中校在給克拉倫登的報告中所說的：

“將軍們和海軍上將們沒有接到本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情報，所以他們還不能相信亞洲的情況確實像奧美爾-帕沙根據他的政府的通知而描述的那樣危險”，他們決定“在沒有接到有關的情報以前，對這個問題不發表任何意見”。

總之，在這種情況下聯軍將領們都拒絕對這個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因為他們沒有接到本國政府的情報。後來，盟國政府也拒絕發出必要的指令，因為它們的將領沒有發表自己的意見。聯軍司令官的態度冷淡，他們玩弄花招，以不相信事實為理由而不發表自己的意見，同時又極不妥當地責備土耳其政府撒謊，所有這一切都使在這個問題上唯一有直接利害關係的人——奧美爾-帕沙感到驚訝，他立即站了起來，斬釘截鐵地說：

“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自己有責任要去君士坦丁堡幾天，以便和他的政府商量。”

果真在兩天之後，即7月16日，他帶着西蒙斯中校動身到君士坦丁堡去了；但同他一起去的還有一個名叫修洛的中校，“這個人是在養病的名義下同去的”（見卡爾斯文件第270號附錄1），而

实际上他是接受佩利西埃和辛普森將軍的委托，去破坏奥美尔-帕沙的计划的。修洛是辛普森將軍司令部的一位軍官，他替可怜虫辛普森(伊文思將軍把他称为世界上最不走运的敗将)帶給雷德克利夫一封信；辛普森在这封信里告訴公使的不是他和他的同僚不相信奥美尔-帕沙的話，而是“他們坚决反对現在从克里木召回任何軍隊”；其次談到的不是他們认为必須对奥美尔-帕沙隱瞞自己的意見，而是他，辛普森

“坚决請求公使閣下利用自己对土耳其政府的特殊影响，使他們的意見压过奥美尔-帕沙閣下的意見”，因为“国家的重要利益已处在决定性关头了”，而“奥美尔-帕沙的胜利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問題就是这个胜利！奥美尔-帕沙可能获得的胜利使佩利西埃將軍睡不着觉，因为到現在为止，除了6月18日的可耻会战以外，他再也沒有什么可以吹嘘的事情。可怜虫辛普森虽然被伊文思將軍描繪成一个天生的最不走运的敗将，但是他仍然是十分狡猾的，他想利用他的同僚的困难处境，背着奥美尔-帕沙搞阴謀活动——可以說，这是他在整个克里木战局期間所采取的唯一的一机动。

雷德克利夫在7月19日給克拉倫登的急电中写道：

“前天夜里〈7月17日〉在他知道了奥美尔-帕沙突然从克里木来到这里，并直接去見了土耳其陸軍大臣后，他感到十分驚訝。”

他因法納尔人³²⁷皮札尼带来了以下消息而感到高兴：

“最高統帥未經政府的許可就来到这里，这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不滿”，并說“他坚信，假如奥美尔-帕沙立即返回克里木去指揮自己的軍隊，那末聯軍的利益就能得到最大的保证”。

尽管雷德克利夫坚信这一点，但是奥美尔-帕沙还是在君士坦

丁堡从7月17日一直耽擱到9月初。下面我們將看到,由于什么原因而浪費掉这样一段時間的。

7月23日雷德克利夫告訴克拉倫登:

“奥美尔-帕沙向土耳其政府建議,委任他来实现向格魯吉亞的進軍,这次進軍以列杜特-卡列为出发点,同时还要利用一下庫泰依斯。”

这个建議在前天(7月22日)夜間总理大臣召开的會議上进行了討論,討論后决定:

“从叶夫帕托利亞抽調2万人并从保加利亞抽調5000人参加为完成上述任务而由奥美尔-帕沙指揮的部队,叶夫帕托利亞部队的缺額将由以新兵补充的部队增补。万一上述計劃遭到反对,那末就建議作这样的修改:从克里木只抽調1万人,而从保加利亞抽調15000人,其中应包括补充部队的新兵。”

这份急电(据說克拉倫登是在8月1日收到的,并且在收到后立即利用它打电报通知了英国駐巴黎大使考萊勋爵)中有一段具有决定意义的話显然是被歪曲了。我指的是这一段:土耳其政府建議从叶夫帕托利亞抽調2万人交給奥美尔-帕沙指揮,而在叶夫帕托利亞,这些人将由土耳其部队来代替。克拉倫登在給考萊勋爵的电报中引用的正是这一段話,而且他还說,“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一点是諒察的”,表示“希望帝国政府也能同意这一点”。

在急电的这一段話中,故意把巴拉克拉瓦說成是叶夫帕托利亞。从西蒙斯中校7月15日发出的、而克拉倫登在7月30日收到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奥美尔-帕沙不論在致联軍將領的备忘录中还是在軍事會議上,都坚持要率領駐扎在这里(巴拉克拉瓦)的他的那部分軍隊;这部分軍隊是他从叶夫帕托利亞抽調出来的,他认为是唯一适于在亞洲作战的軍隊。奥美尔-帕沙来到君士坦丁堡

以后是否改变了自己的意見呢？从西蒙斯 8 月 2 日的报告中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西蒙斯在报告中写道：

“奥美尔-帕沙閣下告訴我，为了补充部队的兵員，他願意提供他所指揮的任何一部分土耳其軍隊，但是目前駐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兵營里的那个师除外；因为这个师是由他的精銳部队組成的，自然，他希望把它留在自己的身边，万一他要向亚洲进军时，他就可以加以使用。”

說土耳其政府在 7 月 21 日夜間的會議上作出了与奥美尔-帕沙的建議相矛盾的決定，有沒有这方面的证据呢？在 7 月 23 日雷德克利夫报告土耳其政府作出了決定的那封急电中，他对克拉倫登說：

“奥美尔-帕沙受到了苏丹极其亲切的接待，并且还得到了大大的奖賞”，同时还补充說：“至于他同陛下大臣們的极其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同土耳其陸軍大臣-帕沙的良好关系，就不用我多說了。”

因此，在土耳其政府和它的总司令之間談不上有什么意見分歧。当他們接到倫敦的指示，要把叶夫帕托利亚的軍隊交給奥美尔-帕沙指揮，并从他那里抽出駐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和刻赤的軍隊时，無論土耳其政府或者奥美尔-帕沙都同样感到驚訝。英国政府捏造了急电中的上述那段話，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英国政府竭力要向輿論界隱瞞以下的事实：一方面，它要在法国政府面前显示它是支持奥美尔-帕沙的計劃的，同时它又簡單地重新編排了一下詞句，把土耳其政府原来的建議变成了一种直接与它相反的东西。这样就有新的理由来进行爭論了。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整个 8 月和 9 月就都花費在发布命令和取消命令上面了。甚至从藍皮书中文件的排列次序上也可看出英国政府的弄虛作假。为了把讀者搞糊塗，克拉倫登給考萊的急电竟印在第

248 頁上，在急電之後，從第 248 頁到 252 頁，是雷德克利夫在 7 月 19 日發出的急電的摘錄、辛普森在 7 月 16 日寫給雷德克利夫的信、奧美爾-帕沙的信件和他提出的備忘錄，最後才是雷德克利夫在 7 月 23 日發出的急電，看起來似乎由於這份急電才產生了克拉倫登給考萊發出的指示。

現在我們應當簡要地談談唐寧街外交部的活動，並仔細地研究一下在那裡熱心地充當偉大的帕麥斯頓主要辦事員角色的克拉倫登伯爵。克拉倫登在給雷德克利夫發出急電之後過了兩天，於 7 月 16 日又給他發了一份急電，急電的結尾是以下幾句話：

“女王陛下政府仍然建議派去援助卡爾斯守軍的一切部隊都開到特拉比曾德去。如果奧美爾-帕沙（我聽說他打算到君士坦丁堡去）一定要帶領他的某一部分軍隊以及突尼斯和阿尔巴尼亞部隊一起去列杜特-卡列，女王陛下政府也不反對。”

雷德克利夫在 7 月 23 日從君士坦丁堡寄發的急電，於 8 月 1 日到達倫敦，整整用了九天，可是克拉倫登在 7 月 16 日發出的急電卻又用了半個多月的時間才到達君士坦丁堡。因此，7 月 30 日，當雷德克利夫說下面這些話時，君士坦丁堡還沒有接到這份急電：

“女王陛下政府堅持 via〔取道〕特拉比曾德派遣增援部隊，這會使土耳其政府處於非常艱難的境地。”

可見，雷德克利夫還沒有接到克拉倫登的急電，急電中說女王陛下政府一點也不反對遠征列杜特-卡列，如果奧美爾-帕沙本人打算這樣做的話。這個奇怪的軍事外交悲劇演出前後順序的特点是：一切旨在拖延時間的急電都到得特別快，而那些似乎主張迅速行動的急電卻不知什麼緣故到得特別慢。但是，在我們引證的克

拉倫登的最后一份急电中，还有一个同样令人吃惊的地方。雷德克利夫勋爵在7月19日从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急电中说，他得悉奥美尔-帕沙突然来到君士坦丁堡后，感到很惊讶；可是克拉倫登早在7月16日，即奥美尔-帕沙离开克里木的那一天，就从倫敦通知雷德克利夫说：“我听说奥美尔-帕沙打算到君士坦丁堡去。”我们知道，奥美尔-帕沙自己是在7月14日，即军事会议结束以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从14日到16日这段期间，并没有一只船从塞瓦斯托波尔开往君士坦丁堡，因而奥美尔-帕沙不得不请求莱昂斯海军上将让他调用英国军舰“勇敢号”。外交部从倫敦拍出的电报需要17天才能到达君士坦丁堡，而它从克里木收到报道事件的电报却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这难道是可以相信的吗？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塞瓦斯托波尔和瓦尔那之间的联络是通过海底电报实现的，而瓦尔那和倫敦之间的联络则通过电报；因此，克拉倫登在军事会议开会的当天就能收到消息。但是，从塞瓦斯托波尔发出的电讯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当然，在藍皮书里是没有的。它干脆被删掉了。但为了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使克拉倫登收到关于奥美尔-帕沙打算到君士坦丁堡去的消息的那条电报又通知他说，奥美尔-帕沙遭到了佩利西埃的反对，也就是遭到了法国政府的反对。由此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克拉倫登平心静气地从7月16日一直等到8月1日，而不把这方面的消息告诉法国政府，不同法国政府就关系到整个战局的结局问题进行谈判？为了防止产生这样的问题，上面提到的电讯就被隐藏起来了。但是，既然克拉倫登删去了从克里木拍来的电报，那为什么他又公布自己在7月16日从倫敦发出的急电呢？既然不能肯定这份急电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君士坦丁堡，那末在藍皮书中的遗漏也就不算什么大的漏洞了。

这里追求的是双重目的。一方面是要表明英国政府不顾波拿巴制造的那些困难,它是准备援助卡尔斯的,这样就可以把拖延時間的全部責任推到波拿巴身上。另一方面則要证明克拉倫登是相信7月23日的假电文的,在他不知道土耳其政府决定硬要奥美尔-帕沙指揮叶夫帕托利亚的軍隊以前,他就准备让奥美尔-帕沙率領他的任何一部分軍隊。的确,当他知道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就不顾奥美尔-帕沙和土耳其政府的种种抗議而坚决支持它。克拉倫登的一切行为——鼓励土耳其政府在整个7月份內从事研究維維安的远征問題,把同波拿巴的談判推迟到8月,在給巴黎的急电中用捏造的建議(波拿巴接受这个建議无疑会在这个錯誤的喜劇中引起一場新的混乱)来代替土耳其政府提出的建議——所有这一切行为是为了一个目的:消磨時間。

三

1855年8月2日考萊勛爵从巴黎发出电报，說“瓦列夫斯基伯爵預料到”克拉倫登以土耳其政府的名义提出的“方案必将遭到反对”。这样一来，狡猾的克拉倫登伯爵就有机会在8月3日的急电中显示自己的爱国热忱，把卡尔斯和埃尔斯倫一旦落到俄国人手里而可能发生严重后果的責任推到法国政府身上。第二天，即8月4日，克拉倫登接到巴黎如下一份电报：

电报

考萊勛爵致克拉倫登伯爵

1855年8月4日于巴黎

法国政府将不阻擋奧美尔-帕沙計劃进行的小亚細亚远征，条件是：駐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土耳其部队的人数不能减少。

尽管有这个条件限制，电报仍然表明，克拉倫登在8月1日以土耳其政府的名义提出的建議完全被接受了，根据这个建議，駐在叶夫帕托利亚的部队应交由奧美尔-帕沙指揮，而代替这些部队的应当是維維安將軍的部队。当天，克拉倫登打电报給雷德克利夫：

“8月4日。奧美尔-帕沙可以去援助卡尔斯，条件是他不能减少駐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土耳其部队的人数，并且不能动用叶尼卡列的守备部队。”

法国政府只是反对縮减駐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土耳其部队的人数。英国政府在这个問題上又增加了一道障碍，即禁止动用叶尼卡列的土耳其部队。8月8日克拉倫登接到威廉斯將軍在7

月 14 日从卡尔斯发出的信，信中报告穆拉維約夫將軍于 7 月 11 日和 12 日在要塞附近进行了偵察，7 月 13 日

“他率領自己的全部軍隊出現在地勢高于卡尔斯的南部高地上，这些高地是我們进行防御的咽喉要地，1828 年卡尔斯就是由于这些高地失守而被攻陷的”。

这封信的最后几句是：

“我剛才得到消息說，俄国將軍正在等待从巴雅澤特 via〔取道〕居姆里来的增援部队，不久前从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調出的守备部队也在向格魯吉亚腹地推进，这些部队将会参加小亚細亚未来的軍事行动。”（第 276 号文件）

克拉倫登一听说俄国增援部队的消息，他的减少土耳其部队人数的意图就获得了新的动机。他立即拟就了一份急电，并补充了自己提出的 *index militum prohibitorum*〔禁止动用的部队名单〕：

电报

克拉倫登伯爵致雷德克利夫勳爵

1855 年 8 月 9 日于外交部

維維安將軍的部队应立即开赴叶夫帕托利亚。应把該地的 10 000—12 000 人的土耳其部队調出来由奧美尔-帕沙率領前往列杜特-卡列。駐在巴拉克拉瓦和刻赤的土耳其部队的人数不得减少。由奧美尔-帕沙率領开赴列杜特-卡列的土耳其部队的人員应由保加利亚或其他地方調出的部队补充，而不是从克里木調出軍隊来补充。

因此，我們看到，克拉倫登又重新扩大了自己的禁令范围。克拉倫登想起 7 月 15 日西蒙斯中校的急电中談到，奧美尔-帕沙打算率領“他的一部分駐在这里（即巴拉克拉瓦）和刻赤的軍隊，率領由叶夫帕托利亚調来的 25 000 名步兵和 3 000 名騎兵以及炮兵”进行行动，因此他現在就禁止土耳其政府动用刻赤的守备部队；他

把波拿巴反对从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撤退军队的意見扩大到整个克里木，只是把叶夫帕托利亚除外，但是在叶夫帕托利亚，把要召回的部队的数量甚至也削减到 10 000—12 000 人，而不是他在 8 月 1 日給法国政府的急电中所提到的 2 万人。他像小丑那样幽默地授权土耳其政府在“其他任何地方”寻找部队。他在倫敦安装了炸彈，現在他可以靜候这枚炸彈在君士坦丁堡爆发。

7 月 16 日在克拉倫登給雷德克利夫的急电中，使我們感到惊讶的是下面这段話：

“如果奧美尔-帕沙（我听说他打算到君士坦丁堡去）一定要率領他的某一部分军队到列杜特-卡列去，女王陛下政府并不反对。”

从 7 月 31 日傅阿德-埃芬蒂致雷德克利夫的信、8 月 4 日雷德克利夫的复信以及 8 月 8 日雷德克利夫的信（見第 282 号文件 and 附录）中可以看出，克拉倫登 7 月 16 日发出的急电到 8 月 8 日还没有到达君士坦丁堡。傅阿德-帕沙在信中确认，已經开始的准备工作（明格列里亚远征）停頓下来了，“因为还没有收到所期待的（来自倫敦的）官方的明确答复”，他拥护土耳其的明格列里亚远征計劃，而“反对英国急电中的基本論点”，按照这些电文，“增援部队派往特拉比曾德时**必須**經過埃尔斯倫”。雷德克利夫在 8 月 4 日的复信中說：

“不久前，他不得不轉达本国政府的意見，他完成了这个任务，同时痛苦地意識到，土耳其政府正处在极其艰难的境地”，

而这种境况由于“他不得不說出的”意見而更加复杂化了；同时他还补充說：

“虽然女王陛下政府声明过，它坚决主張經過特拉比曾德和埃尔斯倫采取比較直接的行动，但是，如果为了从切尔克西亚方面进行牽制行动而利用

的兵力在成分上是单一的而且是可靠的，那末，女王陛下政府反对这种牵制行动的意見就很可能减少。”

雷德克利夫在 8 月 8 日給克拉倫登的急电中表示不滿，因为政府

“仍然认为特拉比會德有重大的意义，把它当做是可以提供实际援助的唯一地点…… 所有軍事权威都坚决主張远征〈明格列里亚远征〉……尽管有許多理由来大力支持这个唯一可以实现的援助計劃，但我还是把我的政府的完全相反的看法坦率地告訴了土耳其政府”。

必須从两方面来看克拉倫登（8 月 20 日）对雷德克利夫上述这份急电的答复：一方面要注意雷德克利夫的論断，即他认为英国政府在 8 月 8 日以前是反对明格列里亚远征的；另一方面要注意克拉倫登在 8 月 1 日寄往巴黎的計劃，这个計劃被冒充为土耳其政府自己提出的計劃。关于第一点，克拉倫登声明說（見第 283 号文件）：

“您在发出急电之后想必已經收到了我的許多电报和我在 8 月 4 日发出的急电，从这些电报中您可以看到，女王陛下政府和法皇政府都同意奥美尔-帕沙到亚洲去进行牵制行动以援助卡尔斯；女王陛下政府在这方面不再坚持它最初的看法，即应当通过特拉比會德来进行援助。”

除了 7 月 14 日的急电（克拉倫登在这份急电中反对明格列里亚远征并要求土耳其部队撤离卡尔斯和埃尔斯倫）和 8 月 9 日的急电（雷德克利夫当然不可能在 8 月 8 日收到这份急电）外，根据藍皮书，克拉倫登根本沒有发出过任何电报。克拉倫登說“在他的許多电报里”都否认英国政府禁止明格列里亚远征，这显然是撒謊。为什么他不提他在 7 月 16 日发出的急电呢？就是因为这份急电只能放在藍皮书里，只是为藍皮书写的，它从来沒有越出唐宁

街外交部的范围。雷德克利夫显然觉察到给他设下的陷阱，于是在8月13日给克拉伦登写道(第286号文件)：

“閣下，我刚才读到您8月9日的来电。我相信，女王陛下政府同意从列杜特-卡列方面进行牵制行动将会使土耳其政府和奥美尔-帕沙感到极大的满意。上一封电报表示只能通过特拉比曾德向卡尔斯推进，这个意见曾经引起了明显的失望。”

雷德克利夫一点也不知道克拉伦登的许多“电报”。他只知道上一封表示“只能”通过特拉比曾德来进行远征的电报。他指的是7月13日的电报以及7月14日又加以补充说明的电报。他根本不知道有7月16日的急电这回事。我们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很简单。只要翻阅一下卡尔斯文件，每个人都会相信，英国政府是在坚持不懈地力图打乱土耳其政府的计划。然而我们所发现的伪造、歪曲和欺骗行为都证明英国政府意识到它是在弄虚作假的，同时还揭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政府早就有一个深思熟虑但又不敢公开讲明的计划。

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看克拉伦登8月20日的急电。

克拉伦登说：“奥美尔-帕沙作为苏丹部队的司令官，在决定调动自己部队的问题上有完全的自由，他可以通过最好的方式利用自己的部队来为共同事业服务；唯一限制他的行动自由的就是两国政府提出的下列条件：向亚洲的进军不能引起塞瓦斯托波尔和叶尼卡列城郊土耳其部队人数的任何缩减，而维维安将军指挥的土耳其部队可以利用来代替奥美尔-帕沙可能从叶夫帕托利亚带走的那部分土耳其部队。”

按照克拉伦登8月1日拍往巴黎的急电，土耳其政府曾经建议把从叶夫帕托利亚调来的部队交给奥美尔-帕沙指挥，而不动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土耳其军队。他怎么能把简单地同意土耳其政府自己提出的建议称为“对奥美尔-帕沙行动自由的限制”呢？

但是另一方面，既然雷德克利夫的急电（即他答复的那份急电）已經提醒他：奥美尔-帕沙打算从巴拉克拉瓦調走 17 000 人，从刻赤調走 3 000 人等等，那末他是否还能采取別的做法呢？因此，他在給巴黎的急电中作为土耳其政府自己的建議而提出的意見，現在又作为土耳其的西方盟国的意見而强迫土耳其政府接受了。

在 8 月 13 日以前——正好是奥美尔-帕沙向联軍將領提出他的明格列里亚远征計劃后一个月——土耳其政府受到英国政府反对远征的严重影响，因而停止了为援助卡尔斯而作的全部准备工作。直到 8 月 13 日，土耳其政府才終于摆脱了这种悲惨处境，并且滿意地得悉，它的西方盟国同意了它在 7 月 22 日所作的决定。現在它終于有可能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对付穆拉維約夫，而不是对付克拉倫登。8 月 15 日召开了奥斯曼帝国會議，討論和寻求援助卡尔斯的最有效的办法。这次討論的結果使人感到十分驚訝，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雷德克利夫在 8 月 16 日給克拉倫登的急电（第 294 号文件）中說道：“奥美尔-帕沙极其坚决地反对倫敦来电中所轉达的在叶夫帕托利亚配置部队的計劃，他认为，如果不允許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土耳其部队参加远征，他就不可能負起指揮远征的責任。”

这样一来，我們看到，把叶夫帕托利亚計劃通知倫敦的日期似乎是 7 月 23 日，而現在可以断定，它从倫敦轉到君士坦丁堡的日期是 8 月 9 日。

8 月 16 日西蒙斯中校也拍給克拉倫登一封急电（第 297 号文件）：

“閣下，我应当向您报告，土耳其陸軍大臣接到了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勳爵的通知，得悉女王陛下政府決定派遣土耳其部队到叶夫帕托利

亚去，他把这个决定轉告了奥美尔-帕沙閣下。奥美尔-帕沙认为，这种調动不能使土耳其政府集中必要的力量来实现旨在解救卡尔斯軍队的亚洲进军，于是他就向土耳其陸軍大臣打了一个报告…… 奥美尔-帕沙虽然坚持带走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部队，但是他会从这些部队以及在刻赤的土耳其部队中抽出一部分所需要的兵力来补充英土部队，使这个部队的兵員滿額…… 在我看来，帕沙的建議是唯一有希望能解救卡尔斯軍队的建議，当然必須遵守英国和法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帕沙閣下是知道这个条件的)，即进行远征不应当引起克里木部队人数的大大縮减。因此，奥美尔-帕沙向联軍將領們提出的第一个建議(我在7月15日的急电中报告过这个建議)不可能付諸实现。帕沙对进行远征現在是否能及时解救卡尔斯守軍这一点表示怀疑。但是，即使不能援助卡尔斯，远征無論如何会阻碍敌人在埃尔斯倫的帕沙轄区内修筑防御工事，阻碍他們在下一次战局中向腹地发动新的进攻。”

西蒙斯中校在上述急电中摘引的奥美尔-帕沙致土耳其陸軍大臣的备忘录，附在雷德克利夫8月16日給克拉倫登的信中。我們把备忘录中所談的意見援引如下：

“目前駐在叶夫帕托利亚的部队成分复杂——它們是由突尼斯人和埃及人組成的，他們缺乏陆上运输工具…… 他們既不能行軍，又不能机动…… 假如习惯于炎热气候的埃及人不得不到亚洲去，在即将来临的冬季气候条件下进行軍事行动，那末，他們就不能采取必要的机动，而且成分复杂的軍队是很少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如要实现这一計劃，那就会破坏土耳其軍队和不列顛軍队的团結，不应当忘記，在战争时期，軍队的战斗力，甚至軍队本身的存在，多半取决于它的队伍的团結……” 帕沙指出，每一个指揮作战的將軍都应当預見到他在战争中可能会遇到的最艰难的情况，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防止失敗。他指出了以下这种情况，即卡尔斯的軍队可能在他到达亚洲之前就被消灭，而俄軍在占領这个地点之后可能会繼續向前推进，他說，他的軍队成分复杂，对这样的軍队是不能完全信賴的，因此他可能会陷入目前亚洲軍队所处的这种困难的境地……

每一个受委托去采取某次軍事行动的將軍，对这次行动及其实现的方法应当是同意的，这样他才能被认为是对这次行动的进程負起了責任。英土部

队在得到从保加利亚和刻赤調来的队伍的补充而达到滿額后,其人数将同他指揮下的几个师的人数大致相等。至于說到联軍部队的人数,如果採納了他的意見,那就用不着减少了。相反,如果实现倫敦发来的計劃,那末土耳其陸軍大臣为补充叶夫帕托利亚守备部队而提出的全套既定措施就将遭到破坏,而且必然会造成時間上的拖延,因为不得不建立一个全新的組織。”

因此,按照奥美尔-帕沙的意見,实现倫敦的計劃就必然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土耳其軍隊会丧失掉最后一点战斗力,土耳其軍隊和不列顛軍隊的团結会遭到破坏,突尼斯人和埃及人会故意被派去送死,补充叶夫帕托利亚土耳其部队的全部既定計劃会遭到破产;同时也必然会造成時間上的拖延,奥美尔-帕沙在軍事上的声望会遭到損害,而明格列里亚的軍隊也会遭到和卡尔斯守軍同样的命运。雷德克利夫在把这个强硬的抗議轉告克拉倫登时,甚至沒有想到,他自己成了一种工具,正如人們所說的,土耳其政府通过这个工具,似乎把一个与倫敦的計劃相同的計劃轉給了克拉倫登勳爵。

因此,我們有新的无可爭辯的根据来证明,7月23日急电中所說的土耳其政府的建議,乃是倫敦的伪造物,而克拉倫登在8月1日的电报中向法国政府提出这个計劃时,就已很明显地意識到,他是在进行笨拙的伪造勾当。

克拉倫登的計劃准确地按照他的意图实现了。土耳其政府終於得悉:英国政府一般是同意土耳其的远征的,但同时也了解到,英国政府反对实现这次远征所必需的一切細节。在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浪費整整一个月的時間来反对克拉倫登的埃尔斯倫方案之后,現在又不得不浪費更加寶貴的一个月——8月来反对他的叶夫帕托利亚計劃。

在8月20日雷德克利夫給克拉倫登的急电中，附有奧美尔-帕沙的第二份备忘录，这一份备忘录的内容和前一份一样，但作了如下的补充（見第296号文件）：

“任何一个企图不顾一切軍事原則来实现这种战斗行动的將軍，都会使自己在軍事上的声望遭到損害，此外，还会使联軍的整个計劃受到威胁。我是既不願意造成前一种結果，也不願意造成后一种結果的。

即使我接受了指揮任务，这对事业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他把叶夫帕托利亚的部队形容为“不守紀律、成分复杂和沒有經驗的部队”。

8月20日（見第298号文件：西蒙斯給克拉倫登的电报），奧美尔-帕沙根据土耳其陸軍大臣的副官（他在8月5日离开卡尔斯，8月19日到达君士坦丁堡）带来的消息，把卡尔斯的局势告訴西蒙斯：

“在他离开卡尔斯的时候，卡尔斯城仓库里为守軍儲备的粮食只够用一个月，或者最多能維持五个星期；守軍的彈药供应也不足。但是，这种情况沒有多大的意义，因为穆拉維約夫將軍曾对他的軍隊（在得到增援后，目前約有5万人）宣布过，他要用圍困的方法占領卡尔斯，即不費一枪一彈来夺取这个城市…… 俄軍强迫周圍8小时行軍路程（28英里）範圍內的居民运走一切食物…… 埃尔斯倫的守軍由6000人的正規部队和12000人的非正規部队組成；然而有許多非正規部队正在离开城市并且瓦解了。”西蒙斯說：“从同奧美尔-帕沙的談話中可以看出，土耳其政府被亚洲的悲惨局势弄得非常苦恼，到本月底或9月初，卡尔斯的守軍（16000人和将近200門火炮，其中約70門野炮）将会丧失殆尽，这种十分明显的前景几乎把它弄到絕望的地步…… 土耳其政府感到非常悲痛和失望的是：浪費了这么多時間，而巴黎和倫敦內閣以及克里木軍事当局却未能像土耳其政府那样十分重視事态的发展，只是一味反对旨在改善土耳其政府的处境和防止災禍而一直提出的那些建議。”

8月21日，在土耳其政府召开的會議上(第299号文件：8月23日西蒙斯給克拉倫登的电报)

“作出决定，要以最大的毅力来采取行动，利用土耳其政府所掌握的一切物資来实现奥美尔-帕沙提出的計劃…… 决定向英法大使提出照会，讓他們知道土耳其政府的决定，并請求他們政府的舰队协助把土耳其部队、火炮、器材以及陆上运输工具运到亚細亚沿岸地区…… 土耳其政府已經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作来組織进军以支援卡尔斯守軍和恢复亚洲的局势，如果它〈土耳其政府〉提出的計劃一个也不能实现，那末将来发生災禍时，它就不負任何責任。为了准备調遣部队，土耳其政府現在正派舰前往西佐波耳，在那里将开始載运部队等等。显然，土耳其政府仍旧有些疑虑：在英土部队已接到倫敦的要它們开往叶夫帕托利亚去的命令后，它是否还要采取这样坚决的步驟”。

8月已經快完了，而土耳其政府仍然感到自己在行动上受到克拉倫登的叶夫帕托利亚計劃的束縛。卡尔斯来的消息越坏，它的顾虑也就越大，最后它終於設法使当时已經到达塞瓦斯托波尔的雷德克利夫拍发了如下的一封信(第290号文件)：

雷德克利夫勋爵致克拉倫登伯爵

8月26日于塞瓦斯托波尔城郊

我請求立即明确地給予指示：奥美尔-帕沙是否可以从巴拉克拉瓦带走全部或部分土耳其部队，条件是这些部队将由同等数量的其他部队来代替，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允許让維維安將軍的部队去占据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陣地，而不是要它到叶夫帕托利亚去。人們天天在等待着奥美尔-帕沙。而奥美尔-帕沙提出授权他采取上述行动作为进行远征的先决条件。他举出了充足的論据來說明这一点。假如我們能够撥出运输工具，那末一个月之后，部队大概就能在列杜特-卡列登陆。威胁埃尔斯倫的俄軍已經向卡尔斯方面撤退。据报道，土耳其軍隊在8月初拥有的存粮大約可以維持两个月。

四

克拉倫登通过他的叶夫帕托利亚计划，终于在整個 8 月里阻撓了土耳其政府的一切行动。威廉斯將軍曾經說过：“卡尔斯的粮食恐怕吃不到 9 月初”，雷德克利夫的急电证实了他的話。下面我们引证的备忘录（第 315 号文件的附录）表明，卡尔斯的土耳其守軍以怎样非凡的自我牺牲精神坚持超过了威廉斯所說的期限。

1855 年 9 月 1 日于卡尔斯

我們用粮非常节省。兵士們只分配到半份面包和肉食或者米飯。有时候沒有面包，只有 100 德拉姆的面包干，别的什么也沒有了。沒有錢发。3 000 名伊斯兰教居民組成的步兵快要餓死了。阿尔明尼亚人接到了在明天撤离城市的命令。沒有大麦，几乎沒有任何飼料。馬匹瘦成一副骨架子，不能再被守軍利用了；炮兵用的馬匹很快也会变成这副样子。怎么能牵引野炮呢？…… 采取什么办法来挽救这支軍队呢？

署名：威廉斯

克拉倫登剛一确信卡尔斯的粮食最多能吃到 10 月初，而另一方面雷德克利夫又向他证实了，甚至在联軍的运输船只的帮助下，奥美尔-帕沙的部队最早也要到 10 月初才能抵达列杜特-卡列，因此他认为促使法国政府采納土耳其计划就不会再有多大的危險了。此外，克拉倫登知道，他正是在即将对塞瓦斯托波尔实行强攻的时候向法国政府提出要求的，因此，佩利西埃就有极充分的理由不让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部队在人員上有任何变动。为了隱瞞已收到的情报，他摘引了雷德克利夫的急电，并且歪曲了它的原意。

下面就是克拉倫登給考萊勳爵的急电：

1855年8月28日于外交部

女王陛下政府相信，帝国政府是会同意对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在8月26日从巴拉克拉瓦发出的急电作下列答复的。既然如此，就請閣下把这个答复直接通过潘繆尔勋爵轉給辛普森將軍，假如雷德克利夫子爵还在巴拉克拉瓦，辛普森將軍会把这个答复通知他的。答复全文如下：“奥美尔-帕沙可以把他所认为需要的他的部队从巴拉克拉瓦帶往亚洲；这些部队应当由从維維安將軍的部队中抽出同等数量的部队，或者根据联军將領的决定由从叶夫帕托利亚調来的部队来代替；在取得海軍上將們的同意后，应当发布一些关于运送他的部队的相应指令。”

署名：克拉倫登

甚至在这份急电中，克拉倫登也忍不住要得罪土耳其政府。尽管他从奥美尔-帕沙的許多备忘录中清楚地知道，从叶夫帕托利亚抽出部队来代替駐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奥美尔-帕沙的部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并且会給整个計劃带来极大的害处，然而他还是似乎 en passant [順便] 向法国政府建議由維維安的部队或叶夫帕托利亚的部队来代替塞瓦斯托波尔的部队。巴黎的答复是这样的：

电报

考萊勳爵致克拉倫登伯爵

1855年8月29日于巴黎

法皇不反对从巴拉克拉瓦調走土耳其部队和用其他部队来代替它們，如果联军最高統帥們对此表示同意的話；然而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自己沒有責任发表什么更多的意見。我拍了一封电报給辛普森將軍，在“亚洲”这个詞后面加上“如果您和佩利西埃將軍不反对的話”。

克拉倫登勳爵迫切地希望在这个危急关头加速实现明格列里亚远征，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9月7日他給西蒙斯中校的急电中，

这份急电是作为普通邮件发出的，因此，西蒙斯在9月23日才收到。克拉倫登在9月5日收到了西蒙斯中校的下列急电（第301号文件）：

“閣下，我应当向您报告，奥美尔-帕沙对我說，他最早也要过5—6天才能离开君士坦丁堡，因为他正忙于进行远征亚洲的一切必要准备工作，为了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他在这里是绝对必要的。”根据土耳其政府采取的措施，“奥美尔-帕沙只能依靠土耳其舰队把不到5万人和3400匹马分两次运往亚洲，而且把部队全部运完可能需要3—4个星期，即每次要用10—14天……奥美尔-帕沙很希望联军帮助他运送駐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部队及其武器装备，以及西佐波耳的輜重馬；他认为，如果准许英国舰队在把指定代替巴拉克拉瓦部队的部队运到以后，再从塞瓦斯托波尔把部队运往亚洲，这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好办法。”

克拉倫登对这个急电的答复如下：

克拉倫登伯爵致西蒙斯中校

1855年9月7日于外交部

先生！

您在8月26日的急电中关于奥美尔-帕沙提出的支援亚洲军队的措施的报告，是同女王陛下政府得到的最晚的消息相矛盾的。您在急电中說，奥美尔-帕沙打算从塞瓦斯托波尔带走一部分土耳其军队，并且用維維安將軍的部队来代替它們。但是从辛普森將軍后来拍发的电报中得悉，奥美尔-帕沙认为，在明年春天以前，維維安將軍的部队不适于占据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陣地。根据这个意見，并考虑到辛普森將軍反对把部队調到他那里去（他的反对也是以上述意見为根据的），女王陛下政府决定，不把部队派去同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军队会合。

克拉倫登

我們注意到，辛普森这位无能敗将的急电在藍皮书里是被漏掉了，奥美尔-帕沙的“意見”是一种借口，所謂“最晚的日期”，即奥美尔-帕沙提出与他在8月26日的意見相矛盾的新意見的日期是

在7月初,这一点可以从西蒙斯中校的急电的下列摘录中看出来。这个急电是西蒙斯中校在1855年9月23日从卡馬累兵营发出的。

“閣下,关于这一点,請允許我向您报告,奥美尔-帕沙还是在7月初……而且是在他知道亚洲军队处在危急状态之前給辛普森將軍的信中就提出了这种看法。当时他已經表示他坚信辛普森將軍并不打算在开闊地上(en rase campagne)与敌人发生冲突时就使用維維安的部队…… 腊格倫勋爵不止一次地問过我,我是否认为有可能利用維維安的部队来占据巴拉克拉瓦城郊的防綫,当我問奥美尔-帕沙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他对我說,假如腊格倫勋爵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話,他看不出这方面会有什么障碍。”

辛普森轉达了奥美尔-帕沙在明格列里亚远征問題提出討論以前所表示的意見,并且捏造了他的这个意見,然后根据捏造的东西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見,不言而喻,辛普森是在他“脑筋迟鈍”的情况下按照从倫敦收到的秘密指示行动的。可怜虫辛普森是帕麦斯頓的創作之一,是他的哥列姆之一。所謂哥列姆,就是像德国詩人阿尔宁所說的³²⁸,这原是一些大土块,奇妙的魔术师把它們变成人的模样,并赋予他們人为的生命。假定辛普森完全是按照克拉倫登急电中所說的那樣写的(藍皮书里漏載了这份急电,說明这也是有問題的),那末,当时克拉倫登無論对日期或对奥美尔-帕沙的意見的实质都不可能产生絲毫怀疑。早在7月15日,西蒙斯就告訴他,奥美尔-帕沙认为,“維維安的部队虽然可以担当警备勤务,但还不能派他們深入腹地”,在后来的急电中,他又說,“在巴拉克拉瓦和刻赤,維維安的部队将被配置在内层防綫上”,而不把它們放在“开闊地上”。

奥美尔-帕沙的明格列里亚远征的經過情形在藍皮书里沒有記載,但是已經透露出来的材料足以表明,盟国政府甚至在較晚的时期,即在他們十分勉强地同意远征以及在塞瓦斯托波尔南区已

被占领的时候，还在远征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的障碍。

西蒙斯在9月21日从卡馬累兵营给克拉倫登写道：

“9月18日佩利西埃将军同意把三个土耳其猎兵营从这里派往亚洲。过一两天，他们就要经海路到达巴士姆。到目前为止，佩利西埃将军还没有同意把驻在这里的其他土耳其部队派到亚洲去。”

9月26日雷德克利夫说：“土耳其政府对我的询问肯定地答复如下：部队的运送和军粮的运输工作正在进行，但是很缓慢，因为为这一目的而提供的运输工具的数量很有限。不能不看到，计划的无止境的变动，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战斗行动所引起的刻不容缓的需要，对运输工具的大量需要——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使得解救卡尔斯的希望正在减小。”

但是，计划的无止境的变动，这是英国内阁一手造成的；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战斗行动所引起的刻不容缓的需要，这是一个空洞的借口，因为联军在占领这个城市之后，守卫的只是一片废墟，而必要的运输工具之所以缺乏，是因为唐宁街一直在发布一些徒劳无益的命令，把维维安部队从瓦尔那运到叶尼卡列、刻赤、叶夫帕托利亚，又从这些地方运回博斯普鲁斯海峡。

这些阴暗的预感由于土军9月29日在卡尔斯城郊对俄军强攻纵队的像流星般的光芒一样的胜利而瞬息间消逝了。威廉斯将军在当天写的报告中把这一天称为“土耳其军队的光荣日”。他在10月3日的报告(第342号文件)中告诉克拉倫登说：

“在几乎延续了7个小时之久的战斗中，土耳其步兵同炮兵一样，也表现出了无比的英勇；如果想到兵士们几乎4个月来一直在修筑防御工事，而在夜间又要守卫这些工事，如果想到他们的衣着很差，领到的口粮不足半份，有29个月之久没有领到薪餉，那末我认为，阁下您应当承认他们的表现是值得全欧洲称颂的，他们无疑有权被列为欧洲的第一流军队。”

土耳其政府在接到这则令人兴奋的消息之后，就向卡尔斯的

保卫者拍发了賀电(第 345 号文件),賀电中写道:

“我們对鼓舞閣下的那种大无畏精神和热情,对上帝所賜予的无上恩典深信不疑,在这方面我們感到十分欣慰。另一方面,我們日以继夜地在謀求迫使敌人撤除圍攻的方法。关于这次胜利的令人兴奋的消息,鼓舞我們更加生气勃勃地工作。”

这則消息在克拉倫登的内心里将激起多么旺盛的新的生命力啊!他日以继夜地寻找一些方法,以阻碍土耳其政府所想出的办法的实现,因此他难道不想慷慨其詞地大談一番至少是假表同情的廉价的漂亮話嗎?可是完全不是这样!他自己打錯了算盘,于是就在一份簡短的带有挑衅性的諷刺急电(第 346 号文件)中把怒气发泄在土耳其政府身上:

“……孤立无援的卡尔斯守軍会滿意地知道,至少他們的痛苦……打破了土耳其大臣們的宁靜,这些大臣們因为缺乏一切通常的援助办法,所以只能始終不停地为守軍的安全和順利祈禱。”

克拉倫登过去是阿伯丁的沉默寡言的朋友,可是在这里却充当帕麦斯顿的可怜の傳声筒。

自从 9 月 29 日在卡尔斯城郊击退了俄軍的攻击以后,到 11 月 24 日要塞投降为止,又过了将近两个月。英国政府是怎样利用这段时间来改善局势的呢?第一,它迟迟不給奥美尔-帕沙調撥必要的运输工具。10 月 2 日“泰晤士报”記者奥利芬先生从奥美尔-帕沙的兵营报道說:

“土耳其軍队将逐漸成为一支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一旦从巴拉克拉瓦調来的 1 万名土軍到达这里之后(联軍將領們終于勉强同意把它們調来),土耳其軍队就将近有 5 万人了。部队迟迟不来的主要原因是我們在克里木的司令部拖延時間,它不給运输工具,所以不能把部队运到这里来,显然,司令部根本没有考虑部队来不来这里的問題。非常遺憾,奥美尔-帕沙对这次远征

感到不安的唯一重大原因也就是已經造成了那么多災禍的那个原因。”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早在7月份，帕麦斯顿在議會关于給土耳其貸款問題进行辯論时就說过，土耳其政府現在感到資金极端缺乏，它今后的全部行动将取决于它目前是否能得到資金。議會同意給予貸款，而英国政府在1855年8月也宣布了这笔貸款；但是从呈交議會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在撥給土耳其政府500万英鎊貸款中，到1856年1月29日只支付了200万，甚至这笔款項也是分成数目不大的10万英鎊一份寄出的。

还在1855年11月24日，土耳其政府就作过声明（見第353号文件，附录4）：

“最后，閣下〈土耳其陸軍大臣〉来看我并对我說，关于他为援助卡尔斯守軍而作的不断努力，我知道的一定不比他少。奥美尔-帕沙是由于种种原因而耽擱下来的，可惜他无权來說明这些原因。这是联軍的事情。一开始就很明显：沒有留在克里木的軍队的协助，土耳其軍队所能采取的那些措施，是不足以实现預定目的的…… 陸軍大臣閣下极其坚决地繼續向我說明，由于迟迟未付給貸款，土耳其軍队絕對不能完成今后作战所必需的一切任务。他們为滿足軍队需要而采购的100万公斤粮食还没有到手，因为他們付不出錢…… 他已經写信給总理大臣說，从今天算起，如果在一星期內还不能拿到这笔款項〈貸款〉他就要辞职了。”（曼斯菲尔德將軍致德·雷德克利夫勳爵的信）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恰好在卡尔斯投降的那一天，土耳其陸軍大臣令人信服地向英国軍事顧問說明了这场災難的真实原因，即由于联軍不让土耳其政府調动它自己的部队，所以奥美尔-帕沙的远征就拖延下来了，后来又由于英国政府不让土耳其政府使用它自己的資金，所以在10月和11月，一切战斗行动就都停止了。

当11月24日卡尔斯决定投降的时候，

“兵士們每天成百成百地餓死。他們變得骨瘦如柴，既不能作戰，也無力逃跑。婦女們帶着孩子到將軍家里去要飯吃，並且把孩子扔在那里；滿城全是屍體和快要死亡的人”（第 366 号文件）。

在克拉倫登不斷打亂土耳其政府的計劃、使它的兵力失掉活動能力並遲遲不把它自己的錢交給它的整個時期內，我們看到，他由於勸土耳其政府堅決行動、責怪它動作緩慢而一再使被束縛住手脚的土耳其政府感到討厭。在世界史上未必能找到比英國政府所幹的事情更能引起人們苦笑的事情了。英國政府由於在克里木、波羅的海和太平洋上進行冒險活動並且重賞促成這些失敗的肇事人，而把英國變成了歐洲的取笑對象；但是另一方面，同一個英國政府又以古羅馬的卡托一般的最严厉口吻責備土耳其政府，說它的軍事活動家和民政當局犯了錯誤。薩德勒之流的政府憤怒地指責帕沙們的賣身投靠；科德林頓和埃利奧特之流的靠山們堅決要求懲辦塞里姆-帕沙和塔希爾-帕沙；辛普森的 *improvvisatori*〔即席作者們〕生氣地对奧美爾-帕沙的靠山們皺起眉頭；潘繆爾——“請關懷一下多布”——教訓土耳其陸軍大臣；唐寧街及其斯密斯之流的醫生們，以及它的菲耳德之流、艾雷之流和戈登之流甚至在塞瓦斯托波爾委員會的會議上，為了在裝運洗膛杆和沖子時沒有捆扎好，沒有用蒲席包裝而責罵特拉比曾德的某一位帕沙，——這就是東方戰爭的真情實況。而首先要看到的是勇敢的克拉倫登用他那扣人心弦的言詞在抱怨土耳其政府的冷漠態度！他就像一個正式的瑟息替斯那樣，在責備丹納士諸女，說她們沒有把自己的無底桶填滿。

卡·馬克思 普魯士³²⁹

把法国变成賭場又把拿破侖帝国比作交易所的无法遏止的买空卖空現象，决不局限在这个国家的疆域之內。这个不受政治界限約束的瘟疫越过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萊茵河，并且（不管这是多么奇怪）席卷了庄严的德国。在这里，思想領域內的投机已經让位給有价证券的投机，*summum bonum*〔至善美德〕让位給奖金^①，辩证法的奥妙的語言让位給交易所的同样奥妙的語言，追求統一的願望让位給获取股息的强烈欲望。萊茵普魯士由于靠近法国，也由于它的工商业的高度发达，所以第一个傳染上了这种疾病。科倫的銀行家們不仅同巴黎的大騙子們結成了形式上的联盟，同他們一起收买了“比利时独立报”³³⁰作为共同的机关报，在卢森堡創設了国际銀行之后，他們不仅把德国的整个西南部吸引到«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的漩渦里来，而且在萊茵普魯士和威斯特伐里亚公国的疆域內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以致現在除去工人和小农外，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已卷进大发橫財的狂热里了，甚至小資產階級的資本也离开了通常的途徑，参加到最危險的冒險行徑中来，每一个小店主也都变成了炼金术士。普魯士其

① 額外的股息。——編者注

他地方也避免不了这种流行病，这从政府报纸“普魯士通訊”的下列摘录中就可以看出：

“最近对金融市场情况的观察证明着这样一种推测，即一个周期性的可怕的商业危机又在迫近。开始是在国外发生的无法遏止的投机的狂热浪潮，去年以来也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不仅柏林交易所和普魯士的资本家已被卷入这个漩涡，而且从前竭力避免直接参加证券交易所的危险交易的那些社会阶层也已卷入这个漩涡。”

普魯士政府用这种对于迫近的金融危机的恐惧，作为说明它不允许成立«Crédit Mobilier»的理由，因为它怀疑银行的光耀夺目的招牌掩藏着骗人的目的。但是，在这一种招牌下被禁止的东西，可以在另一种招牌下创办起来；在柏林不允许的，在萊比錫和汉堡可能准许。战争结束后，尽管出现了通常随着締結和約而来的商业的虚假繁荣现象（像1802年和1815年出现过的），投机狂热病的新阶段仍然开始了。这次我们看见了一个特点：普魯士形式上表示愿意为西方资本和投机买卖开放自己的市场。毫无疑问，我们很快就会听到其支綫通达北京的伊尔庫茨克大铁路的消息和其他同样宏伟的计划；问题不在于真正打算实现的是什么事情，而在于什么样的新鲜材料可以利用来维持投机的风气。为了加速普魯士政府所如此害怕的大崩溃，光是和約是不够的。

如果普魯士的工业最近几年来没有获得大的成绩，那末它这次破天荒地参加欧洲的投机事业就会是不可能的。从1840年到1854—1855年间，仅仅投入铁路的资本就从1900万普魯士塔勒增长到15400万。现在正在修筑的铁路的成本规定为5400万塔勒；此外，政府批准了修筑成本为5700万塔勒的新铁路綫。从1849年起的时期内，出现了87个股份公司，资本为8300万塔勒。

1854—1856 年間登記注册了 9 家保險公司，資本为 2 200 万。在这两年內，拥有 1 050 万資本的 6 家股份公司开办了大批紡織工厂。从“关于棉花的报告书”中可以看出，从 1853 到 1856 年期間运到欧洲各个港口的棉花总数是在起着怎样的变化。根据官方报告，上述各年的头 7 个月內棉花的出口捆数为：

| | 1853 | 1854 | 1855 | 单位：捆 1856 |
|------------|-----------|---------|---------|--------------|
| 向英国出口…………… | 1 100 000 | 840 000 | 963 000 | 1 131 000 |
| 向法国出口…………… | 255 000 | 229 000 | 249 000 | 354 000 |
| 向欧洲其他港口出口… | 204 000 | 179 000 | 167 000 | 346 000 |

从这些数字中得出的結論是，如果 1853 年欧洲大陆各国进口的棉花仅占輸入英国的棉花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那末 1856 年欧洲各国的进口已达英国进口的八分之五。此外还应当加上英国向欧洲各国轉口的棉花数量。向法国大宗出口棉花只是一种表面現象，因为其中大部分都从哈佛尔轉运到瑞士、巴登、法兰克福和安特卫普去了。因此，上述数字說明的欧洲工业的发展，首先是意味着德国工业、而主要又是普魯士工业的发展。地主們在战时由于荒年和高价所获得的利潤同工业資產階級近年来所积累的財富不相上下。在德國內部，不要說谷物的价格，就是馬、牛、一般家畜都保持了十分高昂的价格，以致用不着外国市場的影响就能使大地主們能够大发其財。正是这种財富——这两个階級从来沒有經歷过財富的这样迅速的积累——为目前正在普魯士猖獗的投机狂打下了基础。

当这个肥皂泡破灭时，普魯士政府就会經受严重的考驗。从 1849 年起，普魯士經歷了各种不同的反革命阶段，結果是人数不

多的貴族地主階級掌握了国家政权；曾經千方百計地协助加强这个階級的統治的普魯士国王，現在在同这个階級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正像路易十八在同 *Chambre introuvable*³³¹ 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一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不願滿足于父亲遺留給他的死气沉沉的官僚主义的政府机器。他一生都在幻想着以某种浪漫主义的哥德式的图案来裝飾普魯士国家的大厦。但是根据他的 *Herrenhaus* [貴族院] 活动的經驗，他很快就确信，实际上地主們，或者像普魯士人所称呼的 *Krautjunkers* [乡村紳士們]，决不认为替官僚制度充当中世紀的裝飾品是一种幸福；他們用一切力量竭力貶低这种官僚制度，把它降低到自己階級利益的單純工具的地步。这也就說明了容克們和政府之間、国王和普魯士王子之間发生冲突的原因。容克們为了向政府表示他們不是在开玩笑，他們剛不久就拒絕了批准和繼續征收战时实行的附加稅，这是在立宪的普魯士从未听見過的事情。他們冷靜而坚定地宣称：他們在自己的領地上有着跟普魯士国王在全国所有的同样充分的权力。他們頑強地力爭使宪法成为对其他一切階級來說是有名无实的东西，而对自己却具有实际的作用。他們一方面要摆脱官僚制度的任何監督，同时又想要这种官僚制度以双倍的力量压住所有其他的下层階級。

叛变 1848 年革命的資產階級不得已而看到，尽管借助于資本的不可遏止的积累而使自己获得了社会上的胜利，但是現在它却丧失了任何政治上的作用。加以 *Krautjunkers* 蔑視最基本的礼节，正在兴高采烈地利用一切借口使資產階級感到自己的卑賤。当資產階級的演說家企图在众議院发言时，容克們 *en masse* [全体一起] 离开自己的座位，当呼吁他們哪怕是听完跟他們的意見不同

的意見時，他們就對左派的先生們嗤之以鼻。當左派抱怨他們在選舉時受到阻撓時，他們得到的回答是：政府只不過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使群眾不受蠱惑。當左派指出貴族報刊所享有的充分自由與自由派的報刊所受的各种限制剛好相反時，人們就提醒他們說，自由在基督教國家里並不意味着滿足個人的任性要求，而是意味着滿足上帝和最高政權的願望。人們有時對左派暗示：“榮譽”是貴族的專有物，有時則用哈勒、博納德和德·梅斯特爾的早已被拋棄了的理論的明顯的例證來觸動左派的痛處。一個以自己在哲學領域內造詣至深而感到自豪的普魯士公民，在看到最優秀的學者被趕出大學，教育事業被委託給一幫蒙昧主義者，宗教法庭干預他的家務，而他本人在星期天都要被警察趕進教堂時，覺得受了侮辱。容克們並不千方百計地擺脫納稅為滿足；他們還把資產階級硬塞進行會、社團，破壞他們的市政機關，廢除了他們的法官的獨立地位和不能更換的規定，結束了各種宗教派別的平等權利，等等。在極少有的情況下，當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在議院內不再抑制他們胸中所積累的仇恨，而鼓足勇氣用將來要進行革命以威脅容克們時，容克們卻挖苦地回答他們說：革命同資產階級算的賬並不比同貴族算的賬少些。

要大資產階級像 1848 年那樣來重新領導普魯士革命，的確是不大可能的。在普魯士東部，農民不僅喪失了 1848 年革命在解放事業中所給予他們的一切，而且他們仍然像從前一樣無論在行政方面或司法方面都直接隸屬於貴族。在資本主要投于工業企業的萊茵普魯士，用抵押的方法使農民變成奴隸的過程同債款利息增長的速度一樣地飛快。當時奧地利政府雖然採取了某些細小措施來安撫農民，但是普魯士卻仍舊在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考驗

着农民的耐性。至于工人阶级，政府对他们的罢工采取猛烈镇压的办法，阻撓他们从主人所得的利益中获取他们应得的那部分，并且经常不断地排斥他们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王朝内部的不和，由于官僚同贵族、贵族同资产阶级的经常争吵而使政府分裂成相互敌对的派系，全面的商业危机和备受压迫的阶级对社会一切上层阶级的不断增长的愤恨，——这就是现代的普鲁士。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4 月 15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6 年 5 月 5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694 号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注 釋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釋

- 1 从本文起，馬克思开始在“新奧得报”上有系統地闡述議會关于1855年英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問題的辯論。

“新奧得报”（《*Neue Oder-Zeitung*》）是德国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日报，1849—1855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以本名出版。

該报是在1846年出版的天主教反对派的“奧得总汇报”（《*Allgemeine Oder-Zeitung*》）編輯部发生分裂之后于1849年3月創办的，它采取了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方針。在五十年代，該报被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受到了政府机关刊物的迫害。

五十年代初，該报的領導人是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埃尔斯納、泰梅和施泰因；从1855年9月起，摩里茨·埃尔斯納任“新奧得报”主編；报纸的发行人是斐·拉薩尔的堂兄弟、德国政論家麦克斯·弗里德兰德，馬克思是通过拉薩尔参加該报撰稿工作的。从1854年12月底起，馬克思开始以倫敦記者的身分給“新奧得报”撰稿，每周投寄两三篇通訊。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报刊的反动年代里，利用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刊物进行反对反动勢力的斗争是很重要的；給“新奧得报”撰稿使馬克思有可能同德国保持联系，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的經濟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問題介紹給德国讀者。針對着克里木战争，馬克思不断地給“新奧得报”寄去有关战事进程的文章；他在論述战争事件时有时全面地利用恩格斯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軍事評論，把它們譯成德文；馬克思有时把对恩格斯文章的簡述寄給“新奧得报”，在某些情况下还对这些文章作一些修改和补充。——第3頁。

- 2 馬克思在自己的分析議會辯論的文章中利用了“泰晤士报”发表的速記

- 記錄，并且參考了漢薩德在倫敦出版的刊物“議會辯論”(«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馬克思曾親自出席過幾次下院會議。——第3頁。
- 3 指1854年10月25日(13日)巴拉克拉瓦會戰，在這次會戰中，俄軍給英土部隊，特別是給英國騎兵以嚴重打擊。恩格斯在“巴拉克拉瓦會戰”一文中對這次會戰作了詳細的論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86—593頁)。——第3頁。
- 4 在紀元前216年第二次布匿戰爭時期，迦太基的統帥漢尼拔在坎訥(意大利)會戰中擊潰了羅馬軍隊。——第3頁。
- 5 “笨拙”(«Punch»)是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倫敦喧聲”(«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簡稱，1841年起在倫敦出版。——第4頁。
- 6 四項條款是西方列強在1854年8月8日的照會中作為進行和平談判的基礎的先決條件向俄國提出的要求。俄國必須放棄對莫爾達維亞、瓦拉幾亞和塞爾維亞的保護，代之以全歐的保護，容許在多瑙河自由航行，同意1841年倫敦公約關於海峽問題的修訂並放棄對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保護。沙皇政府起先拒絕接受四項條款，但是在1854年11月被迫同意把這幾項條款作為將來和平談判的基礎。——第4頁。
- 7 指英國、法國、奧地利在1854年12月2日在維也納簽定的同盟條約。按照條約，三國在沒有達成初步協議之前不得同俄國簽定任何協議，並且不容許俄軍佔領多瑙河各公國。一旦奧地利與俄國發生戰爭，英國和法國應當給予奧地利軍事援助。四項條款應當成為同俄國進行談判的基礎。條約中規定，如果在1855年1月1日以前經過談判還沒有締結和約，三國將議定下一步的一致行動。英國和法國力圖借助於這個條約把奧地利拖進反俄戰爭，而奧地利則想利用同西方列強的聯盟來加強它在巴爾干的勢力，並使多瑙河各公國屈從奧地利的統治。——第5頁。
- 8 “泰晤士報”(«The Times»)是英國保守派最大的日報；1785年於倫敦創辦。——第5頁。

- 9 殉道派教徒（意即自我牺牲者），这是中世紀在伊朗对伊斯馬伊耳派—阿薩辛派的秘密伊斯兰教派（什叶派）的最狂热的信徒的称呼，这个教派在十一世紀末由伊朗封建主創立，它反对在伊朗进行統治的突厥—塞尔柱人和十字軍。——第7頁。
- 10 皮尔派是拥护罗·皮尔的那一派（即温和的托利党人），他們支持皮尔在保存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統治的条件下对工商业資產階級采取經濟让步的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資產階級的利益，廢除了谷物法，結果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滿并导致托利党的分裂和皮尔派的孤立。在五十年代，皮尔派是議會中的一个沒有明确綱領的不太大的党团，照馬克思的說法，他們是“沒有軍队的軍官”；皮尔派参加了阿伯丁的联合政府（1852—1855），占据了包括軍职在內的最重要的职位。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皮尔派加入了自由党。——第7頁。
- 11 “新奧得报”編輯部曾根据倫敦的电訊在馬克思的文章末尾加上了下面一段話，本版已予删除：“据1月26日和27日倫敦电称，約翰·罗素勋爵在向議會說明自己辞职的原因的同时，还列举了其他有关文件以及他同阿伯丁勋爵的来往信件，他在信中坚决主張在軍事领导方面作某些改变。按照他的意見，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軍队的凄惨情况是不容置辯的，但是，他却不能根据自己的全部实际經驗去判明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帕麦斯顿勋爵批評約翰·罗素勋爵的辞职理由，但同时却同意必須以最大的毅力进行战争。他肯定地說，全部舰只都被适当而有效地使用着，它們正在把部队、制服和粮食运往克里木；他要求进行关于信任或不信任政府的正式投票。罗巴克的演說——虽然可以看出演說人是病了——不断为全体議員的雷鳴般的掌声所打断。阿伯丁伯爵在上院声称，虽然大臣們的有权势的同僚辞职了，但是他們仍然把反对关于任命調查委员会的提案看做是自己的职责。”——第8頁。
- 12 是指罗素出版的“查理·詹姆士·福克斯回忆录和通信集”1853—1854年倫敦版第1—3卷（《Memori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James Fox》. Vol. 1—3, London, 1853—1854）。这本书的第4卷在1857年出版。——第10頁。

- 13 皮由茲教派是十九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英國國教會中的一個流派。以它的創始人之一皮由茲的名字得名。皮由茲是牛津大學的一個神學家，他號召在英國國教中恢復天主教的儀式和天主教的某些教理。皮由茲教派的擁護者們在一些文章和小冊子裡闡述了他們的教理，這些文章和小冊子是由他們以“當代的論著”（*Tracts for the Times*）的總標題出版的，由此產生了他們的第二個稱呼：“論著派”。皮由茲教派是英國貴族反對工業資產階級的鬥爭在宗教上的反映，當時英國貴族力圖保持自己在國內的影響，抵制大部分屬於各個新教教派的工業資產階級。——第 12 頁。
- 14 軍隊中軍官官銜證明書的買賣制度在英國產生於十七世紀末。這一制度一直存在到 1871 年，它保障了英國貴族在軍隊中的壟斷地位。關於這種制度，在卡·馬克思的“軍銜買賣。——來自澳大利亞的消息”一文中有詳細的說明（見本卷第 118—121 頁）。——第 12 頁。
- 15 “歐洲戰爭”是恩格斯應馬克思的請求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關於克里木戰爭的許多文章中的一篇。

“紐約每日論壇報”（*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國報紙，1841—1924 年出版。該報由著名的美國新聞工作者和政治活動家霍拉斯·格里利創辦，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國輝格黨左翼的機關報，後來是共和黨的機關報。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該報站在進步的立場上反對奴隸占有制。參加該報工作的有許多著名的美國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受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查理·德納從四十年代末起是該報編輯之一。馬克思於 1851 年 8 月開始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一直到 1862 年 3 月，繼續了 10 年以上；為該報寫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寫的文章，涉及國際和國內政治、工人運動、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殖民地擴張、被壓迫國家和附屬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等極其重要的問題。在歐洲的反動時期裡，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這個發行很廣的美國報紙以具體材料來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病態和這個社會所固有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並且說明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

“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隨意處

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編輯部的社論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編輯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馬克思的抗議。在1855—1856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照例是作为社論发表的。在本卷所包括的时期內，只有两篇文章在該报发表时署上了馬克思的名字。

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經濟危机，报纸的財政状况受到影响，編輯部向馬克思提出减少写稿数量。在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馬克思完全停止了給該报写稿；馬克思所以和“紐約每日論壇报”断絕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編輯部內主張同奴隶占有制各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場。——第14頁。

16 見注108。——第14頁。

17 見注6。——第14頁。

18 恩格斯指自己的“俄国的兵力”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6—571頁）。——第15頁。

19 阿德里安堡和約是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1829年9月締結的和約。根据条約，多瑙河口和附近諸島嶼，以及庫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必須承认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賦予它們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来保障，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的国家（同土耳其的联系仅在于向苏丹納年貢），遵守以前就塞尔維亚的自治問題所締結的一切条約，并用特別敕令把这种自治法定下来。——第19頁。

20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倫敦創辦；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是激进派資產階級的机关报。——第20頁。

21 論著派。——見注13。——第21頁。

22 指第五次反拿破侖法国的同盟战争期間英国舰队于1809年远征些耳

德河口。英軍在占領伐耳赫倫島以後，沒有利用它作為擴展軍事行動的基地，4萬名登陸部隊因飢餓和疾病損失了1萬人左右，因而被迫撤離該島。——第21頁。

- 23 “上一屆英國政府”一文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創作合作的許多范例之一。1855年1月30日馬克思寄給恩格斯一份論述下台了的阿伯丁聯合政府的材料，而在1月31日寄給恩格斯的信中則擬就了這篇文章的詳細大綱。根據這個材料，恩格斯於2月1日寫成了這篇文章。這篇文章作為社論刊載在2月23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馬克思就同一問題為“新奧得報”寫了“被推翻的內閣”和“兩種危機”兩篇文章（見本卷第46—49、53—56頁）。——第25頁。
- 24 愛爾蘭旅 是大不列顛議會中愛爾蘭議員所組成的派別。在十九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這一派的大部分成員是民族運動中的右派即妥協派的代表，他們代表着愛爾蘭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大地主和天主教會教權派集團的利益。同時，在這一派中，還有依靠富裕租佃者的愛爾蘭自由派人物。在托利黨和輝格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愛爾蘭旅同曼徹斯特學派一起，能夠動搖議會中的力量對比，影響議會內部鬥爭的進程，有時還決定政府的命運。——第25頁。
- 25 1844年，詹姆斯·格萊安任大不列顛內務大臣，為了討好奧地利政府，他曾向英國郵政部門下令允許警察檢查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件，其中包括從1837年起就流亡倫敦的馬志尼的信件。——第27頁。
- 26 1853年5月31日羅素在下院會議的發言中宣稱，英國議會不應當同意國家去支持愛爾蘭的天主教會。因為天主教會僧侶對英國王室和憲法不夠忠誠。——第27頁。
- 27 南海公司 是在對南美和太平洋諸島進行貿易的名義下於1712年前後在英國成立的；它的真正目的是從事國家證券的投機。這個公司從政府那裡獲得了一系列的特權和壟斷權，其中包括發行國家有價證券的權利，展開了大規模的投機活動，這種活動在1720年以公司破產告終。破產的結果使國債大大增加，1853年格萊斯頓曾企圖用收買該公司的貶值股票的辦法來償還一部分國債。——第29頁。

28 指 1852 年 11 月向英国議會提出的关于爱尔兰大地主和佃农的法案。法案規定，在某种程度上放寬在爱尔兰租佃土地的条件。1853 年在联合政府的假同意下法案在下院通过了，因为联合政府希望爱尔兰議員支持自己的政策；但是，法案在上院却遭到了反对。在以后几年，法案从这届議會轉到那届議會，并被一再修改；1855 年 7 月，对这些法案的討論又被不定期地推迟下去。馬克思在自己的許多文章中对这些法案作了分析和評价（見本卷第 403—404、539—540 頁）。——第 29 頁。

29 流放法案 (Transportation Bill) 于 1853 年 8 月 12 日通过，它要求廢除用流放到殖民地服苦役的办法来懲罰犯罪行为。被判罪的人在审前羈押期滿后，得到一張假釋证，证明他可以在警察的监督下在英国居住，并且可以在社会性工作中充当廉价劳动力。馬克思在“战争問題。——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議會动态”一文中对这个法案作了評价（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278 頁）。——第 29 頁。

30 指英、法、普三国大使和奥地利代表根据奥地利政府的倡議于 1853 年 7 月 24 日在維也納召开的會議，會議的目的是調解俄土两国之間的緊張关系。會議拟定了一个調解性的照会（即所謂維也納照会），規定苏丹应当遵守庫楚克-凱納吉条約（1774 年）和阿德里安堡条約（1829 年），并且保护奥斯曼帝国的正教教会的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根据會議的决定，照会应当先送給沙皇，如果沙皇对它抱肯定态度，那就再送給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了照会的內容，同时保留自行解釋照会的权利，土耳其苏丹也同意照会，但是对照会提出了許多为沙皇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修正和保留。

在英、法、奥、普四国駐君士坦丁堡大使于 1853 年 12 月 12 日簽署的并于 1853 年 12 月 15 日递交土耳其的这份照会中，四国向土耳其政府表示願意进行調停，以恢复俄土两国之間的和平，并提出如下几項条件作为談判的基础：俄軍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恢复俄土之間先前一些条約的效力，以特別敕令来保证在土耳其的基督徒的权利，改变奥斯曼帝国的管理制度。——第 30 頁。

31 指英国駐彼得堡公使西摩尔勳爵同英国外交大臣約翰·罗素勳爵和后

来的克拉倫登之間关于西摩爾同尼古拉一世于1853年初就土耳其問題所进行的談判的秘密通信。由于約翰·羅素1854年2月17日在下院发表了反对俄國的好战演說，因此“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用法文出版)于1854年3月2日(2月18日)发表了一篇社論，暗示沙皇政府同英国政府在土耳其問題上有勾結，并引用西摩爾的通信来证明。英国政府被迫公布了上述通信。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函件”(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8—159、160—177頁)两文中詳細地分析了这些文件和英国政府在同尼古拉一世談判过程中所采取的模稜两可的立場。——第30頁。

- 32** 根据英国从1662年起实施的法律，貧民如果改变住址和向某个教区的济貧所請求救济，可以根据法院的决定强迫他返回原来的住处。1854年2月10日，曾經向下院提出了一項法案(Settlement and Removal Bill)，要求在英国和威尔士禁止强迫貧民迁移。法案沒有被議會通过。——第31頁。
- 33** 根据十八世紀初叶以来英国实行的法律，新选出的議會議員应当宣讀“退位誓詞”(宣誓他們否认詹姆士二世的后代有继承王位的权利)；誓詞全文包括一些效忠基督教的話。議員不宣讀誓詞就沒有权利积极参加議會的工作。在議會中不止一次地提出过修改誓詞的問題，但只是由于1866年的法令才刪掉了效忠基督教的話。——第31頁。
- 34** 馬克思在这里諷刺地暗指赫伯特对历史事实的混淆。赫伯特把1793年发生的事件归咎于1795年成立的执政內閣。1793年4月2日，即在革命的法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員和陸軍部长被派到杜木里埃將軍指揮的北部軍隊的大本营去傳達一項命令，這項命令要求杜木里埃出席国民公会，以便对背叛革命的控告进行审問。杜木里埃拒絕服从国民公会，逮捕了委員和陸軍部长，并把他們引渡給奧地利人。此后不久，杜木里埃公开投到奧地利方面去了。——第33頁。
- 35** 馬克思显然是指拜倫的諷刺作品“英国的彈唱詩人和苏格兰的評論家”

(«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第 34 頁。

- 36 少数派——馬克思指的是阿伯丁联合政府时期英国議會中的各个不同的小派別和集团，它們虽然人数不多，但起的作用却相当大，由于議會里缺少一个稳定的多数派，它們对議會內的斗争的进程有影响。馬克思在“政党和集团”一文中对議會里的派別和集团作了評述(見本卷第 50—52 頁)。——第 38 頁。
- 37 指帕麦斯頓在由英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所引起的英希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場。1847 年帕西菲科在雅典的房屋被焚毀，后来就成了当时外交大臣帕麦斯頓把英国舰队派往希腊海岸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借口。1850 年 6 月 25 日帕麦斯頓在下院就这次冲突所发表的侵略性演說中为自己的行动辯解，认为必須維護英国臣民的声望并把英国的臣民同古羅馬的公民相比。——第 43 頁。
- 38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 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72—1937 年在倫敦出版。在十九世紀中叶它是糾集在帕麦斯頓周圍的輝格党右派分子的机关报。——第 44 頁。
- 39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 是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報紙；从 1846 年到 1930 年用这个名称在倫敦出版。——第 44 頁。
- 40 “先驅报”(«*The Herald*») 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先驅晨报”(«*The Morning Herald*») 的簡称；1780—1869 年在倫敦出版。——第 45 頁。
- 41 梅费尔激进派 是假激进派(摩耳斯沃思、奥斯本等)集团的綽号，他們实际上代表向民主派献媚的那一部分英国貴族。“梅费尔派”一詞从倫敦豪华区之一的名称梅费尔而来，这个区是貴族的私邸区。——第 46 頁。
- 42 阿·凱特勒“論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社会物理学的經驗”1835 年巴黎版第 1—2 卷 (A. Quetelet. «*Sur l'homm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 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 Tomes

- I—II, Paris, 1835)。馬克思會引用的是本書的英譯本(1842年愛丁堡版)。——第50頁。
- 43 曼徹斯特學派是反映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英國經濟思想中的一派。這一派的擁護者即自由貿易派，主張貿易自由和國家不干涉經濟生活。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是曼徹斯特，在曼徹斯特領導這一運動的是1838年組織反谷物法同盟的兩個紡織廠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在四十五至五十年代自由貿易派組成了一個單獨的政治集團，後來加入了自由黨。——第51頁。
- 44 見注31。——第55頁。
- 45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中，本文的下面一段話被刪掉了。——第56頁。
- 46 恩格斯指自己的“阿爾馬河會戰”一文，該文對克里木戰爭時期俄軍和聯軍之間在1854年9月20日(8日)進行的一次大會戰作了分析(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0—565頁)。——第57頁。
- 47 指1811年比利牛斯半島戰爭期間(1808—1814)英軍在威靈頓指揮下對法軍占領的巴達霍斯要塞(西班牙)的圍攻。威靈頓曾兩度撤圍，去迎擊前來援救被圍的守備部队的法軍。——第60頁。
- 48 恩格斯大概是指他的“對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72—576頁)。——第60頁。
- 49 1851年12月2日法國波拿巴政變後，當時擔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帕麥斯頓與法國駐倫敦大使會談，贊成路易·波拿巴的篡位。帕麥斯頓這樣做沒有商得輝格黨內閣其他閣員的同意，結果使他於1851年12月提出辭職，而在原則上英國政府同帕麥斯頓的觀點是沒有分歧的，它在歐洲首先承認了法國的波拿巴政權。——第63頁。
- 50 指“評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61—663頁)。——第65頁。
- 51 “帕麥斯頓勳爵”是馬克思為“新奧得報”寫的一組有關1855年2月6

日成立帕麦斯頓政府的文章；这組文章基本上是著名的抨击文“帕麦斯頓勳爵”的梗概，这篇抨击文是馬克思在1853年秋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同时还在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全文发表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頁）。——第68頁。

52 英国議會于1850年6月討論与所謂帕西非科事件（見注37）有关的英希冲突問題时，政府（帕麦斯頓当时任外交大臣）的对外政策得到下院的贊同；相反，上院却以37票的多数表示反对政府在上述問題上的立場。法国和俄国也通过它們駐倫敦大使对英国的立場表示了自己的不滿：法国大使以示威的姿态离开倫敦，俄国大使不出席帕麦斯頓举行的宴会。——第70頁。

53 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輸入谷物的谷物法，是为大地主-土地貴族的利益而从1815年起在英国实行的。工业資產階級在貿易自由的口号下为反对谷物法而斗争，他們終于使谷物法在1846年廢除。——第70頁。

54 英法艦队在1832年封鎖些耳德河和荷兰海岸，其目的是迫使荷兰停止它为反对脫离了荷兰的比利时而于1831年重新开始的軍事行动。軍事行动于1833年停止。当时由于五大国（英、法、俄、普、奧）的串通，不論是荷兰或是比利时，都被迫接受了大国拟定的和約（1833）的折衷条件。

在葡萄牙內战时期（1828—1834），英国封鎖塔霍河口和杜罗河口。这次內战是在以葡萄牙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为首的专制制度拥护者（封建教权派）和立宪主义者（資產階級自由派）之間进行的。英国政府为了加强它在比利牛斯半島的势力和破坏支持专制制度拥护者的奥地利在这个地区的地位，把艦队派往葡萄牙海岸，封鎖了塔霍河口和杜罗河口，从而促进了立宪主义者的胜利。

英法艦队封鎖布宜諾斯艾利斯是在1845年开始的，其目的是迫使阿根廷政府对外国船只开放巴拉那河和其他河流。英法两国迫使阿根廷簽訂了相应的条約，終于在1852年达到了这一目的。——第71頁。

55 根据英国政府和双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王国)政府在1816年签订的条约,双西西里王国不得给予其他国家以损害英国利益的贸易特权。1838年那不勒斯国王授予法国公司在西西里岛开采硫磺的专利权,结果引起了英国的强烈抗议。为了迫使那不勒斯国王撤销自己的决定,英国政府于1840年命令它的地中海舰队开始军事行动,那不勒斯被迫实现了英国的要求。

关于因帕西菲科事件而引起的远征见注37。

马克思谈到的对波斯湾的远征,是指在1838—1841年英伊冲突期间英国舰队的行动;这次冲突是由于伊朗军队围攻阿富汗要塞赫拉特(最重要的贸易交通枢纽)而引起的。1837年伊朗国王穆罕默德向赫拉特的进军不仅是伊阿矛盾、而且也是英俄矛盾在这一地区尖锐化的结果。为了加强英国在阿富汗的势力和削弱俄国当时在伊朗的日益巩固的势力,为了迫使伊朗签订对自己不利的贸易条约,英国政府声称,伊朗国王的行动是敌视英国的行动,并且要求撤除对赫拉特的围攻。由于伊朗国王拒绝执行这项要求,英国政府同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并且以战争相威胁,于1838年把一个分舰队派往波斯湾。伊朗国王被迫撤除围攻,随后又同意同英国签订贸易条约。——第71页。

56 指英国对西班牙所谓的卡洛斯派战争(1833—1840)的干涉,这次战争是在以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为首的反动的封建天主教势力和支持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摄政女王政府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势力之间进行的。英国以援助西班牙政府为借口把舰队和不列颠志愿军团派往西班牙,这个军团参加了1835—1837年的军事行动。英国干涉西班牙事务的真实目的是力图巩固它在比利牛斯半岛的势力。

为输入鸦片而同中国进行的战争(即所谓1839—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这次战争开始,中国就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战争的导火线是中国当局在广州焚毁了外国商人的鸦片。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封建落后的中国战败的机会,迫使中国签订了掠夺性的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开放五个海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把香港岛割给英国作“永久的属地”,并且要中国偿付巨额赔款。根据1843年的补充议定书,中国

还应当让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第 71 頁。

- 57 1838 年，由于阿富汗王多斯特-穆罕默德拒絕同英国訂立反对伊朗和俄国的同盟，英国沒有能够使阿富汗变成自己政策的工具，故决定通过武装干涉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把自己的傀儡沙赫舒扎捧上王位。英国軍隊侵入了阿富汗，几乎占領和蹂躪了整个国家，俘擄了多斯特-穆罕默德；但是英国人的統治沒有維持多久。1841 年 11 月的人民起义粉碎并歼灭了英国軍隊。1842 年英国人又一次企图侵占阿富汗，結果同样遭到了彻底的失敗。

英奧艦隊对叙利亞要塞 圣让得阿克的轰击 是在 1839—1841 年土埃战争期間发生的。英国所以干預这次冲突是因为害怕俄国单独采取支持土耳其苏丹的行动，同时还竭力想孤立法国（法国在爭夺近东势力范围的斗争中曾指靠征服了叙利亞的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由于英国政府坚决主張，四大国（英、俄、奧、普）在 1840 年 7 月 15 日簽訂了关于給苏丹以軍事援助的倫敦协定。根据协定，向穆罕默德-阿利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即要求他服从苏丹并且把全部領地（埃及和叙利亞南部除外）立即归还苏丹。由于穆罕默德-阿利拒絕执行这一要求，英奧軍艦遂于 1840 年秋季轰击了位于叙利亞沿岸地区的貝魯特、圣让得阿克和其他要塞。穆罕默德-阿利被迫让步并接受了大国的最后通牒。——第 71 頁。

- 58 关于 阿德里安堡条約 見注 19。

巴尔塔利曼尼条約 是俄国和土耳其在派軍隊进駐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鎮压革命运动以后，于 1849 年 5 月 1 日（4 月 19 日）簽訂的協議。根据这一条約，占領制度一直保持到革命危机完全消除的时候（外国軍隊直到 1851 年才撤出这些公国），并且暂时地实行了由苏丹征得沙皇同意后任命国君的原則；条約还規定，如革命重起，俄国和土耳其应采取包括再一次进行軍事占領的許多措施。——第 72 頁。

- 59 指 1852 年 5 月 8 日，俄国、奧地利、英国、法国、普魯士、瑞典的代表会同丹麦的代表簽訂的关于保证丹麦君主国完整的倫敦議定书。該条約是以 1850 年 7 月 4 日倫敦會議的上述参加国（普魯士除外）所通过的

确定丹麦王国(包括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領地不可分割的原則的議定书为基础的。倫敦議定书指出俄皇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者之一(作为以彼得三世的名义在俄国称帝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查理-彼得-烏尔利希的后裔),这些继承人都放棄自己的权利,把权利让給被宣布作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继承人的格呂克斯堡王朝克里斯提安公爵。这就为俄国沙皇以后在格呂克斯堡王朝中斷的情况下覬覦丹麦王位造成了先例。——第 72 頁。

60 指俄国、英国和尼德兰的代表 1815 年 5 月 19 日(7 日)在倫敦簽訂的关于賠償俄国把拿破侖軍隊驅逐出荷兰和比利时各省所花的軍事費用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英国和尼德兰政府必須以賠償的形式向霍普公司的荷兰銀行家付清俄国的部分債款以及 1816 年 1 月 1 日以前尚未偿还的这笔債款的利息。协定的一項特別条款規定,一旦比利时的一些省脫离尼德兰,就将停止償清債款。在 1830 年革命和独立的比利时国家成立之后,尼德兰政府便停止了付款。但是帕麦斯頓代表英国政府在 1831 年 11 月 16 日(4 日)同俄国簽訂了一項承认英国过去所担負的財政債務的新协定。——第 73 頁。

61 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是俄国和土耳其在 1833 年 7 月 8 日(6 月 26 日)締結的条約。在条約簽訂之前,俄国登陆部队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地区安吉阿尔-斯凱萊西地方登陆。这支登陆部队派遣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去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伊布拉希姆-帕沙(反对苏丹的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之子)的軍隊。1833 年 5 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調停下同穆罕默德-阿利締結了和約,把叙利亞和巴勒斯坦割让給穆罕默德-阿利。尽管对苏丹的直接危險已經过去,但沙皇的外交还是能够利用緊張局势和俄軍駐扎土耳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締結防御同盟,并且在从法律上固定这个同盟的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中列入了一項秘密条文:土耳其必須根据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軍艦通过海峽。該条約第二条确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約和其他俄土协定。条約的有效期規定为 8 年。——第 73 頁。

62 根据 1829 年阿德里安堡条約,多瑙河口附近的群島划归俄国所有,但

- 同时必須保证各国商船在多瑙河航行的自由。然而在1836年根据政府化了的参议院3月2日(2月19日)的命令,在多瑙河的支流苏利納河口設立了俄国檢疫所,这个檢疫所实际上起了监督这段航綫上船只航行的关卡的作用。1836年4月在英国議会对这个問題进行辯論时,帕麦斯頓声称,俄国的作法无損于英土貿易,因此他不认为英国有进行外交干預的理由。——第74頁。
- 63 “公文集”(《*Portfolio*》)是戴·烏尔卡尔特在倫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汇编的簡称。“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丛刊在1835—1837年出版;新的丛刊是以“公文集.外交評論”(《*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名字在1843—1845年出版的。——第74頁。
- 64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是自由貿易维护者(自由貿易派)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年創刊于曼彻斯特。——第78頁。
- 65 指麦克尼耳匿名出版的小册子“俄国在东方的进展和現状”1836年倫敦版(《*Progress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 London, 1836)。——第81頁。
- 66 “紀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自1770年到1862年在倫敦出版;它是輝格党人的机关报,在五十年代初,是皮尔分子的机关报,后来是保守党人的机关报。——第84頁。
- 67 “經濟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周刊,1843年于倫敦創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85頁。
- 68 “欧洲面临的战争”一文是恩格斯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馬克思对該文作了删节和不大的修改,并把它分为两篇通訊稿寄給“新奧得报”：“議會和軍事問題”(見本卷第95—97頁)和“軍队的状况”。“軍队的状况”(《*Zustand der Armeen*》)一文在1855年2月24日的“新奧得报”上发表(編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在本版中沒有包括該文,因为該文的内容同“論壇报”上发表的完全一样。——第87頁。

- 69 *Blue Books* (藍皮書) 是英國議會公布的材料和外交部公布的外交文件的總稱。藍皮書因藍色的封皮而得名, 從十七世紀起在英國出版, 它是英國經濟和外交史方面的主要官方資料。——第 95 頁。
- 70 指威·弗·帕·納皮爾 “1807 年至 1814 年比利牛斯半島和法國南方戰爭史” 1828—1840 年倫敦版第 1—6 卷 (W. F. P. Napier.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 I—VI, London, 1828—1840)。——第 97 頁。
- 71 指 1845 年英國議會里討論關於給 1795 年創辦的梅努特天主教神學院 (在愛爾蘭) 增加津貼的問題。給神學院增加津貼的目的是要把愛爾蘭的天主教僧侶們吸引到英國統治階級方面來, 從而削弱愛爾蘭的民族解放運動。——第 100 頁。
- 72 指選舉法的改革, 關於選舉法改革的法案在 1831 年為英國下院所通過, 1832 年 6 月為上院最後批准。這次改革是反對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壟斷, 並為工業資產階級的代表進入議會打開通路。爭取改革鬥爭的主要力量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被自由資產階級所欺騙, 沒有獲得選舉權。——第 102 頁。
- 73 包括了憲章派的各項要求的人民憲章, 是 1838 年 5 月 8 日作為準備提交議會的一項法律草案公布的; 憲章包括了以下六點: 普選權 (賦予年滿 21 歲的男子), 議會每年選舉一次, 秘密投票, 各選區一律平等, 取消議員候選人的財產資格限制, 發給議員薪金。馬克思在本卷的其他文章中揭示了人民憲章的意義 (見第 156—157、268、300—301 頁)。——第 102 頁。
- 74 小憲章是一個關於選舉改革的法律草案的名稱, 這個草案是由英國資產階級激進派首領休謨在 1848—1851 年間不止一次地在英國議會中提出來以與憲章派的人民憲章相對立。休謨的法律草案規定: 凡有住房或部分住房 (Household Suffrage) 的人都有選舉權, 議會每三年改選一次, 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進行。它成了議會和財政改革全國協會

的綱領。

全国議會改革和財政改革协会由資產階級激进派在1849年建立，其目的就是宣傳休謨的小宪章和进行稅收改革。資產階級激进派拿自己的綱領与宪章派的要求相对抗，指望在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失敗后工人階級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情况下分裂宪章派运动，使工人群众接受自己的影响。受到科布頓、布莱特和以奥康瑞尔为首的宪章派的改良主义分子支持的資產階級激进派的鼓动并没有获得成功。大多数宪章主义者在五十年代仍然忠实于人民宪章。1855年全国議會改革和財政改革协会瓦解了。——第102頁。

- 75 羅馬皇帝卡利古拉把自己喜爱的馬封为執政官。——第104頁。
- 76 歐洲人把1526年在印度北部建立并于十八世紀开始衰敗的帝国的統治者称为大莫臥儿（认为他們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莫臥儿”一詞由此而来）。——第104頁。
- 77 暗指根据帕麦斯頓的提議任命罗素为出席維也納會議的英国代表，維也納會議是在1855年3月召开的（关于这次會議，見注108）。——第105頁。
- 78 天主教徒的解放是指英国議会在1829年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們获得了被选入議會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財產資格却被提高了4倍。英国統治階級指望用这种手段把爱尔兰資產階級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106頁。
- 79 济貧法 是1834年通过的法律，它只允許用一种方式来帮助貧民，就是将他們安置在习艺所中，习艺所的制度同从事苦役的牢獄中的制度不相上下，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獄”。济貧法所追求的目的是强迫貧民同意在艰苦的劳动条件下到工厂里去做工，从而为工业資產階級增加廉价劳动力的数量。——第109頁。
- 80 指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国工人的一次大罢工。1853年8月，普雷斯頓和四郊的棉紡織厂的織布工和細紡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資百分之

- 十；其他行业工人支持了他們。企业主联合会为了对付罢工，1853年9月宣布了同盟歇业。在3万名普雷斯頓工人中大約有25000人停止工作。由于其他城市工人的支援，普雷斯頓的工人得以坚持了36周之久。宪章派积极参加了为罢工者筹措資金的活動。1854年2月同盟歇业已停止，但罢工还在繼續。为了破坏罢工，企业主联合会开始把爱尔兰和英格兰习艺所的工人运到普雷斯頓。1854年3月，罢工的领导人被捕。工人由于基金耗尽而被迫复工。5月罢工結束了。关于普雷斯頓罢工的詳細情况，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和第10卷。——第110頁。
- 81 “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常常修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的开头部分，企图使人誤认为这些文章是在美国写的。在馬克思的这篇文章的头几行，也有該报編輯部所作的类似的修改。——第114頁。
- 82 惩治叛乱法案 (Mutiny Act) 是議会从1689年至1881年每年通过一次的法律，这项法律授权国王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軍和海軍，在陆海軍中实行各种軍事条令和制度，实行軍法审判，并制定惩治参加嘩变、違抗命令、違反紀律等等行为的制度。頒布第一个这样的法律是由于英国的兵变。——第118頁。
- 83 买卖宗教职位 是中世紀买卖教会职位的一种制度，宗教改革的拥护者早在十二世紀起就进行了反对这种制度的斗争。——第119頁。
- 84 1855年3月9日的“新奧得报”上发表了一則簡訊說，著名的英国医生格兰維耳在1853年曾向帕麦斯頓預言沙皇很快要死去，并且建議他在制定自己对俄政策时考虑到这一点。——第123頁。
- 85 皮蒂娅格言 是德尔斐城(古希腊)的阿波罗神殿女祭司-預言者皮蒂娅的格言。——第123頁。
- 86 “通报”(«*Moniteur*») 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簡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机关报。馬克思提到的那篇文章发表在1855年2月17日“通报”上。——第125頁。

- 87 馬克思指的是匿名小冊子“論東方戰爭的進行。克里木遠征。一個將軍致拿破侖第三皇帝陛下政府的短簡”1855年布魯塞爾版(«De la conduite de la guerre d'Orient. Expedition de Crimée. Mémoire adressé au gouvernement de S. M.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par un officier général». Bruxelles, 1855)。這本激烈批評克里木遠征的領導的小冊子的發表，在報刊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和廣泛的反應；這本小冊子被認為是出自拿破侖親王(小日羅姆·波拿巴)的手筆。——第125頁。
- 88 指1851年12月到1852年11月期間在“泰晤士報”上發表的英國新聞記者理查茲(署名“一個英國人”)關於路易-拿破侖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變的反波拿巴的文章。——第125頁。
- 89 下面馬克思引證的是登載在1855年3月3日“人民報”上的瓊斯在聖馬丁大廳的群眾大會上發表的演說。
- “人民報”(«The People's Paper»)是憲章派的週報，1852年5月由革命的憲章派領袖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內斯特·瓊斯在倫敦創辦。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為該報撰稿，同時對該報的編輯工作也給予幫助。“人民報”除了刊載馬克思和恩格斯專門給該報寫的文章外，還轉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章。在這個時期，“人民報”始終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和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由於瓊斯和資產階級激進派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為“人民報”撰稿，並暫時和瓊斯斷絕關係。1858年6月該報轉到資產階級投機商人手里。——第125頁。
- 90 指1839—1841年土埃戰爭期間英法在近東的矛盾的尖銳化。1840年7月15日，在沒有法國的參加下簽訂了關於給予土耳其蘇丹軍事援助以反對埃及執政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倫敦協定(見注57)，這就導致了英法關係的嚴重惡化和造成了戰爭的威脅。法國由於害怕列強結成反法同盟，不得不放棄對埃及執政者的支持。——第126頁。
- 91 1846年基佐政府為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小兒子蒙潘西埃公爵訂下了同西班牙公主瑪麗-路易莎-費南達的婚約，破壞了英國所策劃的親王列

奧波特·科堡同西班牙女王伊薩伯拉二世的婚盟。英法兩國政府之間為這些婚約而進行的鬥爭在 1846 年至 1847 年引起了英法關係的極端尖銳化。——第 126 頁。

- 92** 1713 年烏得勒支條約 是法國和西班牙為一方同參加反法同盟的國家（英國、荷蘭、葡萄牙、普魯士及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為另一方簽訂的結束爭奪西班牙繼承權的長期戰爭（1701 年開始）的一個和約。根據條約，西班牙王位仍留給法國的王位追求者——路易十四的孫子菲力浦·波旁，但法王必須放棄他合併法國和西班牙兩個王國的計劃，並放棄他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國支系的繼承者對西班牙王位的繼承權。條約批准把法國和西班牙在西印度和北美的許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羅陀割給英國。

帕麥斯頓在 1846 年和 1847 年譴責法國破壞烏得勒支條約指的是路易-菲力浦又想通過他的小兒子同西班牙公主的婚姻而合併兩個王國。——第 126 頁。

- 93** 指 1835 年愛爾蘭民族運動的自由派首領奧康奈爾（領導議會中的愛爾蘭議員團）和輝格黨的首領們所簽訂的協定。由於談判是在倫敦的利奇菲耳德勳爵的府邸內進行的，所以這個協定被稱為利奇菲耳德府邸協定。——第 134 頁。

- 94** 指為取消 1801 年英國同愛爾蘭的合併而進行的鼓動。英國政府在鎮壓了 1798 年愛爾蘭起義以後強加給愛爾蘭的這個合併，徹底消滅了愛爾蘭的自治權，取消了愛爾蘭議會。取消合併（Repeal of Union）的要求，從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起在愛爾蘭成為最普遍的口號。但是領導民族運動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奧康奈爾等人）把取消合併的鼓動僅僅看成是爭取使英國政府對愛爾蘭資產階級作某些小的讓步的手段。1835 年，奧康奈爾同英國輝格黨達成了妥協，完全停止了這種鼓動。但是在群眾運動的推動下，愛爾蘭自由派不得不在 1840 年建立了合併取消派協會，並力圖把它引上同英國統治階級妥協的道路。——第 134 頁。

- 95** 1848 年在愛爾蘭為求得國家的民族解放和建立共和國的人民起義已醞釀成熟。起義的主要發起人是密契爾、累洛爾和愛爾蘭同盟革命派

- 的其他代表。爱尔兰同盟是由于合并取消派协会（見注 94）的分裂而于 1847 年成立的。由于密契尔和运动的其他领导人的被捕，以及由于以斯密斯·奥勃萊恩为首的同盟自由派的妥协的、实质上是叛卖的策略，总起义没有举行。1848 年 7 月只是在各城市内发生了分散的起义，在各省内发生了农民的自发的发动，这些起义和发动都遭到了失败。英政府残酷地镇压了 1848 年爱尔兰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第 137 頁。
- 96 “克里木事件”一文是恩格斯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克里木軍事行动的总结”（《The Results in the Crimea》）的譯文，“克里木軍事行动的总结”一文作为社論于 1855 年 4 月 2 日发表。馬克思为“新奧得报”翻譯本文时曾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第 138 頁。
- 97 指俄土双方軍队在 1855 年 2 月 17 日（5 日）在叶夫帕托利亚的会战。——第 140 頁。
- 98 本文的开头几行是“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加的。——第 142 頁。
- 99 1809 年 5 月 21—22 日拿破侖第一的軍队与奥地利卡尔大公的軍队在阿斯佩恩地区（在多瑙河左岸，距維也納不远）进行了一次大規模的会战，結果奥地利軍队获胜。拿破侖第一为了挽救軍队免遭毁灭，把軍队撤离多瑙河左岸。——第 144 頁。
- 100 指 1813 年 10 月 16—19 日萊比錫会战，即欧洲各国同盟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中的决战，結果同盟国的軍队打敗了拿破侖第一的軍队。——第 144 頁。
- 101 暗指路易·波拿巴于 1836 年 10 月 30 日在斯特拉斯堡的不成功的叛乱。——第 145 頁。
- 102 霧月十八日（1799 年 11 月 9 日）是在法国完成資產階級反革命过程的政变；政变的結果，建立了拿破侖·波拿巴的軍事專政。
- 1800 年 6 月 14 日在馬連峨（意大利北部）会战中拿破侖·波拿巴的軍队战胜了奥地利的軍队。这是政变后波拿巴的第一次大捷，它促

使波拿巴的政权得到了巩固。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的霧月十八日的再版是指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十二月二日的政变。——第148頁。

103 “先驅”(《*The Leader*》)是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周报,1850年創辦于倫敦。——第151頁。

104 和平协会是教友会教派于1816年在倫敦建立的資產階級和平主义組織。协会得到了自由貿易派的积极支持。自由貿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貿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进而取得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統治。——第152頁。

105 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是英国議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

1850年2月高等控訴院(英国的高等法庭之一)宣判被控告破坏十小时工作日法的厂主无罪。这个判决事实上等于取消这个法律,因此引起了工人的反抗。于是1850年8月5日議会頒布了新的法律,規定女工和童工每日劳动10个半小时,并确定了工作日的起止時間。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制問題”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两篇文章中对1847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作了詳細的分析(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69—275、276—287頁)。——第153頁。

106 关于琼斯发表了演說的这次群众大会的报告載于1855年3月19日“晨邮报”和3月24日“人民报”。——第154頁。

107 俄国軍隊和英法軍隊在克里木的因克尔芒会战发生于1854年的11月5日(10月24日)。会战以俄国軍隊的失敗而告終,但俄軍的积极行动迫使联军放棄立即向塞瓦斯托波尔强攻而轉入对这个要塞的长期圍攻。在恩格斯的“因克尔芒会战”一文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詳細的叙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94—599頁)。——第158頁。

108 維也納會議是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代表在維也納召开的會議,目的是为了在进行克里木战争的各国之間拟定締結和約的

- 条款。會議于1855年3月15日開幕，斷斷續續一直开到1855年6月4日。所謂的四項条款(見注6)被列为談判的基础。俄国帶有若干保留条件地同意接受第一項、第二項和第四項条款，坚决拒絕第三項条款，即不同意西方各国对限制俄国在黑海的海軍力量的解釋。英法代表坚持要俄国无条件地接受所有条款。他們还否決了奥地利在最后一次會議上提出的折衷的建議。这个建議要求給予俄国和土耳其自行协商解决两国在黑海上能够拥有的海軍数量問題的权利。維也納會議沒有通过任何決議而停止了自己的工作。——第158頁。
- 109 *Ceterum censeo* 是老卡托通常在羅馬元老院結束他的每一次讲演时所慣用的一句話的开头几个字：*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 (可是，我认为迦太基必須被消灭)。——第159頁。
- 110 恩格斯写的“拿破侖最近的詭計”一文的片断以及“塞瓦斯托波尔会战”一文，曾由馬克思綜合縮写成“克里木的最近事件”(«Ueber die letzten Vorgänge in der Krim»), 这篇通訊稿发表于1855年3月26日的“新奧得报”上(編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6頁。
- 111 拿破侖亲王于1854年在克里木指揮一个师。他因为不贊成克里木远征，加之沒有足够的軍事才能，在軍隊中沒有声望，因此托病力求解脫軍事领导职务，而后便擅自返回巴黎。——第167頁。
- 112 关于本文的德文稿見注110。第一段看来是“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加的。——第170頁。
- 113 “新聞报”(«*The Press*»)——英国的一家周报，托利党机关报；自1853年到1866年在倫敦出版。——第175頁。
- 114 看来，馬克思指的是前托利党得比內閣外交大臣馬姆茲伯里勋爵于1853年3月到巴黎的訪問。关于这次訪問，正如1853年3月23日“泰晤士报”所报道的：拿破侖第三宴請了馬姆茲伯里，并同他进行了秘密会談。根据馬姆茲伯里自己的回忆录来看，在同法国皇帝会談时強調了巩固英法友好关系的必要性。——第175頁。

- 115 艾·日拉丹“和平”1855年巴黎版(É. Girardin. «La Paix». Paris, 1855)。——第177頁。
- 116 暗指路易·波拿巴的著作“拿破侖的觀念”，1839年在巴黎出版(Napoléon-Louis Bonaparte.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 Paris, 1839)。——第178頁。
- 117 倫敦 聖詹姆士宮 是十七世紀末葉英國國王的宮殿，十九世紀成為舉行隆重慶典和招待會的地方。——第179頁。
- 118 *Exeter Hall* [埃克塞特會堂]是倫敦的一座大廈，各宗教團體和慈善事業組織集會的地方。——第184頁。
- 119 本文第一段顯然被“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篡改過。——第191頁。
- 120 恩格斯指的是他的“克里木軍事行動小結”一文，該文的德文稿載於本卷第138—141頁。——第191頁。
- 121 指“克里木的最近事件”一文，該文的英文文稿載於本卷第170—174頁。——第197頁。
- 122 軍隊中的代役制在法國廣泛地推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它給有產階級造成了一種特權。每一個應召入伍的有財富的人都可以付出一定的代價為自己僱傭代役人。在十八世紀末葉法國革命時期曾經禁止代役，然而拿破侖第一又重新使它合法化了。在1855年4月軍隊中的代役制曾作了修改：按照新法，代役人如果不是被征者的近親，他們就由國家機關選定，代役款項則列入“軍隊補貼”特別基金。新法的目的是建立一支更加穩固和更加效忠於皇帝的軍隊。1872年法國的代役制被廢除了。——第200頁。
- 123 “弗拉·迪亞沃洛”(“魔鬼大哥”)是法國作曲家奧伯採用斯克里巴腳本編的喜歌劇。——第203頁。
- 124 指1848年6月23—26日巴黎無產階級的英勇起義，這次起義遭到法國資產階級的殘酷鎮壓。六月起義的失敗是歐洲各國反革命進攻的信號。——第208頁。

- 125 本文曾以“拿破侖的辯白”(«Napoleon's apology») 为題作为社論載于1855年4月30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第209頁。
- 126 关于阿德里安堡条約 見注19。
庫楚克-凱納吉条約 是在1768—1774年俄土战争俄国战胜后,两国于1774年7月21日(10日)簽訂的和約。根据这个条約,俄国得到了黑海北岸的南布格河和德涅泊河之間的地區,其中包括金布恩要塞;此外还得到了阿速夫、刻赤、叶尼卡列,并且迫使土耳其承认了克里木的独立,为俄国以后合并克里木造成了方便的条件。俄国商船获得了自由通过博斯普魯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条約还規定苏丹应給予正教教会一系列特权,其中包括第十四款关于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一座正教教堂的規定。
恩格斯提到的关于尼古拉皇帝的訃聞載于1855年3月27日“通报”上;訃聞中說:俄国对阿德里安堡条約的片面解釋是发动克里木战争的借口。其实,在克里木战争前夕就“圣所”問題进行的爭論中,俄国所依据的是庫楚克-凱納吉条約中規定正教教会享有特权的条款。——第210頁。
- 127 1808年7月20日,在西班牙独立战争时期(1808—1814)的拜兰会战中,由杜邦將軍指揮的法軍被西班牙軍隊包圍,他們放下了武器。
1813年8月29—30日,在反拿破侖法国的欧洲各国同盟战争时期,万当將軍指揮的法軍在庫尔姆(捷克)附近被奥地利軍隊包圍,全部被俘。——第210頁。
- 128 莫尔特克“1828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Moltke. «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 Berlin, 1845)。——第210頁。
- 129 “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一文是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報”写的、于1855年4月30日作为該报社論发表的“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圍攻”(«The Siege of Sevastopol») 一文的譯文。馬克思在翻譯此文时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第214頁。

130 恩格斯的这两篇文章是应馬克思的請求为在“新奧得报”和“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同时发表而写的。从“新奧得报”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中以及1855年4月17日馬克思写給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建議繼續批判泛斯拉夫主义的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揭露泛斯拉夫主义理論的反动实质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后来在報紙上沒有看到恩格斯关于这一題目的文章。

“紐約每日論壇报”在1855年5月5日和7日以“欧洲的斗争”（«The European Struggle»）和“奥地利的弱点”（«Austria's Weakness»）为題歪曲地登載了恩格斯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論壇报”編輯部在第二篇文章中加进了一整段話，贊揚了報紙撰稿人之一阿·古罗夫斯基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第218頁。

131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別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屬於該派的有代表大会領導者帕拉茨基，沙法里克）企图以維護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办法来解决民族問題。民主主义左派（薩宾納、弗利契和里別尔特等）坚决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張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屬於激进派和积极参加1848年6月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殘酷的迫害。布拉格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休会。——第222頁。

132 1804年塞爾維亞发生了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塞爾維亞人民世代反对土耳其封建主統治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土耳其近卫軍对塞爾維亞人的大屠杀。1804年2月，塞爾維亞广大人民群众在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做过海杜克的格奥尔基·彼得罗維奇（格奥尔基·車尔尼）的领导下群起投入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斗争。在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时期，俄国軍隊在巴尔干的順利挺进給塞爾維亞人的运动以重大的支持。在这次战争期間，塞爾維亞人赶走了土耳其侵略者之后，于1811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管理机构。按照1812年布加勒斯特条約，土耳其應該让塞爾維亞享有內政自治权。但是，苏丹乘拿破侖軍隊入侵俄国之隙撕毁条約，于1813

- 年征討塞爾維亞，並在那里暫時恢復了自己的統治。由於 1815 年塞爾維亞人又一次實行了勝利的起義，以及俄國在外交上的援助，土耳其的枷鎖終被打碎。在 1828—1829 年的俄土戰爭後，土耳其在 1830 年蘇丹的特別敕令中被迫承認塞爾維亞的自治（事實上的獨立）。——第 223 頁。
- 133 指沙皇俄國參與鎮壓 1849 年匈牙利的革命。——第 224 頁。
- 134 這裡恩格斯指的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布魯諾·鮑威爾，他在“俄國和德國”（1853）、“俄國和英國”（1854）等許多小冊子中實質上發展了泛斯拉夫主義思想。——第 225 頁。
- 135 1797 年英國政府頒布了一道專門的銀行限制令，規定銀行券的強制性的行價，廢除銀行券兌換黃金的辦法。到 1819 年才恢復了銀行券兌換黃金的制度。——第 226 頁。
- 136 奧·哈克斯特豪森“對俄國的內部關係、人民生活、特別是農村設施的考察”1852 年柏林版第 3 冊第 526 頁（A. Haxthausen. «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sslands». Dritter Theil, Berlin, 1852, S. 526）。——第 226 頁。
- 137 行政改革協會根據商業金融資產階級（西蒂區“實業界”）自由派領袖的倡議於 1855 年 5 月在倫敦成立。在報刊和議會調查委員會關於英軍在克里木遭受災難的報道的影響下，國內的不滿情緒更加嚴重。在這種情況下，行政改革協會指望依靠群眾集會來給議會施加壓力並使商業金融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能更廣泛地從英國貴族手中得到國家職位。協會的領袖們企圖和憲章派達成協議，以便在自己的反對寡頭政治的鬥爭中能預先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持，但是這些嘗試都沒有成功。憲章派在協會組織的群眾大會上和自己的群眾大會上依據人民憲章（見注 73）提出了議會改革的要求來與溫和的資產階級的行政改革要求相對抗。行政改革協會的鼓動宣傳沒有取得成就，於是不久協會便垮台了。關於協會和關於憲章派對協會的關係的比較詳細的說明見本卷第 252—255、267—269、298—301 頁。——第 227 頁。

- 138 馬克思指的是十八世紀德國作家維蘭特的諷刺小說“阿布德拉人”，在這本小說里敘述了由於微不足道的小事爭吵，這個古色雷斯城市阿布德拉的居民被分為兩派，兩派間的鬥爭幾乎把整個城市給毀滅掉。小說的第1版於1776年在魏瑪出版。——第228頁。
- 139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是整個歐洲的戰爭，它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間的鬥爭而引起的。在捷克發生的反對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制度的壓迫和天主教反動進攻的起義是這場戰爭的開端，隨後戰爭又演化為封建的天主教陣營（羅馬教皇、西班牙和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的天主教公爵）和新教國家（捷克、丹麥、瑞典、資產階級的荷蘭和經過宗教改革的德意志各邦）之間的戰爭，新教國家會得到法王——哈布斯堡王朝的對手的支持。德國是這次鬥爭的主要場所，是戰爭參加者的軍事掠奪和侵略的對象。戰爭在第一階段帶有反抗歐洲封建專制反動勢力的性質，但後來，特別是從1635年起變成了相互競爭的外國掠奪者對德意志的一系列的入侵行為。戰爭於1648年以簽訂使德國在政治上的分散性更加鞏固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而告終。——第228頁。
- 140 馬克思指羅馬教皇庇護九世。庇護九世於1846—1848年初在意大利的革命運動發展的條件下在教皇國內進行了對貴族和工商業資產階級有利的一些溫和的自由主義的改革，以防止革命的發展。——第229頁。
- 141 指奧迪隆·巴羅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代表於1848年二月革命的前夜在法國所進行的爭取選舉改革的宴會運動中所起的作用。與資產階級反對派右翼接近的以奧迪隆·巴羅為首的法國議員團（所謂王朝反對派）參加了這個運動的組織，並竭力使整個運動對七月王朝不帶有危險的性質。王朝反對派在提出溫和的選舉改革的同时，認為這是預防革命和保存奧爾良王朝的一種手段。——第229頁。
- 142 恩格斯的“塞瓦斯托波爾的消息”一文以“對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Die Belagerung von Sebastopol»）為題刊登於1855年5月11日“新奧得報”上。該文的德文稿有顯著的刪節。——第230頁。

- 143 指維也納會議的暫時中斷，原因是參加談判的代表在對俄國提出的第三項條款問題上意見有分歧（見注 108）。俄國拒絕了西方國家關於限制它在黑海的海軍力量的要求，於是 1855 年 4 月 26 日維也納會議就暫時中斷。維也納會議的最后一次會議在 1855 年 6 月 4 日舉行。——第 230 頁。
- 144 這個消息是錯誤的。恩格斯根據核實的材料在“克里木戰爭”（見本卷第 259—266 頁）一文中談到這一點。所舉的俄軍要塞在 1855 年 6 月 7 日（5 月 26 日）才被聯軍占領。——第 230 頁。
- 145 本文原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它以“克里木的新攻勢”（«The new move in the Crimea»）為題作為社論於 1855 年 5 月 29 日在該報發表。由於“論壇報”編輯部對英文稿顯然作了修改，特別是關於聯軍在克里木的軍隊數量，該報根據駐倫敦記者普爾斯基的報道列出了不同的統計數字，因此俄譯文是按“新奧得報”刊出的原文翻譯的。——第 240 頁。
- 146 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徹斯特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於 1838 年創立的。同盟要求貿易完全自由，廢除谷物法（關於谷物法見注 53），其目的是降低工人工資和削弱土地貴族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對土地占有者的鬥爭中曾經企圖利用工人群眾，可是就在這個時候，英國的先進工人已經展開了獨立的、有着自己政治見解的工人運動（憲章運動）。在 1846 年谷物法廢除後，同盟就不再存在了。由於同盟開展運動的結果，托利黨的皮爾政府廢除了谷物法，這就引起了托利黨的分裂，為輝格黨人在 1846 年取得政權打開了方便之門。——第 245 頁。
- 147 指 1716 年的議會法令（Septennial Act），這個法令從輝格黨寡頭政治的利益出發，把議會任期從 3 年增加到 7 年。——第 246 頁。
- 148 關於習藝所見注 79。——第 246 頁。
- 149 關於伐耳赫倫遠征見注 22。——第 248 頁。
- 150 本文曾以“議會外的風潮”（«Die Aufregung außerhalb des Parlaments»）為題刊載在“新奧得報”上。本版保留了“馬克思恩格斯全

- 集”第1版的标题。——第252頁。
- 151 指倫敦憲章派組織委員會，該委員會是在“歡迎和抗議委員會”改組后于1855年2月成立的。（歡迎和抗議委員會是根据厄·琼斯的倡議于1854年10月建立的，其目的是在倫敦組織隆重的欢迎会，欢迎被釋出獄的1848年法国革命参加者巴尔貝斯，并准备示威游行，抗議拿破侖第三拟在这个时候前来倫敦。）倫敦組織委員會与憲章派中央执行委員會一起行动，并給自己提出如下的任务：在倫敦恢复群众性的憲章运动，并加强民主力量的国际协作。委員會的成員有：琼斯、哈里逊、泰勒和其他人；由委員會选出的七人小組执行建立国际联系的任务，这个小組同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在倫敦的流亡者代表共同組成国际委員會。1855年年底倫敦組織委員會宣告解散，国际委員會便成了独立的組織。它在1856年改名为国际协会，一直存在到1859年。——第253頁。
- 152 馬克思指1855年5月12日“人民报”的社論，这篇社論揭露了行政改革协会的阴谋和它向憲章派献媚的意图。——第255頁。
- 153 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引用了自己的文章“克里木的新攻勢”，該文的德文稿譯載于本卷第240—243頁。——第259頁。
- 154 普軍和法軍的耶拿会战发生于1806年10月14日，以普軍的潰敗而結束。——第263頁。
- 155 唐宁街是倫敦中心的一条街，政府的所在地。——第267頁。
- 156 指一本匿名的小册子“西蒂区或倫敦实业界的生理現象以及对交易所和咖啡館的短評”1845年倫敦版（《The City, or the Physiology of London Business; with Sketches on'Change and at the Coffee Houses》. London, 1845）。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援引了这本书。——第268頁。
- 157 1855年4月11日在“通报”上刊載了一篇社論“东方远征”，在这篇社論里引用了拿破侖第三給圣阿尔諾元帅的指令。恩格斯在“評拿破侖在‘通报’上的社論”一文中对这篇社論作了詳尽的分析（見本卷第

- 209—213 頁)。——第 270 頁。
- 158 1854 年 7 月，法軍在埃斯潘納斯指揮下向多布魯甲進行了遠征，這次遠征由於大量兵士患霍亂和其他疾病而死亡，所以遭到了失敗。——第 271 頁。
- 159 1851 年 12 月 1 日夜，由埃斯潘納斯指揮的囚裏面的一個營奉命守衛國民議會；被波拿巴分子所收買了的埃斯潘納斯在 12 月 2 日率領軍隊占領了國民議會大廈，從而促進了路易·波拿巴政變的勝利。——第 271 頁。
- 160 指 1855 年 5 月 22 日迪斯累里在下院會議上的聲明，他說在最近幾天將把致女王的方案提交議會討論，在方案中對帕麥斯頓政府在和平和戰爭問題上所採取的搖擺政策表示不滿。這項提案於 1855 年 5 月 24 日提交給議會，並引起了熱烈的辯論。馬克思在自己的許多文章中對這些辯論作了分析（見本卷第 283—294、304—307、316—319 頁）。——第 272 頁。
- 161 本文談到克里木最近事件的那一部分（即一直談到任命佩利西埃的情況的那一段）是恩格斯寫的“新的法國總司令”（«The new French Commander»）一文的譯文，該文作為社論在 1855 年 6 月 12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第 274 頁。
- 162 從 1547 年起，下院的會議在聖斯蒂凡教堂（韋斯明斯特宮）內舉行。——第 280 頁。
- 163 1848 年二月革命之後的法國階級力量的配置和巴黎工人六月起義的失敗，使得波拿巴集團有可能利用普選權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總統選舉中把路易·波拿巴推上共和國總統的位置；1851 年，在實現十二月二日政變時，路易·波拿巴陰險地利用了恢復 1850 年 5 月 31 日被法國立法議會廢除了的普選權的口號。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中對這些事件作了分析。——第 300 頁。

- 164 1842年資產階級的激進派以及主張自由貿易的自由派曾多次企圖使工人運動置于自己的影響之下，並利用工人運動來進行廢除谷物法和資產階級改革的鼓動。他們提出了含糊不清的可以有各種解釋的所謂“完全選舉權”的要求，以便使工人們離開爭取實現憲章派的社会和政治綱領的鬥爭。資產階級激進派依靠憲章派的某些具有妥協情緒的領袖(洛維特和其他人等)，於1842年在北明翰召開了兩次資產階級和憲章派的代表會議，在會議上提出了共同鼓動選舉改革的問題。但是，以新的“權利法案”和“完全選舉權”的要求來代替人民憲章的建議被代表會議的憲章派大多數堅決否決了。人民憲章從這時起成了廣大人民群众的唯一的的要求。——第301頁。
- 165 指摩耳斯沃思在1839—1845年出版的“托馬斯·霍布斯全集”，其中有11卷是英文版，5卷是拉丁文版。——第305頁。
- 166 馬克思所指的是哈姆雷特的一段獨白(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場)，在這段獨白中哈姆雷特在教導演員，要求他們在表演時要有節制。——第305頁。
- 167 指查·拜比吉“論機器和工廠的經濟性質”1832年倫敦版(Ch. Babbage.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1832)。——第305頁。
- 168 指布尔韦尔·利頓的小說“最後一個男爵”和“尤金·阿拉姆”。前部小說塑造了十五世紀英國封建內訌主要參加者之一沃里克伯爵(綽號“國王製造者”)的形象。——第305頁。
- 169 本文第一、三兩段開頭談到從“亞細亞號”輪船和從哈里法克斯城獲得消息的那幾行話，是“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加的。——第308頁。
- 170 本文經恩格斯壓縮并由馬克思稍加文字上的修改後，另以“評克里木的軍事行動”(«Kritik der Krimischen Unternehmungen»)為題發表於1855年6月15日“新奧得報”上。“紐約每日論壇報”刊出的這篇文章的第一段是該報編輯部加的。——第320頁。
- 171 恩格斯指的是自己的文章“對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該文的德文稿

- 譯載于本卷(見第 214—217 頁)。——第 321 頁。
- 172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 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1815 年至 1870 年在巴黎出版; 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 它在 1848 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观点; 1851 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326 頁。
- 173 指 1849 年 7 月, 由于法国政府的武装干涉, 罗马共和国被推翻和教皇的世俗权力得到恢复一事。作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是这次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之一。——第 326 頁。
- 174 提尔西特和約 是拿破侖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魯士在 1807 年 7 月 7 日和 9 日签订的和約。和約条件对普魯士极为苛刻, 使普魯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領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屬地)。俄国没有丧失什么土地, 反而获得了普魯士割让給它的別洛斯托克地区。但是, 亚历山大一世必須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領的地方和拿破侖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 以及拿破侖对伊奥尼亚群島的統治权, 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 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鎖(即所謂大陆封鎖)。——第 329 頁。
- 175 指 1854 年 4 月 20 日奥地利与普魯士之間訂立的同盟条約。根据这一条約, 两国有义务在俄国拒絕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而繼續在巴尔干进军时共同对俄作战。——第 331 頁。
- 176 Lower Empire (原文是法文 *Bas-Empire*) 是历史著作中使用的拜占庭帝国的称号; 这个名詞变成了表示处于没落和腐朽阶段上的国家的普通名詞。——第 331 頁。
- 177 查·納皮尔的信发表于 1855 年 6 月 15 日“晨报”上。——第 333 頁。
- 178 馬克思答应“新奧得报”的一篇文章并没有发表。——第 334 頁。
- 179 領港公会 是倫敦的一座大厦, 十六世紀成立的旨在促进貿易和航海的不列顛海員团体的理事会就設在这里。——第 334 頁。

- 180 “雷諾新聞”（*«Reynolds's Newspaper»*）是英國的激進派的週報；從 1850 年起由雷諾在倫敦出版；在五十年代初支持過憲章派。——第 340 頁。
- 181 普魯德“維也納會議”1815 年巴黎版第 1 卷第 262 頁（Pradt. *«Du Congrès de Vienne»*. Paris, 1815, t. I, p. 262）。——第 343 頁。
- 182 Knesebeck. *«Denkschrift betreffend die Gleichgewichtslage Europa's beim Zusammentritte des Wiener Congresses verfaßt»*. Berlin, 1854, S. 11—14. ——第 344 頁。
- 183 大概是指亞·格·鄧洛普“哥薩克的統治和俄國在歐洲並對德國的影響”1855 年倫敦版（A. G. Dunlop. *«Cossack Rule, and Russian Influence in Europe and over Germany»*, London, 1855）。——第 346 頁。
- 184 馬克思的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關於占領塞瓦斯托波爾的報道）是以單獨通訊的形式刊登在“新奧得報”上，該報編輯部作了相應的修改。本文的這一部分的俄譯文第一次發表。——第 353 頁。
- 185 “夢行者”是意大利作曲家文琴佐·貝利尼的歌劇。——第 353 頁。
- 186 *«God save the Queen»*（“上帝，保佑女王”）是英國國歌；
«Rule Britannia»（“統治吧，不列顛”）是英國民族頌歌；
«Partant pour la Syrie»（“向敘利亞出發”）是第二帝國時期在拿破侖第三的慶祝會上演唱的正式歌曲。——第 353 頁。
- 187 1854 年 9 月底拿破侖第三在布倫舉行閱兵的時候，他曾根據謠言宣布：塞瓦斯托波爾被聯軍占領了。——第 353 頁。
- 188 “俄國殘廢者”（*«Русский инвалид»*）是陸軍部機關報，從 1813 年至 1917 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從 1816 年起改為日報。
 1855 年 6 月 1 日該報登載了漢格事件的消息（指的是 1855 年 5 月對在漢格島登陸的英國巡航艦的小艇上的船員的襲擊，俄國駐防軍把他們當成了偵察部隊）。——第 354 頁。

- 189 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拿破侖第一的軍隊被威灵頓指揮的英荷联軍和布魯赫爾指揮的普魯士軍隊所击潰。——第358頁。
- 190 馬克思指的是英国流傳的一句話:«It's Hamlet without the Prince» (“这是沒有王子的哈姆雷特”),意即在这件或那件事情中缺少了主要的东西。——第358頁。
- 191 “地球报”(«*The Globe*»)是英国一家日报“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的简称,1803年起在倫敦出版,輝格党机关报,在該党执政的时期是政府报纸;1866年起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359頁。
- 192 在这里和这一段的前面部分,馬克思引用“評克里木的軍事行动”一文(該文的英文稿譯載在本卷第320—325頁),以及“帕麦斯頓勳爵官邸演出的喜劇序幕。——克里木最近事件的經過”一文(見第274—277頁)。——第359頁。
- 193 关于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 見注61。
达达尼尔海峡条約 是指1841年7月13日俄、英、法、奧、普同土耳其簽訂的关于海峡的倫敦公約。公約規定,博斯普魯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和平时期禁止所有强国的軍艦通行。公約未涉及战时海峡的制度,从而在形式上承认土耳其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有权决定关于外国軍艦通航的問題。——第361頁。
- 194 高教会派 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它的信仰者多半是貴族,它保持了古老的豪华的仪式,強調与天主教的傳統联系。
低教会派 是英国国教会中的另一派,它主要是傳播在資產階級和下层牧师中間;它与高教会派相对立,着重宣揚資產階級基督教的道德。
非国教徒 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国教会信条的各宗教教派的教徒。——第363頁。
- 195 根据英国議會通常的程序,在討論某些重要問題时,下院即宣布作为全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开会;由下院議長

在主席名单中指定一人担任全院委员会主席 (Chairman of Committees) 主持会议。——第 364 頁。

- 196 指 1840 年 7 月在倫敦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年代会员达到 4 万人。协会的活动表明会员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一致，表明宪章派大多数领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1848 年宪章派失败后，革命宪章运动的先进的、倾向于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厄·琼斯试图在五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组宪章运动。这一点在宪章主义公会 1851 年通过的纲领中得到了反映。1855 年，在当权的寡头政治家的政策在国内引起了广泛不满的条件下，革命的宪章派又企图恢复争取人民宪章 (見注 73) 的群众运动，并重新提出了改组宪章派、从组织上巩固宪章派协会的口号。1855 年夏季举行了一系列的宪章派地方委员会的选举，8 月举行了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的选举，被选入执行委员会的有：厄·琼斯、罗宾逊和芬倫。

在五十年代的后半期，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断地位和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上层人物的收买，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增长了机会主义倾向，这就导致了宪章运动的低潮，宪章派全国协会的活动也实际上停止了。——第 366 頁。

- 197 見注 33。——第 373 頁。
- 198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的簡写稿以“論克里木事件” (《Über die Ereignisse in der Krim》) 为題发表于 1855 年 7 月 2 日“新奧得报”。在“紐約每日論壇报”登載的文章的第一段显然被該报編輯部改动过。——第 375 頁。
- 199 本文有关軍事事物的这一部分以及下面发表的一篇文章“六月十八日的强攻”(見本卷第 394—397 頁) 是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并于 1855 年 7 月 21 日在該报上作为社論发表的“联軍的最近一次失败” (《The late repulse of the Allies》) 一文的譯文。——第 390 頁。
- 200 派尔·麦尔 是倫敦的一条大街，許多貴族俱乐部都設在这里。——第 390 頁。

- 201 *Treadmill* 是一种阶梯式的笨重輪子,由人踩踏而轉动。在英国監獄內强迫犯人轉动这种輪子作为一种懲罰。——第 391 頁。
- 202 *Court of Chancery* (大法官法庭) 是英国的高等法庭之一,在 1873 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庭由大法官領導,其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約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大法官法庭在审理案件时以其故意刁难和拖延而著名。——第 401 頁。
- 203 *Committee of Supply* (撥款委员会)——根据英国議會通常的程序,在討論有关弥补国家开支的許多重要問題时,下院向王室宣布作为撥款委员会开会。这是下院作为全院委员会开全体會議的一种場合(見注 195)。——第 402 頁。
- 204 本文第二部分(关于克里木事件)就是恩格斯写的“在克里木所犯的巨大錯誤”(«The great Crimean blunder»)一文,該文作为社論发表于 1855 年 7 月 27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在“新奧得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时,馬克思刪去了某些細节。——第 405 頁。
- 205 但丁“神曲”第一部“地獄”第三篇。——第 412 頁。
- 206 先决問題 (previous question) 是英国議會中的一种議事程序,通常想迴避作出这一或那一問題的決定时,就采用这种程序。在辯論某一提案的过程中,把“先决問題”提付表決:是否可以“现在就对这一問題进行表決”(«that this question be now put»)。議院如果作出否定的回答,那末对基本問題的处理就要延緩进行。如果提出肯定的回答,表決就立即进行,无須再作辯論。——第 412 頁。
- 207 *Impeachment* 是下院向上院法庭控告个别大臣或議員的違法行为的起訴。保证下院有权監督大臣行为的这种慣常做法在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經常采用,在十九世紀实际上已从議会的實踐中消失了。——第 414 頁。
- 208 1855 年 6 月 27 日英、法和土耳其簽訂了关于英法政府保证給土耳其貸款 500 万英鎊的协定。因此英国政府于 1855 年 7 月向下院提出了关于保证給土耳其貸款的法案,法案遭到了大多数議員的反对。辯論

- 結果，法案以微弱的多數通過了，並在 8 月得到了國王的批准。——第 424 頁。
- 209 馬克思後來把對威克菲爾德殖民地化理論的評論收入“資本論”第 1 卷第 25 章內。——第 425 頁。
- 210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 1 卷第 4 章的注 51 內利用了這個議會委員會的材料。——第 426 頁。
- 211 “工廠視察員向女王陛下內務大臣所作的截至 1855 年 4 月 30 日為止的半年工作報告”1855 年倫敦版（《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5》. London, 1855）。馬克思在“資本論”第 1 卷第 7 章的注 32 內利用了這份報告。——第 426 頁。
- 212 卡·馬克思的抨擊文“約翰·羅素勳爵”的簡寫稿以同一標題於 1855 年 8 月 28 日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第 429 頁。
- 213 “尊敬的艾德蒙·伯克就培德福德公爵和羅德戴爾伯爵於本屆議會常會開會時在上院對他本人和他的養老金問題進行的責難而給高貴勳爵的信”1796 年倫敦版第 37 頁（《A Letter from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to a Noble Lord, on the Attacks made upon him and his Pension, in the House of Lords, by the Duke of Bedford and the Earl of Lauderdale, Early in the present Sessions of Parliament》. London, 1796, p. 37）。——第 431 頁。
- 214 馬克思列舉了羅素的一些著作：《Don Carlos, or Persecution》. London, 1822.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 from the Reign of Henry VII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1821. 《Memoirs of the Affairs of Europe from the Peace of Utrecht》. Vol. 1—2, London, 1824—1829. ——第 432 頁。

- 215 約翰·阿·罗巴克“改革法案通过前1830年的輝格党内閣的历史”1852年倫敦版第2卷第67頁(J. A. Roebuck. «History of the Whig Ministry of 1830, to the Passing of the Reform Bill». Vol. 2, London, 1852, p. 67)。——第432頁。
- 216 1819年,在对集合于曼彻斯特附近举行群众大会討論关于普选权的請願书的工人进行血腥鎮压之后,英国議會根据卡斯尔里勳爵的提議通过了廢除人身不受侵犯、廢除出版和集会自由的六条反动法令(“禁口律”)。——第436頁。
- 217 官册农 是英国农民的一种,即根据官册(記錄摘要)在向大地主交納封建地租的条件下占用土地的人。
契約农 即根据租佃权占用土地的人。租种的期限和条件由大地主和佃农之間訂立的契約来确定。——第436頁。
- 218 指1830年底到1831年初英国南部和东南部許多郡的雇农的自发运动,这种运动是由于經濟危机和农場主使用脫谷机而使雇农的貧困和失业現象日益增长引起的。运动得到了一个“斯温”的称号(英文«swing»的拼音,指用手操作的繩枷的敲打部分)。起义的雇农和加入他們队伍的貧苦佃农燒毀了大地主和农場主的庄园、庄稼梁和倉庫,打碎了他們的脫谷机。按照格雷勳爵的輝格党政府的命令,对农村无产階級的这些零星分散的起义进行了殘酷的武力鎮压。——第436頁。
- 219 自由农 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这种名称起源于中世紀的自由所有者。——第438頁。
- 220 根据英国議会的傳統,上院議長(大法官)的座位用一个羊毛口袋作为座墊,它曾經是英国国民財富的主要来源的象征。——第438頁。
- 221 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 見注93。——第444頁。
- 222 *Habeas Corpus Act*〔人身保护法〕是1679年規定英国审判程序的法令,根据这个程序,被捕者可以要求公布 *Habeas Corpus*,即公布把他送交法庭的命令,以檢查逮捕是否合法。法庭根据对逮捕原因的审查,或者是釋放被捕者,或者是把他送回監獄,或者是在繳納保釋金

或保证书的情况下把他釋放。Habeas Corpus Act 不适用于叛国罪的案件，而且根据議会的决定可以暂时停止生效。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特別經常采取这种措施。——第 446 頁。

223 *Corporation Act* (市鎮机关法) 是英国議会于 1661 年通过的，它要求担任各选职(主要指市政机关中的选职)的人承认英国国教会的信条。

1673 年的 *Test Act* (宣誓法) 同样要求一切公职人員承认英国国教会的信条。

这些法令本来是用来对付天主教反动派的，但后来变成了对付官方的英国国教会的任何反动派的武器和維護英国国教会的特权的工具。——第 452 頁。

224 *Ecclesiastical Titles Bill* (教会圣职法案) 1851 年 8 月成为法律，它宣布羅馬教皇 1850 年頒布的关于任命英国的天主教主教和大主教的敕令无效。——第 452 頁。

225 馬克思的这篇文章的英文稿(收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发表在 1855 年 8 月 10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标题是“最近一次北明翰代表會議”(«The late Birmingham Conference»)。——第 456 頁。

226 国家改革协会 是由資產階級反对派的激进左派代表于 1855 年 7 月成立的。它提出了在普选权基础上实行議会改革的要求来同行政改革协会(見注 137) 相对立。領導国家改革协会的資產階級激进派力求同宪章派达成協議，同时指望工人运动接受他們的思想影响和政治影响。宪章派的領袖厄·琼斯和芬倫等人起初参加了这个协会的執行委员会，但是在大多数宪章派分子(他們認識到宪章派协会有在組織上从屬于資產階級激进派的危險，因而反对加入資產階級組織)的压力下，他們很快就退出了这个組織。琼斯的动摇反映出他不了解丧失无产階級独立路綫的危險性，这种动摇使他在后来离开了宪章主义的革命原則。——第 456 頁。

227 馬克思在本文中利用了下列两个关于 1855 年 7 月北明翰代表會議各次会议的报告：“北明翰代表會議。关于所提出的和約基础，即众所周知的‘四項条款’的委员会的报告” 1855 年倫敦版 («Birmingham

Conference. Report of Committee on the Proposed Bases of Pacification known as «The Four Points». London, 1855)。

“北明翰代表會議。关于丹麦条約問題委員會的报告”1855年倫敦版 («Birmingham Conference. Report of Committee on the Danish Treaty». London, 1855)。——第457頁。

228 “欧洲軍隊”这一著作是由于“普特南氏月刊”通过“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查·德納向馬克思約稿，而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請求写成的。在写作过程中，馬克思曾帮助恩格斯在英国博物館搜集了欧洲各国軍隊的材料，其中包括关于西班牙和那不勒斯軍隊的材料。恩格斯的这一著作中关于英国軍隊一节，馬克思曾在給“新奧得报”写的通訊稿中轉載过，这些通訊稿于1855年8月28日、8月31日和9月1日在該报发表，題目是：“不列顛軍隊” («Die britische Armee»), “对英国兵士的懲罰办法” («Züchtigung der Soldaten»), “英国兵士的服装和装备” («Uniformirung und Equipirung des britischen Soldaten»)。

本卷仅刊登了上述文章的第二篇，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作了許多个人的补充，因而具有独立的意义 (見第572—574頁)；在“新奧得报”上发表的其他两篇論文与紐約杂志“普特南氏月刊”上登載的原文完全一致。——第463頁。

229 布倫兵營是拿破侖第一在1803—1805年建造的軍事基地，其目的是經過拉芒什海峽进犯英国。

1805年12月2日(11月20日)在奧斯特利茨附近发生了俄奧軍隊同法軍的会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侖第一获胜而告終。——第467頁。

230 所謂比利牛斯半島的战争或西班牙战争，是英国和法国1808—1814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領土上进行的战争。同时，在整个半島上展开了西班牙人民和葡萄牙人民爭取独立、反对法国占領的战争。——第467頁。

231 英軍和美軍的新奥尔良(美国)会战是在1815年1月8日发生的。——第467頁。

232 指1812年9月7日(8月26日)博罗迪諾会战(在莫斯科附近)，即1812年卫国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会战，俄国軍隊在这次会战中表现了高

- 度的战斗素质并使法軍遭到重大損失；会战的結果为战争向有利于俄国的方向发展和拿破侖軍隊失敗准备了条件，尽管俄軍当时被迫放棄了莫斯科(在当时条件下这种做法是适宜的)。——第 469 頁。
- 233 七年战争 (1756—1763) 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間的战争：一方是英、普，另一方是法、俄、奥。战争的基本原因是英法之間在殖民地和貿易方面的竞争，以及普魯士的侵略政策触犯了奥、法、俄的利益。在战争过程中，屢胜法、奥軍隊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普魯士軍隊，在同俄軍作战时遭到了一系列的惨重失敗。战争的結果是法国殖民地削弱了，而不列顛殖民帝国却因此增强了。奥地利和普魯士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疆界。俄国在欧洲却大大地提高了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威信。——第 478 頁。
- 234 指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全套 13 册)，在这一著作中說明了古希腊羅馬的数学原理。——第 485 頁。
- 235 切斯尼“簡評火器及它的过去和現在” 1852 年倫敦版 (Chesney. «Observations on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Fire-Arms». London, 1852)。——第 486 頁。
- 236 霍·道格拉斯“海軍炮兵論” 1820 年倫敦版 (H. Douglas. «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 London, 1820)。——第 487 頁。
- 237 居斯丁“1839 年的俄罗斯” 1843 年巴黎版第 1—4 卷 (Custine. «La Russie en 1839». T. 1—4. Paris, 1843)。——第 508 頁。
- 238 托特列本之死的謠傳是由于欧洲报纸的不正确的报道而来的。托特列本在 1855 年 6 月 20 日 (8 日) 負伤，被迫立即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去进行治疗。——第 509 頁。
- 239 指乔·卡瑟克特“簡評 1812 年和 1813 年俄国和德国的战争” 1850 年倫敦版 (G. Cathcart. «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 London, 1850)。——第 510 頁。
- 240 恩格斯在“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对錫利斯特里亚的圍攻”和“多瑙河战争”三篇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39—42、289—302、334—339 頁) 中叙述了 1854 年 1 月 6 日 (1853 年 12 月 25

- 日)的切塔特会战和1854年5—6月的对錫利斯特里亚的圍攻。——第511頁。
- 241 德意志联邦是根据1815年維也納會議的決議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沒有中央政府,德意志分成36个邦,它們各自保持着封建专制制度,这就加深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进一步发展。——第515頁。
- 242 指土耳其苏丹馬茂德二世于1826年殘酷鎮压了发动叛乱的土耳其近卫軍,后者反对在土耳其軍隊中实行旨在以正規部队代替封建的近卫軍的改革。——第517頁。
- 243 土耳其軍隊在1529年和1683年两次圍攻維也納,均未成功。——第519頁。
- 244 阿尔納烏特人 是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叫法。——第520頁。
- 245 恩格斯在“多瑙河战争”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80—587頁)中詳細地分析了1853年11月4日(10月23日)的沃耳特尼察会战。——第522頁。
- 246 指1855年1月26日英法和撒丁王国(皮蒙特)簽訂的軍事协定。根据协定,撒丁所担負的义务是在对俄战争中提供兵力为15000人的一个軍,而英法则保证撒丁王国領土的完整。撒丁的統治集团为了要把奥地利管轄下的意大利領地并入皮蒙特,就以参加克里木战争为代价换取了拿破侖第三对今后这一斗争的支持。——第524頁。
- 247 恩格斯援引卡·雪恩哈耳斯匿名发表的“一个奥地利老兵对1848—1849年意大利战争的回忆”1852年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1卷第166、167、223頁;第2卷第239頁(«Erinnerungen eines österreichischen Veteranen aus dem italienischen Kriege der Jahre 1848 und 1849». Bd. I, S. 166, 167, 223; Bd. II, S. 239,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1852)。——第527頁。
- 248 1799年,在法国反对欧洲同盟的战争时期,那不勒斯(双西西里王国)

参加了战争，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四世的军队被法军击溃。那不勒斯被法军占领。

1820年7月资产阶级革命家——烧炭党人——在军队的参加下在那不勒斯发动了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并制定了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宪法。但是，在1821年奥地利根据神圣同盟的莱巴赫会议的决定对那不勒斯进行了武装干涉；奥地利军队击败了那不勒斯军队，并占领了那不勒斯。专制制度又重新恢复了。——第527页。

249 指那不勒斯王国在1849年5—7月参加法奥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共和国的部队在加里波第的指挥下采取了两次神速的进攻，并击退了那不勒斯军队。——第528页。

250 宗得崩德是由瑞士7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在1843年为了抗拒瑞士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而组成的分离派联盟。瑞士联邦议会在1847年7月通过的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是宗得崩德在11月初对其余各州发起军事行动的导火线。1847年11月23日，大部分由民军组成的宗得崩德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第529页。

251 指1798年春季瑞士军队的失败和法军占领瑞士。——第529页。

252 三十年战争——见注139。——第531页。

253 下面是恩格斯引证休斯的匿名书：“1845年西班牙真相。一个久居西班牙的英国人的作品”1845年伦敦版第1卷第326、329页（«Revelations of Spain in 1845. By an English resident». London, 1845, vol. I, pp. 326, 329）；同时参见该书的第313—314页。——第537页。

254 指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次革命于1823年被神圣同盟根据维罗那会议的决议派往西班牙的军队镇压了，以及1833—1840年的第一次卡洛斯派战争（见注56），这个战争引起了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一直延续到1843年。——第538页。

255 普腊德“西班牙革命史回忆录”1816年巴黎版第189页（Pradt.

«Mémoires historiques sur la révolution d'Espagne». Paris, 1816, p. 189)。——第 538 頁。

256 «*Entente cordiale*» (“誠意協商”) 是表示 1830 年七月革命后英国和法国之間的和好的一种用語。尽管是«*entente cordiale*»,但是在三十年代和以后的时期,英法在一系列国际問題上,特別是在东方問題上的矛盾却一再尖銳化。

这里指的是英国政府,特別是帕麦斯頓在 1839—1841 年土埃冲突問題(見注 90)上所采取的反法立場。——第 539 頁。

257 关于 1854 年 12 月 2 日条約 見注 7。——第 545 頁。

258 1855 年 8 月 8 日在圣馬丁大厅召开群众集会;关于这次群众集会的报告刊登在 1855 年 8 月 11 日“人民报”上。——第 546 頁。

259 波兰之友文学协会是按照以亚当·查尔托雷斯基为首的波兰流亡者的君主貴族保守派于 1832 年在巴黎成立的文学协会的形式于同年在倫敦成立。——第 546 頁。

260 集中 是 1836 年成立的波兰民主协会的領導执行机关。民主协会于 1832 年在法国成立,是波兰流亡者中的左派貴族資產階級的組織。协会的綱領中規定取消封建义务和等級的不平等,規定将份地无偿地轉归农民,以及一系列其他的进步措施。民主协会积极地参加了 1846 年爭取波兰民族解放的克拉科夫起义的准备工作。1849 年夏波兰民主协会在法国被禁止活动以后,集中便迁至倫敦,但是协会的大部分会员仍旧留在法国。在五十年代,民主协会内部发生了思想上的分裂。1862 年,由于波兰建立了准备起义的全国中央委员会,民主协会便决定解散。——第 546 頁。

261 約·鮑·奧斯特罗夫斯基“波兰史”1841 年倫敦版第 1—2 卷 (J. B. Ostrowsky. «The History of Poland». Vol. I—II, London, 1841)。——第 546 頁。

262 1846 年 2 月在波兰的土地上准备了爭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由于波兰小貴族的叛变

以及起义的领导者遭普魯士警察逮捕,总起义被破坏了,仅仅发生了个别的革命爆发。只有在从1815年起受奥地利、俄国和普魯士共同管制的克拉科夫共和国,起义者在2月22日取得了胜利,成立了民族政府,頒布了廢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同时,在加里西亚也爆发了乌克兰农民的起义。克拉科夫的起义在1846年3月被鎮压下去了,随后,奥地利政府鎮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奥地利、普魯士和俄国在1846年11月签订了条約,把克拉科夫归并奥地利帝国。

1848年革命运动又在波兰的許多地方,其中包括波茲南、西里西亚以及加里西亚的乌克兰农民中間爆发了。在1848—1849年,波兰的革命者积极地参加了一系列欧洲国家(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法兰西和意大利)的革命斗争。——第547頁。

- 263 馬克思指的是罗·皮尔于1854年12月12日在下院會議上的演說,皮尔在演說中呼吁英国政府对流亡者采取鎮压措施,禁止流亡者首先是維·雨果的反波拿巴的行动。——第549頁。
- 264 本文第二部分的簡写稿,曾以“战争”(«The War»)为題作为社論发表于1855年9月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第555頁。
- 265 查·納皮尔的信刊登在1855年8月24日“泰晤士报”上。——第564頁。
- 266 本文的第一段显然經過“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的改动。——第566頁。
- 267 奉奥地利皇帝的命令从1855年6月24日起开始縮减駐防在加里西亚边境的奥軍人数,这实质上是奥地利公开拒絕站在联軍方面参加战争。——第566頁。
- 268 本文第一段显然經過“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的改动。該文的德文稿曾以同样的标题刊登在1855年9月3日和4日“新奧得报”上。——第575頁。
- 269 这里列举的是英軍同它的盟軍在反对拿破侖第一的战争中战胜法軍的那些軍事行动的例子,如1810年9月27日布薩庫(葡萄牙)会战,1813

年对 潘普洛納 (西班牙) 堡垒的圍攻, 1815 年 6 月 18 日 滑铁卢 (比利时) 会战。——第 580 頁。

270 1839 年英国議會公布了包括有关波斯和阿富汗問題的外交文件的藍皮书。收在藍皮书里的当时英国駐喀布尔代表亚·白恩士关于同英国阿富汗战争 (見注 57) 有关的事件的通信被外交部別有用心地选择和伪造过, 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英国在发动这次战争中的煽風点火作用。亚·白恩士在他死前不久把他的通信的副本寄到倫敦, 藍皮书中未收入的一部分由他的家屬发表了。英国政府的伪造勾当于是被揭露。——第 582 頁。

271 格萊安和查·納皮尔之間从 1854 年 2 月 24 日到 11 月 6 日这段時間的通信, 发表在 1855 年 9 月 3、4、6 和 8 日“泰晤士报”上。——第 582 頁。

272 关于根据格萊安的指示对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件进行秘密檢查的事情見注 25。

在其他的一些信件中發現有邦迪埃拉兄弟写給馬志尼的信, 他們在信中說明了自己的远征卡拉布利亚的計劃, 目的是在意大利发动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統治的起义。1844 年 6 月在实行这次远征时它的参加者被逮捕, 邦迪埃拉兄弟也被枪杀。——第 582 頁。

273 1843 年英国殖民者占領了印度西北部同阿富汗接壤的信德省。在 1838—1842 年英国阿富汗战争时期, 东印度公司用威胁和暴力使信德省的封建統治者同意让英国軍隊通过他們的領地。英国人又利用这个机会, 于 1843 年要求当地的封建主自认是东印度公司的藩屬, 英国軍隊在查·納皮尔的指揮下对起义的俾路支各部落 (信德省的土著居民) 进行了殘酷的鎮压后, 英国人就宣布整个信德地区并入英屬印度。——第 584 頁。

274 見注 70。——第 584 頁。

275 本文是恩格斯的“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The Fall of Sevastopol») 一文的德文稿, “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9 月 28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本版俄譯文是根据“新奧得报”上的較可靠的原

- 文翻譯的。从馬克思 9 月 11 日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曾根据后来收到的电訊对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作了某些修改。——第 589 頁。
- 276 倫敦塔 是倫敦的一座城堡，在中世紀時曾是王宮和政治監獄，在十九世紀改作軍械庫。——第 589 頁。
- 277 紅色尖頂帽，即弗利基亞帽，是古弗利基亞人的頭飾，后来在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成為雅各賓黨人的帽子的樣式，从此它就成為了自由的象征。——第 594 頁。
- 278 在本文第一段和最後一段里“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加了一些話。編輯部提到的駐倫敦記者系指普爾斯基。——第 595 頁。
- 279 在第三次反拿破侖法蘭西的歐洲各國同盟戰爭期間，被法軍圍于烏爾姆地區的、由馬克將軍指揮的奧地利軍隊于 1805 年 10 月被迫投降。——第 599 頁。
- 280 指詹姆士·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第 1 卷第 1 分冊第 7 章；1767 年第一次在倫敦出版，共分兩卷。——第 601 頁。
- 281 “曼徹斯特觀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是英國自由派報紙“曼徹斯特每日觀察家時報”(《Manchester Daily Examiner and Times》)的簡稱。該報是 1848 年由“曼徹斯特時報”(《Manchester Times》)和“曼徹斯特觀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合併而成的。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該報支持自由貿易派，它用各種名稱一直出版到 1894 年。——第 604 頁。
- 282 指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 [動產信用公司] 是貝列拉兄弟在 1852 年開辦的一家大股份銀行。該銀行同拿破侖第三政府有密切聯系，它在政府的庇護下進行投機活動。在其他許多國家里，仿效法國的 *Crédit Mobilier* 的榜樣，也創辦了類似的機構。該銀行于 1867 年破產，1871 年倒閉。——第 604 頁。
- 283 指阿·庫爾圖瓦“交易所業務，或巴黎開盤的法國和外國的国家有價證券、法國和外國股份公司的股票和債券指南”1855 年巴黎版 (A,

Courtois. «Des opérations de Bourse ou Manuel des fonds publics français et étrangers et des actions et obligations de sociétés françaises et étrangères négociés a Paris». Paris, 1855). ——第 605 頁。

284 本文的英文稿曾以“軍事狀況”(«The State of the War»)为題,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10 月 17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英文稿显然經過該报編輯部的改动。——第 607 頁。

285 指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强攻,恩格斯在“論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强攻”一文中对此作了詳細的分析;該文英文稿載于本卷第 614—623 頁。——第 610 頁。

286 财产继承法院 是在地主有权审判和惩罚自己的农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法庭。

英国的不取报酬的审判官 是指从有产阶级代表中任命的治安法官。——第 612 頁。

287 本文的比較簡短的德文稿(收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內),曾以“論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强攻”(«Zur Erstürmung Sebastopols»)为題載于 1855 年 10 月 4 日“新奧得报”上。“紐約每日論壇报”上的該文第一段曾被該报編輯部改动过。——第 614 頁。

288 指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一文,該文德文稿載于本卷第 589—593 頁。——第 616 頁。

289 下面是恩格斯所写的克里木战争大事記的譯文(手稿中有許多字是簡写的):

克里木战争:

1854 年

9 月

14 日 旧堡登陆。

20 日 阿尔馬河会战。

25 日 联軍向塞瓦斯托波尔南区推进。

26 日 攻占巴拉克拉瓦。

28日 封鎖南區(當時在南區除水兵外只有8個營)。

10月

1日 進行偵察和決定在強攻前進行炮擊。

9—10日 第一道平行壕距要塞400—600俄丈。

17日 炮擊塞瓦斯托波爾(在陸地上俄軍的火力占優勢,以200門重炮對付進攻者的126門炮),艦隊同時射擊。俄軍迫使法軍炮兵停止射擊。現在強攻已晚了。

25日 巴拉克拉瓦會戰。

26日 俄軍以9個營的兵力向英軍陣地出擊。

11月

4日 俄軍比聯軍的兵力占優勢。進攻。

5日 因克爾芒會戰。英軍的圍攻作業現在幾乎完全中止。只有阻援綫在繼續加強,以防止解圍軍隊突破。

12月

11日 奧斯坦-薩肯任城防司令。出擊日益頻繁并日益順利。

[1855年]

1月初 英軍在距要塞400俄丈處挖掘了第二道平行壕。出擊繼續進行。

27日 尼耶爾來到。法軍對馬拉霍夫岡的堅決的強攻決定延期進行。英軍讓出了自己的二分之一的塹壕——總共一英里長!

2月

22—23日 色楞格多面堡建成,23日對該堡的攻擊被擊退。距主牆1100碼。

2月28日— 沃倫多面堡建成——距主牆1450碼。

3月1日

3月

11—12日 堪察加眼鏡堡——770碼;這樣在距要塞470俄丈處敵人被迫悄悄地進行了轉土對壕作業。在這些工事前還築有戰壕。

22—23 日 对这些战壕的攻击被击退，这些战壕已被塹壕連成一个整体；第三棱堡前也是这样——距主牆 430 碼处有采石場。

4 月 向第四至第六棱堡前 200 步处的俄軍战壕攻击。

19—20 日 英軍攻击采石場。

20—21 日 被击退。

5 月 联軍的增援部队（法軍和撒丁軍）开到，佩利西埃也来到。重新組織兵力进攻。

23 日 第五棱堡前俄軍为防守反接近壕而展开了战斗，俄軍获胜。

6 月

7 日 攻击堪察加眼鏡堡、采石場、色楞格多面堡和沃倫多面堡。

18 日 第一次强攻，被击退。

8 月

16 日 黑河。

9 月

8 日 强攻。——第 621 頁。

290 “辯論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的資產階級日报“政治和文学辯論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簡称，1789 年在巴黎創刊。七月王朝时期，它是政府的报纸，是奥尔良派資產階級的机关报。1848 年革命时期，它反映着反革命資產階級，即所謂秩序党的观点。在 1851 年政变后，它是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第 626 頁。

291 馬克思指阿·杜桑涅尔的抨击性著作“高利貸者——当代之王。金融貴族的历史”1845 年巴黎版（《*Les juifs rois de l'époque. Histoire de la féodalité financière*》. Paris, 1845）和若·瑪·馬蒂約-德恩威尔的抨击性著作“高利貸者大王路特希尔德第一的富有教益和有趣的事件”1846 年巴黎版（《*Histoire édifiante et curieuse de Rothschild I-er, roi des juifs*》. Paris, 1846）和“路特希尔德第

- 一，他的奴僕和他的人民” 1846 年巴黎版（«Rothschild I-er, ses valets et son peuple». Paris, 1846）。——第 628 頁。
- 292 本文第一段显然被“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改动过。——第 630 頁。
- 293 1854 年 6 月俄国通过圣彼得堡的施蒂格利茨銀行从国外获得了利率 5 厘的 5 000 万銀卢布的貸款。这笔貸款主要用来抵补进行克里木战争的开支。——第 636 頁。
- 294 这个公告是在 1855 年 8 月 28 日頒布的。——第 637 頁。
- 295 “第一个馬姆茲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的日記和通信集，包括了有关他的駐馬德里宫廷、弗里德里希大帝和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宫廷以及在海牙的公使館的工作报告，他派往柏林、不倫瑞克和法兰西共和国的特別使团的工作报告” 1845 年倫敦第 2 版第 1 卷第 166、217、218、228、299、454、510、515 頁（«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 first Earl of Malmesbury,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his Missions at the Courts of Madrid, Frederick the Great, Catherine the Second, and at the Hague; and of his special Missions to Berlin, Brunswick, and the French Republic», 2-nd ed. London, 1845, vol. I, pp. 166, 217, 218, 228, 299, 454, 510, 515）。
- 关于福克斯回忆录和通信集見注 12。——第 642 頁。
- 296 指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爭取独立的战争（1775—1783），这次战争的結果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欧洲列强在这次战争中的立場是由他們和英国在殖民地和貿易方面的竞争决定的。法国、西班牙力图削弱英国的势力，于是参加了反英战争，后来又发生了同荷兰的战争。英国政府竭力想求得俄国的帮助，但俄国却在 1780 年宣布武装保护那些同英国的敌人进行貿易的中立国家的商船的原則。武装中立政策得到一系列国家（荷兰、丹麦、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它影响了战争的結局。1781 年，英国軍隊遭受了决定性的失敗之后不久，英国被迫簽訂了和約（和約最后是在 1783 年在凡尔賽签字的），承认了自己以前的殖民地的独立。——第 642 頁。

297 1780年12月英国借口荷兰破坏1674年的韦斯明斯特和約而向荷兰宣战。这个和約是1672—1674年英荷战争后簽訂的。英国当时引证了1674年条約的秘密条文，按照秘密条文，两国不得給予任何一方的敌国以帮助，然而对保障航行和貿易自由的另一条文却故意避而不提。

英国在1780年向荷兰宣战，当时因为荷兰同法国、西班牙以及北美殖民地进行貿易（而这些国家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英国政府打算破坏荷兰的貿易并夺取它的殖民地。1780—1784年的战争以英国获胜而告終，根据1784年5月在巴黎簽訂的条約，荷兰应让給英国訥加帕塔姆港口（在印度南部）并允許它在荷屬东印度領水中自由航行。——第644頁。

298 卡尔斯于1855年11月28日（16日）被俄軍攻占。土耳其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把这一要塞变成入侵外高加索的据点，俄軍攻占了这一要塞，因而就完成了它在克里木战争的高加索战区的一系列成功的行动。土軍于1853—1854年企图侵入阿尔明尼亚和格魯吉亚而遭到失败（1853年11月26日（14日）在阿哈尔齐赫，1853年12月1日（11月19日）在巴什-卡得克拉尔，1854年6月15日（3日）在乔洛克，1854年7月29日（17日）在巴雅澤特，1854年8月5日（7月24日）在丘留克-达尔），因而士气沮丧。奥美尔-帕沙的軍队于1855年10月从克里木調往高加索后，由苏胡姆-卡列向明格列里亚进軍，前去营救在卡尔斯被圍的土耳其守軍，但是没有成功。卡尔斯的占領是克里木战争中最后一次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战争的結束。——第646頁。

299 在公元732年的普瓦提埃（在法国西部）会战中，由卡尔·馬尔泰尔指揮的法軍使阿拉伯人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阻止了他們繼續向欧洲推进。——第648頁。

300 恩格斯指1828—1829年俄土战争时期俄軍对巴尔干半島上的瓦尔那、布来洛夫和錫利斯特里亚等要塞的圍攻，尽管土軍在防守这些要塞时表現很頑强，但是这些要塞仍被俄軍攻占了。——第648頁。

301 指弗·博登施泰特“高加索的民族及其反对俄国人的解放斗争”1848

-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F. Bodenstedt. «Die Völker des Kaukasus und ihre Freiheitskämpfe gegen die Russen». Frankfurt am Main, 1848); 罗·柯尔曾“阿尔明尼亚:在埃尔斯倫和俄、土、波斯边境的一年”(R. Curzon. «Armenia: a year at Erzeroom, and on the frontiers of Russia, Turkey, and Persia»), 1854年在倫敦出了本书的三个版本。——第 651 頁。
- 302** 指 1856 年 1 月在路易·波拿巴主持下在巴黎召开的、有英、法、撒丁三国代表和外交官員参加的密軍軍事會議。据报刊报道,在軍事會議上曾討論了关于联軍在对俄作战的新战局中配合行动的問題。——第 653 頁。
- 303** 暗指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时期俄軍的前进部队于 1829 年夏季向君士坦丁堡進軍一事。——第 653 頁。
- 304** 指奥地利代表盟国于 1855 年 12 月中旬向俄国提出的作为和談条件的五項条款。这些条件是早先討論过的四項条款(見注 6)的进一步具体化。其內容如下:取消俄国对多瑙河各公国的保护权,改由各締約国共同保护,俄国同意修改貝薩拉比亚的疆界,即让出靠近多瑙河的一片領土;允許在多瑙河及其河口自由通航;使黑海中立化,禁止軍艦通过海峽,禁止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有海軍軍械庫和舰队(規定数量的小型舰船例外);各大国共同保护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第五項条款規定,各参战国保留在和談过程中除上述四項外再向俄国提出新条件的权利。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的这五項条款,为沙皇政府所接受,并成为以后的巴黎和談的基础。——第 657 頁。
- 305** 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馬克思利用了 1856 年 2 月 7 日恩格斯的来信,信中談到了法国的局勢。——第 658 頁。
- 306** 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冲突是在 1855 年年底发生的,它反映了英美为爭夺中美洲統治权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也表现在解釋 1850 年的克萊頓-布尔韦尔条約时所发生的尖銳的意見分歧上。根据这个条約,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有責任保证计划在尼加拉瓜修建的沟通两大洋之間的运河的中立,并且不对尼加拉瓜、莫斯科托海岸以及中美洲的其

他地区强加侵占和統治。然而，英国違反条約繼續霸占莫斯基托海岸和它在四十年代夺得的其他領土。美国力求巩固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因而就支持在 1855 年夺取了尼加拉瓜政权的美国冒險家沃克。英国企图在美国領土上为克里木的英国軍隊招募雇佣兵一事也促使英国和美国之間关系的尖銳化。两国政府相互指責破坏 1850 年条約，因而都提出抗議，并以断絕外交关系相威胁；英国在 1855 年 10 月还向美国海岸派遣了自己的軍艦。然而事情并没有发展到軍事冲突的地步；这个冲突由于 1856 年 10 月簽訂的协定而得到調解，协定确立了莫斯基托海岸和紧連着海岸的沿海地区的中立。——第 658 頁。

307 亚眠和約簽訂于 1802 年 3 月 27 日，簽訂国的一方为法国以及它的盟国西班牙和巴达維亚共和国（荷兰），另一方为英国。第二次反法同盟由于这个条約的簽訂而解散了。条約只是保证了軍事行动上的暫时的喘息时机，到了 1803 年，英法之間的战争重新开始进行。——第 658 頁。

308 馬克思的这段引文出处是 1856 年 1 月 14 日“北方蜜蜂”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北方蜜蜂”*«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 是俄国的一家政治和文艺报纸，1825 年至 1864 年在圣彼得堡出版（1860 年前由布尔加林和格列奇主編）；是沙皇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第 659 頁。

309 在 1850 年 5 月 22 日立法會議的一次會議上蒙塔郎貝尔要求法国政府采取像在 1849 年对羅馬共和国采取的那种軍事远征来反对国内的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关于对羅馬共和国的远征見注 173）。——第 660 頁。

310 1855 年 12 月 29 日在巴黎为从克里木归来的法国軍隊举行隆重的欢迎会时，*École Polytechnique*（高等綜合技术学校）的学生拒絕欢迎軍隊和皇帝，因而引起了政府方面对他們的鎮压。

路易·波拿巴在他对軍隊的欢迎詞中把自己比作羅馬元老院，羅馬元老院通常是以全体成員在羅馬城門口来迎接凱旋的軍隊。——第 661 頁。

- 311 *École Normale* 是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第 662 頁。
- 312 1855 年 8 月底在翁热城(法国西北部)有数百个工人企图举行起义,目的是在法国建立共和国,这个企图遭到了失敗。起义工人的领导者和在 1850 年建立的秘密的共和团体“瑪丽安娜”有联系。由于这次騷动,在 1855 年底至 1856 年初发生了无数次逮捕和訴訟案件。——第 663 頁。
- 313 除了“人民报”以外,馬克思还把本文寄給了“紐約每日論壇报”。文章以“波拿巴的牺牲者和工具”(«Bonapartean Victims and Tools»)为題作为社論发表于 1856 年 4 月 14 日的該报上。——第 665 頁。
- 314 凱恩 是法屬圭亚那(南美)的城市,政治犯流放的地方,因苦役制度和折磨人的热带气候而常常造成大量死亡,故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
拉姆別薩(拉姆別茲)是在北非古羅馬城市的廢墟上建立起来的法国的感化移民区;1851 年至 1860 年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
貝耳島 是比斯开灣的一个島;1849—1857 年是监禁政治犯的地方;参加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工人也被囚禁在这里。——第 665 頁。
- 315 法国的政治流放犯塔西利埃的信件の譯文,由馬克思寄給了“人民报”,于 1856 年 4 月 12 日在該报发表。——第 665 頁。
- 316 馬克思譏諷地暗指路易·波拿巴和波拿巴集团所利用的方法,他們依靠这种方法在軍隊官兵中搜罗自己的追隨者,准备 1851 年十二月二日的政变。路易·波拿巴以共和国总統的身分在薩托里和其他地方举行招待会和軍事檢閱时,以香腸、冷盘野味、香檳酒等广泛地宴請軍官和兵士。——第 665 頁。
- 317 布斯特拉巴 是路易·波拿巴的綽号,由布倫、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联合构成。这个綽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 年 10 月 30 日)和在布倫(1840 年 8 月 6 日)曾试图举行叛乱以及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在巴黎举行了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 665 頁。
- 318 卡夫丁峡谷 (*Furcae Caudinae*) 在卡夫丁城(古羅馬)附近。公元前

- 321 年第二次薩姆尼特战争时期，薩姆尼特人在那里击败了羅馬軍隊，并且强迫他們負着“牛軛”通过峡谷。这被认为是对战敗軍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語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第 666 頁。
- 319 十二月十日会 是 1849 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它的成員多半是游民。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73—176 頁）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詳尽的評述。——第 667 頁。
- 320 “老鼠与青蛙之战”（巴特拉霍米奧馬希亞）是古希腊的一首詼諧叙事詩，荷馬叙事詩的模拟詩，作者不詳。——第 668 頁。
- 321 指 1856 年 3 月 16 日拿破侖第三的儿子——得到阿尔及利亚国王封号的欧仁的生日。——第 670 頁。
- 322 “卡尔斯的陷落”这一著作是按 1856 年 4 月“人民报”发表的全文登載的，全文共分四篇。最初馬克思曾以同样的标题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过一篇比較簡短的文章，这篇文章登載在 1856 年 4 月 8 日的該报上。1856 年 5 月 3 日馬克思曾将一篇由自己署名的题为“卡尔斯文件中的趣聞”（《Kars Papers Curiosities》）的文章刊登在“設菲尔德自由新聞报”（《The Sheffield Free Press》）和“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上；該文基本上是“人民报”上发表的第二和第三篇的摘要。——第 673 頁。
- 323 关于 五項條款 見注 304。——第 675 頁。
- 324 巴黎条約 是 1856 年 3 月 30 日由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魯士和土耳其的代表为一方和俄国代表为另一方在巴黎會議上所簽訂的和約，也就是結束 1853—1856 年的克里木战争的和約。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俄国应当让出多瑙河河口和南貝薩拉比亚的部分地区，放棄对多瑙河各公国的保护权和对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同意黑海中立化，即禁止外国的軍艦通过海峡，同意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不能有海軍軍械庫和舰队；俄国把卡尔斯归还給土耳其，以此来換回联軍在克里

木所占領的塞瓦斯托波爾和其他城市。媾和條件縱然對俄國說來是苛刻的，但是西方的外交政策（英國的和奧地利的）仍然不能完全實現其侵略的意圖。塞瓦斯托波爾的英勇保衛戰，土耳其軍隊在高加索戰場上的失敗，聯軍在波羅的海的失利以及俄國的外交利用了英法之間的矛盾——所有這一切情況都對和平談判的結果發生一定的影響。

巴黎條約並沒有解決東方問題，因而成為七十年代歐洲各國在巴爾干和近東的矛盾達到新的尖銳化的原因之一。——第 675 頁。

325 馬克思指的是藍皮書：“關於在土耳其亞洲部分的戰事、卡爾斯的保衛和投降的文件” 1856 年倫敦版（《Papers Relative to Military Affairs in Asiatic Turkey, and the Defence and Capitulation of Kars》. London, 1856）。——第 675 頁。

326 《Take care of Dowb》（“請照顧一下多布”）——陸軍大臣潘繆爾拍給辛普森將軍的關於任命他為總司令的正式電文中，請求他照顧一下自己的侄子、年輕的軍官多比金，從此他就得到了這樣一個被嘲笑的綽號。——第 678 頁。

327 法納爾人 是居住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堡）法納爾區有錢有勢的希臘人，他們大部分是拜占庭貴族世系的后裔。他們依仗錢財和政治聯繫，在土耳其帝國的行政機關中高居要職。——第 689 頁。

328 馬克思指的是阿爾寧的幻想故事“埃及的伊薩伯拉”。——第 708 頁。

329 馬克思在本文內利用了關於普魯士經濟狀況的某些資料，這些資料是恩格斯在 1856 年 4 月 14 日的信中告訴他的。——第 713 頁。

330 “比利時獨立報”（《L'Indépendance-belge》）是資產階級的一家日報，1831 年在布魯塞爾創刊；是自由派的機關報。——第 713 頁。

331 《Chambre introuvable》（“無雙議院”）是 1815—1816 年由極端反動分子組成的法國眾議院。——第 716 頁。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55年1月—1856年4月)

1855

- 1月底—2月初** 馬克思繼續研究政治經濟学;为了使材料系統化,便于今后进行工作,他翻閱了他的关于經濟問題摘录的大批筆記本。
- 1月24—27日** 馬克思为德国資产階級民主派報紙“新奧得报”写文章,从1854年12月底起他就是該报的撰稿人。他为这家報紙写了三篇关于英国議会辯論和內閣危机的文章。馬克思的“議会常会开幕”、“論內閣的危机”和“議会状况”三篇文章发表在1月27、29和30日的“新奧得报”上。
- 1月29日左右** 恩格斯繼續注視克里木軍事行动的进展,他应馬克思的請求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欧洲战争”一文,分析了克里木战争变为全欧战争的前景。馬克思把这篇文章的德文稿和他写的关于議会辯論的补充寄給“新奧得报”,文章以“議会新聞。——战区消息”为題于2月1日在該报发表。恩格斯的文章作为社論发表在2月17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1月31日—2月1日** 由于阿伯丁联合內閣的垮台,馬克思給恩格斯寄去一份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文章的材料——对联合內閣活动的詳細評述。恩格斯在“上一屆英国政府”一文中利用了这份材料,該文作为社論发表在2月23日的

“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2月1日

馬克思應憲章派領袖厄·瓊斯的邀請，出席流亡者國際委員會會議，目的是去了解這個組織的性質；在會議上討論了關於紀念法國1848年二月革命的問題。

不遲於2月2日

馬克思收到拉薩爾的來信，信中闡述了德國的內部政治狀況；馬克思把這封信寄給了恩格斯。

2月2日

馬克思把關於根據憲章派領袖們的倡議而成立由瓊斯擔任主席的流亡者國際委員會的消息告訴恩格斯，同時批評了這個委員會的活動，他着重指出，除憲章派外，參加這個委員會的還有同真正的無產階級運動背道而馳的倫敦小資產階級流亡者集團的代表。

2月2—6日

馬克思寫關於英國政府危機的文章：“阿伯丁內閣的倒台”，發表在2月17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署名馬克思，以及“論內閣危機”、“被推翻的內閣”、“政黨和集團”以及“兩種危機”，分別發表在2月5、7、8和9日的“新奧得報”上。

2月9日左右

恩格斯寫“克里木的鬥爭”一文，對塞瓦斯托波爾堡衛者修築的防禦工事體系給予很高的評價。文章的德文稿和馬克思所寫的補充以“帕麥斯頓。——軍隊”為題發表在2月12日的“新奧得報”上。恩格斯的文章作為社論發表在2月26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2月9日—3月3日
左右**

由於翻閱經濟學筆記，進行緊張的工作，馬克思的兩眼感到疼痛。馬克思因為身體很不舒服，只得在床上躺了幾天；馬克思的兒子埃德加爾（穆希）和不久前剛誕生的女兒愛琳娜也都病了；醫生建議馬克思搬離他居住的那個對身體不利的倫敦索荷區。

2月12—14日

由於帕麥斯頓內閣的組成，馬克思給“新奧得報”寄去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是他的抨擊文“帕麥斯頓勛爵”

- 的簡写稿，这篇抨击文发表在1853年底—1854年初的“紐約每日論壇报”和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馬克思揭露英国执政階級寡头政治的文章发表在2月16和19日的“新奧得报”上。
- 不迟于2月13日** 馬克思接到流亡者国际委员会邀請他出席紀念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群众大会的請帖；由于这种大会沒有成效，所以馬克思在同恩格斯商量后，决定拒絕参加群众大会。
- 2月17和19日** 馬克思为“新奧得报”写“議會”和“托利党人同激进派的联合”两篇文章，指出英国經濟状况和政治局势的尖銳化。文章分別发表在2月22和24日的“新奧得报”上。
- 2月20日左右** 恩格斯写“欧洲面临的战争”一文，分析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篇文章的德文稿連同馬克思关于議會辯論的补充发表在2月23和24日的“新奧得报”上，标题是“議會和軍事問題”和“军队的状况”。恩格斯的文章作为社論发表在3月8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2月24日** 由于皮尔分子退出帕麦斯頓內閣，馬克思写了“論新的內閣危机”一文。該文发表在2月27日的“新奧得报”上。
- 2月27日** 馬克思为“新奧得报”写“帕麦斯頓和英国的寡头政治”一文，揭露执政党政策的反动实质。該文发表在3月3日的“新奧得报”上。
- 2月底** 馬克思研究古羅馬的历史；他从巴·格·尼布尔的著作“羅馬史”三卷本中作摘录。
- 3月2日** 馬克思为“新奧得报”写“不列顛宪法”一文，同时还把这篇文章的英文稿寄給“紐約每日論壇报”；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資产階級和貴族之間的妥协构成英国政

治制度的基础，这种妥协阻碍国家的进步发展。文章发表在3月6日的“新奥得报”上，3月24日又作为社论发表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标题是“英国的危机”。

3月3日

馬克思告訴恩格斯，說他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必須休息，因而打算到曼彻斯特去一个时期。

3月6日和7日

馬克思写“論同法国联盟的历史”、“調查委员会”和“布魯塞尔回忆录”等三篇文章，揭露帕麦斯頓对外政策的两面性，并指出英法同盟的不稳固性。文章分別发表在3月9、10和11日的“新奥得报”上。

3月13日

馬克思写“爱尔兰的复仇”一文，内容是对英国議會中的爱尔兰議員团的妥协政策提出批評。該文发表在3月16日的“新奥得报”上。

3月中旬—4月6日

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尔病危，馬克思夫人为儿子的病耽忧也病倒了。馬克思照料着病人，由于长期彻夜不眠，他的身体十分衰弱。恩格斯像往常一样，对极度貧困的馬克思一家給以物质上的帮助。

3月16日左右

恩格斯写关于軍事行动的定期評論，这篇評論以“克里木事件”为題发表在3月19日的“新奥得报”上，并作为社论发表在4月2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标题是“克里木軍事行动的总结”。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大冒險家的命运”一文，揭露波拿巴法国对外政策的冒險性。馬克思同时把这篇文章的德文稿寄給“新奥得报”，3月20日以“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为題在該报发表。这篇文章还作为社论登載在4月2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3月18日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表示必須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揭穿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文章。

馬克思写信告訴恩格斯，在倫敦将要出版赫尔岑

主編的俄国革命流亡者的杂志“北极星”。

3月20日

馬克思写关于在倫敦飯店举行的群众大会的文章，这次大会是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在3月16日召集的，目的是想引誘宪章派参加資產階級反对貴族政治的反对派运动，使工人运动屈从于它的影响。在文章中馬克思引用厄·琼斯和宪章派其他領袖在大会上的讲话，这些讲话揭穿了資產階級反对派的代表利用工人运动来实现自己目的的企图。“倫敦飯店中的群众大会”一文发表在3月24日的“新奧得报”上。

3月20—27日

馬克思注視着英国議會中和报刊上有关国际政治問題的言論，并就这方面的問題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馬克思的文章“英国报刊的消息”、“議會新聞：上院关于普魯士的辯論”、“論同法国联盟的历史”、“拿破侖和巴尔貝斯。——報紙印花稅”分別发表在3月23、24、27和30日的“新奧得报”上。

3月23日左右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拿破侖最近的詭計”和“塞瓦斯托波尔会战”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是揭露拿破侖第三在克里木战争中所抱的王朝目的，后一篇文章是叙述联軍企图占領色楞格多面堡的失敗。馬克思同时把第二篇文章的德文簡写稿寄給“新奧得报”，3月26日該报以“論克里木最近事件”为題发表。恩格斯的兩篇文章作为社論发表在4月7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3月28日

馬克思写关于議會委员会調查克里木的不列顛軍隊处境悲慘的原因的文章，对英国的軍事制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文章以“調查委员会的揭露”为題发表在3月31日的“新奧得报”上，該文的英文稿又作为社論发表在4月14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标题是“不列顛軍隊”。

- 3月30日左右**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战争的进程”一文，对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軍事工程艺术作了很高的評价。馬克思把这篇文章的德文稿寄給“新奧得报”，4月2日該报以“論克里木局势”为題发表。文章还作为社論刊登在4月17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3月30日** 馬克思把儿子病勢严重的情况告訴恩格斯，感謝恩格斯对馬克思一家的关怀，并感謝他在馬克思的这种困难时期担負了写文章的工作。
- 4月6日** 馬克思的八岁的儿子埃德加尔逝世。馬克思告訴恩格斯他打算带着妻子到曼彻斯特去住一个时期。
- 4月10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一文，提出无产階級必須利用由于战争而造成的复杂形势来发展革命斗争的想法。在最近一个时期把馬克思的通訊作为社論刊登的“論壇报”編輯部，这一次用馬克思的署名在4月27日发表了这篇文章。
- 4月14日左右** 恩格斯写文章指出拿破侖第三和他的將軍們作为軍事领导人來說是无能的。文章以“評拿破侖在‘通报’上的社論”为題发表在4月17日的“新奧得报”上，并作为社論发表在4月30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标题是“拿破侖的辯白”。
- 4月15日左右** 恩格斯写軍事評論，批評联軍圍攻塞瓦斯托波尔的方式。評論以“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为題发表在4月18日的“新奧得报”上，并作为社論发表在4月30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标题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圍攻”。
- 4月17日左右** 恩格斯为“新奧得报”和“紐約每日論壇报”写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揭穿了在沙皇俄国統治下斯拉夫人联合起来的那种思想的反动性。文章以“德国和泛斯

拉夫主义”为題刊登在4月21和24日的“新奧得报”上。“紐約每日論壇报”把恩格斯的文章加以歪曲后，作为社論发表在5月5和7日的报纸上。

4月18日—5月6日左右

馬克思和妻子一起住在曼彻斯特。

5月7—21日

由于资产阶级商业金融界代表加紧鼓吹行政改革，馬克思就这个題目为“新奧得报”写了五篇文章：“論鼓动运动的历史”、“‘晨邮报’反对普魯士。——輝格党和托利党”、“上院會議”、“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关于改革运动”。这些文章揭穿了西蒂区改革派的真正目的，指出他們害怕工人阶级，准备同貴族妥协。文章分别发表在5月10、18、19和24日的“新奧得报”上。

5月8日左右和11日左右

恩格斯写了两篇关于战争进程的文章。文章以“塞瓦斯托波尔的圍攻”和“克里木战局”为題刊登在5月11和14日的“新奧得报”上，并作为社論发表在5月28和29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标题是“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和“克里木的新攻势”。

不迟于5月16日

馬克思写信給“新奧得报”的編輯之一埃尔斯納，請求他为恩格斯的一本論泛斯拉夫主义的小册子找一个出版商，因为恩格斯打算在德国写成和发表这本小册子。埃尔斯納没有找到出版商，因为出版商都“害怕落得革命的名声”，拒絕承担出版这本小册子。

由塔克尔出版的“政治評論集”問世，其中收入了馬克思发表在“紐約每日論壇报”和“人民报”上的“帕麦斯頓勋爵”这一組文章中的几篇文章。

5月19日

馬克思写“金融市場”一文，文中引用了一些說明英国金融危机加深的材料。文章发表在5月22日的“新奧得报”上。

5月21日左右

恩格斯写軍事評論，这篇評論作为社論发表在6月8

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標題是“克里木戰爭”。

5月24日

馬克思把恩格斯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軍事評論列入自己定期為“新奧得報”寫的文章中。文章以“帕麥斯頓勳爵官邸演出的喜劇序幕。——克里木最近事件的經過”為題發表在5月29日的報紙上。恩格斯的文​​章作為社論發表在6月12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標題是“新的法國總司令”。

5月26日—6月1日

馬克思就議會關於帕麥斯頓政府對外政策的辯論為“新奧得報”寫了四篇文章，分析了英國議會中各個黨派和集團對克里木戰爭所採取的立場。馬克思的“議會改革。——維也納會議的中斷和恢復。——所謂殲滅性戰爭”、“迪斯累里的提案”、“議會新聞：關於迪斯累里提案的辯論”、“對帕麥斯頓最近一次演說的批評”等四篇文章分別發表在5月30、31日以及6月1和4日的“新奧得報”上。

6月5日

馬克思為“新奧得報”寫“行政改革協會。——人民憲章”一文；他指出憲章派提出的英國政治制度民主化綱領的意義，並着重指出，實現這一綱領，就有可能為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開辟前景。該文發表在6月8日的“新奧得報”上。

6月6—9日

馬克思繼續注視英國議會對戰爭問題的辯論，並就這方面的問題寫了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發表在6月9和12日的“新奧得報”上。

6月8日左右

恩格斯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克里木的消息”一文。該文的德文稿刊登在6月11日的“新奧得報”上，標題是“評克里木事件”，並作為社論發表在6月23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6月12日左右

恩格斯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塞瓦斯托波爾”一文，

对筑城学的发展作了概述。該文的德文稿以“評克里木的軍事行动”为題发表在6月15日的“新奧得报”上，并作为社論发表在6月29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6月15日左右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拿破侖的軍事計劃”一文，证明联軍提出的“为局部目的进行局部战争”的計劃所追求的目的是不让克里木战争变为各国人民反对欧洲反动制度的战争。馬克思把这篇文章的材料也收入自己的通訊：“下院的事件。——克里木战争”和“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辯論。——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这两篇通訊发表在6月19和23日的“新奧得报”上。恩格斯的文章作为社論发表在7月2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不迟于6月15日

馬克思接到“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之一德納的建議，要他为紐約的进步杂志“普特南氏月刊”撰写論述欧洲軍队的文章；根据馬克思的請求，恩格斯担負了写这些文章的工作。

6月19日

馬克思写“奇怪的政策”一文，揭露英法执政阶级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文章作为社論发表在7月10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6月19日以后

馬克思接到过去参加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席利从巴黎的来信，信中轉达了馬克思的許多熟人的意見：他們认为必須尽快出版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方面的著作。

6月24日

馬克思和威·李卜克内西一起参加了在倫敦海德公园举行的群众性示威，反对有損人民群众利益的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馬克思在“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一文中叙述了自己对这次示威的印象，同时

着重指出这次运动的群众性以及宪章派在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文章发表在6月28日的“新奥得报”上。

6月27日—7月3日左右

馬克思在英国博物館的圖書館里为恩格斯收集有关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军队的材料，恩格斯在他的“欧洲军队”一文中利用了这些材料。

6月29日左右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一文。該文的德文稿以“論克里木事件”为題发表在7月2日的“新奥得报”上，并作为社論发表在7月12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6月底—7月初

恩格斯写“欧洲军队”一书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刊登在“普特南氏月刊”的8月号上。

7月1日

馬克思参加了在海德公园举行的反对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的第二次示威；他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有才逃脫了逮捕。馬克思在“关于更严格地遵守星期日例假制的法案所引起的風潮”一文中坚决反对倫敦警察当局残酷镇压示威参加者的行为。文章发表在7月5日的“新奥得报”上。

7月6日左右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关于6月18日联軍强攻塞瓦斯托波尔失败的文章。馬克思把該文的德文稿寄給了“新奥得报”，同时把它分成两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里，他补述了在7月1日镇压海德公园示威者以后所发生的倫敦人民同警察的冲突。“人民同警察的冲突。——論克里木事件”和“六月十八日的强攻”这两篇文章发表在7月9和11日的“新奥得报”上。恩格斯的文作为社論发表在7月2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标题是“联軍的最近一次失败”。

7月11—20日

由于新的內閣危机和罗素辞职，馬克思写了一系列有关議會辯論的文章，揭露了英国議会的反民主性质。

馬克思把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軍事評論列入其中的某些文章中。“議會新聞: 罗巴克和布尔韦尔的提案”、“議會新聞: 布尔韦尔提案, 爱尔兰問題”、“罗素的辞职。——克里木事件”、“罗素的辞职”、“在議會內”和“議會新聞。——战区消息”等文章发表在7月14、16、17、20、21和23日的“新奧得报”上。

7月17日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 告訴他有关流亡到美国的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員和德国的其他一些革命流亡者的消息。

7月17日以后

馬克思带着由于儿子死亡悲痛过度而仍未复原的妻子和女儿們搬到坎伯威尔(在倫敦近郊)的一个曾經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員的伊曼特那里; 伊曼特到苏格兰去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的住宅让給馬克思一家使用。

7月25日—8月12日

馬克思写抨击文“約翰·罗素勋爵”, 揭露了罗素——輝格党的典型代表——所体现的英国执政的寡头政治在十九世紀上半叶所奉行的政策。这篇抨击文发表在从7月28日到8月15日的“新奧得报”上, 它的簡写稿发表在8月28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7月底

恩格斯写“欧洲軍隊”一书的第二部分, 这部分刊登在“普特南氏月刊”的9月号上。

8月13日

馬克思写“波兰集会”一文, 揭露帕麦斯顿政府对波兰民族运动的政策的挑衅性质, 也譴責了波兰流亡者中保守的貴族君主派的立場, 并且拿它同民主派进行对照。該文发表在8月16日的“新奧得报”上。

8月15日

馬克思写“对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場的批判”一文, 闡述了英国議會中关于奥地利拒絕参加反俄战争的原因的辯論。文章发表在8月18日的“新奧得报”上, 該文增补后的稿子在8月底写成, 作为社論发表在

- 9月13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標題是“奧地利和戰爭”。
- 8月17和18日** 馬克思為“新奧得報”寫“英法對俄戰爭”一文，在文章中利用了恩格斯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軍事評論。該文發表在8月20和21日的“新奧得報”上。恩格斯的文​​章作為社論發表在9月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標題是“戰爭”。
- 8月31日左右** 恩格斯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黑河會戰”一文，該文的德文稿發表在9月3和4日的“新奧得報”上，並作為社論發表在9月14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 9月** 恩格斯寫“歐洲軍隊”一書的第三部分即最後一部分，這一部分發表在“普特南氏月刊”的12月號上。
- 9月1日** 馬克思把德納提出的為“普特南氏月刊”寫一篇論述改進現代作戰方法的文章的新建議告訴恩格斯。
- 9月6日** 馬克思得悉羅·丹尼爾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成員、科倫案件的被告之一)逝世後，寫信給在科倫的死者​​的妻子，向她表示慰問。
- 馬克思寫信告訴恩格斯，打算刊登悼念丹尼爾斯逝世的訃聞，並在報刊上發表由他自己、恩格斯、弗萊里格拉特和威·沃尔弗簽署的關於丹尼爾斯逝世的通告。
- 9月8日左右** 由於英國報刊發表了英國海軍上將查·納皮爾和海軍大臣詹姆​​斯·格萊安之間關於1854年聯軍在波羅的海的軍事行動的通信，馬克思寫了“英國的新揭露材料”一文。該文作為社論發表在9月24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 9月8日以後** 恩格斯編寫克里木戰爭大事記。

- 9月11日** 馬克思根据最近的电訊,校正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一文,并将該文的德文稿寄給“新奧得报”,于9月14日以“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为題在該报发表,該文还作为社論刊登在9月28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馬克思接到埃尔斯納关于“新奧得报”財政困难的来信后,复信表示願意不取稿費为該报撰稿。
- 由于宪章派前领导人奥康璠尔逝世,馬克思为“新奧得报”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倫敦工人为奥康璠尔举行的葬礼,“奥康璠尔的葬礼”一文发表在9月15日的报纸上。
- 9月12日** 馬克思离开坎伯威尔到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去。
- 9月14日左右** 恩格斯写“克里木战争的前景”一文,指出要塞和野战軍在現代战争中的作用。馬克思把該文的德文稿寄給“新奧得报”,以“关于克里木事件”为題在9月18日发表。恩格斯的文作为社論发表在10月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9月24日和10月4日** 馬克思写“貿易和財政状况”和“法兰西銀行。——克里木的增援部队。——新元帅”两篇文章,指出法国財政危机成熟的征兆。这两篇文章分別发表在9月28日和10月8日的“新奧得报”上。
- 9月28日**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关于强攻和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文章,該文的德文稿以“論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强攻”为題发表在10月4日的“新奧得报”上。文章还作为社論发表在10月13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标题是“战争的決定性事件”。
- 10月2日** 馬克思为“新奧得报”写“官方財政报告”一文,批評英国政府的稅收政策,指出英国資產阶级报刊关于英国

- 劳动者福利增长的断言是毫无根据的。文章发表在10月6日的报纸上。
- 10月6—10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埃尔斯納的两封来信，信中請他不要再把通訊稿寄給“新奧得报”，因为該报即将停止出版。馬克思收到第一封信后就停止寄通訊稿。
- 10月19日左右**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定期軍事評論。文章作为社論发表在11月5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标题是“軍事行动的进程”。
- 11月上半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会見他們的朋友——从欧洲大陆旅行归来的德国无产阶级詩人格·維尔特。
- 11月初** 馬克思写信給德納，坚决要求改变他給“紐約每日論壇报”撰稿的条件。德納复信表示同意馬克思的建議：每星期給該报寄两篇文章，每篇文章的稿酬为10美元。
- 11月2日左右** 恩格斯写“俄国軍隊”一文，指出沙皇俄国的經濟落后性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对它的軍隊所起的影响。文章作为社論发表在11月16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11月8日** 馬克思写信告訴埃尔斯納，說他的来信已經收到，得悉“新奧得报”即将停止出版，因而他不再給报纸寄稿。在信中馬克思对于又繼續出版了一个时期的“新奧得报”的活动表示称赞，并且指出，在德国政治反动的条件下，报纸应尽最大可能来爭取出版。馬克思还告訴他关于英国当局迫害澤稷島上的政治流亡者的情况。
- 1855年11月17日和
1856年1月5日** 反对帕麦斯頓的烏尔卡尔特分子的报纸“設菲尔德自由新聞报”(«Sheffield Free Press»)轉載了馬克思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帕麦斯頓勋爵”一組文章中的两篇文章；其中第一篇在設菲尔德出版的“‘自由新聞’小丛书”(«Free Press Serials»)的第4期(A)上单独刊印出版。

- 12月初 馬克思从曼彻斯特回到倫敦。
- 12月12日 恩格斯把曼彻斯特紡織工厂工人繼續罢工的情况告訴馬克思。
- 1855年12月12日—
1856年1月 馬克思几次会見埃德加尔·鮑威尔和布魯諾·鮑威尔。馬克思把他同鮑威尔兄弟談話的情况写信告訴恩格斯,并对他們的思想观点作了批判性的評价,特別对布魯諾·鮑威尔的蔑視工人运动的傲慢态度提出尖銳的批評。
- 1855年12月24日左右—
1856年1月初 恩格斯在倫敦的亲戚家里作客,經常和馬克思会面。
- 12月28日左右 馬克思写“傳統的英国政策”一文,用历史实例揭穿了輝格党的对外政策的反革命实质。該文作为社論发表在1856年1月12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1855年12月29日—
1856年2月16日 烏尔卡尔特分子在倫敦的机关报“自由新聞”(«Free Press»)轉載了馬克思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帕麦斯頓助爵”一組文章,同时还以“帕麦斯頓助爵傳記”为題,在“‘自由新聞’小丛书”的第5期上单独刊印出版。

1856

- 1—4月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关于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一組文章;他研究了有关斯拉夫人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书籍;恩格斯的文​​章由馬克思寄往紐約,但没有发表。
- 1月上半月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論述多瑙河各公国和瑞典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发表。
- 1月11日左右 由于1855年11月俄軍攻占卡尔斯要塞,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亚洲战争”一文,分析了土耳其軍队在南高加索失败的原因,并指出了俄国人的巨大成

就。該文作为社論发表在 1 月 25 日的報紙上。

1月18日左右

恩格斯写“欧洲战争”一文，对克里木战争作出几点总结，同时指出，事件的进展并不能实现使这一战争变成争取欧洲的民主改革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的战争的愿望。該文作为社論发表在 2 月 4 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1月18日

馬克思把戴·烏尔卡尔特的“宪章运动通訊”一文寄給恩格斯，作者在文章中对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大肆誣蔑。馬克思在信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烏尔卡尔特客观上作了“英国警察的走狗”。

2—4月

馬克思在英国博物館的圖書館里研究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上半叶的外交文件和抨击性文章，以及有关英俄关系的历史著作。他从詹·威廉斯、休斯、馬洪、施洛塞尔和其他許多作者的著作中作了摘录，还从彼得一世的日記和俄国駐英国大使韦謝洛夫斯基的札記中作了摘录。他告訴恩格斯，他打算发表他所发现的有关十八世紀外交史方面的材料。

2月7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对法国内部政治状况作了詳細的評述，指出在无产階級、大学生和軍隊中的反波拿巴主义的情緒日益高漲。

2月8日

馬克思利用恩格斯 2 月 7 日来信中的材料，写了“英美冲突。——法国的局势”一文，預言法国波拿巴制度复灭的必然性，文章也涉及到英美之間的矛盾。这篇文章刊登在 2 月 25 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2月25—28日左右

海·列維作为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代表到倫敦来找馬克思，向馬克思报告了萊茵省工人运动的状况，叙述了佐林根、伊塞隆、爱北斐特和其他准备举行起义的地區的工厂工人革命情緒的高潮情况。馬克思警告列維，不

要采取冒險的措施，并向他說明在現有条件下在萊茵省举行起义为时过早，同时还指出，如果“巴黎发出信号，那末在任何情况下，大家都会进行冒險”。列維还告訴馬克思許多有关拉薩尔的活动和私生活中的不光彩的事实，这些事实引起了杜塞尔多夫工人对他的仇視；馬克思建議繼續观察拉薩尔的行动，暂时不要对他作公开的揭露。

2月底—3月上半月

馬克思在英国博物館里研究斯拉夫民族历史方面的书籍。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对斯拉夫学方面的某些著作，其中包括多勃罗夫斯基、赫弗特尔、艾希霍夫等人的作品，作了批判性的評价。馬克思对斯拉夫人的文化史以及对古代俄罗斯的文化感到兴趣，馬克思讀了“伊戈尔远征記”一书的法譯本，并答应恩格斯为他找到这部作品的版本。

3月5—7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就列維报告的萊茵省工人运动状况交換意見。他們还討論了从列維那里了解到的关于拉薩尔的品行的情况，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这种品行提供了对他更加不可信任的理由。

3月底—4月

馬克思讀了剛剛在藍皮书上发表的关于放棄卡尔斯的外交文件后，写了“卡尔斯的陷落”一文，目的是为了揭露英法外交对“联盟的”土耳其的背信棄义行为。馬克思最初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这一著作的，4月8日在該报发表，馬克思后来又作了大量补充，把它寄給了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分成四篇文章分別发表在4月5、12、19和26日的报纸上，署名是馬克思。馬克思在他給“自由新聞”和“設菲尔德自由新聞报”写的并于5月3日发表的通訊中利用了“人民报”上的某些文章。

不迟于3月29日

馬克思向“人民报”編輯厄·琼斯介紹原定为“紐約每

日論壇報”写的“卡尔斯的陷落”一文的手稿。琼斯打算在圣馬丁大厅向工人听众作公开讲演时利用文章的材料，并在3月29日的“人民报”上登出广告：即将在这家报纸上发表馬克思关于卡尔斯的一组文章。

4月1日左右

馬克思写“小波拿巴法国”一文，揭露第二帝国的政治制度。該文刊登在4月5日的“人民报”上，并作为社論刊登在4月14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4月上半月

馬克思几次会見卡·沙佩尔，沙佩尔承认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自己采取宗派冒險主义立場的錯誤，并对他和維利希一起参加反对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的派別斗争表示后悔。

不迟于4月10日

馬克思收到列維从杜塞尔多夫的来信，列維在信中談到他同曾經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員的米凱尔的会面，还談到他同米凱尔在关于无产階級在面临的革命中对待資产階級的态度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列維不同意米凱尔的妥协立場，因而請馬克思就這個問題发表自己的意見。

4月15日

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普魯士經濟和內部政治状况的文章，文章利用了4月14日恩格斯給他的信中所列举的实际材料。馬克思的“普魯士”一文作为社論发表在5月5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人名索引

三 画

万当, 多米尼克·勒奈 (Vandamme, Dominique René 1770—1830) —— 法国將軍, 曾参加拿破侖第一的各次战争, 1813年在庫尔馬附近率全軍投降。——第 210 頁。

大卫·丹热, 比埃尔·让 (David d'Angers, Pierre Jean 1788—1856) —— 著名的法国雕塑家, 左派共和主义者, 1830年和 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被驅逐出法国, 但不久又回到国内。——第 662 頁。

土苏姆-帕沙 (Tusum Pasha) —— 土耳其將軍, 1855年任高加索土軍指揮官。——第 685 頁。

四 画

戈登, 約翰·威廉 (Gordon, John William 1814—1870) —— 英国軍官, 軍事工程师, 后为將軍; 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軍工程长官。——第 712 頁。

日拉丹, 艾米尔·德 (G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 —— 法国資產階級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曾断續地担任“新聞报”編輯, 以政治上毫无原則著称。——第 177 頁。

文迪施格雷茨, 阿尔弗勒德 (Windischgrätz, Alfred 1787—1862) —— 公爵,

奥地利元帅; 1848年指揮鎮压布拉格和維也納的起义; 1848—1849年率領奥地利軍隊鎮压匈牙利革命。——第 224、489 頁。

尤維納利斯 (德齐姆斯·尤尼烏斯·尤維納利斯)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生于一世紀六十年代——死于 127 年后) —— 著名的羅馬諷刺詩人。——第 318 頁。

扎莫伊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 (Zamojski, Wladyslaw) —— 伯爵, 波兰大地主, 曾参加 1830—1831 年起义, 起义被鎮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領導人之一; 克里木战争时期, 企图組織波兰軍团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第 74 頁。

丹多納耳德 —— 見柯克倫, 托馬斯。

切斯尼, 弗兰西斯·罗当 (Chesney, Francis Rodon 1789—1872) —— 英国上校, 1855年起为將軍。——第 486 頁。

切奧达也夫, 米哈伊尔·伊万諾維奇 (Чеодаев,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死于 1859 年) —— 俄国將軍, 曾参加 1812 年战争, 克里木战争时任軍长和后备步兵指揮官。——第 16、24 頁。

比佐, 米歇尔·布里斯 (Bizot, Michel Bris 1795—1855) —— 法国將軍, 軍事工程师; 1854—1855 年任克里木法軍

- 工程長官。——第 170 頁。
- 比耳斯, 艾德蒙 (Beales, Edmond 1803—1881) ——英國法學家, 資產階級激進派; 1855 年為主張通過議會改革來擴大工業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的宣傳家之一, 1865—1869 年為改革同盟主席。——第 155 頁。
- 比特桑, 威廉·弗格森 (Beatson, William Fearguson) ——英國將軍; 1854 年任多瑙河土軍騎兵指揮官, 後任克里木土軍騎兵指揮官 (至 1855 年 9 月)。——第 676、684 頁。
- 韋克利, 托馬斯 (Wakley, Thomas 1795—1862) ——英國醫生和政治活動家, 資產階級激進派; 1855 年主張通過議會改革擴大工業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第 154 頁。
- 韋德爾, 列奧波特·亨利希 (Wedell, Leopold Henrich 1784—1861) ——普魯士將軍; 1855 年負外交使命駐巴黎。——第 150 頁。
- 韋斯明斯特侯爵, 理查·格勞弗諾 (Westminster, Richard Grosvenor 1795—1869) ——英國貴族, 大土地占有者, 輝格黨人。——第 385 頁。
- 鄧斯·司各脫, 約翰 (Duns Scotus, John 1265 左右—1308) ——中世紀經院哲學家, 唯名論 (唯物主義在中世紀的最初表現) 的代表人物, 著有“牛津文集”這一內容豐富的傑作。——第 66 頁。
- 鄧達斯, 理查·桑德斯 (Dundas, Richard Sanders 1802—1861) ——英國海軍上將, 1855 年任波羅的海艦隊總司令。——第 354、370、559、561 頁。
- 鄧達斯, 詹姆士·威特利·迪恩斯 (Dundas, James Whitley Deans 1785—1862) ——英國海軍上將, 1852 年至 1855 年 1 月為參加克里木戰爭的英國地中海艦隊總司令。——第 306 頁。
- 鄧洛普, 亞歷山大·格萊安 (Dunlop, Alexander Graham) ——英國政論家。——第 346 頁。
- 鄧科布, 托馬斯·斯令斯比 (Duncombe, Thomas Slingsby 1796—1861) ——英國政治活動家, 資產階級激進派, 四十年代曾參加憲章運動, 議會議員。——第 79、82、373、390 頁。
- 巴勒, 德——見克蘭里卡德侯爵, 烏利克·約翰。
- 巴羅, 奧迪隆 (Barrot, Odilon 1791—1873) ——法國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 1848 年 2 月前是自由主義王朝反對派首領; 1848 年 12 月—1849 年 10 月領導以保皇派反革命集團為支柱的內閣。——第 229、666 頁。
- 巴蘭坦, 威廉 (Ballantine, William 1812—1887) ——英國法學家。——第 391 頁。
- 巴林頓, 威廉·魏耳德曼 (Barrington, William Wildman 1717—1793) ——子爵, 英國國家活動家, 托利黨人; 曾任陸軍大臣 (1755—1761、1765—1778)。——第 119 頁。
- 巴克豪斯, 約翰 (Backhouse, John 1772—1845) ——英國官員; 1827—1842 年任外交副大臣。——第 75 頁。
- 巴拉蓋·狄利埃, 阿希爾 (Baraguay d'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 ——法國將軍, 1854 年起為元帥, 波拿巴主義者; 曾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 (1853—1854), 1854 年為波羅的海法國遠征軍指揮官。——第 277 頁。
- 巴特, 伊薩克 (Butt, Isaac 1813—1879)

——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議會議員；在七十年代是爱尔兰自治（Home-Rule）运动的組織者之一。

——第 84 頁。

巴特勒，詹姆斯·阿默尔（Butler, James Armar 1827—1854）——英国軍官，1854 年錫利斯特里亚保卫战組織者之一。——第 521 頁。

巴尔扎克，奧諾萊·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偉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85 頁。

巴尔貝斯，阿尔芒（Barbès,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階級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領導人之一；1848 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制宪議會議員，因参加 1848 年 5 月 15 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 年遇赦；被釋后侨居国外，不久就脫离政治活动。——第 179 頁。

五 画

汉卡，瓦茨拉夫（Hanka, Václav 1791—1861）——捷克的語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对捷克人实行日耳曼化；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一个反动分子，沙皇专制制度的辯护人；在发表历史文件时有严重的伪造現象。——第 221 頁。

本生，克利斯提安·卡尔·約西亚斯（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1791—1860）——男爵，普魯士外交家、政論家和神学家；曾任駐倫敦大使（1842—1854）。——第 161、163、393 頁。

白恩士，亚历山大（Burns, Alexander 1805—1841）——英国軍官；1839—1841 年任喀布尔英軍司令部政治顧問。

——第 582 頁。

包法利，爱德华·普萊得尔（Bouverie, Edward Plydell 1818—1889）——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議會議員；曾任貿易副大臣（1855），济貧法問題委員會主席（1855—1858）。——第 383、405、409 頁。

加里波第，朱澤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1848 年在反对奧地利的戰爭中，率領志願軍站在皮蒙特軍隊一边奋勇作战；1849 年 4—6 月为羅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組織者；五十至六十年代領導意大利人民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統一而斗争。——第 528 頁。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第 160、642—645 頁。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 II Adolf 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和統帥；为爭夺波罗的海霸权对丹麦、波兰和俄国宣战；曾参加三十年战争，領導新教国家同盟。——第 531 頁。

兰斯科伊，謝尔盖·斯切潘諾維奇（Ланской, Серг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781—1862）——1861 年受封为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曾任內务大臣（1855—1861）。——第 637 頁。

兰斯唐侯爵，亨利·配第-菲茨莫里斯（Lansdowne, Henry Petty-Fitzmaurice 1780—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曾任財政大臣（1806—1807），樞密院院长（1830—1841、1846—1852），不管部大臣（1852—1863）。——第 62、362 頁。

- 卢肯伯爵, 乔治·查理·宾加姆 (Lucan, George Charles Bingham 1800—1888)——英国將軍, 托利党人, 1854—1855年初任克里木英軍騎兵师长。——第158頁。
- 卢什迪-帕沙 (Rushdi Pasha 1809—1879)——土耳其国家活动家, 五十至六十年代屢任陸軍大臣。——第683、685、686、700、701、703、711、712頁。
- 圣西門,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偉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625、626頁。
- 圣阿尔諾, 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卢阿·德 (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Leroy de 1801—1854)——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 曾任陸軍大臣 (1851—1854), 1854年任克里木法軍总司令。——第132、142、146、167、189、209、210—212、271、277、474、555頁。
- 瓦揚, 让·巴蒂斯特·菲利貝尔 (Vailant, Jean Baptiste Philibert 1790—1872)——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陸軍大臣 (1854—1859)。——第142、146、310頁。
- 瓦特耳, 艾梅尔 (Vattel, Emmeric 1714—1767)——瑞士法学家, 在薩克森当外交官, 为国际法专家。——第218頁。
- 瓦列夫斯基伯爵, 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約瑟夫·科倫納 (Walewski, Alexander-Florian-Joseph Colonna 1810—1868)——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 拿破侖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婭伯爵夫人的儿子; 曾参加1830—1831年波兰起义, 起义失敗后流亡法国; 曾任外交大臣 (1855—1860); 曾主持巴黎會議 (1856)。——第695頁。
- 弗兰茨-約瑟夫 (Franz-Joseph 1830—1916)——奥地利皇帝 (1848—1916)。——第489、566頁。
- 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魯士国王 (1740—1786)。——第162、467、478、498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魯士国王 (1797—1840)。——第343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魯士国王 (1840—1861)。——第716頁。
- 尼扎尔, 让·瑪丽·拿破侖·德吉烈 (Nisard, Jean Marie Napoléon Désiré 1806—1888)——法国文学評論家和文学史家; 五十年代任索尔邦大学教授, 在讲課中企图证明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是理所当然的。——第662頁。
- 尼耶尔, 阿道夫 (Niel, Adolphe 1802—1869)——法国將軍, 后为元帅; 1854年任波罗的海法国远征軍工程长官, 1855年任克里木法軍工程长官。——第143、147、170、587、610、614、617頁。
- 尼科萊, 詹·阿·(Nicholay, J. A.)——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階級激进派; 1855年为主張通过議會改革扩大工业资产階級政治权利的宣傳家之一, 六十年代为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員。——第155頁。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 (1825—1855)。——第4、14、17、19、30、55、92—94、109、114、122、123、160、209、285、293、335、349、

- 555、582、639、640、653 頁。
- 皮特(小皮特), 威廉(Pitt, William 175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領袖之一, 曾任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第 105、226、246、248、373、658 頁。
- 皮扎尼, 埃蒂耶納(Pisani, Etienne)——英国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的翻譯(1854—1855)。——第 689 頁。
- 皮阿諾里, 卓万尼(Pianori, Giovanni 1827—1855)——意大利革命家, 曾參加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和抗击法国武装干涉者的羅馬共和国保卫战; 革命失敗后流亡皮蒙特, 后迁法国, 1855 年 5 月謀刺拿破侖第三未遂被处死。——第 237 頁。
- 皮尔, 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溫和派(人称皮尔派, 即因他而得名)的領袖, 曾任內务大臣(1822—1827 和 1828—1830), 首相(1834—1835 和 1841—1846), 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廢除了谷物法(1846)。——第 73、77、100、106、126、184、189、246、257、306、414、434、444—446、448—451、453、454、583 頁。
- 皮尔, 罗伯特(Peel, Robert 1822—189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皮尔分子, 后为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 曾任海軍副大臣(1855—1857); 罗伯特·皮尔的儿子。——第 150、164、548、549 頁。
- 皮尔, 卓納森(Peel, Jonathan 1799—1879)——英国將軍, 托利党人, 議會議員; 1855 年为克里木英軍状况調查委員會委員。——第 412—414 頁。
- 皮尔, 弗雷德里克(Peel, Frederick 1823—1906)——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分子, 后为自由党人; 陸軍副大臣(1855—1857); 罗伯特·皮尔兄弟。——第 77、113、563 頁。
- 皮尔斯, 富兰克林(Pierce, Franklin 1804—1869)——美国总统(1853—1857)。——第 658 頁。
- 卡托(老卡托)(馬可·波尔齐烏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公元前 234—149)——羅馬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貴族特权的維護者; 公元前 184 年被选为監察官, 他監察之严格是人所共知的。——第 712 頁。
- 卡穆, 雅克(Camou, Jacques 生于 1792 年)——法国將軍, 1855 年任克里木法軍师长。——第 576、577 頁。
- 卡諾, 拉查尔·尼古拉(Carnot, Lazare Nicolas 1753—1823)——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政治和軍事活动家, 資产階級共和主义者;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階級革命时期傾向雅各宾党人, 1794 年参加热月 9 日的反革命政变。——第 322、678 頁。
- 卡利古拉(Caligula 12—41)——羅馬皇帝(37—41)。——第 104 頁。
- 卡德威尔, 爱德华(Cardwell, Edward 1813—1886)——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派領袖之一,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貿易大臣(1852—1855), 爱尔兰事务大臣(1859—1861), 殖民大臣(1864—1866)和陸軍大臣(1868—1874)。——第 98、115、189 頁。
- 卡特賴特, 約翰(Cartwright, John 1740—1824)——英国政論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 資产階級激进派; 在报刊上发表意見要求采用普选权进行議會改革。——第 301 頁。
- 卡瑟克特, 乔治(Cathcart, George 1794—1854)——英国將軍, 1854 年任克里

- 木英軍師長。——第 158、510 頁。
-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 (Cavaignac, Louis Eugène 1802—1857)——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 年 5 月起为法国陸軍部長，极端殘酷地鎮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为政府首腦 (1848 年 6—12 月)。——第 277、666 頁。
- 卡斯特朗，艾斯普里·維克多·伊丽莎白·博尼法斯 (Castellane, Esprit Victor Elizabeth Boniface 1788—1862)——伯爵，法国元帥，波拿巴主义者，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积极参加者之一。——第 277 頁。
-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 (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1769—182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陸軍和殖民大臣 (1805—1806、1807—1809)，外交大臣 (1812—1822)。——第 160、343、436 頁。
- 布朗，乔治 (Brown, George 1790—1865)——英国將軍；1854—1855 年任克里木英軍師長。——第 276 頁。
- 布律阿，阿尔芒·約瑟夫 (Bruat, Armand-Joseph 1796—1855)——法国海軍上將，1855 年任黑海艦隊總司令。——第 688 頁。
- 布隆諾夫，菲力浦·伊万諾維奇 (Бру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1797—1875)——男爵，俄国外交家；曾任駐倫敦公使 (1840—1854、1858—1860)，后为駐倫敦大使 (1860—1874)。——第 458 頁。
- 布兰西昂，阿道夫·厄内斯特·德 (Brancion, Adolphe Ernest de 1803—1855)——法国軍官，1855 年任克里木法軍團長。——第 394 頁。
- 布奧尔-紹恩斯坦，卡尔·斐迪南 (Boul-Schauenstein, Karl Ferdinand 1797—1865)——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駐彼得堡公使 (1848—1850)，后为駐倫敦公使 (1851—1852)，首相兼外交大臣 (1852—1859)。——第 5、204、286、411 頁。
- 布萊，詹姆斯 (Bligh, James)——五十年代宪章运动的积极活动家之一。——第 366 頁。
- 布萊特，約翰 (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派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自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派領袖之一；历任自由党内閣各部大臣。——第 98—100、206、228、268、273、274、317、318、413、437、441、541、628 頁。
- 布魯姆，亨利·彼得 (Brougham, Henry Peter 1778—1868)——男爵，英国法学家和文学家，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輝格党的著名活动家，曾任大法官 (1830—1834)；五十年代起在政治生活中不起重大作用。——第 356、438、440、454 頁。
- 布魯土斯 (馬可·尤尼烏斯·布魯土斯) (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 85 左右—42)——羅馬政治活动家，反对尤利烏斯·凱撒的貴族共和派陰謀的发起人之一。——第 12、399 頁。
- 布腊默耳，乔治·布萊恩 (Brummel, George Bryan 1778—1840)——英国貴族，由于讲究穿戴，得外号“美男子布腊默耳”。——第 549 頁。
- 布腊提昂諾，季米特卢 (Bratiano, Dimi-tru 1818—1892)——羅馬尼亚政治活

动家和政論家，曾参加瓦拉几亚 1848 年革命，革命失敗后侨居国外。——第 551 頁。

布尔克奈，弗朗斯瓦·阿道夫 (Bourque-
ney, François Adolphe 1799—1869)
——男爵，法国外交家；曾任駐君士
坦丁堡公使 (1814—1844)，后为大使
(1844—1848)，又任駐維也納公使
(1853—1856)，后为大使 (1856—
1859)。——第 5 頁。

布尔韦尔-利頓，爱德华·乔治·利頓
(Bulwer-Lytton, Edward George
Lytton 1803—1873) ——英国資产阶
級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初期为輝格党
人，1852 年起为托利党人，議會議員。
——第 305、351、398、400—402、405、
409、410、424 頁。

六 画

安 (Anne 1665—1714) ——英国女王
(1702—1714)。——第 118 頁。

伍德，查理 (Wood, Charles 1800—1885)
——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1846
—1852 年任財政大臣，后为印度事务
、督察委员会主席 (1852—1855)，1855—
1858 年任海軍首席大臣，后为印度事
务大臣 (1859—1866)。——第 27、47、
79、104、175、370、373、413、414 頁。

迈尔斯，威廉 (Miles, William 生于 1797
年) ——英国議會議員，托利党人。——
第 84 頁。

列阿德，尼古拉·安德列也維奇 (Реад,
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1793 左右—
1855) ——俄国將軍，1855 年任克里木
駐軍軍長。——第 575、631 頁。

吉比奇，伊万·伊万諾維奇 (Дибич,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 ——伯爵，俄

国元帅，1828—1829 年俄土战争时为
俄軍总司令；鎮压 1830—1831 年波兰
起义的俄軍总司令。——第 512 頁。

托特列本，埃杜阿尔德·伊万諾維奇
(Тотлебен, Эдуард Иванович 1818
—1884) ——杰出的俄国軍事工程师，
上校，1855 年 4 月起为將軍，英勇的塞
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組織者之一。——
第 194、235、509、513、555、655 頁。

多勃罗夫斯基，約瑟夫 (Dobrowski, Jo-
seph 1753—1829) ——杰出的捷克学
者和社会活动家；斯拉夫語言的科学語
文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对于十九世紀
上半叶捷克民族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
作用。——第 221 頁。

达来朗-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 (Talley-
rand-Pe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 ——公爵，著名的法国外
交家，外交部长 (1797—1799、1799—
1807、1814—1815)，法国出席維也納會
議的代表 (1814—1815)、駐倫敦大使
(1830—1834)，其特点是在政治上毫无
原則和唯利是图。——第 203、343 頁。

考萊男爵，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里
(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1804—1884) ——法国外
交家，曾任駐巴黎大使 (1852—1867)。
——第 690—692、695、706 頁。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
1825) ——俄国皇帝 (1801—1825)。
——第 160、343 頁。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
1881) ——俄国皇帝 (1855—1881)。
——第 160、169、218、329、349、607、
637 頁。

乔治三世 (Georg III 1738—1820) ——
英国国王 (1760—1820)。——第 443、

- 643—645 頁。
- 乔治四世 (Georg IV 1762—1830)——摄政王(1811—1820)和英国国王(1820—1830)。——第 364、443 頁。
- 休斯, 特·姆·(Hughes, T. M.)——十九世紀上半叶英国作家, 长期侨居西班牙。——第 537 頁。
- 休謨, 約瑟夫 (Hume, Joseph 1777—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激进派首領之一, 議會議員。——第 72、102、103、268、301、436、440 頁。
- 华德, 威廉 (Ward, William 生于 1817 年)——男爵, 英国貴族, 托利党人。——第 412 頁。
- 华姆斯萊, 乔舒阿 (Walmsley, Joshua 1794—1871)——英国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激进派, 議會議員; 五十年代为全国議會改革和財政改革协会組織者之一和主席。——第 268 頁。
- 伏尔特, 約翰 (Wolter, Johann 1789—1857)——奧地利將軍, 軍事工程師; 1853—1857 年任克拉科夫要塞司令。——第 568 頁。
- 伏尔泰, 弗朗斯瓦·瑪丽 (Voltaire, François-Marie)(本姓阿魯埃 Arouet de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論哲学家, 諷刺作家, 历史学家, 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 反对专制政体和天主教。——第 364、391 頁。
- 艾雷, 理查 (Airey, Richard 1803—1881)——英国將軍, 1854—1855 年为克里木英軍兵站总监。——第 712 頁。
- 艾克蘭, 詹姆斯 (Acland, James 1798—1876)——英国社会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論者; 1855 年为資產階級財貿界爭取行政改革运动組織者之一。——第 253、254 頁。
- 艾布納尔(Ebner)——奧地利將軍, 克里木战争期間任普澤米希尔要塞司令。——第 568 頁。
- 米涅, 克勞德·埃蒂耶納(Minié, Claude Étienne 1804—1879)——法国軍官, 新式步槍的發明者。——第 475、484、490、500、525、530 頁。
- 米爾納·基卜生——見基卜生, 托馬斯·米爾納。
- 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維奇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32—1909)——俄国大公, 尼古拉一世的第四個兒子。——第 122 頁。
- 米克洛希奇, 弗蘭蒂舍克 (Miklosich, František 1813—1891)——著名的學者, 斯拉夫語文学的代表人物, 斯拉夫語比較語法的奠基人; 斯洛文尼亚人。——第 221 頁。
- 伊文思, 乔治·德·雷希(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將軍, 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議會議員; 1854 年任克里木英軍師長。——第 77、129、130、154、689 頁。
- 伊斯甘德-貝伊 (亚历山大·伊林斯基) (Iskender Beg (Alexander Ilinski) 1810—1861)——土耳其將軍, 波兰人; 三十至四十年代先后在西班牙、葡萄牙、波斯和法国的軍隊中供職, 曾参加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 革命失敗后流亡土耳其, 加入土耳其國籍; 曾任多瑙河土軍指揮官(1853—1854), 克里木土軍指揮官(1855)和高加索土軍指揮官(1855—1856)。——第 196、197、521 頁。
- 伊斯馬伊耳-帕沙 (乔治·克美蒂) (Ismail Pasha (György Kmetty) 1810—1865)——土耳其將軍, 匈牙利人; 曾參

加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革命失敗后流亡土耳其，加入土耳其國籍；曾任多瑙河土軍指揮官(1853—1854)，高加索土軍指揮官(1854—1855)。——第 649 頁。

伊布拉希姆-帕沙 (Ibrahim Pasha 1789—1848)——埃及的統帥，埃及執政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嗣子；在埃及對土耳其的戰爭中任埃及軍總司令(1831—1833 和 1839—1841)；1844 年起是埃及的共同攝政者。——第 73 頁。

西哀士，艾曼紐爾·約瑟夫 (Sieyes, Emmanuel Joseph 1748—1836)——法國天主教神甫，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活動家，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第 355 頁。

西摩爾，喬治·漢密爾頓 (Seymour, George Hamilton 1797—1880)——英國外交家，1851—1854 年為駐彼得堡公使。——第 29、293 頁。

西蒙斯，約翰·林托恩·阿腊賓 (Simmons, John Lintorn Arabin 1821—1903)——英國中校，軍事工程師，後為元帥；克里木戰爭期間為駐克里木土軍司令部代表。——第 686—688、690、691、696、701、703、704、706—709 頁。

西頓男爵，約翰·科耳伯恩 (Seaton, John Colborne 1778—1863)——英國將軍，曾參加反對拿破侖第一的戰爭(1808—1814 和 1815)，愛爾蘭英軍司令(1855—1860)。——第 77 頁。

西韋爾斯，弗拉基米爾·卡爾洛維奇 (Сиверс, Владимир Карлович 1790—1862)——伯爵，俄國將軍，1854—1855 年任波羅的海沿岸駐軍司令。——第 16、23、418 頁。

西斯蒙第，讓·沙爾·列奧納爾·西蒙·

德 (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批評家。——第 34 頁。

西德默思子爵，亨利·阿丁頓 (Sidmouth, Henry Addington 1757—1844)——英國國家活動家，托利黨人；曾任首相兼財政大臣(1801—1804)；任內務大臣時(1812—1821)對工人運動實施鎮壓措施。——第 70、246 頁。

七 画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公元前 384—322)——古希臘卓越的演說家和政治活動家，雅典的反馬其頓黨的領袖，奴隸主民主制的擁護者。——第 133 頁。

庇護九世 (Pius IX 1792—1878)——羅馬教皇 (1846—1878)。——第 452—454 頁。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偉大的意大利詩人。——第 412 頁。

辛普森，詹姆斯 (Simpson, James 1792—1868)——英國將軍，1855 年(2—6 月)為陸軍參謀長，後任克里木英軍總司令(6—11 月)。——第 77、81、539、575、610—612、617—619、628、686—689、692、707、708、712 頁。

懷特塞德，詹姆斯 (Whiteside, James 1804—1876)——愛爾蘭法學家和政治活動家，托利黨人，議會議員；屢任英國的愛爾蘭管理機構中高級司法職務。——第 84 頁。

希斯科特，威廉 (Heathcote, William 1801—1881)——英國議會議員。——第 283、284、303 頁。

邦迪埃拉兄弟，阿提利奧(1810—1844)和

- 埃米利奧（1819—1844）（Bandiera, Attilio ed Emilio）——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軍官，“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員；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1844）。——第 333、582 頁。
- 劳勒，弗兰西斯·查理（Lawley, Francis Charles 1825—1901）——英国記者，格萊斯頓的私人秘书（1852—1854）；1854—1856 年为“泰晤士报”駐美国記者。——第 30、117 頁。
- 沙法里克，巴維尔·約瑟夫（Šafařík, Pavel Josef 1795—1861）——杰出的斯洛伐克語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运动自由派代表，曾参加 1848 年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拥护奥地利斯拉夫主义綱領。——第 221 頁。
- 別布托夫，瓦西里·奧西波維奇（Бебутов, Василий Осипович 1791—1858）——公爵，俄国將軍，克里木战争期間任高加索駐軍指揮官。——第 651、680 頁。
-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維奇（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30—1800）——偉大的俄国統帥。——第 632 頁。
- 麦克唐納（Macdonald）——“泰晤士报”的撰稿人。——第 182 頁。
- 麦克尼耳，約翰（McNeill, John 1795—1883）——英国外交家，駐德黑兰公使（1836—1839 和 1841—1842）；1855 年为調查克里木軍需工作的政府全权代表之一。——第 81 頁。
- 麦克馬洪，瑪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Mac-Mahon, Marie-Edme-Pratrice-Maurice de 1808—1893）——法国將軍，后为元帥，波拿巴主义者；曾参加第二帝国的各次战争，1855 年任克里木法軍師長；是鎮压巴黎公社的劊子手之一；曾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總統（1873—1879）。——第 615、620 頁。
- 里德，約瑟夫·海托恩（Reed, Joseph Heitorn）——英国軍官，議會議員。——第 540 頁。
- 里迪格尔，費多尔·瓦西里也維奇（Ридигер, Фе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4—1856）——伯爵，俄国將軍，1854 年为波兰王国副总督和俄国西部边境駐軍司令，1855 年任近卫軍和擲彈兵軍总司令。——第 418 頁。
- 里士滿公爵，查理·倫諾克斯-戈登（Richmond, Charles Lennox-Gordon 1791—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第 3 頁。
- 伯克，艾德蒙（Burke, Edmund 1729—1797）——英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輝格党人，后为托利党人，議會議員，初期傾向自由主义，后来成为反动分子，是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凶惡敌人之一。——第 431、645 頁。
- 伯德特，弗兰西斯（Burdett, Francis 1770—1844）——英国政治活动家，資產階級激进派，后为托利党人；議會議員。——第 228、301、574 頁。
- 伯戈因，約翰·福克斯（Burgoyne, John Fox 1782—1871）——英国將軍，軍事工程师，1868 年起为元帥；1854—1855 年任克里木英軍軍事顧問和工程長官。——第 81 頁。
- 杜克，詹姆士（Duke, James 生于 1792 年）——英国議會議員，自由貿易論者。——第 154 頁。
- 杜拉克（Dulac）——法国將軍，1855 年任

- 克里木法軍師長。——第 615 頁。
- 杜木里埃, 沙尔·弗朗斯瓦 (Dumouriez, Charles François 1739—1823) —— 法国將軍和十八世紀末資產階級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 吉倫特党人; 1792—1793年为北部革命軍队指揮官; 1793年3月背叛革命事业。——第 33、40 頁。
- 杜邦·德·勒坦, 比埃尔·安都昂 (Dupont de l'Étang, Pierre-Antoine 1765—1840) —— 法国將軍, 1808年在西班牙作战时率本师在拜兰附近投降。——第 210 頁。
- 坎提昂 (Cantillon) —— 法国下級軍官, 在拿破侖第一的軍队中服役; 1818年被控謀刺威灵頓 (在法国的英国占領軍总司令), 后宣告无罪。——第 237 頁。
- 坎特布里大主教——見薩姆納, 約翰。
- 坎宁, 乔治 (Canning, George 1770—1827) ——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領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807—1809、1822—1827), 首相 (1827)。——第 69、70、246、435 頁。
- 坎宁, 查理·約翰 (Canning, Charles John 1812—1862)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曾任郵政大臣 (1853—1855), 印度总督 (1856—1862)。——第 99 頁。
-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尔 (Vauban, Sébastien le Prestre 1633—1707) —— 法国元帥, 軍事工程師, 著有許多有关筑城学和圍攻方面的著作。——第 321—323 頁。
- 沃克曼 (Workman) —— 五十年代宪章运动积极参加者之一。——第 254 頁。
- 沃里克伯爵, 理查·尼維尔 (Warwick, Richard Neville 1428—1471) —— 英国封建主, 在紅白薔薇战争 (1455—1485) 中起巨大作用; 他操纵了立王事宜, 因此得外号“国王制造者”。——第 102、399 頁。
- 沃尔波尔, 霍雷修 (Walpole, Horatio 1717—1797) —— 英国貴族, 作家和艺术理論家。——第 436 頁。
- 沃尔波尔, 斯宾塞·霍雷修 (Walpole, Spenser Horatio 1806—1898)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內务大臣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7)。——第 43、318 頁。
- 利文, 达丽娅 (多罗苔娅)·赫里斯托弗罗夫娜 (Ливен, Дарья (Дорогея) Христофоровна 1785—1857) —— 公爵夫人, 俄国外交家赫·安·利文之妻; 她在欧洲外交生活中, 作为倫敦和巴黎的政治沙龙的女主人起着显著的作用。——第 361 頁。
- 利奈公爵, 卡尔·約瑟夫 (Ligne, Karl Joseph 1735—1814) —— 奧地利將軍, 外交家和作家, 1809年起为元帥。——第 343 頁。
- 利迭尔斯,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維奇 (Лидерс,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0—1874) —— 俄国將軍; 1853—1854年任多瑙河俄軍軍長, 1855年任南方軍司令, 1856年初为克里木駐軍总司令。——第 418、638、640、641 頁。
- 利普兰迪, 巴維尔·彼得罗維奇 (Липранди, 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1796—1864) —— 俄国將軍, 1853—1854年任多瑙河俄軍師長, 1854—1855年在克里木任師長, 在黑河战役中任軍長。——第 558、575 頁。
- 利物浦伯爵, 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 (Liverpool, Robert Banks Jenkin-

- son 1770—1828)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領袖之一,曾历任各部大臣,首相(1812—1827)。——第70、83、160、248、373頁。
- 克奧,威廉·尼古拉斯(Keogh, William Nicolas 1817—1878)——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皮尔派,議會中爱尔兰党团的領袖之一;屡任英国的爱尔兰管理机构中高級司法职务。——第46、135、136頁。
- 克雷茲(Krösus)——吕底亚的皇帝(公元前560—546)。——第166頁。
- 克美蒂——見伊斯馬伊耳·帕沙。
- 克勞塞維茨,卡尔(Clauswitz, Karl 1780—1831)——普魯士將軍和資產階級最杰出的軍事理論家。——第499頁。
- 克奈澤貝克,卡尔·弗里德里希(Knesebeck, Karl Friedrich 1768—1848)——男爵,普魯士元帥,曾参加反对拿破侖第一的各次战争,曾出席1814—1815年維也納會議,1831年任普魯士駐波茲南監視軍總司令。——第344、346頁。
- 克拉倫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1800—1870)——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1847—1852),殘酷鎮压了1848年的爱尔兰起义;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第11、26、33、35、62、80、104、162—164、285、355、356、362、411、446、453、551、553、570、675—679、681—683、686、688—710、712頁。
- 克兰里卡德侯爵,烏利克·約翰·德·巴勒(Clanricarde, Ulick John de Burgh 1802—1874)——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輝格党人;曾任駐彼得堡大使(1838—1841),邮政大臣(1846—1852)。——第85、117、372頁。
- 貝林,弗兰西斯(Baring, Francis 1796—1866)——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議會議員;1839—1841年任財政大臣,1849—1852年任海軍首席大臣。——第77、283、284、303、316頁。
- 貝利,亨利·詹姆斯(Baillie, Henry James 生于1804年)——英国議會議員,托利党人。——第272頁。
- 貝茨,罗伯特·梅金(Bates, Robert Makin 生于1791年左右)——英国銀行家。——第372頁。
- 貝多,瑪麗·阿尔丰斯(Bedeau, Marie 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副議長,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逐出法国。——第143頁。
- 貝列拉,艾米尔(Pérelle, Emile 1800—1875)——法国銀行家,1825—1831年为圣西門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股份銀行的創辦人和董事之一。——第625頁。
- 貝爾格,費多尔·費多羅維奇(Берг, 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 1793—1874)——俄国將軍,后为元帥;1853—1863年为駐芬兰俄軍總司令和芬兰总督。——第418頁。
- 貝爾納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Bernadotte, Jean Baptiste Jules 1763—1844)——法国元帥,1810年被瑞典

国王查理八世收为义子，成为王位继承者，1813年参加反对拿破侖第一的战争；1818—1844年为瑞典和挪威的国王，称查理十四·約翰。——第531頁。

貝尔納·奧斯本，拉尔夫 (Bernal Osborne, Ralph 1808—1882) ——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 (屬於所謂梅費爾激进派)，議會議員，海軍部秘书长 (1852—1858)。——第4、41、46頁。

貝克萊，莫里斯·弗雷德里克·菲茨哈丁 (Berkeley, Maurice Frederick Fitzhardinge 1788—1867) ——英国海軍上将和政治活动家，輝格党人，議會議員，海軍部部务委員 (1833—1839和1846—1857)。——第41頁。

貝克萊，弗兰西斯·亨利·菲茨哈丁 (Berkeley, Francis Henry Fitzhardinge 1794—1870) ——英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議會議員。——第426頁。

貝克韦耳，霍尔 (Bakewell, R. Holl) ——英国軍医；1855年在克里木的野战医院工作。——第563頁。

八 画

金，彼得·約翰·洛克 (King, Peter John Locke 1811—1885) ——英国政治活动家，資產階級激进派，議會議員。——第440、454頁。

門茨，乔治·弗雷德里克 (Muntz, George Frederick 1794—1857) ——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資產階級激进派，議會議員。——第135頁。

奈特，查理 (Knight, Charles 1791—1873) ——英国政論家和发行人。——第341頁。

雨果，維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 ——偉大的法国作家，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澤西島；1855年底被英国当局驅逐出境。——第549頁。

芬倫，詹姆斯 (Finlen, James) ——宪章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52—1858年为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員會委員。——第366頁。

帖木儿 (塔梅尔兰) (1336—1405) ——中亚細亞的統帥和征服者，东方幅員广大的国家的奠基者。——第122頁。

彼得一世 (Петр I 1672—1725) ——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第19、160頁。

孟德斯鳩，沙尔 (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 ——杰出的法国資產階級社会学家、經濟学家和作家，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启蒙运动的代表，君主立宪制的理論家。——第361頁。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德奧杜尔 (Changarnier, Nicolas Anne Théodule 1793—1877) ——法国將軍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驅逐出法国。——第143、277、421頁。

居斯丁侯爵，阿斯托尔夫 (Custine, Astolpho 1790—1857) ——法国旅行家和作家。——第508頁。

杰弗雷斯，乔治 (Jeffreys, George 1648—1689) ——男爵，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皇家法庭大法官 (1683—1685)；他对政治案件的判决极为严酷。——第248頁。

林賽，威廉·肖 (Lindsay, William Shaw 1861—1877) ——英国船主和商

- 人，自由貿易論者，議會議員。——第 373 頁。
- 林德赫斯特男爵，約翰·辛格爾頓·柯普利 (Lyndhurst, John Singleton Copley 1772—1863) ——英國政治活動家、法學家，托利黨人；曾任大法官 (1827—1830、1834—1835 和 1841—1846)。——第 8、160—162、285、552、569、570 頁。
- 舍伐利埃，米歇爾 (Chevalier, Michel 1806—1879) ——法國工程師，經濟學家和政論家，三十年代為聖西門主義者，後為自由貿易論者；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變後積極支持和宣傳拿破侖第三的經濟政策，曾長期為“辯論日報”的編輯。——第 626 頁。
- 舍夫茨別利伯爵，安東尼·艾釋黎·庫伯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1801—1885) ——英國政治活動家，四十年代在議會中領導托利黨人慈善家集團，1847 年起為輝格黨人；1855 年為克里木英軍醫療狀況調查委員會主席。——第 363、562 頁。
- 佩諾，沙爾 (Penaud, Charles 1800—1864) ——法國海軍上將，1855 年任波羅的海分艦隊指揮官。——第 561 頁。
- 佩拉特，阿普斯利 (Pellatt, Apsley 1791—1863) ——英國企業主，資產階級激進派，議會議員。——第 155 頁。
- 佩利西埃，讓·雅克 (Pélissier, Jean-Jacques 1794—1864) ——法國將軍，1855 年 9 月起為元帥；三十到五十年代曾參加佔領阿爾及利亞；1855 年初任克里木法軍軍長，後為總司令 (1855 年 5 月—1856 年 7 月)。——第 259、264、271、272、275—277、308—310、312—314、320、324—326、354、359、375、377、379、380、392—396、406、408、558、575、577、578、590、602、609、610、617、636、660、669、670、686—689、693、705 頁。
- 拉·馬爾摩拉，阿爾丰梭·費勒羅 (La Marmora, Alfonso Ferrero 1804—1878) ——意大利將軍和國家活動家，皮蒙特陸軍大臣 (1848、1849—1855、1856—1859)，1855 年任克里木撒丁軍隊軍長，後為首相。——第 576 頁。
- 拉德茨基，約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 ——伯爵，奧地利元帥，1831 年起為意大利北部的奧軍司令官，1848—1849 年曾殘酷鎮壓意大利革命民族解放運動；1850—1856 年為倫巴第一威尼士王國的總督。——第 224、489、670 頁。
- 拉莫特盧日，約瑟夫·愛德華·德 (La Motterouge, Joseph Eduard de 1804—1883) ——法國將軍，1855 年任克里木法軍師長。——第 615 頁。
- 拉摩里西爾，克利斯托夫·路易·萊昂 (Lamoricière, Christophe-Louis Léon 1806—1865) ——法國將軍和政治活動家，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參加佔領阿爾及利亞，1848 年積極參加鎮壓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後為卡芬雅克政府的陸軍部長 (6—12 月)，對路易·波拿巴政府採取反對立場，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變後，被驅逐出國。——第 143、167、277 頁。
- 帕紐亭，費多爾·謝爾蓋也維奇 (Панютин, Федо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0—1865) ——俄國將軍，在克里木戰爭初期任軍長，1855—1856 年為俄國西南部後備軍指揮官。——第 16、23、311、575 頁。
- 帕西菲科，大衛 (Pacífico, David 1784

- 1854)——英国的臣民, 雅典商人; 葡萄牙人。——第 43、71 頁。
- 帕克斯頓, 約瑟夫 (Paxton, Joseph 1801—1865)——英国建筑学家, 倫敦世界工业展覽会(1851)展覽館設計者, 議會議員。——第 84 頁。
- 帕拉茨基, 弗兰蒂舍克 (Palacký, František 1798—1876)——杰出的捷克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1848 年为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主席; 实行旨在维护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政策, 奥地利斯拉夫主义思想家之一。——第 221 頁。
- 帕斯凱維奇, 伊万·費多羅維奇 (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782—1856)——公爵, 俄国元帅, 1831 年夏天起为镇压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俄軍总司令, 1832 年起为波兰王国的总督, 1849 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軍总司令; 1854 年为俄国西部和南部边境的駐軍总司令, 4—6 月任多瑙河俄軍指揮官。——第 512 頁。
- 帕麥斯頓子爵, 亨利·約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依仗輝格党右翼分子的支持, 成为該党領袖之一; 曾任軍务大臣 (1809—1828), 外交大臣 (1830—1834, 1835—1841 和 1846—1851), 內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4、8、11、12、20、25、26、29、30、33、35、39、40、43—45、49—51、54、55、62、63、68—75、79—83、95、96、98—101、104、105、113、115、118、122、126、127、132、135、136、150、158、159、164、188、196、201、204、227、228、237、244、249、250、252、272—274、278—280、295—297、303、304、316—318、329、335—338、340、351、352、359、361、362、370—372、391、398、400—405、409、410、413、414、420、424、425、448、458、539、540、542—544、546、547、549、550、552、560、569、571、582、583、628、654、658、669、675、679、682、692、708、710、711 頁。
- 波将金, 格里哥里·亚历山大羅維奇 (Потемкин,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739—1791)——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 元帅, 1787—1791 年俄土战争时期任总司令。——第 632 頁。
- 波特兰公爵, 威廉·亨利·本廷克 (Portland, William Henry Bentinck 1738—1809)——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首領之一; 曾任內务大臣 (1794—1801), 內閣首相 (1783 和 1807—1809)。——第 70 頁。
- 波尔切斯特尔, 亨利·赫伯特 (Porchester, Henry Herbert 1741—1811)——英国議会活动家, 輝格党人。——第 21、248 頁。
- 波茨措-迪-博尔哥, 卡尔·奧西波維奇 (Поц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1764—1842)——伯爵, 俄国外交家, 科西嘉人, 1814—1821 年任駐巴黎公使, 1821—1835 年为大使, 后任駐倫敦大使 (1835—1839)。——第 160 頁。
- 波拿巴, 日罗姆 (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拿破侖第一之弟, 威斯特伐里亚国王 (1807—1813), 1850 年起为元帅。——第 167 頁。
- 波拿巴, 拿破侖·約瑟夫·沙尔·保尔 (Bonaparte, Napoléon Joseph Charles Paul 1822—1891)——日罗姆·波拿巴之子, 拿破侖第三的堂弟,

- 在长兄死后(1847年)改名为日罗姆; 1854年以將軍銜任克里木法軍师长。——第132、133、138、142、145、146、167頁。
- 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1804—1814、1815和1852—1870)。——第143、146、211、318頁。
- 罗素, 約翰(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領袖, 曾任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 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 樞密院院长(1854—1855); 1855年为英国出席維也納會議的代表和殖民大臣。——第4、5、7—13、26、27、30、32、34—39、41、43、50、51、53—55、63、81—83、85、99、100、102、105、106、112、113、115、188、190、203、204、279—282、284—286、291—294、296、304—307、317、335、337、362、373、400、402、403、405、409—411、430、431—442、444—446、448—455、541—544、552、553、569、570、583、642頁。
- 罗格, 克利斯托夫·米歇尔(Roguet, Christoph Michel 1800—1877)——伯爵, 法国將軍, 波拿巴主义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第277頁。
- 罗巴克, 約翰·阿瑟(Roebuck, John Arthur 1801—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资产階級激进派, 議會議員, 1855年为克里木英軍状况調查委员会主席。——第5—12、20、31、33、36、38—40、42、50、51、80、82—84、98—100、184、190、279、280、317、333—335、348、352、357、360—362、382、398—400、409—414、420、424、427、432、549頁。
- 罗宾逊, 弗雷德里克·約翰, 葛德里奇子爵(Robinson, Frederick John, Viscount Goderich 1782—1859)——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23—1827年任財政大臣, 首相(1827—1828)。——第70、118頁。
- 罗克比男爵, 亨利·罗宾逊-蒙台居(Rokeby, Henry Robinson-Montagu 1798—1883)——英国將軍, 1855年为克里木英軍师长。——第77頁。
- 罗伯斯比尔, 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階級革命的杰出活动家, 雅各宾党人的領袖, 革命政府的首腦(1793—1794)。——第84頁。
- 罗曼諾夫王朝(Романовы)——俄国皇朝(1613—1917)。——第654頁。
- 阿丁頓——見西德默思, 亨利。
- 阿德尔, 罗伯特·亚历山大·舍夫托(Adair, Robert Alexander Shefto)——英国上校, 議會議員。——第412、413頁。
- 阿斯特, 恩斯特·路德維希(Aster, Ernst Ludwig 1778—1855)——普魯士將軍, 軍事工程师。——第322、499、500頁。
- 阿基米得(Archimedes 公元前287左右—212)——古希腊偉大的数学家和机械学家。——第366頁。
- 阿朗維耳, 阿尔芒·奧克塔夫·瑪麗·德(Allonville, Armand Oktav Marie d' 1800—1867)——法国將軍; 1854—1855年任克里木法軍指揮官。——第630頁。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戈登(Aberdeen, George Gordon 1784—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0年起为

皮尔派首領；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1841—1846)和联合內閣首相(1852—1855)。——第7、8、10—13、25、27、29、33—36、38、49、50、62、72、82、83、96、98、99、105、158、280、285、295、317、351、410、411、413、420、710頁。

阿盖尔公爵，乔治·道格拉斯·坎伯尔(Argyll, George Douglas Campbell 1823—1900)——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分子，后为自由党人；曾任掌璽大臣(1853—1855、1859—1860、1860—1866、1880—1881)，邮政大臣(1855—1858、1860)，印度事务大臣(1868—1874)。——第104頁。

阿尔宁，路德維希·約阿希姆(Arnim, Ludwig Achim 1781—1831)——德国反动浪漫派詩人。——第708頁。

阿尔伯特(Albert 1819—1861)——薩克逊-科堡-哥特亲王，英女王維多利亞的丈夫。——第334—336、340、360—362、382、628頁。

阿尔貝罗尼，朱利奧(Alberoni, Giulio 1664—1752)——西班牙国家活动家，紅衣主教；1717—1719年任国王菲力浦五世首相。——第79頁。

九 画

品得(Pindaros 公元前約522—442)——古希腊抒情詩人；曾写了許多庄严的頌詩。——第70、248頁。

柏姆(Böhm)——奥地利將軍；克里木战争期間任奧里繆茨要塞司令。——第568頁。

耶伊，雷希(Yea, Lysi 1808—1855)——英国軍官，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軍团长。——第396頁。

娄，罗伯特(Lowe, Robert 1811—1892)——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論家，“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輝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議會議員；曾任貿易副大臣(1855—1858)，財政大臣(1868—1873)，內务大臣(1873—1874)。——第84、274、283、284、303、304、414頁。

洛維特，威廉(Lovett, William 1800—1877)——英国手工业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三十年代宪章运动領袖之一，拥护“道德力量”并主張和資產階級合作。——第301頁。

派西沃，斯宾塞(Perceval, Spencer 1762—181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07—1809年任財政大臣，內閣首相(1809—1812)。——第70、246、248、249、373、453頁。

若米尼，昂利(Jomini, Henri 1779—1869)——將軍，初在法軍中供职，后在俄軍中供职，資產階級軍事学家，著有許多有关战略和軍事史方面的著作；瑞士人。——第499、608、679頁。

南丁格尔，弗洛倫斯(Nightingale, Florence 1820—1910)——英国女社会活动家，克里木战争期間在組織英軍医疗方面起杰出作用。——第183、187頁。

保罗，約翰·第恩(Paul, John Dean 1802—1868)——英国銀行家。——第372頁。

迪斯累里，本杰明，貝肯斯菲尔德伯爵(1871年受封)(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領袖之一，后为保守党領袖；曾任財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和首相(1868和1874—1880)。——第3、12、25、28、30、43、46、47、50、51、79、

- 81、82、84、105、175、246、272—274、278—281、283—288、292、293、296、304、351、402、409—411、413、552、569 頁。
- 約克, 查理·菲力浦 (York, Charles Philipp 1764—1834)——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軍务大臣(1801—1803), 內务大臣(1803—1804), 海軍大臣(1810—1811)。——第 248、249 頁。
- 約克公爵, 弗雷德里克·奧古斯特 (York, Frederick August 1763—1827)——英王乔治三世次子, 1795 年起为元帅, 曾任英軍总司令 (1798—1809、1811—1827); 在他指揮下的軍队在十八世紀末的历次对法战争中屡遭敗北。——第 574 頁。
- 施, 威廉 (Shee, William 1804—1868)——爱尔兰法学家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議會議員。——第 136、403 頁。
- 施尔德尔, 卡尔·安得列也維奇 (Шильдер, Карл Андреевич 1785—1854)——俄国將軍, 卓越的軍事工程师和发明家, 1828—1829 年和 1854 年俄土战争时, 在多瑙河領導俄軍进行圍攻作业。——第 194 頁。
- 拜倫, 乔治 (Byron, George 1788—1824)——杰出的英国詩人, 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34 頁。
- 拜比吉, 查理 (Babbage, Charles 1792—1871)——英国数学家和机械学家, 資产階級經濟学家。——第 305 頁。
- 欧仁妮——見蒙蒂霍, 欧仁妮。
- 欧几里得 (Eukleides 公元前四世紀末—三世紀初)——古希腊杰出的数学家。——第 485 頁。
- 柯尔曾, 罗伯特 (Curzon, Robert 1810—1873)——英国旅行家和作家; 1843—1844 年在爱尔斯倫确定土伊边界的全权代表之一。——第 651 頁。
- 柯克倫, 托馬斯, 丹多納耳德伯爵 (Cochrane, Thomas, Earl of Dundonald 1775—1860)——英国海軍上将, 曾参加反对拿破侖第一的各次战争, 議會議員。——第 574 頁。
- 查耳迪尼, 恩利科 (Cialdini, Enrico 1811—1892)——意大利將軍, 1855 年为克里木撒丁軍旅长。——第 615 頁。
- 查尔托雷斯基, 亚当·埃日伊 (Czartoryski, Adam Jerzy 1770—1861)——公爵, 波兰大地主, 十九世紀初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 曾任俄国外交大臣 (1804—1806);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时是临时政府首脑; 起义被鎮压后流亡巴黎, 在那里領導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第 74、546、547 頁。
- 查理大帝 (Charlemange 742 左右—814)——法国国王 (768—800) 和皇帝 (800—814)。——第 166 頁。
- 查理三世 (Charles III 1716—1788)——西班牙国王 (1759—1788)。——第 537 頁。
- 查理十二 (Charles XII 1682—1718)——瑞典国王 (1697—1718)。——第 531 頁。
- 查理-阿尔伯特 (Charles-Albert 1798—1849)——撒丁国王 (1831—1849)。——第 526 頁。
- 威克菲尔德, 爱德华·吉本 (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家活动家, 經濟学家, 制定了資产階級的殖民理論。——第 425 頁。
- 威灵頓公爵, 阿瑟·威尔斯里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英国統帅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

- 人；1808—1814 和 1815 年率領軍隊和拿破侖第一作戰；曾任陸軍總司令（1827—1828、1842—1852），首相（1828—1830）。——第 59、60、65、70、106、188、189、237、358、436、467、478、482、572、617 頁。
- 威斯特摩蘭伯爵，約翰·范恩（Westmorland, John Fane 1784—1859）——英國外交家；駐柏林公使（1841—1851），後為駐維也納公使（1851—1855）。——第 5、280 頁。
- 威爾遜，詹姆斯（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自由貿易論者，“經濟學家”雜誌的創辦人和編輯；1853—1858 年任財政部秘書長。——第 85 頁。
- 威爾遜，羅伯特·托馬斯（Wilson, Robert Thomas 1777—1849）——英國將軍，軍事作家，資產階級激進派，議會議員。——第 573 頁。
- 威廉四世（William IV 1765—1837）——英國國王（1830—1837）。——第 74、75 頁。
- 威廉斯，威廉·芬威克（Williams, William Fenwick 1800—1883）——英國將軍，1854—1855 年為駐高加索土軍司令部代表，卡爾斯保衛戰領導人之一。——第 633、647、649、651、675、676、686、695、705、709 頁。
- 哈丁，亨利（Hardinge, Henry 1785—1856）——子爵，英國將軍和國家活動家，托利黨人，1855 年起為元帥；曾參加反對拿破侖第一的各次戰爭，曾任軍務大臣（1828—1830 和 1841—1844），印度總督（1844 年—1848 年 1 月），英軍總司令（1852—1856）。——第 41、158、189、628 頁。
- 哈勒，卡爾·路德維希（Haller, Karl Ludwig 1768—1854）——瑞士的法學家 and 歷史學家，農奴制度和專制制度的辯護人。——第 717 頁。
- 哈耳福德，亨利（Halford, Henry）——英國議會議員。——第 152 頁。
- 哈菲茲-帕沙（Hafiz Pasha）——土耳其將軍，1855 年任高加索土軍指揮官。——第 685 頁。
- 哈林頓伯爵，萊斯特·菲茲吉拉德·查理·斯坦諾普（Harrington, Lester Fitzgerald Charles Stanhope 1784—1862）——英國上校和政治活動家，輝格黨人。——第 548 頁。
- 哈克斯特豪森，奧古斯特（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普魯士官員和作家，寫過一本專門描述俄國土地關係中村社制度殘余的著作，從政治觀點來看他是一個反動的農奴主。——第 226 頁。
- 哈桑-卜-薩巴赫（Hasan-Ben-Sabbah 1056—1124）——伊斯蘭教阿薩辛派創始人，該教派在十二至十三世紀曾抗御突厥-塞爾柱人和十字軍。——第 7 頁。
- 哈德威克伯爵，查理·菲力浦·約克（Hardwicke, Charles Philip York 1799—1873）——英國海軍上將和政治活動家，托利黨人。——第 3、247、248 頁。
- 哈里遜，喬治（Harrison, George）——英國工人，憲章運動積極參加者之一。——第 155 頁。
- 哈里斯——見馬姆茲伯里，詹姆斯。
- 科勒，楊（Kollár, Ján 1793—1852）——杰出的捷克詩人和語文學家；為爭取斯拉夫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而鬥爭的鼓吹

者之一；斯洛伐克人。——第 221 頁。

科勒特，科勒特·多布森 (Collet, Collet Dobson) ——英国激进派記者和社会活动家。——第 547、548 頁。

科布頓，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 ——英国厂主，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派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議會議員。——第 228、268、306、317、318、441 頁。

科苏特，拉約什 (路德維希) (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 ——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1848—1849 年革命时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人，匈牙利革命政府的首腦；革命失敗后逃离匈牙利。——第 26、49 頁。

科皮塔尔，瓦尔弗洛梅 (Kopitar, Bartolomeo 1780—1844) ——斯拉夫語文学的杰出代表，斯洛文尼亚人，著有許多有关斯拉夫各民族語言、文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221 頁。

科德林頓，威廉·約翰 (Codrington, William John 1804—1884) ——英国將軍，1854—1855 年任克里木英軍师长，后为总司令 (1855 年 11 月—1856 年 7 月)。——第 618、712 頁。

科貝特，威廉 (Cobbett, William 1762—1835)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第 37、102、153、227、301、435、574 頁。

科貝特，約翰·摩尔根 (Cobbett, John Morgan 1800—1877) ——英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議會議員，威廉·科貝特的儿子。——第 153 頁。

科尔弗，費多尔·赫里斯托佛罗維奇 (Корф, Федор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

男爵，俄国將軍，1855 年任克里木騎兵师师长。——第 631 頁。

科尔尼洛夫，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謝也維奇 (Корнило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06—1854) ——杰出的俄国海軍活动家，海軍上将，黑海舰队參謀長 (1849—1853)，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鼓舞者和組織者之一。——第 193、194、197、589 頁。

科尔蒙太涅，路易·德 (Cormontaigne, Louis de 1696 左右—1752) ——法国將軍，軍事工程师，著有許多有关筑城学和圍攻方面的著作。——第 322 頁。

科尔彻斯特男爵，查理·艾波特 (Colchester, Charles Abbot 1798—1867) ——英国海軍上将，托利党人，議會議員。——第 356 頁。

十 画

修洛 (Suleau) ——法国中校，1855 年为駐克里木英軍司令部代表。——第 688、689 頁。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傳記材料)。——第 87、170、192、195、196、265、276、312、313、380 頁。

爱里斯，爱德华 (Ellice, Edward 1781—1863) ——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議會議員；1855 年为克里木英軍状况調查委員會委員。——第 84 頁。

烏尔卡尔特，戴維 (Vrquhart, David 1805—1877) ——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1847—1852 年为議會議員。——第 74、75、123、301—303、306、334、405、456、457

- 頁。
- 夏恩霍斯特, 格尔哈特 (Scharnhorst, Gerhard 1755—1813) ——普魯士將軍和軍事活动家; 1806年普魯士軍隊为拿破侖打败后任軍事改革原則制訂委员会主席; 曾任陸軍大臣(1807—1810)和总參謀长(1807—1813); 在1813年反对拿破侖的解放戰爭中起卓越的作用。——第500頁。
- 索伊蒙諾夫, 費多尔·伊万諾維奇 (Соймонов,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800—1854) ——俄国將軍, 在克里木戰爭时期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軍指揮官, 在因克尔芒战斗中陣亡。——第631頁。
- 涅謝尔罗迭, 卡尔·瓦西里也維奇 (Не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 ——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总理大臣, 外交大臣(1816—1856)。——第160、285—287、292頁。
- 紐卡斯尔公爵, 亨利·佩勒姆·費恩斯·佩勒姆·克林頓 (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nnes Pelham Clinton 1811—1864) ——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分子, 曾任陸軍和殖民大臣(1852—1854), 陸軍大臣(1854—1855)和殖民大臣(1859—1864)。——第3、8、10、11、33—37、39、41、50、53、55、83、98、99、158、184、189、410、411、413、414頁。
- 哥尔查科夫,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維奇 (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 ——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駐維也納大使(1854—1856), 外交大臣(1856—1882)。——第5、204、281、292頁。
- 哥尔查科夫, 米哈伊尔·德米特利也維奇 (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93—1861) ——公爵, 俄国將軍, 曾任多瑙河俄軍司令(1853—1854), 南部軍隊总司令(1854年9月—1855年2月), 后为克里木駐軍总司令(1855年2—12月); 波兰王国总督(1856—1861)。——第23、263、314、555、575、577、578、592、595—597、600、602、603、609、620、630、631頁。
- 特罗蒂 (Trotti) ——撒丁將軍, 1855年为克里木撒丁軍师长。——第576、578頁。
- 特罗洛普, 約翰 (Trollope, John 生于1800年) ——英国政治活动家, 議會議員。——第52頁。
- 特腊佛斯, 英格列海姆 (Travers, Ingham) ——英国政治活动家; 1855年为資產階級財界爭取行政改革运动的領袖。——第254頁。
- 拿騷的摩里茨, 拿騷伯爵 (奧倫治亲王) (Maurice of Nassau, Prince of Orange and Count of Nassau 1567—1625) ——尼德兰总督(1585—1625); 軍事活动家, 尼德兰独立戰爭时期的統帥。——第500頁。
- 拿破侖亲王——見波拿巴, 拿破侖·約瑟夫·沙尔·保尔。
-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 ——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90、105、144、148、149、167、169、181、209、237、263、271、306、321、332、346、347、350、394、467、469—471、478、538、545、548、574、598、612、627、640、659、661、668、679頁。
-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拿破侖第一的侄子,

- 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33、62、85、105、125、126、129、132、142—144、146—149、166、167、169、174、175、179、196、204、207、209—213、237、264、270、276、306、310、326—329、331、332、338、339、346、348、350、354、358、379、391、404、408、416、421、425、475、476、479、544、547、549、555、569、588、625—627、654、658—663、665—671、694、697頁。
- 泰特,威廉(Tite, William 1798—1873)——英国建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議會議員;1855年为行政改革协会副主席。——第298、549頁。
- 泰勒,瓦特(Tyler, Wat 死于1381年)——1381年英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領袖。——第80、95頁。
- 泰勒,湯姆(Taylor, Tom 1817—1880)——英国剧作家和記者,五十年代为“笨拙”杂志的撰稿人,1874—1880年为編輯;1854年被任命为保健委员会秘书长。——第4頁。
- 泰勒,詹姆斯(Taylor, James)——英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1855年支持工业资产阶级的議会改革运动。——第154、156頁。
- 海斯,亨利希(Heß, Heinrich 1788—1870)——男爵,奥地利將軍,后为元帅,曾积极参加鎮压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1854—1855年任駐匈牙利、加里西亚和多瑙河各公国奧軍总司令。——第567頁。
- 海瑙,尤利烏斯·雅科布(Haynau, Julius Jakob 1786—1853)——奥地利將軍,曾殘酷鎮压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第311頁。
- 海华德,阿伯拉罕(Hayward, Abraham 1801—1884)——英国法学家和政論家,初期为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854年被委任为济貧委员会秘书长。——第30頁。
- 海特尔,威廉·古迪納夫(Hayter, William Goodenough 1792—1878)——英国法学家和議会活动家,輝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第8頁。
- 海尔維格,格奧尔格(Herwegh, Georg 1817—1875)——著名的德国詩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317頁。
- 納皮尔,查理(Napier, Charles 1786—1860)——英国海軍上将,1854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第306、333、372、564、565、582—587頁。
- 納皮尔,查理·詹姆斯(Napier, Charles James 1782—1853)——英国將軍,曾参加比利牛斯半島的反对拿破侖第一的战争(1808—1814);1842—1843年率領軍队占領信德,1843—1847年为信德执政者。——第583、584頁。
- 納皮尔,約瑟夫(Napier, Joseph 1804—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議會議員;1852年以爱尔兰总檢察長身分进入得比內閣;1858—1859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第29頁。
- 納皮尔,爱德华·艾勒斯(Napier, Edward Alers 1808—1870)——英国軍官;1854—1855年参加筹划克里木英軍軍需工作。——第60頁。
- 納皮尔,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英国將軍和軍事史学家;1804—1814年参加比利牛斯半島的反对拿破侖第一的战争。——第89、97、476—478、484、486、498、584頁。
- 納尔瓦艾斯,拉蒙·馬利阿(Narvaez,

- Romón Maria 1800—1868)——西班牙將軍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莫迪腊多斯派(溫和派)領袖,政府首腦(1844—1846,1847—1851,1856—1857,1864—1865和1866—1868),曾殘酷鎮壓群众的革命行动。——第536、537頁。
- 埃布林頓,休(Ebrington, Hugh 1818—1905)——子爵,英国政治活动家,輝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議會議員。——第297、548、549頁。
- 埃尔比昂,艾米尔(Herbillon, Emil 1794—1866)——法国將軍,1855年为克里木法軍師長。——第576、577頁。
- 埃利奧特,乔治·奧加斯特斯(Elliot, George Augustes 1813—1901)——英国海軍軍官,1858年起为海軍上將;1854—1855年为波罗的海艦隊一戰列艦指揮官。——第712頁。
- 埃克塞特侯爵,布劳恩劳·塞西耳(Exeter, Braunlou Cecil 1795—1867)——英国貴族,托利党人。——第412頁。
- 埃倫伯勒男爵,爱德华·罗(Ellenborough, Edward Law 1750—1818)——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初期为輝格党人,后为托利党人,議會議員,皇家法庭大法官(1802—1818)。——第247、248頁。
- 埃倫伯勒伯爵,爱德华·罗(Ellenborough, Edward Law 1790—1871)——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議會議員;曾任印度总督(1842—1844),海軍首席大臣(1846),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8);爱德华·罗·埃倫伯勒男爵的儿子。——第3、245、247、249、251—253、553、570頁。
- 埃斯基涅斯(Aeschines 公元前389—314)——著名的雅典演說家和政治活动家,雅典馬其頓党的領袖,奴隶占有制寡头政体的拥护者。——第133頁。
-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Espartero, Baldomero 1793—1879)——西班牙將軍和政治活动家,进步派領袖,西班牙摄政(1841—1843),政府首腦(1854—1856)。——第536頁。
- 埃斯潘納斯,沙尔·瑪丽·埃斯普里(Espinasse, Charles-Marie-Esprit 1815—1859)——法国將軍,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1854年为多布魯甲英軍師長,后为克里木英軍旅長(1854和1855)。——第167、271頁。
- 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傳記材料)。——第105、151、245、251、271、276、364、365、390頁。
- 馬林斯,理查(Malins, Richard 1805—1882)——英国法学家,托利党人,議會議員。——第373頁。
- 馬志尼,朱澤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之一。1849年为羅馬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首腦,1850年为倫敦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組織者之一。——第27頁。
- 馬尼揚,貝尔納·比埃尔(Magnan, Bernard Pierre 1791—1865)——法国元帥,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第277、663頁。
- 馬丹普雷,爱德华·沙尔·德(Martimprey, Edouard Charles de 1808—1883)——法国將軍,1854—1855年为

- 克里木法軍參謀長。——第 688 頁。
- 馬茂德二世(Mahmoud II 1785—1839)——土耳其蘇丹(1808—1839)。——第 73、517 頁。
- 馬爾波羅公爵，約翰·丘吉爾(Marlborough, John Churchill 1650—1722)——英國統帥，1702—1711 年爭奪西班牙王位繼承權戰爭期間任英軍總司令。——第 583 頁。
- 馬克西米利安·德斯特(Maximilian d'Este 1782—1863)——奧地利大公，將軍，特種形式要塞建築“馬克西米利安式塔樓”(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發明者。——第 568 頁。
- 馬姆茲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Malmesbury, James Harris 1746—1820)——英國外交家 and 國家活動家，輝格黨人；曾任駐彼得堡大使(1777—1782)。——第 642—644 頁。
- 馬姆茲伯里伯爵，詹姆斯·霍華德·哈里斯(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1807—1889)——英國國家活動家，托利黨人，後為保守黨著名活動家；曾任外交大臣(1852、1858—1859)，掌璽大臣(1866—1868、1874—1876)。——第 175、355—357、457、458 頁。
- 馬其頓的菲力浦二世(Philipp II Makedonien 公元前 382 左右—336)——馬其頓王(公元前 359—336)。——第 133 頁。
- 格拉赫，弗里德里希(Grach, Friedrich 1812—約1856)——普魯士軍官，1841 年起在土耳其供職，1854 年錫利斯特里亞保衛戰的領導者之一。——第 521 頁。
- 格累澤爾(Gläser)——奧地利將軍，克里木戰爭期間任扎列錫基要塞司令。——第 568 頁。
- 格萊弗諾，羅伯特勳爵(Grosvenor, Robert 1801—1893)——英國政治活動家，輝格黨人，後為自由黨人；議會議員。——第 274、297、365、369、370、382、385 頁。
- 格雷，喬治(Grey, George 1799—1882)——英國國家活動家，輝格黨人，曾任內務大臣(1846—1852、1855—1858 和 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第 11、104、406、426 頁。
- 格雷，查理(Grey, Charles 1764—1845)——伯爵，英國國家活動家，輝格黨領袖之一，曾任海軍首席大臣(1806)，內閣首相(1830—1834)。——第 436、645 頁。
- 格雷，亨利·喬治(Grey, Henry George 1802—1894)——伯爵，英國國家活動家，輝格黨人，軍務大臣(1835—1839)，陸軍和殖民大臣(1846—1852)，查理·格雷的兒子。——第 31、54、56、104、453 頁。
- 格萊安，蒙台居·威廉(Graham, Montagu William)——英國議會議員。——第 164 頁。
- 格萊安，詹姆斯·羅伯特·喬治(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國國家活動家，初期為輝格黨人，後為皮爾分子，曾任內務大臣(1841—1846)，海軍首席大臣(1830—1834、1852—1855)。——第 27、33、54、62、80、98、99、124、175、274、281、305、306、317、337、410、411、413、414、582—587 頁。
- 格萊斯頓，威廉·尤爾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國國家活動家，托利黨人，後為皮爾

分子,十九世紀下半叶是自由党領袖;曾任財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內閣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11、12、28—30、33、41、42、47、48、50、53—56、62、63、66、67、80、98、100、115、125、159、184、189、206、273、281、283、284、288、291、295、297、305、317、318、337、338、351、410、411、413、541、542、544、624、625頁。

格蘭比侯爵,查理·塞西爾·約翰·曼諾斯(Granby, Charles Cecil John Manners 生于1815年)——英國貴族,托利党人,議會議員。——第283頁。

格蘭維耳,奧加斯特斯·博威(Granville, Augustes Bozzy 1783—1872)——英國醫生,著有許多醫學著作;意大利人。——第123頁。

格蘭維耳伯爵,喬治·魯森-高爾(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1815—1891)——英國國家活動家,輝格党人,后為自由党領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851—1852、1870—1874和1880—1885),殖民大臣(1868—1870、1886),樞密院院長(1852—1854、1855—1858和1859—1865)。——第104、112、356、362、367頁。

格蘭瑟姆男爵,托馬斯·羅賓遜(Grantham, Thomas Robinson 1738—1786)——英國國家活動家和外交家,輝格党人;曾任駐馬德里大使(1771—1779),外交大臣(1782—1783)。——第644頁。

十一画

梭倫(Solon 公元前638左右—558)——

聞名的雅典立法家,在人民群眾的壓力下制定了許多反對世襲貴族的法律。

——第549頁。

蓋伊,路德維特(Gai, Liudevit 1809—1872)——克羅地亞記者,語文學家和政治活動家;1848年為克羅地亞臨時政府委員;在自己的政治觀點中贊成奧地利斯拉夫主義綱領。——第221頁。

勒韋昂(Levaillant)——法國將軍,1854—1855年任克里木法軍師長。——第615頁。

累亞德,奧斯丁·亨利(Layard, Austin Henry 1817—1894)——英國考古學家和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激進派,后為自由党人,議會議員;1885年為克里木英軍狀況調查委員會委員。——第4、9、41、79、84、95、112、113、154、190、227、245、250、273、274、297、317、333、334、337、360、402、583頁。

莎士比亞,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偉大的英國作家。——第39、66、104、549、550、665頁。

敏托伯爵,吉伯特·埃利奧特(Minto, Gilbert Elliot 1782—1859)——英國國家活動家和外交家,輝格党人;曾任海軍首席大臣(1835—1841),掌璽大臣(1846—1852),1847—1848年負外交使命駐意大利。——第453頁。

得比伯爵(1851年受封),愛德華·喬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ery Smith Stanley 1799—1869)——英國國家活動家,初期為托利党人,曾為托利党領袖,后為保守党領袖之一;曾任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第25、29、34、43、46、50、62、84、112、135、201、246、250、253、351、406、

- 441、450、453、457 頁。
- 培德福德公爵，約翰·羅素 (Bedford, John Russell 1766—1839)——英國貴族，約翰·羅素之父。——第 431、438 頁。
- 雪萊，約翰 (Shelley, John 1808—1867)——英國政治活動家，自由貿易論者，議會議員。——第 154 頁。
- 雪恩哈耳斯，卡爾 (Schönhals, Karl 1788—1857)——奧地利將軍和軍事著作家；曾積極參加鎮壓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第 526 頁。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爾·吉約姆 (G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 and 國家活動家，從 1840 年起到 1848 年二月革命這一期間實際上操縱了內政和外交，他所代表的是大金融資產階級的利益。——第 200、267 頁。
- 基卜生，托馬斯·米爾納 (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國國家活動家，自由貿易論者，後為自由黨人，曾任貿易大臣 (1859—1865 和 1865—1866)。——第 273、279、280、305、402 頁。
- 莫爾特克，赫爾穆特·卡爾·伯恩哈特 (Moltke, Helmut Karl Bernhard 1800—1891)——普魯士軍官，後為元帥，反動的軍事活動家和著作家，普魯士軍國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思想家之一；1835—1839 年在土耳其軍隊中供職；曾任普魯士總參謀長 (1857—1871) 和帝國總參謀長 (1871—1888)。——第 210 頁。
- 莫爾尼伯爵，沙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 (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1811—1865)——法國政
- 治活動家，波拿巴主義者，立法議會議員 (1849—1851)，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變的組織者之一，曾任內務部長 (1851 年 12 月—1852 年 1 月)，立法團議長 (1854—1856、1857—1865)。——第 661、663、664 頁。
- 曼托伊費爾，奧托·泰奧多爾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普魯士國家活動家，貴族官僚制度的代表，曾任內政大臣 (1848—1850)，首相兼外交大臣 (1850—1858)。——第 161 頁。
- 曼斯菲爾德，威廉·勞茲 (Mansfield, William Rous 1819—1876)——英國將軍，1855—1856 年任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軍事參贊。——第 711 頁。
- 理查茲，阿爾弗勒德·倍特 (Richard, Alfred Bate 1820—1876)——英國劇作家和新聞記者，反對科布頓和曼徹斯特派的和平主義。——第 125 頁。
- 理查二世 (Richard II 1367—1400)——英國國王 (1377—1399)。——第 80、95 頁。
- 理查三世 (Richard III 1452—1485)——英國國王 (1483—1485)。——第 104 頁。
- 梅恩，理查 (Mayne, Richard 1796—1868)——倫敦警察局長 (1850 年起)。——第 385、386、390 頁。
- 梅特涅，克雷門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奧地利國家活動家和外交家，反動分子；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神聖同盟的組織者之一。——第 221、223、224、305、343 頁。
- 梅利奈，艾米爾 (Millinet, Emile 1798—1894)——法國將軍，1855 年為克里

木法軍近卫师指揮官。——第 615 頁。
梅利克-沙赫(Melik Shah 1055—1092)
——塞尔柱人国家的执政者(苏丹)
(1072—1092)。——第 7 頁。

梅塔斯塔西奧, 彼得罗 (Metastasio,
Pietro 1698—1782)——意大利詩人,
歌劇作家。——第 442 頁。

康威, 亨利·西摩爾 (Conway, Henry
Seymour 1721—1795)——英国將軍
和国家活动家, 1793 年起为元帅; 輝格
党人, 議會議員。——第 436 頁。

康格里弗, 威廉 (Congreve, William
1772—1828)——英国軍官和軍事发明
家, 1808 年发明火箭, 被命名为康格里
弗火箭。——第 466 頁。

康罗貝尔, 弗朗斯瓦·塞尔坦(Canrobert,
François-Certain 1809—1895)——
法国將軍, 1856 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
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
及利亚;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
极参加者之一; 曾任克里木法軍总司令
(1854 年 9 月—1855 年 3 月), 后为克
里木法軍軍长。——第 143、146、171、
173、192、194、197、198、212、216、231、
233、240、259、264、271、275—277、308、
324、480 頁。

康斯坦丁·巴甫洛維奇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1779—1831)——俄国大
公, 1814 年起任波兰陸軍总司令, 实际
上是波兰总督 (1814—1831)。——第
74 頁。

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維奇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俄国大
公, 尼古拉一世次子, 海軍上将, 曾领导
海軍部門(1853—1881)和舰队(1855—
1881)。——第 607 頁。

康伯米尔子爵, 斯泰普頓·柯頓 (Com-

bermere, Stapleton Cotton 1773—
1865)——英国將軍, 1855 年起为元帅;
曾参加反对拿破侖第一的各次战争, 曾
任爱尔兰英軍总司令(1822—1825), 后
为駐印度英軍总司令 (1825)。——第
628 頁。

十二画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810—1859)
——那不勒斯国王(1830—1859)。——
第 528、544 頁。

舒尔舍夫斯基(Szulszewski)——波兰上
校, 流亡者, 1855 年为倫敦波兰之友文
学协会的秘书。——第 548 頁。

黑耳, 威廉(Hale, William)——倫敦郊
区火箭工厂的厂主。——第 26、27、466
頁。

湯普逊, 乔治(Thompson, George 1804
—1878)——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
級激进派; 五十年代为全国議會改革和
财政改革协会的积极活动家之一。——
第 268、548 頁。

傅阿德-埃芬蒂 (Fuad-Efendi 1814—
1869)——土耳其国家活动家; 五十至
六十年代屢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等
职。——第 676、690、697 頁。

温德姆, 查理·阿什(Windham, Charles
Ash 1810—1870)——英国上校, 1855
年 10 月起为將軍; 1855 年秋为克里木
英軍旅长, 后任克里木英軍陸軍參謀长
(1855 年 11 月—1856 年 7 月)。——
第 611、618 頁。

腊格倫男爵, 菲茨罗伊·詹姆士·亨利·
索美塞特 (Raglan, 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1788—1855)——英
国元帅, 以威灵頓的參謀官身分参加反
对拿破侖第一的战争 (1808—1814 和

- 1815), 曾任总司令办公室軍事秘书 (1827—1852), 克里木英軍总司令 (1854—1855)。——第 33、35、58—60、64、65、81、142、143、146、147、158、173、185、188、189、194、198、207、212、216、276、310、320、358、392、396、555、617 頁。
- 凱利(Kelly)——英国軍官, 1855 年任克里木英軍团长。——第 216 頁。
- 凱特勒, 阿道夫(Quetelet, Adolph 1796—1874)——杰出的比利时资产階級学者; 統計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第 50 頁。
- 提托夫,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維奇(Титов, 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1805—1891)——俄国外交家, 曾任駐君士坦丁堡公使 (1843—1853); 1855 年为俄国出席維也納會議的代表。——第 281、292 頁。
- 提比利烏斯(Tiberius 公元前 42 年—公元 37 年)——羅馬皇帝 (14—37)。——第 662 頁。
- 萊特, 納坦(Wright, Nathan 1654—1721)——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掌璽大臣和樞密院議員(1700—1705)。——第 118 頁。
- 萊昂斯, 艾德蒙(Lyons, Edmund 1790—1858)——英国海軍上将; 1855 年任黑海舰队总司令。——第 276、688、693 頁。
- 菲耳德(Filder)——英国將軍, 1854—1855 年为克里木英軍軍需长官。——第 2 頁。
- 菲利莫尔, 約翰·乔治(Phillimore, John George 1808—1865)——英国法学家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議會議員。——第 414 頁。
- 菲茲吉拉德, 約翰·戴維(Fitzgerald, John David 1816—1889)——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 屢任英国的爱尔兰管理机构中的高級司法职务。——第 135、136 頁。
- 普腊德, 多米尼克·杜福尔·德(Pradt, Dominique Dufour de 1759—1837)——法国神甫, 外交家, 政論家和历史学家。——第 343、538 頁。
- 普拉兰, 沙尔, 舒阿澤尔公爵(Praslin, Charles, Duc de Choiseul 1805—1847)——法国貴族; 1847 年关于他謀杀妻子的案件有政治反应。——第 85、117 頁。
- 普芬多夫, 賽米尔(Pufendorf, Samuel 1632—1694)——男爵, 德国学者, 法学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階級的“自然法”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218 頁。
- 普里契特, 罗伯特·泰勒(Pritchett, Robert Taylor 1828—1907)——英国枪炮工匠, 改良过米涅式步枪。——第 484 頁。
- 琼斯, 威廉(Jones, William)——宪章主义者, 菲·奥康瑙尔治丧委员会秘书 (1855 年 9 月)。——第 594 頁。
- 琼斯, 約翰·盖耳(Jones, John Gale 1769—1838)——英国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階級激进派; 医生。——第 249 頁。
- 琼斯, 哈利·大卫(Jones, Harry David 1791—1866)——英国將軍, 軍事工程师; 1855 年为克里木英軍工兵长官。——第 81、170 頁。
- 琼斯, 厄內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无产階級詩人和政論家, 革命的宪章派領袖之一, “北极星报”編輯之一, “寄語人民”和“人民报”

- 的編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155、228、253—255、299、456、594 頁。
- 博宁，爱德华 (Bonin, Eduard 1793—1865) ——普魯士將軍和国家活动家，陸軍大臣 (1852—1854、1858—1859)；克里木戰爭時期主張普魯士和西方強國結成同盟。——第 161 頁。
- 博克塞，爱德华 (Boxer, Edward 1784—1855) ——英國海軍上將，1855 年為巴拉克拉瓦港口司令。——第 78 頁。
- 博斯凱，比埃爾·約瑟夫·弗朗斯瓦 (Bosquet, Pierre-Joseph-François 1810—1861) ——法國將軍，1856 年起為元帥；三十至五十年代曾參加侵占阿爾及利亞，1854 年任克里木法軍師長，後任軍長 (1854—1855)。——第 620 頁。
- 博納德子爵，路易·加布里埃爾·昂勃魯阿茲 (Bonald, Louis Gabriel Ambroise 1754—1840) ——法國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君主主義者，復辟時期的貴族和教權主義反動派的思想家之一。——第 717 頁。
- 博林布羅克，亨利 (Bolingbroke, Henry 1678—1751) ——英國自然神論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托利黨領袖之一。——第 246 頁。
- 博登施泰特，弗里德里希 (Bodenstedt, Friedrich 1819—1892) ——德國詩人和翻譯家；四十年代曾游歷高加索和小亞細亞。——第 651 頁。
- 斯卡利，文森特 (Scully, Vincent 1810—1871) ——愛爾蘭律師和自由派政治活動家，議會議員。——第 549 頁。
- 斯泰福，奧加斯特斯 (Stafford, Augustes 1811—1857) ——英國議會活動家，托利黨人。——第 41、190 頁。
- 斯蒂文斯 (Stevens) ——克里木戰爭時期為英國駐特拉比魯德副領事。——第 685 頁。
- 斯洛克姆，威廉 (Slocombe, William) ——五十年代憲章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之一。——第 254、255 頁。
- 斯托蒙特子爵，戴維·馬里 (Stormont, David Marrie 1727—1796) ——英國國家活動家和外交家，托利黨人；曾任駐維也納公使 (1763—1772) 和巴黎公使 (1772—1778)，外交大臣 (1779—1782)。——第 644 頁。
- 斯科菲爾德，威廉 (Scholefield, William 1809—1867) ——英國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激進派，議會議員。——第 426、427 頁。
- 斯坦利——見得比伯爵，愛德華。
- 斯坦利，愛德華·亨利，得比伯爵 (1869 年受封) (Stanley, Edward Henry, Earl of Derby 1826—1893) ——英國國家活動家，托利黨人，六十至七十年代是保守黨人，後為自由黨人；議會議員，外交副大臣 (1852)，印度事務大臣 (1858—1859)，外交大臣 (1866—1868 和 1874—1878)；殖民大臣 (1882—1885)，愛得華·得比的兒子。——第 84、112、283 頁。
- 斯密，亞當 (Smith, Adam 1723—1790) ——英國經濟學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傑出代表人物之一。——第 3、601 頁。
- 斯密斯，安得魯 (Smith, Andrew 1797—1872) ——英國軍醫，曾領導英軍醫務部門的工作 (1846—1858)。——第 183、184、187、712 頁。
- 斯密斯，羅伯特·維農 (Smith, Robert

- Vernon 1800—1873) ——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軍务大臣(1852),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5—1858)。——第21、104、541頁。
-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苏格兰人。——第601頁。
- 斯图亚特,胡斯顿(Steuart, Huston 1791—1875) ——英国海軍上将,輝格党人,海軍部部务委員(1850—1852); 1855年为黑海舰队副总司令。——第688頁。
- 斯图亚特,达德利·庫茨(Steuart, Dudley Coutts 1803—1854) ——英国政治活动家,輝格党人,議會議員;曾与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有联系。——第72、546頁。
- 斯特兰,威廉(Strahan, William 約生于1808年) ——英国銀行家。——第372、393頁。
- 斯特腊特,爱德华(Strutt, Edward 1801—1880) ——英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郎卡斯特公国正卿(1852—1854)。——第442頁。
-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腊特弗德·坎宁(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1786—1880) ——英国外交家,駐君士坦丁堡公使(1810—1812、1825—1828、1841—1858)。——第74、652、675—677、681—685、689—693、695—704、705、709、711頁。
- 斯特腊弗德伯爵,約翰·宾恩(Stratford, John Bing 1772—1860) ——英国將軍,1855年起为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侖第一的战争(1808—1814和1815)。

——第628、629頁。

十三画

- 楊格,約翰(Young, John 1807—1876)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爱尔兰事务大臣(1852—1855)。——第47頁。
- 道金斯,爱德华(Dawkins, Edward) ——英国外交家,1827—1834年为駐希腊駐办公使。——第73頁。
- 道格拉斯,霍华德(Douglas, Howard 1776—1861) ——英国將軍和軍事著作家,著有炮兵和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20、486頁。
- 葛尼,賽米尔(Gurney, Samuel 1786—1856) ——英国銀行家,是倫敦大貼現銀行經理。——第393頁。
- 葛德里奇——見罗宾逊,弗雷德里克·約翰。
- 塔西利埃(Tassilier) ——法国印刷工人,从1848年起作为政治犯被流放在凱恩。——第665頁。
- 塔希尔-帕沙(Tachil Pasha) ——土耳其將軍,1855年为高加索土軍指揮官。——第712頁。
- 塞西耳,罗伯特·阿瑟·塔波特·盖斯康,索耳斯貝里侯爵(1868年受封)(Cecil, 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 Marquise of Salisbury 1830—1903)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議會議員;屡任保守党内閣的首相和外交大臣。——第414頁。
- 塞里姆-帕沙(Selim Pasha) ——土耳其將軍,1855年为高加索戰場土軍指揮官。——第712頁。
- 塞拉諾-伊-多敏格斯,弗朗西斯科(Serrano y Dominguez, Francisco 1810

- 1885) ——西班牙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陸軍大臣(1843), 1856年政变的参加者, 曾任外交大臣(1862—1863), 政府首腦(1868—1869, 1871, 1874), 王国摄政(1869—1871)。——第537頁。
- 雷丁頓, 托馬斯·尼古拉斯 (Redington, Thomas Nicolas 1815—1862) ——英国政治活动家, 輝格党人; 爱尔兰事务副大臣(1846),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副主席(1852—1856)。——第112頁。
- 雷德克利夫——見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 斯特腊特弗德。
- 雷尼奧·德·圣让·丹热利, 奥古斯特·米歇尔·埃蒂耶納 (Regnault de Saint-Jean d'Angély, Auguste Michel Etienne 1794—1870) ——法国將軍, 后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 曾任陸軍部长(1851), 近卫軍指揮官(1854—1869; 1855年为克里木法軍后备軍軍長。——第416、421頁。
- 福舍 (Faucheux) ——法国將軍, 1855年任克里木法軍师长。——第576—578頁。
- 福雷, 埃利·弗雷德里克 (Forey, Elie Frédéric 1804—1872) ——法国將軍, 后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1854—1855年初为克里木法軍指揮官, 1855年4月被任命为奥兰省(北非)总督。——第173、271頁。
- 福克斯, 查理·詹姆斯 (Fox, Charles James 1749—1806)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領袖; 曾任外交大臣(1782, 1783和1806)。——第10、642、644、645頁。
- 福克斯頓 (Folkestone) ——英国議會議員, 资产階級激进派。——第574頁。
- 路易斯, 乔治·康瓦尔 (Lewis, George Cornwall 1806—1863)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曾任财政部秘书长(1850—1852), 1852—1855年为“爱丁堡評論”編輯, 1855—1858年任財政大臣, 后任內务大臣(1859—1861)和陸軍大臣(1861—1863)。——第104、159、624、625頁。
-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 ——法国国王 (1643—1715)。——第467頁。
- 路易十八 (Louis XVIII 1755—1824) ——法国国王 (1814—1815和1815—1824)。——第716頁。
- 路易-菲力浦 (Louis Philippe 1773—1850) ——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1830—1848)。——第117、126、127、203、248、272、373、628頁。
- 路特希尔德, 萊昂涅尔 (Rothschild, Lionel 1808—1879) ——男爵, 倫敦路特希尔德銀行的經理, 輝格党人, 1858年起为議會議員。——第373、454頁。
- 奧利芬, 勞倫斯 (Oliphant, Lawrence 1829—1888) ——英国旅行家和記者; 1855年以“泰晤士报”在奧美尔-帕沙远征軍中的隨軍記者身分在高加索活动。——第710頁。
- 奧勃萊恩, 威廉·史密斯 (O'Brien, William Smith 1803—1864) ——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青年爱尔兰”社右翼領袖; 1848年筹划起义未成被英国当局逮捕并判处死刑, 而以終身放逐代替; 1856年被赦免。——第446頁。
- 奧美尔-帕沙(米哈伊尔·拉塔斯) (Omer

Pasha (Michail Latas) 1806—1871) ——土耳其將軍，克罗地亚人，克里木戰爭中任土軍總司令。——第 60、64、88、129、191、194、196—198、240—243、263、276、309、313、325、406、425、520、522、557、598、599、634、635、649—652、655、656、680、686—697、699—703、705—712 頁。

奧弗拉赫蒂，艾德蒙 (O'Flaherty, Edmond) ——英國官員，1854 年任財政部在愛爾蘭徵稅的特派員。——第 30 頁。

奧倫治的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 ——尼德蘭總督 (1672—1702)，英國國王 (1689—1702)。——第 79、106 頁。

奧斯本——見貝爾納·奧斯本，拉爾夫。

奧斯特羅夫斯基，約瑟夫·鮑列斯拉夫 (Ostrowski, Joseph Boleslaw 1805—1871) ——波蘭政論家和歷史學家，著有許多有關波蘭歷史的著作。——第 546 頁。

奧康奈爾，丹尼爾 (O'Connell, Daniel 1775—1847) ——愛爾蘭律師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民族解放運動右翼自由派的領袖。——第 102、134、135、301、404、443—446 頁。

奧康諾爾，菲格斯 (O'Connor, Feargus 1794—1855) ——憲章運動的領袖之一，“北極星報”的創辦人和編輯；1848 年後成為改良主義者。——第 102、594 頁。

奧特韋，阿瑟·約翰 (Otway, Arthur John 1822—1912) ——英國議會活動家，五十年代是托利黨人。——第 337、370 頁。

奧特馬爾，德 (d'Autemarre) ——法國將

軍，1855 年任克里木法軍師長。——第 615 頁。

奧馬賸，巴里·愛德華 (O'Meara, Barrie Edward 1786—1836) ——英國軍醫和政論家，1815—1818 年為放逐在聖海倫島上的拿破侖第一的私人醫生；愛爾蘭人。——第 181 頁。

奧馬爾公爵，奧爾良的昂利·歐仁·菲力浦·路易 (Aumale, Henri Eugène Philippe Louis d'Orléans, due d' 1822—1897) ——法國國王路易-菲力浦之子，四十年代參加侵占阿爾及利亞。——第 167 頁。

奧爾西 (Orsi 死於 1899 年) ——伯爵，交易所經紀人，拿破侖第三的代理人；科西嘉人。——第 354 頁。

奧爾良王朝 (Orléans) ——法國王朝 (1830—1848)。——第 167 頁。

奧爾梭普子爵，約翰·查理·斯賓塞 (Althorp, John Charles Spencer 1782—1845) ——英國國家活動家，議會議員，1832 年爭取議會改革時期輝格黨領袖之一；財政大臣 (1830—1834)。——第 437、438 頁。

十四画

歌德，約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 ——偉大的德國作家和思想家。——第 21 頁。

赫伯特，悉尼 (Herbert, Sidney 1810—1861) ——英國國家活動家，初期是托利黨人，後為皮爾分子；曾任軍務大臣 (1845—1846 和 1852—1855) 和陸軍大臣 (1859—1860)。——第 9、21、33、40—42、50、54、62、76、77、98—100、124、125、184、189、273、410、411、413、414

頁。

赫魯朔夫, 亚历山大·彼得罗維奇 (Хрущ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1806—1875)——俄国將軍, 1853—1856 年任克里木駐軍指揮官, 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积极参加者之一。——第 172 頁。

維利森, 威廉 (Willisen, Wilhelm 1790—1879)——普魯士將軍和軍事理論家; 1848 年任王室駐波茲南專員, 1848—1849 年在鎮壓意大利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的奧軍中供職。——第 527 頁。

維維安, 罗伯特·約翰·哈西 (Vivian, Robert John Hassi 1802—1887)——英国將軍, 1855—1856 年任刻赤半島土軍指揮官。——第 676、678、681—683、694—696、706—709 頁。

維多利亞 (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 (1837—1901)。——第 8、45、50、335、360、362、382、405、440、450 頁。

蒙奈, 德 (Monet, de)——法国將軍, 1854—1855 年初为克里木法軍旅长。——第 172 頁。

蒙塞耳, 威廉 (Monsell, William 1812—1894)——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議會中爱尔兰党团的領袖之一; 1852—1857 年为軍械局秘书。——第 46、113、135 頁。

蒙蒂霍, 欧仁妮 (Montijo, Eugénie 1826—1920)——法国皇后, 拿破侖第三的妻子。——第 662、665 頁。

蒙塔郎貝尔, 沙尔 (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會和立法會議員, 奥尔良党人, 天主教派的首領。——第 660 頁。

蒙塔郎貝尔, 馬尔克·勒奈 (Montalembert, Marc-René 1714—1800)——法国將軍, 軍事工程师, 曾研究出一种新筑城法, 在十九世紀被广泛采用。——第 322、500 頁。

十五画

摩耳斯沃思, 威廉 (Molesworth, William 1810—1855)——英国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屬於所謂梅費尔激进派), 議會議員; 曾任公共工程部长官 (1853—1855) 和殖民大臣 (1855)。——第 4、46、278、305、425 頁。

潘繆尔男爵, 福克斯·莫尔 (Panmure, Fox Maule 1801—1874)——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軍务大臣 (1846—1852), 陸軍大臣 (1855—1858)。——第 77、80、83、99、158、201、250、382、678—682、712 頁。

墨尔本子爵, 威廉·拉姆 (Melbourne, William Lamb 1779—1848)——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曾任內务大臣 (1830—1834), 首相 (1834 和 1835—1841)。——第 77、85、134、444、448 頁。

緬施科夫, 亚历山大·謝尔盖也維奇 (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87—1869)——公爵, 俄国軍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 1853 年任駐君士坦丁堡特派大使, 克里木陸海軍总司令 (1853 年—1855 年 2 月)。——第 16、23 頁。

劍橋公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 (Cambridge,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 1819—1904)——英国將軍, 1854 年任克里木英軍师长, 后为英国陸軍总司令 (1856—1895),

——第 182、184、186、655 頁。

德兰恩, 約翰·塔杰烏斯 (Delane, John Thadeus 1817—1879) ——英国新聞記者, “泰晤士報”編輯 (1841—1877)。——第 45 頁。

德拉蒙德, 亨利 (Drummond, Henry 1786—1860) ——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議會議員, 1855 年为克里木英軍状况調查委员会委員。——第 21、84、180、372 頁。

德·梅斯特尔, 約瑟夫 (De Maistre, Joseph 1753—1821) ——法国作家, 保皇党人, 貴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一,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死敌。——第 717 頁。

德魯安·德·路易斯, 爱德华 (Drouyn de Lhuys, Edouard 1805—1881) ——法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是溫和的奥尔良保皇党人; 1851 年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外交部长和外交大臣 (1848—1849、1851、1852—1855、1862—1866); 1855 年为法国出席維也納會議的代表。——第 200、201、203、204、663 頁。

十六画

賴德律-洛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 ——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領袖之一, “改革報”編輯; 1848 年是临时政府成員, 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 在議會中領導山岳党; 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第 84 頁。

澤德耳迈尔 (Sedlmayer) ——奥地利將軍, 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卡尔斯堡要塞司令, ——第 568 頁。

默娄, 約翰·帕特里克 (Murrough, John Patrick) ——英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議會議員。——第 155 頁。

穆拉維約夫, 尼古拉·尼古拉也維奇 (Муравьев,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4—1866) ——俄国將軍, 1854—1856 年任高加索俄軍总司令和高加索总督。——第 328、349、634、635、680、696、700 頁。

穆罕默德-沙赫 (Muhammed Shah 1810—1848) ——波斯沙赫 (1834—1848)。——第 74 頁。

霍桑, 查理 (Hotham, Charles 1806—1855) ——英国軍官, 1854—1855 年任維多利亞(澳洲)总督。——第 120、121 頁。

霍納, 萊昂納德 (Horner, Leonard 1785—1864) ——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工厂視察員 (1833—1856), 主張保护工人利益。——第 152、427 頁。

霍布斯, 托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 ——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鮮明的反民主傾向。——第 305 頁。

霍斯曼, 爱德华 (Horsman, Edward 1807—1876) ——英国自由派国家活动家; 1855—1857 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第 79 頁。

霍尔, 約翰 (Hall, John 1795—1866) ——英国軍医, 1854—1856 年任克里木英軍軍医主任。——第 66 頁。

霍尔, 本杰明 (Hall, Benjamin 1802—1867) ——英国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屬於所謂的梅費尔激进派); 1854—1855 年任保健大臣, 公共工程部长官 (1855—1858), ——第 3、4、425 頁。

十七画

謝耳万 (Сельван 死于 1854 年)——俄国將軍, 1854 年为錫利斯特里亚俄軍指揮官, 在一次攻打要塞时陣亡。——第 631 頁。

十八画

魏恩, 哈利·乔治 (Vane, Harry George)——英国議會議員。——第 273 頁。

魏科夫, 亨利 (Wikoff, Henry)——美国記者, 五十年代初代表帕麦斯顿在报刊上发表意見。——第 44 頁。

魏兹, 約翰·埃什弗德 (Wise, John Ayshford)——英国議會議員。——第 272 頁。

魏兹曼, 尼古拉斯 (Wiseman, Nicolas 1802—1865)——英国天主教神甫; 1850 年起为韦斯明斯特大主教和紅衣主教。——第 453 頁。

薩德勒, 約翰 (Sadleir, John 1814—1856)——爱尔兰銀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議會中爱尔兰党团的首領之一, 1853 年任財政副大臣。——第 30、46、117、404、712 頁。

薩姆納, 約翰·伯德 (Sumner, John Bird 1780—1862)——英国教士, 坎特布里大主教 (1848—1862)。——第 151 頁。

薩格登, 爱德华, 圣萊昂納茲男爵 (Sugden, Edward, Baron St. Leonards 1781—1875)——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2 年为大法官。——第 455 頁。

薩特倫德, 約翰 (Sutherland, John 1808—1891)——英国医生, 1855 年領导克里木英軍医疗状况調查委员会。——第 562、563 頁。

薩美塞特, 亨利 (Somerset, Henry 1794—1862)——英国將軍, 1855 年被任为孟买东印度公司英軍总司令。——第 77 頁。

薩瓦亲王奥伊根 (Eugen, Prinz von Savoyen 1663—1736)——奥地利統帥和国家活动家。——第 467 頁。

薩尔, 沙尔·瑪丽·德 (Salles, Charles Marie de 1803—1858)——法国將軍, 1855 年为克里木法軍軍长。——第 591、617 頁。

薩尔托里烏斯, 費南多·路易斯·霍賽, 圣路易斯伯爵 (Sartorius, Fernando Luis Jose, primer conde de San-Luis 1820—1871)——西班牙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政論家, 莫迪腊多斯派 (溫和派) 領袖之一, 曾任內政大臣 (1847—1851), 政府首腦 (1853—1854)。——第 537 頁。

文学作品和神話中的人物

四画

以薩迦——据聖經說他是犹太人十二支系之一的祖先; 他異常馴服順从, 并特

別能吃苦耐勞, 因此他的父亲雅各把他比做“强壮的騾”。——第 340 頁。

丹納士諸女——古希腊神話中国王丹納士的女儿們, 由于杀害自己的丈夫, 被

罰死后提水灌滿无底水桶。——第 712 頁。

尤金·阿拉姆——布尔韦尔-利頓的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一个与学术界隔絕、最后在周圍现实冲突中牺牲的学者典型。——第 305 頁。

五 画

史頓，克里斯多弗——莎士比亚的喜劇“馴悍記”中的人物。——第 442 頁。

本丢·彼多拉——羅馬駐犹太总督(26—36)，他的名字成了伪善和殘酷的別名。——第 371 頁。

六 画

西維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預言家”之一；据傳說她住在庫馬城（古希臘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她的占語被編成所謂的“西維拉占語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羅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第 123 頁。

亚加米农——古希臘神話傳說中的阿尔哥斯国王，“伊利亚特”中的人物之一，特洛伊战争时希臘軍隊的領袖；傳說为了消除阻拦，使希臘舰队得以开往特洛伊，他用自己的女儿伊菲姬妮亚作为牺牲祭祀女神阿尔蒂米斯。——第 441 頁。

伊菲姬妮亚——古希臘神話中国王亚加米农的女儿。——第 441 頁。

齐格弗里特——古代德國神話中的英雄，中世紀叙事詩“尼貝龙根之歌”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据傳說齐格弗里特杀死了巨龙之后在龙血流成的湖里沐浴，因而刀枪不入。——第 281 頁。

七 画

沃里克——布尔韦尔-利頓的小說“最后一个男爵”中的主人公，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十五世紀封建內乱的参加者的典型人物。——第 305 頁。

八 画

参孙——聖經中的英雄，据說他有非凡的力气和胆量。——第 77 頁。

阿基里斯——希臘神話中圍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臘英雄，“伊利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据傳說阿基里斯是由于箭鏃射中了他的脚跟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而去世的。——第 670 頁。

九 画

約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代名詞；1712 年启蒙作家阿伯什諾特的政治諷刺作品“約翰牛傳”問世后，这个名詞就流傳开了。——第 31、38、43、44、89、203、205、270、328、510 頁。

哈巴谷——聖經中的先知。——第 391 頁。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劇中的主人公。——第 305、358 頁。

十 画

夏祿——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和“溫莎的風流娘儿們”中的人物；眼光短淺、目空一切和自私自利的乡村法官，訟棍。——第 549 頁。

哥列姆——据犹太傳說，他是一个用粘土塑造出来的人，供役使做各种粗重杂活；阿尔宁在自己的幻想小說“埃及的伊薩伯拉”中第一次把哥列姆这个人物

引进文坛。——第 708 頁。

烏利斯，或奧德賽——“伊利亚特”和“奧德賽”中的主人公，傳說中的伊大卡島國王，特洛伊戰爭時希臘軍隊領袖之一，以大胆、機智和善辯著稱。——第 6 頁。

特洛米奧(愛非斯的特洛米奧和叙拉古的特洛米奧)——學生弟兄，長相一樣，莎士比亞“錯誤的喜劇”中的人物。——第 82 頁。

唐·吉訶德——塞萬提斯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第 70、249 頁。

唐達魯士——古希臘神話中呂底亞的國王，因侮辱諸神被罰沉淪地獄，永世受苦。每當他想掬取身周的水解渴或採摘懸在頭上的果子解餓的時候，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見。——第 183、187 頁。

庫爾威烏斯(馬可·庫爾威烏斯)——傳說中的古羅馬少年，他投身深淵以拯救羅馬。——第 12 頁。

航海家辛伯達——阿拉伯神話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第 400 頁。

十一画

朗普金，湯尼——奧利弗·哥德斯密的喜劇“欲擒故縱”(“錯誤之夜”)中的人物；妄自尊大、矯揉造作、不學無術、粗鹵無禮的貴公子。——第 549 頁。

十二画

雅典娜·帕拉斯——古希臘神話中主要神祇之一，戰神和智慧的化身；被認為是雅典的保護神。——第 671 頁。

十三画

瑟息替斯——“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希臘戰士，特洛伊戰爭的參加者；一個乖戾而又尖酸刻薄的駝背癩子，敘事詩第二章中說到他遭到了奧德賽的痛打，因為他詆毀了希臘軍隊的領袖。——第 6、362、712 頁。

福斯泰夫——莎士比亞一些著作(“亨利四世”和“溫莎的風流娘兒們”)中的人物；愛吹牛的懦夫，諧謔者，酒徒。——第 66、549 頁。

塞卜洛士——古希臘神話中看守地獄(亡靈在此受苦)大門的三頭犬。——第 574 頁。

十四画

赫斯貝里德姊妹——古希臘神話中狄坦神阿特拉斯的女兒們，看守長在生命樹上的金蘋果。——第 373 頁。

十五画

摩拏——傳說中的古印度立法者；“摩拏法典”是婆羅門僧侶在一至五世紀內編纂的。——第 541 頁。

摩洛赫——古代腓尼基和迦太基宗教中的太陽神，以活人獻祭；後來摩洛赫的名字成了殘忍凶狠、恣意殺戮的暴力的代名詞。——第 151 頁。

十九画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劇“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 368 頁。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倫敦出版。——第 125、341、671、673 頁。

四 画

“公文集”（《The Portfolio》）——倫敦出版。——第 74、75 頁。

“手术刀”（《The Lancet》）——倫敦出版。——第 372 頁。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布魯塞尔出版。——第 713 頁。

“韦斯明斯特評論”（《The Westminster Review》）——倫敦出版。——第 441 頁。

五 画

“北方报”（《Le Nord》）——巴黎—布魯塞尔出版。——第 659、663 頁。

“北方蜜蜂”（《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圣彼得堡出版。——第 659 頁。

“北明翰每日新聞”（《The Birmingham Daily Press》）——第 456 頁。

“北明翰报和商报”（《The Birmingham Journal and Commercial Advertiser》）——第 660 頁。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巴黎出版。——第 326、338、348、415、421、652、658 頁。

六 画

“地球报”（《Le Globe》）——巴黎出版。——第 200 頁。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倫敦出版。——第 359、391 頁。

“先驅”（《The Leader》）——倫敦出版。——第 151、359 頁。

“先驅报”（《Herald》）——見“先驅晨报”。

“先驅晨报”（《The Morning Herald》）——倫敦出版。——第 45、124、128、150、175、252、270、318、341、359 頁。

“米兰官报”（《Gazzetta Ufficiale di Milano》）——第 670 頁。

七 画

“邮报”（《Post》）——見“晨邮报”。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倫敦出版。——第 44、85、122、227、237、340、372、551、611、624 頁。

“劳埃德氏倫敦新聞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第 341 頁。

八 画

“羅馬日报”（《Gazzetta di Roma》）——第 453 頁。

“官报”（《Gazette》）——見“倫敦官报”。

“阿尔古斯报”（《The Argus》）——墨尔本

出版。——第120頁。

九 画

“紀事报”（《Chronicles》）——見“紀事晨报”。

“紀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s》）——倫敦出版。——第84、85、95、200、227、237、238、352頁。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125、209、213、237、270、416、421、559、666—668、670頁。

“城乡新聞”（《Town and Country Newspapers》）——倫敦出版。——第341頁。

“俄国殘廢者”（《Русский инвалид》）——圣彼得堡出版。——第354、355頁。

“信使电訊报”（《Courier and Telegraph》）——倫敦出版。——第341頁。

“政治和文学辯論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巴黎出版。——第626頁。

十 画

“泰晤士报”（《The Times》）——倫敦出版。——第5、20、21、25、26、38、44—46、48、60、65、75—78、84、85、108、114、122、158、159、180—182、190、193—195、197、198、213、217、238、254、272、340、341、355、356、370、373、386、399、403、414、561、563、651、658、659、668、710頁。

“泰晤士画报”（《Illustrated Times》）——倫敦出版。——第341頁。

“倫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第4頁。

“紐約每日論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第19、28、32、45、61、94、

117、141、145、169、174、190、195、203、208、211、213、217、236、243、263、266、277、311、325、332、347、381、393、397、408、419、430、437、457、458、462、560、571、581、588、589、591—593、600、609、623、635、641、645、652、657、664、668、670、671、673、718頁。

“爱丁堡評論，或批評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 or Critical Journal》）——倫敦出版。——第159頁。

十 一 画

“舵手”（《The Pilots》）——倫敦出版。——第341頁。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倫敦出版。——第20、96、104、122、123、125、128、154、227、237、403、669頁。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倫敦出版。——第44、54、95、122、132、133、150、196、244、273、369、539、669頁。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78頁。

“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Manchester Daily Examiner and Times》）——第604、605頁。

“笨拙，或倫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第4、71、272、583頁。

十 二 画

“普特南氏月刊”（《Putnam's Monthly》）——紐約出版。——第463頁。

“普魯士石印通訊”（《Preussische Lit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柏林出版。——第714頁。

十三画

“新聞報”(《*The Press*》)——倫敦出版。
——第175—177頁。

“新奧得報”(《*Neue Oder-Zeitung*》)——布
勒斯勞(弗罗茨拉夫)出版。——第6、
8、13、24、37、49、52、56、65、67、75、78、
86、92、94、97、101、103、107、111、113、
121、123、127、131、133、137、141、149、
153、157、159、165、174、178、181、185、
199、202、213、217、225、229、230、236、
239、243、246、251、255、258、269、273、
277、282、287、294、297、302、307、313、
315、319、325、336、339、342、352、357、
362、369、374、381、384、389、393、397、
400、404、408、411、414、423、428、429、
462、540、544、545、550、554、560、563、

565、574、581、593、594、603、606、609、
613、614、617、623、626、629頁。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倫敦
出版。——第85、606頁。

“雷諾新聞”(《*Reynolds's Newspaper*》)——
倫敦出版。——第340、341頁。

十五画

“論壇報”(《*Tribune*》)——見“紐約每日論
壇報”。

“墨爾本阿爾古斯報”(《*Melbourne Argus*》)
——見“阿爾古斯報”。

十六画

“辨士時報”(《*Penny Times*》)——倫敦出
版。——第342頁。

地名索引*

三 画

- 土倫——第 168、381、417、422 頁。
 大灣——第 171、242、259、413、591、598 頁。
 大西洋——第 465、535 頁。
 大貝耳特海峽——第 587 頁。
 士麥那(伊斯密爾)——第 81 頁。
 小亞細亞——第 557、646、687 頁。
 干地亞(克里特)島——第 518 頁。
 下阿爾卑斯——法國的省。——第 667 頁。

四 画

- 文森——第 526、662 頁。
 牛津——第 31、56 頁。
 長島——在大西洋。——第 656 頁。
 扎列施基——第 567 頁。
 不倫瑞克——第 515 頁。
 什列斯維希——第 484、532 頁。
 切塔特——第 511、522、596、602 頁。
 切爾克西亞——第 74 頁。
 太平洋——第 71、355、712 頁。
 太恩河畔新堡(新堡)——第 54、334、360、398、456、457 頁。
 比里尤斯——第 628 頁。

- 比利牛斯山脈——第 713 頁。
 比利牛斯半島——第 97、467、584 頁。
 巴黎——第 145、150、163、200、211、213、230、234、235、260、264、271、276、290、310、322、327、346、354、358、359、379、390、398、408、423、555、559、600、605、613、629、653、660、662、663、667、670、675、690、694、695、698—700、706 頁。
 巴登——第 515、715 頁。
 巴特——第 298、549 頁。
 巴格達——第 518 頁。
 巴士姆(巴士米)——第 557、633、650—652、655、676 頁。
 巴伐利亞——第 514—516、567 頁。
 巴達霍斯——第 60、65 頁。
 巴雅澤特(多古巴雅西特)——第 646 頁。
 巴拉腊特——第 119—121 頁。
 巴拉克拉瓦——第 3、41、42、57、60、65、66、78、95、125、126、139、142、143、146、158、174、182、186、189、207、230、241、259—263、325、327、348、378、393、407、417、419、423、481、484、487、511、523、576、598、619、686、690、696、700、708 頁。
 巴赫契薩賴——第 18、139、276、597、603 頁。

* 括弧中是現代地圖上的名稱。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點的地名，則加有簡短的說明。——編者注

巴扎尔吉克, 又名道布里奇(托耳布欣)。
——第 166 頁。

巴尔干山脉——第 209、210、331、350 頁。

巴尔塔利曼尼——第 72 頁。

五 画

白海——第 556、654 頁。

古巴島——第 536 頁。

卢森堡——第 713 頁。

弗吉尼亚——第 107 頁。

尼古拉也夫——第 328—330、348—350、
381、558、607、608、633、638、639 頁。

幼发拉底河——第 633 頁。

印度——第 27、28、47、48、56、104、110、
112、116、360、481、541 頁。

印度河——第 28、48 頁。

东印度——第 27、76—78、541 頁。

皮蒙特——第 33、524—527、545 頁。

皮尔姆——第 639 頁。

皮列柯普——第 139、168、314、328、348、
407、597、600、603、608、639 頁。

北京——第 714 頁。

北明翰——第 135、226、298、299、398、
399、436、456、457、460 頁。

叶尼卡列——十九世紀刻赤附近的堡垒。
——第 314、631、695、709 頁。

叶夫帕托利亚——第 139—141、168、191、
192、195—197、241、242、260、263、271、
309、313、327、348、523、558、592、593、
600、620、630、631、652、690、691、695—
697、699、702、703、706、709 頁。

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德涅泊彼得罗夫斯
克)——第 407、607、608 頁。

汉堡——第 714 頁。

汉格(汉科)——第 352—354、370 頁。

汉諾威——第 515、516 頁。

瓦尔——第 667 頁。

瓦尔那——第 41、42、129、130、142、146、
166、209、210、598、648、654、693、709
頁。

瓦拉几亚——第 16、23、29、49、161、289、
519、521、542、551、571 頁。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 55、85、284、
285、289、293、355、418、506、555、566、
607、644 頁。

圣让得阿克(阿卡)——第 71 頁。

布倫——第 467、668 頁。

布拉格——第 222 頁。

布薩庫——葡萄牙的一个居民点。——
第 580 頁。

布格河(西布格河)——第 17、24 頁。

布格河(南布格河)——第 14、16、17、22、
23、558、631、632 頁。

布达佩斯——第 222 頁。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 499 頁。

布来洛夫(布来拉)——第 648 頁。

布萊克本——第 78 頁。

布萊得弗德——第 456、457 頁。

布宜諾斯艾利斯——第 71 頁。

卡法——見費奧多西亚。

卡查河——第 240、261、262 頁。

卡利希——第 15、16、22、23 頁。

卡梅什——第 407、598 頁。

卡馬累, 又名科馬累——克里木的一个居
民点。——第 708、709 頁。

卡尔斯——第 521、557、630、633—635、
646—652、655、656、660、672、675—
678、680—682、684—688、694—696、
698、700、702—705、709—711 頁。

卡尔斯-查伊河(卡尔斯河)——第 650
頁。

卡尔斯堡(阿尔巴-尤利亚)——第 568
頁。

卡拉法特——第 139、140、196、598 頁。

卡麦涅茨(卡麦涅茨-波多尔斯克)——第 16、23 頁。
 卡兰亭灣——第 171、308、309、313 頁。
 加拉茲——第 608 頁。
 加尔各答——第 78 頁。
 加里西亚——第 16、18、23、92、219、566—568 頁。
 加利波利(格利博卢)——第 42、209 頁。
 加利斯河(克孜尔-伊尔馬克河)——第 166 頁。
 加利福尼亚——第 110、116 頁。

六 画

休达——第 535 頁。
 华沙——第 17、24、568 頁。
 匈牙利——第 17、94、164、219、222、223、225、311、469、489、491、544、654 頁。
 伍斯特——第 298、299 頁。
 列維里(塔林)——第 559 頁。
 列杜特-卡列——第 635、652、676、686、692、705 頁。
 朴次茅斯——第 77、360 頁。
 因克尔芒——第 139、143、158、170、174、184、207、241、259—261、308、312、378、380、388、406、415、417、420、423、483、484、487、513、533、573、576、578、580、590、596、597、600、602、603、619、631、655 頁。
 伐耳赫倫島——第 21、248 頁。
 米諾尔卡島,又名梅諾尔卡島——在地中海。——第 644 頁。
 西諾普——第 29、54、55 頁。
 西伯利亚——第 335 頁。
 西佐波耳(索佐波耳)——第 704 頁。
 伊茲馬伊耳——第 15、22、329 頁。
 伊奧尼亚群島——第 360、628 頁。
 安特卫普——第 715 頁。

安那托里亚——第 407、678 頁。
 安吉阿尔-斯凱萊西——第 73、361 頁。
 艾托多尔(哥里斯托耶)——克里木的一个居民点。——第 378、608 頁。
 艾尔斯貝里——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12 頁。
 乔尔貢——第 276、308、378、576 頁。
 乔罗赫河——第 633、635 頁。
 达尔馬威亞——第 489 頁。
 达达尼尔海峽——第 73、205、361 頁。
 多瑙河——第 24、49、74、88、92、129、139、205、209、327、331、348、350、522、556、596、602、608 頁。
 多瑙河各公国——見瓦拉几亞和莫尔达維亞。
 多布魯甲——第 271 頁。
 托斯卡納——第 527、543 頁。
 托利-莫納斯特尔(比托耳)——第 517 頁。
 亞眠——第 658 頁。
 亞得利亚海——第 223 頁。
 亞历山大罗波尔(列宁納坎)——第 634、647、680 頁。

七 画

里子——第 456、457 頁。
 里昂——第 93 頁。
 里昂河(里奧尼河)——在高加索。——第 635、651、680 頁。
 里沃夫——第 568 頁。
 別里斯拉夫——第 314 頁。
 別尔疆斯克(奧西片科)——第 314 頁。
 貝耳島——在比斯开灣。——第 665—667 頁。
 貝耳特——見大貝耳特海峽。
 貝薩拉比亞——第 16、17、23、169、331、418、504、656、660 頁。

貝爾貝克河——第 243、259、261—263、378、608 頁。
 沃倫——第 14、17、22、169、310、381、418、590 頁。
 沃耳特(沃耳士)——第 633、635 頁。
 沃耳特尼察——第 522、596、602 頁。
 沃耳契亞河——第 608 頁。
 坎訥(坎涅)——第 3 頁。
 但澤(格但斯克)——第 321、323 頁。
 利物浦——第 288、342、360、406、426 頁。
 麥加城——第 647 頁。
 杜羅河——在比利牛斯半島。——第 71 頁。
 呂宋島——在太平洋。——第 536 頁。
 那不勒斯——第 71、398、543 頁。
 辛費羅波爾——第 139、168、211、242、259、260、262、381、407、592、609 頁。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 29、54、73、77、81、90、142、146、148、161、168、182、183、186、198、209、210、218、241、292、327、348、424、517、521、557、633、647、650、653、676、678、682、683、685、688—690、692、693、697、700、703 頁。
 蘇格蘭——第 10、30、31、55、56、625 頁。
 蘇姆拉(科拉羅夫格勒)——第 58、64、209、517、598 頁。
 蘇利納河口,又名蘇利納支流——在多瑙河三角洲。——第 49 頁。
 蘇茹克-卡列——高加索海岸要塞。——第 74、315 頁。
 蘇胡姆-卡列——第 635、650 頁。
 克里木——第 3、4、11、14、16—20、22、23、31、33—35、38、40、41、53、57、58、61、63、65、66、77、81、87—92、95、96、115、124、125、130、132、133、138、141—148、158、159、166—169、183、184、186、

188、191、192、194、196—198、210、230、240—242、248、259、260、270、271、274、285、286、293、308、310—312、314、315、325、326、328、329、337、338、348、349、354、358、361、365、375、380—382、386、390、391、404—408、412、415、417—420、422、425、427、470、474、475、479、481、484、486、501、510、514、522、526、542、547、552、553、556—558、562、570、575、589、593、595、597—601、607—610、619、620、623、627、628、633、636、638、650、653、655、660、661、665、667、670、681、689、693、696、712 頁。

克亞索——瑞士的一個居民點。——第 528 頁。

克萊德——在蘇格蘭。——第 360 頁。

克萊納——第 219 頁。

克拉科夫——第 93、567 頁。

克羅地亞——第 219 頁。

克倫地亞——第 219、221 頁。

八 画

林茨——第 568 頁。

明喬河——在意大利。——第 224 頁。

帕爾馬——第 527 頁。

居姆里——見亞歷山大羅波爾。

金布恩——第 558、631、632、652 頁。

易北河,又名拉巴河。——第 223 頁。

些耳德河——第 71 頁。

直布羅陀——第 88、96、177 頁。

的黎波里——第 518、519 頁。

明格列里亞——第 652、656、680—682、697、698、700、706、708 頁。

法納哥里亞堡——第 630、631 頁。

芬蘭——第 17、23、418、425、656 頁。

芬蘭灣——第 318 頁。

羅馬——第 90、148、354、453、528、542、

544 頁。
 罗契得尔——第 628 頁。
 孟买——第 78 頁。
 孟加拉——第 28、48 頁。
 刻赤——第 240、260、270、275、298、314、
 315、325、327、406、631、652、691、696、
 700、708、709 頁。
 刻赤海峽——第 655 頁。
 拉弗勒舍——第 663 頁。
 拉姆別薩(拉姆別茲)——第 665 頁。
 拉芒什海峽——第 124、138、543 頁。
 波河——第 59、64、525 頁。
 波斯灣——第 71、74 頁。
 波茲南——第 322、500 頁。
 波尔頓——第 78 頁。
 波列西耶——第 17、24 頁。
 波多黎各——第 536 頁。
 波多利亚——第 14、17、22、24、310 頁。
 波罗的海——第 16、23、87、143、147、
 148、296、306、329、418、425、505、542、
 556、557、559、584、585、587、656、712
 頁。
 波斯尼亚——第 519、520 頁。
 波尔塔瓦——第 407 頁。
 波尔塔瓦省——第 330、350、608 頁。
 波希米亚——見捷克。
 波希米亚(捷克)森林——山脉。——第
 219 頁。
 波多尔斯克(赫梅里尼茨克)省——第
 330、350 頁。
 阿納帕——第 315、327 頁。
 阿思隆——第 136 頁。
 阿勒頗(哈勒布)——第 518 頁。
 阿速夫——第 314 頁。
 阿速夫海——第 298、314、328、348、381、
 406、419、558、597、603、631 頁。
 阿尔及尔——第 90、168、666 頁。

阿尔馬河——第 57、59、207、240、242、
 243、261、263、474、510、513、580 頁。
 阿尔达汉——第 651 頁。
 阿卢什塔——第 260、261 頁。
 阿卢普卡——第 261、262 頁。
 阿斯佩恩——第 144、149、491 頁。
 阿拉木特——中世紀伊朗的堡垒。——
 第 7 頁。
 阿拉巴特——第 314 頁。
 阿拉巴特砂咀——第 632 頁。
 阿德里安堡(爱德尔納)——第 19、72、
 210、517 頁。
 阿腊克斯河——第 633、650 頁。
 阿哈尔齐赫——第 646 頁。
 阿尔巴尼亚——第 519、520 頁。
 阿尔德肖特——第 572 頁。
 阿尔明尼亚——第 556、633、635、647、
 650、651 頁。
 阿尔明尼亚高原——第 635、646 頁。
 阿尔卑斯山脉——第 219、713 頁。
 阿尔汉格尔斯克——第 556 頁。

九 画

耶拿——第 263、467 頁。
 柏林——第 161、238、499、714 頁。
 軍港——第 591 頁。
 信德——巴基斯坦的省。——第 584 頁。
 叙利亚——第 519 頁。
 突尼斯——第 518、520 頁。
 保加利亚——第 425、676 頁。
 查特尔山——第 260、600 頁。
 施梯里亚——第 219 頁。
 美因茲——第 322 頁。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715 頁。
 威尔特郡——第 76 頁。
 威斯特伐里亚——第 713 頁。
 拜兰——第 210 頁。

拜达尔(奥尔利諾耶)——克里木的一个居民点。——第 378 頁。
 拜达尔盆地——第 261、262、308、312、406、562、578、620 頁。
 南灣——第 143、147、320 頁。
 南威克——第 253、278 頁。
 南高加索——第 328、608、656 頁。
 科倫——第 322、500、713 頁。
 科布倫茨——第 322、500 頁。
 科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第 322、499、500 頁。
 科尔富島——第 88、96、360、480 頁。
 科尔貝克(科洛布热克)——第 321 頁。
 哈佛尔——第 715 頁。
 哈尔科夫——第 331、350、407 頁。
 哈尔科夫省——第 330、350 頁。
 哈里法克斯——在英国。——第 456、457 頁。
 哈里法克斯——在加拿大。——第 309 頁。
 哈得茲菲尔德——第 456、457 頁。

十 画

翁热——第 667 頁。
 拿騷——第 515 頁。
 敖德薩——第 210、306、328—331、348—350、352、381、407、607、608、631、639 頁。
 高加索——第 16、23、74、328、329、349、418、505、556、608、635、652、656、680 頁。
 涅夫勒——法国的省。——第 667 頁。
 臭水海(錫瓦什)——湖泊。——第 314 頁。
 郎卡郡——英国的郡。——第 152、480 頁。
 索美塞特——英国的郡。——第 201 頁。

納尔根(奈薩尔)島——在塔林附近。——第 587 頁。
 倫敦——第 4、27、41、48、49、85、124、158、161、163、179、204、206、228、230、247、249、278、290、297—299、341、342、354、358、359、364、365、382、385、386、390、391、393、398、406、408、423、426、436、449、456、457、546、547、589、594、627、644、683、691—693、697、700、708 頁。
 倫巴第——第 222、491、528 頁。
 特拉比魯德(特拉布松)——第 205、651、652、677、680、684、685、697—699、712 頁。
 特兰西瓦尼亚——第 489、568 頁。
 哥特兰島——在波罗的海。——第 531 頁。
 哥本哈根——第 355 頁。
 埃及——第 113、519、520 頁。
 埃罗——法国的省。——第 667 頁。
 埃尔斯倫(埃尔祖魯姆)——第 518、521、557、633、646、649—651、677、678、680—682、684—687、695、697、698 頁。
 爱尔兰——第 29、30、47、48、55、70、77、134—137、443—446、449、450、453、539、625 頁。
 爱丁堡——第 450、601 頁。
 爱沙尼亚——第 656 頁。
 馬賽——第 360、381、417、422 頁。
 馬連峨——第 148 頁。
 馬尔他島——第 88、96、129、360、480、628 頁。
 馬斯拉克——克里木的一个居民点。——第 592 頁。
 烏克蘭——第 597、603 頁。
 烏尔姆——第 599 頁。
 烏里治——第 360 頁。

烏得勒支——第 126 頁。
 烏爾庫斯塔——克里木的一个居民点。
 ——第 620 頁。
 格魯吉亞——第 328、349、677、679、680
 頁。
 格拉斯哥——第 342 頁。
 格尼切斯克——第 314 頁。
 格拉克列亞的赫爾松涅斯——第 18、58、
 63、139、141、168、174、198、242、263、
 275、309、312、313、379、598 頁。
 庫拉河——第 635 頁。
 庫盧魯——克里木的一个居民点。——第
 630 頁。
 庫班河——第 329、349、504、608 頁。
 庫爾姆(赫魯美茨)——捷克斯洛伐克的
 一个居民点。——第 210 頁。
 庫泰依斯(庫泰依西)——第 635、651、
 676、680 頁。
 庫爾迪斯坦——第 519 頁。
 庫楚克-凱納吉(凱納吉)——第 180、210、
 285、293 頁。

十一画

第戎——第 93 頁。
 崩港——第 666 頁。
 得比——第 456、457 頁。
 教皇國——第 542 頁。
 曼都亞——第 321 頁。
 曼徹斯特——第 78、110、116、226、228、
 305、342、406、426、427、436、601 頁。
 設菲爾德——第 362、398、399、456、457
 頁。
 朗卡斯特公國——第 77 頁。
 梯維爾頓——第 272 頁。
 梯弗里斯(梯比里斯)——第 635、648、
 680 頁。
 捷克——第 17、24、92、219—222 頁。

捷列克河——第 329、349、504、608 頁。
 梅努特——第 100 頁。
 梅克倫堡——第 515 頁。
 梅肯集高地——在克里木。——第 575、
 609 頁。
 莫斯科——第 94、182、186、330、331、
 350、607、608、639 頁。
 莫拉維亞——第 17、24、220 頁。
 莫爾達維亞(莫爾多瓦)——第 16、17、
 23、29、49、161、289、519、542、551、571
 頁。
 基輔——第 17、24、608 頁。
 基輔省——第 330、350、608 頁。
 基連灣——第 171 頁。
 基連谷——第 321、377、392、614 頁。

十二画

凱恩——第 665 頁。
 溫莎——第 8 頁。
 都柏林——第 446 頁。
 菲律賓群島——第 536 頁。
 費奧多西亞——第 194、198、211、240、
 260、327、328、348 頁。
 提羅耳——第 222 頁。
 提爾西特(蘇維埃斯克)——第 329、349
 頁。
 雅典——第 35、90、148 頁。
 雅爾達——第 260 頁。
 雅伊拉(克里木山脉)——第 261 頁。
 博羅迪諾——第 469 頁。
 博馬爾松德——第 586 頁。
 博斯普魯斯海峽——第 42、73、598、676、
 709 頁。
 萊比錫——第 144、149、531、714 頁。
 萊茵河——第 327、713 頁。
 萊斯特——英國的郡。——第 202 頁。
 普雷斯頓——第 78、110 頁。

普魯特河——第 17、24、552、553、569、570 頁。

普瓦提埃——第 648 頁。

普澤米希尔——第 567、568 頁。

黑河——第 139、143、192、194、197、198、240、242、243、259、262—264、271、276、308、312、324、354、378、407、408、525、558、561、562、575—577、579、590、592、593、596、597、602、603、608、620、631 頁。

黑海——第 3、5、19、87、88、108、114、140、211、212、221、289、296、304、306、327、330、331、338、339、348、350、407、465、505、542、558、632、633、654、656、684 頁。

黑森——第 515 頁。

黑森-达姆斯塔特——第 515 頁。

黑塞哥維那——第 519 頁。

斯泰福——第 302、306 頁。

斯庫塔里(烏斯庫达尔)——第 42、81、129、182、183、187、563 頁。

斯特劳德——第 437、440 頁。

斯特拉斯堡——第 145、148、668 頁。

斯摩棱斯克——第 94 頁。

斯維阿波尔格(苏奧緬林納)——第 559—561、564、584、586、587 頁。

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第 530 頁。

十三画

滑铁卢——第 358、379、580、629 頁。

新奥尔良——第 467 頁。

蒙瓦勒里安——第 235 頁。

頓河——第 381 頁。

頓河軍区——第 597 頁。

奧登堡——第 515 頁。

奧查科夫——第 558、632 頁。

奧里繆茨(奧洛摩茨)——第 568 頁。

奧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第 162、467 頁。

塔曼——第 630、631 頁。

塔霍河——在比利牛斯半島。——第 71 頁。

塔姆沃思——在英国。——第 549 頁。

塔干罗格——第 314、328、348 頁。

塔夫利达省——第 607 頁。

塞爾維亞——第 220、519 頁。

塞瓦斯托波尔灣,又名塞瓦斯托波尔停泊場。——見大灣。

塞瓦斯托波尔和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第 4、10、19、53、58、60、63、65、66、99、122、123、130、132、138、141—147、159、167—171、173、177、191、194—198、209、211—217、230、233、235、241、242、259—261、264—266、270、285、308、310、312、314、315、320、323、324、327、328、335、348、352—354、358、359、375、380、381、406、408、412、415、416、419、421、483、509、512、513、595—600、602、603、614、652、653、655、660、679、682、691、693、695、697、699、704—706、709 頁。

大凸角堡(第三棱堡)——第 232、353、375—377、379、392、396、557、590、601、610、611、614、616—619、628 頁。

小凸角堡(第一棱堡)——第 614、616、617、619 頁。

中央棱堡(第五棱堡)——第 231、232、308、313、591、614、615、617—619 頁。

巴甫洛夫炮壘,又名巴甫洛夫炮台。——第 590 頁。

市区——第 265、320、615 頁。

北区——第 141、169、197、232、259、

261、263、264、276、324、325、406、416、421、589、592、593、597、598、600 頁。

北堡，又名北炮台。——第 138、192、242、609 頁。

卡兰亭棱堡（第六棱堡）——第 265、375、591 頁。

尼古拉也夫炮壘，又名尼古拉也夫炮台。——第 592 頁。

色楞格多面堡——第 171、193、216、217、230、231、265、309、320、321、324、377 頁。

亚历山大罗夫炮壘，又名亚历山大罗夫炮台。——第 592 頁。

沃倫多面堡——第 230、231、265、309、320、321、324、377 頁。

南区——第 60、141、168、232、264、324、325、354、359、380、408、415、421、562、589、595、598、602、619、620、652、653、655、708 頁。

軍港区——第 320、379、380、396、591、592、595、602、615、619 頁。

馬奇塔棱堡（第四棱堡）——第 230—232、236、265、308、313、375、591、614—616 頁。

馬拉霍夫岡（科尔尼洛夫棱堡）——第 170—172、193、194、197、217、231、236、324、353、377、379、392、394、395、415、420、557、562、589—592、595、596、598、601—603、614—618、619、620 頁。

堪察加眼鏡堡，又名馬美朗。——第 217、230、231、265、309、320、321、324、375—377、394、415、420、590、611、616、655 頁。

雅佐諾夫多面堡，又名花园炮台。——第 266 頁。

十四画

維也納——第 5、14、29、33、54、55、81、83、87、96、100、129、148、158、160—164、191、203、204、222、224、230、234、238、273、278—281、283—287、289、292、294、303、304、306、317、335、337、343、344、346、347、402、424、492、519、543、567、568 頁。

維爾諾（維爾紐斯）——第 639 頁。

維爾騰堡——第 515 頁。

維斯拉河——第 17、94、326、338、506 頁。

維多利亞——在澳大利亞。——第 119—121 頁。

赫拉特——第 74 頁。

赫爾松——第 17、314、328—330、348—350、381、407、558、597、603、607、608、632 頁。

赫爾松省——第 607 頁。

赫爾松涅斯——見格拉克列亞的赫爾松涅斯。

赫爾辛福斯（赫爾辛基）——第 370、560 頁。

十五画

劍橋——第 248、249 頁。

墨爾本——第 119、120 頁。

摩地那——第 527 頁。

慕尼黑——第 567 頁。

魯舒克（魯塞）——第 209、598 頁。

魯美利亞——第 407 頁。

潘普洛納——第 580 頁。

撒丁——見皮蒙特。

撒丁島——第 523、524、527 頁。

德勒穆——第 202 頁。

德涅泊河——第 17、24、314、338、381、558、607、608、631 頁。

德普弗德——第 360 頁。
 德韦-博荣——高加索的山岭。——第
 649、650 頁。
 德涅斯特尔河——第 14、16、17、22—24、
 331 頁。

十六画

諾定昂——第 152、155、456、457 頁。
 默麦尔(克莱彼达)——第 244 頁。
 霍亭——第 568 頁。
 霍尔施坦——第 515、532、533 頁。
 錫兰島——第 360 頁。
 錫瓦斯——第 685 頁。
 錫利斯特里亚(錫利斯特腊)——第 130、

194、210、511、521、598、631、638、648
 頁。

十八画

薩瓦——第 327 頁。
 薩克森——第 515、640 頁。
 薩蓬山——第 197、216、217、231、275、
 375、376、655 頁。
 薩福克——英国的郡。——第 202 頁。
 薩尔茨堡——第 568 頁。
 薩塞克斯——英国的郡。——第 107 頁。
 薩塞克湖——第 140、630 頁。
 薩耳吉尔河——第 260、600 頁。